拉康研讨班 · 第四期

客体关系

La relation d'objet

1956—1957

雅克 · 拉康 著
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 译

中文阅读版
2026-10-30

版本说明

本册收录第四期研讨班《客体关系》（La relation d'objet，1956—1957）共24课的现有中文译文，依据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本地源文件整理。版本日期：2026-10-30。

保留正文、正文图示和段下注释；移除建言、独立阅读笔记及其入口。相关知识卡链接保留在对应段落下，联网后可打开在线卡片。电子书正文、图示与公式可离线阅读。

译文覆盖已完成，翻译校订与注释仍在进行。本册为版本快照；后续修订以项目在线版为准。

作者：Jacques Lacan（雅克·拉康）
中文译文及编辑：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贡献者
在线阅读：KotobaRin 言林
项目来源：Lacan Chinese Translation Project

文本来源与对照版本

项目整理和翻译的研讨班原始文本主要来自 Staferla。翻译校订与注释以法语文本见证为主，并按册次和疑难段落参照下列主要版本：

- **法语底本**：Staferla：La relation d'objet；本项目整理、分段与法中对齐所用的主要法语原始文本
- **英语书目参照**：Cormac Gallagher, Object Relations；Lacan in Ireland 研讨班英译页面；本次用于核对册次、课年和英文题名；未据此逐段改写

这些版本用于核对疑难句、术语、引文和异文，不取代法语底本；并非每一册或每一段都使用全部版本，具体取舍以段下注释为准。

联系与交流

预约精神分析工作可以添加 分析师工作微信：Yanlin_Char
翻译项目交流qq群：700300644
分析师bilibili账号 **言林_Char**

项目贡献者创作的中文译文、译注等采用 CC BY 4.0。法文原始材料与第三方图像不因收录而自动纳入此授权。范围以项目 NOTICE 为准。本册仅作内容筛选、链接转换和排版，未改写译文。

目录

第1课 · 1956年11月21日 6
第2课 · 1956年11月28日 27
第3课 · 1956年12月5日 48
第4课 · 1956年12月12日 73
第5课 · 1956年12月19日 96
第6课 · 1957年1月9日 122
第7课 · 1957年1月16日 146
第8课 · 1957年1月23日 174
第9课 · 1957年1月30日 200
第10课 · 1957年2月6日 218
第11课 · 1957年2月27日 239
第12课 · 1957年3月6日（速记稿将本课日期标为3月13日） 262
第13课 · 1957年3月13日（速记稿将日期标为3月6日） 284
第14课 · 1957年3月20日 305
第15课 · 1957年3月27日 333
第16课 · 1957年4月3日 360
第17课 · 1957年4月10日 382
第18课 · 1957年5月8日 405
第19课 · 1957年5月15日 426
第20课 · 1957年5月22日 447

第21课 · 1957年6月5日 469
第22课 · 1957年6月19日 493
第23课 · 1957年6月26日 521
第24课 · 1957年7月3日 549

第1课 · 1956年11月21日

今年我们要讨论一个主题。在所谓的精神分析的历史演变中，这个主题无论是否得到明确表述，都在理论与实践里占据着完全核心的位置。这个主题就是客体关系。

既然这个主题早已切合当下、早已居于首位、早已处在中心、早已具有批判性，那么我们开始这些研讨班时，我为什么没有选择它？恰恰是因为我的标题第二部分所指出的理由：只有先对一个问题形成某种看法，并同它拉开一定距离，才能处理这个主题。这个问题就是，弗洛伊德向我们揭示了哪些结构，分析在这些结构中展开并发生作用；尤其是在分析现场的两个主体——受分析者与分析家——之间那种关系的复杂结构。

过去三年，我们通过评注和批判弗洛伊德的文本所做的一切，正是为此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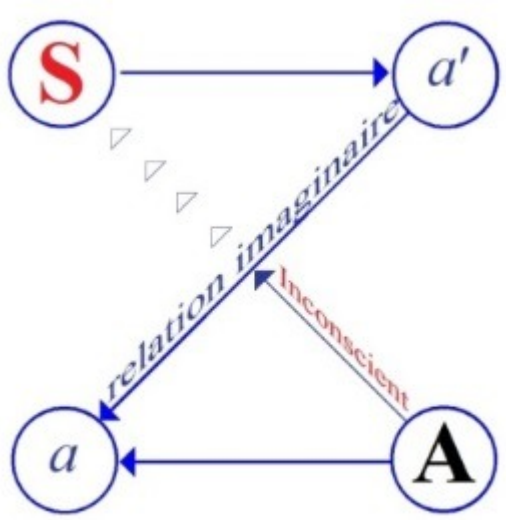
- 第一年讨论的，是所谓技术操作本身的基本要素，也就是转移概念与阻抗概念；

- 第二年讨论的，必须说是弗洛伊德经验与发现的根基，也就是严格意义上的无意识概念。我相信，第二年我已经充分向你们表明：正是这个无意识概念，迫使弗洛伊德引入那些在纯粹辩证层面上简直

是悖论性的原则，也就是他在《超越快乐原则》中不得不引入的原则；

- 最后在第三年，我给了你们一个清楚的例子：要从分析的角度理解精神病所固有的偏执狂性领域，就绝对有必要把象征界中那个叫作能指的根本环节单独提取出来。

因此，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一批术语，并由此得出了若干图式。这些图式的空间性绝不能按照“图式”一词的直观含义来理解：它们不包含任何定位，却完全正当地包含一种空间化——这里的空间化意味着位置关系、拓扑关系，例如居间关系，又或先后与序列关系。



这些图式中的一个，汇集了我们经过数年批判所得出的一切。我们可以依照定义来称呼这个图式，并把它同另一种图式对置起来：后者铭写的是主体与大他者的关系，即分析开始时所构成的那种“自然”关系

——一种虚拟关系、一种虚拟言说的关系；借由它，主体［S］从大他者［A］那里，以无意识言说的形式，接收到他自己的讯息。

这则他被禁止接收的“自己的讯息”，由于 a 与 a′ 之间的想象关系横插进来，而遭到歪曲、截断、攫取，并被他从根本上误认。所谓这一横插进来的关系，正是这个自我与那个他者之间的关系；后者是自我的典型对象。换句话说，想象关系［a ↔ a′ ］打断、拖慢、抑制并且往往倒转主体与他者之间的言说关系，还通过一种根本上异化的关系对它作出深刻误认。这里的他者是大他者：他本身也是一个主体，而且尤其是一个能够欺骗的主体。

这就是我们所抵达的图式。你们很清楚，当我们把它重新放回分析内部时，它并不是某种无关紧要的东西……[注]。如今越来越多的分析家都这样表述问题，而我们将要质疑的，正是客体关系在分析理论中的这种优先地位——可以说，是未经评注的客体关系、原初客体关系、客体关系本身：

> [注] 此处法文转录在 ce n’est pas quelque chose qui n’est pas […] 处有缺文，句子的否定结构无法完整复原；译文保留省略号，不据上下文补成确定判断。

相关知识卡 《研讨班 IV》对客体关系优先性的批评

- 它被置于分析理论的中心位置；
- 它重新规定了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的整套辩证法的中心；
- 它把分析的一切进展都奠立在某种可称为主体—对象关系的物化之上：这种关系被视为一种二元关系；谈到分析情境时，人们还告诉

我们，这是一种极其简单的关系。正是这种主体与对象的关系，越来越趋于占据分析理论的中心。

相关知识卡 《研讨班 IV》对客体关系优先性的批评

我们要检验的恰恰就是这一点。我们要看，能否从我们图式中确切对应于 a → a′ 这条线的东西出发，令人满意地建构出观察与分析经验呈现给我们的全部现象；这个工具单凭自身能否说明事实；换言之，我们所提出的那个更复杂的图式，是否应当受到忽略，甚至被排除。

客体关系至少表面上已经成了解释分析的首要理论要素，我想我会持续不断地给你们提供证明。倒不是说我要让你们专心研读最近出版的一部可称为集体著作的书[注1]——“集体”这个词用在它身上确实格外贴切。你们会看到，全书从头到尾都在突出客体关系；它的论述或许并不总是特别令人满意，但其单调与整齐划一无疑十分惊人。其中一篇明确题为《精神分析的演变》的文章，把这种客体关系推到了前台；而在作为这一演变终点的《精神分析临床》一文中，你们还会看到一种完全以客体关系为中心的临床呈现方式。

[注1] 参见《今日精神分析》（La psychanalyse d’aujourd’hui），法国大学出版社，1956 年；下文简称 P.D.A.。

我或许还会举出这种呈现方式能够抵达的一些观念。整体情形的确十分引人注目：实践分析的人试图围绕客体关系来整理自己的思想，整理自己对亲身经验所能形成的理解。然而，这种观念在我们看来并不能给予他们充分而完整的满足。

但另一方面，这种观念确实深刻引导并渗入他们的实践，因为无法设想：他们在这一语域中的经验竟不会对他们的介入方式、对分析所取

的方向、从而对分析的结果产生实际后果。倘若只是阅读和评注，这一点很容易遭到误认；可是人们历来都说，分析理论与实践不能彼此分离、彼此割裂。

一旦以某种方向来理解分析，就不可避免地也会沿着某种方向来实施分析，即使理论方向与实践结果同样都只能隐约看见。为了提出客体关系的问题，提出它在分析理论中占据中心位置究竟有何正当性、又有何无根据之处，我必须至少简要提醒你们：这个概念在何种意义上源自弗洛伊德本人，又在何种意义上并非如此。

我之所以这样做，不仅因为从评注弗洛伊德出发，确实是我们在这里给自己设下的一种指南，甚至近乎一种技术限制；还因为今年我察觉到了一些疑问——即便还算不上忧虑——人们想知道我是否仍会从弗洛伊德的文本出发。然而，讨论客体关系时，很难直接从弗洛伊德本人的文本出发，因为那里并没有这个概念——我指的当然是此处得到十分明确断言的那种、被我视为分析理论偏离的客体关系。因此，我不得不从近期文本出发，同时也从对这些立场的某种批判出发。

不过，我们最终必须参照弗洛伊德的立场，这一点毫无疑问。因而，我们也不能不至少迅速提到：在严格说来最根本的弗洛伊德主题中，哪些东西围绕着对象概念本身展开。开头时我们不可能详加展开，我会尽量迅速处理。当然，这也意味着：到最后，我们恰恰必须越来越多地重新拾起、展开、找回并明确表述这些问题。我现在只想作一个简短提醒；若非我们身后已有三年共同分析文本的工作，若非你们早已同我一道以不同形式遇到过对象这个主题，就连这样的简述也不可能做到。

在弗洛伊德那里：

- 当然谈到了对象。《性学三论》中有一节的标题，恰恰就是对象的“寻找”，更准确地说，是对象的“找到”；
- 每当现实概念介入时，对象也以隐含方式得到讨论；
- 每当某些根本关系的矛盾情感受到牵涉时，对象还以第三种方式得到讨论：主体使自己成为他者的对象；存在着某种关系类型，其中主体与对象的位置彼此可逆，而这种相互性对主体而言既是显明的，也是构成性的。

我想更着重地强调这些对象概念向我们显现的三种方式。

因此，我才提到弗洛伊德那里可以让我们确证并明确表述对象概念的一个地方。你们若回到《性学三论》的这一节，就会看到有一种说法早已在那里出现；而在更早的时候，由于某种历史偶然才得以出版的那篇文本中——弗洛伊德不仅无意出版它，它甚至可以说是违背他的意愿而出版的——我们也已经在他的第一份心理学《纲要》中看到同一个有关对象的表述［参见《科学心理学纲要》，收入《致威廉·弗利斯书信》］。

弗洛伊德强调：对人而言，任何找到对象的方式，都不过是一种倾向的后续；这种倾向所关涉的是一个失落的对象，一个有待重新找到的

对象。对象并不像现代理论所设想的那样，被视为能够带来完全满足的东西：

- 典型对象，
- 首要对象，
- 和谐对象，
- 使人奠立于一种适当现实、奠立于那种证明其已经成熟的现实之中的对象，也就是那个著名的生殖器对象。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弗洛伊德根据最初的分析经验建立本能演变理论时，向我们指出，这一演变是通过寻找失落对象而被把握的。这个对象对应于本能成熟的某个较晚阶段；它就是在第一次断奶中失去、后来又被重新找到的对象，也就是最初曾作为儿童最早满足之依附点的那个对象。它是一个被重新找到的对象。

显而易见：

- 仅仅由于“重复”这一项，就已经引入了一种不相合：某种怀旧把主体系于失落对象，全部寻找努力都通过这种怀旧而展开；而重新找到对象这件事，又带着一种不可能的重复的印记，因为它恰恰不是同一个对象，也不可能是同一个对象；

相关知识卡 《研讨班 IV》对客体关系优先性的批评

- 这一辩证法具有优先地位：它把一种根本张力置于主体—对象关系的中心，使得受到寻找的东西，并不是按照最终找到之物的同一种

身份受到寻找的；新的对象正是通过对一种已经过去、已经被越过的满足的寻找而受到寻找、被找到，并且在不同于寻找目标的地方被把握；

- 一切对象寻找都包含一种根本冲突，这一要素引入的根本距离，正是客体关系概念在弗洛伊德那里出现的第一种形式。

我想说，为了把我在这里所强调的东西充分突出出来，我们在这里恐怕只能勉强借助那些已经经过哲学阐发的术语，因而也只能把它表述得不够妥帖……我有意不这样做，而要把它留到我们重新回到这一项时再谈；对于那些凭借某些哲学知识已经懂得这些术语的人来说，弗洛伊德那里主体与对象之关系的全部"距离"，同此前某种对象观之间的距离，已经包含在如下对立之中。此前的对象观把对象看作适当对象，看作预先受到期待、同主体成熟相互配合的对象。与它相对的，一边是柏拉图式视角——它把一切把握、一切认出都奠立在对某种仿佛预先成形的类型的回忆之上；另一边则是一种根本不同的概念，其间隔着现代经验与古代经验之间的全部距离：

这就是克尔凯郭尔在《重复》名下提出的概念[注2]。这种重复总是受到寻找，却在根本上永远不能得到满足，因为就其本性而言，它绝不是回忆，而始终是作为重复本身的重复，因而不可能被满足。弗洛伊德那里重新找到失落对象的概念，就处在这一语域之中。

> [注2] 索伦·克尔凯郭尔：《重复》，载《全集》第 5 卷，蒂索译，L'Orante 出版社，1972 年；另有维亚拉内译《重演》，GF 丛书，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90 年；以及蒂索译《重演》，收入《索伦·克尔凯郭尔》，Bouquins 丛书，罗贝尔·拉丰出版社，1993 年。

我们要记住这段文本。在弗洛伊德第一次说明对象概念的地方，这一点应当足以成为关键依据。当然，问题从根本上是以主体同其世界之间一种深刻冲突的关系为基础而得到提出和规定的。除此之外还能怎样呢？因为早在这个时期，关键所在就是现实原则与快乐原则之间的对立。

如果说现实原则与快乐原则不可彼此分离，我还会进一步说：二者在一种辩证关系中相互蕴含、相互包容。因此，正如弗洛伊德始终确立的那样，现实原则只是由为了满足快乐原则而强加给它的条件所构成；在某种意义上，它不过是快乐原则的延伸。

反过来，如果现实原则在自身的动力和根本追寻中蕴含着快乐原则的根本张力，那么二者之间仍然存在一道裂隙——这正是弗洛伊德理论所带来的要点。倘若一个原则只是接续另一个原则，就没有必要把这道裂隙区分出来：

- 快乐原则趋向于在一种深刻非现实的构成物中实现自身；
- 现实原则则意味着另一种自主组织、另一种自主结构的存在；这也意味着，它所把握的东西，恰恰可能同受到欲望的东西根本不同。

就在这种关系中，主体与对象的辩证法本身又引入了另一项，一项在这里被设定为不可还原的东西：

- 正如我们刚才所说，对象在其原初要求中被奠定为某种总是注定要返回、并因此注定只能不可能地返回的东西；

- 同样，在现实原则与快乐原则的对立中，我们也看到一种根本对立：一边是现实，另一边是倾向所寻找的东西。

换言之，快乐原则的满足始终潜伏在一切创造世界的活动之下，并总是或多或少地趋向于以某种程度的幻觉形式实现自身。这种组织——它潜藏在自我之下，也是主体本身的倾向——有一种根本可能性：在非现实的实现中、在幻觉式的实现中得到满足。这就是弗洛伊德有力强调的另一项；从《梦的科学》、从《释梦》（Traumdeutung）开始，从他第一次完整而明确地表述现实原则与快乐原则的对立开始，就是如此。

这两个立场本身并没有彼此衔接起来。正因为它们在弗洛伊德那里以相互分立的方式出现，才清楚表明整个展开并不以主体同对象的关系为中心。这两项各自在弗洛伊德辩证法的不同位置上得到安置，理由很简单：主体—对象关系无论如何都不居于中心；它只以一种看起来仿佛能够直接地、毫无裂隙地自我支撑的方式出现。

主体正是在这种矛盾情感关系中，或者说在后来被称作“前生殖器期”的那类关系中——“看—被看”“攻击—被攻击”“被动—主动”——经历这些关系。这些关系总是或隐或显地蕴含着主体对关系伙伴的认同；也就是说，主体的位置与伙伴的位置以一种相互性——这个词在这里是适用的——、以一种矛盾情感的方式得到经历。

由此引入的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关系，不但直接而没有裂隙，而且二者简直彼此等价。正是这一点，为把客体关系本身置于首位提供了口实。但我们会看到什么？这种关系本身已经预示并明确显示，它配得上“镜像关系”这个名称，也就是主体与对象之间的相互性。它本身提出了如此之多的问题，以至于我把“镜像阶段”这个概念引入分析理论，正是为了尝试解决这些问题。镜像阶段绝不只是给儿童发展中的一种现象加上名称，即儿童认出自身形象的那个时刻；关键在于，儿童在被自身形象迷住的过程中所学到的一切，尤其在于他的内在张力同这段关系中由形象的实现、由对该形象的认同所唤起的张力之间的距离。然而，正是这种镜像关系被当作主题和中心，用来把主体—对象关系置于首位，仿佛它是一把现象尺度，足以有效地归置此前那些不仅以多元术语、而且严格说来以冲突术语呈现的东西；后者原本在不同项目之间引入的是一种根本上辩证的关系。

人们曾以为可以做到这一点……亚伯拉罕是最早强调这一点的人之一，尽管并没有人们以为的那么早……也就是试图重新规定迄今被引入主体演变中的一切的中心。那些东西原本总是通过重建、以回溯方式，从一种核心经验出发而得到看待：这种核心经验就是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冲突张力。造成这一冲突张力的根本事实是：倾向所寻找的东西是晦暗的；意识在其中认出的东西，首先而且根本上是误认；主体并不是沿着意识的道路认出自己。还有另一种东西，还有一个彼岸；而这个彼岸既从根本上受到主体误认，又处在其认识力所不及之处，因而立即提出了自身结构、原则与意义的问题。

这一点被若干人的倡议所放弃：起先是若干人物，随后则是分析内部一些影响重大的潮流。他们转而根据一种对象来思考；这种对象的终

点并不是我们的出发点，我们是从终点向后倒推，以理解如何抵达这个事实上从未被观察到的终点——那个简直不可思议的理想对象。

相反，这个对象被设想成一种瞄准点、一种抵达点；从某个时期开始，一系列经验、要素以及有关对象的局部概念都被认为向它汇聚，特别是自亚伯拉罕[注3]于 1924 年在其力比多发展理论中作出这一表述以来。对许多人而言，它由此奠定了分析本身的法则，奠定了分析中一切事件的法则。

> [注3] 卡尔·亚伯拉罕：《力比多发展史纲要》（“Versuch einer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r Libido”），载《全集》第 2 卷，Payot 出版社，2000 年，第 170 页；德文原版由国际精神分析出版社于 1924 年出版。

全部分析经验所处的坐标系，都由这个著名的理想对象的完成点来规定：它是终极的、完美的、适当的对象；分析把它当作一个标志，仿佛它本身就标明目标已经达到，标明主体已经“正常化”。单是“正常化”这个词，就已经引入了一个与分析的出发点非常陌生的范畴世界。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想没有什么比直接指出走上这条道路的人自己的表述——同时也是他们的坦白——更合适；这一点确实得到了极其明确的表述。他们认为，分析经验的进步就在于把主体与其环境的关系置于首位。对“环境”的这种强调，把整个分析经验缩减为某种向彻底客观化立场的回归：它首先设定某个个体的存在，以及这个个体同其环境之间或多或少适当、或多或少适应的关系。我们所谈的那部集体著作［P.D.A.］从第 761 页到第 773 页，就是用这些术语来表述问题的。

在明确指出分析的进步就在于强调主体与其环境的关系之后，我们顺便得知，这一点在小汉斯的观察中“尤其具有意义”：有人告诉我们，在小汉斯的观察中，他的父母仿佛没有自己的人格。

我们不必赞同这一意见；重要的是接下来的说法。据说这是因为当时我们身处：

> “……1914 年战争之前；在那个时代，西方社会充满自信，并不怀疑自身能否长久延续。相反，自 1926 年起，重点转向了焦虑以及有机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因为社会的根基也已经动摇，人们每天都在经历一个变动世界的焦虑，个体也认识到自己彼此不同。也正是在这个时代，物理学正在探索自身；相对主义、不确定性与概率论，仿佛夺走了客观思想对自身的信心。”

把现代物理学援引为一种新理性主义的基础，在我看来无需评论。重要的只是，这里以一种奇特的间接方式坦白了一件事：精神分析被设想成某种社会补救手段，因为被置于首位、被当作分析进步之动力特征的，正是这一点。

我们无须知道这种说法是否有根据；这些事情在我们看来分量很轻。只是，这些说法在此处如此轻率地获得接受，而这一语境本身对我们或许会有某种用处。

这并非唯一的例子。这部集体著作内部各篇之间的沟通，与其说经过了严格衔接，似乎不如说来自一种奇特的同质化。它还有另一个特点：我刚才提到的第一篇文章故意而且明确地提出，归根结底，为我们提供当前理解人格结构所必需的一般观念的，是据说最实际、也最

朴素不过的观察角度，也就是**病人的社会关系**（作者强调）［P.D.A.，第 761—773 页］。

我略过其他一些说法。那些说法涉及这种坦白的性质，并告诉我们：这种分析观念可以被视为变动的、人为的，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难道不是因为，这门学科的对象本身——没有人想要否认这一点——也随时间发生过变化吗？

这确实能够解释沿着这条路线出现的不同研究方式何以多少有些令人震撼，但它或许不能让我们完全满意。我看不出有哪一门学科的对象不同样会随时间而变化。

谈到主体同世界的关系，我们会看到一种平行关系得到断言和强调：一边是本能活动或多或少已经确立的成熟状态，另一边是主体在某个时刻的自我结构。总而言之，从某个时候起，这种自我结构被看作本能活动成熟状态的副本，最终更准确地说，是这一成熟状态的代表。自我进展的不同阶段与本能发展的不同阶段之间，无论在动力层面还是在发生层面，都不再有任何差别。

对你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这些说法本身或许并不显得特别值得批判。无关紧要，问题不在这里；我们以后会看到能否保留它们，以及能够保留到什么程度。其结果是，它们以一种极其明确、俨然拓扑的方式被树立在分析中心：一边是“前生殖器期者”，一边是“生殖器期者”。

“前生殖器期者”是脆弱的个体，他们的自我之连贯性“紧密依赖于同一个重要对象维持某些客体关系”。文本就是这样写、这样明确表述的。

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提出问题。稍后阅读同一批文本时，我们或许顺便会看到，这个未经解释的“重要”（significatif）概念能够走到何种地步；这个“重要”中完全没有任何区分与辨别。它所蕴含的技术观念，是把前生殖器期关系调动起来，同时在分析关系内部突出它们；这些关系刻画了这个“前生殖器期者”同其世界的关联。有人告诉我们，这些人同对象的关系具有某种欠缺：

> “……这些关系或其对象的丧失——二者在这里是同义的，因为对象只依据其同主体的关系而存在——会引起自我活动的严重紊乱，例如人格解体现象和精神病性障碍。”

在这里，人们试图找到一种检验标准，来证明自我同其对象之关系具有这种深刻的脆弱性：

> “……主体不惜一切代价维持自己的客体关系，并为此运用种种安排——更换对象，并借助移置或象征化；他会选择一个象征性对象，任意赋予它同最初对象相同的情感价值，从而使自己不至于被剥夺客体关系。”

最初对象的情感价值被移置到这个对象上，因此，把它称为“辅助自我”是完全有道理的。这也解释了下面的说法：

> “……相反，生殖器期者拥有一种自我；这种自我的力量及其功能运作并不依赖于占有一个重要对象。举最简单的例子：对前一类人而言，一个在主观上重要的人一旦丧失，他们的个体性就会受到威胁；而对生殖器期者而言，这种丧失无论多么痛苦，都丝毫不会动摇其人格的稳固。他们不依赖于客体关系。这并不是说，他们可以轻易省去一切客体关系——鉴于客体关系如此众多而多

> 样，这在实践上本来也做不到——而只是说，他们的统一性不会任由同一个重要对象的接触之丧失摆布。从自我与客体关系的关联来看，这正是他们同前一类人的根本区别。”

> “如果说，一如所有神经症，正常演变似乎因为主体无法解决童年最后一个结构性冲突而中止；如果说，这个冲突的彻底清算——姑且这样说——会通向一种极其幸福的世界适应，也就是所谓生殖器期客体关系，并使每个观察者都感到一种和谐人格，使分析立即察觉到某种水晶般澄澈的心灵——而我要重申，这与其说是现实，不如说是一个极限——那么，解决俄狄浦斯的这一困难，往往并不只来自俄狄浦斯本身提出的问题。”

水晶般的澄澈……我们也看得出，这位作者能够凭借客体关系的完满把我们带到哪里。他还把我们带到下面这种说法：

> “这里所涉及的驱力会使我们得出如下观念：前生殖器期形式以一种不可遏制、无限、无条件并带有破坏性的占有需要为标志；而在生殖器期形式中，驱力才真正是爱人的。即便主体并不因此就是奉献性的，亦即无私的；即便他的对象同前一种情形一样，根本上仍是自恋对象，他在这里却能够理解他者，能够适应他者的处境。此外，其客体关系的内在结构表明，对象参与自身的快乐，是主体获得幸福所不可或缺的。什么对对象是合宜的，以及对象的欲望和需要，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考虑。”

这已经足以向我们显示并开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在成熟过程中究竟应当作出哪些区分？成熟并不是一条道路、一种视角或一个平面，以至于我们不能在它上面实际提出如下问题：

“一个正常的童年、青春期和成年期最终会通向什么？”

然而，必须从根本上区分现实的建立——连同它所提出的一切适应问题，即适应于：

- 某种抵抗之物，
- 某种拒绝之物，
- 某种复杂之物，
- 某种无论如何都蕴含“客观性”概念的东西——最基本的经验已经向我们表明，这同这些文本以“客体性”这个不同术语或多或少隐含地指向的东西、即对象的完满，是两回事。

这里的混淆其实也得到了明确表达，因为文本把“客观性”当作这种完成了的关系形式的特征。然而，下面两者之间无疑存在距离：

- 一方面，是在某个时代被认为或多或少令人满意的某种世界建构所蕴含的东西——而这种建构当然又被规定在一切历史相对性之外；
- 另一方面，则是同他者的关系本身，即这里所谓情感乃至感伤的语域，以及对他者的需要、幸福与快乐的考虑。

这当然把我们带得远得多，因为这里涉及他者本身的构成，也就是作为言说者、作为主体的他者。我们还要回到这个问题。只把这些话引用出来，哪怕顺便作出几句它们自身已经足以引发的幽默评论，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完成了必需的推进。

这种在分析中极其初级地理解本能演变的方式，远未得到普遍接受。比如，格洛弗一类人的文本，无疑会把你们带回一种截然不同的“客体关系”探索观念，即使这些关系也被如此命名并得到明确界定。

阅读格洛弗的文本时，你们会看到，在我看来，个体发展的不同时期里，对象的各个阶段之所以具有自身特征，根本上是因为对象被设想成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功能。分析坚持引入一种关于对象的功能性概念；它在性质上截然不同于把对象当作主体某种要求的单纯对应物，截然不同于对象同这一要求的简单配合。

对象在那里具有完全不同的作用；可以说，它被放置在焦虑的背景之上。在主体发展的各个阶段，主体同世界的关系都以某种根本焦虑为底色；正因为对象是遮蔽、防御这一焦虑的工具，主体在每个阶段才必须通过对象得到刻画。

今天这次谈话结束之前，我不能不作一个点示，用某个例子来说明并凸显我关于这种观念所带给你们的东西：请注意，弗洛伊德关于恐怖症的根本经典观念，确切说来无非就是这一点。

弗洛伊德以及所有同他一道或在他之后研究恐怖症的人，都不能不表明：所谓恐惧并不会直接给这个对象涂上根本色彩，从而把它构成为某种原始对象。相反，这里所涉及的恐惧与对象之间存在相当大的距离。这种恐惧在某些情形下或许确实原始，在另一些情形下却也可能并非完全原始；至于与它相对的对象，则根本上正是为了把它维持在远处、把主体圈在某个圆圈和某道壁垒之内而构成的，主体在其中躲避这些恐惧。

相关知识卡 小汉斯的马：恐怖症作为防护构筑与能指替补

对象从根本上同警报信号的发出相联系；对象首先是抵御一种已经确立的恐惧的前哨。正是这种恐惧，在主体某次危机的某个时刻和某个确定点上，赋予对象以作用与功能；但这场危机根本上既非典型危机，也非发展性危机。

这种可以说是现代的恐怖症观念，或多或少能够得到正当地断言。我们还必须批判它，因为格洛弗式思想与技术所特有的著作和分析操作方式，正是由此发展出它们所推崇的对象概念。人们告诉我们，这里涉及的焦虑就是阉割焦虑；直到不久以前，这一点很少受到质疑。

然而，事情竟然发展到这种地步，实在值得注意：沿发生方向进行重建的欲望，甚至试图让我们从某种东西中推导出父亲对象本身的建构；这种东西被设想成原始的恐怖症对象建构的延续、归宿与绽放。曾有一篇关于恐怖症的报告，恰恰沿着这个方向前进，奇特地倒转了分析曾经让我们走过的道路：分析原本使我们从恐怖症追溯到它同焦虑的某种关系，追溯到恐怖症对象相对于这种焦虑所发挥的保护功能。

在另一语域中，恋物概念与恋物癖概念发生了什么变化，同样值得注意。我今天也把它引入，是为了向你们表明：如果从“客体关系”的视角看问题，那么分析理论确实把恋物明确表述成承担某种功能的东西；它同样提供一种针对焦虑的保护，而且——奇怪的是——针对的是同一种焦虑，也就是阉割焦虑。

不过，恋物似乎并不是通过同一条路径与阉割焦虑发生这种更特殊的联系；后者在这里同对女性主体缺少阳具器官的察觉，以及对这一缺少的否认相联系。这并不重要！你们不能不看到，对现实中表现为一

个洞、甚至一道深渊的东西而言，对象在这里同样发挥某种补足功能。于是问题便出现了：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关系？这个恐怖症对象与这个恋物之间，是否具有某种共同之处？

然而，一旦用这些术语提出问题，我们或许就必须在现象本身之中找到批判的契机与出发点，同时又不拒绝从客体关系入手。典型对象、理想对象、功能性对象，以及你们能够在人那里设想的一切对象形式，都可以提交给关于对象的这场质询；而这种批判会使我们真正从这一角度处理问题。

不过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能满足于用整齐划一的解释处理不同现象。比如，我们一开始就要把问题集中在：恐怖症与恋物的功能为何根本不同？因为二者都以同一种根本焦虑为背景，仿佛都应主体之需而被召来，充当一种保护措施、一种保障措施。我的确决意从这里出发，以便向你们表明：我们在经验中从何处出发，又如何抵达同一批问题。

因为我们确实必须不再以神话或抽象方式，而是以对象直接呈现给我们的方式提出问题；必须看到，泛泛谈论对象是不够的，谈论某种仿佛凭借某种神奇的沟通功效、便能调节同其他一切对象之关系的对象，也是不够的。仿佛只要成为一个“生殖器期者”，一切问题就都已经得到提出和解决。比如，从这里被置于首位的纯粹生物学观点看，一个对象对于“生殖器期者”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并不比人类日常经验中的某个对象——比如一枚硬币——少一分神秘；而这枚硬币本身就提出了其客体价值的问题。

在某种语域中，这枚硬币作为交换手段可能丧失其价值；又或者，人的生活中任何要素都可以通过交换而被换算为商品价值——这些事实不是以千百种方式把我们引向一个问题吗？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参见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商品拜物教］，这个问题事实上是用“拜物”这一术语解决的；它同我们刚才引入的“恋物”十分接近，却并非同义。总之……对象概念，以及你们愿意的话，屏幕对象的概念；还有这样一种极为独特的现实构成所发挥的功能——弗洛伊德从一开始就以真正惊人的光芒照亮了它，而我们不明白人们为什么不再继续赋予它应有的价值：也就是“屏幕记忆”概念，它尤其构成着每一个主体之所以为其自身的过去。所有这些难道不是同一个问题场中的东西吗？

所有这些问题的确都值得分别就其自身来考察，并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接受分析；因为正是从这些关系中，必要的层次区分才可能重新浮现，使我们能够明确界定为什么“一种恐怖症”与“一个恋物”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也使我们能够判定：一般使用“恋物”一词时的含义，同它被用来指称一种性倒错的确切形式、并在其中获得的特定用法之间，究竟是否存在某种关系。

我们将以这种方式引入下一次谈话的主题，也就是恐怖症与“恋物”。我相信，回到实际经验，正是我们能够借以恢复并重新赋予“客体关系”一词真正价值的道路。

第2课 · 1956年11月28日

这一周，为了你们，我读了一些精神分析家围绕我们今年主题所写的东西，也就是关于对象，尤其关于我们上次谈到的那个对象——生殖器对象——的论述。直呼其名的话，生殖器对象就是女人；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直呼其名呢？于是，我算是犒赏自己，读了若干篇有关女性性欲的文章。

由你们而不是由我来读这些文章会更重要，因为这会让你们更容易理解我将要就此告诉你们的东西。此外，这些阅读从其他角度看也很有教益，尤其因为，一想到勒南那句名言："人的愚蠢使人对无限有了一个观念"，我就不得不补充：如果他生活在今天，他还会加上一句："……精神分析家的理论漫游——我绝不是把它同愚蠢等同起来——也属于能够使人对无限有一个观念的那类东西。"

事实上，弗洛伊德本人的陈述如此陡峭、如此惊人，而在它们之后，不同分析家的思想竟陷入如此非同寻常的困难，这一点极其引人注目。不过，弗洛伊德——"始终孤身一人"［原文如此］——在这个问题上带来了某种东西；今天我要说的内容，影响范围大概也就限于此。我们刚才把那个对象称作和谐对象，称作凭自身本性完成主体—对象关系的对象。若有什么最有力地反驳这种观念，那甚至不必说是分析经验；毕竟，普通经验中男人与女人的关系本来就不是什么没有问题的事——若它没有问题，也根本不会有分析。真正最有力地带来一种落差、一道裂隙、某种"不对劲"的观念的，是弗洛伊德那些精确表述。

这并不意味着它足以界定“不对劲”究竟是什么；但是，对“不对劲”的正面断言确实存在于弗洛伊德那里：

- 它存在于《文明及其不满》中；
- 也存在于《精神分析新论》的那一讲中。

因此，这又把我们带回对对象的追问。我提醒你们，人们通常遗忘了对象概念，却没有同样强烈地遗忘分析经验与弗洛伊德学说的陈述赋予并规定这个对象的鲜明轮廓：

- 对象首先总是在对失落对象的寻求中呈现；
- 而对象又总是被重新找到的对象。

这两点都同那种把对象视为完成者的观念形成最鲜明的对立。主体相对于对象的处境恰恰是：对象本身被卷入一场寻求；与此相反，把对象当作完成者的观念，最终导向的是一个自主主体的概念。上次我还强调了幻觉对象：它以令人焦虑的现实为背景出现，是弗洛伊德所谓欲望的初级系统在运作中产生的对象观念。

同这一点完全相反，分析实践中的对象概念最终被缩减为实在：问题变成重新找到实在。对象不再从焦虑的背景上凸显，而是可以说从共同现实的背景上凸显；分析寻求的终点，是发现没有理由害怕它。这里的“害怕”又是一个不同于焦虑的项。

最后，沿着弗洛伊德观察并追踪对象时，对象向我们显现的第三项是想象的相互性：在任何同对象的关系中，主体都同时占据关系各项的位置；对对象的认同处于一切对象关系的根底。

说实话，最后这一点并没有被遗忘；但现代分析技术中的客体关系实践，显然最紧紧抓住的就是它，结果形成了我所谓的“意义的帝国主义”。既然你能认同我，我也能认同你，那么我们两人之中，对现实适应得更好的那个自我，当然就是更好的范型。

归根结底，在一幅理想化的简图中，分析的进展将被归结为对分析家自我的认同。我想举例说明这一点，以显示如此片面地操弄客体关系能够造成何等严重的偏离；我要提醒你们一个特别体现在强迫神经症实践中的例子。

如果强迫神经症正如在座多数人所想的那样，能够从如下结构性观念来理解强迫症者——“什么是强迫症者？”——那么可以说：他是一个扮演角色的演员；他仿佛已经死去一般执行一系列动作，这是他让自己躲开死亡的一种方式。他投身的这场游戏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场活的游戏，其要旨是显示自己不可伤害。为此，他对自己进行某种驯练；这种驯练制约着他接近他人的一切方式。我们看到他进行某种展示，向人显示自己在这场操练中能走多远。

这里具有游戏的一切特征，包括幻觉性的特征：这个不过是其另一个自我、是其自身分身的小他者，究竟能走多远？而这一切又是在一个观看表演的大他者面前进行；强迫症者本人也是这场表演的观众，因为他从游戏中获得的全部快乐，以及游戏之所以可能，都维系于此。

但另一方面，他不知道自己占据什么位置；这就是他身上无意识的东西。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明，这一点他可以隐约察觉；他很清楚，游戏并不是在他所在之处进行的，因此，所发生的事情几乎没有任何一件对他真正重要。可是，他并不知道自己从哪里观

看这一切，归根结底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在操纵游戏。当然，我们知道操纵者正是他自己；但如果不知道这场游戏在哪里被操纵，我们同样可能犯下千百种错误。由此便提出了对象的概念，以及对这个主体而言何为重要对象的问题。

若以为可以用任何二元关系的术语来指称这个对象，那将完全错误——当然，这里说的是那位作者所阐发的客体关系观念。你们很快会看到，它会把人带到哪里……

不过，在这个极其复杂的处境中，对象概念显然不是直接给出的。严格说来的对象，是一场攻击性的报复游戏，是那场“富人游戏”（原文：jeu de riche）[注]，是尽可能贴近死亡、同时又避开一切打击的游戏；主体仿佛预先杀死自己身上的某种东西，并且可以说使欲望僵死。这个对象恰恰只在参与一场幻觉游戏时才显现出来。这里的对象概念极其复杂，值得我们时时加以强调，好让我们至少知道自己正在谈论哪一个对象。

> [注] 原文作 jeu de riche，直译为“富人游戏”，但与下文“尽可能贴近死亡”的语义衔接异常；也可能存在转录讹误。现有底本不足以确定改作其他词，正文保留原词及字面义。

我们会努力赋予对象概念一种统一用法，使我们能够在自己的词汇中辨清所指。这个概念并不是躲开我们，而是以一种绝对难以圈定的面貌摆在我们面前。为了加强刚才的比较：强迫症者要向另一个观众证明某件经过他明确编排的东西；他自己并不知道这个观众正是他，而随着转移推进，他又把我们放到这个观众的位置上。

分析家会如何运用这种客体关系观念？请你们重新阅读我所说的那位作者[注1]对这个案例的观察，并分析他怎样描述一名强迫症者的分析进展。

> [注1] 参见莫里斯·布韦，载《今日精神分析》，法国大学出版社，1956 年；或《客体关系》，法国大学出版社，2006 年。

相关知识卡 **莫里斯·布韦与分析距离**

你们会看到，在这个案例中操弄客体关系的方式，恰好类似于如下情景：我们在马戏场边观看两个人轮流互扇一连串耳光，却走进场内，努力让自己害怕挨耳光。相反，正是因为强迫症者的攻击性，他才扇出耳光，而同他谈话的关系也被说成攻击性关系。正在这时，马戏团司仪“忠诚先生”（Monsieur Loyal）走进来说：

> “行了，这一切都不合理。放手吧，你们干脆彼此吞下自己的棍子；这样它就到了合适的位置，你们也就把它内化了。”

这确实是解决这种处境、给它安排一个结局的方式。我们还可以配上一首小歌，那是一位名叫［……］的人留下的不朽之作——他简直是个天才[注]。如果不理解我在这里所谓的、我们仿佛正在观看的那场展示、那场仪式所具有的某种神圣性质，无论它显得多么阴暗，我们就绝对无法理解任何东西；同样，我们或许也无法理解“客体关系”严格说来究竟意味着什么。

> [注] 此处原文人名缺失，现有转录仅保留方括号省略号。

想象客体关系深层的口腔性质，在字里行间显现出来。它也让我们看到：一种逃不出想象界法则的实践，会怎样严格而彻底地停留在想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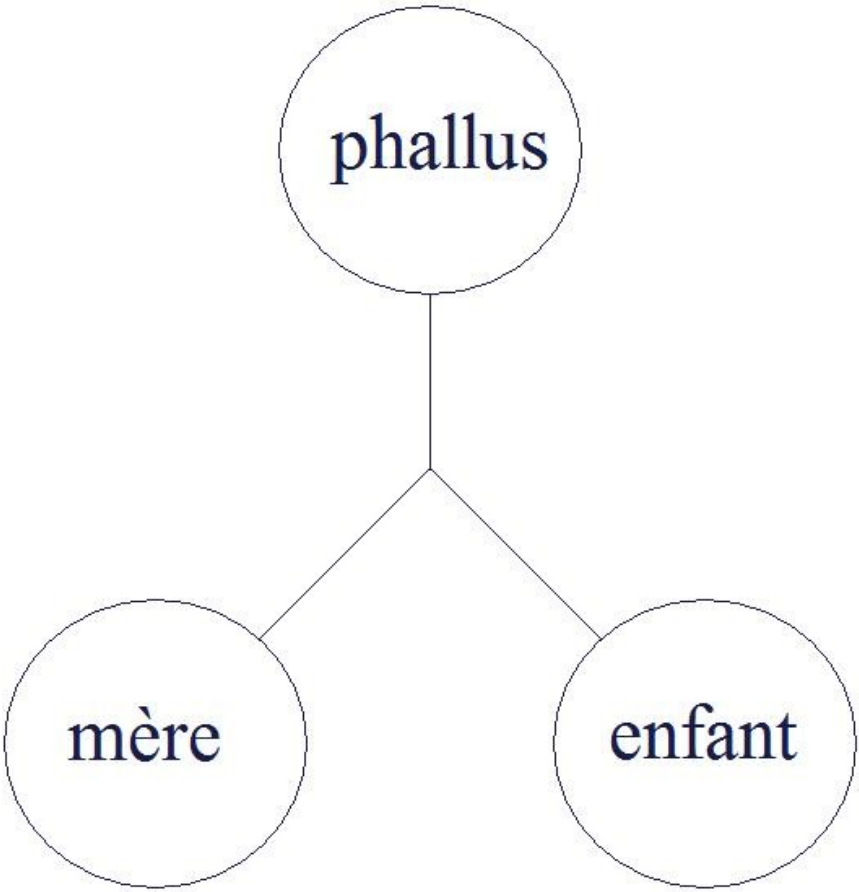
层面；这种实践把二元关系当成实在关系，因为这种客体关系最后抵达的，正是阳具性并入的幻想。为什么说它是阳具性的？

相关知识卡 莫里斯・布韦与分析距离

经验并不遵循我们对其完成状态可能抱有的理想观念；它必然更强烈地凸显自身的悖论。你们会看到，这正是我今天试图带你们跨出这一步所要引入的东西：二元关系本身越趋于完成、我们越接近它，它就越把某种名为阳具的想象对象作为特权对象推到前台。

相关知识卡 《研讨班 IV》对客体关系优先性的批评

如果不把一个第三要素纳入对象概念，整个对象概念就不可能得到推进、不可能得到理解，甚至不可能被实际运用。我还不把它称作中介要素，因为那会让我们跨出尚未共同跨出的那一步；总之，这个第三要素就是阳具。今天，我再次把它放到这幅图式的前台。上一年结束时，我曾把这幅图式交给你们：一方面，它是对精神病探索所引向的能指分析的总结；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篇导言，可以说是我今年就客体关系向你们提出的内容的开篇图式。



无论是哪一种想象关系，都以某种真正根本的关联为范型，也就是“母亲—孩子”关系；当然，这种关系本身包含全部问题，却也十分容易让人以为这里涉及一种实在关系。事实上，当下对分析情境的全部分析正在朝这一点发展：它试图最终把分析情境缩减为“母亲—孩子”关系的发展，以及最初位置在后来、在发生过程中铭写下来的东西和留下的痕迹与反映。

只要考察分析经验中的若干要点——甚至在那些把这一想象要素当作全部分析发生之基础的作者那里——就不可能运用并展开它，而不让我们所谓“分析经验的阳具主义”在客体关系概念的中心显现为关键点。

经验和分析理论的演变都证明了这一点；而我在今天这次讲演中尤其要向你们表明的，是任何把这种想象的阳具主义还原为某种实在给定的尝试，都会因缺少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三项而陷入死路。

归根结底，为了重新找到所发生的一切以及整个分析辩证法的起源，人们只会转而寻求实在。为了给这种目标、给某种取向中操弄二元关系的方式、给这种分析经验理论化再添最后一笔，我还要作一次完整的回顾；这一点值得记下，因为它恰好出现在我向你们提过的那部集体著作［P.D.A.］的开篇。

当分析家进入强迫症者的想象游戏，坚持让他承认自己的攻击性，也就是坚持让他把分析家安置在二元关系、想象关系——我刚才称为相互性关系——之中时，文本把下列事实当作主体拒绝并误认这一处境的证据：例如，主体从不愿表达自己的攻击性，只把它表达成由僵硬技术引起的一点轻微恼怒。

作者由此坦言，他不断坚持把主体带回这个主题，仿佛它才是核心而重要的主题；作者还意味深长地补充道：“毕竟，人人都知道，恼怒和讽刺都属于攻击性表现。”仿佛恼怒显然就是攻击关系本身的典型特征。可是我们知道，攻击也可能由完全不同的感情引发；例如，一种爱的感情完全可能处在攻击反应的起点。至于把讽刺这样的反应按其本性定性为攻击性的，在我看来并不符合人人都知道的事实：讽刺并

不是一种攻击反应；讽刺首先是追问的一种方式，是问题的一种形态。如果其中含有攻击性要素，这一要素也从属于讽刺中的提问结构。

这向你们表明，这种客体关系会造成何种层次缩减；我决定从现在起不再以这种形式向你们谈论它。相反，我们被带到了一个问题面前：任意两者之间究竟存在什么关系？这是我们必须从中出发、因为以后还必须回到它、也终将抵达它的那个既首要又根本的问题。围绕对象提出的问题，其全部歧义都可以归结为："对象究竟是不是实在？"对象概念及其在分析中的运用，是否应当……我们既通过自己在这里使用的、经过阐发的词汇——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抵达这个问题，也通过你们阅读对象论述时最直接、自发的直觉抵达它……对象究竟是不是实在？谈论客体关系时，我们是否只是在谈论通达实在，谈论那个应当成为分析终点的通达？在实在中找到的东西，是不是对象？

这个问题值得一问。即使暂且不进入我今天引入的阳具主义问题核心，分析经验中也已经有一个真正突出的点：有一个重大对象，个体发展的整套辩证法以及一次分析的整套辩证法都围绕它旋转；它正是作为对象本身被把握的。我们以后会更详细地看到，阳具与阴茎不能混淆。

如果必须作出这一区分，如果在 1920 至 1930 年前后，阳具主义与阳具期概念引发了一场占据整个分析共同体的庞大争论，那正是为了区分：

- 作为实在器官的阴茎，连同我们可以用某些实在坐标来界定的功能；
- 与处在想象功能中的阳具。

即便只有这一点，也值得我们追问对象概念究竟意味着什么。

因为不能说，这个对象在分析辩证法中不是一个占优地位的对象，也不能说个体对它本身没有观念。这个对象从未被明确表述为严格说来只能在想象层面上得到设想，但自弗洛伊德在某个时刻提出有关论述、某些人尤其是琼斯作出回应以来，对它的单独提取仍然显示：阳具主义概念意味着必须把想象界这个范畴提取出来。你们会在一行又一行的文本中看到这一点涌现。

不过，在进入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追问对象与实在之间的关系、二者彼此的位置。处理这个问题的途径不止一条，因为我们一开始就会发现，实在具有不止一种含义。我想，你们中的一些人一定会轻松地叹一口气：

“他终于要向我们谈那个著名的、迄今始终藏在阴影里的实在了。”

其实，实在处在我们经验的边界上，并不值得惊讶。与人们所谓分析是一种“极其简单的情境”相反，分析的条件如此人工；我们经验中相对于实在采取的位置，已经足以说明这一点。然而，一旦进行理论

化，我们仍不能不参照实在。因此，我们必须把握：在理论化并援引实在时，我们究竟意指什么。

起初，我们不大可能全都对它抱有同一种观念；但只要仔细观察这个词的实际用法，我们大概都能抵达某种必须引入的根本区分，区分“实在”或“现实”的不同运用。人们说“实在”时，可能瞄准若干不同的东西。首先，是一切实际发生之事的总和；这就是德语 Wirklichkeit 一词所包含的“现实”观念。德语在这里的优点，是能从现实中辨出一种法语很难单独提取的功能：整个机制产生效果、产生 Wirkung 的一切可能性，都包含在 Wirklichkeit 自身之中。

我这里只顺便作几点评论，以表明分析家何等安然地被囚禁在这种“现实”范畴中；然而，这个范畴同他们的实践本应把他们引向的一切，极其格格不入。

具有机械—动力论传统的思想——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在科学中建构《人是机器》的尝试——或许能够从某种视角认为，精神生活层面发生的一切都必须参照某种被提出为“物质的”东西。可是，对一名分析家而言，这能有哪怕最微小的意义吗？他的技术与职能之所以能够运作，恰恰依靠一系列效果；根据身为分析家的基本假设，这些效果具有自身的秩序。如果他遵循弗洛伊德，如果他理解支配整个体系精神的东西，也就是一种能量论视角，那么他理应采取的恰恰就是以这些效果自身的秩序为准的视角。

让我用一个比较来说明这一点，好让你们看清物质——即被调动之物的原初 Stoff——具有怎样的迷惑力。某种东西如此令医学思想着迷，以至于当人们无端断言“我们同其他医生一样，把一种有机现实、一种

最终必定能在现实中找到的东西，置于分析中发生的一切的基础和原则处”时，竟以为自己说出了什么。

弗洛伊德也曾如此直截了当地说过；但必须回到他说这句话的地方，看看它在那里发挥什么功能。归根结底，这仍是一种寻求安心的需要；我们看到分析家在自己的文本中反复回到它，就像人们反复“敲木头”祈求好运。仿佛归根结底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在这里调动的无非是表层机制，一切最终都必须参照某种我们也许有朝一日会认识的东西，参照作为一切事件起源的基本物质。

让我再作一个简单比较，以表明：倘若分析家承认自己活动于一个具有实效性的秩序中——这就是现实的第一种观念——那么刚才那种想法对他而言何等荒谬。假设有人负责一座位于大河水流中央的水力发电厂，比如莱茵河上的发电厂。要理解并谈论机器中发生的事情——某种能量的积聚原则在机器中发挥作用；这里积聚的是电力，随后可以分配给消费者使用——他首先必须处理同机器具有最紧密关系的东西。若他转而梦想景色尚未改变、莱茵河水量充沛地流淌的时代，不但不会多说出任何东西，而且简直什么也没有说。至于声称“能量已经以潜在状态存在于河流之中”，并以为这句话能让我们向前一步，严格说来同样毫无意义。

因为在这个例子中，能量只有从积聚起来的时刻才开始同我们有关；而它只有从机器以某种方式开始运转的时刻才得到积聚。当然，驱动机器的是某种最终来自河流的推动力。

然而，只有一个彻底发疯的人，才会把河流当作这种能量的原初秩序来参照；这是一种严格说来属于“玛纳”（mana）秩序的观念，却被用

来理解能量乃至力这种完全不同秩序的东西。这样的人不惜一切代价，想在某种仿佛亘古以来就在那里的东西中，重新找到最终被积聚起来、成为一种作用（Wirkung）、一种可能现实（Wirklichkeit）的要素之恒常性。换言之，我们总想把 Stoff，或者说原初物质、冲动、流动或倾向，同分析现实的实际运作中真正被调动的东西混为一谈；这种需要无非是对象征的现实效力（Wirklichkeit）的误认。

也就是说，正是在各种要素的冲突、辩证法、组织与结构化中，在这些要素相互组合、彼此建构的过程中，这种组合与建构才赋予相关事物一种完全不同的能量效力。如果仍然需要谈论一种仿佛存在于这种运作本身之外的终极现实，那就是误认了我们活动于其中的那种现实自身。

分析中还有另一种“现实”概念的用法；它重要得多，同刚才那种堪称迷信的参照毫无关系。后者是某种残余，是所谓“有机主义”公设；从分析视角看，它简直不可能具有任何意义。我以后还会向你们表明，即使在弗洛伊德表面上提到它的地方，它在这种秩序中也同样毫无意义。客体关系中的另一个现实问题，是双重原则——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所调动的问题。这里涉及完全不同的东西，因为显而易见，快乐原则的运作并不会因此更少具有实效；我甚至认为，分析正是为了证明相反的事实。“现实”一词在这里具有完全不同的用法。

有一点相当引人注目：这种用法起初如此富有成果，使我们得以在心理秩序中提出初级系统与次级系统；但随着分析推进，它却以一种相当难以捉摸的方式变得越来越成问题。要看清这两个原则最初的对立用法同我们经过某种滑移后如今所处的位置之间有多大距离，几乎必

须借助偶尔会发生的那种时刻：说“国王什么也没穿”的孩子，究竟是傻瓜、天才、顽童，还是狠角色？

这一点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不管怎样，他无疑是一个颇能解放局面的人。分析中也会发生这类事情：分析家重新回到某种原初直觉，看出此前一直在说的一切其实什么也没有解释。

这种事情就发生在 D. W. 温尼科特身上[注2]。他写过一篇短文，讨论自己所谓的“过渡性对象”（transitional object）；不妨把它理解为对象的过渡或过渡现象。他只是指出：我们越来越重视母亲的功能，认为它在儿童把握现实的过程中绝对原初且具有决定性。也就是说，我们逐渐用一出有演员、有主体的戏，取代了现实原则与快乐原则这两个原则之间非人格的辩证对立。这些主体无疑极其理想化，这些演员也无疑更像一套形象化装置或一出想象木偶戏；但我们的确已经走到了这里：

> [注2] 唐纳德·伍兹·温尼科特：“过渡性对象与过渡现象”（“Transitional Objects and Transitional Phenomena”），1953 年；另见法译《过渡性对象》，Payot 出版社，2010 年。

相关知识卡 温尼科特的过渡性对象与拉康的批评

- 我们把快乐原则等同于某种客体关系，也就是同母亲乳房的关系；
- 我们把现实原则等同于孩子必须学会放弃母亲乳房这一事实。

温尼科特十分正确地指出，归根结底，若一切进展顺利——因为一切顺利十分重要；我们如今已经把一切出错都追溯到某种原初异常，追溯到挫折，而“挫折”已成为我们辩证法中的关键词——事情就仿佛是：为了让开端顺利，也就是为了不使孩子受到创伤，母亲必须恰好

在需要她的时刻始终在场；确切地说，她必须在妄想性幻觉发生的那一刻，把能够填满孩子的实在对象放到正确位置。

因此，在开端处的理想“母亲—孩子”关系中，下列两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区别：

- 根据我们对初级系统的理解而出现的幻觉，即母亲乳房的幻觉；
- 与实际完成，即同相关实在对象的相遇。

因此，若一切顺利，孩子在开端处根本无从区分：

- 奠基于幻觉的满足，也就是同初级系统的活动与运作相联系的满足；
- 与对真正填满并满足他的实在的把握。

此后，全部问题就在于母亲逐步教会孩子承受这些挫折，并由此以某种开创性的张力形式，察觉现实与幻象之间的差别。这个差别只能通过幻象的破灭而形成，也就是说，现实有时不再同由欲望产生的幻觉相重合。

温尼科特只是指出了第一个事实：在这样的辩证法内部，严格说来根本无法设想，怎样可能阐发出任何超越“一个严格对应于原初欲望的对象”的东西；一旦把这套辩证法化身为母亲与孩子这两个实在演员，人类欲望领域的发展中介入的工具性对象与幻想性对象何以如此多样，也就变得完全不可思议。

第二点则是一个严格的经验事实：即使在最年幼的孩子身上，我们也会看到温尼科特所谓“过渡性”对象的出现。在这套经过缩减、化为具体角色的辩证法——幻觉与实在对象的辩证法——中，我们无法说它们位于哪一边；这就是他所谓的过渡性对象。具体说来，儿童游戏中的一切对象、严格意义上的玩具都是如此——孩子并不需要别人把玩具交给他，他会用手边碰到的一切制造玩具。对于这些过渡性对象，不能追问它们更主观还是更客观；它们具有另一种性质，而温尼科特并未越过这一界限。

相关知识卡 温尼科特的过渡性对象与拉康的批评

为了给它们命名，我们干脆称其为想象对象。这样一来，我们立即就稳稳进入了想象界。尽管相关作者的论述确实十分犹疑、迂回，也充满混乱，我们仍看到，他们总会被带回这些对象。比如，当他们试图解释恋物、性恋物这类事实的起源时，就会竭力寻找它同恋物之间的共同点；后者占据客体要求的前台，是主体可能获得的重大满足——也就是性满足——的条件。

他们于是试图在儿童那里搜寻并密切观察：孩子是否以某种特权方式摆弄一个小物件——从母亲那里偷来的一块手帕、床单的一角，或现实中某个偶然落入孩子掌握范围的碎片。这种东西出现在这里所谓的“过渡性”时期；然而，这并不是一个中间时期，而是儿童发展的一个恒常时期。这些作者几乎把过渡性对象同恋物混为一谈，却没有追问：这个对象的色情化同它作为想象对象首次出现之间，究竟存在多大距离。

相关知识卡 恋物、面纱与拒认 ・ 温尼科特的过渡性对象与拉康的批评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这种辩证法所遗忘的东西；正是这一遗忘，迫使人们采用我在温尼科特文章中强调的那些补充形式。从分析经验一开始，其最根本的动力之一就是对象欠缺概念，而这并不完全是同一回事。我提醒你们，事情已经沿某个方向发展；在具体运用分析理论时，我们从来不能不把对象欠缺视为核心。它不是一种消极项，而是主体同世界之关系本身的动力。

相关知识卡 《研讨班 IV》对客体关系优先性的批评 ・ 温尼科特的过渡性对象与拉康的批评

分析对神经症的分析从一开始，就以阉割这个概念起步；它如此悖论，以至于可以说至今仍未得到完整阐发。我们以为自己还像弗洛伊德时代那样一直谈论它，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谈得越来越少，而且这是我们的过错，因为我们谈得更多的是挫折。还有第三项刚刚开始受到讨论；更确切地说，我们将看到，这个概念怎样必然得到引入，又是沿哪条道路、出于什么要求得到引入的——这就是剥夺。三者绝不等价。为了区分它们，我想先作几点评论，只求让你们初步理解它们是什么。

当然，我们必须从日常用法中最熟悉的挫折概念开始。挫折与剥夺之间有什么差别？我们不得不从这里出发，因为人们正在引入剥夺概念，并声称二者在心理中以同样的方式受到体验。

这是一个相当大胆的说法。不过显而易见，如果阳具主义、也就是对阳具的要求，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是主体分析所描述的冲突性进展中整场想象游戏的关键点，那么当问题转到完全不同于想象界的东西——即实在界——时，我们只能谈剥夺。阳具要求并不是通过实在界发挥作用的。这里最成问题的事情之一就是：一个被呈现为整体的存在者，怎么会感到自己被剥夺了某种按定义本来就不拥有的东西？我

们会说，就其欠缺的性质而言，剥夺根本上是一种实在欠缺，是一个洞。

只要参照我们实际谈论这些概念时的用法，我们对挫折的理解就是一种损害（dam）。它是一种伤害、一种损失。按照我们通常看待这种损害发生的方式，按照我们把它引入辩证法的方式，这里始终只涉及想象损害。挫折在本质上属于索求的领域：某种东西受到欲望却没有得到，但这种欲望并不参照满足或取得它的任何可能性。

挫折本身属于无节制要求的领域，属于无法无天的要求之领域。作为欠缺范畴之一，挫折概念的中心是一种想象损害。挫折位于想象层面。

从这两点出发，我们或许更容易看到：阉割——我要再次提醒你们它的性质，也就是它根本上的戏剧性质——与其说得到过深入研究，不如说遭到了放弃和搁置。若要以最鲜明的方式把它引入我们的讨论，只需说：弗洛伊德引入阉割时，它同原初法则、同乱伦禁令和俄狄浦斯结构中的根本法则概念绝对相互配合。若我们现在回头思考，这无疑代表着弗洛伊德最初陈述之物的意义。

这一引入通过经验中的某种致命飞跃得以完成。他竟把像阉割这样悖论性的东西放在俄狄浦斯这场决定性、形成性、重大的危机中心；事后想来，我们不能不为此惊叹——而我们如今一心只想避而不谈它，同样堪称奇观。

阉割只能被归入象征性债务的范畴。下列三者之间的距离：

- 象征性债务，
- 想象性债务，
- 与实在的洞、实在的缺席，

使我们能够定位这三个要素；我们将称它们为对象欠缺的三项参照。对有些人来说，这一说法无疑可能需要保留意见；他们是对的，因为只有牢牢抓住这里涉及的是对象欠缺的不同范畴，这种说法才成立。我说的是“对象欠缺”的参照项，而不是“对象”的参照项；因为一旦把问题放到对象层面，我们便可以追问：这三种情形中欠缺的对象各是什么？

在阉割层面，这一点立即最为清楚。阉割由象征性债务构成；这里欠缺的东西制裁法则，给予法则以支撑及其反面——即惩罚。显而易见，在我们的分析经验中，它不是实在对象。只有《摩奴法典》才说，同母亲发生性关系的人应割下自己的生殖器，拿在手里一直向西走去，直至死亡。迄今为止，我们只在极其罕见的情形中观察到这类事情；它们同我们的经验无关，所需要的解释显然也属于完全不同的秩序，不属于我们经验中通常被调动的结构化与正常化机制。这里的对象是想象的；阉割所涉及的始终是一个想象对象。

我们之所以容易相信挫折能够让自己更轻易地深入问题核心，是因为阉割对象的想象性质与“挫折是对象的一种想象欠缺”之间具有共同点。然而，在这些范畴中，欠缺、对象，乃至我们将称作施事者的第三项，完全不必属于同一个层面。事实上，阉割对象是一个想象对

象；正是这一点，迫使我们追问阳具究竟是什么——人们花了如此漫长的时间，才把它本身辨认出来。

相反，尽管挫折是想象的，挫折的对象按其本性却确实是一个实在对象。对孩子而言——也就是我们挫折辩证法选定的主体——发生欠缺的始终是某种实在之物，确实是一个实在对象。

这会有力地帮助我们看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要看见它，必须比人们参照刚才所说的现实标准时更熟练地在形而上层面运用这些术语：剥夺的对象始终只能是一个象征对象。这一点再清楚不过。

属于剥夺秩序的东西，也就是“不在其位置上”的东西——确切地说，从实在的观点看——绝对没有任何意义。一切实在之物总是并且必然在其位置上，即使人们挪动它也是如此。实在的首要性质，是把自己的位置带在鞋底上。你们尽可以把实在弄得天翻地覆；我们的身体爆炸以后依然会在自己的位置上，在碎块的位置上。

某物在实在中的缺席，是一件纯粹象征的事：只有法则规定它本应在那里，才会说一个对象在其位置上欠缺。最好的参照，是想想你们在图书馆索取一本书时发生的事情。别人告诉你，这本书不在自己的位置上；它可能就在旁边，但原则上仍然在其位置上欠缺，原则上不可见。这并不意味着图书管理员生活在一个完全象征的世界里。我们谈论剥夺时，所涉及的只有象征对象，没有别的。

这或许显得有些抽象；但你们以后会看到，它将如何帮助我们识破种种障眼法：人们借这些手法，给本来就是假问题的问题提供根本不成其为解答的“解答”。换言之，在后续讨论的辩证法中，人们觉得男女两性在分析意义上的性欲发展完全不同这件事不可容忍，便拼命试图

打破这种差异，把两项还原到一个原则；然而，也许从一开始就有某种东西，能够非常简单而清楚地解释并使我们理解，为什么二者的发展必然很不相同。

我只想再补充一项，它以后同样会显示自己的作用，也就是施事者概念。我知道自己在这里作了一次跳跃；要说明它，我本应回到母亲、孩子与阳具组成的想象三元组，但现在没有时间。我只想把这张表补充完整。施事者也会在这种对象欠缺中发挥作用，因为谈到挫折时，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母亲扮演这一角色。

什么是挫折的施事者？它是象征的、想象的还是实在的？什么又是剥夺的施事者？归根结底，它是否像我刚才指出的那样，是某种根本没有任何实在存在的东西？这些问题至少值得提出。

本次课结束时，我要把这个问题保持为开放问题。答案在这里或许已经可以起步，甚至可以完全形式化地推导出来；但在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它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令人满意。因为施事者概念完全超出了我们今天所限定的框架；今天我们只是第一次提出对象与实在之关系的问题。

施事者在这里显然属于另一种秩序。不过你们可以看到，怎样在这三个层面上对施事者作出定性，显然是阳具建构的开端所提示的问题。

第3课 · 1956年12月5日

女士们，先生们，昨晚你们听了若干围绕“身体意象”这个主题的发言。由于场合所限，对其中一些发言，我除了笼统表示赞同之外，没有再说什么；如果当时必须谈，我就会把它们放到我们这里所做的工作中来定位，也就是进行教学。在真正属于另一性质的科学工作场合，我不愿这样做；所以没有被迫谈论，我并不遗憾。

不过，我们还是从昨晚呈现给我们的身体意象出发。要把它放到我们这里的工作中定位，我想你们都充分知道这个首先就显而易见的事实：它不是一个对象。昨晚为了界定各个阶段，人们谈到了对象；对象概念的确重要。然而，昨晚呈现的这种身体意象不仅不是一个对象；我要说，最能让我们把它同其他想象构成物区分开来的，恰恰是它本身不可能成为对象。

这是一条极其简单、却没有人直接提出的评论，至多只是有人间接触及。分析经验中确实有一些对象，我们可以追问它们是否具有想象性质——我没有说它们就是想象的；我说的恰恰是，我们在这里提出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站在这个中心点上，把对象概念中令我们感兴趣的东西引入临床，这也不表示我们已经固守于这个点，仿佛以想象对象的假设为出发点。事实上，我们远没有从这一假设出发，否则它就不会仍是我们的问题。

但分析经验事实上交给我们的、这种可能具有想象性质的对象，你们已经知道了。为了让观念具体起来，我已经举过两个准备集中讨论的

例子：恐怖症与恋物。若以为这些对象迄今已经泄露了自身秘密，你们就错了；它们远没有做到这一点。

无论人们作过怎样的操练、杂技、扭曲或幻想发生学，仍然相当神秘的是：在男孩或女孩生命的某些时期，他们会觉得自己非得害怕狮子不可；而狮子并不是他们经验中极常遇到的对象。很难把这种形式变成某种原始给定，例如一种铭写在身体意象中的给定。

人们可以使尽一切办法，却仍会留下某种余项。科学解释中的余项总是最值得考察、也最富有成果的东西；无论如何，偷偷抹掉它们绝不会带来进步。同样，你们大概已经注意到，性恋物的种类到处看来都相当有限。为什么？

除了鞋子——它在这里扮演的角色如此惊人，以至于人们不禁要问为何没有给予更多注意——几乎就只剩吊袜带、袜子、胸罩之类。这些东西都紧贴皮肤，但最主要的仍是鞋子；这里同样留下了一个余项。

对于这些对象，我们要追问它们是否是想象对象；还要追问，仅仅依据某种发生过程所能给出的指示，能否理解它们在力比多经济中的动力价值。所谓发生过程，归根结底总是某种异位的概念：从一种被称作“阶段”的典型关系中产生的东西，被放进另一种接续此前阶段的典型关系中。无论如何！

不管怎样，那些对象——如果昨晚你们接触到的确实可以称作对象——显然代表着某种令我们十分为难、又无疑极具吸引力的东西；只需看看会场上被激起的兴趣和讨论的重要性就知道了。

不过，若要初步把这些对象归在一起，我们会说：它们是某些建构，整理、组织并明确表达了某种亲历经验，正如昨晚有人所说。最引人注目的，是操作者——这里就是多尔托夫人——怎样运用它们：这里非常确定地涉及某种东西，

而只有从能指概念出发，才能立即以完全可理解的方式定位这种东西。

多尔托夫人把它当作能指来使用：

- 它作为能指进入她的对话；
- 它作为能指代表某种东西。

这一点在如下事实中尤其明显：这些意象没有任何一个能够凭自身成立；每一个都必须相对于另一个意象，才获得结晶、定向的价值，才以某种方式穿透她所面对的主体，也就是那个年幼孩子。

因此，我们再次被带回能指概念。正因为这里进行的是教学，而没有什么比误解更值得重视，我想告诉你们：我直接或间接地发现，上次所说的一些东西没有得到理解。

我谈到现实概念时曾说，精神分析家抱有一种科学主义的现实观；几十年来，正是这种现实观妨碍了精神病学的进步。本来可以相信，精神分析会让精神病学摆脱这道障碍；所谓障碍，就是到某种据说更具物质性质的东西中寻找现实。

为了让人明白，我举了水力发电厂的例子。我说，仿佛有人要处理发电厂可能发生的各种变故——包括缩减规模、暂停运转、扩建与维修

——却以为只要参照让发电厂运行时调动的原始材料，也就是这里的水流落差，就总能对该怎样处理发电厂作出有效推理。

于是有人对我说：何必扯到那里去？你应该明白，对工程师而言，水流落差就是一切。既然你谈的是发电厂中积聚的能量，这种能量无非是厂址预先给出的势能的转化。工程师只要测出水面相对于排水处水位的高度，就可以进行计算。将被调动的势能已经全部给出；发电厂的功率已经由这些先在条件规定了。

说实话，这里需要作几条评论。第一条是：我要向你们谈现实时，首先用 Wirklichkeit、用整个系统——这里是心理系统——的实效来界定它；另一方面，我又想向你们说明以某种方式设想这种现实所具有的神话性质，并用这个例子来定位它；可是，我还没有讲到“实在”主题可能呈现的第三个方面，也就是那个始终同我们打交道的“先在之物”。

当然，把“先于某种象征运作而存在的东西”看作现实，恰恰又是一种现实观；别人反驳我时所依赖的迷象，其中最牢固的部分就在这里。说实话，我绝不是在否认存在某种先在之物。例如，在“我”从“自身”或“本我（ça）”中出现以前，已有某种东西存在，而“本我”正由它而是。问题只在于，这个“本我”究竟是什么。

别人告诉我，在发电厂的例子中，先在之物正是能量。我从来没有说过别的；然而，能量与自然现实之间隔着整个世界。因为能量只有在你们测量它时才开始进入考虑，而你们只有在发电厂已经运转、不得不围绕它进行大量计算——其中包括计算可以支配的能量——时，才会想到测量能量。

能量概念实际上是依据生产型文明的需要建构起来的：这种文明必须核算，为取得可以支配的实效回报，需要耗费多少劳动。你们总是在两个参照点之间测量能量。自然蓄水池并不存在绝对能量；只有相对于较低水位、相对于液体在水库装上溢流道后将流向的下方，才存在这座水库的能量。不过，单有一条溢流道仍不足以进行任何能量计算；只有相对于下方的平面、下方的水位，这种能量才可计算。

何况问题并不在这里。问题是，必须先实现某些自然条件，计算才具有哪怕最微小的意义。任何水位差——无论是细流还是水滴——在水流中永远都潜在地储备着某种能量价值；只不过它根本不会让任何人感兴趣。

总而言之，自然中必须已经存在某种东西，以一种具有特权的、也就是“能指性的”方式，呈现机器使用时将调动的材料；它必须呈现为可利用的、能指性的，在这里还必须呈现为可测量的，才可能建造一座发电厂。在一个被当作能指系统的层面上，这一点当然无可争辩。

要紧的是它同心灵的比照；我们现在会看到这种比照怎样勾勒出来。它在两点上成形：恰恰受到能量概念推动的弗洛伊德，把某种东西指定为一个分析中必须采用的概念，

其用法同能量概念可以相比。

这个概念同能量一样完全抽象，它的作用只在于使我们能够在分析中设定——

而且仍只是虚拟地设定——一项简单的预设，以便思想能够进行某种运算。能量概念严格说来引入的是等价关系，也就是为下列事物设定共同尺度：

那些在性质上显得极其不同的表现。这种能量概念，恰恰就是——

力比多概念。分析中的力比多概念，同任何物质载体之间的固定联系都少得不能再少。

人们惊叹，在《性学三论》中，弗洛伊德几乎无须修改一段话：1905年，他第一次在那里用某些术语谈到力比多的物理载体；后来性激素概念得到发现和传播，他却几乎不必因此改动这段话。

这里没有任何奇迹。这意味着，无论是哪一种情形，严格说来，对化学载体的参照都毫无重要性。弗洛伊德说：

- 无论存在一种载体，
- 还是存在若干种载体，
- 无论是女性气质使用一种、男性气质使用一种，还是双方各自使用两三种，
- 无论它们可以相互替换，
- 还是只存在唯一一种——事实上完全可能如此——

这一切都毫无重要性，因为无论如何，分析经验都迫使我们认为只有一种而且仅有一种力比多。

因此，弗洛伊德立即把力比多置于一个可以说经过中性化的层面。这个词或许让你们觉得悖谬，但力比多正是以某种方式把不同存在者的行为联结起来的东西，使他们取得主动或被动位置。不过他告诉我们，无论何种情形，我们都只从力比多所产生的效果来把握它；这些效果即便出现在被动位置中，也始终是主动效果，因为采取被动位置本身确实需要一种活动。

他甚至由此指出：力比多呈现出某种面貌，使我们只能在这种具有实效、主动的形式中看到它，因而它总是更接近男性位置。他甚至说，只有力比多的男性形式是我们能够把握的。

这是什么意思？如果这里涉及的不是一个仅仅为了体现并支撑某种特殊联结而设置的概念，以上说法该有多么悖谬！这种联结发生在某个层面，

严格说来恰恰就是想象层面：它通过所谓欲望纽带，把一个生命体面对另一个生命体时的行为联结起来。全部“想要”都是弗洛伊德思想的根本动力之一，借此组织性行为中所涉及的一切。

那么，我们同样习惯以自己的方式把本我（Es）看作同倾向、本能乃至力比多关系最密切的东西；它究竟是什么？刚才的比较恰好允许我们把它比作什么？

我们可以把本我比作一座发电厂，不过是一个完全不知道发电厂怎样运转的人眼中的发电厂。这个没有知识的人或许会以为，是河流精灵在内部恶作剧，把水变成光或力。

可是，本我意味着什么？本我就是主体中能够成为“我”的东西；这仍是我们能够给本我的最佳定义。分析告诉我们：它不是一种原始现实，也不只是“先在之物”；它是某种：

- 已经像能指一样得到组织的东西；
- 已经像能指一样得到衔接的东西。

这同机器生产的东西一样真实：全部力量原本都可以得到转化；不过仍有一个区别，它不但得到转化，而且能够被积聚。发电厂之所以是水力发电厂，而不只是一座水力机械厂，其根本意义恰恰就在这里。

所有这些能量当然确实存在；不过没有人能够否认，发电厂建成之后，不仅景观中、而且实在中都产生了显著差别。发电厂并不是经由圣灵的运作自行建成的——然而，恰恰只有圣灵；若你们对此有所怀疑，那就是你们错了。我之所以提出这套能指与所指理论，正是为了提醒你们圣灵的在场；它对推进我们对分析的理解绝对不可或缺。

我们说过，现在从另一个层面重新讨论这一点。

只要你们仍把现实原则与快乐原则当作初级与次级两个系统来对立，并且只从外部规定这两个系统，也就是认为：

- 初级系统层面发生的事情受快乐原则支配，也就是受回归静止的倾向支配；
- 现实系统层面发生的事情，则纯粹由所谓外部现实强迫主体采取迂回路径这一点来界定——

那么，仅凭这些规定，完全无法使人感到，在实践中运用这两个术语时，它们的冲突性与辩证性质将怎样显现出来。

不过，在你们每天对它们作出的具体运用中，你们绝不会不为每个系统附上一个特殊指标；这个指标可以说是每个系统自身的悖论，虽然常被回避，却从未真正在实践中被遗忘。它首先是：快乐原则层面发生的事情，的确正如向你们指出的那样，同回归静止的法则与回归静止的倾向相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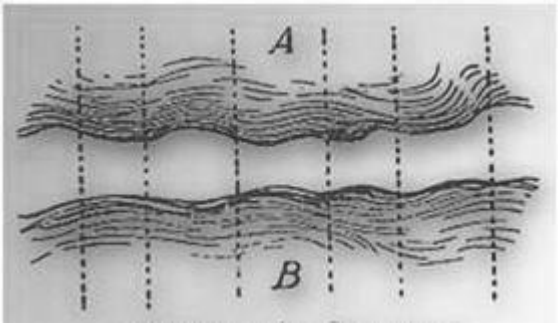
然而，仍然引人注目的是——弗洛伊德正因此才引入力比多概念，而且在文本中明确这样说——具体意义上的快乐，亦即德语 Lust，带着他所强调的德语双重含义：既是快乐，又是想要。这两者可能显得相互矛盾，在经验中却有效地联系在一起。快乐并不联系于静止，而联系于想要，联系于欲望的勃起。

反过来，现实层面也存在一个同样强烈的悖论：现实不只是我们迎头撞上的东西。正如一个层面既有回归静止的原则，又有想要；另一个层面同样不只有现实的阻挡，也有绕行现实、通过现实迂回的原则。

如果我们在现实原则与快乐原则这两个原则之外，同时引入两个相关层次，事情就会清楚一些。正是这两个层次把两项联结起来，使它们能够以辩证方式运作；它们就是言说的两个层次，体现于能指与所指概念中。

我已经把下列两者以一种平行叠置的方式放在一起：

- 能指的进程，例如具体话语的进程；
- 与所指的进程；主体内部以及主体之间的亲历经验之连续性、倾向之流，正是在其中并作为它而呈现。



这里就是能指［A］，那里则是所指［B］。这种表示完全成立，因为不仅言说与语言，而且一切在分析中作为现象呈现之物的运作，若不从根本上承认下列可能性，就根本无法得到设想：

所指不断在能指之下滑动，能指不断在所指之上滑动。若没有这幅根本图式，分析经验中的任何东西都无法得到说明：某物的能指随时都可能变成另一物的能指；主体的想要、倾向与力比多中呈现的一切，也总带着某个能指的印记。

就我们所关心的部分而言，不存在别的东西。驱力与想要中或许还有某种完全不带能指印记的东西，但我们无法通达它。能够向我们显现的一切都带着能指印记；能指把自身法则引入自然运动、欲望，或格外传神地诉诸食欲与要求之原始表达的英语 demand“要求”之中。没有任何可通达之物不受能指自身法则的标记。

正因此，“想要”来自能指。能指的存在以及这种能指的介入中，同样有某种东西提出了问题。我刚才以提醒你们圣灵最终是什么的方式提出了它；前年我们已经看到，圣灵对我们是什么，以及它在弗洛伊德的思想和教导中是什么。就其整体而言，圣灵就是能指来到世上、进入世界。

这是什么？

它无疑就是弗洛伊德以死亡本能这个术语带给我们的东西，是任何生命体都永远无法抵达的所指之界限。甚至人也只会在某种例外的、大概带有神话性质的情形中抵达它；我们只能在某种哲学经验的晚期著作中遇到它。不过，它潜在地处在人对自身生命的反思极限，使人得以瞥见死亡是生命的界限，是其存在的绝对而不可逾越的条件——用海德格尔的话说。

能指整体得以存在于世界中，人得以同能指整体建立可能关系，恰恰同这种取消一切亲历之物、把一切亲历之物置于括号中的可能性相联系。我们要把某种东西放在世界中能指之存在及在场的根底处：它是能指发生实效的表面；在这表面上，能指仿佛映照出可称为“所指的最后一个词”的东西，也就是生命、亲历经验、情绪之流与力比多之流的最后一个词。

死亡支撑并奠定了圣灵的运作，能指借此而存在。这个具有自身法则——在特定现象中可能得到辨认，也可能不能——的能指是否已经在那里？它是否就是本我（Es）所指称的东西？这是我们提出的问题。我们的回答是：要理解我们在分析中所做的任何事情，就必须回答“是”；也就是说，分析所涉及的本我，就是已经在实在中的能指。

尚未得到理解的能指已经在那里；但它是能指，而不是什么含混的原始性质，不属于某种不知道是什么的预定和谐。那些我在这里毫不犹豫称作——

“头脑软弱者”的人，总会或多或少地退回预定和谐这个假设；其中首推琼斯先生。我以后会告诉你们，他怎样处理女性最初发展的问题，以及女性那里著名的阉割情结——一旦这些问题暴露出来，对所有分析家而言都无解。他从这样一种想法出发：既然有“线”（fil）和针，也同样有“女孩”（fille）和男孩[注]；男女之间应当存在同样的预定和谐，因而任何困难的出现都只能来自：

> [注] 拉康借法语 fil“线”与 fille“女孩”的近音制造双关，并把“线—针”的自然配合讽刺性地类比为“女孩—男孩”的预定和谐。

- 某种次生紊乱，
- 某种防御过程，
- 或某种纯粹偶发且非必然的东西。

原初和谐概念由此得到预设；它依据的观念是：无意识让主体内部的某种东西天生能够猜出另一个人那里什么东西应当回应它。这种观念同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中围绕儿童性意象的发展这一重要主题所说的极其简单的事情相对立：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并不存在仿佛已经铺设好的轨道，让男人畅通无阻地抵达女人，让男女相遇只会遭到途中偶然事故的阻碍。

相反，弗洛伊德提出，儿童性理论将以自身印记标记两性关系的整个发展——

和全部历史。严格说来的生殖器阶段，会在俄狄浦斯得到充分发展之前经历第一次成熟；这一时期就是所谓“阳具期”。此时只有一种有关生殖器状态与阶段的原始想象表象。这里不是因为思想为了方便而在某种根本能量平等中进行汇总，也不是因为只有一种力比多；这一次发生在想象层面：唯一的表象就是阳具本身。阳具本身并不等于男性生殖器官的总和；弗洛伊德说，若把它同男性生殖器官相比，阳具还排除了后者的补充部分，例如睾丸。根本所在是勃起的阳具意象。这里没有其他选择：要么是男性意象，要么是阉割。

我不是在认可弗洛伊德的这个术语；我是在告诉你们，这是弗洛伊德进行重建时交给我们的出发点。在我看来，它“没有那么自然”。当然，相对于此前的一切，《性学三论》的确是在为分析中发现的这一观念寻找自然界的参照；但它所强调的恰恰是，我们在经验中发现了大量绝非那么自然的偶然因素。

此外，如果我们把我在这里写出的东西设定为原则，也就是说，如果整个分析经验都从如下观念出发：能指已经安置妥当、已经形成结构，已经有一座建成并运转的发电厂……它不是由你们建造的；从你们所能回忆的最久远之时起，语言就已经在那里运作——说得更确切些，在人类整体历史中，你们根本无法回忆得比语言更早……那么，自从能指开始在那里运作，主体就在心理中由能指自身的游戏组织起来。正因此，这个给定的本我、你们深入深处寻找的东西，甚至比意象更加“没有那么自然”；因为水力发电厂存在于自然中，正好就是自然概念的反面，是发电厂存在于自然中的丑闻——

一旦它经由圣灵的运作建成，便是如此——

分析立场就位于这一点上。

当我们处理主体时，我们知道，自然中已经有某种东西构成他的本我，并因此按照能指衔接的方式形成结构；主体那里发生的一切都带着它的印记、矛盾，也带着它同自然配合之间的深刻差异。

我认为有必要重申这些在我看来十分根本的立场。请注意：我把一种终极现实放在能指背后；它完全被遮蔽在所指之外。而能指的运用本身还意味着一种可能性：

所指中的一切都可能根本不存在。看出生命完全会消逝、生命本身并无必然性，以及形成诸如此类同任何生命运作都无关的观念，正是死亡本能。生命运作恰恰只是像同一典型谱系中所有先行者一样，在存在中走完自己短短的一程。能指之所以存在，只同一个事实相联系——这确实是一个事实：就在这个或多或少受到认识、或多或少遭到误认的背景上，话语被引入了世界。

不过仍然奇怪的是，分析经验迫使弗洛伊德不得不明确表述另一件事：如果能指能够运作，它就以某种死亡经验为背景……这里的“经验”同亲历过某件事情意义上的经验毫无关系……因为两年前我们对弗洛伊德相关文本的评注[注1]若曾表明什么，

> [注1] 指 1954—1955 年《自我》研讨班中对《超越快乐原则》的评注。

那就是：这里无非是依据经验中的某些悖论——换言之，某些不可解释之物——所作的重建；主体受到驱使，以一种根本上属于能指的方式，无休止地重复某种严格说来对他具有致命性质的东西。

反过来，正如死亡映照在所指的根底，所指中还有一整系列事物已经在那里，却被能指借用。这里所涉及的恰恰是这些事物：某些要素同深深卷入所指的东西，也就是身体，相互联系。经验给出了身体的若干要素和变故。正如自然中已经有某些天然蓄水池，所指中也有某些要素被能指拿来，可以说为它提供最初的武器。

这些东西极难捉摸，却又极不可还原：

- 阳具这一项、单纯的勃起、竖起的石头，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 作为继承者的人体概念，是另一个例子；
- 还有若干多少同身体形态相联系、而不只同身体亲历经验相联系的要素。

它们构成最初的要素，的确从经验中借来、从经验中取得，却因下列事实而得到彻底转化：

它们被象征化了，也就是始终依照逻辑法则得到衔接。

我曾让你们围绕死亡本能至少玩过奇偶游戏，借此把你们带回这些逻辑法则中最初的一些[注2]；这是为了提醒你们：这些逻辑法则最终可还原到（+）或（−），可还原到时间序列中两个或三个一组的组合。确实存在一些终极法则，也就是能指的法则；它们当然从一切开端起就隐含在那里，而且不可能不被遇见。

> [注2] 参见《〈被窃的信〉研讨班导言》，《文集》第 44 页；或《精神分析》第 2 期，法国大学出版社，1956 年，第 1—14 页。

现在回到上次搁下问题的地方，也就是分析经验层面。那种居于中心、具有动力性创造作用的客体关系，是欠缺的关系。弗洛伊德从《性学三论》开头就告诉我们，对象的找到（Findung）其实是重新找到（Wiederfindung）；仿佛这部著作一气呵成，从未经过增补一样。

> “对象的找到其实是婴儿期性对象的重新找到。精神分析教导我们，对象的找到有两条道路：第一条就是正文所讨论的依托型道路，它依照婴儿早期的范型进行；第二条是自恋型道路，它寻找自身的自我，并在他者那里重新找到它。后一条道路对病理结局具有格外重大的意义，但不属于这里讨论的脉络。”（第 5 节“对象的找到”）

弗洛伊德没有哪一部著作不曾经过修订；他的所有著作都添加过注释，不过直接修改正文的地方极少。《释梦》不断得到扩充，却没有改变原初的平衡。相反，你们首先必须牢牢记住：如果读到《性学三论》第一版，你们会惊讶得无法相信——姑且这样说——因为在你们通常阅读的《性学三论》那些熟悉主题中，你们几乎一个也认不出来；你们平时读到的版本带着主要在 1915 年、也就是多年以后加入的增补。

也就是说，有关力比多前生殖器期发展的全部内容，只有在自恋理论出现以后才可能得到设想；而无论如何，在儿童性理论的内容得到修改以前，它从未被引入《性学三论》。弗洛伊德说，儿童性理论有一些重大误解，尤其是孩子完全不知道性交与生殖；这正是它们的根本缺陷。

这部分内容同样在 1915 年以后才得到提出，从根本上联系于这一概念地位的提升；它只有在这个最终版本之后，才于 1920 年《婴儿生殖器组织》（Die infantile Genitalorganisation）一文中抵达终点。它是性器发展的关键要素，却留在《性学三论》的界限之外；《性学三论》没有完全抵达那里，但它的推进——也就是对前生殖器期关系本身的寻找——只有依据下列要素的重要性才能得到解释：

儿童性理论以及力比多理论本身。

力比多理论那一章，恰好就是讨论自恋概念本身、讨论力比多理论观念的发现与起源的一章。弗洛伊德告诉我们，自从提出把自我力比多（Ich-Libido）看作蓄水池、看作客体力比多的构成来源以后，我们才可能建立这种理论。他又说：“对于这座蓄水池，我们只能越过围墙匆匆瞥上一眼。”

归根结底，正是在自恋张力概念中，也就是在人与意象的关系中，我们才能形成共同尺度的观念，同时形成这样一个储备中心的观念：一切根本上属于想象性质的客体关系都从这里建立。换言之，其中一项根本衔接就是意象对主体的迷惑：那个意象归根结底始终只是主体携带于自身之中的一个意象。这就是自恋理论本身的最后定论。

因此，后来所有朝向“幻想具有组织价值”这一方向发展的论述，背后预设的根本不是预定和谐观念，不是对象与主体之间的自然适配；相反，它首先预设了一项经验……

也就是《性学三论》最简单、最初、最原始的版本带给我们的经验……它完全围绕儿童性欲的两阶段发展、两层次展开，

以至于对象的重新找到始终带着如下印记：由于潜伏期的存在，也由于贯穿这一时期的潜在记忆——弗洛伊德明确这样说——最初对象，也就是母亲对象，以一种未能改变的方式被记住；原文写作 verbünden war，并称其不可逆[注]。这个 Wiedergefunden 的对象、这个永远只能是被重新找到的对象，将带着最初对象的样式；这种样式会在重新找到的对象及重新找到这一事实本身之中，引入一种根本冲突性的本质分裂。

> [注] 现有法文转录在此保留德语 verbünden war，但这一形式同随后的“不可逆”释义并不吻合；证据不足以静默改成另一德语词形，译文保留底本。

因此，弗洛伊德性理论的第一重辩证法，是围绕“重新找到的对象同受到寻找的对象并不相合”这一最初观念而引入的。在这项经验内部，力比多概念的引入又确立了这项根本经验自身的运作。它从根本上预设：某物在主体不知情的情况下保存于记忆中；也就是说，在潜伏期内，一个对象在内部得到能指性的传递，后来又发生分裂、变得不相合，并在主体此后的一切客体关系中发挥扰乱作用。

严格说来的想象功能正是在这里、在这一演变的某些时刻、某些经过选择的衔接点、某些时期得到发现；有关前生殖器期关系的一切都被置于括号之中，

被置于“想象层”概念的引入之中；而在我们的词汇中，这套辩证法起初从根本上是象征界与实在界的辩证法。

后来变得如此占优的想象界，是在《论自恋》一文之后才被引入的；它直到 1915 年才在性理论中得到衔接，直到 1920 年才围绕阳具期得到表述，而且一经表述就十分断然。当时，这种表述已经显得令人不

安，使整个分析界陷入困惑；它确切表述如下［……］[注]。当时所谓“前生殖器期”辩证法，就是相对于伦理而得到定位的——请注意，不是“前俄狄浦斯期”。

> [注] 此处原文在“它确切表述如下”之后存在缺文；译文保留方括号省略号。紧接的 par rapport à l’éthique“相对于伦理”在当前底本中语义突兀，但无其他版本证据，未擅改为别词。

“前俄狄浦斯期”这个术语是在女性性欲问题上引入的，而且是十年以后才引入。此时所涉及的是前生殖器期关系；它处在对准备性经验的记忆中，

却只有在俄狄浦斯经验中才得到衔接。从俄狄浦斯的能指衔接出发，我们才在能指材料中看到这些意象和幻想。它们本身的确来自某种东西，来自能指与所指相接触的某种经验；能指在所指中的某个地方取得了自己的材料，取自若干实际发生、鲜活并受到亲历的关系。正是这些材料，使我们能够在事后把握的过去中，形成结构并组织起我们遇到的这种想象组织；而它首先具有悖论性质。

它是悖论性的；与其说它符合和谐而规律的发展观念，不如说它同这种观念相对立。相反，这是一种危机式发展：甚至从开端起，不同口腔期与肛门期那些所谓对象，就已经被当成不同于其本身的东西，已经受到加工。人们通过各种并入概念对这些对象进行操作；正是并入概念组织并支配它们，使它们能够得到衔接，而能指结构不可能从这种操作中被排除。结合上次所说，我们看到，必须围绕对象欠缺概念组织整个经验。

我已经向你们展示对象欠缺的三个不同层面；每当这场本身就属于危机性寻找的对象寻找发生危机、相遇或有效作用时，要理解发生的一切，这三个层面都不可或缺：

相关知识卡 挫折、剥夺与阉割：三种欠缺

- 阉割，
- 挫折，
- 剥夺。

三者的中心结构、三者作为欠缺各自是什么，属于三种根本不同的东西。

在接下来的课程中，我们会十分确切地把自己置于现代理论、当下实践及分析家在实践中理解经验时所处的同一个点。如今，他们不再从阉割概念——它同俄狄浦斯一道构成了弗洛伊德的原初经验与发现——出发重组分析经验，而是在挫折层面重组它。

下一次，我会从一个随手取来的例子出发。它见于 1949 年出版的 Psychoanalytics 第 3—4 卷，是安娜·弗洛伊德的学生施努尔曼夫人的一次报告。她曾在短时间内观察到，一名交由安娜·弗洛伊德照看的儿童出现了恐怖症。

我们会阅读这份成千上万观察中的一份，看看自己能从中理解什么；也会试着看看报告者本人理解了什么。她显得具有堪称典范的忠实——这并不排除若干预先设定的范畴；但她为此把材料收集起来，使我们能够形成时间次序的观念。

我们会看到，恐怖症怎样围绕若干要点和参照出现，随后又消失。

我们会在这个主体身上看到一种恐怖症：一种获得特权的想象创造物，它在一段时间内占据优势，并对主体的行为产生一整系列效果。

我们会看到，作者能否仅仅从当下给出的挫折概念出发，明确表达这份观察的根本所在。这个概念把挫折简单理解为：主体在剥夺出现时所处阶段的特权对象遭到剥夺；它产生一种或多或少的退行效果，而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产生进展效果。为什么不呢？

我们会看到，一种现象能否只凭自身的出现、只凭自己在某种时间顺序中的位置，就以任何方式在这一语域中得到理解。

另一方面，我们会看到，若参照这三个术语——我只想强调它们的含义——是否能够得到不同的理解。它们意味着：

- 阉割中从根本上存在一种位于象征链中的欠缺；

相关知识卡 挫折、剥夺与阉割：三种欠缺

- 挫折中有某种东西只能在想象层面、作为想象损害得到理解；
- 剥夺中只有某种纯粹位于实在中的东西——实在界限、实在裂隙。但它之所以值得我们关心，恰恰因为我们看到它根本不在主体之中。主体要通达剥夺，就必须已经把实在象征化，必须把实在设想成可能不同于它事实上所是的样子。

这里对剥夺的参照，就是要求我们在能够对经验说出有意义的话之前，先设定并非一切都像一场唯心主义的梦那样发生。在那场梦里，

主体仿佛受到迫使：在人们交给我们的心理发生过程、在分析中通行的心理发生学中，主体就像一只必须从自己身上抽出全部丝线的蜘蛛；每个主体都在那里吐丝结茧，把自身裹在其中，其整个世界观都必须从自己和自己的意象中分泌出来。

我用这些准备工作向你们解释的一切，都指向一个会让我们停留一段时间的问题：人们当下交给我们的这种心理发生学究竟是否可设想？也就是，主体以某种不知所谓的预定成熟之名，从自身分泌出同对象的一系列关系，而这些对象最终又成为我们这个人类世界的对象。尽管分析提供的全部迹象都显示不可能从事这种工作，人们仍这样做；因为他们只看见那些有启发性的方面，而每当我们陷入混乱时，又只把它看作语言上的困难。

这只是我们所犯错误的表现：只有设定某种对理解客体关系不可或缺的框架，才能正确提出客体关系问题。第一重框架就是：在人类世界中，客体组织的结构与出发点是对象欠缺；而我们必须在对象欠缺的不同层次上设想它。它不仅存在于主体内部、存在于象征链层面——这条链的开端和结尾都逃逸于主体——也不仅存在于挫折层面，在那里，主体的确被安置在一种自身能够思考的亲历经验中；我们还必须在实在中考察这种欠缺。

也就是说，必须清楚：我们在这里谈论剥夺时，并不是在谈一种被感受到的剥夺，不是参照人们如此需要、以至于人人都使用的东西。障眼法只是在某个时刻——琼斯先生正是这样做——把这种剥夺变成挫折的等价物。

剥夺并不等于挫折。它存在于实在中，却在实在中完全处于主体之外；主体要把握它，首先必须把它象征化。主体怎样被引向象征化？

挫折怎样引入象征秩序？这就是我们将要提出的问题。它会使我们看到，主体在这里并不孤立，也不独立；并不是主体自己引入了象征秩序。

十分引人注目的是，昨晚没有人谈到多尔托夫人发言中的一个关键段落，

也就是：按照她的说法，只有这样一些男女儿童会变得具有恐怖症——他们的母亲在同她自己的异性亲本的客体关系中，曾经不得不承受某种紊乱。

这样一来，我们就被引入了一个显然涉及远不止孩子—母亲关系的观念。我之所以向你们提出母亲、孩子与阳具这个三元组，正是为了提醒你们：在这位母亲那里，对阳具的要求几乎总是或多或少地处在孩子身旁；孩子或多或少地象征或实现这个阳具。至于同母亲发生关系的孩子，他自己对此一无所知。说实话，昨晚围绕孩子谈论身体意象时，还有一件事理应向你们显现：即使孩子能够通达这种身体意象，母亲看待自己的孩子时，看见的也是这个样子吗？这个问题没有被提出。

同样，孩子在什么时候才能发现：母亲在他身上欲望、填满和满足的，是母亲自己的阳具意象？孩子通过何种可能性通达这一关系要素？它属于直接流溢的秩序，甚至属于投射的秩序吗？这种理解似乎预设，主体之间的一切关系，都同她自己与孩子的关系属于同一秩序。

令我惊讶的是，没有人问她：如果她看到了所有这些身体意象，那么除了某位男性或女性分析家——而且还是她所属学派的分析家——以外，究竟还有谁会在孩子身上看到这些要素和意象？这才是重要之点。男女儿童被诱导并被引入一种想象不相合之中的方式，造成了如下事实：

对母亲而言，孩子远不只是孩子，因为他同时还是阳具。我们应当怎样设想这一点？

这是经验能够触及的事，因为我们可以从经验中提取某些要素，向我们表明：孩子必须已经经历某个象征化时期，才能通达这一点；或者，在某些情形中，孩子以某种直接方式接近了想象损害——不是他自己的损害，而是母亲相对于这种阳具剥夺所处的损害。如果它在发展中确实至关重要，那么我们正是围绕这些关键点提出问题：

究竟是想象要素在这里反映于象征界，还是相反，象征要素显现于想象界？我们正是由此提出恐怖症问题。

为了不让你们完全意犹未尽，也为了从现在起先点亮我自己的灯，我要告诉你们：在母亲、孩子与阳具这个三元图式中，问题在于，为什么在恋物癖中，孩子会或多或少地占据母亲相对于阳具的位置；又为什么相反，在某些极其特殊的依赖形式中，某些异常能够带着正常的一切表象出现，孩子也可能占据——

阳具相对于母亲的位置。他为什么被引到那里？

这是另一个问题，而且无疑会把我们带得很远。因为母亲—阳具关系看来并不是以自发、直接的方式交给孩子的……事情并不是简单地因

为孩子看着母亲，发现她欲望的是一个阳具……相反，恐怖症发展起来时，绝不属于孩子在阳具与母亲之间建立这种联系——以及他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其中——的同一种秩序。我们会设法看清这一点。

恐怖症是另一回事，是对孩子—母亲关系所引入的这一困难问题的另一种解决方式。去年我已经向你们表明：要使这三项存在，必须有一个封闭空间，必须有一个名为父亲的象征世界组织。

恐怖症更多属于这种秩序，属于这种划定边界的纽带：在一个格外关键的时刻，问题没有打开任何其他性质的解决道路，主体便呼唤某个象征要素前来救援。这个要素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总是显得极其象征，也就是极其远离一切想象把握；恐怖症中介入之物真正带有神话性质，它在某个时刻受到召唤，用来支撑那种必须维持的根本连结——阳具的出现已经在母亲与孩子之间、在母亲—孩子这一取向中打开一道裂隙。

第4课 · 1956年12月12日

这是我们上次得出的表格，用来明确表述对象问题在分析中怎样得到提出。

Agent	Manque	Objet
Père *réel*	Castration *symbolique*	Phallus *imaginaire*
Mère *symbolique*	Frustration *imaginaire*	Sein *réel*
Père *imaginaire*	Privation *réelle*	Phallus *symbolique*

今天我会设法让你们感到：由于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怎样的混淆、缺少了怎样的严谨性，分析才会出现一种奇特滑移，最终加入了一种我称之为可耻的人类情感关系观念。

说实话，我想自己已经多次强调：分析起初之所以造成如此大的震动，是因为它突出性欲的作用——当然并不总是如此；分析也促使它变成了陈词滥调，如今无人再觉得受冒犯。更确切地说，造成震动的是，分析在引入性欲观念的同时、而且更强烈地引入了一种悖论观念：接近性对象时存在一种可以说内在的根本困难。奇怪的是，我们

竟从那里滑向了这种和谐的对象观。为了衡量它同弗洛伊德本人最严谨表述之间的距离，我从《性学三论》中为你们选了一句话。

即使对客体关系所知最少的人也会注意到，弗洛伊德的确谈了许多有关对象的事情，例如对象选择；但客体关系概念本身——

在他那里完全没有得到突出、培育，更没有被置于问题前台。下面这句话出自弗洛伊德《驱力及其命运》一文[注1]：

> [注1]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驱力及其命运》，载《元心理学》，伽利玛"观念"丛书，第 19 页："驱力的对象，是驱力能够在其中或借以达到目标的东西。它是驱力中最容易变化的部分，原本并不同驱力相连；只因它特别适合使满足成为可能，才被附加给驱力。"

> "驱力的对象，是驱力能够在其中或借以达到目标的东西。它是驱力中最容易变化的部分，原本并不同驱力相连；只因它适合使驱力得到平息和满足，才被配置给驱力。"
>
> ["Das Objekt des Triebes ist dasjenige, an welchem oder durch welches der Trieb sein Ziel erreichen kann. Es ist das variabelste am Triebe, nicht ursprünglich mit ihm verknüpft, sondern ihm nur infolge seiner Eignung zur Ermöglichung der Befriedigung zugeordnet."]

因此，这里明确表述的是：对象与倾向之间不存在预定和谐；对象只是凭借自身使满足成为可能的条件，才同倾向发生联系。人们只能想办法凑合。这不是一套完整学说，只是一段引文；但它是众多引文之一，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引文之一。

我们要看的是：这是一种怎样的对象观？它经过怎样的迂回，才使我们能够设想对象的实效性地位？借助弗洛伊德那里以不同方式得到表

述的若干要点，我们已经突出这个前台：对象始终只是从原初找到（Findung）出发而重新找到的对象，因而是一种永远不能令人满足的重新找到（Wiederfindung）。重点正落在“重逢”概念上。此外，我们还从其他特征看到，这个对象一方面并不适当，

另一方面甚至有一部分逃逸于概念把握。

这使我们尝试更紧密地圈定那些根本概念，尤其要把当下分析理论置于中心的挫折概念单独提取出来。这个概念一旦进入我们的辩证法——尽管我曾多次强调，它相对于弗洛伊德本人的思想多么边缘——就必须得到更精确的圈定和重新审视。我们要看它为何成为必需，又应当在何种程度上加以修正与批判，才会变得可用；总而言之，才会同分析学说的根基，即仍从根本上构成弗洛伊德教导与思想的东西相一致。我已经提醒过你们，材料一开始就呈现出——

阉割、挫折与剥夺这三项；标出三者差别是富有成果的。

相关知识卡 挫折、剥夺与阉割：三种欠缺

阉割从根本上联系于一个已经确立的象征秩序；这个秩序包含一种漫长而完整的连贯性，主体绝不可能在它之外被给出。我们此前的全部思考已经充分表明这一点；只需再注意，阉割从一开始就同俄狄浦斯情结的中心地位相联系。俄狄浦斯情结是整个性欲演变不可或缺的衔接要素；它自身从一开始就在根本上包含了绝对无法清除的法则概念。

结合此前全部思考，这一点应当已经得到充分断言乃至证明：阉割位于象征性债务层面。上次我曾指出，这种由阉割确立的象征性债务所涉及、所调动的是一个想象对象，也就是阳具本身。至少弗洛伊德是

这样断言的；这就是我今天的出发点，我们将从这里试着把挫折辩证法再向前推进一些。

当然，挫折本身在这张表中占据中心位置，这一点也不会凭自身造成偏轴或紊乱。弗洛伊德把欲望概念置于分析冲突性的中心；由此不难理解，强调挫折并没有太大偏离弗洛伊德辩证法的这一中心概念。要紧的是把握挫折意味着什么、怎样被引入，又指向什么。

显而易见，挫折概念之所以被置于分析理论前台，联系于对创伤、固着以及本身属于前俄狄浦斯期的经验印记的考察。这并不表示它们处在俄狄浦斯之外，而是说它们为俄狄浦斯准备了地形、基础和根基；它们以某种方式塑造俄狄浦斯，使某些偏转已在其中得到预备，并将成为俄狄浦斯冲突——

或多或少强烈地朝某个或多或少非典型、异型方向偏转的斜坡。

因此，挫折概念联系于生命最初时期，也联系于某种关系模式；这种模式自身显然把实在问题引入分析经验的推进。我们看到，某些观念随挫折概念一同被置于主体条件形成及发展过程的前台；人们用或多或少带有数量隐喻的语言，把它们称作满足与奖赏，也就是同年幼主体各发展阶段相适应、相配合的一定数量的好处；这些好处的饱和程度或相反的匮乏程度，被看作关键要素。

我想，只需提出这条评论，就足以唤起证据，使我们回到文本，并看到分析文献只因兴趣中心发生移动，便在考察中跨出了怎样的一步。

这一点相当容易看出，至少熟悉这三个概念、能够轻易辨认它们的人会看出。在某段很容易认出这种概念衔接的分析文献中，重点会被放

在某些实在条件上；我们可以、也被认为应当在主体的既往经历中通过经验发现这些条件。而在最早期的分析观察中，这种对相关要素的突出大体上并不存在；因为当时它以不同方式得到表述。

这样，我们又回到作为某种实在亲历印记的挫折层面。这些印记发生于主体同某个实在对象的关系通常以母亲乳房这一所谓原初意象为中心的时期。主体最初的斜向与固着，正是相对于这一原初对象而形成；人们又在这些斜向与固着面前描述不同本能阶段的类型，而这些类型的特征，就是向我们提供一幅主体发展的想象解剖图。

口腔期与肛门期关系，连同它们各自不同的阳具性、施虐性等细分，由此得到明确表述。它们都带着矛盾情感这一要素：主体在自身位置上也参与他者的位置；主体是两个，始终参与一种根本的二元处境，没有这种处境，就不可能对位置作出任何总体承担。我们先把讨论限制在这里，看看这一切会把我们带到哪里。

现在我们面对一个处在这一位置、也就是欲望位置上的对象。我们照别人交给我们的样子，把它当作乳房，当作实在对象。于是我们来到问题核心：

“主体同实在对象之间最原始的关系是什么？”

你们知道，分析理论家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过怎样的讨论；它至少显露出种种误解。弗洛伊德曾谈到作为亲历阶段的自体性欲；至少有些人坚持认为，这种自体性欲就是孩子同原初母亲对象之间的最初关系。另一些人则指出，很难依据一个仿佛建立在“相关主体只认识自己”这一事实上的概念；直接观察中的许多特征，以及我们认为解释孩子—母亲关系的发展所必需的许多东西，似乎都同“此时还不存在同对象的

有效关系”这一看法相矛盾。有什么会比主体最迫切需要、作为最初食物的那个东西，更明显地位于主体外部呢？

说实话，这里似乎存在一种由某种混淆产生的误解。讨论因此始终原地踏步，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表述；若逐一列举，它们的差异足以把我们带得很远。我们尚须在相关问题的概念化上推进，因而现在不能这样做。不过请注意，我们已经谈过爱丽丝·巴林特的理论。她试图调和弗洛伊德所提出的自体性欲概念与儿童在最初发展阶段所面对对象的现实所强加给我们的东西，最终得出一种十分明确而引人注目的观念，她称之为“原初之爱”（primary love）。

相关知识卡 迈克尔·巴林特的原初之爱与分析终结

巴林特夫妇说，这是唯一一种自私与给予能够完美调和的爱；也就是把下列两者之间的完美相互性规定为根本：

- 孩子向母亲要求的东西；
- 与母亲向孩子要求的东西。

两种需要、两个极点之间据说存在完美互补。然而，这同全部临床经验极其矛盾；我们不断遇到的是主体唤起——

相关知识卡 迈克尔·巴林特的原初之爱与分析终结

一切可能发生的不相合的印记，而且是真正根本的不相合。稍后我会提醒你们，在这个根本不是二元组的二元组中，只需一个极其简单的要素，就足以显示不相合；

它同所谓完美、互补的原初之爱理论自身的表述形成极大反差。爱丽丝·巴林特[注2]只用一条评论，就暴露了这一点。她告诉我们，在关系保持自然的地方，也就是“野蛮人”那里，这种情形历来如此：孩子始终同母亲保持紧密身体接触。

> [注2] 爱丽丝·巴林特：“对母亲的爱与母亲之爱”（“Love for the Mother and Mother's Love”），《国际精神分析杂志》，1949 年，第 30 卷，第 251—259 页。

也就是说，它永远发生在别处、发生在梦境之国；在那里，众所周知，母亲永远把孩子背在背上。这显然是一种逃避，同严谨的理论化很不相容。归根结底——

人们不得不承认，只有在一个完全理想、甚至唯心主义的位置中，才能明确表述一种如此严格互补、仿佛天生注定会找到相互性的爱。我举这个例子，其实只是因为它引入了我们马上要指出的东西，也就是我们批判挫折概念的驱动力。显然，这完全不是克莱因理论一类理论交给我们的根本表象。饶有意味的是，人们从哪个角度攻击克莱因理论的重建。既然问题涉及客体关系，我恰好看到一份比利时精神分析家协会的活动通讯。

相关知识卡 迈克尔·巴林特的原初之爱与分析终结

其中几位作者也会出现在那本我曾为第一次讲演作笔记的书中。我已经告诉过你们，那本书严格以一种毫不羞惭、完全可质疑的客体关系乐观图景为中心，并由此获得自身意义。而在这份较为内部的通讯里，对问题的处理似乎更有分寸，仿佛作者对自己的不确定多少感到难为情，只有在这类地方才肯表达；当人们读到这些内容时，它无疑也显得更为可取。

我们看到，帕什先生与勒纳尔先生的一篇文章，重印了他们在日内瓦大会上针对克莱因立场提出的批判。这篇文章极其引人注目：它责备梅兰妮·克莱因持有一种发展理论；按照批评者和作者的说法，这套理论仿佛把一切都放在主体内部，以预先成形的方式把一切可能的发展类型——

都已经纳入本能给定之中。按照作者的说法，发展只不过是让不同要素从中走出来；这些要素已像他们要求进行的比较那样，潜在地得到衔接，

也就是像某些生物发展理论所说的那样：整棵橡树已经包含在橡子之中。

这类主体仿佛不会从外部获得任何东西。发展据说首先从主体原初的攻击驱力开始——从这个视角理解梅兰妮·克莱因时，攻击性在她那里占据优势的确十分明显；这些攻击驱力随后从外部、即母亲领域反弹回来，被主体感受到。于是，母亲整体概念逐步建构起来；据说这种建构只能被理解为一棵预先成形的橡树。所谓“抑郁位置”由此确立，并可能出现在一切经验中。

要恰当评价所有这些批判，必须逐条考察；

我在这里只想强调，它们合在一起悖论式地抵达了什么。这些批判最终得出一条构成文章核心的表述。作者显然被如下问题迷住：发展中从外部带来的东西，是一个经验事实；但他们以为自己在梅兰妮·克莱因那里看到，这一切从开端起就已经在一个内部星丛中给出。因此，内部对象概念后来如此强烈地被置于前台，似乎也就不足为奇。

两位作者于是得出一个他们认为可以从克莱因的贡献中抽绎出来的结论：应当把“遗传上预先形成的图式”这一概念置于首位——而他们自己也强调，这种图式极难想象。[注]

> [注] 米勒编订本（Seuil，1994，第 65 页）作 tirer de l’apport kleinien，即“从克莱因的贡献中抽绎出来”；Staferla 转录少了介词 de，本译据米勒本校正。

> “因此，孩子带着遗传本能出生，面对一个他尚未感知、却已经记得的世界。此后，他既不必从自身或任何其他东西中把这个世界产生出来，也不必通过一连串异乎寻常的发现来发现它，而只需把它认出来。”

我想，你们多数人都认得这段表述无法掩盖的柏拉图式性质。这个只需回忆起来的世界，会依照某种想象准备得到确立；

主体从一开始就同它相适配。这当然是一种对立性的批判；但我们必须用经验检验，它是否不仅同弗洛伊德写下的一切背道而驰，而且还应从现在就看出：这些作者其实远比自己以为的更接近他们责备梅兰妮·克莱因的立场。因为恰恰是他们自己预先在主体那里指出：一切使主体能够把自己列入一系列阶段的要素，都以“预成图式”状态存在，并准备在恰当时刻出现。这些阶段只有在如下意义上才可称为理想阶段：给它们提供类型和规范的，恰恰是主体的记忆，

而且准确地说，是主体的种系发生记忆。

这真是梅兰妮·克莱因夫人想说的吗？甚至支持这种说法都绝对不可思议。因为如果说梅兰妮·克莱因确实带来过某种观念——而这也正是两位作者批判她之处——那无疑就是：

相关知识卡 梅兰妮·克莱因

最初处境远为混乱，在开端处真正处于无政府状态；起源以驱力的喧嚣与狂暴为特征。真正的问题，正是秩序一类东西怎样可能从这里建立起来。

克莱因的构想中无疑包含某种神话性质。倘若她确实提供了一个两位作者无法认出的神话——尽管它类似于克莱因式幻想——那么这里的矛盾已经十分完整。当然，这些幻想只具有回溯性质。我们将看到，在主体的建构中，它们怎样从一些可能非常早的点被重新投射到过去；这些点必须得到界定，我们还要说明它们为何可能如此之早，为何早在两岁半时，梅兰妮·克莱因就已经能够像阅读任意一面占卜镜、预言之镜的人那样“阅读”……

相关知识卡 梅兰妮·克莱因

……她在一个已经高度发展的主体的过去中作回溯性阅读，并找到一种方法，在那里读出无非是俄狄浦斯结构的东西。这是有理由的，因为这里当然存在某种迷象作用。

当然，我们不能跟随她声称：俄狄浦斯仿佛已经以碎片形式存在——阴茎在不同种类的兄弟姐妹之间移动，而他们都位于由母亲身体内部界定的整个领域中。不过，这种衔接很早就能在同孩子的某种关系中被发现并明确表达；这一点无疑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富有成果的问题。纯属假设的理论衔接，可以在开端处交给我们某种更能满足自然和谐观念的东西，却并不符合经验向我们显示的事实。

相关知识卡 梅兰妮·克莱因

我相信，这已经开始向你们指出，我们可以从哪个角度把某种新东西引入原初母亲—孩子关系层面的混乱。之所以会有这种混乱，是因为

人们没有从一个中心概念出发，也就是没有从真正的中心——挫折——出发。但我们不是从当下被设想的挫折出发，也不是从它不应当成为的样子出发；问题是，孩子的原始关系怎样得到提出与定位。

如果以下列方式处理问题，许多东西都能得到澄清：这种“挫折”从起源起就有两个侧面，直到最后我们都会看到二者被括在一起。

一边是实在对象。正如人们告诉我们的，一个对象远在被感知为对象之前，就完全可能开始影响主体的关系。实在对象构成直接关系；正是依据这种周期性——其中可能出现空洞和匮乏——主体的某种关系模式才会建立。为了引入它，我们此刻甚至完全无须承认主体已经区分自我与非我。例如，弗洛伊德意义上的自体性欲位置，就表示严格说来尚未构成他者；但直接关系本身完全可以设想。

在这种属于欠缺关系的根本关联中，确实存在某种对象；不过对象只相对于欠缺才取得自身地位。施事者概念应当使我们能够从开端起，对总体位置怎样得到安置作出一条十分根本的表述。这里的施事者就是母亲。过去几年中，我们从自己的经验、尤其从弗洛伊德围绕孩子相对于重复游戏的原则性位置所明确表述的东西中，看到了什么？

母亲不同于这个原始对象；而且依照观察，她从一开始也并不作为母亲显现。弗洛伊德明确强调，母亲从最初那场游戏开始显现；孩子的行为以极其鲜明的方式抓住并处理了这场游戏：孩子拿起一个本身完全无关紧要的对象，

相关知识卡 象征母亲、实在母亲与赠礼

一个毫无生物价值的对象——这个例子中是一只小球，不过也可以是任何东西——六个月大的孩子把它扔过床沿，随后再把它取回。

孩子极早就明确表达了“在场—缺席”这一对；它所刻画、标示的是——

挫折之施事者的第一次构成。起初，这个施事者就是母亲，作为挫折施事者的母亲——

也就是人们所说，在发展的某个阶段引入“整体”这个新要素的母亲；这一阶段就是“抑郁位置”。它的特征与其说是一个整体同前一层次的碎片对象混乱相对立，不如说是这种“在场—缺席”结构。它不仅作为客观事实存在，而且由主体本身明确表达，并围绕某种东西被主体赋予中心。正如我们去年已经阐明的，“在场—缺席”对主体而言意味着：

- 母亲对象缺席时受到呼唤；
- 它在场时，则在同呼唤相同的语域中、也就是通过一声发音而被推开。

呼唤的这一根本节拍当然远未一开始就交给我们全部象征秩序；但它显示了开端，使我们能够从实在客体关系中提取出另一个独立要素。孩子同实在对象的关系有自身节拍，留下标记与痕迹；这个要素将使这种实在关系此后可能同象征关系本身发生关联。

在更清楚地显示这一点之前，我只想突出一件事实所包含的东西：孩子同构成“在场—缺席”对立项的人建立关系，这种关系把某种东西引入了孩子的经验；而它在挫折发生时自然趋于沉睡。于是孩子面对一个已经参与象征性秩序的施事者；正如去年所见并已阐明，“在场—缺席”对、正负（+/−）标记，就是第一个要素。

它单凭自身还不足以构成象征秩序，因为此后还需要一个序列，而且需要作为序列得到分组；不过，“正”与“负”、“在场”与“缺席”的对立中，已经潜藏着一个象征秩序的起源、诞生与可能性，

也潜藏着它的根本条件。

我们应当怎样设想这种同实在对象的原初关系转向别处的时刻？母亲—孩子辩证法在什么真正的转折点，才会向更复杂的关系敞开，向其他要素敞开，使后者严格说来把我们所谓辩证法引入其中？我相信，可以用一条图式化问题来表述：构成象征施事者的东西——

也就是母亲本身——是孩子同这个实在对象之关系的根本要素；那么，如果她不再回应，会发生什么？如果她不再回应这声呼唤，会发生什么？

让我们自己引入答案：如果她不再回应，如果她从原有位置跌落，会发生什么？此前把她变成依呼唤而“在场—缺席的对象”的象征结构，从这一刻起变成了实在的。它为什么变成实在的？

相关知识卡 象征母亲、实在母亲与赠礼

这意味着什么？母亲离开了此前使她作为施事者存在的结构；我们原本已经把她同作为孩子满足对象的实在对象区分开来。此时她变成实在的，也就是说，她不再回应，或者说只按自己的意愿回应。她变成某种力量，整个现实以后将围绕这股力量开始形成结构。

位置由此发生倒转。我们以乳房为例；即使把这个对象设想得包容一切也无关紧要，因为这里涉及实在关系。可是，从母亲成为一种力量、并以此成为实在的那一刻起，孩子能否通达此前单纯作为满足对

象的这些对象，就以最明显的方式依赖于她。它们现在变成这股力量所给予的赠礼对象；同母亲此前一样，它们可以进入“在场—缺席”标记，却也不会比母亲此前更进一步。

不过，这些对象如今依赖于这个实在对象、依赖于母亲这股力量。总之，它们成为我们严格意义上所说的对象，不是隐喻性对象，而是能够被抓取、能够被占有的对象。

“非我”（not me）概念首先经由他者意象进入，还是经由能够被占有的东西、经由孩子想留在自己身旁的对象进入，这是一个观察问题。从这一刻起，这些对象不再那么需要成为满足对象；它们更重要的是标志那股可能不回应的力量——母亲的力量——具有何种价值。换言之，位置倒转了：母亲变成实在的，对象则变成象征的；对象首先成为来自母亲力量之赠礼的见证。此后，对象具有两种满足性质，可能以两重方式成为满足对象：

相关知识卡 象征母亲、实在母亲与赠礼

- 它像此前一样满足某种需要；
- 同样无疑的是，它象征着一股有利的力量。

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自分析理论按某种说法变成“发生学精神分析”以来，最累赘的概念之一，就是所谓思想的全能，就是人们归到一切离我们最遥远之物身上的“全能”。孩子抱有全能概念是可以设想的；也许他的确掌握了其中最根本的东西。但如果认为这里所涉及的全能是孩子自己的全能，那就完全荒谬，而且会陷入死路。我正在描述的母亲实现时刻，才是这里所涉及的全能：全能的是母亲，不是孩

子。从一种极其古老的象征化过渡到母亲成为现实，决定性的正是这个时刻：母亲能够给予任何东西。

如果认为孩子抱有自己全能的概念，那就彻底错误，完全无法设想。不仅孩子的发展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一点；几乎所有令我们感兴趣的变故都在向我们显示，孩子自身的这种“全能”及其失败根本不属于问题；真正属于问题的是你们将要看到的——

有关母亲全能的匮乏与失望。

这项考察或许显得有些理论化；但它至少具有一个优点：引入了一些根本区分，打开了当下实际用法没有打开的道路。你们现在会看到——

它把我们引向哪里，以及我们现在已经能够指出什么。孩子面对某种已经被他实现为力量的东西：它突然从最初“在场—缺席”标记的层面，转变成一种能够拒绝、并掌握主体可能需要的一切——甚至掌握主体并不需要之物——的东西；只要这些东西依赖于这股力量，它们就变成象征的。

现在从完全不同的出发点提出问题。弗洛伊德告诉我们，这个对象世界中有某种东西发挥着完全决定性、而且悖论式决定性的功能：那就是阳具这个对象。它本身被界定为想象的，无论如何都不能同作为现实器官的阴茎混淆；严格说来，阳具是阴茎的形式、勃起意象。阳具之所以如此关键，以至于它在想象界中的怀念、在场与地位，对缺少它的人类成员——也就是女人——看来甚至比对能够确认自己现实中拥有阴茎的人更重要；然而，后者的整个性生活又从属于他在想象中

切实承担其使用，并最终把这种使用承担为合法、获准的东西——也就是男人。这是一项给定。

现在来看我们所讨论的母亲与孩子。先按照迈克尔与爱丽丝·巴林特的看法把他们放在一起：就像让·谷克多时代的莫蒂默夫妇只有一颗心一样，在巴林特夫妇那里，母亲与孩子也只有一个需要整体。不过，我仍把他们保留为两个彼此外在的圆。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在女人的根本对象欠缺中存在阳具。这不但同她与孩子的关系具有最紧密的联系，而且理由很简单：如果女人从孩子那里找到满足，恰恰是因为孩子在她的层面上使某种东西达到饱和，使她在他身上找到某种或多或少能让她平静的东西——阴茎，也就是对阳具的需要。如果不把这一点纳入考虑，我们不仅误认弗洛伊德的教导，也误认经验时时显示的东西。因此，母亲与孩子之间存在某种关系：孩子期待从母亲那里得到东西，也在这套辩证法中实际得到东西。我们不能不把我现在引入的东西纳入其中：大致沿用巴林特夫妇的表述，孩子或许可以相信自己是因为自身而受到爱。

问题在于：

- 只要母亲的阳具意象没有完全被还原为孩子的意象；
- 只要据说处在孩子面前、构成母亲欲望的那个原初对象发生复视与分裂：它事实上由两方面叠合起来，一方面是对某种想象饱和的需

要，另一方面是母亲同孩子在一个始终带有神话性质的原初层面上可能拥有的真正实在、有效而本能的关系；

- 只要对母亲而言，相关事物中仍有某种不可还原的东西——如果我们最终遵循弗洛伊德——

……这就是说：作为实在的孩子，象征着那个意象。

如果作为实在的孩子对母亲而言取得了象征她的想象需要的象征功能，那么三项已经全部在场，各种变化都可能从中出现。孩子面对母亲时，二者之间已经存在各种形成了结构的处境：从母亲作为力量进入实在的时刻起，某种东西就为孩子打开了一个中间项本身的可能性，也就是作为赠礼对象的中间项。

问题是：孩子在什么时候、怎样、通过哪种通道，才能直接进入母亲那里的象征—想象—实在结构？换言之，孩子在什么时候能够以我们将看到的、或多或少经过象征化的方式，进入并承担阳具对母亲而言所构成的想象而又实在的处境？孩子在什么时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感到：他自己被剥夺了向母亲要求的某种东西，因为他发现，受到爱的并不是他，而是另一个东西，是某个特定意象？

事情还会更进一步：孩子在自己身上实现这个阳具意象；严格说来的自恋关系正是在这里介入。

- 例如，当孩子把握到两性差异时，这项经验在何种程度上同母亲的在场及行动交给他的东西衔接起来，使他辨认出阳具这个对母亲而言属于想象的第三项？

- 更进一步，母亲欠缺这个阳具、母亲自身也处于欲望之中——她不只是欲望着不同于孩子的某物，而且就是欲望着；也就是说，她的力量受到触动——这一认识在何种程度上会成为对主体而言比任何东西都更具决定性的东西？

上次我预告了一份恐怖症观察。现在就告诉你们它的意义所在：对象是一个小女孩。由于当时处在战争时期，而且观察者是安娜·弗洛伊德的学生，我们拥有种种有利条件：孩子从头到尾受到观察；而这位学生正因为是安娜·弗洛伊德夫人的学生，才会成为一个好观察者——因为她什么也不理解。她之所以什么也不理解，是因为安娜·弗洛伊德夫人的理论是错的；理论的错误使她面对事实时始终处于惊讶状态，而观察的全部成果恰恰由此产生。于是，一切都被逐日记录下来。

相关知识卡 **安娜·弗洛伊德**

这个小女孩发现，男孩有一个“小鸡鸡”（fait-pipi），用小汉斯观察中的说法就是如此。

有一阵子，她开始采取竞争位置——当时她两岁五个月——也就是想尽办法模仿小男孩。

这个孩子同母亲分开，不只是因为战争，还因为母亲在战争初期失去了丈夫。母亲会来看她，两人关系非常好；“在场—缺席”节奏规律，爱的游戏和身体接触也都是接近游戏：母亲踮着脚尖走来，让自己的到来一点点滴入；我们可以看见她的象征母亲功能。一切都很好。母亲不在时，女孩想要的实在对象一应俱全；母亲在时，则扮演象征母亲的角色。

女孩发现男孩有“小鸡鸡”，于是当然发生了一些事情：她想模仿他们，也想摆弄他们的“小鸡鸡”；这里出现过一场风波，却完全没有造成任何后果。

然而，这份观察被作为一份恐怖症观察交给我们。的确，有一天夜里，她突然在疯狂惊恐中醒来，因为有一条狗在那里，要咬她；她想离开自己的床，别人不得不把她放到另一张床上。这份恐怖症观察持续发展了一段时间。恐怖症紧接着发现阴茎缺席而来吗？我们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因为这条狗显然是一条会咬人的狗，而且咬的是性器官；随着我们分析孩子——也就是跟随并理解她所说的东西——我们会知道这一点。

相关知识卡 **安娜·弗洛伊德**

这个孩子有些语言发展迟缓；她成长中说出的第一句真正又长又有结构的话，是说狗会咬坏男孩的腿，而这恰好就在恐怖症起源处。你们也看得出象征化与恐怖症对象之间的关系。为什么是狗，我们以后再谈。我现在只想请你们注意：狗在这里是一个取走的施事者，取走了起初或多或少被承认为缺席的东西。

我们是否要跳过中间环节，直接说恐怖症只是一种向法则层面的过渡？也就是说，某种像我刚才所说、被赋予力量的东西介入进来，为缺席提供理由："之所以缺席，是因为"它被取走、被咬掉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今天试图以一幅图式明确表述某种让我们完成跨越、看清这件表面上十分粗略之事的东西。

人们时时都这样做。琼斯先生非常明确地说：对孩子而言，超我也许只是一种不在场证明；焦虑才是原初的、原始的、想象的。由此他又回到某种人为安排：道德上的对应物或违规，也就是全部文化及其禁令，只是一种会消逝的东西；更根本的、处于无拘束状态的焦虑仿佛躲在它后面安歇。

这里有某种正确的东西，也就是恐怖症机制；但恐怖症机制就是恐怖症机制。帕什先生在我提到的文章末尾把它扩展到这样一种程度：他声称恐怖症机制从根本上解释了例如死亡本能；或者，梦的意象只是主体用来给焦虑穿衣、让焦虑人格化的某种方式。这始终回到同一个观念：这里并没有对象征秩序的误认，象征秩序只不过是某种更根本之物的衣着与借口。我引入这份恐怖症观察，是想告诉你们这一点吗？不是！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恐怖症花了远不止一个月才爆发，实际间隔更久；在这个孩子发现自己的无阳具状态（aphallicisme）与恐怖症出现之间，有一段标记清楚的时间。这个间隔中必须发生另一件事：母亲先因为患病而停止来访，并且必须接受手术。母亲不再是象征母亲；母亲缺席了。后来她回来，再次同孩子游戏，仍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再后来她拄着手杖回来，变得虚弱；她不再拥有原来的在场、欢快，也不再拥有此前每八天一次、足以维系孩子的接近与离开关系。

相关知识卡 安娜・弗洛伊德

于是，在相隔很远的第三个时刻，观察者让我们知道了一项发现：底本在这里说，“俄狄浦斯”并非来自无阳具状态，也不来自母亲“到来—已经到来”之交替节奏的第二次中断；还必须让母亲显现成一个自身可能欠缺的人[注]。她的欠缺铭写在孩子的反应和行为中：孩子非常悲伤，必须有人鼓励她；但这时仍没有恐怖症。直到她重新见到虚弱的母亲——母亲拄着一根棍子，生病而疲惫——第二天才爆发狗的梦，恐怖症随即发展起来。

> [注] 此句法文转录的主语写作 l’Œdipe“俄狄浦斯”，与本段围绕恐怖症发生时点的上下文不完全吻合；venue-être venue 的形式也不稳定。译文保留底本用词，不静默替换成“恐怖症”或补造时态关系。

相关知识卡 安娜・弗洛伊德

这份观察中只有一件事比上述情况更有意义、更显悖论——我们以后还会回到这个恐怖症，

谈治疗者如何处理它，以及他们以为自己理解了什么。我现在只想在恐怖症的先行事件中标出一点：至少它提出了一个问题——从哪个时刻起，正因为母亲自身欠缺阳具，恐怖症中形成并取得平衡的某种东西才使恐怖症成为必需？为什么恐怖症足以解决问题，则是我们下次会处理的另一个问题。

还有一点同样引人注目。恐怖症之后，战争结束，母亲把孩子接回身边并再婚。女孩有了新父亲和新兄弟；这个突然得到的兄弟，是母亲再婚对象的儿子，明显比她年长，大约大五岁。他开始同她进行种种

既崇拜又粗暴的游戏，包括要求彼此裸露身体。这个兄弟对小女孩的兴趣，显然完全联系于她“无阴茎”（a-pénienne）这一点。心理治疗师对此感到惊讶：这本应是她恐怖症复发的绝佳机会。因为安娜·弗洛伊德整个治疗法以“环境论”（environmental）理论为基础；按照这套理论，正是自我对现实得到的消息是否充分，造成了不相合。

此时，她的欠缺重新变得在场；男人—兄弟这个不仅具有阳具性质、而且实际携带阴茎的人物也在场。难道这里不应当成为一次复发机会吗？完全相反，她从未如此健康；此时没有丝毫心理紊乱的痕迹，她发展得非常好。

文本还准确告诉我们原因：母亲显然偏爱她而不是那个男孩。不过，父亲又是一个相当在场的人，足以准确引入一个新要素。我们迄今还没有谈到它，但它同恐怖症功能有根本联系：这是一个超出同母亲之间力量或无力关系的象征要素，也就是严格意义上的父亲；父亲本人把力量概念从女孩同母亲的关系中分离出来。总之，恐怖症看来已经使这个要素达到饱和：她在作为阉割施事者的动物那里害怕的东西，事实证明是不可或缺的根本衔接要素，使这个孩子能够穿过她面对母亲无力时所进入的严重危机。

她在这里重新找到由母亲在场满足的需要；除此之外，还有某种东西……问题恰恰在于，治疗师是否真看得如此清楚……她已经成为父亲的女儿，而这种关系中或许存在种种病理可能。我们还可以从另一面看出，她此时整个变成了某种比兄弟更有价值的东西。无论如何，她无疑会变成那种人们谈论甚多的“阳具姐姐”；问题是，以后的她会在何种程度上牵涉进这种想象功能。

不过眼下，没有任何根本需要必须通过明确表达阳具幻想来填满。父亲在那里，他已经足够；他足以在母亲—孩子—阳具关系的三项之间维持充分间距，使主体不必拿出自身、不必以任何方式投入自己的东西来维持这个间距。

这个间距怎样维持？通过哪条道路、哪种认同、哪种人为安排？下次我们会重新考察这份观察，并开始处理这些问题；由此也会把你们引向——

前俄狄浦斯期客体关系最具特征的东西，也就是恋物对象的诞生。

第5课 · 1956年12月19日

精神分析关于客体关系的构想，已经有了某种历史性的实现。我试图向你们展示的东西，部分以不同的意义、部分也以相同的意义重新接过这一构想；不过，当然，所谓相同也只是在它被纳入一个不同的整体、从而获得不同意义的限度内才成立。

在我们已经抵达的这个关头，应当非常鲜明地标出：那个日益把客体关系当作依据的群体——我最近重读某些文章时又看清了这一点——究竟如何把这种客体关系置于他们对分析的构想中心。还应当清楚标明，这一逐渐凝结、逐渐自我确立，甚至在这些年里同步得到强化的表述，如何终于形成了如今某种十分牢固的 articulation［条理化结构］。

我曾在某些文章里带着讽刺意味地希望，有人能真正说明：某一种取向［PDA］所设想的客体关系究竟有何根据。此后，我的愿望得到了充分满足：不止一个人向我们给出了这种表述。更具体地说，最初借强迫神经症引入这一表述的那个人［布韦］，后来反倒把它处理得较为松软；而在另一些人那里，可以说，主导性的构想则经历了一番力求精确化的努力。

米歇尔·费恩先生在《客体关系中的运动性》一文中——刊于《法国精神分析杂志》1955 年 1—6 月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例子；我认为，它与我即将作出的概述完全相符。你们若亲自阅读那篇文章，肯定还会觉得事情走得远远超过我在这几句话里不得不缩略呈现的程度。

总之，我希望你们会看清：被分析者与进行分析者之间的关系，一开始就被设想为一个主体（病人）同一个外部对象（分析家）之间建立的关系；用我们的词汇来说，分析家在这里被设想成实在的。分析情境的全部张力，都被安置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仅凭这个“二人组”，便足以成为推动分析展开的要素；在一个躺着或没有躺在长榻上的主体与作为分析家的外部对象之间，原则上只能建立、只能显现出所谓的原初驱力关系。按照分析关系发展所预设的正常情况，这种关系本应通过运动活动表现出来。

分析家细心观察主体各个运动反应时期留下的细小痕迹，并从这一侧找到驱力层面所发生之事的最终答案；驱力仿佛就在那里被分析家定位，并被他感受到是活生生的。正因为主体抑制自己的动作，正因为分析惯例所建立的关系迫使他加以抑制，分析家才把应当显现之物——也就是正在涌现的驱力——定位在这个层面。

归根结底，这一情境从根本上被设想为只能外化成一种情色性的攻击；它之所以没有显现，是因为双方约定它不应显现，但可以说，人们又希望它的勃起随时都能冒出来。

恰恰因为在分析惯例和规则所规定的位置之内，驱力的运动性表现无法发生，我们才得以察觉有什么东西介入了这个被视作构成性因素的情境。它被非常明确地表述为：在同外部对象的关系之上，又叠加了一种同内部对象的关系。

我刚才引用的文章正是这样表述的。主体同某个内部对象有着特定关系；这个内部对象始终被视作在场的那个人，只不过是被纳入了主体内部早已建立的想象机制。正因为这个想象对象与实在对象之间出现

了某种不协调，分析家才会在每个时刻受到评估和衡量，并根据下列两者之间不协调的程度，随时调整自己的介入：

- 一方面，是这个内部对象，即同某个人的幻想关系中的对象；原则上，这个人就是在场者，因为在分析情境中参与进来的并没有别人；

- 另一方面，是其中一位作者提出、并在这里得到所有其他作者追随的概念，即主体强加给对象的“神经症性距离”；这个概念所指的恰恰就是这种分析情境。

在某一时刻，幻想对象、内部对象最终被还原为主体同分析家之间的实在距离——至少在这个悬置的位置上，以及就主体如此体验它而言——；主体也就在这一还原得以实现的程度上，把分析家实现为一种“实在的在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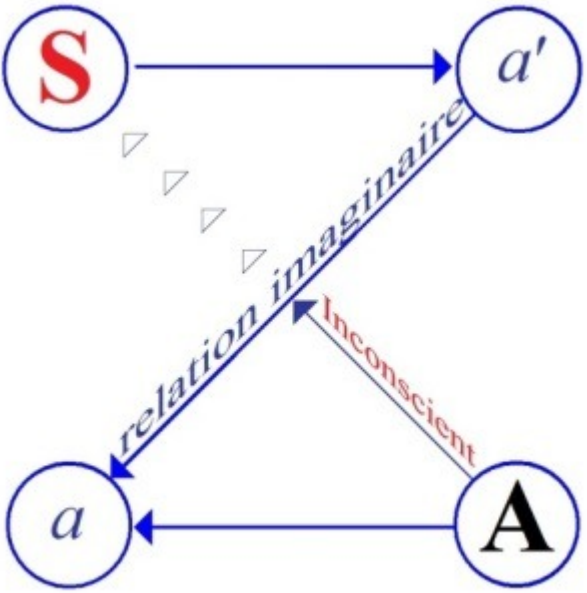
这些作者在这里走得非常远。我已经多次提到，其中一位作者——诚然，那时他的职业生涯尚处于申请资格的阶段——曾把分析的一个关键转折点说成这样一个时刻：他的受分析者终于能够闻到他；这并不是隐喻，不是说对方能在心理意义上感受到他，而是说对方嗅到了他的气味。

我必须说，把这种远距离嗅闻关系推到前景、让它浮现出来，乃是关于分析关系的这类构想在数学意义上的后果之一。在一个受到抑制的位置中，人们认为必须逐渐实现某种距离，而且正是这个被设想为在分析家面前发挥作用、当下在场且实在的距离；那么，在这个实在而仅仅受到抑制的位置里，最直接的关系方式之一，当然就必定是远距离嗅闻所提供的这种隔空把握方式。我并不是随手举个例子；这件事

已被反复提到，而且在这个圈子里，人们似乎越来越倾向于赋予这类把握方式以枢纽地位。

因此，分析位置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境内部得到设想的：两个真实人物处在同一个围合空间里，由一道约定俗成的屏障彼此隔开，并且应当有某种东西在其中实现。我这里说的是对事情的理论表述；稍后我们会看到，它在实践后果上会把人引向何处。

显然，如此越界的构想不可能被推到它的最终后果。另一方面，同样显然的是，如果我教给你们的东西是真的，那么这个情境实际上甚至根本不是他们所说的那样；当然，仅仅把它设想成那样，并不足以让它真的成为那样。人们会由于自己设想它的方式而把它引上歧途，但它实际上仍然是我试图用这个图式向你们表达的东西：



在这个图式中，象征关系与想象关系相互介入、彼此交叉，其中一方仿佛充当另一方的滤器。显然，即便人们误认了这一情境，它也不会因此就真的成为他们所设想的那样；于是，它本身终将显露这种构想的不足。反过来，这种构想的不足也可能影响整个情境最终得到妥善引导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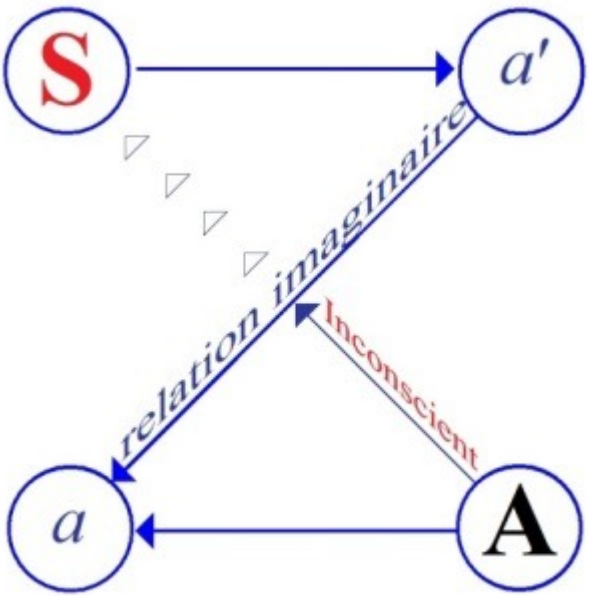
今天我要在你们面前着重提出一个具体例子，向你们展示这种构想实际上会导向什么。眼下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情境被设想成一种实在情境，一种把想象界向实在界加以还原的情境。在这项还原操作内部，会发生若干现象；借助这些现象，人们可以定位主体在哪些阶段仍然或多或少地黏附、固着于这种想象关系，并穷尽各种位置。正如已经显示出来的，这些位置本质上是想象性的；前生殖期关系越来越被置于首位，成为分析中所探索内容的核心。

这种构想有一个确凿的特征：唯一完全没有得到阐明的东西——而这绝非小事，因为一切都在这里——可以这样说：人们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情境中要说话。当然，不知道并不意味着可以不要说话；只是对于语言与言语在这个位置上所具有的严格意义上的功能，什么也没有说。

而且，我们将会看到一种非常特殊的价值被赋予……这一点同样可以在那些作者和所引文本中找到，而且标示得极其精确……只有冲动性的言语化，只有朝分析家发出的诸如“您为什么不回答我？”这样的喊叫，最终才被当作有价值的东西，因为这里涉及的是冲动性的话语；指出一种言语化，唯有在它具有冲动性、唯有在它是运动性表现的限度内才有意义。

在这项可以说是调节内部对象距离的操作中，全部技术仿佛都要服从于它；那么，我们最终会抵达哪里？我们的图式让我们能够怎样设想其中可能发生的事？这条关系［a'→ a］涉及想象关系：主体——作为一个或多或少不协调、分解开来、向碎裂敞开的主体——同一个统一化意象之间的关系；这个意象就是小他者的意象，也就是一个自恋性意象。

想象关系［a'→ a］从根本上正是沿着这条线建立起来的。



同样，严格意义上的全部移情关系都建立在这条线［A → S］上——它眼下还不能算是一条线，因为必须先把它建立起来——，而同大他者的关系也在这条线上发生。这个大他者并不只是在那里的人；从字面

上说，它是言语的场所：在言说关系中，已经结构化了这个彼岸，这个甚至超出你在想象中把握到的那个他者的彼岸大他者，这个被预设的大他者就是作为主体本身的主体。你的言语正是在它之中构成，因为它作为言语不仅可以受到接纳和感知，还可以得到回应。想象界在其中恰恰发挥着滤器、乃至障碍的作用。当然，在每一种神经症中，主体都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套调节方式：

- 对于某种东西而言，这套调节实际上用来调节他同意象的关系；
- 对于另一种东西而言，它又让主体既能听见、又听不见在言语场所中应当听见的东西。

我们只需再说下面这些：

- 如果我们的全部努力和全部兴趣，只落在这里［$a' \to a$］，落在这个相对于言语之降临［$A \to S$］而言的横向位置上；
- 如果人们彻底误认了想象性张力［$a' \to a$］同必须实现、必须显露的无意识象征关系［$A \to S$］之间的联系——全部分析学说恰恰都潜在于这里，因为有某种东西必须让主体既作为历史、也作为供认而完成和实现自身；
- 如果我们抛弃了这样一个观念：想象关系的功能必须相对于那种构成神经症的、象征性降临之不可能来把握；如果我们不再持续以大他者为参照来思考这两者……那么，原则上可以期待有话可说的东西，恰恰就成了这些作者、这些构想的拥护者所谓的客体关系；而这种同对象的距离，也恰恰被朝某个特定目的加以调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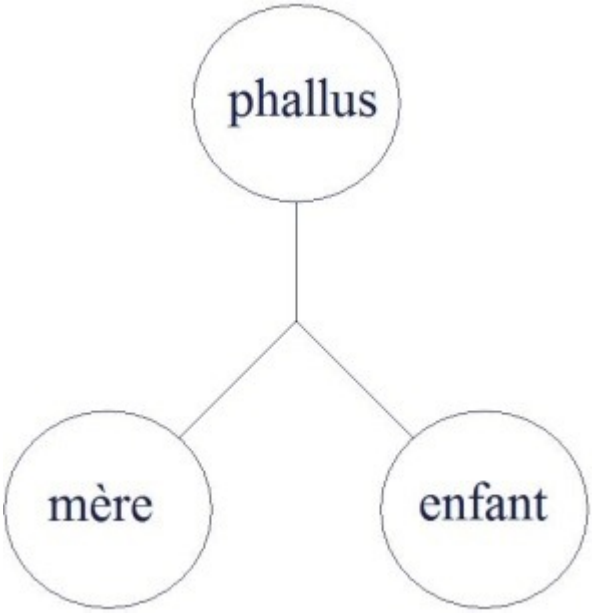
如果我们只对这种关系感兴趣，以便仿佛将它消灭；如果仅仅关注它竟然真能让我们抵达某种结果——倘若这是可能的——，那么只消知道，我们已经见识过这种结果：已经有一些经历过这种把握方式和考验的主体来到我们手中。

有一件事绝对确定：至少在一定数量的病例中，尤其在强迫神经症病例中，如果把分析情境的全部发展，都放在不断缩减那个著名“距离”的追求之中——据说这个距离是强迫神经症里客体关系的特征——，我们得到的便是所谓悖论性的倒错反应。

例如，会突然爆发出一种完全异乎寻常的现象；在这种技术方式被推到前景之前，分析文献中几乎不曾出现过它：

主体会骤然依恋上一个同性对象，而这个对象在他的关系中又显得完全悖谬，甚至像某种人工制品留在那里，像一个意象凝胶化之后形成的东西；它围绕主体触手可及的那些对象结晶、沉淀下来，并可能在一段时间内维持相当持久的存在。如果我们从母亲—孩子—阳具这一想象三元组的关系出发来看，这就并不令人惊讶。

相关知识卡 **母亲—孩子—阳具三角**



上一次，我把问题推进到这样一个位置，你们已经看到一条研究路线开始显露出来。诚然，我们当时还只停留在象征关系投入运作的前奏；象征关系要到第四项功能——即父亲的功能——出现时才会真正展开，而父亲功能则由俄狄浦斯维度引入。

我们这里处在一个本身属于前俄狄浦斯期的三角形中——我强调这一点——，只是出于抽象才把它单独隔离出来。它的发展之所以令我们感兴趣，只是因为此后随着父亲功能投入运作，它会重新纳入一个四元组。起点在于孩子遭遇这样一种根本性的失望：他不仅认识到自己不是母亲唯一的对象——至于他如何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仍把问题悬置着——，还察觉到母亲可能感兴趣的对象——其突出程度视不同病例而异——乃是阳具。

相关知识卡 母亲—孩子—阳具三角

这是认识母亲—孩子关系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其次，孩子察觉到母亲恰恰也被剥夺了这个对象，她自己也缺少它；这就是我们上一次抵达的地方。我曾借一个幼女身上暂时性的恐怖症病例向你们展示这一点。这个病例让我们能够以格外有利的方式加以研究，因为在双重失望之后，我们所能看见的正是俄狄浦斯关系的边界：

- 想象性的失望：孩子自己辨认出她所缺少的阳具；
- 随后，在第二个时刻，她又察觉到：母亲，这个处于象征界与实在界边界上的母亲，

也同样缺少阳具。

相关知识卡 母亲—孩子—阳具三角

为了支撑这种不可支撑的关系，孩子唤出了那个作为狗的幻想性存在；这个存在仿佛突然绽现出来，并作为严格意义上应为整个情境负责的那一个介入：它会咬人，会阉割；借助它，整个情境才变得可以思考，至少在一个暂时的时期内变得在象征上可以承受。

相关知识卡 母亲—孩子—阳具三角

那么，当这三个想象对象所组成的套组在这里断裂时，会发生什么？又有哪些位置成为可能？可能的解法不止一种；无论情境正常还是异常，总会有某种解法受到召唤。

在正常的俄狄浦斯情境中，会发生什么？

通过某种由认同标点其间的竞争，通过主体同父亲的关系所经历的交替，会有某种东西得以建立；于是，主体会——依他自己处在女孩还

是男孩的位置而各有不同——被授予某种东西。可以说，在男孩那里这一点极其清楚：他在特定界限内被授予这种阳具权能，而这些界限恰恰把他引入象征关系。

某种意义上，我前几天曾对你们说：对母亲而言，作为实在存在的孩子被当作她对象之缺的象征，也被当作她对阳具的想象性欲求。这个情境的正常出路，恰恰可以被设想为在孩子的层面实现了这样一件事：孩子在象征上领受了自己所需要的这个阳具；但为了让他对它产生需要，他必须先受到阉割性权威的威胁，而这一权威原初地、本质上就是父亲的权威。孩子在象征层面上订立某种契约，获得对阳具的权利；构成规范性俄狄浦斯关系基础的男性认同，正是在这里建立起来。

不过，我先在这里作一个附带的说明。这件事产生了什么结果？在弗洛伊德最初执笔区分下列两者时，他的表述中有一种颇为奇特、甚至悖论性的东西：

- 依托型关系；

相关知识卡 依附型对象选择与 anaclitic

- 自恋型关系。

在俄狄浦斯情结中，这种力比多关系……弗洛伊德告诉我们，青春期有两种爱的对象：

- 依托型爱的对象，它带有对母亲的原初依赖留下的印记；

相关知识卡 依附型对象选择与 anaclitic

- 自恋型爱的对象，它以主体自身的意象为模型，是主体自身的意象，即自恋性意象。我们在这里试图阐发的正是这个意象，并且已经揭示了它在同他者的镜像关系中的根源。

“依托型”（anaclitique）这个词——尽管我们是从弗洛伊德那里继承来的——其实造得很糟，因为在希腊语里，它根本没有弗洛伊德赋予它的意义；这一意义由德语词 Anlehnung 表示，也就是一种倚靠着的关系。这当然又会引起各种误解，有些人甚至把这种倚靠一直推成了某种最终近似防御反应的东西。不过，我们先把这一点搁在一旁。事实上，只要阅读弗洛伊德，就能清楚看到这里涉及的是对支撑的需要，而且这种东西确实很容易向一种依赖关系敞开。

相关知识卡 依附型对象选择与 anaclitic

如果继续深入，就会发现弗洛伊德在对立地表述

这两种关系模式——依托型与自恋型——时存在一些奇特的矛盾。非常奇怪的是，在谈依托型关系时，他更多说的是一种被爱的需要，而不是去爱的需要。反过来，又极具悖论性的是，自恋者突然以一种令我们惊讶的面貌出现；因为，事实上，弗洛伊德无疑是被自恋者那种极其特殊的行为所固有的主动成分吸引了：他之所以显得主动，恰恰是因为他总会在

某种程度上误认

他者。

弗洛伊德为自恋者披上了去爱之需要的外衣，把这种需要归作他的属性；悖论性的是，这便突然使他成了我们用另一套词汇所谓“奉献型”倾向的天然场所，不能不令人困惑。我认为，我们还必须回到这一点上来；不过，这些悖论性的视角又一次起源于对主体内部诸要素所处位置的误认，并同时从那里取得自己的理由。

所谓依托型关系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即它在成人身上的持续存在，总被设想成一种纯粹而简单的残存，一种所谓婴儿位置的延续。

如果主体确实处在这个位置……弗洛伊德在另一篇论力比多类型的文章中干脆称之为情色型位置，这清楚表明它实际上是最为敞开的位置……那么，人们之所以误认它的本质，恰恰是因为没有看见：主体在象征关系中获得了阳具，看到自己被赋予作为阳具本身的阳具，把它当作属于自己、可以说能够正当地行使之物；由此，他面对那个继母亲对象之后出现的对象——即那个被重新找到、带有同原初母亲关系之印记的对象；从弗洛伊德一开始的论述来看，在正常的俄狄浦斯位置中，它原则上始终是男性主体的对象——便成了女人所欲求的那个对象的承载者。

这个位置之所以成为依托型位置，是因为从此主体成了阳具的主人、代表和保管者；正因为女人依赖于他，这个位置才是依托型的。依赖关系的建立，是因为主体认同于他者、认同于作为对象的伴侣，并因此成为这个伴侣不可或缺的人；满足她的是他，而且只能是他，因为原则上，只有他保管着那个作为母亲欲望对象的对象。

俄狄浦斯位置的完成，使主体相对于那个被重新找到、并将继原初母亲对象之后出现的对象，占据了一个我们从特定视角可以称为最优的位置；

相对于这个对象，他自己将成为那个不可或缺的对象；而且，正因为知道自己不可或缺，属于这一力比多侧面的那些主体，其情色生活便有一部分

完全取决于一种已经历并已承担的他者需要：母性女人需要在他身上找到自己的对象，也就是阳具对象。

这就是依托型关系与自恋型关系相对立时的本质所在。

这不过是一段插话，旨在表明始终让这种关系辩证法投入运作有何用处。这里涉及最初的三个对象；此刻，第四项——父亲——仍然被定位在它们周围，只不过已有一个把它们全部包容、并把它们系在象征关系之中的一般概念。父亲在这里引入象征关系，引入一种可能性：让挫折关系或对象之缺超越自身，进入完全不同的阉割关系。也就是说，他把这种对象之缺引入一种辩证法，

引入某种既取又予、加以设立、赋予权能的东西；它把一项禁令、一条法则，尤其是乱伦禁令的契约维度赋予这整个辩证过程。

回到我们的主题：如果想象关系成了全部依托型关系的规则和尺度，会发生什么？

结果恰恰是这样：孩子同母亲相对于第三个对象——阳具对象——的关系，由于某种发展的缘故、由于历史事件的影响，可能陷入不协

调、不联结，原有纽带也可能遭到破坏；而这个阳具对象既是女人所缺少的东西，也是孩子发现母亲所缺少的东西。就在这种时候，还会有另一些方式可以重新建立这种连贯性。

这些方式是想象性的方式，是一些非典型的想象性方式。例如，孩子认同于母亲：他相对于母亲的伴侣发生一次想象性的移位，取代母亲作出选择，并为她承担起指向阳具对象本身的这个缺失。我在这里给你们的图式，正是恋物癖倒错的图式。如果你们愿意，这是一种解法的例子；但还有一条更直接的道路。

换言之，还存在另一些通达这种对象之缺的解法。这种缺失已经在想象层面上构成人的实现道路，也就是人同自身存在的关系：他的存在可以受到质疑；这已经使他不同于动物，也不同于在想象层面上可能出现的一切动物关系。换言之，这种实现处在某些受到标点、可以说超出历史的条件中，而倒错的极盛时刻总是以这种方式呈现。

倒错有这样一个特性：它实现了某种通达他者意象彼岸的方式，而这个彼岸正是人的维度的特征。不过，它只在一个时刻里实现这一点，就像倒错的极盛总会产生的那些时刻一样；这些时刻在主体的历史内部，仿佛是切分出来的切分音时刻。

各种因素汇聚或攀升到一个时刻；这个时刻也许非常意味深长地被称作诉诸行动。在这次诉诸行动期间，会实现某种东西：

- 它是一种融合；
- 它是对这个彼岸的通达；
- 严格来说，它就是弗洛伊德依托型理论如此表述、并教我们称作爱欲的那个跨个体维度：两个个体结合起来，各自被从自身之中拔出，并在一个或长或短、脆弱、短暂、甚至只是潜在的瞬间构成这个统一体。这个统一体会在倒错的某些时刻实现；而倒错之所以构成倒错，恰恰在于它永远只能在这些没有得到象征性秩序编排的时刻里实现。

主体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对象，而且是自己的专属对象；他自己也这样说：这个对象越是专属、越是没有生命，它就越能完美地令他满足——至少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放心，不必怕它令自己失望。当主体爱上一只拖鞋时，可以说，他才真正把自己的欲望对象置于触手可及之处；这样更可靠。这个对象本身不具备任何主体性、主体间性、甚至跨主体性的属性。从实现缺失本身这一条件来说，恋物癖的解法无疑是这个视角下最容易设想的条件之一，而且它确实实现了。

我们也知道，想象关系的特性就是永远完全互反，因为它是一种镜像关系；所以我们应当预料到，在恋物癖者身上会不时出现这样一个位置：他不是认同于母亲，而是认同于对象。在对恋物癖者的分析过程中，我们确实会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因为这个位置本身始终是最不能令人满足的。

曾经作为母亲对象的那个对象，其令人目眩的照亮即使在短暂一瞬间满足了主体，也不足以让一种完整的情色平衡围绕它建立起来。事实上，如果主体此刻认同于对象，那么可以说，他便会失去自己的原初对象——即母亲——，并把自己看作母亲眼中的毁灭性对象。这种永恒的游戏、这种深层的复视，标记着对恋物癖表现的全部把握；稍后我们还会进入其中。

这一点如此清晰、如此明显，以至于像菲莉丝·格里纳克这样认真深入研究恋物癖关系基础的人，也告诉我们：这仿佛是一个主体在两面相对的镜子里，以过快的速度向你展示自己的意象。她就这样脱口而出，当时自己也不太知道原因；这句话在那里显得突兀得像汤里的头发，但她突然感觉事情就是如此。主体从来不在自己所在的位置，理由很简单：他已经离开了自己的位置，进入母亲同阳具之间的镜像关系；他交替成为其中一方和另一方。这个位置只有在主体抓住某种独一无二、具有特权而又同时并不恒久的象征时，才得以稳定下来；它就是恋物癖那个确切的对象，也就是象征阳具的某种东西。

因此，如果我们把依托型关系完全置于客体关系的中心，只让想象界与实在界介入，并以所谓"分析家的在场"这一实在为准绳，来调节想象关系的全部适应，那么，面对这种处理依托型关系的方式，其至少暂时性的结果，就必定会在类似关系的层面上显现——至少我们可以把这些关系设想为本质上具有倒错性质。

我在《罗马报告》的某处提到过这种客体关系方式，把它比作一项被推到心理考验极限的 bundling［同床禁触习俗］。这段短文可能没有引起注意，不过我在一条注释中为读者作了说明，指出 bundling 是一种非常明确的东西，涉及某些至今仍存在于文化孤岛中的古老习俗。

不过，我们已经能在司汤达那里看到它；他把这件事讲成异想天开的瑞士人

或德国南部人的一种地方特性，而那些不同地点从地理角度看并非无关紧要。

所谓 bundling，准确说来，就是在男女关系中设想出一套爱的技术、一种关系模式：在特定条件下，人们允许一个以特殊身份接近

某个群体的外来伴侣，同这家里的某个人——通常是女儿——共睡一张床；这段关系本质上以款待关系为基础，但附带一个条件：双方不会发生接触。Bundling 一词正由此而来。在这类习俗中，女孩通常会被包裹在

一张床单里，于是，接近对方的一切条件都已具备，唯独最后一步被排除在外。

这可能只是被当作一种令人愉快的风俗奇想；我们甚至也许会遗憾自己无缘参与，因为它看起来可能颇为有趣。然而，这件事值得留意，因为说到底，声称弗洛伊德去世十七八年后，分析情境竟以这种悖论性的方式得到构想和形式化，绝不是牵强附会。

这里有一份记录于 1933 或 1934 年的会谈报告，记下了女病人在会谈中的一切动作；这些动作之所以受到注意，是因为它们表现出她相对于身后分析家、在或近或远的距离上所呈现的或明显或隐约的趋近冲动。尽管这篇文章是在我写完报告之后才发表的，这里仍然有某种颇为醒目的东西；它证明我丝毫没有勉强事实：在某一种构想中，分析实践确实被还原成了这个目标和这些心理后果。

我要向你们指出：如果我们在某些文化孤岛的风俗习惯中发现了这些悖论，那么，有一个已得到相当深入研究的基督新教教派[注1]，也保存着这种东西。这个教派源自荷兰，并且

> [注1] 阿蒙·门罗·奥朗德（Ammon Monroe Aurand）：《关于阿米什人与门诺派教徒的鲜为人知的事实：宾夕法尼亚朴素派群体社会风俗与习惯研究》（“Little Known Facts about the Amish and the Mennonites: A Study of the Social Customs and Habits of Pennsylvania's Plain People”）。

极其严格地在其关系中保留了同宗教统一性相联系的地方习俗；这就是阿米什教派。

当然，所有这些都属于某些未被理解的遗留物；但它们的象征性表述，却在一种可称为宗教性的、乃至象征性的完整传统中，得到充分协调、审慎筹划和组织。

我们对宫廷爱情实践及其在中世纪所处整个领域的全部了解，显然都包含这样一种对爱的接近方式进行严格技术化阐发的工作。它要求主体在爱慕对象面前经历漫长的抑制阶段，目的的确是实现人们在爱情中追寻的那个彼岸，即严格意义上的情色彼岸。一旦掌握了理解这些技术、这些传统的钥匙，我们也会在其他文化区域中发现它们以充分成形的方式涌现出来。

在人类历史中，这是一种曾多次被完全有意识地提出的、关于爱的实现的探索秩序。

至于其中得到编排、实际达成的东西，我们在这里不必质疑。它是否旨在尝试超出某种生理性的短路——如果可以这样说——，同样并无疑问，而且确实有其意义。我之所以在这里引入它，是因为有某个参

照点让我们既能准确定位这个隐喻，也能在不同层次上——亦即以或多或少自觉的方式——整合人们对想象关系本身的运用……这种关系本身或许就是经过审慎筹划而使用的……还可以说，是对某些实践的运用。在天真的人看来，这些可能是倒错实践；实际上，它们并不比一套在特定风俗和所谓模式领域内规范爱的接近方式的做法更加倒错。要知道我们身处何处，这一点值得标记为参照。

现在，我们来看上次所引那份杂志中展开的一个病例；这份杂志刊载了某个群体成员围绕客体关系提出的真诚问题。这里，一位已在分析共同体中取得位置的人，记录了她恰当地称作恐怖症主体的病例[注2]。这位恐怖症主体的活动已大幅缩减，几乎到了完全无所作为的地步。他最明显的症状，是害怕自己太高大；他总以一种身体极度前倾的姿态出现，

> [注2] 吕特·勒博维西（Ruth Lebovici）：《精神分析治疗过程中一过性性倒错》（“Perversion sexuelle transitoire au cours d’un traitement psychanalytique”），载比利时精神分析家协会《活动通报》第 25 号，1956 年。

他同职业环境的关系几乎全都变得不可能；他退缩在家庭环境的庇护下，过着极为局限的生活。不过，他并非没有情妇——这个情妇是他母亲替他找来的——，而且她比他年长。

正是在这一星丛中，那位女分析家接手了他，开始同他处理这个问题。对主体的诊断相当细致；尽管存在一个悖论——致恐怖对象乍看之下似乎并非外部对象——，把他诊断为恐怖症并不困难。不过，这个对象确实是外部的，因为在某一时刻，我们看到一个重复梦出现，而它正是焦虑外化后的范型。

在这个特殊病例中，对象要到第二次接近时才被发现；它恰恰就是我们完全能够辨认的恐怖症对象本身，是父亲意象的替代物，而父亲意象在这个病例中严重缺失。它是一个身披铠甲的男人意象；此外，这个男人还配有一种格外具有攻击性的工具——一管 Fly-Tox 杀虫剂——，用来消灭所有那些小小的恐怖症对象，也就是昆虫。这个场景在这里得到了绝妙的呈现。

主体显露出来的恐惧，正是害怕在黑暗中被这个铠甲男人追捕并闷死；这份恐惧在整个恐怖症结构的平衡中绝非无足轻重。经过一段时间，这个意象终于浮现。负责这位主体的女分析家，为这份病例观察取名为《精神分析治疗中一次倒错反应或一种倒错的出现》。所以，我把倒错反应——一过性性倒错——的问题引入这里，并不是勉强事实，因为作者自己就强调观察的意义正在此处。事实上，作者并不安心；她不仅不安心，而且清楚察觉到，她称作倒错的反应——当然这只是一个标签——是在特定情形中出现的。

无论如何，作者围绕这个时刻提出问题，证明她意识到问题就在这里：当她终于看到致恐怖对象——那个铠甲男人——显露出来时，却把它解释成阳具母亲。可它明明是一个具有全部纹章特征的铠甲男人，为什么会是阳具母亲？为什么是阳具母亲？

在整份病例观察中，作者把自己提出的问题记录下来；我认为，这些记录无可置疑地忠实，而且无论如何都得到了相当清楚的强调。

作者问自己：我在这里所作的解释是不是错了？因为紧接着就出现了这个倒错反应，随后我们更被卷入一段足足三年的时期；在此期间，主体分几个阶段展开了一套倒错幻想。他最初想象自己：

- 小便时被一个女人看见；这个女人因此极度兴奋，随即前来要求同他发生性爱关系；
- 随后，这个位置发生倒转：作为主体的他，一边手淫或不手淫，一边观察一个正在小便的女人；
- 到第三个阶段，这个位置被实际付诸实现：他在一家电影院里发现了一个小隔间；它仿佛天赐一般开有小窗，于是，当他自己待在这个小间里时，确实可以观察隔壁卫生间里的女人。

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某种东西最初以幻想结晶的形态沉淀出来，而作者自己也在追问，某种解释方式对于这次沉淀究竟具有怎样的决定性作用；

这个结晶显然来自主体自身的某些组成成分，但它涉及的不是阳具母亲，而是母亲同阳具的关系。

不过，至于为什么这件事中会出现一个阳具母亲，作者自己为我们提供了钥匙。她曾在某一时刻反思治疗的总体引导方式，并且注意到：说到底，她自己施加的禁令、她扮演禁止者的程度，远远超过母亲以往所做的一切。所有事实都表明，阳具母亲这个实体之所以在这里被生产出来，是由于作者自己所谓的反移情位置。

只要仔细跟随这场分析，就根本不会对此有所怀疑；因为，当这种想象关系正在展开时——当然，它之所以得到展开，完全是因为分析中的那个失足——，我们看到：

1）分析家针对一个梦作出介入。梦中，主体面对一个来自自己过去经历的人；

他声称自己对这个人有爱的冲动，却又声称另一个同样在其经历中扮演过角色的女性主体在场，阻止了他。这个女人在他童年一个相当晚的阶段——也就是十三岁以后——曾当着他的面小便，被他看到。

分析家作出如下介入：

> “毫无疑问，比起努力去追求另一个可能令您心动、却已经结婚的女人，您更喜欢通过观看一个女人小便来对她感兴趣。”

分析家以为自己通过这次介入重新引入了真相，不过方式多少有些强迫，因为梦中的男性人物只通过联想得到提示，即所谓母亲的丈夫。这个丈夫前来重新引入俄狄浦斯情结，其介入方式带有挑衅的全部特征；尤其当我们知道，正是分析家的丈夫把主体介绍给她时，更是如此。就在这个时刻，事情出现了一个转折；也正是在这里，

观察幻想逐渐发生倒转，从被人观察转向自己观察别人。

2）仿佛这样还不够，主体请求放慢会谈频率时，分析家回答他：

“您在这里表现出自己的被动位置，因为您非常清楚，无论如何，您都不会得到它。”

就在这时，幻想彻底结晶；这证明其中还有更多东西。主体对自己无法抵达女性对象的关系已经理解了不少，最终却开始

在治疗本身内部展开自己的幻想：害怕在长榻上小便，等等。他开始出现一些反应，表明同实在对象的距离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他开始窥视分析家的双腿，而分析家也带着某种满意把这件事记录下来。这里确实有某种东西来到了实在情境的边缘，来到母亲被构成为并非阳具母亲、而是无阳具母亲的边缘。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真正构成了恋物癖位置确立的原则，那正是主体在自己的探究中停在特定层次，只把女人当作有或没有那个受到质疑的器官来观察。因此，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是这样一个位置：它逐渐把主体引向一句话——“天哪，除非我同我的分析家上床，否则就没有解法。”他确实说了这句话。

这时，分析家开始觉得这件事有点令她心烦，于是作出下面这句评论；后来她又焦虑地反问自己：“我说这话说得对吗？”

“您现在是在拿某种自己非常清楚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吓唬自己取乐。”她对他说。

任何人都可以追问，这类介入包含了何种程度的掌控；它相当生硬地提醒了分析情境的约定。这完全符合一种把分析位置设想成实在位置的观念。于是，事情就这样被重新摆正了。

恰恰在这次介入之后，主体才最终诉诸行动，并在实在界中找到了那个完美的、获选的地点：香榭丽舍大街上的一处小便池布局。在那里，他同自己的观察对象隔着一堵墙，终于真正处于正确的实在距

离；这一次，他确实能够观察那个对象，并且不是把她当作阳具母亲，而恰恰是当作无阳具母亲。他在这里把自己的全部情色活动悬置了一段时间，而这种活动令他满足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他声称，在发现这个地点以前，自己一直像自动机一样活着；但现在，一切都改变了。事情就到了这里。

我只是想让你们切实看到：对象距离的概念、把分析家当作实在对象的观念，以及所谓参照概念，确实不可能毫无作用；不过，说到底，它们造成的也许并不是最值得期待的作用。我不会告诉你们这场治疗如何结束；每个细节都富有教益，必须逐一细查。最后一次会谈被略去了；主体还接受了某处静脉曲张的手术——一切元素都齐了——，甚至连他对阉割的谨慎试探，以及可能由此产生的某种自由，也得到了提示。

此后，人们认为这已经足够。主体回到了自己的情妇身边，还是开头那个比他年长十五岁的女人；由于他不再谈论自己的高大身材，人们便认定恐怖症已经治愈。不幸的是，从这时起，他心里只剩下一件事：自己的鞋码。鞋子有时太大，使他失去平衡；有时又太小，把脚挤得生疼。这样，恐怖症的转弯和转化就完成了。

归根结底，为什么不把这看作分析工作的终点呢？无论如何，从实验角度看，这里确实有某种并非毫无意义的东西。

当然，所谓顺利通达实在对象的顶峰，被表现得几乎像某种相认的暗号——这是内行人之间的话——：主体在分析家面前闻到尿味的那个时刻，被视为同实在对象的距离终于……整份病例观察始终告诉我

们，全部神经症关系恰恰在这一点上出了问题……变得准确的时刻；当然，这个时刻同时也是倒错的顶点和极盛。

当我说“倒错”时，你们务必明白——作者自己也没有向自己隐瞒这一点——，严格来说，不应把它看作一种倒错，而更应看作一种人工制品。这些东西即使可能长久存在、极为持久，也终究是人工制品，可能断裂，有时还会相当突然地瓦解。

过了一段时间，主体被一名女引座员撞见。仅仅这次被撞见，就让他在一夜之间停止光顾那个格外适宜、由实在界适时提供给他的地点：当人们终于沿着正确道路得到调节、处于恰当距离时，实在界总会适时提供一切所需之物。

第6课 · 1957年1月9日

今天，我们要跃入一个问题。假如我们按部就班地推进，正常来说，这个问题要到论述前进得更远以后才会遇见；它就是从分析视角看最成问题的那种倒错，即女性同性恋。我为什么要这样安排？我会说，这里面有一部分是偶然性使然。

毫无疑问，今年考察客体关系时，我们不可能不遇到女性对象。你们知道，问题倒不十分在于我们如何在分析中遇见女性对象……当这场相遇的主体并不是自然生成时，分析已经提供了足够多的材料来教导我们。我在上季度研讨班的前半部分已充分向你们表明：女性主体总是在这场相遇中被召向某种重新找到；它从一开始就把她置于同男人的关系中，置于自然关系与象征关系的歧义里，而我试图向你们展示的正是分析维度全部位于其中……真正的问题无疑是：女性对象对这件事怎么看；而女性对象对它的看法，甚至比男性主体接近她的方式更不自然。所谓女性对象对它的看法，就是：从最初接近欲望的自然且原初的对象——母亲的乳房——开始，她走过怎样的道路？女性对象如何进入这一辩证法？

我今天称她为对象，并不是毫无理由。显然，这个对象必定会在某一时刻开始发挥功能；只是，她采取的这个对象位置极不自然，因为它是一个二阶位置，而它之所以值得被如此命名，只因为这个位置是由一个主体采取的。

在整个分析领域里，女性同性恋具有格外典范性的价值，因为它揭示了若干阶段、行进道路，以及这一行进中的停顿；在同某种起初是自

然、生物性的关系中，这些停顿可能标记女人的命运，但这种关系又始终落在象征层面，落在主体承担自身的位置上，而主体本身已经被卷入象征链条。

这里所涉及的正是女人。分析经验教给我们：她必须作出一种选择，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个选择都必须是有待抵达之物与未能抵达之物之间的某种妥协。正因为如此，每当讨论女人在其象征性完成中必须走过的阶段时，都会遇到女性同性恋。

这段插入的讨论应当让我们彻底处理若干文本。就弗洛伊德而言，这组文本从 1923 年开始；你们可以把这一年记作《婴儿期的生殖器组织》[注1]一文的发表年份。在那里，他把阳具性承担的优先地位确立为一项原则：在儿童性欲阶段结束时，男孩和女孩都会经历一个典型阶段。

> [注1]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婴儿期的生殖器组织》（“Die infantile Genitalorganisation”），1923 年；法译见《性生活》法文版，第 113 页。

两性都会抵达生殖器组织，但其类型把拥有或不拥有阳具变成首要的区分要素；在这个层面上，两性的生殖器组织正是通过它彼此对立。弗洛伊德告诉我们，此时实现的并不是雄性与雌性，而是：

- 一方具有阳具属性；
- 另一方不具有这一属性，并因此被视作等同于已遭阉割。

为了准确说明他的思想，我再补充一点：这种组织是儿童性欲第一阶段中一个本质而最终的阶段公式；第一阶段在进入潜伏期时结束。所谓准确说明，就是：对两性而言，这一点都建立在一手错牌上，而这

手错牌又建立在无知上。这里涉及的不是误认，而是对男性精液之受精作用的无知，以及另一方面对女性器官本身之存在的无知。这些断言极其惊人，需要经过诠释才可能得到理解，因为我们不可能把这里的东西置于真实经验的层面来接受。

我的意思是——正如那些在弗洛伊德作出这项断言之后投入争论的作者所提出的，尽管他们极为混乱——，大量事实都表明：在若干切身经验的层面上，种种现象都容许男性在生殖行为中的作用显露出来；即便不是这一作用，至少女性器官的存在也会显露，尤其对女人自己而言如此。

小女孩的早期经验中存在着同阴道定位相对应的某种东西；她会产生感受，甚至可能有早期阴道手淫——我认为，至少在一定数量的病例中，这一点作为实际发生过的事几乎无法否认。由此，人们开始追问：阳具期之所以占据优势，是否确实应归因于阴蒂的存在？是否如人们所说，力比多——我们暂且把这个词当作全部性感经验的同义词——起初原初而排他地集中在阴蒂上？而随后是否必须通过一次漫长、艰难、需要迂回很久的移置？

我认为，弗洛伊德的断言肯定不能用这些说法来理解。此外，大量仍然混乱的事实，也让人可以从各方面提出异议。我这里只提其中一项：某些现实主义前提把各种

误认都理解为预设无意识对两性契合已有某种知识；如果我们接受这些前提所要求的构想，就必须承认：女孩身上之所以会让一个本身并不真正属于她的器官取得优势，只可能以某种否认阴道存在的背景为条件，而这件事必须得到说明。

人们正是从这些被当作先验的假设出发，竭力为女孩那里这个“阳具”项追溯一条发生史。我们会进入女孩的细节，并看到这样一种由若干前提借来的必要性，其中一部分前提也由弗洛伊德本人表达出来。这个构造所诉诸的最终事实本身并不确定——支撑它的那些有关“阴道器官原初经验”的事实，表述得非常谨慎，甚至有所保留——，由此清楚可见，它无非是理论前提所要求的一种重构；而这些前提恰恰源自一条误解弗洛伊德断言的歧路。弗洛伊德的断言以他的经验为基础，他提出时也很谨慎，甚至带着一种极具其

发现呈现方式之特色的不确定成分；但尽管如此，它仍被断言为原初的，甚至必须被当作一个固定点、一个理论解释应当围绕其展开的枢纽。

我们将试着从这个关于阳具主义项的悖论性断言出发来做这件事：一端是弗洛伊德在其著作特定时点作出的这些断言，另一端则是八年后的 1931 年，他

在论女性性欲时写下的更加惊人的东西[注2]。

> [注2] 西格蒙德 · 弗洛伊德：《论女性性欲》（“Über die weibliche Sexualität”），1931 年；法译见《性生活》法文版，第 139 页。

在这段间隔中，爆发了一场极为活跃的讨论，各种推测大量涌现；而且，这一事实也由［……］以及琼斯转述。这里有一整套通过逐步逼近而取得的真正进展；假期里，我不得不投身其中。我会说，要在不歪曲它的情况下加以说明，显得格外困难，因为它最突出的特征无疑就在于无法得到掌控。

我们必须彻底处理投入运作的这些范畴所具有的深度不可掌控性。然而，要把它说清、让人听懂，就不可能不用某种方式掌控它；而掌控它，就已经彻底改变了它的轴线和性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无法真正给出问题的恰当透视。因为这种不可掌控性对于整个问题确实是本质性的，并且真正关联着

我们今年理论考察的第二个目标：向我们表明，分析实践本身怎样同时而又不可逆转地进入一种无法控制的偏离。

我要说，再一次回到我在全部事实堆积中向你们讲解的这个确切切入点，今天早晨我觉得，从这些文章之一随手摘出的一个小事实可以保留下来，作为典范性图像——这里涉及大家都承认的一件事。也就是说，小女孩在发展转折处进入俄狄浦斯情结时，恰恰会把从父亲那里得到一个孩子当作所缺阳具的替代物，开始产生这种欲望。其中一位作者还援引了一份儿童分析作为例子。

这个例子旨在表明：这里有某种东西能够作为当下的切入点，介入俄狄浦斯运动的骤然推进……也就是说，未能从父亲那里得到孩子的失望，会发挥本质作用，使小女孩从自己进入俄狄浦斯情结时所在的位置返回。她最初通过认同于父亲这条悖论性道路进入其中；而原则上所有作者都承认，她会通过被剥夺所欲求的父亲之孩子这条道路，重新采取女性位置……

人们又用一个病例来例示这个被说成始终本质上无意识的运动：分析让一个孩子把某个意象显露出来。这个小女孩正在接受分析，因而比其他孩子得到更多启发；经过对“她的无意识里正在发生什么”的一番说明之后，

她每天早晨一起床，就询问父亲的小宝宝是否已经来了，是今天来还是明天来。

她每天早晨都带着愤怒和泪水提出这个问题。

在我看来，这个例子再一次典范性地表明：关于客体关系，我们今年始终一面推进理论探索，一面追踪的那种分析实践的偏离究竟是怎样的；

因为在这里，我们切实看到：某种理解和处理挫折的方式，实际上如何把分析引向一种介入模式；它造成的效果不仅可能显得可疑，而且显然同所谓分析解释过程真正涉及的东西正好相反。

在发展的某一时刻，孩子显现为

一个想象对象，成为所缺阳具的替代物；阳具在小女孩的发展中发挥本质作用——我们对这一点的认识，按字面说，只有在如下限度内才有意义，才能被正当地投入运用：此后，

甚至在同一时期，孩子、这个主体必须同它打交道，进入一系列象征性回响的游戏。这些回响会牵动过去，把孩子在阳具状态中经历的东西投入运作，也就是在阳具危机时刻可能同他的占有性或毁灭性反应相关的一切，以及这一危机在它所对应的童年阶段中真正成问题的全部内容。

总之，同孩子发展某一阶段中阳具的这种优先地位或优势相关的一切，都是到“事后”才产生这些影响：它们会在某个时刻进入一种象征化事件的必要性之中。例如，同孩子关系密切的人在较晚时候生下另

一个孩子；又或者，主体实际面对拥有孩子的问题、面对自己成为母亲的问题。可是，如果并非在这类事件发生时才引入它，而是在它初次出现时就引入，那么，介入的就不是主体的象征结构化，而是一种想象替代关系——言语在此时把这种关系骤然推进象征层面，而孩子当时对它的体验完全不同。这样做，便等于预先赋予它一种组织的裁决，把它引入某种正当性之中；按字面说，这会为

挫折本身举行加冕礼，把它设立在经验中心；然而，只有当它确实发生在无意识层面时，才可以正当地作为挫折

被引入——正确的理论正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这种挫折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时刻；对我们分析家而言，它也只有在纯理论层面衔接既已发生之事时，才具有重要性和功能。主体对它的实现依定义就被排除，因为它极不稳定。它只有在通向另一个东西时才有意义，而另一个东西就是我向你们区分出的两个层面之一：剥夺或阉割。阉割无非就是：

- 在真正的秩序中确立这种挫折的必要性；
- 超越它，把它设立在一条赋予它不同价值的法则之中；
- 并由此确认剥夺的存在；因为在实在层面上，任何剥夺观念都只有对这样一种存在者才是可设想的：他会在象征层面衔接某种东西。唯有从那里出发，剥夺才可能被实际设想。

我们可以从某些支持性介入、心理治疗性介入中把握这一点。例如，我曾简要提到那个由安娜·弗洛伊德一名学生负责的小女孩；她在确

实被剥夺某种东西的经验之后显出恐怖症雏形，而这发生在不同于当天上午那个例子中的孩子被迫处于的情境之下。[注]　我已经向你们表明，推动恐怖症发生必要移置的真正动力根本不在这项经验本身，也不在于她没有阳具；而在于她的母亲无法把阳具给她，更进一步说，母亲无法给她，是因为母亲自己也没有。

> [注]　米勒编订本（Seuil，1994，第　100　页）明确作“当天上午例子中的那个孩子”；Staferla 转录漏掉了这一限定。

心理治疗师介入时告诉她所有女人都是这样——她这样说完全正确——，这可能让人以为这里发生了向实在的还原。但这并不是向实在的还原，因为孩子非常清楚自己没有阳具。治疗师教给她的是规则；正因为把事情转移到法则的象征层面，她才以一种效果值得讨论的方式介入。事实上，她自己也只能追问：这次介入是否有效地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恐怖症？显然，当时的效果极其短暂，恐怖症很快又愈演愈烈。

恐怖症只有在孩子重新融入一个完整家庭以后才会消退；原则上，那时她的挫折本应比以前显得更大，因为她面对一位继父——也就是一个进入家庭游戏的男性，她的母亲此前一直守寡——，还面对一个哥哥。然而，恰恰到这时，恐怖症才消退，因为她按字面说已经不再需要恐怖症来填补象征回路中一切严格意义上的阳具携带要素——也就是男性——的缺席。

我们使用“挫折”这个词时，以上批判性说明的要点……当然，某种意义上，这个词的使用具有正当性，因为这一辩证法中的核心与其说是对象本身，不如说是对象欠缺；从表面看，挫折确实很好地回应了这个概念……就在于挫折辩证法本身并不稳定。

挫折并不是剥夺。为什么？挫折是另一个人使你得不到某种东西，而你本来恰好可以期待他给出你向他要求的东西。在挫折中，真正受到牵涉的与其说是对象，不如说是能够赠予你的那个人的爱——假如东西真的给了你。挫折的对象与其说是对象，不如说是赠礼。我们在这里来到一种辩证法的起源，它是一道象征性的间距；而且，这道间距本身随时都在消逝，因为这份赠礼还没有被带来，它只是处在某种无偿性之中。

赠礼来自大他者。至于大他者背后的东西，也就是这份赠礼借以抵达你的整条链条，眼下仍未得到察觉。主体一旦察觉它，就会发现这份赠礼远比最初显现的更为完整：它牵涉整条人类链条。

然而，在挫折辩证法的起点，只有这一切：同大他者的对峙，以及骤然出现的这份赠礼；但是，如果它作为一份赠礼被带来，对象本身作为对象便会消逝。

- 换言之，如果要求得到满足，对象就会退居次要位置。
- 相反，如果要求没有得到满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象也会消逝并改变意义。

如果你们想要维持“挫折”这个词——因为一旦主体进入这个词所包含的索偿，便确实有了挫折——，就必须把对象作为一种按权利本可要求、已经属于主体所有物的东西引入。这时，对象进入了我们可以称作主体所有物的自恋时代。

无论发生哪一种情况，挫折时刻都是一个转瞬即逝的时刻；它会通向某种东西，把我们抛入一个不同于纯粹而简单的欲望层面的平面。

要求之中仿佛包含某种人类经验十分熟悉的东西：它自身带有某种特性，使它作为要求永远不可能真正得到满足。无论是否得到满足，它都会在下一阶段消解、归于虚无，并立即投射到另一个东西上：

- 要么投射到赠礼链条的衔接上；
- 要么投射到某种封闭而绝对无法熄灭、名为自恋的东西上。正因为自恋，对象对主体而言才既是他自己、又不是他自己；主体永远无法从中得到满足，恰恰因为它同时是他又不是他。

挫折进入一套辩证法以后，才会得到法制化，同时取得这种无偿性维度，并被安置到某个位置；也只有在这个限度内，实在界的象征化秩序才可能建立起来，主体才能把某些永久性的剥夺设立为存在并得到承认之物。

人们误认这一点，便会以各种方式重构经验交给我们的全部事物，把它们当作同根本的对象欠缺相联系的效果；这又引出一系列僵局，它们总同这样一种念头有关：把欲望视为个体的纯粹要素，连同其满足或失望所产生的反冲作用，从这里出发试图拆解、把持并重构整条经验链条。

然而，只有先确立下面这项原则，这条链条才真正可能得到阐发和设想：如果我们不先把某个事实设为在先的，经验中就没有任何东西能

够衔接，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搭建起来。这个事实就是：只有当主体进入

- 法的秩序；
- 象征秩序；
- 进入一种符号的秩序、象征链条的秩序、象征性债务的秩序以后，某种严格可供分析的冲突才会建立、才会构成。

这个东西先于主体遭遇的一切、先于各种事件或失望而存在。只有从进入它的时刻开始，主体接近所发生之事的一切方式——也就是他的亲历、他的经验，以及在那里却尚未得到秩序安排的混沌之物——才会得到衔接、取得意义，并且唯有如此才可能接受分析。

要天真地进入这些参照，也要让你们看清这项提醒——它原本只该是一项提醒——为何有充分根据，没有比弗洛伊德本人的几篇文本更好的地方了。

昨晚，有些人谈到某些文本带有一种不确定、有时甚至悖论式地显得粗野的面向；

他们甚至谈到其中有冒险成分，还有人说有外交手腕——其实看不出为什么。因此，我为你们选了其中最出色的一篇，甚至可以说是最令人不安的文本之一；不过，它也完全可能

显得真正古老、乃至过时。它就是《一例女性同性恋的心理发生》[注3]。

> [注3]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例女性同性恋的心理发生》（"Über die Psychogenese eines Falles von weiblicher Homosexualität"），1920 年；法译载《神经症、精神病与倒错》，法国大学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245 页。

我只想向你们重提其中几项根本衔接。病例涉及维也纳一个体面家庭的女儿；对一个体面家庭来说，把人送到弗洛伊德那里已经是迈出相当大的一步。事情发生在 1920 年。

当时发生了一件十分特别的事：这户人家十八岁的女儿，漂亮、聪明、社会阶层很高，却因为追逐一位比她大十岁的所谓"社交界女士"，成了父母的忧患。家人提供的各种细节还明确表明：按照当时维也纳通行

而又被视作体面的社会分类，这位社交界女士也许属于某种可以称作"半上流社会"的圈子。

随着事件推进，一切都显示，把她系在这位女士身上的依恋真正充满激情；这使她同家庭的关系相当痛苦。后来我们得知，这些痛苦关系同整个情境的建立并非无关。总之，父亲为此暴跳如雷，看来无疑构成了一个动机：少女并不是因此支撑这份激情，而是因此以某种方式把它一路推行下去。我指的是，她以一种平静的挑衅不断向那位女士献殷勤，在街上等候她，把这段关系部分展示出来却又不公开炫耀；这一切足以让父母、尤其是父亲对此毫不知情成为不可能。文本也告诉我们，母亲并不是一个令人省心的人；她患过神经症，却没有把这件事看得太坏，至少没有看得太严重。

家人前来请求弗洛伊德把事情纠正过来；他非常中肯地指出，当治疗是为了满足周围人的要求时，治疗的建立会遭遇困难。弗洛伊德完全正确地说，分析不能照订单进行。事实上，这一点只是在引入更非同寻常的东西，而且它所沿的方向，恰恰会让我们看到弗洛伊德对分析本身所作的一些考量——某些人可能会觉得这些考量已经非常过时。也就是说，为了解释这场分析为何没有走到终点，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它让他看得非常非常远——所以他才把它讲给我们——，但无疑并没有让他改变这个少女命运中的多少东西。

为了解释这一点，他引入了下面这个观念。它虽然可能显得陈旧，却并非毫无根据；这是一种图式化观念，与其让我们觉得自己更善于操纵分析，不如说它应促使我们回到某些最初的给定。这个观念就是：分析中有两个要素：

- 第一个要素，仿佛是把所有能够知道的东西收拢起来；
- 随后，才是让那些仍然牢不可破的阻抗屈服；此时主体已经知道许多事情。

他在这里引入的比喻也极其惊人：他把这比作旅行前收拾全部行李——这件事总是相当复杂——，随后才是登程并走完道路。出自一个对铁路和旅行患有恐怖症的人，这个参照毕竟颇为辛辣！然而，更惊人的是，在整个这段时期，他感觉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发生。相反，他非常清楚地看到曾经发生过什么，并突出了若干阶段。

他清楚看到，在童年时期，某种事情并非顺利发生：少女从两个兄弟那里——准确说来，是从较年长的那个兄弟那里——把握到那项差异，发现自己是一个没有本质上值得欲求之对象、即阳具对象的人；

这并非毫无波澜地过去。她的两个兄弟中，另一个比她年幼。不过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在这之前，少女从未患过神经症；分析中没有发现任何歇斯底里症状，她的童年史从病理后果角度看也没有任何值得注意之处。

正因如此，至少从临床上看，这个病例中有一点十分醒目：一种在所有人看来都明显异常的态度，竟然如此晚才爆发。她对那个多少有些声名狼藉的女人占据一个奇特位置，表现出激情洋溢的依恋，并终于闹出一场风波，使她被带到弗洛伊德那里求诊。之所以不得不托付给弗洛伊德，是因为发生了一件引人注目的事。少女曾同危险进行一场温柔的调情：她竟然同那位女士散步，几乎走到自家窗下。一天，父亲走出来，看见这一幕；他当时身边还有其他人，于是朝她们投去一道燃烧着怒火的目光，转身离开。那位女士却问少女：

- “那个人是谁？”
- “是爸爸。”
- “他看起来不高兴！”

这位女士随即对此极为不悦。文本告诉我们，此前她对少女一直非常矜持，甚至冷若冰霜；她无疑完全没有鼓励这些殷勤，也不特别想惹上麻烦。于是她说：“既然这样，我们别再见面了！”维也纳有一些环线小铁路；她们离其中一座小桥不远，少女随即从桥上纵身跳下，她坠落了——niederkommt。她摔断了几处骨头，却活了下来。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年轻女同性恋者”病例与拉康的结构重读

于是弗洛伊德告诉我们：这份依恋出现以前，少女的发展不仅正常，而且一切都让人觉得方向极佳。她十三四岁时，不是已经展现出某种迹象，让人可以期待女性使命——母职——得到最令人欣慰的发展吗？

她曾照料父母朋友家的一个小男孩；可这种仿佛已预先使她成为母亲典范的母爱突然中断。弗洛伊德告诉我们，也就在那时，她开始同他所谓"已经成熟"的女人来往——这次经历并不是第一次——；最初，她们似乎是某种母亲替代者。不过，这个图式并不太适用于最后那个人，也就是那个真正体现了戏剧性经历的人；分析的启动和明确同性恋的难题都会围绕这场经历展开，因为主体向弗洛伊德声明，她绝不会放弃自己的任何要求，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对象选择。

她会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欺骗家人，但仍会维持同那个人的联系；她远没有失去对后者的兴味，而后者又被这份非同寻常的奉献标志打动，此后对她变得更加容易接近。因此，主体公开声明并维持的这段关系，引出了弗洛伊德一些极其醒目的评论。其中有些评论被他赋予裁决性的价值：

- 一类用来解释治疗前已经发生的事情，例如自杀未遂；
- 另一类用来解释他本人的失败。

前一类看来非常中肯，后一类同样如此——只是也许并不完全按他自己的理解方式成立；

因为弗洛伊德的病例观察自有一种特性：即使对那些多少超出他本人把握的事，它们仍会始终给我们留下极其充足的清晰性。

我指的是朵拉病例。弗洛伊德后来把事情看清了：他曾对朵拉作出介入，却误认了她的问题朝向她自己的性别，也就是误认了朵拉的同性恋。这里，我们会看到一种类似秩序的误认，但它更具教益，因为更加深刻。

此外，他还告诉我们一些事情，却只作了不完整的利用；就这次自杀未遂真正涉及的东西而言，它们无疑位列最有趣之处。自杀未遂仿佛在一项有意义的行动中达到顶点；这是一场危机，而主体显然同张力的不断上升紧密相连，直至冲突爆发并酿成灾难。

他以如下方式解释：最初那场危机使主体走向一种同正常取向严格相反的东西；但这场危机必须放在某种可谓正常的取向中设想，即她欲望从父亲那里得到一个孩子。文本告诉我们，这里发生了位置的真正翻转，而弗洛伊德试图把它衔接出来。这是这样一种病例：欲望对象造成的失望，被一次完整的位置翻转所概括，也就是认同于这个对象；正因如此——弗洛伊德在一条注释中准确作了说明——，它等同于向自恋的退行。

当我把自恋辩证法本质上规定为“自我 $\leftrightarrow$ 小他者”这项关系时，我所做的绝不多于把弗洛伊德各种表述中隐含的东西凸显出来。那么，这场失望究竟是什么？在十五岁左右的那个时刻，主体已经走上一条占有这个想象对象、这个想象孩子的道路——她曾如此用心照料那个孩子，以至于这件事在病人既往史中构成一个明确日期——；究竟是什么使她完成这次翻转？

就在那个时刻，她的母亲实际从父亲那里生下了一个孩子；换言之，病人有了第三个弟弟。这就是关键点，也使这份观察在发生了某件事

之后看起来具有例外性质。现在必须看清，在哪个层面解释它最为恰当；因为，一个姗姗来迟的小孩子介入，竟导致主体的性取向发生深刻翻转，这同样绝不寻常。

正是在这时，少女改变了位置；问题是究竟发生了什么。弗洛伊德告诉我们，这件事无疑必须被看作反应性的——文本里并没有这个词，但其中隐含了这一点，因为他继续假设，对父亲的怨恨仍在发挥作用。这就是情境中的主要角色和一个枢纽，它解释了整场经历被推行的全部方式。

她对父亲带有鲜明的攻击性；依此说来，在她那位可以说与她相应的依恋对象对她加以阻挠、令她失望以后发生的自杀未遂，只不过是一个反向攻击现象，

也就是针对父亲的这份攻击转回主体自身[注]，同时又同某种在象征上满足问题所涉之物的东西结合起来。弗洛伊德告诉我们：经过一种骤降、一种把情境还原到真正投入运作的对象层面的缩减，整个情境仿佛坍缩到原初给定之上。当少女 niederkommt、从桥上坠下时，她完成了一项象征行动；它正是一个孩子在分娩中 niederkommen——“降生”——的行动。德语正用这个词表示“生下来”。

> [注] 米勒编订本（Seuil，1994，第 108 页）明确作“针对父亲的攻击转回主体自身”；Staferla 此处的句法容易使攻击性的归属发生歧义。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年轻女同性恋者”病例与拉康的结构重读

这里有某种东西，把我们带回这个情境结构的最终而原初的意义。

在弗洛伊德向我们提出的第二类评论中，他要解释这个情境为何在治疗

内部没有出路。他告诉我们：因为阻抗未被克服。别人告诉她的一切，始终只令她极感兴趣，却从未让她放弃自己的最终位置；也就是说，用今天的话来说，她始终把全部内容维持在智性兴趣的层面。弗洛伊德把她的反应比作一位女士：别人向她展示各种物品，她隔着长柄眼镜说，“多漂亮啊！”

这是一个比喻。不过，弗洛伊德说，不能认为这里完全没有移情；他极具洞察力地从病人的梦中辨认出移情的在场。这些梦本身……与此同时，病人还毫不含糊地向他声明，自己决意不改变对那位女士的行为……

却预告着最令人欣慰的取向会惊人地重新开花：一位英俊而令人满意的丈夫将会到来，而且还会期待一个由这份爱情结出的对象降生。

总之，梦中预告的丈夫田园诗般完美，简直带着某种被强行制造出来的味道，仿佛是在回应双方共同付出的努力；换作任何一个不是弗洛伊德的人，都会受骗并寄予最大的希望。弗洛伊德没有上当；他从中看到一种移情。这组梦复刻了她为回应失望而进行的某种反诱骗游戏。毫无疑问，她对父亲不只是攻击和挑衅，也作出过让步；关键只是要向父亲表明她在欺骗他。

弗洛伊德看出这里涉及类似的东西，也看出这就是那些梦的移情意义：她要同弗洛伊德重演自己曾同父亲进行的那场残酷游戏的根本位置。在这里，我们不能不进入那种根本的相对性；它正是象征形成的核心，

因为它构成了我们所谓无意识场域的根本路线。弗洛伊德把这一点表达得非常准确，唯一的问题是强调得稍微过了头。他告诉我们：

> “我认为，诱使我误入歧途的意图，是形成这个梦的要素之一。这也在试图赢得我的兴趣与好感，或许是为了日后让我遭受更加深刻的失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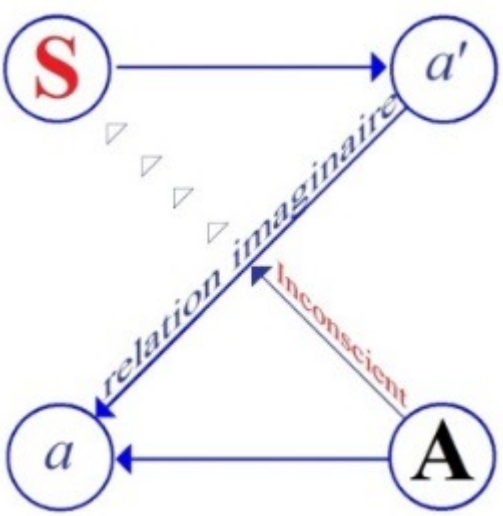
弗洛伊德归到主体身上的这项意图，其锋芒在这里显露出来：她前来占据这个位置，要迷住他、抓住他；按弗洛伊德的说法，是要让他从更高处跌下来，此前她把他抬得越高，就越要让他坠落。可以说，弗洛伊德本人已经被卷入情境；因为只要听听这句话的语气，就完全无法怀疑，其中发生了我们所谓的一次反移情行动。

认为这个梦具有欺骗性，这一点是正确的；而弗洛伊德却只保留了这一点。紧接着，他便严格进入一场讨论；在他的笔下发现这场讨论令人着迷：无意识的典型表现可能是一种欺骗性的表现。他显然预先听到了别人会向他提出的反对：“如果连无意识也会欺骗我们，那么我们还能信赖什么？”他的弟子会对他说什么？他会给他们作一番长篇解释——其中也带着一点倾向性——，说明这件事为何终究毫不矛盾，以及它如何可能发生。

尽管如此，1920 年的弗洛伊德在这里推到前景的根本之物，恰恰就是无意识中最核心的东西：主体同大他者本身的关系；这项关系在其根基上恰恰包含了这个层面上的欺骗可能性。我们处在谎言与真理的秩序中。

然而，尽管弗洛伊德把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他似乎没有看到：这是真正的移情。也就是说，道路本应在对欺骗欲望的解释中打开，而不是把它当成某种——粗略地说——针对他本人的东西。

因为，他只消再添上这句话：“这也在试图把我绕进去、迷住我，让我觉得她非常漂亮。”——而这个少女想必确实非常迷人——，就已经像朵拉病例一样，在这件事里并不完全自由。他想避免的，恰恰是断言自己已经注定要遭遇最坏的事：他会亲自感到幻灭；换言之，他已经随时准备产生幻想。他一面防范这些幻想，一面已经进入游戏，实现了想象游戏［$a \leftrightarrow a'$］。



从这一刻开始，他就使游戏变得实在，因为他本人已经身在其中；而且结果果然如此：他解释这件事时告诉少女，她的意图就是欺骗他，一如她惯常欺骗自己的父亲。也就是说，他立即截断了自己实现出来的想象关系。某种意义上，他的反移情本可以在这里派上用场，条件是它不要成为反移情，条件是他自己并不相信它，也就是他自己并不身处其中。

只因他已经身处其中，并且过早作出解释，他便让少女的这个欲望进入实在界。它只是一种欲望，并不是欺骗他的意图；他却赋予它实体。他对待少女的方式，同那个介入小女孩病例的人完全一样，把它当作一尊雕像［？］，当作我向你们解释的核心中的象征之物[注]。我说的是这样一种滑向想象界的过程：一旦它仿佛被确立成学说，就远不只是陷阱，而成了一道创口。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极限而透明的例子；我们不可能

> [注] 此处法文转录为 comme une statue [?] et comme la chose symbolique，其中“像一尊雕像”同前后句的句法和论旨衔接不稳。译文保留底本的疑问标记，不据意补改。

误认它，因为它就写在文本中：弗洛伊德此刻通过自己的解释让冲突爆发出来，赋予冲突实体；而正如他自己已经感觉到的，本来应该做的恰恰是揭露无意识中存在的那套说谎话语——真正涉及的确实不是别的东西。弗洛伊德却反而企图结合而造成分离：他告诉少女，这一切都是针对他的。治疗果然没有再前进多少，也就是中断了。

然而，还有一件更有趣的事受到弗洛伊德强调，却没有得到他的解释。它极其惊人，而且他并未漏看：少女对那个人的激情有一种特殊性质，它不是普通的同性恋关系。同性恋关系的特性，恰恰是展现出异性恋关系所具有的全部变化种类，甚至可能还多出几种。

弗洛伊德以绝妙方式强调的，是他所谓“严格男性型的对象选择”；他还说明自己究竟是什么意思，并以极具鲜明轮廓的方式把它衔接出来：按字面说，这就是最为崇高的柏拉图式爱情。它不要求任何满

足，只要求侍奉那位夫人；可以说，这真正是神圣之爱，或最为虔敬的宫廷爱情。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年轻女同性恋者”病例与拉康的结构重读

他还添上了 exalt［狂热崇高］一类词；这个词在德国文化史中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参见“恋歌诗人”Minnesänger］。严格来说，正是这种炽烈的崇高化处在该关系的根底。总之，他为我们描绘的东西把这段爱恋关系置于象征化爱情关系的高位：它被确立为侍奉、制度与参照，而不只是某种被动承受之物，不只是吸引或需要。

它本身不仅不需要满足，而且恰恰以这种不满足为目标。

它在对象关系中确立缺失，并把这项确立当作理想爱情得以绽放的秩序本身。你们难道没有看到，这里有某种东西仿佛打成一个结，联结了我试图让你们感受到的三个层次吗？它们处在整个过程的结点上；如果你们愿意把症状这个词当作谜的同义词——因为我们正在询问它——，这个过程可以说是从挫折走向症状。

这个特殊情境的问题就将这样得到衔接；但它只有放在自身的界域中才有意义，也就是说，它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具有特异性。这里有一个在无邪状态中得到体验的、对想象对象的参照：这个孩子；解释让我们可以把他设想成从父亲那里得到的孩子。

人们已经告诉我们：与想象中可能以为的相反，女同性恋者恰恰是那些曾在某个时刻对父亲形成非常强烈固着的人。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出现真正的危机？因为就在这时，实在对象介入了：一个由父亲给出的孩子——这是真的——，却恰恰给了另一个人，而且是给了离她最近的那个人。此时发生了真正的翻转；它的机制已经得到说明。我

认为，至关重要的是看到：在这个病例中，某种东西早已在象征层面确立。因为她正是在象征层面从这个孩子那里得到满足，把他当作父亲给她的孩子；而实在对象的在场，却使她在一瞬间被带回挫折层面。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年轻女同性恋者”病例与拉康的结构重读

这已经不再是她在想象界中从中得到满足的东西；后者曾在女人之间的关系中支撑她，其中还包含把父亲在场本身确立为：

- 首屈一指的父亲；
- 根本的父亲；
- 对她而言，任何一个会给她孩子的男人都将始终成为的那个父亲。……眼下发生的事情却把她带回挫折层面，因为对象在一瞬间成为实在的；她的母亲把这个对象抱在身边，使它取得了物质实体。

这个时刻里最重要的是什么？难道只有某种翻转，使她在这时

认同于父亲？当然，这一点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她自己是否变成了某种潜伏的孩子，并会在危机走到终点时实际 niederkommen——坠下 / 降生？

我认为，假如我们像朵拉病例那样拥有日期，也许可以算出事情是在多少个月之后发生的。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受到欲求的东西位于这个女人的彼岸。少女献给她的这份爱情，指向一个不同于她本人的人；这份爱纯粹而简单地活在奉献秩序中，把依恋、把主体在关系中的自我消解推到最高程度。

弗洛伊德似乎把这种东西保留给男性经验的界域，这并不是毫无理由。

事实上，这里涉及一种高度阐发的文化关系得到制度化绽放的形式；事物在其中受到遵守和支撑［参见宫廷爱情］。主体在根本失望的层面完成了一次通道和反转；她找到的出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爱的界域中，在女人身上，究竟有什么东西受到爱，而又位于她自身的彼岸？这恰恰触及了与爱情之完成相关的问题中一切真正根本的东西。

严格说来，在她身上［或：被她］欲求的，恰恰是她所缺少的东西；在这里，她所缺少的是回到原初对象，而主体原本要在孩子身上找到这个对象的等价物和想象替代物。它恰恰就是阳具。在最极端、最理想化的爱情中，人们在女人身上寻找的就是她所缺少的东西；人们在她的彼岸寻找的，是作为全部力比多经济之中心对象的阳具。

第7课 · 1957年1月16日

上一次谈话结束时，我们试着概述了弗洛伊德呈现的女性同性恋病例。在讲述事件曲折的同时，我也顺带勾勒了某种可以称作结构的东西；因为，如果不是以结构分析为背景追踪这个病例，它的意义并不会比一个奇闻病例大多少。我们应当回到这项结构分析，因为只有推动它前进，

并且尽可能推得更远，分析沿这条道路深入才有意义。

分析理论中存在某种欠缺，在我看来，它随时都会浮现出来。顺便提醒一句也并非无益：我们在这里继续努力，实际上正是为了回应这项欠缺。当然，这项欠缺到处都能感觉到；最近，当我看到安娜·弗洛伊德小姐与梅兰妮·克莱因的说法相互碰撞时，它又一次在我的思考中活跃起来。

此后，安娜·弗洛伊德小姐无疑已经大幅缓和自己的立场；但她最初却把自己的儿童分析原则建立在以下评论上：

- 例如，儿童不可能形成移情，至少不可能形成移情神经症；因为儿童仍然被包含在制造神经症性张力的情境中，对于一种尚在上演的东西，严格说来不可能发生移情。

- 另一方面，儿童仍可能同自己最初依恋的对象保持关系——总之，这是另一条性质相同却有所不同的评论——；这应当改变分析家的

位置：分析家在当下层面仿佛以第三者身份介入，因此也应深刻改变自己的技术。

- 事实上，她的技术也确实得到了深刻改变；在这一点上，安娜·弗洛伊德小姐向某种东西致意，它就像是对言语功能在分析关系中所具有的本质重要性的预感。

- 她说，儿童同言语的关系当然可能不同于成人。换言之，必须借助作为儿童技术的游戏手段来把握他；儿童也可能处在一个不允许分析家以中立或接纳位置面对他的状态，而这种位置首先寻求接纳言语、让它展开，并在适当时候作出回响。

因此，我要说，分析家投入一种不同于言语关系的关系性质，虽然没有得到展开，甚至没有得到设想，却仍然已经被指出。

相反，梅兰妮·克莱因夫人在论证中指出：没有什么比成人分析更像儿童分析。[注]　即使儿童年龄极小，他的无意识中所涉及的东西也已经——与安娜·弗洛伊德小姐的说法相反——同现实中的父母毫不相干。

> [注] 米勒编订本（Seuil，1994，第 112 页）补全了 Staferla 转录中缺失的比较项："成人分析"与"儿童分析"。

早在两岁半到三岁时，情境相对于我们在现实关系中能够观察到的东西已经改变得如此彻底，已经如此成为一整套同儿童当下家庭关系深度陌生的戏剧化，以至于即使一个孩子作为独生子女被养在远离父母的某个人——总之，一位老姑母——那里，处于同唯一一个人完全孤立的二元关系中，人们也仍然看到，他重构出一整套家庭戏剧，其中

有父亲、母亲，甚至还有作为竞争者的兄弟姐妹。这是我所引用的病例。

因此，从一开始，分析要揭示的就是某种东西；从根本上说，它并不处在同实在界纯粹而直接的关系中，而已经铭写在某种象征化之内。从这时起……

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接受梅兰妮·克莱因的断言——这些断言以她的经验为基础，而这份经验通过一些有时把事情推向奇异境地的病例观察传达给我们——，那么我们确实不能不被那种“女巫坩埚”或女预言家的坩埚所震动。在它的底部，在一个整体想象世界里翻腾着母亲身体作为容器的观念，

……一切原初幻想都已经在场，而且仿佛从起源开始，便倾向于结构化成一场

看来早已预成形的戏剧；为了让机器运转，必须随时唤起最具攻击性的原初本能涌现出来。

我们不能不同时受到两件事震动：一方面，全部这些幻想剧同克莱因夫人在这里操纵的独特给定之间，显示出某种切合；另一方面，面对这一切，我们又不能不问自己：我们究竟身处什么面前？

这种戏剧性的象征化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越向更早时期回溯，它就越显得已经填充完毕；仿佛最终可以承认，我们越接近起源，俄狄浦斯情结就越已经在那里充实存在、衔接成形、准备投入行动。

这至少值得提出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处处重新涌现，也沿着我眼下试图引导你们走的那条特定道路——倒错——涌现出来。倒错是什么？即使在同一个群体内部，人们对此也发出极不协调的声音：

- 一些人自以为追随弗洛伊德，会说必须纯粹而简单地回到一种观念：对某个部分驱力的固着持续存在。它仿佛完好无损地穿过俄狄浦斯情结试图建立起来的全部进展和整个辩证过程，却完全不经历那些命运变化；其他部分驱力则在这些变化中被纳入一场缩减运动，最终得到统一并抵达生殖器驱力——这是一种理想而本质上统一化的驱力。于是，倒错成了驱力发展中的某种事故。他们又用经典方式解释弗洛伊德所谓“倒错是神经症的负片”，纯粹而简单地把倒错处理成一种驱力尚未得到加工的东西。

- 另一些人虽然未必因此就最有洞察力、最为优秀，却受到经验以及分析实践中某种真正强制显现之物的警示。他们会试着表明：倒错绝不是某种纯粹的、持续不变的东西；总而言之，倒错本身也属于某种经过一切危机、戏剧性融合与解融合而实现的东西，并展现出同神经症一样丰富的维度、同样的充盈、同样的节奏和阶段。于是，他们会试着用以下这类公式解释它为何是“神经症的负片”：这里发生了防御的情色化，正如在分析中缩减防御的全过程所经历的种种游戏。

我倒愿意接受；这的确形成了一幅图景。但说到底，它为什么能够被情色化？这才是全部问题：这种情色化从何而来？那个不可见的权能位于哪里？它仿佛投下一层多余的色彩，造成一种性质变化，把严格说来应当被视作力比多满足的东西涂抹在防御之上。

事实上，这件事并非不可设想；但至少可以说，它并没有真正得到思考。

不过，说到底，不能以为在分析理论的发展中，弗洛伊德没有尝试向我们提供一种逐渐得到阐发的观念。我甚至还要多说一步：弗洛伊德本人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例子，证明他所说“倒错是神经症的负片”，绝不是一个应当按照人们长期以来的方式理解的公式。也就是说，它并不只是意味着：在神经症病例中隐藏于无意识的东西，会在倒错中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仿佛获得自由。

他向我们提出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或许，我们终究应当把这些紧缩公式看作交给我们的东西，等待分析找出其真正意义。我们可以先试着追随弗洛伊德，看看他如何设想一种可称作倒错的现象、甚至一种明确倒错的机制；这样一来，我们最终或许就能看清，当他断言“倒错是神经症的负片”时究竟是什么意思。

如果再仔细一些，考察那篇本应著名的研究——《性倒错发生研究之贡献》[注1]——，就会注意到弗洛伊德关注方式的特征……

> [注1]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个孩子被打：性倒错发生研究之贡献》（“Ein Kind wird geschlagen”/“On bat un enfant”），H. Hoesli 法译，载《法国精神分析杂志》，1933 年第 3—4 期，第 274—297 页。

同样富有特征的是，他选择了下面这句话作标题，并在正文中加以强调。它不只是一个标签，而是直接摘自病人谈到自己这类大体上可称作施虐—受虐的幻想时所作的陈述，无论这些幻想在每个具体病例中承担怎样的角色和功能……弗洛伊德告诉我们，他把研究特别集中在六个病例上；这些病例或多或少都是强迫神经症，其中四名女性、两

名男性，背后还包含他对其他全部病例的经验，只是他对它们没有同样深入的理解。因此，这里看来有一种对大量经验的概括与组织尝试。

主体在治疗中把作为幻想的这个东西投入运作时，会用这种引人注意的形式表达它。这个说法的不确定性留下若干悬而未决的问题，主体很难回答；事实上，他一开始根本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几乎只能带着某种厌恶、甚至难堪或羞耻加以描述。这些感觉并不针对那些或多或少同此类幻想相联系的自慰活动；主体通常把这些活动视为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罪责的活动……[注]

> [注] 米勒编订本（Seuil，1994，第 114 页）作 pratiques masturbatoires plus ou moins associées à ces fantasmes；Staferla 此处的转录发生了串词。

……相反，十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幻想往往不仅极难得到表述，而且一旦要加以衔接，就会在主体身上引发相当强烈的厌恶、反感与罪责感。我们已经能从这里感觉到某种值得警觉的东西：以幻想或想象方式运用这些意象，同用言语表述它们之间存在差别。主体行为中的这个信号已经标出一条界限：在心中演弄它们，同把它们说出来，并不属于同一秩序。

围绕“一个孩子被打”这个幻想，弗洛伊德将告诉我们，他的经验向他显示了什么，以及它在这些主体那里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不会读完这篇文章；我只想突出一些完全明显的要素，因为它们直接关系到我上次借女性同性恋的心理发生病例引导你们走上的道路。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分析的进展表明，这个幻想是通过一系列转化替代另一些幻想而形成的；那些幻想在主体发展的特定时刻都曾发挥完全可以理解的作用。

我想向你们呈现这些状态的结构，让你们可以从中辨认出某种看来

完全明显的东西；唯一的条件，是至少要对我们试图进入的这个维度睁开眼睛，而它可以概括在主体结构这个标题之下。

换言之，我们始终努力把持的正是这一点，以便把理论中经常呈现为歧义、僵局甚至复视的东西安置在真正的位置：看清一种现象发生在主体结构的哪个层面。我们发现，随着历史在分析压力下逐渐打开，使这些幻想的起源得以重新找到，它经历了弗洛伊德所说的三个阶段。顺便说，弗洛伊德声明自己将限于……讨论那种让他能够初步典型表述幻想的材料……将限于……仅仅讨论女性身上确切发生的事情。他稍后会说明理由，不过今天我们自己先把它搁下，在本次没有放到前景的论述前半部分也暂不处理。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分析事实时能够重新找到的第一个幻想采取如下形式：

“我父亲正在打一个孩子，那个孩子是我憎恨的孩子。”

这个幻想在历史中或多或少同一个弟弟或妹妹、一个竞争者的进入相联系；这个孩子的在场以及他所得到的照料，在某一时刻使主体失去父母之爱，遭受挫折。

这里特别涉及父亲。我们不会在此强调这一点，但也不能不注意到：涉及的是一个处在特定时刻的女孩，俄狄浦斯情结已经构成，同父亲的关系已经建立。因此，关于父亲人物为何在一个极其原始的幻想中取得这种优先地位，我们把解释留待以后；不言而喻，它应当同主体是女孩这一事实有所关联。不过，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搁在一旁。

重要的是：我们一开始就在一种具有回溯作用的历史视角中触及这一点。主体从分析中的当下位置

出发，为过去作出表述，并以一种方式组织起一个原始的戏剧情境；

然而，这种方式铭写在主体当下的言语中，铭写在他现在的象征化能力中；随着分析推进，我们把它重新找到，视为原始之物、最深层的原初组织。它显然有一种包含三个人物的复杂性：

- 有一个惩罚的施事者；
- 有一个承受惩罚者，他不同于主体；准确说来，他是主体憎恨的一个孩子，主体由此看到他失去了这里所涉及的父母偏爱。正因为另一个孩子从这份偏爱中跌落，主体才感觉自己享有特权；
- 还有某种东西——如果可以这样说——包含三重维度与三重张力。它预设一个主体同另外两人的关系，而后两人彼此之间的关系又受到某种以主体为中心之物推动：

“我父亲——为了朝一个方向加强这件事，可以这样说——打我的弟弟或妹妹，是怕我以为他更偏爱对方。”

这里存在一种因果性或张力，存在对作为第三者的主体的参照；事情为了他而发生，并由此推动和激发对第二个人物、即承受者的行动。作为第三者的主体本人，也在情境中受到召唤、得到当下化；事情必须在他眼前发生，意在让他知道：有某种属于他的东西正被交给他，也就是享有这份偏爱的特权、这项优先次序、这种秩序与结构。它以某种方式重新引入了……就像刚才已有恐惧观念一样……一种预期、时间维度以及向前的张力；它被引入这个三元情境，成为推动力。

这里参照第三者作为主体，因为他必须相信某事，或者从某种落在第二对象身上的行为中推断某事。在这里，第二对象成为两个主体之间这场沟通的工具；归根结底，这是一场爱的沟通，因为中央主体正是以第二对象为代价，听到某种对自己宣告的东西，并在这里领受它；那就是他希望得到偏爱、得到爱的愿望与欲望之表达。

当然，这个构成已经得到戏剧化，也已经具有反应性，因为它源自一个复杂情境。然而，这个复杂情境预设这种三重主体间参照，以及它所必需并引入的一切时间参照、时间和切分。它还预设第二个主体的进入；这一主体不可或缺。为什么？因为他正是从一个主体跨越到另一个主体之物的工具、弹簧、中介与手段。归根结底，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完整的主体间结构，因为它建立在一次言语跨越的完成之中。

关键并不在于事情是否被说出来，而在于这个原始幻想所建立的三元情境中，主体间结构本身已经携带着那项构成一切完整言语的同一主体间结构之印记。

同第一阶段相比，第二阶段呈现的是一个缩减后的情境。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在这里会以

极其特殊的方式发现一个缩减到两个人物的情境——我这里遵循弗洛伊德的原文，至于解释，只能尽力而为。弗洛伊德提出解释时没有过度压实它；他把这个情境描述成一个必要而经过重构的阶段，是理解主体历史中所发生之事的全部动机所不可或缺的。这个第二阶段产生：

“我被父亲打。”

这里涉及一个缩减为二元的情境；可以说，它排除了一切不同于同打人施事者之关系的维度。这个情境可能引发各种解释，但这些解释本身都会带有最强烈的歧义特征。

如果第一个幻想中有某种组织和结构，可以用一系列箭头来标出赋予它的意义，那么第二个情境就如此歧义，以至于我们一时会问：主体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攻击并殴打她的人。这就是经典的施虐—受虐歧义。如果要解决它，就会像弗洛伊德一样得出结论：这里的某种东西同受虐癖的本质相联系，不过我在这个情境中得到强烈强调。

主体处在一个互反却又排他的立场：挨打的要么是他，要么是另一个人；在这里是他。正因为是他，某种东西得到了指出，却没有得到解决。

我们可以——后面的讨论也会这样表明——从挨打这项行动本身中，看到某种或许已经带有情色印记之物的转置或移置。人们在这里能够谈“受虐癖的本质”，这一事实本身极具指示性；而在前一阶段，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我们所处的情境尽管高度结构化，却仿佛孕育着一切潜在可能。它既非性的，也非特别施虐的，只是潜在地包含二者。到

了第二阶段，某种东西朝一个或另一个方向骤然凝结，却仍然歧义；这个二元关系阶段也由此标记，并在力比多层面提出全部难题。

这个第二阶段是二元的；主体被包含在同他者本身的二元关系中，因而也处在歧义里，处在二元关系的根本形式“要么……要么……”之中。弗洛伊德告诉我们，这个阶段如此短暂，以至于几乎总得由我们加以重构。短暂易逝正是它的特征，而情境会很快骤然推进到第三阶段：可以说，主体在那里被缩减到最极端的一点，并表面上以纯粹而简单的观察者形式重新找到自己的第三者位置；这个观察者仿佛把情境

从包含时间维度的主体间情境，经过第二个二元、互反的情境，缩减为终极幻想中完全去主体化的情境，也就是：“一个孩子被打。”

当然，在这个法语无人称代词“on”中，人们还能隐约重新找到父亲功能；但一般来说，父亲已经无法辨认，只剩下一个替代者。另一方面，“一个孩子被打”是弗洛伊德希望尊重的主体原句，实际上往往有多个孩子；幻想产物会让他们爆裂并倍增成上千个副本。这清楚表明，原初关系中发生了本质性的去主体化：剩下的是这种对象化，无论如何都是整个结构的彻底去主体化。在这个层面，主体只作为一种旁观者存在，被缩减到旁观者、甚至只是一只眼睛的状态；这就是各种对象在极限处、在最终缩减点上总会具有的特征。为了看见对象，至少需要一只眼睛——未必总要有一个主体——，需要一只眼睛和一道主体借以得到确立的屏幕。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什么？在我们当前的进程中，怎样才能用自己的语言翻译它？显然，在主体、大他者以及主体自我之多少经过幻想化的

想象关系图式上，想象关系沿着这个方向铭写，并表现为自我与他者之间或多或少鲜明的镜映性和互反性关系。

我们面对的是一句无意识言语；必须借移情分析的一切技巧才能把它重新找到。它就是：

“我父亲打一个孩子，也就是我憎恨的那个孩子，以此向我表明他爱我。”或者：“我父亲打一个孩子，是怕我以为自己没有得到偏爱。”

……也可以是任何其他公式，只要它以某种方式突出这场戏剧性关系中的一个重音。

这个东西在神经症中被排除、并不在场，必须重新找到；它会经历种种发展，并在构成这场神经症的全部症状中另行显现。这个东西在临床图景的一个要素——幻想——中重新出现。它怎样呈现？它在某种可以说是跨对象的层面上，仍携带着清晰可见的、来自衔接言语之能指要素的证词；这个层面就是大他者，即无意识言语得到衔接的场所，是作为言语、历史、记忆与衔接结构的本我。

倒错——或者把范围限定在这里，倒错幻想——有一种我们现在可以析出的特性。这种残余、这种象征性缩减究竟是什么？它逐渐排除了情境的全部主体结构，只让某种完全对象化、最终成为谜的东西浮现；它同时保留了作为衔接结构的大他者层面上的全部负载——主体卷入其中——，但这项负载没有得到揭示、构成，也没有得到主体承担。

在倒错幻想层面，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同时具有这个结构的全部要素，却已经失去构成其意义的一切，也就是失去主体间关

系。可以说，这里纯粹维持着其中可称作纯粹能指的东西：没有主体间关系，能指已被抽空自己的主体；情境本身的能指发生了某种对象化。在倒错层面，主体历史中某种根本的结构化关系就沿这一方向得到标示：它既受到维持、得到容纳，却又只采取纯粹符号的形式。

这同我们在倒错层面重新找到的一切，又有什么不同？

现在，请设想一下你们例如对恋物已经知道的东西。人们告诉你们，这个恋物可以通过那个从未被看见的彼岸来解释。难怪！那就是阳具母亲的阴茎；主体把它同某个情境联系起来……至少在经过短暂的分析努力以后，在主体仍可抵达的记忆中通常如此……

……在这个情境中，可以说，孩子的观察至少在记忆里停在了母亲的裙边。这里，我们看到所谓屏幕记忆的结构同它发生一种引人注意的会合：记忆链条在某个时刻停止，而它恰恰停在裙边，没有高过脚踝。

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在那里遇见鞋子；

也正因为如此，至少在某些特定病例——而这是典范性病例——中，鞋子可以取得替代那件未被看见、却已得到衔接和表述之物的功能。对主体来说，这件东西真正涉及拥有阳具的母亲；这个阳具无疑是想象的，却对母亲作为阳具母亲的象征奠基不可或缺。

这里，我们同样面对一种属于同一秩序的东西：某种把记忆进程冻结、缩减成一幅瞬间快照之物。它让记忆停在所谓屏幕记忆的点上；就像某种快速展开的东西突然停在一点，把所有人物都冻结，如同电影运动中的定格。

这类瞬间快照具有一种特征：那个从主体通向主体的、完整、能指化且衔接成形的场景，被缩减为某种在幻想中凝固的东西；它仍负载着

原场景表达中包含的全部情色价值，并仿佛成为这些价值的证词、支撑，以及最后剩余的支撑。

我们在这里切实触及所谓“倒错的模具”如何形成：意象取得这种价值提升，因为它仍然是某种必须在无意识中得到衔接、必须在移情辩证法中重新投入运作之物的特权见证；换言之，它必须在分析对话内部重新取得自己的各个维度。

因此，每当涉及倒错时，想象维度的价值就显得占据优势。

从主体到大他者发生之事——更准确地说，主体中位于大他者的残余——要经过这种想象关系。恰恰因为它受到压抑，言语……它确实是主体的言语；然而，言语按其本性是一条消息，主体必须从大他者那里以颠倒形式接收它……同样可能停留在大他者之中，也就是在那里构成无意识的被压抑物，确立一种可能却未实现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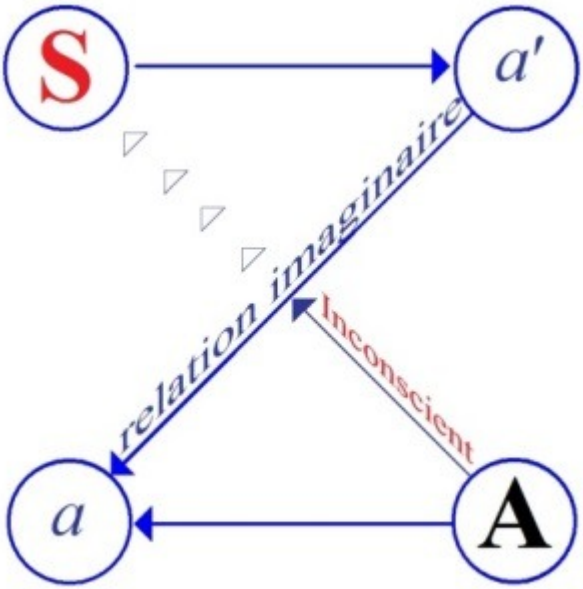
况且，仅说“可能”还不够；其中必定还有某种不可能，否则它就不会受到压抑。正因为通常情境中存在这种不可能，才需要移情的全部技巧，重新让从这个大他者通向主体——主体的“我”将要出现——的沟通变得可以通过、可以表述。

弗洛伊德的分析以最清楚的方式向我们提供了这项指示，而且一切都得到了比我刚才所说更为深远的表达和衔接。在这里，弗洛伊德明确标出：我们必须通过俄狄浦斯情结的种种命运和历险，通过俄狄浦斯情结的推进与解决，来把握一切倒错之构成的问题。

人们竟然还能设法维持那种把倒错称为“神经症的负片”的通俗说明，实在令人震惊。他们只是说，倒错是一种未经过俄狄浦斯及神经症机制加工的驱力，是某个不可还原的部分驱力纯粹而简单的残存和持续；

然而，在这篇具有奠基意义的文章以及许多其他地方，弗洛伊德已经充分指出：

无论我们把一种倒错结构设想得多么原始——至少是我们分析家所认识的那些倒错结构——，它都只能作为某个东西的手段、枢纽和要素得到衔接；而这个东西归根结底只能在、通过并为了俄狄浦斯情结的过程、组织和衔接得到设想、理解和衔接——而且只能在、通过并为了它。



我们试着把前几天的病例写入主体与大他者的这项交叉关系，其中：

- 正是在这里［A ⁀› S］，象征意义以及主体当下的全部发生过程必须得到证实和建立；

- 另一方面，还有想象性插入［a'→ a］；主体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地位，找到由他如此承认的对象结构，并相对于某些对他具有直接吸引力的对象被安置在一定的俘获之中。这些对象对应着他的欲望，因为主体走上那些形成所谓力比多固着的想象道路和轨道。

今天不会把这项工作推到终点，不过先作一个简单概括。我们看到什么？可以用五个时刻描述这一建立过程中的主要现象。这里不只涉及倒错；至于我们把这种倒错看作根本的还是后天获得的，眼下并不重要。我们知道这项倒错何时显示出来、随后建立、又骤然凝结；我们既有它的动力，也有它的起点。

这种倒错构成得很晚；这不等于说，它在极其原初的现象中没有自己的前提。不过，让我们试着在弗洛伊德本人已经开辟的道路上理解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最初状态发生在这个女人十三四岁、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女孩珍爱一个由感情纽带同她相连的对象：她照料一个孩子。在所有人看来，她在这个方向上表现出格外良好的取向，恰恰走在大家都可以期待的、女人典型使命——母职——的道路上。

某种东西以此为基础发生，并将在她身上造成一类翻转。最初，她开始对带有女性标记的爱的对象感兴趣：这些女人或多或少处于母亲式、重新扮演母亲的位置；最终，这条道路把她带到人们按字面说对那个人产生的“吞噬性”激情，而那个人也被称作“那位夫人”——这并不是毫无理由；

她以骑士式、按字面说是男性式的关系风格对待这位夫人；从男性层面和视角来看，这种风格经过高度阐发。

她仿佛不带任何要求、欲望，甚至不期待回报地侍奉自己对那位夫人的激情。爱者被投向甚至超出爱人一切表现的彼岸，呈现出赠礼性质；这是爱情关系在其最高度教养的形式中最富特征、也最经过阐发的形式之一。

我们怎样设想这次转化？我已经向你们给出了第一个时刻；在这两者之间，发生了某种事情，而且文本告诉了我们是什么。我们将用分析这个位置时所用的相同术语来包含这次转化。

我们从弗洛伊德那里知道，男性或女性主体在潜伏期之前会抵达一个阶段……这就是弗洛伊德谈论婴儿期生殖器组织的阳具期时所说的意义……这个阳具期标示生殖器性得以实现的点。

一切都在那里，甚至包括对象选择。不过，还有某种东西不在那里：生殖器功能作为实际得到结构化和组织的功能，尚未充分实现。留下的，是某种幻想性的、本质上想象的东西，也就是阳具的优势；因此，世界上有两类存在者：拥有阳具的存在者，以及没有阳具——即遭到阉割——的存在者。弗洛伊德正是这样表述的。

显然，这里有某种真正提出难题的东西；作者们始终无法摆脱它，因为他们试图以主体在实在界中获得规定的某些动机，为它作出某种说明。我已经告诉你们，我会暂且搁置那些被迫由此发明出来的奇特解释方式。它们的一般模式大致如此：众所周知，一切都必须已经在无意识倾向中受到猜测和铭写；主体必定已经由于自身本性预先形成了某种东西，使两性的合作得以适配。

因此，这必定已经是一种让主体获得某种好处的构成，而且其中必定已经存在一项防御过程。从某种视角看，这确实并非无法设想；但它只是把问题向后推，并确实把作者们卷入一系列建构，把整套象征辩证法重新放回起源；而我们越向起源回溯，这些建构就越发不可思议。

眼下我们姑且接受这一点，并接受另一个对我们来说比对那些作者更容易接受的事实：在这里，阳具恰好是这样一个想象要素——这是一个必须当作事实接受的事实——，主体在生殖器层面通过它被引入赠礼的象征体系。

赠礼的象征体系与生殖器成熟是两件不同的事。二者通过某种包含在真实人类情境中的东西联系起来：生殖器功能实际进入人与人的交换时，其行使受到法则所设规则的规定；事情正发生在这个层面，因而赠礼的象征体系与生殖器成熟之间确实存在如此紧密的联系。

但对主体来说，这没有任何个体生物学内部的连贯性。相反，事实证明，生殖器层面上阳具的幻想是在这套赠礼的象征体系内部取得价值的；弗洛伊德也强调了这一点。出于一个充分理由，它对现实拥有阳具的人——男孩——和不拥有它的人——女孩——并不具有相同价值。

对女孩而言，她恰恰因为不拥有阳具，才会被引入赠礼的象征体系。也就是说，她把情境阳具化，把问题变成拥有或不拥有阳具，并由此进入俄狄浦斯情结；而弗洛伊德向我们强调，男孩并不是由此进入，而是由此退出俄狄浦斯情结。换言之，在俄狄浦斯情结终点，当男孩

已经在某个层面实现赠礼的象征体系时，他实际上必须赠出自己拥有的东西。

女孩之所以进入俄狄浦斯情结，则是为了在其中找到她没有的东西。不过，她没有的东西……因为我们已经处在某种想象之物进入象征辩证法的层次和层面，

……所以，人所没有的东西同其余事物一样存在，只是带有一个负号；女孩就是带着这个负号进入其中。

无论带着负号还是正号进入，都不妨碍问题所涉之物投入运作……要标记正或负、在场或缺席，就必须先有某种东西……弗洛伊德告诉我们，恰恰是让阳具如此投入运作，才构成女孩进入俄狄浦斯情结的动力。在这套赠礼的象征体系中，各种东西都可以作为交换而赠出；可交换之物如此之多，归根结底，正因如此，我们才会在实际出现的症状中看到如此多的阳具等价物。

弗洛伊德还走得更远。在《一个孩子被打》中，你们会发现一个以直截了当的话表述出来的指示：前生殖器期关系中的如此多要素之所以进入俄狄浦斯辩证法——也就是说，之所以会出现肛门和口腔层面的挫折，并由它们来实现俄狄浦斯关系中的挫折、意外和戏剧性要素，即实现按照前提本应只在生殖器加工中得到满足的东西——，是因为，在自我层面发生着某种晦暗之事；孩子当然没有对此形成经验，而属于其他前生殖器期关系的要素和对象，更容易进入言语表象。

他甚至说，前生殖器期对象之所以在俄狄浦斯辩证法中投入运作，是因为它们更容易进入言语表象。例如，孩子更容易告诉自己：父亲偶尔给母亲的东西是自己的尿液，因为尿液是一个他熟知其用途、功能

和作为对象之存在的东西；它比那种已经在孩子想象中获得某种实现、却始终极难把握，而且对女孩尤其难以接近的对象，更容易得到象征化，也就是被赋予正号或负号。

因此，女孩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人们告诉我们，她最初被引入俄狄浦斯辩证法，是因为她将以一个替代物——孩子——的形式，从父亲那里得到自己欲求的阴茎。不过，在我们所考察的例子中，涉及的是一个实在孩子，因为她照料的是一个实际存在、参与其中的孩子。

另一方面，她照料这个孩子之所以能满足她身上某种想象性的阳具替代，是因为她通过替代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自己构成为主体，构成为想象母亲，并借拥有这个孩子得到满足。她所做的，正是获得那根她从根本上因未能拥有而受挫的想象阴茎，也就是把这根想象阴茎放到自我层面。

我只是要凸显原初挫折的这个特征：任何以挫折名义引入的对象——我是说，由一项实际发生的挫折所引入的对象——都只能、也必定是主体在某个歧义位置上取得的对象；这个位置就是它属于主体自身身体的位置。

我之所以向你们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谈到儿童与母亲的原初关系时，人们总把全部重音

放在被动理解的挫折概念上。人们告诉我们：儿童在从母亲那里感受到的挫折中，第一次经受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关系的考验；随后，你们就会看到“对象挫折”与“爱的对象之丧失”这两个说法受到不加区别的使用。

然而，如果说我在前几课中反复强调过什么，那正是下列两者之间存在一种两极分化，或者极为鲜明的对立：

- 一方面，是儿童可能因得不到它而受挫的实在对象，即母亲的乳房；

- 另一方面，是处在给予或不给予这个实在对象之位置上的母亲。这预设乳房同作为完整对象的母亲之间有所区分。梅兰妮·克莱因夫人先谈部分对象，再谈母亲如何被确立为完整对象、并可能在儿童身上造成著名的抑郁位置，说的正是这件事。

这确实是一种看待事情的方式；但这个立场回避了一点：这两个对象并不具有相同性质。不过，无论人们是否区分它们，都仍然有这样一个事实：母亲作为施事者，由呼唤功能确立；即使只受到最粗略的把握，她也已经是一个被标记的对象，并被赋予了正或负、在场或缺席的可能性。凡是由同母亲本身相关之物造成的挫折，都是爱的挫折；而凡是来自母亲、回应这一呼唤的东西，都是赠礼，也就是不同于对象的东西。

换言之，下列两者之间存在根本差异：

- 赠礼作为爱的标志；它本身从根本上指向一个彼岸、指向另一种东西，也就是母亲的爱；

- 另一方面，则是来到这里满足儿童需要的任何对象。

爱的挫折与享乐的挫折是两件不同的事，因为爱的挫折本身孕育着此后可能构成的全部主体间关系；然而，享乐的挫折

本身根本不孕育任何这类东西。

同人们所说的相反，产生现实的并不是享乐的挫折。温尼科特先生已经很好地看到这一点——尽管仍带着分析文献中随处可见的混乱，他却毕竟看到了。我们无法凭儿童有无乳房这件事，奠定哪怕最小程度的现实发生论：如果儿童没有乳房，他就会饥饿，而且会继续哭喊。

换言之，享乐的挫折会产生什么？至多，它会重新发动欲望，却绝不会构成任何对象。归根结底，正因如此，温尼科特先生才会指出：在儿童行为中，真正可以把握、让我们阐明某种进展确已发生的东西——这种进展已经构成，并要求一种原创解释——并不是儿童仅仅因为被剥夺母亲的乳房，就制造出乳房的根本意象，甚至也不是制造出任何意象。这个意象本身必须被当作一个原创维度；那至关重要的乳头尖端，后来会受到阳具的替代与叠加。

二者在这里自己表明，它们共有一种要求我们停下来注意的特征：它们构成为意象。也就是说，持续存在、继之而来的，是一个原创维度。在儿童那里，享乐对象的挫折之后出现的，是某种作为想象关系维持在主体中的东西；它不只是像动物那里那样，使欲望的冲势受到某种诱饵极化。说到底，动物的行为总是朝向对手羽毛或鳍上的某种东西，并由它把对方构成对手；我们总能从中找到使意象在生物学中获得个体化的东西。这里无疑也有这种东西，但在人类那里，有某种可以从

儿童行为中观察到的因素进一步强化了它。

这些意象都参照那个赋予它们总体地位的根本意象，就像主体借以攀附于他者本身的整体形式。围绕这个意象，主体还可能按照归属或不

归属而聚合、解组。总之，问题并不在于：最初被设想成一种想象而理想的自体性欲的自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加工；问题反而在于

认识原初自恋在对象世界本身的构成中具有怎样的功能。正因如此，温尼科特才会停留在他所谓的“过渡性对象”上；若没有这些对象，我们不会得到任何证词，说明儿童如何能够从自身挫折出发构成一个世界，

因为儿童当然确实会构成一个世界。

但不要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围绕儿童原初受到挫折的欲望对象构成的。儿童之所以构成一个世界，是因为当他朝自己欲求的某种东西前进时，可能遇到某种会令他撞疼或灼伤的东西。然而，这绝不是一个以任何方式由欲望对象产生的对象，也不是某种会由欲望在儿童发展中的确立和组织阶段塑造的东西；它属于另一种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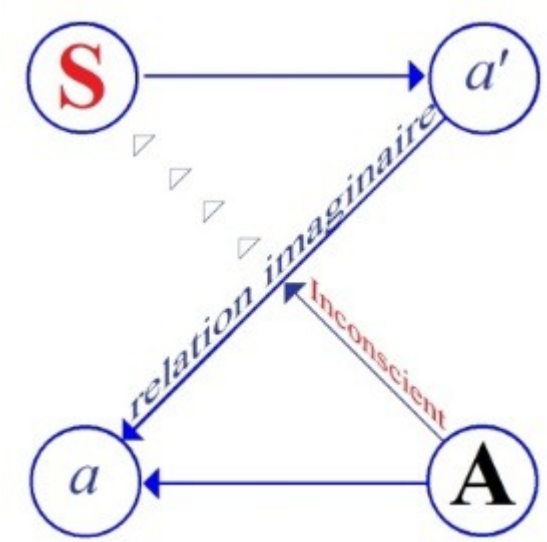
如果对象是由挫折本身产生的，我们就必须承认这项想象产物在其同身体意象的关系中具有自主性。它是处在二者之间的歧义对象，既不能说属于现实，也不能说属于非现实。温尼科特先生的表述极其恰当；与其把我们引入这个对象进入象征秩序所开启的全部问题，不如说他身不由己地来到这里，因为只要踏上这些半实在对象——他所谓过渡性对象——的道路，就不得不走向那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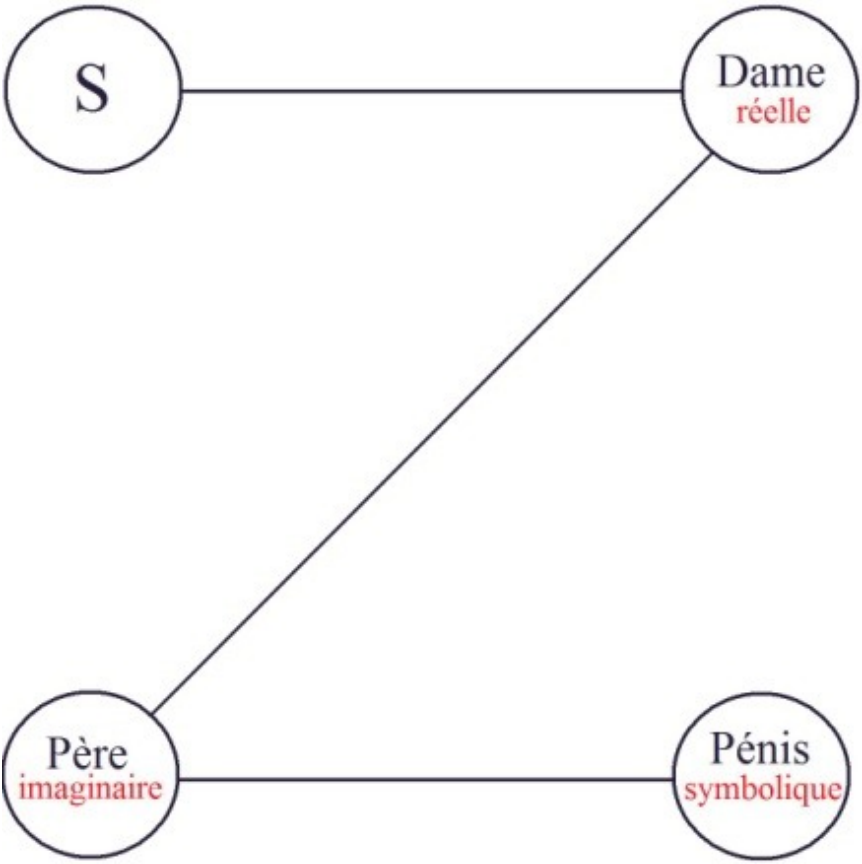
儿童通过某种攀附牢牢依恋这些对象，例如床单的一角、围嘴的一端。并非所有儿童身上都能看到它们，但大多数儿童都有。温尼科特非常清楚这些对象最终同恋物必定具有怎样的关系；他把它称作原初恋物并不正确，不过它确实是恋物的起源。他停下来告诉自己：归根

结底，这个既非实在又非非实在的对象，是某种我们既不赋予充分现实性、也不赋予完全幻觉性质的东西。

一个体面的英国公民生活在这类事物中间，预先知道应当如何行事；这里包括你们的哲学观念和宗教体系。没有人会想到指责你信奉某种宗教或哲学学说，也没有人会想到把它们从你手里夺走；这就是介于二者之间的领域。温尼科特确实没有错：生命正位于这一切之中；但如果没有它，又如何组织其余部分？他指出，人们在这里也不应要求过多。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有人才会想到质问这些事物得以确立的半存在性质：某个人被迫把自己所推崇的宗教观念或哲学幻觉强加给别人，要求他们必须依附于这个对象，并宣称它具有“铁一般坚硬”的真实性或现实性。总之，明智的世界表明，每个人都有权发疯，条件是各自单独发疯；当某个人把自己的私人疯狂强加给全部主体时，疯狂才真正开始，而每个主体都在某种过渡性对象的游牧状态中构成。

这个过渡性对象、她通过拥有孩子而取得的这根想象阴茎，同人们告诉我们的并无不同：总之，只要她照料自己的孩子，她就拥有了自己的想象阴茎。那么，她要进入第三个时刻——也就是今天不会看到的五个情境中的第二个阶段，那个恋爱少女最终抵达的位置——还需要什么？她是同性恋者，而且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她像男人那样爱。


S
a'
relation imaginaire
Inconscient
a
A



尽管译者把这里译成“女性的”，我们的女同性恋者却将处于男性位置。也就是说，第一阶段位于大他者 A 层面的父亲，如今来到自我层面，因为她采取了男性位置。这里有那位夫人，即替代孩子的爱的对象；随后还有象征阴茎，也就是爱情在最充分阐发处位于被爱主体彼岸的东西。爱情所爱的，正是位于主体彼岸之物；按字面说，就是他

所没有的东西。那位夫人没有象征阴茎，但她具备一切足以拥有它的条件，因为她是主体全部崇拜所拣选的对象；恰恰因此，她受到爱。

相关知识卡 爱是给予自己没有的东西

这里发生了一次置换：通过主体认同于父亲功能，象征父亲转入想象界。另一个东西则作为爱的对象进入自我；它恰恰拥有那个作为象征阴茎的彼岸，而后者起初位于想象层面。

我们只需指出：这两者之间发生了什么？那就是第二个时刻；这份病例观察的特征——第四个时刻还会重新出现它——在于，父亲的实在行动被引入想象关系层面，而这位象征父亲原本位于无意识中。因为，当实在孩子开始替代对阴茎的欲望时——一个将由父亲给她的孩子——，那是一个想象孩子，或者已经存在于那里的实在孩子。这个孩子是实在的，已颇令人不安；但他的父亲本人仍作为生育者处于无意识，而且孩子越实在，父亲就越是如此。

可是，父亲实际给出了一个孩子，却不是给自己的女儿，而是给了母亲。也就是说，这个由女孩在无意识中欲求的实在孩子——她曾用自己从中获得满足的替代物替代他——已经无疑显示出需要的强化，并由此赋予情境以戏剧性。实在孩子来自作为象征父亲的父亲，却被给了少女自己的母亲；主体因此以一种格外特殊的方式受到挫折。

这就是病例观察的特征。当人们说，在某个病例中，事情之所以朝倒错方向变得明确，无疑源于本能、倾向或某种原初驱力的适应时，他们是否始终清楚区分了以下三个绝对本质的要素——只要把它们彼此区分：

想象界、象征界与实在界？

你们可以在这里注意到：正是因为实在界介入——一个在想象界层面回应无意识情境的实在——，情境才由于高度结构化的理由显露为嫉妒关系。孩子曾把自己局限在一种想象满足中，而实在因素通过某种插入在想象关系层面得到实现并实际投入运作，不再只是象征父亲；这使得想象满足变得无法维持。

就在此时，另一种想象关系建立起来；女孩会尽可能把它补全，但它受到下列事实标记：原本以潜在方式衔接在大他者层面的东西，开始以倒错的方式……正因如此，它才走向倒错，而不是因为别的……

……开始以想象方式得到衔接。少女此时认同于父亲，采取父亲的角色，自己成为想象父亲；她也将保留自己的阴茎，并依附于一个对象，而她必须把这个对象所没有的东西给它。

她必须赋予自己的爱以动机，并且不把爱放在对象上，而放在对象所没有的东西上；正是这一必要性把我们带到爱恋关系本身以及赠礼本身的核心，也使这个主体历史中的第三项星丛成为必要。

下一次，我们会从这里重新接过问题。

这将使我们能够进一步深入赠礼辩证法，考察主体如何以完全原初的方式看见并体验它，也就是去看刚才搁置的另一面。我已经从对象一侧突出挫折的悖论，却还没有说明爱的挫折会产生什么，以及它本身意味着什么。

第8课 · 1957年1月23日

这册刊物中的一些文章[注1]，会让你们重新找到一种对逻辑的新尝试；你们会在逻辑所在之处，以格外鲜活的方式重新找到它，也就是在我们的实践中。

> [注1] 参见《〈失窃的信〉研讨班》，载《精神分析》第 2 期，法国大学出版社，1957 年，第 1—44 页。

准确说来，要重新接过我所暗指的东西，也就是我们著名的奇偶游戏，你们可以很容易在其中重新找到主体性的三个时刻。只要把挫折理解为对象欠缺，并思考问题的零位是什么，就很容易看出主体性同挫折相关的这三个时刻：

这就是纯粹符号之确立所形成的对立：（+）或（−），在场或缺席；其中只有一种可以对象化的游戏给定位置。

你们也很容易从这里看到第二个时刻：游戏中的声明构成一种要求；你把自己置于可能或不可能得到满足的位置，却要由另一个人来满足你。可是一旦骰子落到对方手中，他实际上就完全没有能力这样做了；他手里的结果是否回应你的要求，已经不再取决于他。

于是，这里出现了二元关系的第二阶段：它确立这项呼唤及其回应，挫折层面也建立在回应之上；你们同时还能看到它绝对易逝、按字面说不可能得到满足的性质。

如果这个游戏有什么令你感兴趣并赋予它意义，那显然是因为你引入了第三个维度，

也就是法则。你以一种在游戏运作中始终潜伏的形式引入法则：从提出要求者的角度看，问题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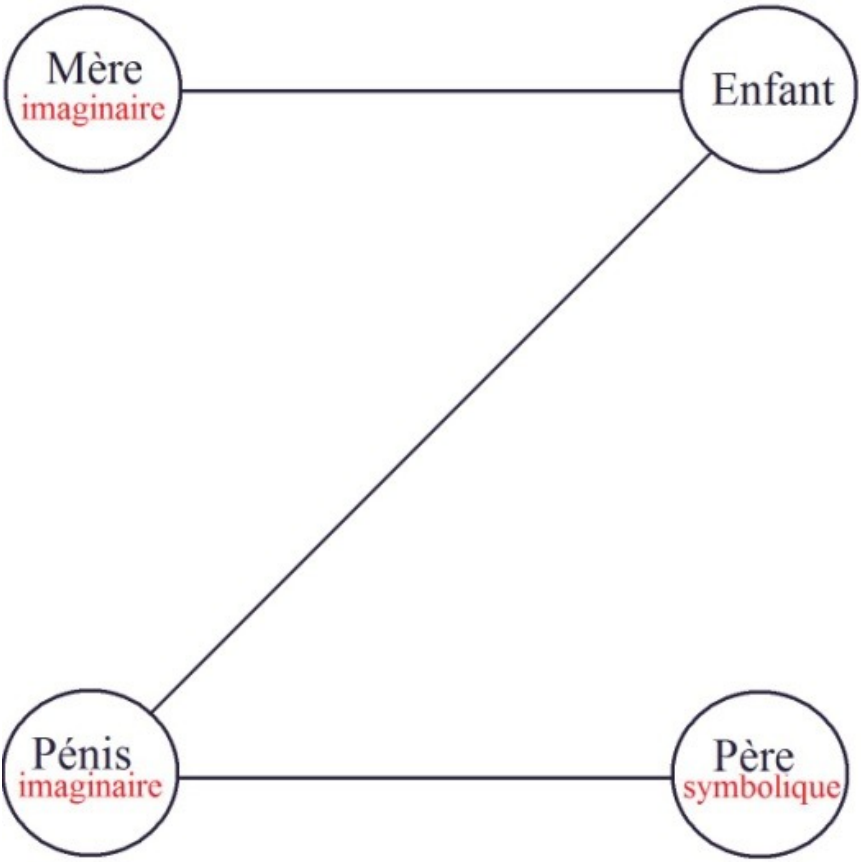
大他者显然被预设为随时向他暗示某种规律性，换言之，某条法则；但与此同时，大他者又竭力把它隐藏起来。人们把某条法则、某种规律性设想为可能；每个时刻，提出游戏隐藏部分的人都把它藏起，却又一瞬间暗示它正在诞生。游戏中最根本并赋予它主体间意义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法则确立的维度中建立起来；由此，游戏不再处于二元而进入本质性的三元维度。

我的引言的价值正立足于这一点：要让某种类似法则的东西开始得到衔接，必须引入三项。我们试图在这三个主体间时刻中观察这个对象如何得到引入；仅仅因为它在分析实践中来到我们触手可及、受我们管辖的位置，它就成为一个必须进入象征链条的对象。

上一次，我们讲到女性同性恋病例时，正抵达这里。我们抵达我所谓的“第三个时刻”，也就是以下述方式构成的时刻。在被我们任意选作起始情境的第一种情境中，这种按时间顺序安排各项、从过去走向未来的做法，已经对进步主义视角作出某种让步；这样做只是为了简化，使它接近人们在挫折辩证法中所做的事情。对挫折的粗略设想——不区分实在、想象与象征层面——会导向僵局；我们越向前，我越希望让你们感受到这些僵局。眼下，我们正在尝试确立对象与象征链条构成之间的关系所遵循的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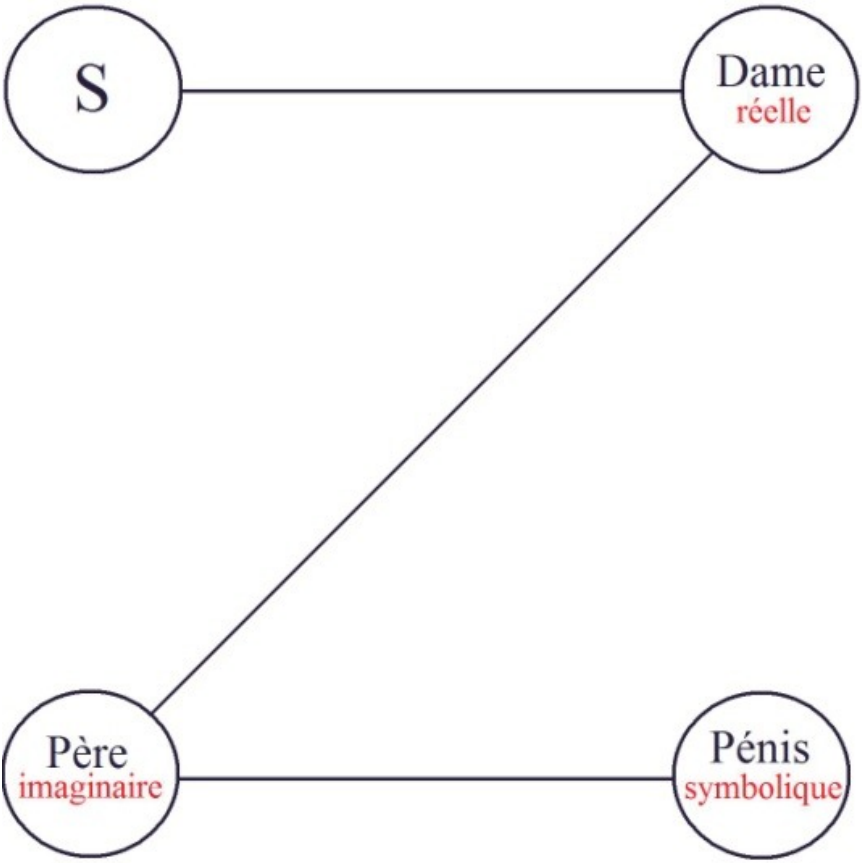
因此，我们先看到少女仍处于青春期时的位置。她的位置最初以经典方式得到象征与想象的结构化，正如理论所规定的，建立在想象阴茎—孩子这一等价关系中。这使她相对于作为彼岸的父亲，处在某种想

象母亲关系里；父亲此时作为象征功能介入，也就是作为能够给予阳具的人介入。父亲的这项权能在当时处于无意识中，能够给出孩子的人是无意识的。



可以说，就在这个阶段，致命时刻发生了：父亲在实在界中介入，把一个孩子给了母亲。这样一来，父亲就让这个少女同其处于想象关系的孩子实际得到实现；因此，她再也无法在自己原先确立他的想象位置上支撑他。

我们现在来到第二个时刻：实在父亲在她当时因未能得到而受挫的孩子这一层面介入，使整个等式发生转化；从此，它表述为：想象父亲、那位夫人、象征阴茎。



也就是说，通过一种翻转，原本属于象征秩序、也就是她同父亲之间的关系，转入想象关系的方向；或者，如果你们愿意，也可以说，她第一个平衡中的无意识公式关系，以某种方式被投射到一种倒错关系中，投射到她同那位夫人之间的想象关系中。这样，在首次运用我们

的公式以后，这些项的位置便以一种无疑仍是谜、甚至值得我们稍作停留的方式呈现。然而，应当注意，无论这些项是什么，它们都会强制显现；我的意思是，它们强制规定一种结构：只要改变其中一项的位置，就必须把其他所有项放到别处，而且绝不能随意安置。

现在，让我们试着看清这意味着什么。分析已经向我们给出它的意义。在这份病例观察的关键时刻，弗洛伊德怎样告诉我们？他对所涉位置作出特定设想，沿这个方向介入，并由此以某种方式使自己同病人之间的位置结晶；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弗洛伊德承认并断言，分析关系就在此时断裂。无论弗洛伊德自己怎么想，他远没有把全部责任归到病人位置的僵局上；不管怎样，他自己的介入、构想和对这个位置的成见，必定对情境断裂有所影响。

让我们回想这个位置是什么，以及弗洛伊德如何表述它。他告诉我们，病人的阻抗无法克服。他怎样使这些阻抗取得实体？举了哪些例子？赋予它们什么意义？他尤其看到阻抗表达在一些梦中；悖论的是，这些梦本可以带来很大希望，即

情境正常化的希望。事实上，这些梦只涉及结合、婚配和富有生育力的婚姻。

在梦里，病人顺从于一个理想配偶，同他生育孩子。总之，梦表现出的方向，正是——即使未必是弗洛伊德本人，也是这里由家庭代表的社会——对治疗结局所能抱有的最好愿望。根据病人告诉他的有关自身位置和意图的一切，弗洛伊德没有按字面接受梦的文本，

而只在其中看到——如他所说——病人的诡计，一种专门为了使他失望而制造的东西。更准确地说，就像我刚才谈到主体间猜测游戏时所说的，它同时要让他产生幻想和幻灭。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弗洛伊德指出的，这预设人们此时可能反驳他："那么，无意识也会说谎了！"弗洛伊德长久停留在这个问题上，对它展开讨论，并小心作出一套充分衔接的回答。

他重新接过《梦的科学》中对前意识与无意识的区分，并展示了自己在另一份病例观察中也曾重提的东西……我们以后会谈到那个病例；在拉加什的移情报告之后，我曾作过一次简短介入，概括我认为应当怎样设想朵拉病例中的各个位置……在朵拉病例中，必须抽出《梦的解析》的一段文字；它用一个比喻说明

无意识欲望与前意识欲望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资本家与企业家的比喻。

可以说，前意识欲望是梦的企业家；但如果没有另一种欲望为梦提供底本——也就是无意识欲望——，梦便没有足够资源把自己确立为所谓无意识之物的代表。

因此，他清楚区分了这一点，只是没有由此推导出最终后果。总之，下列两者彼此有别：

- 主体在梦中带来的、属于无意识层面的东西；
- 以及二元关系的因素，即讲述梦、在分析中处理梦时，主体同自己言说对象之间的关系。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告诉你们：分析过程中产生的梦总带有朝向分析家的某种指向，但这项指向未必总是无意识的指向。全部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应当把重音放在：

- 属于意图层面的东西上；弗洛伊德告诉我们，这些始终是病人公开承认的意图，即同父亲玩游戏。病人最终把这场欺骗游戏表述出来：假装接受治疗，却维持自己的位置以及对那位夫人的忠诚；

- 还是说，梦中表达的东西应当纯粹而简单地从欺骗视角，也就是从它在前意识层面的意图化来设想？

看来并非如此。因为仔细观察，我们会看到什么得到表述？

其中无疑有一套欺骗辩证法；但还原到能指以后，得到表述的，恰恰是第一个位置中原初遭到转向的东西。在那个阶段的无意识中——因此也在第三阶段的无意识中——，它就是以下公式：这条消息来自父亲……主体以自身消息的颠倒形式接收自己的消息，形式是："你是我的妻子""你是我的主人""你会为我生一个孩子"……在进入俄狄浦斯情结时，或者只要俄狄浦斯情结尚未解决，这就是女孩进入俄狄浦斯情结所依据的承诺；她的位置正从这里出发。

事实上，如果我们在梦中发现某种被衔接成实现这项承诺之情境的东西，那么，显现的仍然是同一项无意识内容；弗洛伊德之所以在它面前犹豫，恰恰因为没有抵达关于移情是什么的充分纯化表述。

移情中有一个想象要素和一个象征要素，因而必须作出选择。如果移情具有一种意义……如果弗洛伊德后来以 Wiederholungszwang［重复强迫］观念带给我们的东西——我曾用整整一年围绕它展开，向你们

表明它可能意味着什么——具有一种意义……那么，首先且唯一的理由，就是象征链条本身具有其特有的坚持。依定义，主体并不承担象征链条自身的这种坚持。

然而，仅仅因为它在第三阶段重新产生、作为持续存在之物来到那里，并在一个梦中得到表述，那么，即便这个梦在想象层面——即同治疗者的直接关系中——显得具有欺骗性，严格说来，它仍然、而且只有它，才是严格意义上移情的代表。

如果弗洛伊德的移情观念没有那么摇摆，他就本可以凭一种有充分根据的大胆，在这里放心信赖梦，并在准确设想以下两点的条件下作出介入：

- 移情本质上发生在象征衔接层面；
- 当我们谈论移情，当某种东西因分析家成为移情的场所而取得意义时，恰恰涉及象征衔接本身。……当然，这发生在主体承担它以前；因为这恰恰是一个移情之梦。

弗洛伊德注意到，此刻终究发生了某种属于移情秩序的东西；只是，他既没有由此得出严格后果，也没有采取正确的介入方法。我之所以指出这件事，是因为它其实并不只值得在这个特定病例中留意。我们还有另一个病例，问题以同样方式在同一层面打开，只不过弗洛伊德犯了正好相反的错误；它恰恰就是朵拉病例。

可以说，这两个病例取得了绝妙平衡，严格相互交叉；而且不只是

因为其中发生了：

- 在一个病例中，象征位置同想象位置朝一个方向发生混淆；
- 在另一个病例中，混淆则发生在相反方向。 可以说，在各自的完整星丛中，这两个病例严格彼此对应，只是其中一方相对于另一方以正片与负片的形式组织起来。我甚至可以说，没有什么能比它们更好地说明弗洛伊德的公式：“倒错是神经症的负片。”不过，这还需要展开。

让我们快速重提朵拉病例中的各项，因为它们同当下星丛中的项具有共同之处。在朵拉病例的最前景，我们看到完全相同的人物：一位父亲、一个女儿，还有一位夫人——K　夫人。更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全部问题也都围绕那位夫人旋转；尽管这件事在女孩的呈现中对弗洛伊德有所遮蔽。她是一个小歇斯底里者，因为出现过一些无疑较轻、却仍特征鲜明的症状而被带到弗洛伊德那里。

相关知识卡 朵拉个案中的第二个梦与“阴茎嫉妒”

尤其是，在某种近似自杀示威或自杀意图的事情终于令家人惊恐以后，情境变得无法忍受。女孩被带到弗洛伊德那里时，父亲把她呈现为病人；毫无疑问，来到求诊层面这件事本身就标示出：在此前一直以某种平衡维持情境的整个社会集合中，危机已经发生。

不过，这种奇特平衡早在两年前就已破裂。最初向弗洛伊德隐瞒的位置是：父亲以 K 夫人为情妇，而这个女人嫁给一位叫 K 先生的人；他们同父女组成的一对生活在某种四元关系中，母亲则不在情境里。

随着我们不断深入，已经看到这同年轻女同性恋者情境的反差：在后一个病例中，母亲在场，因为她正是夺走父亲对女儿的关注、引入实在挫折要素的人；这个要素最终决定了倒错星丛的形成。

然而，在朵拉病例中，是父亲引入那位夫人，并且看来把她维持在那里；在女同性恋病例中，则是女儿引入她。这个位置中最醒目的，是朵拉立即向弗洛伊德表达了自己极为强烈的索偿：她指控这段关系夺走了父亲对自己的爱，并立刻向弗洛伊德表明，她一直在追踪这段关系的存在、持续与优先地位，如今已无法再容忍；她的全部行为都表现出面对它时的索偿。弗洛伊德迈出了精神分析经验第一步之严格辩证性质中最具决定性的一步，把她带回如下问题：

相关知识卡 朵拉个案中的第二个梦与“阴茎嫉妒”

“您把这件事当作一种紊乱而奋起反抗，但您自己难道没有参与其中吗？”

事实上，他很快就揭示：直到某个关键时刻，朵拉本人一直以最高效的方式支撑这个位置。她对这个奇特位置远不只是纵容，而真正是它的枢纽：

- 她仿佛保护父亲与那位夫人私下独处；
- 在某些情况下，她甚至替代那位夫人履行其职能，例如照顾孩子；
- 另一方面，随着我们更加深入地把握病例的观念和结构，她甚至表现出同那位夫人的格外特殊的纽带：她是那位夫人的知己，看来还同她进行了极其深入的私密交谈。

这个病例如此丰富，至今仍可从中有所发现；这次快速回顾绝不能代替细读病例。顺带指出，两次症状之间有一段九个月的间隔；弗洛伊德认为自己发现了它，因为病人以象征方式把它给了他。然而，仔细查看就会发现，病例观察中实际涉及的是十五个月。而这十五个月具有意义，因为“十五”这个数字在病例中随处可见；它以数字和纯粹象征价值为基础，对理解病例颇有用处。

今天，我只能向你们重提整份病例观察中全部问题以哪些术语提出：

- 不只是弗洛伊德事后才发现，他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病人阻抗承认她同 K 先生之间存在爱恋关系——弗洛伊德以自己的坚持与权威的全部重量向她暗示这种关系；

- 你们在整份病例观察中读到的不只是这一点；

- 也不只是弗洛伊德在注释中事后指出，这里无疑出现了一项错误：他本应理解，对 K 夫人的同性恋依恋，才是她原初位置得以确立以及我们即将抵达的危机所具有的真正意义；

- 也不只是弗洛伊德事后承认这一点。贯穿整份病例观察，弗洛伊德对于朵拉欲望的实在对象始终处在最大的歧义中。

这里，我们又一次处在一个可能表述这种仿佛仍未解决之歧义的问题位置。K 先生本人对朵拉具有完全占优势的重要性，而且她同他之间显然建立了某种力比多纽带。与此同时，属于另一种秩序的某种东西显然也具有极大重量，始终在同 K 夫人的力比多纽带中发挥作用。

怎样才能以一种足以说明整场经历的进展、危机以及平衡断裂点的方式，同时设想二者；

既说明这场经历如何推进，也说明它为何在那个时刻停下？五年前，我首次批判或处理这个问题和病例观察时，就依照

歇斯底里者的结构指出：

- 歇斯底里者是通过代理人去爱的人；你们可以在大量歇斯底里病例观察中重新找到这一点；
- 歇斯底里者的对象是同性对象，而她通过认同于一个异性者来接近这个同性对象。

这是从临床角度对病人的第一步处理。随后我还走得更远，从自恋关系的概念出发，因为：

- 它奠定自我；
- 它是那个名为自我的想象功能得以构成的母体。……我曾说，我们最终可以从病例观察中找到这方面的踪迹：正因为朵拉的自我——仅仅是自我——认同于一个男性人物——我说的是整个四人舞情境——，正因为她就是 K 先生，男人们对她而言都是其自我可能形成的结晶，情境才可以得到理解。换言之，她通过 K 先生、作为 K 先生，依恋于 K 夫人这个人物；这发生在由 K 先生人格构成的想象点上。

我当时还走得更远，说：K　夫人是一个重要人物，为什么？她并不只是众多对象选择中的一个，也不只是一个可以被说成得到自恋功能投

注的人——这种功能处在一切爱恋的根底。如梦所显示的——整份病例观察的核心重量都落在这些梦周围——，K 夫人就是朵拉的问题。

现在，让我们试着用目前的表述转写这一点，并在基本图式中定位这个四元组里的各项怎样得到安排。朵拉是一名歇斯底里者，也就是说，她已经来到俄狄浦斯危机层面，并且在这场危机中既能够、又不能够完成跨越。这里有一个理由：与女同性恋者的父亲相反，她的父亲是阳痿的。整份病例观察都建立在父亲阳痿这个中心概念上。

因此，这恰好提供了一个格外典范的机会，让我们突出父亲本身的功能相对于对象欠缺可能是什么：女孩通过什么进入俄狄浦斯情结？父亲作为赠予者可能发挥怎样的功能？

换言之，这个情境建立在我讨论原初挫折——也就是可能确立在儿童与母亲关系中的挫折——时所作的区分上。对于对象而言：

- 遭受挫折以后，对它的欲望仍然持续；
- 对象属于主体的所有物；
- 挫折只有在这个对象于挫折之后继续存在的限度内才有意义。
  ……必须把这一点同母亲在这里介入的方式区分开来；后者属于另一个界域：
- 她给予或不给予；
- 这份赠礼是或不是爱的标志。

这里的父亲被设定成在象征上给予这个缺失对象的人。但他在此并未给予，因为他自己没有。父亲的阳具性缺失作为一条绝对根本的构成性音符，贯穿整份病例观察，

也贯穿这个位置。那么，我们在这里是否又一次只处于单一层面？也就是说，整场危机是否纯粹而简单地只相对于这项缺失建立？让我们看看问题究竟是什么。

什么叫给予？换言之，当对象可以被给予或不被给予，从而把客体关系提升到象征程度时，其中引入了怎样的维度？再换句话说，被给予的真的是对象吗？

相关知识卡 爱是给予自己没有的东西

朵拉病例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极具典范性的出路：她没有在象征上从这位父亲那里领受男性赠礼，却仍深深依恋他；这份依恋如此之深，以至于她的历史恰恰从俄狄浦斯情结退出的年龄开始，伴随一系列歇斯底里事故。这些事故明确联系于她对父亲的爱的表现；而父亲此时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明确、决定性地显现成一个受伤而患病的父亲，一个其生命权能本身都受到打击的受创父亲。

相关知识卡 朵拉个案中的第二个梦与“阴茎嫉妒”

她对父亲的爱在此刻恰恰同父亲的减损处于严格相关、范围相同的关系中。因此，我们看到一个极其清晰的区分：在爱恋关系中介入的东西，作为爱的标志受到要求的东西，永远只是某种仅仅作为标志才有价值之物。甚至可以再走一步：没有比赠出自己没有的东西更大的赠礼，也没有比它更大的爱的标志。

不过，请清楚注意：赠礼维度只有随着法则引入才存在；全部社会学思考[注2]都向我们断言并确立，赠礼是一种流通之物。

> [注2]　参见马塞尔·莫斯《论赠礼》，载《社会学与人类学》，法国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另参见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马塞尔·莫斯著作导论》。

相关知识卡　爱是给予自己没有的东西

你赠出的赠礼，总是自己曾经收到的赠礼。不过，在两个主体之间，这个赠礼循环仍来自别处；因为建立爱恋关系的，是这份赠礼可以说无所为而给出。

“以无换无”是交换的原则；同一切有“无”介入的公式一样，它也是一个歧义公式。

这个“以无换无”看似正是利益的公式，却也是纯粹无偿性的公式。爱的赠礼中，实际只有某种“无所为”而给予的东西，而它只能是“无”。换言之，只有主体无偿给出某种东西，只有他给出的东西背后有自己所缺的一切，才有原初赠礼。人类交换起源处以“夸富宴”形式实际运作的赠礼也是如此：构成赠礼的，是主体献祭出超出其所有物的东西。

请你们注意：如果我们假设有一个主体，自身承载着所有可能的财富和全部富饶，仿佛达到一个人可能拥有之一切的最大圆满，那么来自这类主体的赠礼，按字面说根本不会具有爱的标志之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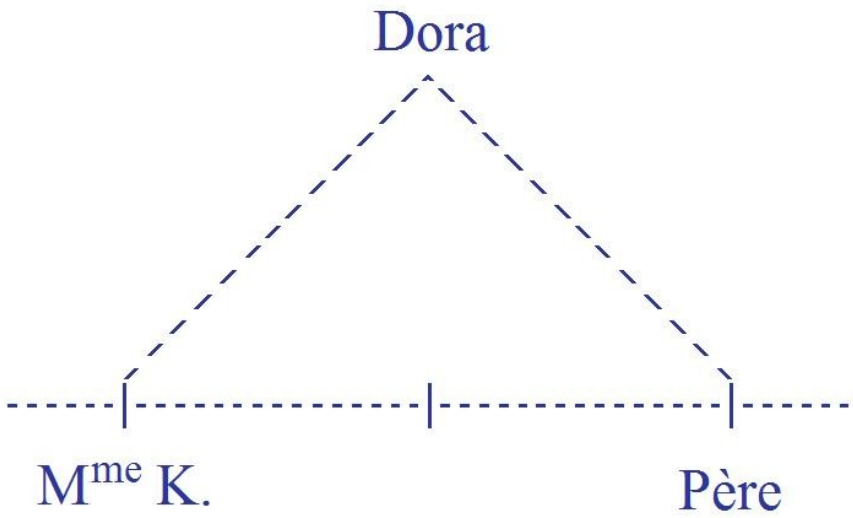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爱是给予自己没有的东西

信徒之所以可能设想自己能够爱上帝，是因为上帝被预设为自身确实拥有这种全然充盈和圆满。不过，即使这种承认对任何东西来说都可以设想，但面对那个把如下东西置于一切信仰根底的人，事情显然如

此：只要这个被预设为完整总体的存在者仍被设想成存在者，那么它无疑就缺少存在中最重要的东西，也就是实存。

也就是说，在相信上帝完全、全然慷慨的信仰根底，始终有某种上帝所缺的、不可名状的东西，使我们仍然能够假设他并不存在。没有任何理由去爱上帝，除非也许他并不存在。可以确定的是，朵拉爱父亲时恰恰处在这个位置：她正因为父亲没有给她的东西而爱他。

离开这个一直维持到最后的原初位置，整个情境便不可设想；但我们必须理解：父亲在朵拉面前投入另一个东西，而这个东西甚至看来是由朵拉促成的，那么她如何能够支撑和容忍这个原初位置？整份病例观察都建立在我们拥有的三项上：父亲、朵拉、K 夫人：



整个情境仿佛围绕朵拉必须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建立：“我的父亲爱 K 夫人的什么？”K 夫人呈现为父亲在她自身彼岸所能爱的某种东西；而朵拉依恋的，正是父亲在另一个女人身上、在这个她不知道究竟是什么

的他者身上所爱的这个东西。这完全符合阳具对象的全部理论所预设的内容：女性主体要进入象征秩序的辩证法，就必须通过某种作为阳具赠礼的东西进入；她不可能以其他方式进入。

因此，这预设实在需要——弗洛伊德没有否认它；它属于女性器官本身，属于女人的生理机能——从来不会在欲望位置的建立之初直接得到给予。欲望以阳具为目标，因为阳具必须作为赠礼得到领受；为此，它必须被提升到缺席或在场之赠礼的层面。此外，正因为被提升到赠礼对象的尊严，阳具才使主体进入交换辩证法；后者将把所有这些位置规范化，甚至包括奠定交换整体运动的根本禁令。弗洛伊德从未想过否认同女性器官本身相联系的实在需要确实存在；但它只会在这套结构内部取得位置，并且可以说在侧面得到满足。

然而，这项需要从未作为有意义之物得到象征定位；它本质上始终对自身构成问题，被置于某次象征跨越之前。而症状的全部展开和这份病例观察的全部进程，处理的恰恰就是这件事。朵拉问自己：“女人是什么？”K 夫人体现了女性功能本身，因而对朵拉来说，K 夫人就是

她把自己作为问题投射其中之物的表象。朵拉自己走在同 K 夫人发生二元关系的道路上；换言之，K 夫人是在朵拉彼岸受到爱的东西。总之，朵拉之所以觉得自己同这个位置利害相关，是因为 K 夫人仿佛在她自身的彼岸受到爱。

朵拉无法知道或认识这个情境，而 K 夫人实现了其中朵拉找不到自己位置的东西；正因为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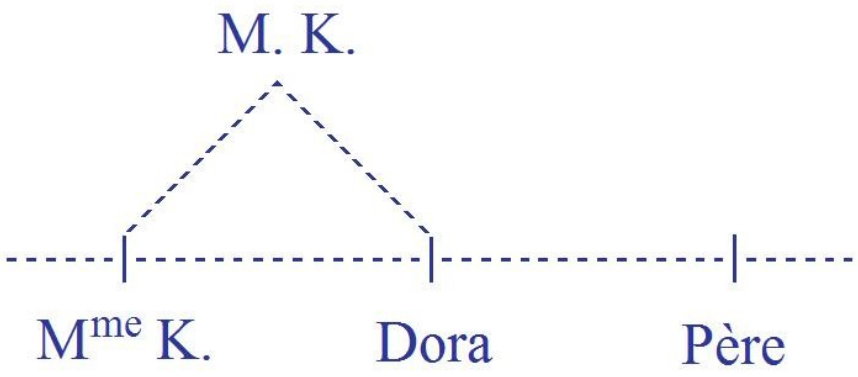
- 爱是在一个存在者身上爱某种超出其所是的东西；归根结底，就是爱这个存在者身上所缺少的东西。对朵拉而言，爱位于她父亲与 K 夫人之间的某处；

- 因为父亲爱 K 夫人，朵拉便感到满足；当然，条件是这个位置得到维持。

此外，这个位置还以千万种方式得到象征化：阳痿的父亲用一切象征赠礼——包括物质赠礼——补偿自己无法实现的男性在场；他实际使朵拉顺带从中受益，把各种慷慨馈赠同时分给情妇和女儿。

他以这种方式使朵拉参与这个象征位置。不过，这仍然不够；朵拉试图恢复、重建一条通往反向表现位置的道路。我的意思是，她不再面对父亲，而是面对眼前的女人——K 夫人——，试图重新建立一个三角情境；K 先生由此介入，

也就是说，通过他，三角形确实可能闭合，只不过处在一个翻转后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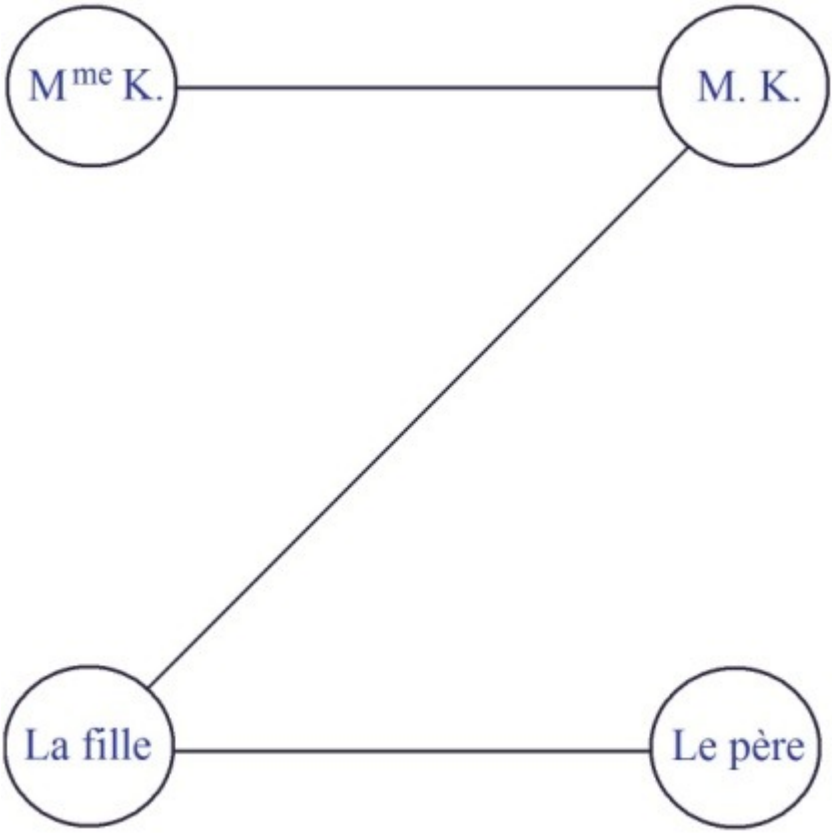
因为自己的问题关系到切身利益，朵拉会把 K 先生视为一个参与 K 夫人在场之问题面向的人；在病例观察中，这种参与得到一个极其明显的象征联想表达，也就是对《西斯廷圣母》的崇拜。

K 夫人是周围所有人崇拜的对象；归根结底，朵拉正是通过参与这场崇拜而相对于她定位自身。K 先生则是朵拉试图让男性要素重新进入回路、从而把这个位置规范化的方式。事实上，正当 K 先生告诉她……

并不是追求她或爱她，甚至不是以一种歇斯底里者无法忍受的方式接近她……

……而是当他说“Ich habe nichts an meiner Frau.［我的妻子那里没有什么。］”时，她扇了他一记耳光。

重要的要素是：K 先生在某个时刻作出一句具有格外鲜活意义的声明——只要我们把“无”这个词的全部分量与意义赋予它，德语原句尤其富有表现力。总之，他说出某种使自己退出如此构成的回路之物；这套回路在其秩序中建立如下：



朵拉完全可以接受：父亲在她身上并通过她，爱那个彼岸的 K 夫人。然而，K 先生要在这个位置上变得可以容忍，就必须占据恰好相反而取得平衡的功能：朵拉本人必须在他的妻子彼岸受到他的爱，而他的妻子对他必须仍然是某种东西。这个某种东西，就等同于彼岸必须存在的那个无；在这里，彼岸就是朵拉。

如果 K 先生告诉她，自己妻子那一侧没有什么，那么德语中的这个介词“an”便在这项特殊关系中清楚表明：他说的并不是妻子对他来说什

么都不是，而是“那里没有什么”。“An”出现在千万种德语表达中；这里特有的德语公式表明，an 是在所缺之物的彼岸添上的东西。我们在此重新找到的恰恰就是它；K 先生的意思是，他妻子之后什么也没有：我的妻子不在这个回路中。

这会产生什么后果？朵拉无法容忍它：也就是说，K 先生对朵拉感兴趣，只因为他唯一感兴趣的就是朵拉。整个情境随即破裂。如果 K 先生只对她感兴趣，那就意味着她父亲只对 K 夫人感兴趣；

此时，她再也无法容忍。为什么？

可是在弗洛伊德看来，她确实进入了一个典型情境；正如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先生在《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中所解释的，婚姻纽带的交换恰恰是：“我得到一个女人，也就欠出一个女儿。”然而，这项确立交换与法则的原则，纯粹而简单地把女人变成交换对象；她自身没有凭借任何东西被整合进来。

换言之，如果她自己没有放弃某种东西——准确说，就是被设想成赠礼对象的父亲阳具——，那么从主体角度看，她就无法设想任何不是从别人、也就是从一个男人那里领受的东西。

只要她被排除在赠礼与法则的这项最初确立之外，被排除在爱的赠礼的直接关系之外，她就只能在觉得自己纯粹而简单地被缩减为对象的情况下体验这个情境。

此刻发生的正是这种事。朵拉彻底反抗，开始说：“我父亲把我卖给别人。”就情境仍维持在这种半明半暗的状态而言，这确实是对它清楚而完美的概括。可以说，丈夫——也就是 K 先生——多年来在某种蒙着

面纱的宽容中追求朵拉；让他这样做，确实成了为丈夫的纵容付出的代价。因此，K 先生承认自己并不属于朵拉能够在其中认同于他、也不属于朵拉可以认为自己是 K 先生在其妻子彼岸之对象的回路——朵拉原本正通过这个女人同他相连。正因为这些纽带断裂——它们无疑微妙而歧义，却在每个层面都有完全明确的意义与方向——，朵拉才再也无法在回路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除非以一种极不稳定的方式。

然而，她确实以某种方式找到了它；情境之所以失衡，始终都因为这些纽带断裂。朵拉看到自己跌落到纯粹对象的角色，随即开始索偿某种她原本完全愿意认为自己一直在领受——甚至通过另一个女人领受——的东西，也就是父亲的爱。

从此以后，她开始排他地索偿这份爱，因为它已被彻底拒绝。分别牵涉朵拉和我们的“女同性恋者”的这两个界域、这两个情境之间，显现出怎样的差异？

为了快速推进，并以一个形成鲜明图景的东西结束，我先告诉你们下面这点，稍后我们还会加以确认。如果我们的女同性恋者在无意识中维持的是父亲的承诺——“你会为我生一个孩子”——，而她对那位夫人的崇高之爱又如弗洛伊德所说，展示了绝对无私、无所为之爱的范型，那么，你们难道没有看出：在第一个病例中，一切仿佛都在表明，女孩想向父亲展示真正的爱是什么，也就是她父亲曾拒绝给她的那种爱。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年轻女同性恋者”病例与拉康的结构重读**

毫无疑问，父亲就这样卷入了主体的无意识；这无疑是因为他从母亲那里获得了更多好处。事实上，这项关系在儿童每一次进入俄狄浦斯情结时都具有根本性，也就是成年竞争者压倒性的优势。

她向父亲展示的是：人不仅可以因为另一个人拥有的东西而爱他，而且按字面说，还可以因为他没有的东西而爱他。她爱的是那根象征阴茎；她非常清楚，自己不会在那位夫人那里找到它，因为她很清楚它在哪里——在并不阳痿的父亲那里。

换言之，在这个病例中，倒错表达自身的方式是在字里行间，通过对照和暗示。它谈论完全不同的事情，却由于投入运作的各项所形成的严格序列，必然包含自己的对应面，也就是主体想让他者听见的东西。换句话说，你们在这里重新找到我从前向你们提出、取最广意义的转喻：通过谈论完全不同的东西，让人听见某种东西。如果不能在全部普遍性中把握转喻这个根本概念，你们就不可能形成任何关于倒错在想象界中可能意味着什么的观念。

相关知识卡 欲望的转喻性

这类转喻是虚构和艺术秩序中一切所谓现实主义的原则，因为现实主义按字面说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一部小说若只由大量本身毫无意义的细小特征组成，便没有任何价值；除非它恰恰使某种在彼岸具有意义的东西产生和谐共振。伟大小说家之所以可以忍受，是因为他们着力展示的一切并不是以象征、更不是以寓言方式取得意义，而是通过他们使之从远处回响的东西取得意义。电影也是如此。主体的倒错功能同样是一项转喻功能。

但对作为神经症者的朵拉来说，事情相同吗？完全不同。从图式可见，在倒错中，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有意义的行为；它指向能指链条上更远处的一个能指，因为二者通过一个必要能指相连。而在朵拉病例中，作为主体的朵拉步步把自己安置到链条中的若干能指之下；按字面说，

K　夫人就是她的隐喻。因为朵拉说不出自己是什么、有什么用，也说不出爱有什么用；她只知道爱存在，并为它找到一套历史化叙事。她在其中以一个问题的形式找到自己的位置；她全部梦的内容和衔接都围绕这个问题，而珠宝盒等意象并不意味着别的东西。

正因为朵拉追问作为女人意味着什么，她才以自己的方式表达——通过症状表达。这些症状是能指要素；不过，其下始终流动着一个不断变化的所指，也就是朵拉卷入这些症状、同它们发生利害关系的方式。朵拉的神经症正是作为隐喻取得意义，也能够得到解开。弗洛伊德却恰恰介入这个隐喻，企图强行压实那个在整个隐喻中试图重新进入的实在要素，对她说："你爱的准确说来就是这个。"当然，K　先生投入运作，使情境中的某种东西趋向正常化；但它仍然处于隐喻状态。证据是，弗洛伊德凭借自己对意义那种惊人的直觉，确实可以认为：同 K 先生断裂的危机以后，朵拉发生了某种近似受孕的东西；而实际发生的，是一种奇特的能指性流产。

弗洛伊德认为是"九个月"，因为朵拉自己说"九个月"；她由此亲自承认，这里仿佛发生了某种怀孕。然而，真正有意义的，是在此之后、在对朵拉而言正常应被称作分娩期限过去以后，她才看到自己同 K 先生仍然系结之物的最后回响。事实上，我们在这里以特定形式看到某

种交媾等价物；它转写在象征秩序中，而且纯粹以隐喻方式转写。再一次，症状在这里只是一个隐喻，只是一次试图重新连接

象征交换法则的尝试——同那个会与自己结合或分离的男人重新连接。

相反，在另一个病例里、在女同性恋者来到弗洛伊德手中以前，那份病例观察的结尾同样发生了一次分娩：实在父亲再次介入，向她表现自己的恼怒与盛怒；同她在一起的女人又作出制裁，告诉她不愿再见她。就在这时，她突然从一座铁路小桥上跳下。

相关知识卡 弗洛伊德“年轻女同性恋者”病例与拉康的结构重读

此刻，少女已经绝对失去最后的动力。此前，她本应得到的东西——父亲阳具——已经令她遭受相当大的挫折，但她仍找到一种办法，通过这段想象关系维持欲望。到了这时，那位夫人拒绝了她，她再也无法支撑任何东西：对象已经彻底丧失；她原本把自己确立在那个“无”中，向父亲展示人可以怎样去爱，但这个“无”如今也失去存在理由。就在这一刻，她自杀了。

然而，弗洛伊德向我们强调，这还有另一种意义：它意味着对象的最终丧失，也就是那根被断然拒绝给予她的*阳具**坠落了——niederkommt*。这既具有最终剥夺的价值，也同时模仿了一种象征分娩。

你们会在这里重新找到我所说的转喻面向：当她同那位夫人和父亲的关系来到关键终点，从铁路桥上纵身跃下；弗洛伊德可以把这项行动解释成一种示范方式——她把自己变成那个未曾拥有的孩子，同时又

在最后一项有意义的对象行动中毁灭自己。这样的解释只以 niederkommt 一词的存在为基础；这个词以转喻方式标出最终之项，

相关知识卡 欲望的转喻性

标出自杀的主题；我们所讨论的女同性恋者，其整套倒错唯一的动力正表达在这个主题中……这符合弗洛伊德就某一类女性同性恋的发病机制反复断言的一切……也就是对父亲的一种稳定且格外强化的爱。

第9课 · 1957年1月30日

继续思考对象，今天我要向你们提出由此可以推导出的东西，它涉及一个格外尖锐地使对象问题取得实体的问题：恋物与恋物癖。你们将会看到，我最近试图带给你们的根本图式——它们尤其表达在这些悖论性的断言中：在对象中受到爱的是它所缺少的东西；还有，人只给予自己没有的东西——

相关知识卡 爱是给予自己没有的东西

这个根本图式包含一个事实：无论象征交换朝哪个意义运作，对象的彼岸始终具有构成性。它使我们可以从新视角出发，以不同方式确立这种倒错的根本等式；在分析理论中，这种倒错取得了典范角色，它叫作恋物癖。

早在弗洛伊德处理恋物癖问题的两篇根本文本中——它们分布于 1904 至 1927 年之间[注1]——

> [注1]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性学三论》（“Drei Abhandlungen zur Sexualtheorie”），原注标为 1904 年；另一篇为 1927 年《恋物癖》。

——后来还有其他人重新处理问题，但最珍贵的仍是这两篇：一篇《性学三论》，另一篇《恋物癖》——，弗洛伊德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个恋物是某种东西的象征；不过，他接下来告诉我们的内容，无疑会让我们感到失望。

自从人们谈论分析、弗洛伊德谈论恋物以来，已经就这个恋物说了很多。这个某种东西又一次将是阴茎。但弗洛伊德紧接着就强调：并不

是随便哪一根阴茎。他带给我们的这项限定，似乎几乎没有按照其结构底蕴得到利用；初读时，它天真地包含的一些根本预设也没有受到开发。

这个恋物不是随便哪一根阴茎；总而言之，它不是实在阴茎：

- 它恰恰是女人拥有的那根阴茎；
- 也就是说，确切因为她并不拥有它。

我要强调这个摇摆点；我们必须在它周围停留片刻，察觉通常遭到回避、而我们绝不能回避的东西。对于不使用我们这些钥匙的人，这只是对实在界的误认问题。也就是说，这只是女人没有的阳具；出于儿童同现实之间那种可疑关系所导致的某些理由，她非得拥有它不可。

这是通常的道路，惯常支撑着关于恋物癖的未来、发展与危机的各种推测。我广泛阅读关于恋物癖的全部著述后已经能够确认：恰恰是这条道路把人引向各种僵局。

这里同往常一样，我尽量不在分析文献的这片森林中过度铺陈。因为说到底，这里有某种不只需要耗费数小时，而且为了有效完成反倒要求限制阅读范围的东西；

没有什么比辨认材料准确从何处滑脱、作者从何处避开一项区分的关键点更加微妙、甚至更加乏味。因此，我把多少已经澄清的结果作为这里论述的一部分交给你们，请你们跟上我。

要让问题取得恰当位置，避免作者们由于回避这一点而逐年走向的迷途，处理方式的区分性中枢就在于必须看见：问题所涉并不是实在阳

具——不是它作为实在的究竟存在还是不存在——，而是象征阳具。就象征之物而言，按其本性，它会在交换中作为缺席呈现。

它作为缺席如此运作，因为凡是在象征交换中传递的东西，始终既是缺席又是在场；它注定具有某种根本交替：在一个点出现，随后消失，又在另一个点重新出现。换言之，它不断流通，在自己离开的点上留下自身缺席的标志。［参见《"失窃的信"研讨班》］

换言之，我们立刻就认出，这里涉及的阳具恰恰是这样一个象征对象；通过它，

不仅会建立一轮想象威胁的结构循环，限制实在阳具的方向与使用……这就是阉割情结的意义，男人正是由此被卷入阉割情结……而且，在男人同禁令的关系所产生的或多或少可怕的幻想背后，还藏着一种可以说是阳具的另一种用法；禁令关系涉及阳具的使用，而另一种用法就是它的象征功能。

我的意思是：只有通过它在那里或不在那里——而且只通过它在那里或不在那里——，两性的象征区分才得到确立。

换言之，尤其对女人而言，正因为她在象征上没有这个阳具……

不过，在象征上没有［实在］阳具，就是以缺席名义参与其中，因而仿佛拥有［象征阳具］……这个阳具始终位于男人与女人任何关系的彼岸。女人可能在想象上怀念这个阳具，因为她只有一根很小的阳具；但对她发挥功能的并不只有这一个阳具。只要女人被卷入主体间关系，在她彼岸就有一根对男人而言她所没有的阳具，也就是在那里作为缺席而存在的象征阳具；这并非仅仅因为她只有一根很小而不足

的阳具。她对自己在实在层面参与阳具的方式可能感到想象上的低劣，但这同那项功能完全无关。

前几天，我把这根象征阴茎放在女同性恋者特有的图式中。如果它发挥一种作用，而且在她进入象征交换时发挥如此根本的功能，理由就在弗洛伊德告诉我们的事情中：她正因为没有阳具——也就是说，在象征层面正因为她拥有它——，才进入拥有或不拥有阳具的象征辩证法；正是由此，她进入两性分化这项经过安排和象征化的关系。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经过承担的人际关系，因此也受到规训、类型化与秩序安排，受到禁令打击，并由例如乱伦法则的根本结构标记。

弗洛伊德所谓女人的阉割观念，正是这个意思：她没有阳具，但她是在象征上没有，因此能够拥有。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女孩正由此进入俄狄浦斯情结，而男孩却由此退出。

换言之，从根本和结构角度看，列维-斯特劳斯对亲属关系基本结构的图式化所带有的男性中心主义，确实以某种方式得到说明。女人在由男性谱系奠定的各谱系之间受到交换；人们选择男性谱系，恰恰因为它是象征的、不确定的。女人作为对象在男性谱系之间交换，并通过所领受之阳具的交换进入其中；她们作为交换给出孩子，而孩子对她们取得代用品、替代物、阳具等价物的功能。正是通过孩子，她们把自然生育力引入以父系为中心、本身并不生育的象征谱系。

她们通过同这个独一而居中的对象相联系，进入象征交换链条，并在其中安顿、取得自己的位置和价值；这个对象的特征，恰恰在于它不是普通对象，而是受到最彻底象征性价值提升的对象——阳具。

一旦看见这一点，它就会以千百种方式表达出来。归根结底，女人“献出自己”这个根本主题，如果仔细察看，表达的不正是必须肯定赠礼吗？这里，具体的心理经验以既有形式交给我们，而且在这里格外悖论；因为说到底，在爱的行为中，显然是女人在实际领受，她领受的远比给予的多。

一切都向我们表明——分析经验也已经强调这一点——，在想象层面，没有哪个位置比女人的位置更具俘获性、甚至更具吞噬性。恰恰因为这一点在相反的断言中受到翻转，

人们才说女人“献出自己”；这是因为在象征上，事情必须如此：她必须用某种东西交换自己领受的象征阳具。因此，弗洛伊德告诉我们，恋物代表作为缺席的这个阳具，这根象征阳具。

如果不是必须发生这个秩序的某种东西，必须先有这种初始翻转，我们又如何能够理解下面这类完全悖论的事情？例如，恋物癖者总是男孩，从来不是女孩。

如果一切都发生在想象缺陷、甚至想象低劣的层面，乍看之下，恋物癖最应在两性中实际被剥夺阳具的那一性那里公开显现。事实却并非如此。严格而个体化的女性恋物癖极为罕见；所谓严格而个体化，是指它体现为一个对象，而我们可以把这个对象本身视作以象征方式回应作为缺席的阳具。

我们先试着看清，这种同一个并非对象之对象的奇特关系如何产生。分析家告诉我们，恋物是一种象征。就此而言，它几乎从一开始就同其他一切神经症症状处在同一地位。但如果这里涉及的不是神经症而

是倒错，事情就没有这么顺理成章。从疾病分类角度说，出于具有一定价值的临床表象理由，事情就是这样分类的。

然而，要从分析角度在结构中确认这一点，就必须细看；事实上，许多作者都表现出某种犹豫，甚至把恋物癖放到倒错与神经症的边界，恰恰因为那个关键幻想具有格外选择性的象征特征。

因此，让我们在这里停留片刻，从结构最高处的这个插入位置出发：在爱的对象中受到爱的，是位于彼岸的某种东西；它无疑是无，却恰恰具有一种象征属性——它在那里，而且因为它是象征，不仅可以是这个无，还必须是这个无。

可以说，什么最能为我们清晰地使这种插入关系取得实体？这项关系使受到瞄准的东西位于呈现之物的彼岸。没有什么比人同世界之关系最根本的意象之一——面纱、帷幕——更能做到这一点。

相关知识卡 恋物、面纱与拒认

面纱、帷幕挡在某种东西面前，也最能使爱情的这个根本情境取得意象。我们甚至可以说，正因为有帷幕在场，彼岸受到遮蔽的东西才仿佛倾向于实现为意象。缺席被画在面纱上；这正是任何帷幕的功能。帷幕取得自己的价值、存在与实存，恰恰因为它是缺席投射于其上、在其上受到想象的东西。

可以说，帷幕是缺席的偶像。归根结底，摩耶之幕成为表达

人同一切俘获自己之物的关系时最常用的隐喻，并非毫无理由：人在自身欲望的全部关系中感受到某种根本幻觉，而他正是在那里使自己对爱的对象彼岸之无的感觉取得化身，并把它偶像化。

如果你们想正确定位我们考察恋物关系建立时随时会投入运作的各项，就必须把这个根本图式记在心里。因此，主体在这里，而对象是：

- 那个什么也不是的彼岸；
- 或者说，象征；
- 又或者说，女人所缺少的阳具。

然而，帷幕一旦就位，某种东西就能被画在帷幕上，宣告对象位于彼岸；于是，对象便可以占据缺失的位置，并以此成为爱的支撑。不过，它之所以如此，恰恰因为它不是欲望系结之点。某种意义上，欲望在这里表现为爱的隐喻，但同它相系的，是作为幻觉、并且作为幻觉得以提升价值的对象。

相关知识卡 恋物、面纱与拒认

因为在涉及恋物时，著名的自我分裂是这样得到解释的：例如，通过恋物，女人的阉割既得到肯定，也受到否认。恋物既然在那里，就意味着她恰恰*没有失去**阳具；但同时，也恰恰意味着人们可以使她失去它*，也就是阉割她。

相关知识卡 Spaltung：自我裂分、对象裂分与主体分裂 · 恋物、面纱与拒认

同恋物关系的这种歧义始终存在，并在症状中随时不断显现；它被当作切身经验：幻觉一面受到支撑和珍爱，一面又在那个名为幻觉的脆弱平衡中得到体验，而这个平衡随时可能随着帷幕倒塌或掀起而崩溃。

恋物癖者同其对象的关系，严格说来涉及的正是这项关系。事实上，只要跟随弗洛伊德的文本，就会看到他已经强调它；谈到这段恋物关系得以解开的根本位置时，他使用了 Verleugnung［拒认］一词。不过，他同样说，问题在于让这段复杂关系挺立——仿佛谈论一套舞台布景；弗洛伊德那种既充满意象又极其准确的语言，正是在这些词中显出价值。

相关知识卡 Spaltung：自我裂分、对象裂分与主体分裂 · 恋物、面纱与拒认

他还说："阉割的恐怖通过创造一个替代物、一座纪念碑，为自己安顿下来。"他又说，这个恋物是一件战利品。原文并未出现"战利品"这个词，但它事实上就在那里，叠加在胜利的标志之上。作者们在接近恋物的典型现象时，也会反复谈到主体借以把自身同两性关系纹章化的东西。弗洛伊德在这里让我们再前进一步。

请注意，我们仍在结构中。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为什么它是必要的，稍后再看；但人们总是过于匆忙，一上来就问为什么，立刻进入各种倾向群聚而来的一片混乱群魔殿。它们试图解释主体为什么可能离对象或远或近，为什么感到受阻、受威胁、陷入冲突。

我们先看结构。它就位于彼岸与面纱的这项关系中；彼岸可以说在面纱上被意象化，也就是被确立为想象俘获和欲望的位置，而同彼岸的这项关系是一切象征关系得以确立的根本。主体—对象—彼岸这项三元节奏是象征关系的根本；它下降到想象层面，对象的中间位置投射到面纱功能之中——问题所涉正是这些。

继续以前，我们还要从另一个侧面看到：这里同样发生了象征关系在想象界中的确立。我们尚未抵达使主体需要面纱的要求。我要迈出的

第二步如下：你们会在其中重新找到上次我谈倒错结构本身时说过的东西。当时我谈到转喻、暗示或字里行间的关系；它们都是转喻的基本形式。

相关知识卡 欲望的转喻性

除去没有使用转喻一词，弗洛伊德在这里已经以最清楚的方式告诉我们：构成恋物的、具有象征性的某种东西——尤其是在固定恋物、把它投射到面纱上的历史维度中——，就是历史中意象停住的那个时刻。

相关知识卡 恋物、面纱与拒认 · 欲望的转喻性

我记得自己曾用电影突然定格的比喻。定格恰好发生在这样一个时刻之前：孩子即将看到自己在母亲那里寻找的东西——母亲拥有或不拥有的阳具——作为在场—缺席、作为缺席—在场显现。历史回忆恰恰在此以前停止并悬置。我说“历史回忆”，因为弗洛伊德全部现象学和概念化中如此根本的“屏幕记忆”一词，没有其他意义可以赋予。

相关知识卡 恋物、面纱与拒认

屏幕记忆不只是一幅瞬间快照；它是历史的中断，是历史冻结、停下来的时刻，并由此同时指向其运动在面纱彼岸继续进行。

屏幕记忆通过整条链条同历史相连；它是链条中的一次停止，并因此具有转喻性。历史按其本性停在这里却仍在继续：它指向从此受到遮蔽的后续、缺席的后续，也就是弗洛伊德明确所说的压抑。

只有存在象征链条时，我们才谈压抑。恋物在某种意义上是意象、是投射出来的意象，所以这个现象看起来可能是想象现象；然而，如果它仍可以被指认为

一个压抑点，恰恰是因为这个意象只是历史继续发展同历史开始中断之间的界点；它是压抑点的标志与定位标记。

只要仔细阅读弗洛伊德的文本，就会看到，他衔接事情的方式要求我们充分掂量他使用的每个表达所占位置。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同爱的对象的关系与对象挫折关系之间的区分。它们是两种不同关系：爱在这里通过欲望的隐喻发生转移，而欲望系结于这个作为虚幻之物的对象。不过，这个对象的构成是另一回事；它不是隐喻性的，而是转喻性的：它是历史链条中历史停下来的那个点。它标志着：主体所构成的彼岸正是从这里开始。为什么？

- 为什么主体必须在这里构成这个彼岸？
- 为什么面纱对人而言比现实更珍贵？
- 为什么这项幻觉关系的秩序会成为主体同对象之关系中一个本质且必要的构成要素？

这就是恋物癖提出的问题。当然，在我刚才所说的内部、在继续前进以前，你们已经可以看到各种具有启发性的东西。甚至包括弗洛伊德给出的第一个恋物癖分析例子：那是一段绝妙的双关故事。有位先生童年早期生活在英国，后来到德国成为恋物癖者；他总在鼻子上寻找并且实际看见“一点光泽”（德语 Glanz auf der Nase），而这无非源自英语“看一眼鼻子”（glance at the nose）。鼻子本身当然也是一个象

征。你们在这里清楚看到：在投射到历史链条的面纱上的点上，某种衔接如何投入运作；它甚至可以容纳一个完整句子，而且是一个用已经遗忘的语言说出的句子。

这项结构得以确立的原因是什么？克莱因学派不会向你们保证任何事；无论如何，他们最近已经感到为难，因为事实上：

- 一方面，我们不能失去对恋物癖发生同阉割情结之间根本衔接关系的把握；

- 另一方面，在前俄狄浦斯关系中——阳具母亲居于中心这一观念本身已经指出这点——，阉割情结是否就是决定性要素和动力，已经不再显得确定。

把这两件事结合起来时，各位作者的得心应手程度并不相同。

不过，我们只需看看英国学派成员借助梅兰妮·克莱因夫人的体系所能取得的中等程度的方便。这套体系为口腔倾向的最初阶段、尤其是其中最具攻击性的时刻赋予结构，又在这个时刻本身引入父亲阴茎的回溯性投射与在场；也就是说，它把俄狄浦斯情结回溯性地放入最初同那些可以

被内摄的对象的关系里。显然，这就更容易提供至少可以用来解释问题所涉之物的材料。

我还从未着手全面批判梅兰妮·克莱因夫人的体系意味着什么。

因此，眼下我们把各位作者可能围绕它带来的东西搁在一旁，紧扣自己在这里已经揭示的内容：这一切确实要相对于一项根本关系来把

握，即实在孩子、象征母亲与母亲自己的、对她而言是想象的阳具之间的关系。

因此，这个图式必须谨慎使用：它虽然集中在同一平面，却回应着不同层面，并在历史的连续阶段投入功能。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儿童当然还无法掌握那种想象归属关系——母亲相对于他发生的深刻分裂正由它造成。这恰恰是我们今年将在这个问题中试图阐明的内容。我们正在走向看清：儿童如何、在什么时刻把握这一点；当儿童自己进入同象征对象的关系时，它又怎样投入运作，而阳具正是这项关系中的主要货币。

这会提出时间顺序、时序、秩序与先后等问题。精神分析史自然指示我们，应当从病理角度处理它们。这里的病例观察向我们展示什么？仔细剥离材料就会发现，全部问题极其准确地围绕着一个奇特症状展开并同它相关：它使主体同某种作为恋物的东西发生选择性关系，情色生活也围绕它旋转。我说“旋转”，因为它固然是令人着迷的对象、铭写在面纱上的对象，却显然仍保留一定的运动自由。

只要进行分析，而不只作临床描述；只要考察一份病例观察，就会看到：

- 一些我今天已经向你们衔接的要素——比奈本人早已看到它们——，例如屏幕记忆那个醒目的点，以及记忆停在母亲的裙子下摆、甚至她的束身衣处；
- 主体同恋物之间那种本质上歧义的关系：他把幻觉作为幻觉来体验，却仍偏爱它；
- 一个本身没有生命、完全任由主体在其情色关系中操纵的对象所具有的格外满足功能。

所有这些都可以看见，但必须通过分析才能更加细致地看清问题：每当主体求助于恋物的能力由于某种理由减弱、耗尽、磨损或干脆消失，会发生什么？我们在主体的爱恋行为、更简单说在其情色关系中看到的东西，可以概括为……你们可以阅读《国际精神分析杂志》中西尔维娅·佩恩夫人、吉莱斯皮先生、格里纳克夫人和达格莫尔·亨特先生的病例观察[注2]，或者阅读《儿童精神分析研究》来验证……

> [注2] 达格莫尔·亨特（Dugmore Hunter）：《恋物癖者分析中的客体关系变化》（“Object-Relation Changes in the Analysis of a Fetishist”），《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 35 卷，1954 年，第 302—312 页。

……一种防御。弗洛伊德也曾瞥见这一点，而且它已衔接在我们的图式中。他告诉我们：“恋物癖是抵御同性恋的一种防御。”正如吉莱斯皮先生所说，两者间距异常狭窄。

总之，恋物癖者同爱的对象的关系组织起这一循环；我们在其中看到一种交替：他认同于女人，而对他来说，口腔—肛门期原初经验中的想象阳具又集中在施虐性性交理论的攻击性上。分析重新揭示的大量经验，都显示原始场景被感知成残酷、攻击、暴力，甚至杀戮性的东西。

因此，主体要么认同于女人，即面对这根毁灭性阴茎的女人；要么反过来认同于这根想象阳具，从而使自己成为女人面前的纯粹对象，一种她在极限上能够吞噬和毁灭的东西。儿童以一种粗陋方式面对这项原始想象关系两极之间的摇摆……可以说，父亲作为主体、作为秩序和合法占有的中心尚未引入，因此它尚未在俄狄浦斯法制中得到确立……主体被交付给两个可以说无法调和的对象之间的这种两极摇摆，而结局无论如何都具有毁灭性、甚至杀戮性。每当爱恋关系试图开始、形成秩序，每当它们在主体生活中涌现时，我们都会在其根底重新找到这一点。

现代分析理解沿着一条特定道路处理这一点，而且确实在这里开辟了自己的道路。分析家会介入，使主体察觉自己各个位置之间的交替及其意义；也就是说，以某种方式引入必要的象征距离，让主体看见其意义。

这里的病例观察极为丰富；它们向我们展示主体早期生活的现实可能采取千百种形式，却也有误导我们的风险。根本的不完整使主体被交付给想象关系：要么通过认同于女人，要么通过占据想象阳具的位置；无论哪种情况，三元关系的象征化都不充分。

例如，作者们说，我们极为频繁地注意到，父亲作为在场者在这段历史中缺席，有时还是反复缺席——如人们所说，父亲功能不足；他外出旅行、参战，等等。

更加突出的是，幻想有时会以格外显著的方式重现某种位置，

也就是被迫无法动弹；它有时表现为主体实际、真实地遭到捆绑。

西尔维娅·佩恩的病例观察中有一个极好的例子。由于一项荒唐的医疗处方，一个孩子直到两岁都被禁止行走，并实际用绑带固定在床上。这并非没有后果；他因此在父母房间里受到严密看管，整个处在一个典范位置：只能通过纯粹视觉关系面对父母之间的关系，身体自身没有任何肌肉反应的萌芽，而父母关系又以你们可以想象的暴怒和愤怒风格得到承担。如此典范的病例当然罕见。不过，一些作者曾强调，例如有些患恐怖症的母亲会避免儿童接触自己，仿佛孩子是传染源；原初母亲对象关系的构成之所以让视觉关系占据优势，这些母亲无疑并非毫无作用。

无论如何，比某个原初关系受损的例子更有教益的，是某种可以说显现为病理关系、作为对恋物之力比多黏附的反面或补充而呈现的东西。从疾病学上说，恋物癖是一个包含各种事物的类别；我们仅凭直觉便能感到它们之间具有亲缘性。

例如，主体依恋雨衣同依恋鞋子看来具有相同性质；我们很清楚，没有弄错。不过，从结构角度说，这件雨衣本身仍包含一些启示，并指向一个稍异于鞋子或束身衣的位置；后两者本身严格而直接地处在主体与对象之间的面纱位置。

相反，雨衣同其他各种或多或少包裹身体的衣物恋物一样，无疑还带有橡胶的特殊性质。这里经常可以遇到一个特征，它大概仍隐藏着某种终极奥秘；从感觉性角度进行心理说明，或许可以阐明它：橡胶本身的特殊触感可能比其他东西更容易成为皮肤的衬里，或者具有特殊隔绝能力。

无论如何，从分析式病例观察所呈现的关系结构本身可以看出：雨衣在这里发挥的角色并不完全是面纱，而更像一种主体借以把自己定位在其后的东西。主体不在面纱前面，而仿佛在面纱后面，也就是处在母亲的位置；更准确说，他黏附于认同母亲的位置，而母亲需要通过包裹得到保护。这就构成恋物癖病例同“移情”病例之间的过渡[注]。包裹显然是一种保护；它不只是面纱，而是认同于女性人物的主体裹在身上的护盾。

> [注] 底本此处明确转录为 cas de transfert“移情病例”；但前后文讨论包裹性衣物、认同女性人物，语义上也可能存在 travestissement“易装”的转录混淆。译文不静默改字，保留底本。

另一些典型而真实、有时格外典范的关系，是突然爆发的、甚至有时

同恋物癖交替出现的暴露癖；在某些病例中，它确实具有反应性。主体试图走出自己的迷宫，某些实在因素投入运作，把主体置于不稳定的平衡位置；这种结晶或位置翻转便在此发生，而在我看来，

女性同性恋病例的图式极为明显地说明了它，因为我们在那里看到，在某一时刻，

随着作为实在要素的父亲引入，各项彼此交换；原本位于彼岸的象征父亲进入想象关系，采取了女同性恋者相对于父亲的同性恋位置——它既典范又具有示范性。

同样，病例观察中还有一些很精彩的例子：主体在某些人为实现、强迫实在的条件下尝试进入完整关系，恰恰在此刻通过自己的行动演示——也就是在想象层面——表达了情境中潜伏于象征层面的东西。例如，主体第一次尝试实在关系，却处在某种实验位置，仿佛前去展示自己能做什么；在例如女人的帮助下，他或多或少地成功了。恰好就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此前没有任何迹象让人预料可能出现这类症状——，他进行了一场非常特别而又精心计算的暴露：在一列国际列车驶过时展示自己的性器官，因而没有任何人能够当场抓住他。

因此，某种东西仿佛被强迫取得出口；你们可以看出，这只不过是它投射到想象层面的表达，而它此前已经隐含、容纳在这个层面。主体并没有理解自己刚完成之行动的全部象征回响：说到底，他只是试图展示，而且仅仅展示，自己同别人一样有能力建立正常关系。

我们在几份非常接近恋物癖的病例观察中反复看到这类反应性暴露癖，甚至看到公然违法的行动作为恋物癖的等价物；人们很容易感到这里涉及什么。

同时看到施米德贝格如何避开事情的主要和根本部分，十分耐人寻味。她呈现一个男人：他娶了一个身高几乎是自己两倍的女人，真正成了她的受害者和可怕的替罪羊。一天，这个一直竭尽所能面对可怕情境的男人得知自己将要成为父亲；他冲进一座公共花园，开始向一群少女展示自己的器官。

施米德贝格夫人在这里显得有些过分安娜·弗洛伊德化；她找到了种种相似之处：这个男孩的父亲本身也多少是个受害者，但有一天故意让人撞见自己同女佣在一起，借妻子的嫉妒索偿摆脱情境，使她多少受制于自己。然而，施米德贝格夫人认为这是一例自己成功分析倒错的病例，但上述材料似乎根本没有解释任何东西。

这里完全不必惊叹，因为根本不涉及倒错，而且她也根本没有进行分析；她漏掉了一个事实：主体此次正是通过一次暴露行动表现自身。解释这次暴露行动只有一条道路：参照这样一种启动机制——某种在实在界中额外到来、无法在象征上吸收的东西，倾向于使象征关系根底的东西骤然凝结。对这个可怜人而言，那里恰恰是阳具—孩子的等价关系；他无法以任何方式承担这次父职，甚至无法相信它，于是跑到正确的地方，展示孩子的等价物，

也就是他此时对自己阳具仍能作出的使用。

第10课 · 1957年2月6日

我偶尔会听到一些反馈，知道你们怎样接受我每次——至少我希望如此——带来的小小新意。上一次，我朝阐明恋物癖迈了一步，把它作为欲望动力学中格外根本的例子；尤其是我们最为关切的那种欲望。理由有两重：这种欲望正是我们在实践中打交道的东西——不是一套构造出来的欲望，而是带着全部悖论的欲望。

同样，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带着全部悖论的对象。另一方面，弗洛伊德思想显然正从这些悖论出发；尤其在欲望问题上，它从倒错欲望出发。当人们面对《今日精神分析》可能归属的那些最天真、直觉式的理论，试图统一或还原一切时，忘掉这一点实在可惜。

为了从上次停下的位置重新接过问题，我先要说，我迈出的这一小步使一些人感到惊讶；他们已经颇满足于我向你们呈现的爱情理论观念——它建立在一个事实之上：主体所朝向的，是对象中的那项缺失。

这已经给某些人提供了感知和思考的机会，并且似乎足够启发他们；尽管他们发现主体—对象关系还有一个彼岸和一项缺失时，多少有些不安。

上一次，我又带来一项复杂化，即位于对象之前的另一项：面纱、帷幕。它是想象投射的场所，某种成为这项缺失之形象的东西在那里出现，并由此成为某种东西得以展开的提供点和支撑；那个东西恰恰在那里取得自己的名字：欲望，但作为倒错的欲望。恋物正是在面纱上形象化地呈现对象彼岸所缺少的东西。

这项图式化旨在确立这些连续层面，让你们在某些病例中更容易找到方向，而不致陷入那种不断出现的矛盾并存、混淆，以及“是”与“否”、“朝一个方向”与“恰好朝相反方向”的等价。遗憾的是，分析与分析家通常总以“矛盾情感”为名，利用这一整套东西摆脱困境。

上一次谈恋物癖的最后，我向你们展示了一个仿佛补充性的位置怎样出现……它既见于恋物崇拜的各个阶段，也见于恋物癖者试图重新抵达那个对象时；他被某种当然无法理解其功能和机制的东西同对象隔开……这种位置可以称作恋物癖者的对称项、回应项、对应项和相反极，也就是易装功能。主体在其中认同于面纱后面的东西，认同于那个缺少某物的对象。

分析已经使作者们清楚看到：易装者——用他们的语言来说——是一个认同于阳具母亲的人，而这位母亲同时又遮蔽自己对阳具的欠缺。这种易装把我们带到问题的很远处，因为我们并不是等到弗洛伊德以后才开始讨论服装心理学。

服装的一切使用都参与易装功能。如果在分析家看来，人们对服装功能直接、日常而普通的理解，就是把私处遮住，那么问题就必须变得稍微复杂一些；尤其当某个人谈到阳具母亲时，本应听出自己说的话有什么意义。

衣服不只用来遮住一个人所拥有的东西——在“拥有或没有”的意义上——，还恰恰用来遮住他所没有的东西。两种功能都不可或缺。

问题并非本质上、始终都是遮蔽对象，同样也在于遮蔽对象欠缺。这只是把一种经常遭到遗忘的东西——对象欠缺的功能与在场——所具有的想象辩证法应用到这个病例中。

反过来，在人们粗放地使用窥视癖关系时，总有一件事被当作理所当然：展示自己非常简单，只是“看”这项活动、窥视癖的相关项。然而，还有一个容易遭到遗忘的维度：只要这里涉及与“看”这项活动相关、对应的关系，涉及主体被卷入视觉俘获的一次吹拂，那么主体并不总在所有场合都只是让自己“被看见”。

窥视癖中还包含这一额外的卷入维度。语言用法通过一个反身标记表达它；其他语言的动词中如果存在中间语态，它也蕴含其中，也就是“让自己呈现给观看”。如果把这些维度结合起来：主体在一整类被混入窥视癖—暴露癖关系的活动中“给人看”的东西；他者展示自己时给人看的东西，也不同于他实际展示的东西——这一点却淹没在笼统所谓的窥视癖关系中。

费尼切尔一类作者，在表面的清晰之下是极差的理论家，却并非没有分析经验；他们已经很好地看出了这一点。如果阅读那些理论化努力以令人绝望的失败告终的文章——例如费尼切尔的某些文章——，有时仍会发现十分漂亮的临床珍珠，甚至会看到他感到或预感到有一整套事实需要归组。分析家幸而从经验中取得某种嗅觉，让这些事实围绕分析对根本想象关系衔接中的一个选定主题或分支聚集起来。

围绕易装的窥视癖，你们确实可以看到作者多少朦胧地感觉为具有亲缘性和共同枝干的一切，而这些事实彼此又极易区分。为了弄清分析家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衔接了这些事实，我不得不阅读这批庞大而乏味的文献；正是在此过程中，我最近对费尼切尔发表于《精神分析杂志》的一篇文章产生兴趣，它处理他所谓“女孩 = 阳具”的等式[注1]。他本人已经借著名系列“粪便 = 孩子 = 阴茎”中的等价关系授权我

们这样做；这个等式确实有趣，同费尼切尔试图向我们提出的“女孩 = 阳具”并非没有关系。

> [注1] 奥托·费尼切尔：《象征等式：女孩 = 阳具》（“Die Symbolische Gleichung: Mädchen = Phallus”），《国际精神分析杂志》德文版第 22 卷，1936 年，第 299—314 页。

围绕这个问题，我们很容易看到一种方向缺失显现出来；它随时把一种据说不受某些理论分析之方向缺失影响的逻辑当作给定交给我们。这里有一系列事实围绕某些分析发现归组：从一开始，儿童就可能被视作等价于阳具，在主体——尤其女性主体——的无意识中等同于阳具。也就是说，凡是同孩子被给予母亲、成为阳具某种替代物乃至等价物相关的一切，都属于同一个谱系（phylum）[注2]。

> [注2] Phylum：由同一祖先产生的一系列物种所形成的谱系；这个现代拉丁化词源自希腊语 φῦλον，意为“类别、种类”。

然而，旁边还有许多其他事实。它们同这一类事实被放入同一个括号，颇为令人惊讶。我谈儿童时，并不专指女孩；但这篇文章非常明确地针对女孩，而且它显然必须从某些众所周知的特征出发：在某些被解释为主体阳具等价物的倒错中，会出现具有恋物或近似恋物性质的特殊性。

女孩本人，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儿童，可能把自己设想成、通过行为表明自己被安置成阳具等价物；这是分析给定秩序中的东西。也就是说，她把性关系体验成自己把男性伴侣的阳具带给他的关系；她甚至会在自己享有特权的爱恋姿势细节中，把自己定位成某种前来贴附、蜷缩在伴侣身体某一角落的东西。这又是一类不能不令我们停下并受到震动的事实。

同样，在某些病例中，男性主体把自己作为女人所缺少的某种东西交给她；作为她在想象层面所缺之物，他由此把阳具带给她。这里突出的一组事实看来都指向这一切。然而，把它们相互靠拢、全都放入同一个等式，也使我们看出：人们归组的是秩序极为不同的事实。因为，在我刚勾勒的四种关系秩序中，无论对象是主体带来的、给予的、欲求的，还是主体亲自替代的，他同对象的关系都绝不相同。

一旦这些界域引起我们的注意，就不能不看到：作者把如此确立的等价关系归组起来，远不只是出于理论要求。小女孩可能成为一整类主体优先依恋的对象；可以说，一项神话功能同时从这些倒错幻景和整套文学建构中析出。我们可以根据不同作者，把这些建构归在若干或多或少著名的标题下。

有些人喜欢谈“米侬型”。你们都知道米侬这个创造：这位吉卜赛女孩处于双性位置——歌德本人清楚强调了这一点——，同一位名叫哈夫纳的保护者生活在一起。后者体形庞大、粗暴，明显具有超父亲性质。哈夫纳仿佛是她的一名高级仆人，却同时极为需要她。

歌德在某处谈到这对人物时说：“哈夫纳最需要她，而没有米侬，他什么也做不了。”这里，我们重新看到一对组合：一边是以粗大、野蛮、具身形式存在的权能；另一边，则是权能若没有便无法产生效力的某种东西，是权能本身所缺少的东西，并归根结底构成其真正权能的秘密。这个某种东西只是一项缺失；著名的魔力最终正定位在那里，而分析理论始终如此混乱地把魔力归给全能观念。

有一种东西——与人们所认为的相反——并不在主体身上：全能的结构。如我告诉过你们的，它在母亲、也就是原初大他者那里；全能的

是大他者。然而，在这个全能者背后，还确实有一项最终缺失，其权能就悬在它上面。我的意思是，一旦主体在自己期待其拥有全能的对象身上察觉到让对象本身成为强者的这项缺失，全能的最终动力就会再一次转移到彼岸：转移到某种并不存在、至多只作为缺失的象征而存在的地方；它是脆弱、渺小本身。主体必须把全能的秘密和真正动力定位在那里。正因如此，我们今天所谓的“米侬型”——文学中还有大量复现——才令我们感兴趣。

三年前，我一度准备宣布一场关于卡佐特《恋爱中的魔鬼》的演讲。很少有作品能如此典范地深刻预见我试图在你们面前展开、尤其是今天所讲的想象动力学。我想起它，因为它是一幅突出的例证，能进一步强调一种位于对象彼岸、整套理想化幻想都可能依附于其上的魔法存在。这个故事从那不勒斯的一座洞穴开始；作者在那里召唤魔鬼。完成惯常仪式以后，魔鬼果然现身，化作一颗格外长着两只大耳朵的巨大骆驼头，以最幽深的声音问他：“你要什么？”——“Che vuoi?”

我认为，这个根本质问最为醒目地向我们呈现了超我的功能。不过，重要之处不在于超我意象在这里得到有力说明，而在于：契约一旦订立，同一个存在便被预设会立刻变成一只小狗；经过一次谁也不觉惊讶的过渡，它又变成一个迷人的年轻男子，随后再变成一位迷人的少女。直到结尾，二者始终以完全歧义的方式相互交织；一段时间里，对这篇故事的叙述者来说，它成为一切幸福的惊人来源，实现他的全部欲望，以严格说来魔法式的方式满足他所能希望的一切。然而，所有这些始终处在幻想、危险的非现实与永久威胁的氛围中；这也必然赋予周围环境独特基调。最终，这一切像一场巨大幻景一样，在越来越加速、疯狂的追逐所造成的灾难性断裂中解决；这场追逐代表着同被爱人物的关系。她的名字很有意义，但我已经记不起来。故事最

后，幻景以一种灾难性方式消散；主体则如其所应当，回到母亲的城堡。

拉图什的另一部小说《弗拉戈莱塔》，描绘了一个明显易装的奇异人物。直到结尾，除读者以外，没有人发现她其实是一个扮成男孩的女孩；她所发挥的功能类似我刚才描述的“米侬型”。种种细节与精致安排最终引向一场决斗：小说的男主人公杀死弗拉戈莱塔；此时，她以男孩形象出现在他面前，他没有认出她。这清楚表明，某个女性对象同作为竞争者的他者之间存在等价；这个他者也正是《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杀死奥菲莉娅兄长时涉及的他者。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恋物或仙女般的人物——这两个词从根本上说是同一个词，都同葡萄牙语 feitiço 相连；“恋物”一词正是在那里历史性地诞生，它无非就是“人造的”——。这个歧义的女性存在，在母亲彼岸代表并仿佛化身她所缺少的阳具；而且，她自己越不拥有阳具、越是把全部自身投入阳具的再现，就越能完善地化身它。

于是，我们又看到倒错欲望的爱恋道路所具有的一项功能；它们可以成为典范，帮助我们阐明分析中必须区分的各个位置。这样，我们终于被引向提出一个始终潜伏、又不断被这场批判本身触及的问题，也就是认同观念。从一开始，它便潜在、在场，随时涌现又重新消失于弗洛伊德著作中；《梦的科学》已经隐含若干认同，而当弗洛伊德写作《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时，这个概念来到最重要的说明点；书中有一章专论认同。

这一章有一种特性：它向我们展示作者最大的困惑——这种情况十分常见，也是弗洛伊德著作向我们展示的价值所在。有一篇文章中，弗

洛伊德承认自己面对两个得到明确规定的术语之间的两难而感到为难，甚至无力摆脱；它们就是“认同”与“对象选择”。在许多病例中，二者仿佛能够以最令人困惑的变形力量彼此替代，以至于连过渡本身都无法把握；但维持二者区分又显然必要。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处在对象一侧同处在主体一侧完全是两回事。一个对象成为“选择对象”，显然不同于它成为“主体认同的支撑”。

这本身极具教益；而更令人困惑、同样具有教益的是，所有人看来都轻易适应了这种情形，在观察和理论化中以严格等价的方式使用两者，不再追问。真正继续追问，就会写出如下文章：

古斯塔夫·汉斯·格拉伯的《两类认同机制》[注3]，载 1937 年《意象》杂志。这是最令人瞠目的东西，因为对他来说，一切问题看来都通过区分主动认同与被动认同得到解决。

> [注3] 古斯塔夫·汉斯·格拉伯（Gustav Hans Graber）：《两类认同机制》（“Die zweierlei Mechanismen der Identifizierung”），《意象：精神分析心理学及其边界领域与应用杂志》第 23 卷，1937 年，第 36—53 页。

然而，只要细看，就不可能不在每一种认同中看到主动与被动两个极端——他本人也注意到了。因此，我们必须回到弗洛伊德，逐点重新接过他本人衔接问题的方式。这部著作第八章《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紧接在严格题为《认同》的章节之后，并以一句话开头；它立刻使我们回到一种远比平常读到的东西更加纯粹的氛围：

“语言用法即使任性，也始终忠于某种现实。” [Der Sprachgebrauch bleibt selbst in seinen Launen irgendeiner Wirklichkeit treu.]

我想顺带指出，弗洛伊德在前一章如何谈认同。他以认同父亲为例开始谈论认同；我们正是通过这个例子以最自然的方式进入这一现象。到了第二段，我们看到弗洛伊德文本的糟糕法译之一。德文原文写道：

[Gleichzeitig mit dieser Identifizierung mit dem Vater, vielleicht sogar vorher, hat der Knabe begonnen, eine richtige Objektbesetzung der Mutter nach dem Anlehnungstypus vorzunehmen.]

[“在认同父亲的同时，也许甚至在此以前，男孩已经开始依照依托型方式，对母亲进行真正的对象投注。”]

“在认同父亲的同时，也许甚至稍早一些……”

这却被译成：“稍晚一些”！

“……此时，男孩开始把自己的力比多欲望指向母亲。”

按照这个译法，我们就会问：认同父亲是否发生在先？

今天早晨我要讲的段落中，还有另一个例子。我选择它，是因为它最为凝缩，最适合向你们展示我所谓“弗洛伊德的困惑”。这里涉及爱恋状态同认同的关系。按照弗洛伊德的文本，认同是一项更加原始、更加根本的功能，因为它包含对象选择；但这项对象选择本身又不得不以一种极成问题的方式得到衔接。

这项对象选择在弗洛伊德全部分析中同自恋深度相连；这个对象是主体中的某种另一个自我——这是沿着弗洛伊德已充分衔接的方向所能走到的最远处。因此，问题就是：如何衔接认同同 Verliebtheit［爱恋

状态］之间的差异？后者的最高构成——看来也是最充分的构成——被称作迷恋、爱的归属；它还具有称作臣服或爱恋归属的最高表现，而且很容易描述。

［Im ersteren Falle hat sich das Ich um die Eigenschaften des Objekts bereichert, sich dasselbe nach Ferenczi's Ausdruck « introjiziert », im zweiten Fall ist es verarmt, hat sich dem Objekt hingegeben, dasselbe an die Stelle seines wichtigsten Bestandteils gesetzt.］

［"在第一种情况下，自我以对象的属性丰富自身；用费伦齐的说法，它把对象'内摄'进来。在第二种情况下，自我变得贫乏，把自己交给对象，并把对象安置到自身最重要的构成要素的位置。"］

法译写道：

"在第一种情况下，自我以对象的性质丰富自身，并把对象同化……"

事实上，只须按费伦齐的译法来读："内摄"；这里的问题正是内摄同认同的关系。

"……在第二种情况下，自我变得贫乏，把全部自身交给对象，在对象面前抹去自身……"

……法译者这样翻译。但这并不完全是弗洛伊德所说的：

"……它把这个对象安置在自身构成要素的位置。"

这项内容在"在对象面前抹去自身"这句话中完全被抹去了；人们根本看不出它翻译的是如此明确衔接的东西。

弗洛伊德在这里停留于下列两者的对立：

- 主体内摄并借以丰富自己的东西；
- 以及另一方面，那种夺走主体自身某种东西、使他变得贫乏的东西；因为此前，弗洛伊德曾用很长一段时间停留于爱恋状态中发生的事情，把它描述为这样一种状态：主体越来越为了所爱对象而褫夺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以至于简直陷入卑微，完全屈从于自己所投注的对象。

弗洛伊德在这里明确说，自我为之变得贫乏的那个对象，正是它安置到自身最重要构成要素之位置上的对象。这是弗洛伊德对问题的切入方式；但他继续时又往回退，因为弗洛伊德从不向我们掩饰他的推进过程：他向前走，察觉说得还不完整，于是回来补充道：这种描述显现出一些对立，而从经济观点看，这些对立实际上并不存在。

[Es handelt sich ökonomisch nicht um Verarmung oder Bereicherung, man kann auch die extreme Verliebtheit so beschreiben, daß das Ich sich das Objekt introjiziert habe.]

[“从经济观点看，问题既不在于贫乏，也不在于丰富；极端的爱恋状态同样可以描述为：自我把对象内摄了进来。”]

> “从经济观点看，问题既不在于丰富，也不在于贫乏，因为即使极端的爱恋状态，也可以被设想成对象向自我的内摄。”

接下来的区分或许触及一些本质要点：

[Im Falle der Identifizierung ist das Objekt verloren gegangen oder aufgegeben worden; es wird dann im Ich wieder aufgerichtet, das Ich verändert sich partiell nach dem Vorbild des verlorenen Objekts. Im anderen Falle ist das Objekt erhalten geblieben und wird als solches von seiten und auf Kosten des Ichs überbesetzt.]

[“在认同的情况下，对象已经失去或遭到放弃；随后它在自我中重新建立起来，自我依照失去对象的范型发生部分改变。在另一种情况下，对象被保留下来，并作为这样的对象，由自我一方以自我为代价得到过度投注。”]

“在认同的情况下，对象挥发、消失，随后在自我中重新出现；自我则依照已经消失的对象之范型发生部分转变。在另一种情况下，已经构成的对象由自我赋予全部性质，并以自我为代价。”

法文文本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为什么对象会先“挥发”和“消失”，随后又在自我中“重新出现”，而自我还依照消失对象的范型发生部分转变？最好还是回到德文文本。

[Vielleicht trifft eine andere Unterscheidung eher das Wesentliche. Im Falle der Identifizierung ist das Objekt verloren gegangen.]

“也许另一种区分更能触及本质。在认同的情况下，对象已经失去。”

这里指向的是一个根本观念；从弗洛伊德向我们说明对象形成的观念之初，我们就始终遇见它，也就是把“对失去或遭到放弃的对象的认同”视为根本。因而，问题并非对象“挥发”或“消失”，因为它恰恰没有消失。

[Im Falle der Identifizierung ist das Objekt verlorengegangen oder aufgegeben worden; es wird dann im Ich wieder aufgerichtet, das Ich verändert sich partiell nach dem Vorbild des verlorenen Objekts. Im anderen Falle ist das Objekt erhalten geblieben und wird als solches von seiten und auf Kosten des Ichs überbesetzt. Aber auch hiegegen erhebt sich ein Bedenken. Steht es denn fest, daß die Identifizierung das Aufgeben der Objektbesetzung voraussetzt, kann es nicht Identifizierung bei erhaltenem Objekt geben? Und ehe wir uns in die Diskussion dieser heikeln Frage einlassen, kann uns bereits die Einsicht aufdämmern, daß eine andere Alternative das Wesen dieses Sachverhaltes in sich faßt, nämlich ob das Objekt an die Stelle des Ichs oder des Ichideals gesetzt wird.]

[“在认同的情况下，对象已经失去或遭到放弃；随后它在自我中重新建立起来，自我依照失去对象的范型发生部分改变。在另一种情况下，对象被保留下来，并作为这样的对象，由自我一方以自我为代价得到过度投注。不过，这个区分也引起一项疑问：认同确实以放弃对象投注为前提吗？难道不能在对象被保留时发生认同吗？在我们进入这个棘手问题的讨论以前，或许已经可以逐渐看出，另一个二择一包含着这一事态的本质：对象究竟被安置在自我的位置，还是自我理想的位置。”]

“于是，它重新竖立在自我中，而部分的自我依照失去对象的范型发生部分转变。在另一种情况下，对象仍然被保留下来，并作为这样的对象，由自我一方以自我为代价得到过度投注。但这一差别又引起新的思考：认同是否确实以放弃对象投注为前提？难道也不能同保留下来的对象发生认同吗？在进入这个格外棘手问题的讨论以前，我们还应当在一项考虑面前稍作停留；我们预感到，还有另一种选择可以设想

这种事态的本质，也就是对象究竟被安置到自我的位置，还是自我理想的位置。”

这段文本的推进令我们十分为难。在这种前进与后退的运动里，似乎没有得出任何十分明确的东西。弗洛伊德显然由此揭示：在这些往返的不同时刻，我们究竟可以给对象安排什么位置——它在这些时刻构成认同的对象或爱恋俘获的对象——，这一歧义几乎完整地停留在疑问状态。

至少，疑问仍然被提了出来；我只是想向你们突出这一点。因为我们面对的这篇文本，虽不能说是弗洛伊德的遗嘱性文本，却是他抵达理论阐发顶峰的文本之一。

那么，让我们依据先前在尝试阐发“挫折同对象构成的关系”时给出的界标，重新接过这个问题。首先要设想的是：在我们的实践和说话方式中，通常建立在认同与内摄之间的联系。

你们已经看到它从我刚读的弗洛伊德段落开头出现。我向你们提出这一点：内摄所依据的隐喻是一种口腔隐喻。

无论谈的是内摄还是并入……例如在克莱因时期给出的全部衔接中，人们最常滑向那种著名的原初对象构成：对象照例分为好对象与坏对象；对象的内摄在二者之间交替，被当作一种简单的给定，置于那个著名的、没有界限的原始世界中，仿佛主体同自身在母亲身体内遭到包裹的状态构成一个整体……在那里，内摄被视作一种同投射严格等价而且对称的功能。

从这种用法中也可以看到，对象永远处在一种运动里：从外部进入内部，随后又在内部变得过于不可忍受时，从内部被排回外部；这使“内摄”与“投射”保持着一种完美的对称。

我将尝试在你们面前衔接的内容，尤其正是要反对这种绝非弗洛伊德式的滥用。我认为，下列联系是绝对不可能得到设想的——我说的不只是在概念化层面把思想整理有序，而且是在实践和临床中——：例如，当我们有时或多或少成功地在某些病人那里对对象进行象征还原时，在这种还原的转折时刻出现的明显口腔冲动；又如，在恋物癖治疗的某一转折处出现的贪食冲动。倘若我们仅仅抓住那个随时可用的含混观念：“此刻主体退行了——当然，他本来就是为此而来的”，那么，在某一时刻对口腔驱力的这种唤起便绝不可能得到设想。为什么？

因为主体正在分析中取得进展，也就是试图把自己的恋物纳入视野，而恰在这时他却退行了。人们总可以这样说，也不会有人来反驳你。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对驱力的唤起——正如每当驱力在分析或其他地方出现时那样——都必须依据下列方面来设想：

- 相对于某个界域；
- 相对于它的经济功能；
- 相对于某种得到象征规定的关系之展开。

我给你们讲过的那个儿童原初图式，不正提供了某种能够使我们接近并阐明它的东西吗？在这个图式中，存在以下两者：

- 一方面，母亲是最初爱恋关系的支撑；爱是某种具有象征结构的东西，而母亲是呼唤的对象，因而既是不在场又是在场的对象。母亲的赠礼是爱的符号；这些赠礼也只作为爱的符号才是赠礼，并因此作为符号以外的任何东西而被取消；

- 另一方面，则是母亲以乳房形式呈现给儿童的需要对象。

你们难道没有看到，二者之间涉及一种平衡与补偿吗？每当出现爱的挫折，这项挫折都会通过需要的满足得到补偿。

正因为母亲让呼唤她的儿童感到欠缺，儿童才抓住、紧紧抓住她的乳房，并使乳房变得比它原本所是的一切更具意义：只要他把乳房含在嘴里并从中得到满足，他便无法同它分开；它还使他吃饱、休息并得到满足。在这里，需要的满足既是补偿，而且我几乎要说，它开始成为爱的挫折之托辞。

于是，对象取得的优先价值——这里是乳房或奶嘴——恰恰建立在这一点上：一个实在对象

- 作为爱之对象的一部分取得自己的功能；

- 作为象征性的东西取得自己的意义；

- 它作为实在对象，成为象征对象的一部分；驱力指向实在对象，是因为它是象征对象的一部分。

由此才可能开始理解口腔吸收，理解所谓的口腔吸收退行机制如何能够介入每一种爱恋关系。

当然，在这个对象的时期，这个满足实在需要的对象，从一个实在对象能够成为象征对象之要素的时刻起：

- 任何其他能够满足实在需要的对象，都可以前来占据它的位置；
- 首先就是那种已经得到象征化、却又因其得到完整物质化而同样是对象的东西；它可以前来占据这个位置，也就是言语。

对原初吞噬对象的口腔反应，正是作为爱的挫折之补偿，才构成一种并入反应；而这种反应又为另一类并入提供范型和铸模，其中尤其包括某些言语的并入，它正是所谓超我早期形成的起源。主体以内在的超我之名并入的，是某种类似需要对象的东西：它本身不是赠礼，而是在赠礼欠缺时的替代物；这两者完全不同。

由此，拥有或不拥有阴茎这件事也可以取得双重意义，沿着最初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进入主体的想象经济。因为在某一时刻，阴茎可以沿着乳房和奶嘴这类对象的谱系，定位在这种对象的位置上；这是一条道路。

阴茎的口腔并入形式，在某些症状和功能的决定作用中占有位置。但阴茎还以另一种方式进入这种经济：它不是作为爱的挫折的一种——

可以这样说——补偿性对象，而是作为位于爱之对象彼岸、又为后者所欠缺的东西。

- 其中一个，我们就称为阴茎；连同它包含的一切，它终究是一种想象功能，因为它是以想象方式得到并入的。

- 另一个，则是母亲所欠缺的阳具；它位于母亲彼岸、她爱的权能彼岸，是她所欠缺的东西。自今年研讨班开始以来，我就围绕它向你们提出这个问题：主体在什么时刻以这样一种方式发现这项缺失，以至于他自己可能卷入其中，前来替代它？也就是说，在重新找到逃避他的爱之对象时，他会选择另一条道路：亲自把自己的缺失带给对象。

这个区分至关重要；今天，它将使我们得以初步勾勒出至少必须具备什么，那个时刻才会发生。我们已经有了象征结构化、可能的内摄，由此也确立了弗洛伊德式原初认同最鲜明的形式。Verliebtheit［爱恋状态］能够在第二个时刻发生。除了在自恋关系的界域中，也就是在你们面前讲话的这个人已经界定并衔接的镜像关系中，Verliebtheit 根本无法设想，在任何地方也没有以别的方式得到衔接。

在一个可以标定日期、必然不会早于第六个月的时刻，主体同他者意象的这种关系发生了；这个意象为主体提供一副矩阵，围绕它可以组织我所谓“他所体验的不完整”。也就是说，相对于这个以完整形态呈现的意象，主体处于欠缺之中，他可能缺少某种东西；这个意象对他而言不仅是充盈的，还是欢欣的来源，因为人同自己的意象之间存在一种特有关系。

当想象界介入时，以儿童的对象与母亲之间最初两项象征关系为基础，便可能出现下列事情：对母亲和儿童自己来说，都可能有某种东西在想象层面欠缺；彼岸可能存在某种作为缺失的东西，因为儿童本人已经在镜像关系中把握并体验到一种可能的缺失。

因此，正是在自恋实现的彼岸——就围绕他者开始组织那种深度攻击性的、紧张的往返运动而言，自我的连续层次也将在这个他者周围凝结和结晶——，主体才可能在他自己构成为母亲对象的那个位置彼岸，看到这一形式出现：无论如何，爱之对象本身也被某种主体作为对象无法拥抱的东西抓住、俘获并留置；也就是一种怀念，某种同爱之对象自身的缺失相关的东西。[注]

> [注] 米勒编订本（Seuil，1994，第 176 页）明确作 Ce n'est qu'au-delà…（"只有在……彼岸"）；Staferla 转录漏掉 que 而作 Ce n'est donc pas…。本译据米勒本校正。

事实上，在我们目前抵达的位置，所有这一切都建立在一种传递事实之上；它使我们作出下列预设……因为经验迫使我们这样做，而且弗洛伊德直到自己表述的最后时刻都始终完全忠于这种经验……任何前来替代缺失的实在对象所带来的满足，都从未成功填满这项缺失。在母亲那里，母亲同儿童的关系始终是一个依附点，使她在想象层面嵌入阳具的缺失。

儿童——也就是主体——正是在第二个镜像想象认同的时刻以后，才把"身体意象"本身作为自我的起源和矩阵来取得；由此，他已经能够实现母亲所欠缺的东西。但这要求先有一种镜像经验：他者构成一个总体，而相对于这个总体，可能缺少某种由主体带来的东西。在爱之

对象彼岸，主体可能被引向亲自替代这项缺失，把自己提议为填满这项缺失的对象；前述经验就是它的条件和先决要求。

我想，你们会把这一点留在心里：我已经把你们带到一种“形式”的完成和提出；你们只需先把它留在心里，我们才能准确地重新接过这些事情，并向你们展示这种“形式”从现在起对应什么。你们在这里看到逐渐勾勒出来的，是当前呈现给你们的、完成了的主体所具有的新维度和新性质——当超我、自我理想、自我等功能已经分化时——，也就是自我理想的功能。

问题在于弄清弗洛伊德在文章末尾看得十分清楚并说出的东西：在Verliebtheit［爱恋状态］中，前来占据“自我或自我理想的位置”的那个对象究竟是什么。到目前为止，因为在我向你们说明自恋时，必须强调自我的理想形成……我是说：自我的形成作为一种理想形成，自我正是从自我理想出发分离出来……所以，我还没有向你们充分衔接二者之间的差异。

可是，只要翻开弗洛伊德，看看他那些丰饶的晦涩和那幅在人们手中传来传去、却没有任何人想到要复制的图式，你们会在这一章末尾看到什么？他把不同主体的自我放在这里。问题是要知道，主体们为什么共享同一个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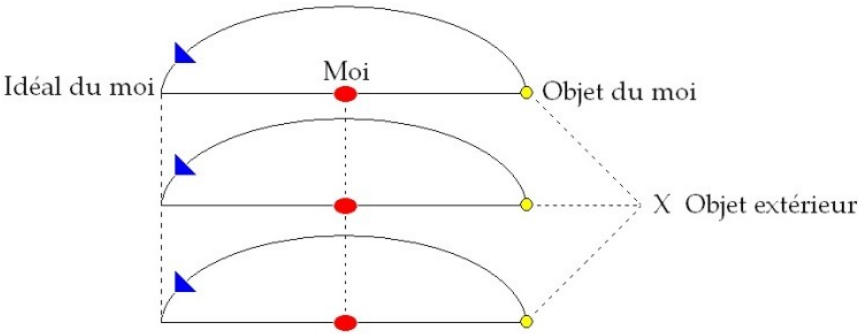


Schéma de Freud

他向我们解释说，自我理想同对象发生认同；文本中的这些对象全都被预设为同一个对象。可是，只要观察图式，就会发现，他特意把这三个本来可以被预设为同一者的对象，同位于所有对象背后的一个外部对象连接起来。

你们难道没有在这里看到一项醒目的方向指示，看到它同我正在向你们说明的东西之间的相似吗？也就是说，就 Ich-Ideal［自我理想］而言，涉及的不只是一个对象，而是对象彼岸的某种东西；在这个病例中，它前来反映的——如弗洛伊德所说——并不纯粹是自我，尽管自我无疑会感受到它、可能因它而变得贫乏；它反映在自我根基本身的某种东西中，反映在它最初的形式和最初的要求中。总而言之，它反映为投射成自我理想形式的第一层面纱。

所以下一次，我将从现在停下的位置重新接过问题：自我理想、恋物同作为欠缺对象——也就是阳具——的对象之间的关系。

第11课 · 1957年2月27日

今天，我打算重新接过那些术语；我正试图借它们为你们重新铸造挫折概念，而这种重铸是必要的。若没有它，我们只会看到当前精神分析的主导理论同弗洛伊德学说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你们知道，在我看来，这套学说绝不亚于“由它亲自奠基的经验之唯一正确概念表述”。今天，我会尝试衔接一些或许比往常更偏代数化的东西，但我们先前所做的一切已经为此作好准备。在重新出发以前，让我们把迄今已经衔接的若干术语所应当显现之处标记出来。

Agent	Manque	Objet
Père *réel*	Castration *symbolique*	Phallus *imaginaire*
Mère *symbolique*	Frustration *imaginaire*	Sein *réel*
Père *imaginaire*	Privation *réelle*	Phallus *symbolique*

挫折……我曾在那个三项小表格中给它定位，也就是把它放在两者之间：一边是分析表述弗洛伊德学说时作为起点的阉割，另一边则是某些人以不同方式援引的剥夺……就其根本经验而言，挫折被《今日精神分析》安置在一切过失的核心；那些过失会在可分析的后果中、严

格说来属于我们领域的症状中留下标记。我说，我们必须理解挫折，才能有效地使用它。

当然，既然分析经验把它推到常用术语的前台，这不可能全无理由。另一方面，它的盛行深刻改变了我们面对神经症现象时的整个思想经济，并在若干方面把思想引向死胡同。这正是我一直试图借许多例子向你们证明的——我希望颇有成效。随着你们睁大眼睛更多地研读分析文献，这一点还会显得更加确凿。

先确定一点：挫折并非简单意义上对一个满足对象的拒绝。满足意味着需要得到满足；这一点不必多说。通常人们谈挫折时，并没有提出任何东西。我们经历令人受挫的经验，认为它们会留下痕迹，于是就这样使用这个概念，不再深究。我们只是忘了：事情若真如此简单，就还必须解释，为什么受到这种挫折的欲望会具有弗洛伊德从著作一开始就如此强烈强调的特征和性质。正如我向你们指出的，他全部著作的发展始终都在追问同一个谜：无意识中受到压抑的欲望不可摧毁。

如果仅从需要的视角出发，这一点严格说来无法解释。因为，我们在动物经济中得到的一切经验都确证：需要受到挫折，会给有机体带来各种或多或少可以承受的改变；但它肯定不会产生一件显而易见之物的反面，也就是——

把欲望本身维持下去。个体要么衰亡，要么欲望发生改变，要么欲望衰退。

无论如何，挫折同欲望的持久维持乃至“坚持”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必然的一致性；

这里使用“坚持”一词，是因为我们谈重复自动机制时，我曾把欲望的坚持推到前台。况且，弗洛伊德从不把挫折说成简单的 Versagung；这个德语词更恰当地落在“废止”的观念中，就像人们说废止一项条约、撤回一项承诺。确实如此，以至于 Versagung 有时甚至可以被放到相反一侧：它既可能意指“承诺”，也可能意指“违背承诺”。这两个意思在这里维系在一起，正如德语中许多带有前缀 ver- 的词那样；这个前缀至关重要，并在分析理论的用词选择中占有突出位置。

先直接说出来：如果只是这样给出“挫折—攻击—退行”三联式，那么它远远不具备那种似乎可以立刻理解、颇具诱惑力的意义。只需稍稍靠近它，

就会发现，它本身并不可理解；它只不过提出了自身怎样才能得到理解的问题。

我们没有理由不随意给出另一套序列；例如，我可以随机告诉你们：“抑郁—悔恨”，还可以发明许多别的组合。

真正需要提出的是挫折同退行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从未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理。

我说它不令人满意，是因为在这种用法中，退行概念本身并未得到阐发。

所以，挫折并不是对满足对象的拒绝，也不以此为根本。它是……这里，我只是把先前已经推敲过的一系列公式依次重新列出；除了稍作提示，我相对不必再次证明。我想在你们面前铺开一条链条，使你们能记住它的主要关节，以便使用并检验它们是否有效……从原初上

说，它是……既然我们遵循从开端把握事情的道路，我说的不是发展，因为这已经不再具有发展的性质，而是儿童同母亲的原初关系……挫折本身——不是任何挫折，而是能够用于我们辩证法的挫折——只能被设想成对赠礼的拒绝，而赠礼本身是所谓爱之物的象征。

相关知识卡 象征母亲、实在母亲与赠礼

这样说时，我并没有说任何未由弗洛伊德本人明白写下的东西。

爱之关系的根本性质，连同它本身所包含的一切——不是二级、而是三级阐发——，并非只意味着面前有一个对象，而是意味着面前有一个存在者。弗洛伊德在许多段落中都把它思考为起点处的关系。这是什么意思？

这不是说儿童已经建构一套爱的哲学，或已区分爱与欲望；而是说，他已经浸泡在一个蕴含象征秩序存在的环境中。我们已经可以在他的行为中找到证据：有些事情正在发生，而只有象征秩序已经在场，这些事情才可能得到设想。

这里，我们始终面对同一种歧义。它产生于下列情况：我们的科学是个体的科学、主体的科学，于是我们屈从于从起点处——在主体内部——开始的需要。我们忘记，作为主体的主体不能等同于个体。即使主体作为个体，同一切把他作为主体牵涉其中的秩序分离，这个秩序也依然存在。换言之，主体间关系的法则深刻支配着个体所依赖的一切，并因此把他作为个体牵涉进这一秩序，无论他是否意识到。

换句话说，我们甚至无法尝试完成那种虽然不断被实行、又不断重做的绝望尝试。我指的是一个名叫马莱的人写的恐怖症文章[注1]；他想向我们说明，谈到

> [注1] 让·马莱：《恐怖症研究之贡献》，法国大学出版社，1955 年。

恐怖症、原始恐怖症以及儿童同黑暗的最初关系时，这些关系如何得到解释，尤其是父亲的意象如何从这些焦虑的涌现中产生。

我确实可以把这项尝试称作绝望的尝试；它只能借助粗得像胳膊一样的把戏来完成。无论个体是否活着，父性秩序都存在。儿童恐惧在父亲—儿童的主体间关系中取得经过衔接的意义；这种关系本身已经受到象征界的深刻组织。在那里，它们构成——

可以这样说——儿童势必要在其中发展自身经验的主体语境。这种经验的每个时刻都深深卷入主体间关系，被它重新加工，并在事后受到重新加工；

儿童则通过一系列引线进入这种经验，而这些引线之所以是引线，恰恰因为它们将要真正接入其中。

赠礼本身蕴含交换的整个循环；只有存在一场庞大的赠礼流通，才会有赠礼。

从进入这套流通的主体观点看，它把整个主体间总体卷入其中；主体向其中进入和引入自身的时间，可以早到你们所能设想的程度。

所以，赠礼从客体关系的彼岸涌现，因为对将要进入其中的儿童而言，它恰恰以背后的整个交换秩序为前提。赠礼也只会凭借使它真正

成为象征性的特征，从这个彼岸涌现：没有任何东西天然就是赠礼；它必须由一个预先取消、撤销它的行动构成。赠礼在撤销的背景上涌现，并得到赠予。

相关知识卡 象征母亲、实在母亲与赠礼

因此，赠礼正是在这个背景上，作为先遭取消的爱之符号、随后又以纯粹在场重新出现，才向呼唤得到或得不到给予。我甚至还要说得更多：我说“呼唤”，它是第一层面；但请回忆我们研究精神病［1955—1956 年研讨班］、谈论对言语的根本呼唤时，我说过什么。相对于言语结构，如果只停在这里，我就错了；言语结构意味着，主体以颠倒形式从大他者那里接收自己的消息。

我们现在还没有走到那里；这里涉及的是呼唤。但如果把呼唤孤立地维持下来，那么作为言语第一时刻的呼唤便不能单独成立。弗洛伊德那幅玩 fort-da 游戏的幼儿图景向我们显示的正是这一点。呼唤本身已经要求面对它的对立面；呼唤会把这一对立面标定出来。[注] 正因为受到呼唤之物可以被推开，呼唤才已经在象征秩序中具有根本和奠基作用；无论如何，它已经是一次全然投入的象征秩序引入。

> [注] 米勒编订本（Seuil，1994，第 182 页）作 Appeler le repère，意为“呼唤把它标定出来”；Staferla 把 Appeler 误断为命令式 αppelez-le。

赠礼向不在场之物的呼唤显现；而它在场时，本质上又只作为赠礼的符号，也就是作为满足对象而言等于什么都没有。当它在场时，它恰恰是为了能作为这个“无”而被推开。这场象征游戏根本上的令人失望性质，正是满足本身围绕其得到定位并取得意义的核心关节。

当然，我不是说儿童有时不会获得那种单凭生命节律便会出现的协调满足；但我要说，挫折中受到质疑的一切满足，都在象征秩序根本上令人失望的背景上出现。在这里，满足只是一项替代和补偿：儿童在口腔中抓住满足对象——这里是乳房——这个实在对象，并以此把象征游戏本身令人失望的性质压扁在上面。

事实上，令儿童在这项满足中入睡的，恰恰是他的失望、他的挫折，是他有时体验到的拒绝，是对象既在那里又永远不在那里的痛苦辩证法。他在一件事中练习这套辩证法；对我们而言，它由那个练习所象征，而弗洛伊德通常将其把握成主体同“在场—缺席”这对组合之关系根底的最终结果和纯粹游戏。当然，弗洛伊德在这里把它把握在纯粹状态和分离形式中；但他辨认出了这种关系游戏：以缺席为背景的在场，以及作为构成在场之物的缺席。

所以，儿童在满足中，以使游戏入睡的口腔把握，压扁这项关系根本上的不满足。他闷住从这种根本象征关系中显出的东西；于是，我们完全不必惊讶：恰恰在睡眠中，他的欲望会在象征层面持续显现。

我要借此向你们强调：即使在据说再简单不过的儿童之梦——小安娜·弗洛伊德的梦——中，儿童欲望也并非同纯粹而简单的自然满足相连。小安娜·弗洛伊德说：“树莓、奶油布丁。”这是什么意思？所有这些对象都是超越性对象；它们已经如此深入象征秩序，以至于恰恰都是作为禁物的被禁止对象。没有任何东西迫使我们认为，小安娜·弗洛伊德那天晚上没有得到满足；很可能恰恰相反。在梦中作为欲望持续存在的东西，固然毫无伪装地表达出来，却经历了象征秩序的全部置换：它是不可能之欲望。[注]　当然，如果你们仍然怀疑言语在这

里发挥根本作用，我就要提醒你们：假如小安娜·弗洛伊德没有用言语说出它，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件事。

> [注] 米勒编订本（Seuil，1994，第 183 页）作 exprimé sans déguisement（“毫无伪装地表达出来”）；Staferla 此处转录有误。

可是，当作为需要满足的满足前来替代

象征满足时，会发生什么？正因为它在这里就是为了取代后者，它由此立即经历一次转变。如果这个实在对象在爱的要求——也就是象征请求——中本身变成符号，它便立刻引起一次转变。

我说，实在对象在这里取得象征价值。如果只是告诉你们，它由此变成了象征或者近似象征，那不过是一场戏法。真正取得象征价值和重音的，是使儿童占有这个对象的活动，是儿童把握它的方式。于是，口腔性不仅是它原本所是的东西，也就是饥饿的本能方式，承载着保存自身身体的力比多——弗洛伊德曾围绕它提出问题。

这种力比多究竟是什么：保存力比多，还是性力比多？它本身当然就是这一切，甚至还蕴含 destrudo［毁灭力］；但恰恰因为它进入了以满足替代爱之要求的辩证法，它才确实是一种情色化的活动：严格意义上的力比多和性力比多。这一切并非徒然的修辞衔接；因为一些并不十分敏锐的人，曾针对分析关于“乳房的情色化”一类评论提出反对意见，而若不回避这些意见，就绝不可能以其他方式跨过它们。例如夏尔·布隆代尔先生。在最新一期《哲学研究》有关弗洛伊德评论的内容中，法韦兹—布托尼耶夫人在一篇文章里提醒我们，夏尔·布隆代尔先生说过：

“我什么都愿意听，可是儿童根本不吃母乳、而是用奶瓶喂养时，他们又怎样解释？”

我刚才为你们结构化的内容恰恰回答了这个问题。实在对象一旦进入挫折辩证法，本身并非毫无差别；但它不必是特定对象，不必就是母亲的乳房。它在性辩证法中的位置价值不会因此失去，口腔区域的情色化也由此产生；因为在这里发挥根本作用的，恰恰不是对象，而是这项活动在象征秩序所编排的欲望层面取得情色化功能这一事实。

我还要顺带提醒你们，这一点甚至走到如下程度：根本没有实在对象，也仍有可能发挥同一作用，因为这里涉及的是产生这种替代性满足、取代象征满足的东西。只有这一点能够解释神经性厌食一类症状的真正功能。

我曾谈到同母亲的原初关系；正是在同一个时刻，母亲成为一个实在存在者，因为她能够无止境地拒绝，因而从字面上说无所不能。如我向你们说过的，全能的维度首次在她的层面出现……并非在某种狂妄观的莫名假设层面；那种假设只是把分析家头脑里的东西投射到儿童身上……德语 Wirklichkeit 既意味着效力又意味着现实；这项根本效力首先在这个层面呈现为实在存在者的全能，赠礼的给予或不给予都绝对而无可求援地依赖于她。

我正在告诉你们，母亲从原初上就是全能的；若要理解任何有效的东西，就不能从这套辩证法中删掉她。这是根本条件之一。我并不是在同梅兰妮·克莱因夫人一道告诉你们，母亲包含一切。那是另一回事，我只顺带提到它。我曾提醒你们：在母亲身体这个庞大容器里汇聚着全部原始幻想对象，而我们现在可以开始看出这何以可能。梅兰

妮·克莱因夫人大致向我们表明了“它确实可能”，却始终很难说明“它何以可能”；她的对手当然没有放过这一点，以此断言梅兰妮·克莱因夫人无疑只是在做梦。

当然，她确实在做梦；而且她有理由做梦。因为这项事实只有通过把想象对象的整副琴弦事后投射到母亲身体之中，才成为可能。不过，这些对象的确全都在那里：母亲构成一个虚拟的、象征性虚无化的场域，未来的一切对象将依次从中取得自己的象征价值。只要把一个约两岁的儿童放在稍晚一点的层面，我们就完全不必惊讶她会发现这些对象被事后投射其中。甚至可以像谈其他一切那样，在某种意义上说：既然它们已经准备好在某天来到那里，它们就早已在那里。

于是，我们抵达儿童面对母亲全能的位置。既然处在梅兰妮·克莱因夫人的层面，你们会注意到：我刚刚快速提到的，是她本人称作偏执位置的东西；而在全能层面，我们已经来到某种提示所谓抑郁位置的东西。因为面对全能，我们可以猜想，这里存在某种不会同“全能关系”无关的东西：一种虚无化、一种同狂妄观恰好相反的渺小妄想，据梅兰妮·克莱因夫人所说，它在这一状态开始勾勒。显然不能走得太快，因为仅仅母亲作为全能的实在者显露出来，并不会自动给出这一切。要产生抑郁效果，主体还必须能够反思自身，并反思自己的无能同她的全能之间的反差。

这使我们能够在这一点附近作出更精确的规定，而且符合临床经验；因为这一点附近把我们带到弗洛伊德指出的第六个月左右，镜像阶段现象已经在那里发生。你们会对我说：“你曾教我们，当主体能够在镜中反射里把自己的身体把握为总体时，他体验到的更像是一种胜利感；他仿佛在这个完整他者中完成自身，并向自己呈现。”确实，这是

我们重构出来的东西，但并非没有经验确证；这场相遇所具有的欢欣性质毋庸置疑。可是不要忘记，掌控的经验是一回事——它会提供同自身区分的一项根本分裂要素，并始终留在儿童同自身自我的关系中——；遇见主人的经验当然又是另一回事。

掌控的形式确实以一个同他自身异化、却又在某种意义上同他紧密相连并依赖他的总体形式得到给予。可是，这个形式一经给出，主体恰恰会在主人的现实中面对它：问题是，他胜利的时刻是否也是失败的媒介；他面对的这个总体——这次以母亲身体的形式——是否并不服从他。因此，正是在镜像阶段的镜式反射结构介入时，我们才能设想：母亲全能只会在鲜明的抑郁位置中得到反射，也就是儿童的无能感。我刚才谈神经性厌食时所提到的东西，便可能在这里嵌入。

人们也可能在这里走得太快，说主体抵抗全能的唯一能力，就是在行动层面说“不”，并由此引入拒绝症的维度；这个维度当然同我所指的时刻并非毫无关系。不过，我要提醒你们，经验向我们表明——而且无疑并非没有理由——：依赖关系中对全能的抵抗，不是在行动层面以拒绝症形式得到阐发，而是在对象层面；对象曾以“无”的符号向我们显现，是作为象征性对象而遭到取消的对象。儿童正是在对象层面挫败自身依赖，恰恰通过“以无为食”，倒转依赖关系，并借此成为那个贪婪地想要使他活下去的全能者之主人。他原本依赖于她，而现在，她却因自己的欲望依赖于他，任凭他通过反复无常的表现——也就是他自己的全能——加以摆布。

因此，我们必须在心中维持一点：可以说，在最初想象关系介入以前，已经有一张必要的床，主体将在它上面进行相反项投射的全部游戏。我们必须从这个根本之处出发：爱的意向性——现在用心理学术

语来说明它，而这种术语相对于我刚才的初步陈述只是一种降格——很早就在对象彼岸构成这种根本象征结构；除非把象征秩序设定为已经建立并作为这样的秩序在场，否则它就无法得到设想。

经验向我们表明了这一点。苏珊·艾萨克斯夫人早就提醒我们：儿童在很小的年龄便能区分偶然造成的伤害与惩罚。还不会说话的儿童，对碰撞和耳光并不作出同样反应。我让你们自己思考这意味着什么。你们会说："很奇怪，动物——至少家养动物——也会这样。"你们或许会提出一项我认为容易驳倒、但可能被当作相反论据使用的反对意见。

这恰恰证明，动物能够抵达一种彼岸的雏形；在同主人发生极为特殊的认同关系时，这个雏形便把它带到那里。不过，动物不像人那样以全部存在嵌入语言秩序。尽管它已经能够作出如此精细的区分——别人究竟只是拍它的背，还是在惩罚它——，但这种区分在它身上不会产生更多东西。

既然目前是在照亮轮廓，就再好好回忆一点。你们也许见过 1939 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它是当年《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的第四期。人们仿佛对自己说："这个语言终究有点东西。"于是，似乎有几个人受到委托来回应这项要求。我以勒文斯坦先生的文章为据；它颇有技巧地保持审慎距离，只提醒人们索绪尔先生曾教导我们存在能指与所指，总之表明自己稍微知道一点。这同我们的经验毫无衔接，除了说我们应当想一想自己正在说什么。既然他停留在这种阐发层面，我也原谅他没有引用我的教学，因为我们已经走得远得多。

可是，有一位代表伦敦学派的赖克罗夫特先生试图再多放入一点内容，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究竟在做什么：分析理论怎样讨论心理内部机构及其相互衔接。不过，也许必须记住，传播理论应当存在；讨论分析场域内部的各个场域及其应当怎样相互传播时，也应记得这套理论。文章提醒我们，当一个儿童喊叫时，可以把它视作一个整体情境：母亲、喊声、儿童；因此，我们完全处在传播理论之中。儿童喊叫，母亲把他的喊声当作信号接收。文章说，如果从这里出发，也许就能够重新组织我们的经验。于是，喊声在这里作为需要的信号介入；文章也明确地这样衔接。

这一说法同我正在教给你们的东西之间，存在下列差别：这里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们所谈的喊声，正如弗洛伊德在儿童表现中突出显示的那样，从一开始就是一种——

它并非被当作信号的喊声，而已经是呼唤自身回应的喊声；可以这样说，它以回应为背景发出呼唤。它在这样一种事态中呼唤：语言不仅已经建立，儿童还已经浸泡在语言环境中，能够把最初的语言碎片作为交替配对来把握和衔接。

这一事实在这里绝对根本。它是一声喊叫，但挫折中我们所考虑的喊叫，是嵌入由象征系统组织起来的诸喊叫之共时世界的喊叫。从现在起，这里已经虚拟地存在这些被组织成象征系统的喊声。人类主体并不只是每次都得到某种对象信号的通知。当我们面对象征系统时，却依据它同信号对象以及其他所有喊声之对象的关系，提出符号问题，这完全恶劣、谬误而且错误。喊声从一开始就为了得到记录而发出，甚至为了以后必须向彼岸的某个大他者交代。只须看看儿童对这些称作语言的经过调制的喊声、对这些称作言语的经过衔接的喊声抱有多

大兴趣，又多么根本地需要接收它们；儿童对这套系统本身就有兴趣。

如果典型的语调恰恰是言语的语调，那是因为这里的语调——可以这样说——在原则上彼此相等；儿童从一开始就既以言语为食，也以面包为食，因为他会死于词语。正如《福音书》所说："使人灭亡的不只是进入他口中的东西，还有从他口中出来的东西。"

现在要迈出下一步。你们已经注意到一点——更准确地说，你们没有注意到，所以我要向你们强调——："退行"一词在这里可以获得一种应用，以一个通常并不从所有方面向你们显现的角度出现。当实在对象及为把握它而进行的活动前来替代象征要求时，"退行"一词便适用于所发生的事情。

我曾告诉你们：儿童在乳房或任何其他对象的接触中，以饱和与饱足压扁自己的失望。严格说来，这正使他进入一种机制的必然性；在这套机制中，象征挫折之后总可能接着发生退行，退行之门由此开启。

现在必须来一个 jump［跳跃］；因为，如果只指出从此以后万事自然展开，我们显然会做出某种完全人为的事情。换言之，当想象界进入时，能指得到一道开口；此后，经由镜像关系而同自身身体建立的全部关系，都可以进入这个开口。你们很容易看出，身体的一切所属物怎样能够由此进入能指。

一段时间里，排泄物成为赠礼的优选对象，这当然不令我们惊讶；因为儿童显然能在同自身身体相关、向他提供的材料中，找到有时用来滋养象征界的这份实在。滞留有时也可能成为拒绝；所有这一切都不

值得惊讶。无论分析经验在肛门象征体系层面发现的现象多么精细而丰富，也不会让我们在这里停留太久。

我刚才说到 jump［跳跃］，因为现在要看的是：阳具怎样进入这套挫折辩证法。这里也要抵御一种徒劳要求，不要寻求自然发生史；如果你们想从生殖器官的某种构造推导出阳具在整个生殖器象征体系中的绝对优先作用，就永远不会成功。你们只会做出各种扭曲；我希望以后向你们详细展示琼斯先生为令人满意地评论弗洛伊德直截了当断言的阳具期而作出的扭曲。他试图向我们说明，女人并不拥有的阳具，怎么会对她如此重要。

这确实非常滑稽，因为问题根本不在那里。首先，问题是一个事实问题：这就是一个事实。如果我们没有在现象中发现这种要求、这种盛行以及阳具的优先地位，发现它统摄着生殖器发展的历险、变迁与失败所涉及的整个想象辩证法，

那么，确实就不会有问题。

而且，完全不必像某些人那样耗尽力气，强调［女孩］儿童

在腹中必然也有自己细微的感觉；这种经验无疑——甚至可能从一开始——就不同于男孩的经验。正如弗洛伊德指出的，问题根本不在那里；而且，这一点显然不言而喻。

如果女人确实像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比男孩更难把子宫或阴道方面发生的现实纳入令她满足的欲望辩证法，那是因为她必须经过某种自己同男性关系全然不同的东西：确切说来，就是她所欠缺的阳具。但

是，为什么会这样，当然无论如何都不能从两性中任何一方的生理构造出发推导。

必须从这一点出发：想象阳具的存在，是一整套要求预设它之事实的枢纽。也就是说，必须研究主体通常迷失其中、甚至可能遭到吞噬的迷宫；引导我们的线索恰恰是有待发现的这一点：母亲欠缺阳具；正因为她欠缺它，她才欲求它；也只有某种东西把它给予母亲，她才可能得到满足。这从字面上说可能令人瞠目结舌。我们必须从令人瞠目结舌之处出发。

认识的首要德性，就是能够面对并非不言而喻的东西。缺失在这里成为主要欲望；对于承认这一点，我们终究也许已经稍有准备。如果承认这也是象征秩序的特征，换言之，正因为想象阳具发挥一种主要能指作用，情形才会如此；而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能指并非每个主体依照自己的性别、禀赋或出生时的嬉闹随意发明出来的：能指存在。作为能指的阳具发挥潜在作用，这毋庸置疑；毕竟，人们需要分析才发现它。

可是，这一点绝对根本。我只是顺带强调它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暂时离开分析领域，到别处去一趟。

围绕《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我曾向列维—斯特劳斯先生提出下面这个问题。我对他说：

“你向我们展示女人怎样在各个世系之间交换的辩证法，并通过一种公设和选择来设定它：女人在世代之间得到交换；我从另一个世系娶来一个女人，就欠下一代或另一个世系另一个女人，而这个循环必须在某一时刻闭合。如果按照交换法则和交表亲优先婚姻来做，事情会在

一个没有理由闭合或断裂的圆环中十分规律地流通；可若按照所谓平表亲来做，就可能产生一些相当麻烦的事情，因为经过一段时间，交换会趋向汇聚，并在各世系内部造成断裂和碎片。”

于是，我向列维—斯特劳斯先生提出这个问题：

> “归根结底，如果你把这个交换圆环倒过来，说各个世代中是女性世系生产男人并交换他们……

因为，我们谈到女人的这项欠缺时，立刻就已得到警示：它不是一种实在欠缺。所有人都知道，女人可以拥有阳具；她们确实拥有阳具，甚至还能生产阳具——她们生下男孩，生下阳具携带者。

> “……那么，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描述各世代间的交换；从形式化观点看，也可以倒过来、以完全相同而对称的方式，选取一条参照轴，建立一套以女人为基础的坐标系来描述事情。”

然而，如果这样做，一大堆事情就会变得不可解释；它们只有通过下列事实才得到解释：在政治权力即使存在于母系社会的一切情况下，它依旧是男性中心的，由男人和男性世系代表；而在这些交换中出现的某种极其古怪的异常、某种改变、例外或悖论，

在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层面的交换法则里，只有相对于亲属游戏以外的某种东西、以它为参照，才能得到严格解释。那就是政治语境，也就是权力秩序，确切说来就是能指秩序；在这个秩序中，权杖同阳具合而为一。

正是由于铭刻在象征秩序——也就是超越个体发展的某种东西——中的理由，拥有或不拥有阳具这件事，才作为一种得到象征化的想象之物，在俄狄浦斯层面取得它的经济重要性。它既决定了阉割情结的重要性，也决定了那项著名的阳具母亲幻想作为突出机构的优先地位；自从它出现在分析视野上，便构成了你们所知道的问题。

在带领你们理解这套阳具辩证法怎样在俄狄浦斯层面得到衔接、完成和解决以前，我想向你们表明，我也可以在前俄狄浦斯的各个楼层停留一阵；唯一条件是以象征关系的根本作用为引线。我要提出下列看法：在阳具的想象功能层面，在所谓阳具母亲的要求层面，这个阳具究竟发挥什么作用？

这里，我想再次向你们展示：只要阅读优秀的分析作者，对象欠缺的概念就绝对不可或缺。卡尔·亚伯拉罕也是我所说的优秀作者之一；他在 1920 年写过一篇十分精彩的《女性的阉割情结》[注2]。文章顺手举出一个例子：一个两岁小女孩午饭以后走到雪茄柜旁，把第一支雪茄给爸爸，把第二支给不抽烟的妈妈，再把第三支夹在两腿之间。妈妈收起整套行头，把它们全都放回雪茄盒。小女孩又回去把这件事重复一遍，这并非偶然：它正好来到自己的位置。

> [注2] 卡尔·亚伯拉罕："女性阉割情结的表现"，载《论文选》，霍加斯出版社，1922 年，第 338 页。

我很遗憾，文章没有把它衔接得更清楚；因为，如果承认第三个动作……

正如亚伯拉罕先生把它作为例子引用时已经暗中承认的那样……表明小女孩欠缺这个象征对象，那么她便借此表现这项欠缺。无疑，正因

如此，她才先把雪茄给那个并不欠缺它的人；随后又向欠缺它的人——母亲——展示应当拿它做什么，并明确标出她“何以能够欲求它”：确切说来，如经验所证明的，是为了“满足那个欠缺它的人”。因为，若阅读弗洛伊德《女性的性欲》一文[注3]，你们就会知道：对小女孩来说，问题并不只是欠缺阳具；她确实还要把阳具或它的等价物——就像她是一个小男孩一样——给予母亲。

> [注3]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论女性的性欲”，载《性生活》，法国大学出版社，1973 年，第 139—155 页。

这个故事只是用来引入一个事实；你们必须知道怎样表象它：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在

倒错现象学中直接得到设想，除非你们从一个比通常提供给你们的观念简单得多的观念出发……在那片由认同、重新实体化、投射和各种网眼构成的黑暗里，人们总会迷失在迷宫中……这里涉及的是阳具。问题在于，儿童怎样以或多或少有意识的方式认识到：母亲的根本全能系于某种东西；并且，他将沿哪条道路把母亲欠缺、他自己也始终欠缺的这个对象给予她。

不要忘记，男孩的阳具终究并不比女孩的阳具强健多少。优秀的作者当然已经看到了这一点；而琼斯先生也毕竟察觉到，卡伦·霍妮夫人在他同弗洛伊德发生争论时，倒更支持他的对手——也就是弗洛伊德。

男孩的阳具具有这种根本不足的性质；他甚至可能因此感到羞耻，深深感到自己有所不及。卡伦·霍妮很善于突出这一点；这不是为了填平男孩和女孩之间差异的沟壑，而是要让两边互相照亮。

在这一线索下，不要忘记男孩在自身作出的发现所具有的价值；这样才能理解人们始终谈论的、他试图诱惑母亲之举究竟有什么确切价值。

这些诱惑尝试深深带着自恋冲突的标记；它们总是最初自恋创伤发生的机会。那些创伤只是日后某些阉割效果的前奏乃至预设，但值得我们停下来考察。

归根结底，这里涉及的，与其说是简单驱力或性攻击，不如说是男孩想让人相信自己是男性或阳具携带者，尽管他只算半个。换言之，在倒错起源的整个前俄狄浦斯时期，一场游戏持续进行：一场“藏手帕游戏”、一场“猜纸牌游戏”，甚至是我们的奇偶游戏。

阳具作为能指，是母亲想象界的根本项；主体必须出于绝对根本的理由抵达这个想象界，因为儿童的自我建立在母亲的这种全能之上。问题在于看它在哪里、又不在哪里。它从不真正位于它所在的地方，也从未完全缺席于它不在的地方。

一切倒错分类都必须据此得到理解：无论人们提出的母亲认同、对象认同等等具有何种价值，根本问题都在于……例如，我们可以举易装为例，也就是奥托·费尼切尔发表于《国际精神分析杂志》创刊号的那篇文章……在易装中，主体使自己的阳具成为问题。人们忘记，易装并不只是或多或少经过变形的同性恋问题，也不只是恋物癖因恋物必须由主体穿戴而产生的特殊形式。费尼切尔十分准确地强调：女性服装下面是一个女人。主体认同于一个拥有阳具的女人，只不过，她正因为阳具被藏起来才拥有它。由此可见，阳具始终必须参与遮蔽它

的某种东西；我们也由此看到，我所谓“面纱”以及服装存在的根本重要性：对象借它们得到物质化。

即使实在对象就在这里，人们也必须能够设想它可能不在那里；并且，人们始终可能以为它恰恰在它不在的地方。同样，在男性同性恋中——今天先限于此——，对主体来说涉及的仍是他自己的阳具；但奇怪的是，依旧是这个属于他的阳具，而他却去另一个人身上寻找它。总而言之，一切倒错都可以据此定位：它们总以某种方式同这个作为能指的对象游戏；就其本性而言，它本身就是一个真正的能指，也就是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按照空间价值来把握的东西。

即使人们最终“抓住它”，找到并永久固定在所谓倒错中的倒错——也就是恋物癖——里，也是如此。因为，恋物癖真正显示的不仅是它究竟在哪里，还显示它究竟是什么：当人们找到它时，它恰好什么也不是，不过是破旧衣物、一套旧行头；在易装中看到的，是恋物癖的一部分；归根结底，它只是一只破旧小鞋。当它真正出现、真正揭开面纱时，它就是恋物。这是什么意思？

这意味着，在俄狄浦斯以前的这个阶段，在我今天为你们奠定并作为出发点的原初挫折关系同俄狄浦斯之间，主体间辩证法有一个构成性时刻：儿童进入诱饵辩证法。母亲欲望从根本上无法满足；为了满足这种不可能得到满足的东西，儿童无论采取哪条道路，都会走上把自己变成骗人的对象这条道路。

我的意思是，这项无法得到满足的欲望必须受到欺骗。自我取得稳定性的整个进程，正是围绕这样一点建立起来的：儿童向母亲展示某种他自身并不是的东西。[注]　正如弗洛伊德在最后一篇论分裂的文章中

所表明的，这些最鲜明的阶段从一开始便带有主体与对象之根本歧义的标记。

> [注] 米勒编订本在此整理为儿童“向母亲展示某种他自身并不是的东西”（Seuil，1994，第 194 页）；Staferla 转录把宾语和间接宾语压成了 il n’est pas à sa mère。

也就是说，儿童正是通过把自己变成用于欺骗的对象，才在同他者的关系中进入一个主体间关系得到完整构成的位置。这里并不只是一种直接诱饵，

不像动物界的情形：披着求偶色彩的动物只须让自己出现，便能竖立整个情境。恰恰相反，主体在他者那里预设欲望；这里涉及的是必须予以满足的二级欲望，而既然这种欲望无法得到满足，就只能欺骗它。

如此鲜明而又总遭遗忘的东西，正是在这种关系中建立：人的暴露癖不同于其他暴露，例如知更鸟的展示；它是在某一时刻拉开裤子，随后又把裤子合上。如果没有裤子，暴露癖就缺少一个维度。那么，会发生什么？

我们在这里同样可能重新遇到退行。因为，儿童在自恋道路上的整个上升，都围绕这个欲望未遂、不满足的母亲建立；而母亲是一个实在的人，她就在那里。像所有欲望未遂的存在者一样，她在那里寻找可以吞噬的东西。儿童从前为了压扁自身象征性不满足而找到的东西，现在可能以张开的大口在他面前重新出现：口腔情境的投射意象，在想象的性满足层面也会重新遇见。美杜莎头颅上张开的洞，是一个儿童在寻求满足母亲时可能遭遇的吞噬形象和可能出口。

这正是幻想向我们揭示的一项巨大危险。我们在吞噬幻想的起源处遇见它，也在这个转折处再次遇见它；在那里，它向我们提供恐怖症显现时的根本形式。观察小汉斯自己的恐惧，我们可以重新找到这一点。现在，小汉斯的情形也许可以在稍微更加澄清的条件下呈现。

在这个转折处，如果你们以我今天刚刚带来的东西为支撑：

- 你们将更清楚地看到恐怖症与倒错的关系；
- 也将更清楚地看到我上次向你们指出的：自我理想的功能将怎样显出轮廓；
- 我相信，你们还会比弗洛伊德解释得更好；因为在他的观察中，怎样辨认小汉斯所谓“大长颈鹿”与“小长颈鹿”，尚有一番摇摆。

正如普雷维尔先生所说：

“大长颈鹿默不作声，小长颈鹿十分稀有。”

在小汉斯病例中，这一点解释得很差；但人们毕竟靠近了真正的问题。只凭小汉斯坐到小长颈鹿身上，尽管毫无疑问代表他母亲的大长颈鹿大声喊叫，这一点就已经相当清楚。

第12课 · 1957年3月6日（速记稿将本课日期标为3月13日）

今天，我们将尝试谈论阉割。你们可以在弗洛伊德著作中看到，它同俄狄浦斯情结一样无处不在；可是，实际上只有谈到俄狄浦斯情结时，弗洛伊德才在 1931 年一篇献给某种全新事物的文章中，尝试把它的公式完整衔接出来[注1]。

> [注1]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论女性的性欲"，载《性生活》，法国大学出版社，1973 年，第 139—155 页。

然而，俄狄浦斯情结从一开始就在弗洛伊德思想中，因为人们可以认为，他正是从那个重大的个人问题出发：父亲是什么？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们从他的传记知道，《致弗利斯书信》证实了这种关切，也证实俄狄浦斯情结从一开始就在场。可是，直到很晚，弗洛伊德才对此作出解释。

对于阉割，任何地方都没有类似的东西。弗洛伊德从未完整衔接这种恐惧或威胁、这种机构、这个戏剧性时刻的确切意义与确切心理影响；而这些词都可以带着问号放在阉割旁边。

归根结底，上次我从挫折之下升起的东西、从同母亲进行的想象阳具游戏入手处理问题。你们许多人即使把握了我所勾勒的父亲介入——他的象征人物纯粹是梦中的象征人物——，仍然对"这种阉割究竟是什么？"抱有疑问。难道为了让主体抵达"生殖器成熟"，他终究必须已经"遭到阉割"吗？

如果只在简单阅读的层面把握事情，那么尽管它没有在任何地方得到这样的衔接，这一点却从字面上蕴含在弗洛伊德著作的每个角落。你们可以说，阉割

- 是俄狄浦斯戏剧的标志；
- 而［俄狄浦斯］又是［阉割］隐含的枢纽。

> 人们可以回避这一点，把它纳入一种“仿佛”，就像分析话语的潮流一样；这股潮流仿佛真正围绕它的［……］提出疑问。可是，只要像我现在这样让文本把你们稍稍拦在这里，这项断言突兀的一面就会向你们显得成问题——它确实有问题。另一方面，我刚才提到的公式无论多么悖谬，你们都可以把它当作出发点。这样一项表述究竟意味着什么？它蕴含什么？预设什么？

作者们确实抓住了这个问题，因为这样一项结果的奇特性毕竟令某些人停下；首当其冲的，例如欧内斯特·琼斯。只要阅读他的著作，你们就会发现，他从未成功克服处理阉割情结本身的困难。于是，他尝试提出一个自己特有的术语；当然，如同任何被引入分析共同体的东西，它在其中走出自己的道路并产生回响。这个独属于他的、主要由英国作者引用的概念，就是希腊语 ἀφάνισις（aphanisis）：“消失”。

相关知识卡 Aphanisis：琼斯的“欲望消失”与拉康的批评

琼斯试图这样解决阉割在心理戏剧史中的作用方式。在他的视角下，我们至少不能把阉割恐惧悬挂在偶然事件、悬挂在那些如此奇特却总在病例史中重复的威胁上，也就是著名的父母威胁：“我们会叫人来把它割掉。”这种威胁带着悖论式动机，并不根植于个体间关系某种必然的常数；但令作者们停步的，并不只是这一面。

弗洛伊德确实把阉割衔接成一种威胁阴茎、威胁阳具的东西——问题恰恰就在这里。如此奇特的东西难以以肯定形式整合，这种困难推动琼斯尝试为它主要围绕其得到构成的发展机制奠定基础。当他开始真正处理超我必须围绕其构成的问题时，这就是他的研究对象；

它促使他把 aphanisis［消隐］概念推到前台。我想，只须由我亲自把它衔接出来，你们就会看到，这个概念本身也绝非没有巨大的困难。

相关知识卡 Aphanisis：琼斯的“欲望消失”与拉康的批评

的确，aphanisis 就是消失，但什么东西的消失？在琼斯那里，是欲望的消失。作为 aphanisis 的阉割情结被拿来替代阉割：它是主体害怕自己身上的欲望熄灭。我想，你们不可能看不到，这样一个概念本身代表着一种高度主体化的关系。

它也许确实可以被设想成一种原初焦虑的来源；但可以肯定，这是一种经过异常反思的焦虑。

这里似乎确实必须跳进一种理解；它把一道巨大鸿沟留在身后，却又同时预设鸿沟已经跨过：一个从最初对象关系活动出发把握的主体，已经退后到某个位置，不仅能把挫折本身衔接出来，还能把对欲望枯竭的忧惧悬挂到这项挫折上。事实上，琼斯正围绕剥夺概念——它引起对 aphanisis 的恐惧——，尝试衔接整个超我的发生史；超我是俄狄浦斯情结正常抵达的终点与正常形成物。

相关知识卡 Aphanisis：琼斯的“欲望消失”与拉康的批评

当然，他立刻遇到一些区分；我相信，我们已经能够给这些区分一种稍微更便于处理的形式。也就是说，当他使用剥夺一词时，哪怕一刻也无法不区分两种剥夺：作为纯粹剥夺的剥夺，使主体的某项需要得

不到满足；以及他称作蓄意的剥夺，它预设主体对面有另一个主体，拒绝给他正在寻求的满足。

从如此缺乏界定的给定出发，要把一项同另一项的过渡结合起来并不容易，尤其当两者仍被保存为同义词时。因此，他自然而然地指出，剥夺最常被主体当作挫折，对主体而言等同于挫折。由此出发，一套过程的许多衔接当然都变得容易；但这些事情若对说话者变得容易，并不意味着对稍有要求的听者也同样容易。

Agent	Manque	Objet
Père *réel*	Castration *symbolique*	Phallus *imaginaire*
Mère *symbolique*	Frustration *imaginaire*	Sein *réel*
Père *imaginaire*	Privation *réelle*	Phallus *symbolique*

事实上，我在这张表格中赋予剥夺一词的意义，完全不同于琼斯。表中作为一项介入的剥夺，正是阉割概念必须相对其得到定位的东西。

如你们所见，我试图恢复挫折一词同真实关系相连的复杂性……在中断前的那次课上，我以非常清楚的方式做过这一点；你们还记得足够多的内容，能够看出我没有以通常那种简略形式使用挫折一词……剥夺与阉割在这里得到区分并介入，只因为我们确实不可能围绕

阉割的影响衔接任何东西，除非把剥夺概念孤立成我所谓“实在中的一个洞”［见表格］。换言之，这里涉及的剥夺……让我们恢复事情的本来面目，不要蒙混过去，恰恰要把它清楚孤立出来……剥夺就是鱼的剥夺，也就是“女人尤其没有阴茎”这项事实。[译注1]

> [译注1] 原文以 noyer le poisson（字面义“淹死鱼”，意为“把事情搅混”）与 privation du poisson（“鱼的剥夺”）构成口语双关；后一句的语义重心是女人没有阴茎这一实在事实。

我的意思是，几乎在弗洛伊德向我们展示的每一个病例中，这项事实都不断以它对发展的影响介入：女人没有阴茎；接受女人被剥夺阴茎这项事实，给男孩提供了最突出的例子——我们在弗洛伊德病例史中随时都能遇到。因此，如果阉割是我们正在寻找的东西，它便以对女人没有阴茎这一事实的实在把握为基础。在多数病例中，男性主体的经验都围绕这个关键点旋转；剥夺概念以格外令人焦虑和有效的方式，依靠这一基础得到支撑。

确实如此：人类中有一部分存在者，在文本里据说“遭到阉割”。当然，这个术语完全歧义：他们只是在主体的主体性中“遭到阉割”。他们在实在界中究竟是什么？作为实在经验受到援引的，是他们在现实中“遭到剥夺”。所以，我所指的就是这种对实在界的参照；在弗洛伊德文本的教学中，阉割经验围绕它旋转。

我曾提醒你们：要正确衔接这些思想，就必须把一种东西同

这种实在界中的剥夺关联起来。只要我们以参照方式这样设定事情，问题就必然涉及——不是病人的经验，而是我们思想的经验——我们自己把握问题的方式。在这样的经验中，剥夺概念尤其感性而鲜明地显露出来，因为它蕴含对象的象征化。

在实在界中，没有任何东西被剥夺任何东西；一切实在之物都自给自足，因为实在界按定义是充实的。如果我们把剥夺概念引入实在界，那是因为我们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象征化实在界，甚至已完整地象征化它，以便表明：某种东西若不在那里，恰恰是因为我们预设它可能在场。也就是说，我们把单纯的象征秩序引入实在界，以某种方式覆盖它、挖空它、使它［……］。因此，我说，在这一步的层面，这里涉及的对象就是阴茎；当我们谈论剥夺时，它是在这个时刻与层面以象征状态给予我们的对象。

Agent	Manque	Objet
Père *réel*	Castration *symbolique*	Phallus *imaginaire*
Mère *symbolique*	Frustration *imaginaire*	Sein *réel*
Père *imaginaire*	Privation *réelle*	Phallus *symbolique*

另一方面，我提醒你们这张表格的必要性。十分清楚，阉割只要在神经症发生史中有效、得到体验并在场，就是对一个想象对象的阉割。在神经症的影响中，我们所谈的阉割从来不是实在阉割；正因为它在主体身上以针对想象对象的一项行动形式发挥作用，阉割才介入。我们的问题恰恰在于设想：为什么、又由于何种必然性，阉割会进入主体的典型发展。

主体必须抵达构成人同女人之关系的复杂秩序；这个秩序使生殖器实现在人类中服从若干条件。同上次一样，我们从主体

同母亲的原初关系重新出发；这就是所谓前俄狄浦斯阶段，而我们已经看到，可以围绕它衔接许多东西。

我们希望，自己比通常谈前俄狄浦斯阶段时衔接得更好一些；我的意思是，我们以更具区分的方式，考虑全部作者话语中始终会重新遇到的东西。我们认为，即使这些东西已经得到证明，人们处理和推理它们的方式仍然不够好。

我们将从这里重新出发，尝试在阉割现象诞生之际，把握它的必然性。阉割象征着一项象征性债务、一次象征性惩罚；它铭刻在象征场景中，并抓住这个想象对象作为自己的工具。

为了先给自己一条引线、让我们可以参照我首先设定并请你们暂时接受的术语，我要提出我们的衔接可以依靠的假设。上次我们已经看到，在象征母亲背后，存在我们所谓的象征父亲。他在某种意义上是象征建构的一项必然性，但我们只能把他定位在一个彼岸，我几乎要说定位在某种超越性中。无论如何，正如我顺带向你们指出的，只有神话建构才能抵达他。

相关知识卡 象征父亲、想象父亲与实在父亲

我经常强调，归根结底，这位象征父亲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得到再现。后续内容会证实，这个说法是否有效，是否确实有助于我们在复杂现实中重新找到阉割戏剧的这一要素。这里，我们发现下方的实在父亲；那里，则是想象父亲。

如果说象征父亲就是能指，那么我们每次谈到他，都只能同时重新发现他的必然性以及一种我们必须接受为能指世界不可还原之给定的性质。如果象征父亲确实如此，那么想象父亲与实在父亲这两个术语给我们带来的困难就少得多。

相关知识卡 象征父亲、想象父亲与实在父亲

我们始终都在同想象父亲打交道。以往，人们谈及下列一切得到容许的辩证法时，最常参照的就是他：

- 攻击性的整个辩证法；
- 认同的整个辩证法；
- 理想化的整个辩证法。

主体借这些辩证法抵达所谓“对父亲的认同”。这一切都发生在想象父亲层面。

如果我们称他为想象的，那也是因为他被整合到想象界关系中；这种关系为严格说来属于物种的关系、同相似者的关系提供心理支撑，而同样的关系也处在一切力比多俘获和一切攻击反应的根底。因此，想象父亲也参与其中，并具有典型特征。这位想象父亲既是我们在许多神经症经验深处所熟悉的可怕父亲，也是一位不必同儿童的实在父亲具有任何关系的父亲。

相关知识卡 象征父亲、想象父亲与实在父亲

这解释了为什么在儿童幻想中，经常会有一个父亲形象——有时也尤其是母亲形象——介入；这个形象偶尔面目狰狞，同当时在场的儿童

实在父亲只有极其遥远的关系。它只同某个时期以及想象父亲将在特定发展时刻发挥的功能相连。

实在父亲则完全是另一回事。由于幻想的介入和象征关系的必然性，儿童同所有人一样，归根结底从来都很难把握他。如果有什么处在全部分析经验的基础和根基处，那就是我们为何如此难以把握身边最为实在的东西：人类真实的样子。

相关知识卡 象征父亲、想象父亲与实在父亲

无论对心理发展还是日常生活而言，全部困难都在于认清我们真正在同谁打交道；尤其要认清一个在普通条件下凭借自身在场，同儿童发展如此密切相连的人物——父亲。他有充分理由被视作一个恒定要素，

是如今所谓儿童环境中的一个恒定要素。

请你们接受下面这个命题；它从某些方面看，起初也许会因自身性质而显得悖谬。同某种企图在俄狄浦斯戏剧中反复强调阉割情结的规范性或典型观念相反，围绕阉割情结发生的事情中，突出功能实际上被交付给实在父亲。

相关知识卡 象征父亲、想象父亲与实在父亲

所以，你们看到，按照我的表述，那些已经可能显得偶然和难以解释的东西——为什么是阉割？为什么这种名为阉割的古怪介入形式会出现在主体经济中？——本身就有某种令人震惊之处。我还加倍强调它的偶然性：这并非偶然，也不是因为研究这个主题的早期阶段有某种古怪之处，才让医生最初停留在那些后来被发现比想象中更具幻想性质的东西上，也就是原初诱惑场景。你们知道，这是弗洛伊德思想的

一个阶段，甚至早于他进行分析、早于他在这个问题上形成学说。然而，就阉割而言，问题绝不是像人们处理原初诱惑场景那样，把整个阉割问题幻想化。

如果阉割确实值得单独划出、在主体历史中拥有一个名称，它就始终同

实在父亲的作用和介入相连；或者，也可以说，实在父亲的缺席会给它留下深刻标记，并使它严重失衡。只有相对于这种必然性，才会引入一种深度的非典型状态，并要求用另一种具有深刻致神经症作用的东西替代实在父亲。

相关知识卡 象征父亲、想象父亲与实在父亲

所以，我们将从实在父亲与阉割之间根本联系的预设出发，尝试在弗洛伊德为我们阐发的复杂戏剧中找到方向。我们经常感觉，他事先受到一条无比可靠的笔直线索引导；例如在小汉斯病例中，我曾向你们强调，我们自己也仿佛每时每刻都受到引导，却既没有把握任何东西，也不知道是什么理由让我们在每个岔路口作出选择。因此，请你们暂且接受一点：我们将围绕这个位置，开始尝试理解阉割情结之意义的必然性。

以小汉斯病例为例。从四岁半开始，小汉斯出现了所谓恐怖症，也就是神经症。后来接手这项恐怖症的人，恰好是弗洛伊德的一名弟子，而且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也就是人们能找到的最好的实在父亲。文本还告诉我们，小汉斯确实对他抱有一切好感；他显然非常爱父亲，完全不会害怕父亲会像阉割那样过分对待自己。

另一方面，也不能说小汉斯真正受到了什么挫折。在观察开始时，我们看到身为独生子的他浸泡在幸福里。父亲当然不是等到恐怖症出现才开始关心他；母亲也给予他最温柔的照料，甚至温柔到一切都由着他。

说实话，只有弗洛伊德那种崇高的安详，才会认可母亲的做法。很清楚，放到今天，一切诅咒都会倾泻到这位母亲头上：她每天早晨都让小汉斯作为第三者进入夫妻床铺，尽管父亲兼丈夫明确表示保留意见。

这位父亲有时不仅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宽容；我们还可以判断，他在这个情境中完全不在局内。无论他说什么，事情都继续以最坚决的方式照常发生；我们从未看到这位母亲哪怕一分钟稍稍考虑过

父亲这个人物恭敬地向她提出的意见。

小汉斯没有受到任何挫折，也没有真正遭到任何剥夺。不过，在观察开始时，母亲确实曾禁止他手淫；这不但并非无关紧要，她甚至说出了那句致命的话：

“如果你手淫，我们就叫 A 医生来把它割掉。”

这件事在观察开头得到报告，但我们没有觉得它是某种决定性事件。儿童继续手淫。当然，这件事本身不是评估要素；不过，出于观察记录的审慎，它肯定必须得到注明：父母已经充分了解相关情况，而这丝毫没有阻止他们继续像一无所知那样行事。

然而，弗洛伊德本人在这个时刻肯定也从未想到，要把任何有关恐怖症出现的决定性东西归结于此。儿童听见这个威胁，我几乎要说他“以应有的方式”听见它。你们甚至会看到，事后显露出这样一种含义：归根结底，对一个儿童也没有更多话可说；它恰好会成为他建构自己需要之物的材料，也就是阉割情结。可是，他为什么需要它，恰恰又是另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就处在这个问题上，而且还远不能立刻给它答案。

目前涉及的不是阉割，那不是我问题的支撑；这里涉及的是恐怖症，以及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把它简单而直接地同手淫禁令联系起来这一事实。

正如弗洛伊德非常准确地说，此刻手淫本身不会带来任何焦虑，儿童还会继续手淫。当然，他后来会把手淫整合到恐怖症发生时显现的冲突中；但在这个时刻，并没有任何显而易见的创伤性影响，能够使我们理解恐怖症的涌现。

这个儿童周围的条件十分理想；恐怖症具有怎样的效力，仍是一个必须以它真正值得追问的性质引入的问题。我们由此才能找到一些会令我们得到启发、甚至有利于我们的交叉印证。

这里有两件事。首先，我要在你们面前作一项考察，回顾儿童的阳具相对于母亲的根本情境。我们已经说过，在前俄狄浦斯关系、儿童同母亲的关系中，母亲是：

- 爱之对象；
- 因其在场而受到欲求的对象；
- 一个预设着某种关系的对象。这种关系可以像你们所预设的那样简单，却很早便在经验、儿童的行为、他的敏感性以及对母亲在场的反应中显露，而且很快被衔接成“在场—缺席”的配对。

你们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人们之所以围绕所谓“儿童最初的对象世界”提出困难，是因为没有充分区分“对象”一词本身。一个原初对象确实存在。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在观念上把这个“儿童世界”建构成某种边界未定的悬浮状态，只悬挂在满足他的器官——也就是喂养器官——之上；我并不是第一个反对这种看法的人。

例如，爱丽丝·巴林特的全部著作和衔接，都以另一种方式——我认为不那么站得住脚——衔接我正在告诉你们的东西，也就是母亲确实存在……但这并不预设所谓自我与非我的东西已经存在。

……母亲作为象征对象和爱之对象存在。经验以及我在这张表格中赋予母亲的位置都会证实这一点：母亲首先是所谓“象征母亲”；只有在挫折危机中，她才通过母子关系中发生的一系列冲撞和特殊事件开始实在化。这位作为爱之对象的母亲，随时都可能成为实在母亲，恰恰因为她使儿童在这种爱上受到挫折。

儿童同她的关系是一种爱之关系。它确实包含某种能够为通常所谓“最初的未分化关系”开门的东西；但人们这样说，只因不知道怎样衔接它。事实上，作为爱之关系本身的第一个具体阶段、构成背景并使儿童满足能否带着意义发生的根本之物，究竟是什么？

儿童把自己也作为母亲爱之对象纳入这项关系。也就是说，儿童获知自己给母亲带来快乐。这是儿童的一项根本经验：他知道，自己的在场若多少能够要求那个对他不可或缺的人在场，是因为他本人向这种在场引入了某种东西；这份光亮使母亲的在场围绕他，而他向她带来爱的满足。

“被爱”具有根本地位；母子之间将要展开的一切，都以它为背景。某种东西在儿童经验中逐渐得到衔接，向他表明：母亲在他身边时，并非只有他一个人。母子关系发展的整个辩证法，都将围绕这一点衔接。我已经向你们指出，事实提出的问题在于：儿童怎样把握自己对母亲而言是什么；而你们知道，我们把一点设定成基本假设。

如果他不是唯一一个人，而且一切都围绕这一点旋转，我们当然会立刻想到一种再常见不过的经验：首先，他并不孤单，因为还有其他孩子。但我们曾提出一个基本假设：还有另一个恒定、根本的项，它不依赖历史的偶然与特殊，也不依赖例如另一个孩子的在场

或缺席。那就是母亲以因主体而异的程度保有 Penisneid［阴茎嫉羡］，儿童相对于它成为某种东西。他填满它或者没有填满它，但问题已经提出。对儿童而言的阳具母亲之发现，同母亲身上的 Penisneid 之发现严格共存；这正是我们目前尝试处理的问题。

二者不在同一层面；我选择从某一点出发，以抵达另一个点。在这个阶段，我们必须把 Penisneid 视作分析经验的根本给定之一，视作母亲同儿童之关系的恒定参照项。经验表明——因为与通常所说的相反，倒错不能完全由前俄狄浦斯阶段解释，除此之外也没有办法衔接它们——，儿童正是在同母亲的关系中，把阳具体验为母亲欲望的中心；而他把自己定位在不同位置，借此维持、确切说来欺骗母亲的欲望。我刚才提到的那次课，所衔接的正是这一点。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儿童都向母亲呈现自己，仿佛自身就是"向她提供阳具的某种东西"；其程度和位置各不相同。他可以：

相关知识卡 母亲—孩子—阳具三角

- 认同于母亲；
- 认同于阳具；
- 认同于作为阳具携带者的母亲；
- 或把自己呈现为阳具携带者。

这里对想象关系层面、我所谓的诱骗关系层面作出了高度概括，而不是高度抽象。儿童借此以某种方式向母亲证明：他不仅能够作为儿童填满她，

还能够在欲望以及母亲所欠缺之物的层面——总而言之——填满她。

这个情境肯定具有结构性和根本性；因为恋物癖者同其对象的关系只能围绕它得到衔接。例如，同易装这样一种复杂、精细而只有分析才能突出并命名的关系相连的全部中间阶次，也只能如此衔接。同性恋

在这里另作处理，因为其中涉及的是对另一个人身上实在阴茎和对象的需要。

我们将在什么时刻看到某种东西终结这样维持的关系？例如，在小汉斯病例中，观察开头便出现了终结因素。凭借一种令人欣喜的光照相遇、凭借每当我们作出发现时都会发生的幸运奇迹，我们看到儿童完全投入一项阳具发挥最明显作用的关系。父亲提供的笔记，记录了儿童从发展起点直到恐怖症开始的 H 时刻；它告诉我们，儿童始终都在幻想阳具，询问母亲身上是否有阳具——

确切说来，先问母亲，随后问父亲，再问动物。

人们谈的只有阳具；至少依据交给我们的言论，阳具确实是组织其世界的枢纽对象与中心对象。我们面对弗洛伊德文本，试图赋予它意义。既然小汉斯的生活中没有发生任何真正重要的危机事件，那么“究竟有什么改变了”？改变的是，他自己的阴茎开始成为某种完全实在的东西；它开始活动，他开始手淫。重要因素与其说是母亲此刻介入，不如说阴茎已经变成一种实在之物。

这是观察中的重大事实。由此出发，我们显然必须追问：它同这时出现的东西——也就是焦虑——是否存在关系。我尚未在这里处理焦虑问题，因为必须按顺序把握事情。你们知道，在弗洛伊德著作始终，焦虑确实是一个永久问题：我们应当怎样设想它？

我不会用一句话概括弗洛伊德走过的道路；焦虑作为机制，毕竟始终在他的每个观察阶段中出现，学说则随后到来。这里涉及的焦虑，我们应怎样设想？应当尽可能贴近现象。

请你们暂且尝试一种需要稍加想象的切入方式，注意焦虑借何种极其倏忽的关系向我们显现：每当主体哪怕极其轻微地从自身存在中剥离，哪怕只在最小程度上察觉自己即将重新被某种东西攫住——你们可以依具体情形随意称它为他者意象、诱惑，等等——，简言之，当主体悬置在两个时刻之间：他不再知道自己在哪里的时刻，以及他将要成为一种再也无法重新找到自身之物的时刻；这就是焦虑。

当某种活动之物——实在阴茎——以这个词最初级意义上的驱力形式在儿童身上出现时，长期以来构成幸福天堂的那场游戏，不正开始显得像一个陷阱吗？在那场游戏中，人是自己所不是的东西；对母亲而言，人就是母亲想要的一切。当然，我不能同时谈论一切；所有这一切终究还取决于儿童对母亲而言实际上是什么。稍后，我们会试着作些区分，更仔细地接近“汉斯对母亲而言曾是什么”。

不过，目前我们先停在这个为事情提供一般图式的关键点。在此以前，儿童以令人满意或不令人满意的方式……但终究没有理由不认为，他能长期把这场游戏玩得令人满意……儿童带着一点幸福停留在诱饵的天堂；即使只须极少幸福，就足以确认这种无论多么难以维持的关系。儿童试图流入并整合到自己为了母亲的爱而成为的东西中。

然而，从他自己的驱力和实在阴茎介入的时刻起，我刚才所说的剥离便出现了：他落入自己的陷阱，被自己的游戏愚弄；一切不一致、一切裂口，尤其是满足一个意象同自己真正拿出某种东西——可以说当场以现金呈上——之间的巨大裂口，都由此显现。

随后必然发生的，不只是在诱惑尝试中，儿童出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失败，或遭到此刻发挥决定作用的母亲拒绝。归根结底，他能呈现的

东西，有时会向他显得十分可怜；我们在分析现实中有成千上万种这种经验。这时，儿童被放到一个开口和两难面前：他原本是一场游戏的俘虏、受害者、被动化要素；从此，他却成为大他者诸种意义的猎物。

我去年曾向你们指出，偏执狂恰恰在这个点上分岔产生。因为，从游戏变得严肃、却同时仍只是一场诱饵游戏的时刻起，儿童便完全悬挂在伴侣所有表现所给予的指示上；对他而言，伴侣的每一种表现都成为判定他够不够格的裁决。

如果这种情境继续维持，Verwerfung［拒斥］便会发生，把象征父亲这一项排除在外；而我们即将在具体内容中看到，他多么不可或缺。这里先撇开这种儿童，也就是从此完全交付给他者之眼与凝视的特殊儿童——未来的偏执狂。

对于另一个儿童，这个情境本身从字面上说没有出路。当然，它确实有一个出路；我在这里正是要向你们展示，阉割情结怎样构成它的出路。阉割情结在纯粹想象层面重新接过围绕阳具发挥作用的一切；也正因如此，实在阴茎必须以某种方式被排除在局外。父亲带着他的禁令介入，带来一种秩序，引入法则的统治；这使整件事情：

- 一方面脱离儿童的掌握；
- 另一方面又在别处得到规定：儿童只有接受赌注原本的分配方式，才可能在这场游戏中获胜。

于是，象征秩序恰恰在想象层面介入。阉割针对的是想象阳具，并非毫无理由；秩序以某种方式在实在配对以外得到恢复，儿童也在其中重新找到某种可以等待事件演变的东西。

目前，这也许会向你们显得像问题的简单解决方案。它只是指示，不是解决方案；它来得很快，只架起了一座桥。如果事情容易到只须架一座桥，也就不必架桥。真正有意思的是我们现在抵达的点。

我们所在的点，恰恰是小汉斯抵达的点：对他而言，并未发生任何类似的事情；他却面对并被放到实在驱力与想象阳具诱饵游戏的相遇处，而这场相遇发生在他同母亲的关系中。

既然出现了神经症，这时发生什么？你们不会惊讶地听到：发生了退行。不过，我倒希望你们对此感到惊讶，因为我赋予“退行”一词的含义，不多不少，严格等于中断前最后一课谈挫折时给它规定的效力。

我曾告诉你们，儿童面对母亲的欠缺，以喂养的满足压扁自身；同样，在他作为中心已经不足以给予有待给予之物的时刻，他陷入“不再足够”的无所适从。退行随即发生，伪装成同样的短路；原初挫折正是借这种短路得到满足，就像他先前抓住乳房，以终结所有问题。

在他面前作为裂口敞开的唯一东西——事实上正在发生的也正是这一点——，就是“被母亲吞噬”的恐惧；这是恐怖症穿上的第一件外衣。

这恰恰在我们这位小家伙的病例中出现：恐怖症对象尽管是“马”，涉及的终究是一匹“会咬人的马”。吞噬主题总能以某种方式在恐怖症结构中找到。事情到此为止吗？当然没有！并非任何东西都会咬或吞噬。每当恐怖症同一个对象产生若干

根本关系时，我们都会面对恐怖症问题；但为了衔接出清楚的内容，必须暂时撇开其中一些关系。

可以确定的是，恐怖症对象——尤其是动物——会从一开始就向

最肤浅的观察者之眼显示出一种东西：它们从本质上属于象征秩序。如果恐怖症对象是一头狮子，无论儿童是否——尤其是没有——生活在这种动物具有任何危险乃至仅仅在场性质的地区，“狮子”、“狼”乃至“长颈鹿”都正是这类陌生对象；在它们中间，“马”标示一条极其精确的边界。这清楚表明，这里涉及的对象仿佛从一份能指清单或范畴中借来，而这些能指性质均一：也就是纹章上会出现的东西。

这些对象使弗洛伊德在建构《图腾与禁忌》时，必须提出父亲与图腾的类比。它们具有极为特殊的功能，并在这里以某种方式替补象征父亲的能指；我们尚未看出这个能指的最终项是什么，而问题恰恰在于：它为什么穿上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与外衣。

我们所遇见的东西中，必定有某种属于事实、经验、肯定之物而且不可还原的东西。这并非一次推导，而是一套为了支撑我们在经验中发现之物而必需的装置。况且，我们不是来解决“为什么恐怖症会采取这样或那样的动物形式？”这个问题的；问题不在那里。

我想在结束时请你们下次以前阅读小汉斯的文本，并注意：这无疑是一项恐怖症，但可以说是一项“行进中的恐怖症”。它一出现，父母便立刻抓住线头；直到它结束，父亲始终没有松手。我希望你们阅读这篇文本；你们会获得阅读它时可能产生的一切纷飞印象，甚至会在许多时候感到完全迷失。

不过，我希望愿意接受这项考验的人下次告诉我：他们的阅读中，是否有某种东西令他们震动，显示起始阶段同后来内容之间的反差。在起始阶段，我们看到小汉斯全速展开各种极富故事性的想象，围绕他同

所有被他收养为自己孩子的人物之间的关系。

这是一个他在其中表现得十分自如的想象主题；他仿佛仍处于能够延长它的状态。这甚至如此彻底地延长了同母亲的诱饵游戏，以至于他能在一个混合了母亲认同、收养孩子以及各种爱恋形式的位置中感到十分自在。范围从他贴近服务和追求的小女孩——度假地房东的女儿——，一直到他从远处爱慕的小女孩；他把后者安置在爱恋关系的一切形式中，并能在虚构层面极其自如地继续展开。

后来发生的事情则同它构成反差：父亲介入以后，在父亲多少带有引导性的分析追问压力下，小汉斯讲出一部真正奇幻的故事。他重构妹妹在出生许多年前，便已经坐在马车上的箱子里、出现在马匹旁边。

简言之，你们将清楚看到，小汉斯分析过程中的所谓想象狂欢，同实在父亲介入之间存在一致性。换言之，如果儿童最终得到一种十分令人满意的治愈……我们会看到，谈他的恐怖症时，“令人满意的治愈”是什么意思……那显然正因为此前几乎从未介入的实在父亲介入了。他能够介入，也是因为背后有作为象征父亲的弗洛伊德支撑。但他确实介入了！

随着他不断介入，一切原本试图在某种过早的实在层面结晶的东西，都重新流入一个如此彻底的想象界，以至于人们甚至不再清楚自己身在何处，随时怀疑小汉斯究竟是在拿所有人开玩笑，还是在表演一种

精致幽默。无可否认，他确实如此；因为这里涉及的是一个为了重新组织象征世界而游戏的想象界。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当阉割本身以一段经过衔接的故事形式得到最清楚的表达时，治愈到来了。也就是说，“水管工”前来，把它旋下来，再给他一个新的。观察恰好在那里结束。恐怖症的解决同一个三项星丛相连，可以说就是实在父亲的介入；下次我们会重新讨论它。尽管有象征父亲全力支撑，他仍像一个可怜家伙一样进入其中。弗洛伊德每时每刻都不得不说：“总比什么都没有好，终究必须让他说话。”

他说：“尤其要——你们会在某页页脚找到我正在向你们衔接的这句话——不要理解得太快！”

而且，他不断用那些问题逼问儿童！显然，他走错了路。没关系！结果由两点划出节奏：汉斯的想象狂欢；以及阉割的到来——可以说它得到完整衔接：人们以某种更美、更大的东西替换实在之物。阉割的到来与显露，同时终结恐怖症，并向我们表明——我不会说它的目的——恐怖症替补了什么。

你们很清楚，这里只是我论述中的一个中间点；我只是想给出足够的内容，让你们看到问题的各层怎样排列，问题之扇怎样展开。

下次，我们将重新接过儿童同母亲之关系的这套辩证法，以及阉割情结真正意义的价值。

第13课 · 1957年3月13日（速记稿将日期标为3月6日）

上次，我们尝试重新衔接阉割概念，至少重新衔接这个概念在实践中的用法。在那一课的后半部分，我向你们标出想象界介入的位置：儿童同母亲相连的挫折关系，在实际运用中远比习惯理解的复杂。我曾说，我们仿佛这样从前向后逐步推进、呈现一系列沿发展线依次发生的阶段，纯粹只是由于表述次序；不宜再把它当作真正的发展序列。

恰恰相反，始终要把握的是：某种在每个阶段从外部介入的东西，怎样事后重新加工先前阶段中已经开始的一切；理由很简单，儿童并不孤单。他不仅不孤单，不仅有生物环境，还有远比生物环境更重要的环境：法则环境以及环绕他的象征秩序。

正是象征秩序的特殊性——我曾顺带强调——，赋予那个名为阳具的想象要素以重音和优先地位。我们上次就抵达这里。为了开始论述的第三部分，我把你们引向了小汉斯的焦虑；因为从一开始，我们便采用两个典范对象：恋物对象与实在对象。

我们将从小汉斯的层面，尝试衔接今天的论题。这不是要重新衔接阉割概念——天知道，它在弗洛伊德那里已经得到多么有力、执着而反复的衔接——，只是要再次谈论它；因为人们长期回避这个话题以后，在观察以及可以采用的参照中，使用这一“情结”已经越来越少。

那么，既然沿着上次的论述继续，今天就来处理阉割概念。在前俄狄浦斯阶段末尾、俄狄浦斯门槛处，涉及的是什么？

- 儿童必须把阳具作为能指来承担，并以一种使它成为象征交换秩序之工具的方式来承担；这套交换秩序统摄世系的构成。

- 总而言之，他必须面对这套秩序；在俄狄浦斯中，它将使父亲功能成为戏剧的枢纽。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至少，我迄今已经围绕这个主题说得足够多；所以，当我告诉你们“事情没这么简单”时，你们心中会有某种东西回应：“确实，父亲没这么简单。”在“父亲”这个能指中，象征层面的存在具有一种功能；这个术语本身带有一切深刻难题，并提出一个问题：这种功能是怎样来到象征组织中心的？

这使我们想到，还必须围绕父亲功能的三个面向［象征界、想象界、实在界］提出一些问题。早在研讨班第一年——后半部分献给《狼人》研究——，我们就已经学会从三个名目区分父亲影响：象征父亲、想象父亲、实在父亲。我们也看到，如果不作这项根本区分，就无法在观察中找到方向，尤其无法在《狼人》病例中找到方向。

相关知识卡 象征父亲、想象父亲与实在父亲

现在，让我们从已经抵达的位置，处理儿童在时间顺序上面对的俄狄浦斯引入。可以说，我们看到儿童仍留在上次那个位置：他在母亲身边尝试诱饵。不过，我曾告诉你们，这不是他完全卷入其中的简单诱饵；它不同于性展示游戏中发生的情形。在性展示中，我们这些外部观察者能看出，一方借另一方的外表，以想象要素俘获伴侣；我们不

知道主体自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把它当作诱饵运用，尽管知道自己偶尔能够这样做，也就是向对手的欲望只呈现一个纹章。

这里所谈的诱饵，十分清楚地表现在我们观察到的男孩行动和活动中，例如他对母亲进行的诱惑活动。当他展示自己时，并非单纯向人展示某物，而是向作为第三方存在的母亲“由自己展示自己”；而且，母亲背后还涌现出某种可以称作诚信、母亲可以上钩的东西。一整套主体间三元乃至四元关系已经开始勾勒。可归根结底，这里涉及什么？

如果从上次停下的位置把握事情，那么俄狄浦斯涉及的是：主体本人必须被这项诱饵抓住，进而卷入一套既存秩序；这套秩序不同于他借以进入、而我们上次让他停留其中的心理诱饵。

因为，如果俄狄浦斯在分析理论中具有规范化功能，也请记得经验告诉我们：这项功能并不满足于让主体最终作出对象选择，而是必须使他拥有异性恋的对象选择。我们也很清楚，仅仅是异性恋者，并不等于按照规则成为异性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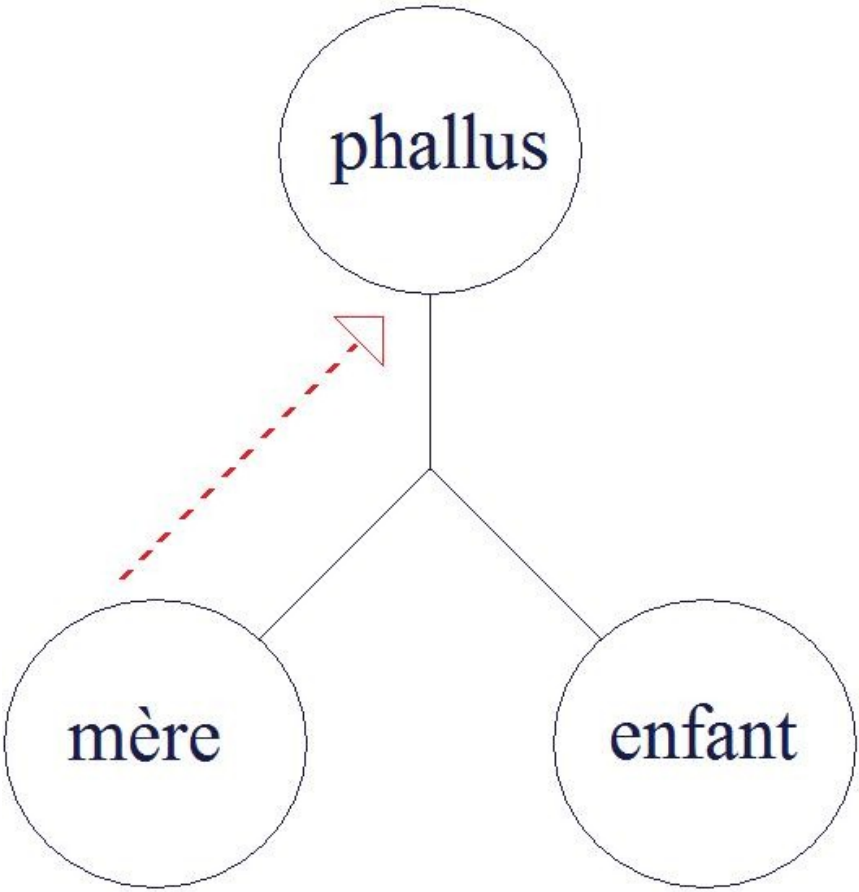
我们知道，有各种表面的异性恋形式；有时，一项明白的异性恋关系会包藏位置上的非典型性，分析探究将使我们看出，它例如来自一个鲜明的同性恋化位置。所以，主体经过俄狄浦斯以后，

不仅必须抵达异性恋，还必须以一种相对于父亲功能得到正确定位的方式抵达，无论他是男孩还是女孩。这就是全部俄狄浦斯问题的中心。

不妨直接说出来，因为我们今年处理客体关系的方式已经指出这一点……而弗洛伊德在论女性性欲的文章中也明确衔接过……归根结底，从这个角度、可以说从前俄狄浦斯视角看，女人的问题简单得多。如果它在弗洛伊德那里、也就是在他发现问题的次序中显得复杂得多，恰恰是因为他首先发现了俄狄浦斯——这并非没有理由——，而且从这里把握事情完全正常。

因为，如果有某种东西是前俄狄浦斯的，那是由于我们首先设定了俄狄浦斯。我们只有首先知道自己必须抵达俄狄浦斯的复杂结构，才能谈论女性在所谓前俄狄浦斯发展层面更加简单的位置。话虽如此，对女人而言，可以说问题只在于阳具的一次滑动。她多少已经在阳具所在的想象界中定位和接近它：在母亲彼岸，在逐渐发现母亲在母子关系本身中体验到的根本不满足时。

这里涉及阳具从想象界向实在界的滑动。这正是弗洛伊德向我们说明的：在对原初阳具的怀念中，小女孩开始在这个想象层面、相对于她的相似者——另一个女孩或男孩——的镜像参照中体验某种东西；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孩子将成为阳具的替代物。事实上，这是对所观察现象的一种略为简缩的把握。



请看我画出的位置：这里是想象界，也就是母亲对阳具的欲望；儿童处在中心，他必须发现这个彼岸、母亲对象身上的这项缺失。在可能的出路之一中，情境在某个时刻围绕儿童旋转：从主体——儿童——找到使情境饱和、通过把情境本身设想为可能而脱离它的时刻起，情况显然如此。

而我们在女孩与男孩的幻想中实际发现的是：当情境围绕儿童旋转时，小女孩会在实在阴茎所在的地方找到它，也就是在儿童彼岸，找到那个能够把孩子给予她的人——弗洛伊德说，就是父亲。正因为阴茎不属于她、而且她在这个层面明确放弃它，她才可能把它作为父亲的赠礼来拥有。

因此，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小女孩正是通过这种同阳具的关系进入俄狄浦斯。如你们所见，这种进入十分简单；随后，它只须通过某种“等价”发生滑动——这正是弗洛伊德使用的术语。小女孩只要充分进入俄狄浦斯，就能实现足够的东西。我不是说不能发生更多事情，也不是说女性性欲的发展不会由此产生一切异常；但从现在起，她已同作为实在阴茎携带者的父亲、同那个能够实际给予孩子的人发生关系，并固定于他。

这对她而言已经足够坚实；归根结底，可以说，俄狄浦斯本身即使给女性性欲的发展带来各种复杂情形乃至死胡同，反过来，作为整合进典型异性恋位置的道路，它对女人却简单得多。

这显然不值得惊讶，因为俄狄浦斯本质上以男性为中心或以父亲为中心。只有借助各种特殊的、近乎历史性的考察，我们才能觉察这种不对称在社会学和民族志层面的优先地位；个体经验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使分析弗洛伊德的发现成为可能。

反过来，我们在这里清楚看到，女人处在这样一种位置……既然我谈到编排、象征秩序或从属排序……对她而言，作为爱的对象——我说的是她的爱，也就是严格指向对象中欠缺要素的情感对象——的东

西，是她通过这项欠缺而被引向的对象，也就是父亲；父亲成为“给予”满足对象、给予生育这种自然关系之对象的人。

由此出发，她只须稍有耐心，那个发挥完全相同作用、发挥父亲作用的人就会替代父亲。这带来一种以后还要重新讨论的东西，并赋予女性超我的发展独特风格：人们非常准确地指出，自恋关系在女人发展中具有重要性和优先地位，而它同前述关系之间存在某种平衡。

不过，如果这项放弃一经发生，阳具便作为她的所属物遭到摒弃；只要阳具属于她从此寄托爱意的那个人——她实际期待其给予孩子的父亲——，它就把女人放进一种依赖之中。从此，阳具对她而言只是必须在这项依赖中给予她的东西。这种依赖极为特殊，并且如作者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悖论式地使最不能忍受某种挫折的存在者在发展中的某个时刻产生真正的自恋固着。以后重新讨论女人的一夫一妻理想时，我们也许会再回到这里。

正是围绕情境的这种简单化约——把爱的对象等同于给予满足的对象——，在所谓正常的发展中出现女人发展的特殊固着乃至停顿——很早就停住了。弗洛伊德在著作的某些段落和转折中，用一种格外厌女的语气，苦涩抱怨至少某些女性主体极难被推动：很难使她们离开他所谓“汤和肉丸”的道德，离开那种对必须从分析本身获取的满足提出强硬要求的东西。我这里只是指出若干引线；总而言之，是要告诉你们，我们以后必须回到弗洛伊德对女性性欲所作的发展。

今天，我们要专注于男孩。理由在于，对他而言，俄狄浦斯似乎更加清楚地旨在使他认同于自己的性别——这发生在同父亲的理想关系与想象关系中。可是反过来，俄狄浦斯的真正目的，即主体相对于父亲

功能得到恰当定位、并在某天亲自抵达那个完全悖谬又成问题的“成为父亲”的位置，

却呈现出堆积如山的困难。人们越来越少关心俄狄浦斯，不是因为没有看见这座山，恰恰是因为看见了它，宁愿转过身去。

不要忘记，弗洛伊德的全部追问……不仅在学说中，还在弗洛伊德本人的经验中；我们可以通过他向我们作出的倾诉、他的梦、思想的进展，以及如今所知的他的生活、习惯乃至家庭内部态度重新描画它们。琼斯先生以或多或少完整却确定的方式向我们报告了这一切……弗洛伊德的全部追问可以归结为：

“成为父亲，究竟是什么？”

对他而言，这是中心问题，是真正为全部研究定向的丰饶起点。还请注意，它不仅对每一位神经症者是问题，在每一位非神经症者的儿童经验过程中也同样是问题。父亲是什么？这是处理父亲能指问题的一种方式。但不要忘记，主体终究也必须成为父亲；提出“父亲是什么？”不同于亲自成为父亲、抵达父亲位置。

让我们仔细看：如果每个男人抵达父亲位置都涉及一种信念与寻求——我们可以提出这个问题——，那么也不难设想，最终也许从来没有任何人真正而完整地成为父亲。因为在这套辩证法中，我们预设——而且必须从这个预设出发——，某处有一个人

能够完整承担父亲位置，能够亲自回答：“我就是父亲。”这个预设对俄狄浦斯辩证法的全部进展不可或缺，但它丝毫没有解决下列问题：

对于其他人、尤其对于儿童而言，担任这一角色的人占据什么特殊的主体间位置？

那么，重新从小汉斯出发。这项观察就是一个世界！我把它放在《五大精神分析》中最后来讲，并非没有理由；

它正是《五大精神分析》的最后一个病例。

它开头几页恰好处在我上次让你们停留的层面，向我们提供了什么？弗洛伊德按这个次序呈现事情并非没有理由。问题围绕 Wiwimacher，法文把它译成 fait-pipi［撒尿器］。我这里只谈弗洛伊德从字面上呈现事情的方式：小汉斯提出的问题，不只涉及他自己的撒尿器，还涉及弗洛伊德所谓各种生物——尤其是比他大的生物——的撒尿器。

你们已经看到有关儿童次序的准确评论；而按实际次序，他首先向母亲提出问题："你也有撒尿器吗？"母亲怎样回答，我们还会重新讨论。汉斯此刻脱口说："对，我只是想到……"也就是说，他正在暗中酝酿不少事情。

随后，他又向父亲提出同一个问题；之后，因为看见狮子的撒尿器而欣喜——这绝非偶然。从那一刻起，也就是恐怖症出现以前，他就清楚标出：如果母亲像她向他断言的那样拥有这个撒尿器——在我看来，这种断言并非没有某种厚颜——，那它就应当看得见。

因为在离这次询问不久的一个晚上，他从字面上盯着母亲脱衣，并提醒她：如果她有一个，它就应该像马的撒尿器一样大。Vergleichung 一词在法文中被译成"比较"或"可比较的"；我们几乎可以说，在这里，"均衡化"或许是最好的译词，

至少在经济学意义上如此，即使未必符合严格传统。这是一种“均衡化”的努力：在我们上次让他停留的想象阳具视角中，在某种绝对对象——阳具——同它接受实在界检验之间进行均衡。

这里不再是主体此前一直玩弄的“全有或全无”。在猜纸牌和捉迷藏游戏中，它从来不在寻找它的地方，也从来不在发现它的地方。现在要知道的是：它究竟在哪里。

这里有一整段距离必须跨越：从假装或玩假装的人，到另一个位置。观察稍后告诉我们，小汉斯做了一个梦——弗洛伊德和他的父母都说，这是第一个

出现变形和移置要素的梦——；它恰恰借助一场罚物游戏发生，并非没有理由。

如果你们追随并记得我在最近几课中处理的整套想象辩证法，就会震动地看到：它正在小汉斯发展这个恐怖症前阶段的表面游戏。一切都在那里，包括幻想中的孩子：有了妹妹以后，他突然收养一大群想象的小女孩，对她们做照料儿童时可以做的一切。

这套严格说来属于想象界的游戏，几乎未经有意安排，就真正完整地汇聚在这里。假装的人同知道自己拥有权能的人之间，有一整段距离必须跨越。初步处理俄狄浦斯关系，会给我们什么？它给出的，是此刻在这种比较行动层面发挥作用的东西：我们可以设想，游戏仍在诱饵层面、想象层面继续；儿童只是把母亲模型添加到自身维度上，那是一个更大却本质同质的意象。

可是，如果俄狄浦斯辩证法这样开始，归根结底，儿童始终只会同自己的一个分身打交道；那是经由把母亲意象作为理想形式引入而放大的分身，而这种引入完全可以设想。

我们仍停留在想象辩证法中，停留在主体同小他者之关系的镜式辩证法中；它的裁决不能使我们脱离“要么……要么……”、“不是他就是我”。这种二择依旧同第一套象征辩证法——在场或缺席——相连。我们没有离开奇偶游戏，也没有离开诱饵层面。

归根结底，无论从理论面还是典范面，我们都知道而且看到：由此产生的只有症状，也就是弗洛伊德所谓焦虑的表现。弗洛伊德在小汉斯观察开头强调，应当把焦虑同恐怖症清楚分开。这里有两种依次发生的东西，而且显然并非没有理由，一种前来救援另一种：恐怖症对象在焦虑背景上填补一项功能。

然而，在想象层面，没有任何东西使我们能够设想这样一个跳跃：它把儿童从母亲面前的诱饵游戏——某个人是一切或什么都不是、足够的人或不足的人——中带出去。仅仅问题已经提出，就必然使它停留在根本不足的层面。这是进入俄狄浦斯情结的最初图式：同父亲发生近似兄弟竞争的关系，但我们必须对这个层面作出比通常表述精细得多的校准。

这里涉及的攻击性，是镜像关系中介入的那类攻击性；“要么我、要么他者”始终被界定为它的根本动力。另一方面，固着仍完全指向那个在最初挫折以后成为实在对象的人——母亲。正因为俄狄浦斯在想象层面具有这个阶段，更准确地说具有这种中心体验，俄狄浦斯才会扩散

出它的一切致神经症后果；分析现实的成千上万个侧面都会重新发现它们。

尤其正是由此，弗洛伊德经验最初的术语之一介入：爱恋生活的某种贬损。弗洛伊德曾为它写过一项专门研究。它同下列事实相连：由于对这个实在对象、对作为挫折施事者的原初实在母亲对象保持永久依恋，从此，每一个女性对象相对于母亲都只能是某种遭到贬值的东西、替代物、破碎而折射的形态；相对于最初的母亲对象，它始终只是部分。稍后，我们会重新考察应当怎样理解它。

不过，不要忘记，俄狄浦斯情结即使凭借它所介入的想象动力产生持久后果，

这也并非全部。不要忘记，正常情况下——弗洛伊德学说从一开始就是如此——，俄狄浦斯情结的本性就是得到解决。当弗洛伊德谈到它时，他说，我们可以把对父亲的敌意推到背景，而且有充分理由把它同压抑联系起来。

可是，在同一句话中，他坚持强调：这再次让我们切实接触到，压抑概念始终适用于历史的某种特殊衔接，而不是永久关系。他说：我愿意破例在这里使用“压抑”一词；但请听清楚，正常情况下，在五岁到五岁半——俄狄浦斯情结衰退发生的年龄——，真正发生的是俄狄浦斯情结的取消和毁灭。

所以，除了我们迄今描述的东西——仿佛一种本身根本持久的关系在想象层面遭到抹除和减弱——以外，还有另一种东西：

- 确实发生一场危机；
- 确实发生一场革命；
- 确实有某种东西留下一个结果，而这个结果就是一种特殊之物的形成，是无意识中能够精确标定日期的形成，也就是超我的形成。

在这里，我们必须使某种新颖、原初而崭新的东西涌现，并让它在俄狄浦斯关系中得到自己特有的解决。要看到这一点，只须使用我们惯常的图式：在上次抵达的位置，儿童把阳具这个想象对象提供给母亲，向她提供完整满足，而且是以诱饵形式提供。

也就是说，他让大他者介入自己同母亲的关系；大他者以某种方式成为见证者，看到情境的整体。若没有这个项，男孩在母亲面前的一切展示都毫无意义；我们所描述的男孩向母亲呈现乃至奉献自身这一事实，就已蕴含这个项。显然，只有在这个大他者层面，俄狄浦斯才可能存在；它必须使一种此前并未参与游戏的东西在场，也就是一个始终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处于能够游戏并获胜之位置的人。

在成千上万个其他特征中，罚物游戏的图式也在这里向我们说明一点……这些特征可以在观察中读到，也可以在儿童这个阶段的活动中看到……确实有一个时刻，游戏发生转变。在小汉斯病例中，游戏以成千上万种形式出现；例如，他突然走开，独自进入黑暗中的一个小closet［小房间］，而这个地方成为他自己的房间，此前它却为所有人

共用。还有无数特征；在某个时刻，一切都围绕游戏的转变发生摇摆。

这里有一个概念，为象征关系层面预期的维度添加了某种东西。在此以前，象征关系带来的只是我上次谈到的、以象征母亲为特征的呼唤与再度呼唤；现在它变成这样一个概念："在大他者层面，有某个人无论如何都能够回应；而且他回答说，无论如何，真正的阳具、实在阴茎都由他拥有。"他拥有主牌，而且他知道。这种"把实在要素引入象征秩序"的做法，同母亲的最初位置恰好相反；母亲凭借自己的在场和缺席在实在界中得到象征化。

正因如此，那个既在又不在的对象……因为他相对于一切对象的出发点，就是一个对象同时在场并缺席，人们始终可以同对象的在场或缺席游戏……从这个时刻起，这个对象不再是他能够用来诱骗自己的想象对象，而成为"他者随时有权表明他没有、或者没有充分拥有的对象"。

从这一时刻起，阉割在他后续发展中发挥绝对根本的作用。理由在于：阳具本质上必须作为母亲阳具得到承担，并且本质上应当成为象征对象。只有在根本的俄狄浦斯经验中，通过那个拥有它、知道自己始终拥有它、又曾一度被剥夺它的人，儿童才能设想"同一个象征对象将在某天给予自己"。换言之，男性异性恋中男性位置的标志之承担，以阉割为起点。

对男人这个天然男性存在者的自然附属物而言，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概念教给我们的是：他必须把自己已经完整拥有、作为所属物具备的

东西——这同女性位置正好相反——，恰恰因为它属于他，而看作从另一个人那里得来。

这里涉及同“象征界中的实在之物”的关系，也就是那个真正作为父亲的人。归根结底，没有人能够说清成为父亲究竟是什么；只知道它是某种已经在那里参与游戏的东西。相对于同父亲进行的这场游戏——可以说是一场“输者为赢”的游戏——，儿童才可能取得信念，让法则的第一道铭文沉积在自身之中。

这场戏剧中的儿童后来怎样了？按照弗洛伊德辩证法的描述，他是一个小小的罪犯；他正是通过这项想象罪行进入法则秩序。不过，只有自己面前至少一度出现过一位实在伴侣，他才可能进入这套法则秩序。这个人确实在大他者层面带来了某种东西：不只是呼唤与再度呼唤，不只是在场与缺席的配对——象征界中根本的虚无化要素——，而是“某个回应他的人”。

如果事情能够在想象戏剧层面得到这样的表达，那是因为经验必须在想象游戏层面完成。只有拥有权能并为之作答的人，才具有这种绝对他异性的维度；这一要求没有产生任何特殊对话，并非没有理由。它由实在人物体现，但这些实在人物本身始终依赖某种相对于他们最终呈现为永久托辞的东西。

只有一个人能够绝对回应父亲位置——就他是象征父亲而言——：他能够像一神教的上帝那样说：“我是自有者。”不过，除了我们在《圣经》中读到的文本以外，这句话从字面上说不可能由任何人说出。

你们会对我说：“你曾教我们，我们收到的消息就是自己的消息，只是形式遭到颠倒；换言之，一切都会由‘你是你所是者’得到解决。”不要相信这一点，因为要对任何另一个人说这句话，我又是谁？

换言之，我想向你们指出：严格说来，象征父亲不可思议；他不在任何地方，也不在任何地方介入。证明正在于，它同时向我们表明：必须有弗洛伊德这样一颗同科学和实证思想要求紧密相连的头脑，才会作出一项据琼斯所说他比自己其他全部著作都更加珍视的建构。他没有把它放在第一位，因为他的主要而且唯一大作——他亲自写下、断言并从未否认——是《梦的解析》；但他最珍爱的著作，作为一项在他看来堪称壮举的成就，则是《图腾与禁忌》。它无非是一则现代神话，一则为了向我们说明他学说中仍然裂开的东西而建构的神话，也就是：父亲在哪里？

只须睁开眼睛阅读《图腾与禁忌》，就会发现，如果它不是我所说的东西，

也就是一则神话，那就完全荒谬。可是反过来，如果《图腾与禁忌》要告诉我们：为了让父亲们继续存在，真正的父亲、唯一的父亲、独一无二的父亲就必须位于进入历史以前，而且必须是死去的父亲——不只如此，还必须是遭到杀害的父亲——，那么，除了严格说来的神话价值以外，为什么还要设想这一点？因为，据我所知，弗洛伊德以及其他任何人都没有把这里的父亲设想成不死之人。为什么儿子必须以某种方式让他的死亡提前发生？这一切又为什么？为了让主体最终亲自禁止自己获得原本要从父亲那里夺走的东西；也就是说，他杀死父亲，恰恰只是为了表明父亲不可杀死。

弗洛伊德围绕一场重大戏剧引入了这一概念，而戏剧的本质建立在严格的神话概念之上；它正是对一种不可能乃至不可思议形式的范畴化：把起源处唯一的父亲永恒化，而他的特征就是已经遭到杀害。为什么？为了使他得到保存！顺带提醒你们，在法语和一些其他语言——尤其德语——中，“杀死”一词源自拉丁语 tutare，而这个词意为“保存”。

这位神话父亲向我们表明，弗洛伊德面对何种困难；它也同时向我们表明，弗洛伊德在父亲概念中真正瞄准的是什么：那是某种在辩证法的任何时刻都不介入的东西，

除非借助在某个时刻前来担任其角色和功能的实在父亲。实在父亲使想象关系获得生命和一个新维度；他带入的不是“我或他者”这种纯粹的镜式游戏，而是让这句无法说出的句子取得化身：“你是你所是者。”刚才我们说过，它不能由一个自身“不是”的人说出。

不过，请允许我使用曾在研究施雷伯总统的偏执结构时用过的双关和歧义：不是“你是你所是者”，而是“你是杀人者”。[译注1]

> [译注1] 法文 Tu es celui que tu es（你是你所是者）与 Tu es celui qui tue（你是杀人者）在发音上形成双关。

只有当某种东西在俄狄浦斯情结末尾标记、定位无意识中的受压抑之物，同时又以一种受规定之物的建立形式永久保留下来，象征界中才会有某种东西作出回应。

法则不再只是某种让我们追问为何整个人类共同体终究被它牵涉和引入的东西；它已经以俄狄浦斯情结留下的这个核心之形式进入实在界。分析曾经一劳永逸地表明：此前哲学家以或多或少歧义的方式向

我们呈现的道德意识之密度、永久核心，以这种实在形式得到铭刻和依附。我们知道，在每一个体身上，它都由一种能够采取最为多样、

最为不同、最为古怪而狰狞形式的东西明确体现；它叫作超我。

它采取这种形式，是因为它始终在某种事件中得到引入，而且在本我层面的引入，始终参与这种深度偶然情境中的某次偶发事件：我们未必知道，从曾一度在那里作出回应的人开始，想象游戏究竟在哪一刻发生了转变。他把这个专横、本质上悖谬而偶然的超我作为同其他力比多要素同质的要素引入本我。可是，即使在非神经症者身上，也只有超我代表着具有这种功能的东西：成为一个能指，标记、压印并在人身上留下他同所指之关系的印章。

在人身上确实有一个标记其同所指之关系的能指，它叫作超我；甚至不只一个，它们叫作症状。我要强调：只有用这把钥匙，你们才能理解小汉斯酝酿自己的恐怖症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想可以通过这项观察向你们证明，最鲜明的事情正是：尽管父亲充满爱意、善良又聪明——我们也因此才拥有这项观察——，那里却没有实在父亲。随后整场游戏继续在小汉斯同母亲之关系这个最终无法忍受、令人焦虑、令人难耐的诱饵中进行：是他或她，是一个或另一个，人们从来不知道究竟是哪一个；是男性阳具携带者还是女性阳具携带者，是大长颈鹿还是小长颈鹿。

尽管处理这项观察的各位作者评价不一，依然完全清楚：小长颈鹿正是整个“谁拥有它、谁将拥有它”之游戏围绕旋转的母亲所属物。小汉斯做了一场白日梦；一时间，尽管母亲高声叫喊——而且正是在这些

喊声中——，它使他成为赌注的占有者，并以最具形象性的方式向我们突出机制本身。

我想再添加若干考虑；这些考虑即使不能让我们直接断言……我正在你们面前尝试衔接“阉割”这个范畴，而你们需要习惯严格处理它……也可以使我们尝试看出，按照这个把每一项定位在自身层面、置于相互关系中的视角，以下二者怎样相关：

- 一方面是自我理想的想象游戏；
- 另一方面是阉割的裁决性介入；这些想象要素借此在象征界中取得自身的稳定性和固定星丛。

让我们看看，在这个视角和区分中，是否必须大胆衔接某种直接出自下列概念的东西：一种被设想成预先就和谐而均一的客体关系，仿佛通过自然与法则的某种汇合，每个男人都应该理想而恒定地找到自己的女人，使两人获得最大满足。同时，你们至少可以停下来片刻，追问整个共同体会怎样看待这件事。

我认为，如果我们懂得把秩序同想象和谐的法则乃至爱恋关系的位置本身区分，

就会开始提出：如果阉割确实是每个主体借以进入、可以说有资格正式俄狄浦斯化的根本危机，那么你们终究会得出结论，即使在我们生活其中那种复杂乃至完全自由的亲属结构层面，而不只在基本结构层面，也完全可以自然地提出一个极端公式：“凡未获准许的女人，都受到法则禁止。”

这会使我们得以设想，每一桩婚姻——而不只神经症者的婚姻——都在自身携带着阉割本身的鲜明回声。如果我们生活的特殊文明在象征层面把婚姻产制成相互同意的果实，这也会向我们解释，为何爱与conjugo［婚姻结合］的同样理想化混淆能够作为一种理想盛行。这种文明恰恰把相互同意推到前台，也就是尽可能推动结合的自由；这一点十分清楚。它把自由推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始终紧贴乱伦的边界。事实上，只须稍加思考原始婚姻与亲属法则的功能本身，就会发现：在法则内部，个体选择的任何结合——即使转瞬即逝——，以及爱与法则的任何结合，即使值得欲求、即使是存在者结合的一种必然交叉点，都参与乱伦。

因此，归根结底，在爱恋生活的失败乃至贬损中，弗洛伊德学说把某种东西归结于对母亲的持久固着；仿佛某种恒常而持久的东西，给人们渴望的一夫一妻结合理想打上原罪污点。不要以为这只是别的东西；它是一种新的“要么—要么”形式，向我们表明：如果乱伦没有发生在我们希望它发生的地方——也就是当下或所谓完美夫妻之中——，那恰恰因为它发生在别处；但无论哪种情况，涉及的确实都是乱伦。

换言之，这种东西在自身携带界限，携带根本的双重性与随时准备再生的歧义。经验使我们能够断言下列一点，而我们的唯一优势在于不再对此惊讶：如果女人的婚姻结合理想出于开头所说的理由属于一夫一妻制，那绝对不值得惊讶。

只须回到儿童同母亲关系的起始图式，就能看出男人一侧始终趋于重演什么：只要典型、规范而合法的结合总带着阉割标记，那种分裂或split　就会在他身上趋于重演，使他从根本上成为一夫二妻的人——我

不是说一夫多妻的，这同人们通常以为的相反。当然，从数字二得到引入的时刻起，在幻象宫殿中也就不再有理由限制游戏。

从根本上说，只要进入俄狄浦斯辩证法的人在实在父亲许可的范围内固定自身选择，那么在这个选择彼岸，爱所瞄准的东西便始终存在：它既不是合法对象，也不是满足对象，而是存在者，也就是恰恰在它所欠缺之处得到把握的对象。

正因如此，无论采取制度化还是无政府式的方式，我们都会看到爱与得到认可的结合从未混为一谈。或者，我再说一次，这一点会以制度化方式发生，正如许多发达文明毫不犹豫地把它写成学说、加以确认并付诸实践。

我们身处自己的文明，只会把一切说成以某种偶然方式发生：因为一个人的自我或多或少软弱或强大，或多或少同某种古老乃至祖传固着相连。不过，我们应当看出，真正的问题就在结构本身：原始想象关系把儿童从一开始便引入母亲彼岸；他已经通过母亲看到、触到并体验到，人类怎样成为遭到剥夺和遗弃的存在者。必须把这项想象经验同使其规范化的象征经验区分开。

许多东西只有借助法则的媒介和中介才得到保存；它们无论如何都不容许我们把事情仅仅说成客体关系，哪怕这种关系最理想、最受选择及最深亲和性驱动。它们使一切爱恋生活始终保留一个根本问题。

弗洛伊德、他的经验以及我们的日常经验，恰恰就是要让我们触及并同时确认这一点。

第14课 · 1957年3月20日

我想先澄清一件事，它涉及《精神分析》第 2 期发表的文章，

文章以我的一次研讨班为题［《〈被窃的信〉研讨班》］，尤其涉及文章导言。

你们中一些人已经抽时间仔细读过。我感谢投身这项考察的人如此用心。不过，想来并非所有人都容易回忆导言内容被引入时的语境；因为在理解这篇文本时，他们可以说又落回了另一种使事物实在化的错误。以前我阐述这些术语时，某些人也曾陷入其中，例如他们以为我否认偶然。

我的文本已经提到这件事，不再回头。为了澄清问题……有一个人最好地理解并审视了它，而且方式最精确——我几乎要说最内行——；她重新找到一张可以这样画出的网络……只须把时间序列中随机排列的符号组 +、+、− 依次整理成符号 1、2、3。我们按照它们表示的内容，把这些符号串记为 1、2、3：

- （1）相同符号的连续［(+ + +)、(− − −)］；
- （3）交替［(+ − +)、(− + −)］；
- （2）相反，则是某种更为不同的东西：［(− + +)、(− − +)］，也包括［(+ − −)、(+ + −)］；也就是一眼看去便区别于其余项、不具对称性的符号。

我用一个无法译成法语的词称它为 odd。它是不对称项，从一开始就因奇数的、跛足的样子跃入眼帘。这只是定义问题；只须这样设定，它就作为一项约定、一个符号的存在而建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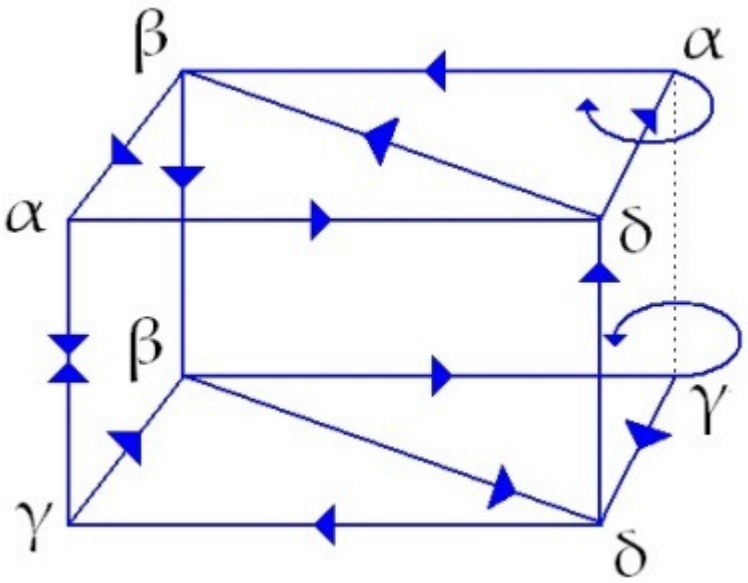
我提醒你们，α、β、γ 在这里会先给出 2、2、2，随后在这里给出 3，接下来又给出符号 3；当然，每个符号都对应时间序列中此前的三个符号。我相信，文本已经毫无歧义地写明这一点；只是写得颇为紧凑，才给一些人造成困难。可是，语境不容许任何人哪怕一刻把它当作别的东西：它就是定义，就是起始约定。

由此出发，要把根据第二个序列建构的另一个符号序列称作 α、β、γ、δ。它以一项观察为基础：只要知道第二个序列的两个端项，中间项就具有唯一值。因此，界定 α、β、γ、δ 时，我们将考虑序列两个端项的情况。例如这里，你们看到它从 odd 走向 odd。约定便是写下一个凭自身跨度抓住第一行此前

五项的符号 γ；因此，从同者到同者，也就是从对称项到对称项，具体规则如下：

- 从 1 到 1、从 1 到 3、从 3 到 1：是 α；
- 从 odd 到 odd：是 β；
- 从其他项出发抵达 odd：是 γ；
- 从 odd 返回：是 δ。

约定就是如此。由此出发，如果想用一张网络界定一切可能项，我们就能建构如下网络：



它必须具有方向，实际方向正如图示。α 可以沿这条向量无限重复。除非由这里定义的环路明确表示，否则每个顶点都不能不进行这种驱动。你们看到，这张网络穷尽概括了所有可能序列，而且只有图中指出的序列可能；任何无法铺到网络上的序列都是不可能序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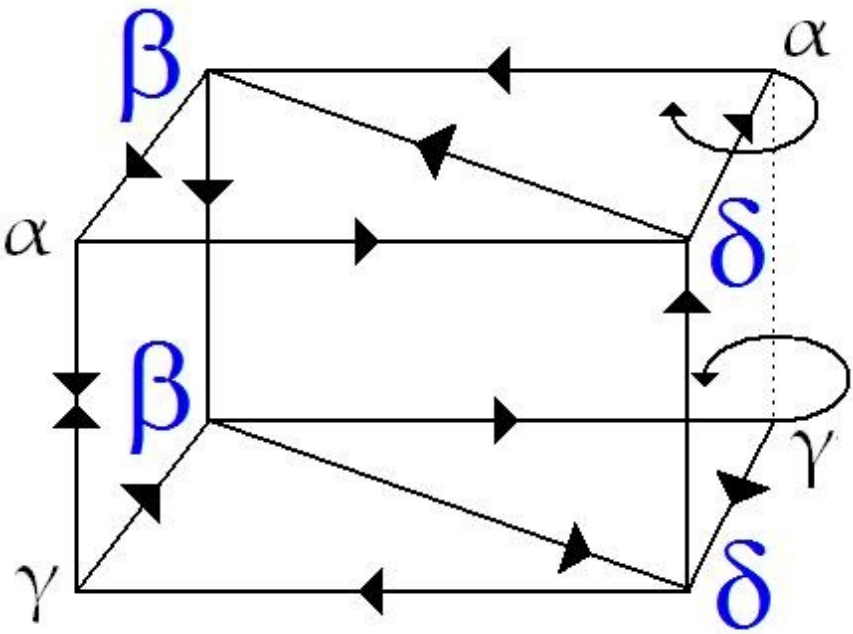
我为什么没有把它放进文本？首先，因为我当时没有在这里画出它。它是一种校验装置，一种包围并锁定问题的方式，使人能够发现并确保自己没有漏掉任何

可能项和可能解。它只是计算校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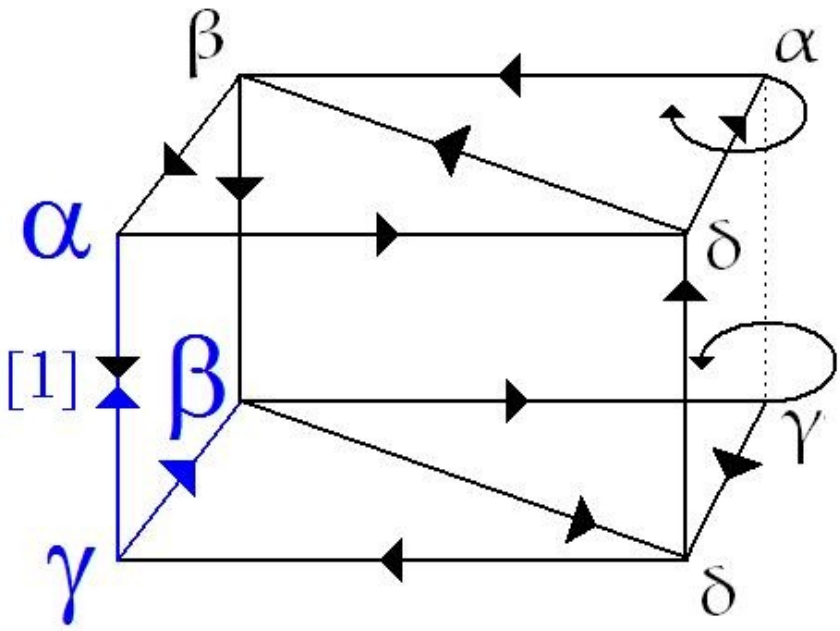
它的意义在于，你们始终可以把它作为可靠之物来查阅；无论围绕这个序列提出什么问题，它都会指出：你们也许在某个病例中忘记了一个可能解，或者完全搞错了。

现在来到争议点。你们从网络上看到，它在某种意义上显示：

- 有两类 β；
- 也有两类 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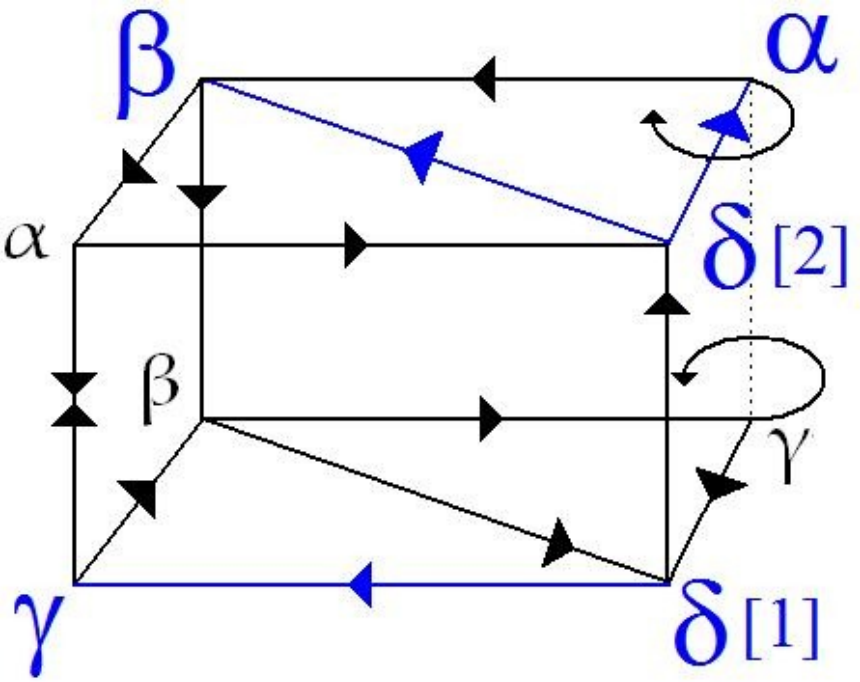


观察这些顶点就会看到，从每个顶点出发，始终都有一项二分提出。



例如，这是γ：

- γ 以后可以有一个 β；
- γ 以后也可以有一个 α，因为这条向量［1］具有双向的特权。



这里同样可以看到一个 δ，而且有两种可能出口：

- 可以是这里这个 δ［1］，随后出现 γ；也可以是另一个 δ［2］；
- 它不同于这里这个 δ［1］；后者随后可以出现 β 或 α。

有些人针对这种功能差异的呈现提出如下异议：他们认为，可以不用 4 个不同字母，而改用 8 个；或者写成 α 和 α_2 。

有人告诉我，这里没有对一个符号作出清楚分明的定义；因此，文本中呈现和衔接的一切，只是一种围绕符号游戏对机制进行的模糊化，一种仿佛让某种内部法则自行涌现的创造……某些头脑的困惑正从这

里开始……也就是说，创造符号所引入之物，产生某种超出最初给定——纯粹偶然——的蕴含。

我认为必须对此作出解释。这完全正确；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可以说，选择符号时，有一种歧义从一开始便已给定，而且从你们制作符号的那一刻起就已给定。

仅仅指出 oddity［奇异性］、也就是不对称性，便已经如此；因为我们谈的是时间序列，

事情具有方向，先 2 后 1 显然不同于先 1 后 2。把两者混在一起，会向符号本身引入某种在明示参照中可以表达得更加清楚的东西。但问题在于，这里的清楚究竟意味着什么。

你们可以把它称作"歧义"，但请牢牢记住，我们恰恰要使人感到这一点：符号只要在某个层面存在，就存在于所有层面，因此：

- 作为 + 的符号预设 −；
- 作为 − 的符号预设 +。

随着建构推进，歧义始终在那里；而把符号三个一组，是能够迈出的最小一步。文章中没有证明这一点，因为我的唯一目的，是提醒你们《被窃的信》在何种语境中得到引入。请暂且承认它是最小一步。当你们迈出这项最小步骤时，恰恰因为符号蕴藏歧义，我所谓的法则才会出现。换言之，假如用 ε、ζ、η、θ 依次替换其中四个顶点，可能序列确实会不同，而且极其复杂；因为你们将处理八个项，每一项都依照并非一眼可见的次序同另外两个配对。

可是，选择这些进行配对的歧义符号，其意义恰恰在于：它们确实通过某种东西，把顶点 α 同另一个也被我们称作 α、却实际发挥不同功能的顶点配对。把它们这样归组，会产生我在文本的一幅图式［第 5 页］中表达的极其简单的法则；这一点才值得考察。它使我们能够说，从第一时刻到第三时刻，始终会出现我现在以稍微不同方式写出的结构：

α, δ → α, β, γ, δ → α, β

γ, β　　γ, δ

第一时刻　　第二时刻　　第三时刻

这里［第一时刻］可以有任意　α、δ / γ、β；这里［第二时刻］则有 α、β / γ、δ。

从第一时刻到第三时刻，可以在［相同位置］重新找到 α 与 γ；可是，相对于排除下列项的二分，［第一时刻在 α 后面的］δ 与［第一时刻在 γ 后面的］β，在［第三时刻］是两种根本不可能项：

- 从第一时刻到第三时刻，α 或 δ 后面不可能接着出现 γ 或 δ；
- 同样，β 或 γ 后面也不可能接着出现 α 或 β。［见《精神分析》第 2 期，第 5 页］

我的文本指出了由此产生的一些后续结果和性质；它们的意义在于突出形式的各种其他相位，也就是可以从这个极其简单的公式推导出的句法法则。我曾尝试以使其具有隐喻性的方式来做。

也就是说，它们使你们可以开始看到，能指究竟怎样真正组织人类记忆所内含的某种东西。只要人类记忆在自身经纬中始终蕴含若干能指要素，它的结构便从根本上不同于一切可能的生命记忆观；后者只涉及印象的持续、抹除或维持。为什么？

因为，一旦我们把能指引入实在界——人们只须说话，能指就已被引入；甚至只须计数，它也已进入——，记忆秩序中受到把握的一切便被某种东西抓住。它以一种本质而根本不同的方式结构记忆，完全超出以单纯生命性质为主题的记忆理论所能设想的一切。

这正是我尝试说明的内容；当我谈到将来和将来完成时，当我在第三时刻以后引入第四时刻时，当然是在进行隐喻说明。也就是说，如果把这个第四时刻固定为终点，任意可能符号都可以固定；因为第四时刻重新取得同第二时刻相同的功能：α、β、γ、δ 都可以在这个第四时刻重新出现。

如果在第四时刻把 α、β、γ 或 δ 固定为终点，第二与第三时刻就会排除某些项。这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帮助我们想象，直接将来从相对于一项目标、一项确定计划成为“将来完成时”的时刻起，怎样得到明确规定。

某些能指要素仅仅由此变得不可能；我将以隐喻方式，用它说明我们在这里可以赋予我所谓“不可能能指”的功能。

今天我想向你们标出一点：我的发展当然停在了那里；但某些人

恰恰借一种虚假的不证自明［提出异议？］：如果对我给出的平行六面体建构中各个顶点的项进行区分性考察，也能提炼出同样简单的法则，那么任何谜团仍不会消失。

问题不在那里。我希望你们暂且在心中维持一点：这只意味着，只要出现书写，就会出现正字法。我马上会用另一种也许在你们看来更有说服力的方式说明，而不是把这一切制作成某种“数学漫游”，

仿佛我具有某种标志性的普遍无能。

你们若这样想，就错了。首先，我不是昨天才开始思考这些问题；其次，我让一位数学家检查过。不要以为，提供这些精确说明以后，便引入了哪怕最小的不确定或脆弱要素。我再说一次：它已经得到检查。

现在，我要说明它怎样准确阐明我刚才所说的“只要出现书写，就会出现正字法”。从这些简单的假设给定出发，

并基于一种稍后还会重新讨论的简单性——尤其要说明我为什么从 odd 出发，而没有像有人向我提议的那样，从一开始就区分：

- 开头有两个轻音步的 odd［(– – +)、(+ + –)］；
- 或结尾有两个轻音步的 odd［(– + +)、(+ – –)］；
- 抑抑扬格［三个音节构成的音步，两个短音节后接一个长音节］；
- 与 扬抑抑格［一个长音节后接两个短音节构成的音步］。

我没有这样做——我们还会回来讨论——，而问题的意义恰恰在这里：从某些也许确实十分粗略、又已经排除了某些东西的定义出发，一些直觉要素——尤其是以节拍为基础、格外醒目的直觉要素——已经蕴含一整套身体投入。

诗歌从这里开始；但我们甚至没有进入诗歌，只引入对称或不对称的概念。我会告诉你们，为什么把第一个能指的创造限制在这个严格要素上，在我看来十分重要。所以，我们从这项假设出发；这里的假设不是通常所谓的假设，而是由极其简单的定义、行动或前提产生的结果。

α, δ → α, β, γ, δ → α, β

γ, β　　γ, δ

第一时刻　　第二时刻　　第三时刻

我在这里重画表格：这里是未确定的第二时刻；这里［第三时刻］上方是 α、β，下方是 γ、δ。现在来到第五时刻：上方是 α、β、δ，下方［……］。它向我们表明，如果这里记录：

- α 之后的可能项；
- 随后是 β 之后的可能项；
- 再是其余各项之后的可能项；

就会看到，这里可以产生 α、β、γ、δ。

你们看到，我们拥有过量的可能性：我们拥有全部可能，而且在两个层面都拥有。不过，只须稍加考察情境就会发现：如果在这里选任意字母——例如 δ——作为第五时刻的终点，又选另一个字母——例如 α——作为起点；如果你们说，我想要一个第一时刻有 α、第五时刻有 β 的序列，就会立刻看到，它无论如何不能是这个字母，也不能是这条线上的任何项。因为从 α 出发，你们只能得到这里二分线上方产生的东西，也就是 α 或 β；随后，也只能得到这条二分线上方的 α、β、γ、δ。

可是，要得到 β，必须在这里先有 α，因为 β 只能来自 α。由此可见，当你们打算构造一个在五个时刻间隔的两端各有一个确定字母的序列时，中间字母——也就是第三时刻的字母——便得到绝对唯一的确定。

我还可以向你们展示其他同样醒目的性质；不过，为了看看这能否在你们心中唤起我们需要的维度，先停在这里。这个性质的结果是：任取一个项，再考察前两个位置的项和后两个位置的项，就能立即以简单而一目了然的方式检查链条任意位置是否有错——排字工都可以完成这种检查。只须查看前两个位置和后两个位置；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个字母可能。

换言之，只要出现书写，书写的最小涌现就同时带来正字法，也就是对错误进行校验的可能［见上文第 117 页：“校验装置”］。这个例子正是为了向你们表明：从能指最简单、最初级的涌现开始，法则便完全独立于任何实在要素而涌现。当然，这并不是说偶然受到任何方式的支配，而是说“法则同能指一道出现”，而且在一切经验以前便精确地独立于经验。

围绕 α、β、γ、δ 的思辨，就是为了证明这一点。这些事情似乎在某些头脑中引起了相当强烈的抵抗。

不过，比起建议你们阅读乃至评注弗雷格，这在我看来仍是一条更简单的道路，能够使人感到某个维度。弗雷格是本世纪的数学家，致力于研究那门表面上再简单不过的科学——算术；他却认为必须作出极大的迂回……因为越接近简单的东西，越难把握……这些迂回完全令人信服地证明：不可能只从经验推导出数字 3。

当然，这会把我们带进一系列我认为不必让你们经受考验的哲学或数学思辨。不过，它依然非常重要：如果同荣格先生所相信的相反，任何经验推导都不能使我们抵达数字 3，那么象征秩序同实在秩序的区分便像犁铧一样进入实在界，并在那里引入一个原初维度。我们分析家只要在言语界域工作，就必须考虑这个维度的原初性。这里受到质疑的正是这一点。

总而言之，我怕令你们疲倦，换一种说法吧。我要告诉你们一个曾经浮现的更加直观的想法；它的断言没有那么确定，但我仍可以说出来。一天，我来到伦敦约六十公里外的一座巨大动物园；动物在那里仿佛拥有完全自由，围栏埋在看不见的壕沟底部。我看着一头狮子被三头华美的母狮围绕，一切都显得相处融洽、无比平静。

我问自己，既然按照我们知道的情况，这些动物之间本应爆发最明显的竞争或冲突迹象，为何会如此融洽。我觉得自己心中没有作出太大跳跃：原因只在于狮子不会数到　3。请听清楚，正因为狮子不会数到三，母狮彼此之间才没有哪怕表面可见的嫉妒。我把这件事交给你们思考。

换言之，每当我们面对分析的主要对象——现实的表象，也就是人际冲突的现实——时，要理解这里的涌现，就绝不能忽视能指的引入。甚至可以走得更远，最终说，冲突之所以存在，恰恰因为人类计数的本领并不比狮子好多少：数字 3 从未得到完整整合，只得到衔接。

因为，根本属于动物的二元关系仍在某个区域继续盛行，那正是想象界；而人终究多少懂得计数，所以归根结底才产生我们所谓的冲突。

如果把数字三衔接出来没有如此困难，也就不会存在我们最近正用小绳梯和各种把戏尽力跨越的前俄狄浦斯与俄狄浦斯之间的这道 gap［鸿沟］。我只是想让你们发现：从人们尝试跨越它的时刻起，始终只能依赖各种把戏；数字二与三之间的 gap 根本不存在真正属于经验的跨越。

我们同小汉斯恰好走到这里：他即将处理我们已经界定、名为阉割情结的过渡；而我们从一开始就能看出，他显然没有这种过渡。他同这个时而在这里、时而不在这里的 Wiwimacher［撒尿器］游戏；它属于他的母亲、大马、小马或爸爸，也同样属于他自己。可是，归根结底，我们从未看到它对他而言不只是一件极其漂亮的捉迷藏游戏对象，而且他还能从中取得最大的快乐。

我想，你们中一些人已经查阅这篇文本。事情就从这里出发，所涉及的只有这一点。这名儿童——无疑是出于给父母看的意图——从一开始便向我们呈现这样一个问题：想象阳具无处不在而又不在任何地方；这构成他同一个存在者发生关系的根本要素。弗洛伊德此刻会把这个存在者再明确不过地称作“另一个人”：也就是母亲。

他已经抵达这里；而一切似乎都进行得如此顺利，以至于弗洛伊德专门向我们强调：最初精神分析时期的教育学仿佛形成了一种颇有特色的自由主义乃至教育放任；得益于此，我们看到儿童以最坦率、清楚而幸福的方式发展。

就在这三个漂亮的前件之后，一件可称为小小纰漏的事情令所有人吃惊地发生了——我们不必过度戏剧化——：恐怖症。也就是说，从某一时刻起，这个儿童对某种东西表现出强烈惊恐；那个特权对象恰好是马，而我已经告诉你们，它在某种意义上具有隐喻性质。在文本中，儿童曾对母亲说："如果你有撒尿器，就应该有一个很大的撒尿器，像马一样的撒尿器。"很清楚，如果马的意象由此出现在地平线上，那么儿童也正从这一时刻进入恐怖症。

要以隐喻方式穿越小汉斯的观察，就必须理解：儿童怎样从如此简单、归根结底如此幸福而衔接清楚的关系，过渡到恐怖症。此刻，无意识在哪里？压抑在哪里？仿佛两者根本不存在：

- 他极其自由地向父母询问撒尿器的在场或缺席；
- 他告诉父母，自己去过动物园，看见一种动物——这里是狮子——有一个很大的撒尿器。

而且，出于观察开头未曾完整说出、却在事后逐渐显现的各种理由，撒尿器发挥一种趋于使自身在场的作用。

儿童非常喜欢展示自己；他的一些游戏清楚显示，撒尿器此刻本质上具有象征性质。他会在黑暗中展示它，把它同时作为隐藏对象呈现；也把它作为自己同感兴趣的对象——也就是小女孩——发生关系的中

介要素。他要求小女孩介入、帮助自己，也让她们观看它。文本还强调，母亲或父亲帮助他这件事，在把他的器官建立为兴趣要素的过程中发挥极大作用；毫无疑问，他借此获得一种快乐：俘获周围许多人的注意、兴趣乃至抚摸。

我们抵达这里时，某件事即将发生。要了解它在何种和谐中出现，请记住：恐怖症以前，小汉斯在想象层面表现了用我们的粗糙语言所谓“男性攻击”的一切最典型姿态。

他同小女孩处在一种求偶游戏中；这种求偶或多或少在场，甚至分化并拉开成两种方式：

- 有一些小女孩，他会紧逼、拥抱、攻击；
- 另一些小女孩，则以 Lieberklass-Distanz［保持距离的爱］方式对待。

  这是两种十分不同、已经非常精细——我几乎要说非常文明、规整而有教养——的关系方式。弗洛伊德本人使用“有教养”一词，描述小汉斯对对象作出的区分。他对待自己视作有教养女士、同一社会圈层女士的小女孩，同对待房东家的小女孩，并不采取同一种方式。

这一切表面上为一种格外幸福的转移提供了出路，也就是把对母亲这个女性对象怀有的情感，重新投注到其他女性对象。我们可以设想，某种东西在这种发展中发生；据说，那项格外开放、能够对话、不禁止儿童任何表达方式的关系，使发展变得容易。

究竟发生了什么？既然现在不是像此前那样略过观察，而是要一步一步批判性追随它，我们已经能怎样处理问题？我认为，下列说法没有强迫文本：有一个符号显示我曾向你们给出的潜在结构——儿童同母亲的关系。危机的引入可以从它得到设想；危机采取实在阴茎开始参与、进入游戏的形式。

文本中有一件从未得到评注的事情。儿童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同小玛丽德尔在一起；她是他夏天在奥地利某处度假时见到的小伙伴。他讲述自己同小女孩在一起；后来，人们复述他的梦并说：

“真有意思，他梦见自己同那个小女孩在一起。”

汉斯作出一句非常漂亮的纠正：

“不只是同玛丽德尔在一起，是单独同玛丽德尔在一起……”

我认为，这个回答具有重要意义……观察中有许多丰富细节，阅读时都会被略过；更准确地说，人们把它们当作儿童故事而打发掉……弗洛伊德说得很清楚：一切都有意义。我认为，只有在我向你们打开、作为母子关系起始层面的想象辩证法中，这句话才完全可以设想。

这件事发生在三岁九个月；文本告诉我们，妹妹出生于三岁六个月。因此，

这个解释当然已经可以令你们满意。“不只是同……在一起，而是单独同……在一起”，也就是说，人可以完全单独地同一个人在一起；不像同母亲在一起时那样，还有这位闯入者。毫无疑问，此刻汉斯正逐渐

习惯小妹妹的存在。所以，按照最经典的评论类型，它显然已经足够令你们满意。

不过，你们很清楚，我不会停在这里。我说，另一个孩子真正闯入母子关系，肯定会加速这样或那样的关键时刻、这样或那样的决定性焦虑；但我的出发点、反复强调之处以及我为何毫不犹豫地突出“单独同……在一起”，就在于：无论处在什么位置，儿童从来都没有同母亲单独在一起。

在儿童同母亲表面二元的关系中，全部进展都带有这一绝对根本要素的标记：儿童的介入……对女性性欲的分析经验给予我们保证；我们必须坚定维持这个参照点和轴线，也就是弗洛伊德直到最后仍围绕女性性欲坚持的东西……

始终只是作为替代、补偿，总之，总是参照母亲根本上

所欠缺的某种东西；而它因此从不让儿童同母亲单独在一起。

母亲逐渐被儿童认识并定位成带着这项根本欠缺的人；她亲自在寻找这项欠缺，而儿童只能给她带来——如果暂且愿意这样称呼——替代性满足。任何新裂口和问题的重新开启，都只能以此为根本基础来引入和设想；尤其是实在的生殖器成熟带来的问题：在男孩身上，就是手淫的引入，也就是同他自己的实在阴茎相连的这份实在享乐。

只有在这个起始星丛中，事情才能得到理解；它为能够产生不同出路的关键要素提供基础，而这些出路构成：

- 一项具有正常出路的俄狄浦斯情结；
- 或者一项以或多或少否定化的方式、在或多或少程度上得到处理的俄狄浦斯情结；它完全不是人们通常教给你们的所谓神经症。

让我们从这里重新接过，并作一点评论。如果儿童必须发现这个维度：母亲欲求某种位于他本人彼岸的东西，也就是位于他最初感觉并渴望自己在母亲那里成为的快乐对象彼岸，那么同所有分析情境一样，这个情境只能在本质主体间的参照中设想。它始终同时而相关地包含每个主体的原初维度，也包含这种主体间视角进入每个主体以后具有的现实。换言之，我顺带提醒你们：某种东西从一开始便受到遮蔽，而我们只有到最后才能揭开它。

不过，你们已经充分了解观察，至少可以提出问题，并参照我从前无论恰当与否使用过的一些术语；它们是主体以能指方式处理任何现实的根本划分，也就是隐喻与转喻。这里确实应当应用它们，并至少容许这么多问号继续存在。也就是说，在儿童同母亲建立的每一种主体间情境中，

我们都可以说要先提出一个先决问题。它先行于一切，也许只有到最后才得到裁决：在这种替代功能中，最终用来把它表达为意象的东西，本身不意味着任何东西。

替代说起来很容易；不妨试试用一块石头替代一片面包。当你们把石头放进大象的鼻子，它可不会像你们以为的那样平静接受。问题不在

普通替代，而在这种能指替代意味着什么。总而言之，问题在于：对母亲而言，相对于作为其欲望对象的阳具，儿童发挥什么功能？

很清楚，下列两种情形完全不同：

- 儿童例如是她对父亲之爱的隐喻；
- 或者，儿童是她对自己并不拥有、也永远不会拥有的阳具之欲望的转喻。

母亲的行为极其明确地表明后一种情形……这位母亲就在这里，从厕所到床上，从字面上说都把儿童拖在身边……儿童是她绝对不可或缺的附属物；因而……因为汉斯的母亲正是如此。弗洛伊德非常喜爱这位母亲，曾为她治疗；她是如此善良、如此悉心照顾儿童——而且还很漂亮——，却能想出在孩子面前换内裤的办法；这终究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维度……如果这项观察确实完成了一件事，如果有某种东西在这个秩序中说明我向你们讲的根本内容，那就是面纱背后的东西；小汉斯的观察以及许多其他观察都向我们表明它。儿童是她对阳具之欲望的转喻，这是什么意思？

这并不是说，她对儿童的阳具怀有更多重视。这位在教育和谈论“这些事情”上如此自由的人，以自己的反应充分表明：一旦真正面对事实，需要伸手触及儿童向她拿出的这个小玩意儿，她就吓得魂不附体。

必须尝试以这种鲜活的张力重新砌出小汉斯的观察，让它闪耀起来。所以，你们看到，说儿童“作为母亲阳具欲望的转喻”受到把握，完全是另一回事；它蕴含一点非常重要的内容：他不是作为阳具携带者具有转喻性，而是“作为一个总体”具有转喻性。

戏剧恰恰在这里建立。如果问题涉及 Wiwimacher［撒尿器］，对他来说一切都会十分顺利；但问题不在那里，他的整个存在都受到质疑。正因为他的整个存在受到质疑，实在撒尿器开始参与时，差异才严肃地显现。实在撒尿器对他而言成为满足对象；所谓焦虑也从此开始发生。

所谓焦虑同下列事情相关：他能够衡量“自己为何受到爱”与“自己能够给予什么”之间的全部差异。这个儿童仅仅因为处在儿童相对于母亲的原初位置——也就是作为快乐对象在那里——，便处在一项自己根本上受到想象的关系中。对他而言，所能发生的最好事情，就是从纯粹被动状态中走出来……这项原初被动性至关重要，我们还会重新看到它；如果看不到这种原初被动化正嵌入这里，就无法理解《狼人》的观察……他所能做的最好事情……超出受到想象、被某种东西的俘获和陷阱攫住——他为了成为母亲对象而把自己引入其中，并可以说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真实处境：他受到想象……

……他所能做的最好事情，就是把自己想象成他受到想象的样子；如果可以这样表达，也就是转入“中间语态”[注1]。

> [注1]　动词过程的参与项通常分为“行动者”（主动语态）与“承受者”（被动语态）。“中间语态”表示主体为了自身利益完成行动，他同时是施事者与承受者。

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

从他也作为实在之物存在的时刻起，选择已经不多：很清楚，他可以把自己想象成根本不同、遭到抛弃的人，想象成不同于母亲所欲求的东西，并因此置身想象场域以外；此前，母亲曾通过他在那里占据的位置找到满足。

弗洛伊德强调：首先发生的是某种焦虑；但“对什么的焦虑”？我们留有痕迹：一个梦。他哭泣着醒来，因为母亲将要离开；他说“你要离开了”——这句话是对父亲说的——，其中涉及某种分离。

我们可以用无数其他特征补全这些术语：当他同母亲分离、同另一个人在一起时，焦虑便显现。可以确定的是，这些焦虑首先出现；而弗洛伊德强调，焦虑感不同于恐怖症，也就是不同于某种并不容易把握、而我们将尝试圈定的东西。

恐怖症是什么？人们当然可以轻快地跳过去说：恐怖症就是其中的表象要素。我愿意接受，可说完以后，你们又前进了多少？

- 为什么是这个表象要素？
- 为什么是如此奇特的表象？
- 它发挥什么作用？

另一个陷阱，是告诉自己这里存在某种目的，而它必定有什么用。

- 它为什么必定有用？
- 难道不会也有一些毫无用处的东西？
- 为什么预先断定“恐怖症有什么用”？
- 也许它恰好毫无用处？

如果它不在这里，事情也许照样发生；为什么要在这种场合预设目的性？我们会尝试弄清恐怖症的功能。这里的恐怖症是什么？换言之，

小汉斯恐怖症的特殊结构是什么？这也许会使我们对恐怖症的一般结构形成一些概念。

无论如何，我想立即提醒你们注意焦虑与恐怖症的区别；这里的区别十分鲜明。我不知道恐怖症是否真的具有如此强的表象性质，因为我们将会看到，很难知道他究竟害怕什么。他以无数方式衔接恐惧，却仍留下一个格外奇特的余项。如果你们读过观察，就知道这匹马——棕色、白色、黑色、绿色，这些颜色并非没有意义——提出一道直到观察结束也未得到解决的谜。它头部这里有某种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黑斑，使它成为史前动物。

马的额面上有这块黑斑；父亲追问儿童：

- “是它嘴里的铁衔吗？”
- “完全不是。”儿童说。
- “是马具吗？”
- “不是，不是……”
- “你在那里看到的那匹马有黑斑吗？”
- “没有，没有……”儿童说。
- 后来有一天，他终于厌烦了，说：“有，那匹有；别再说了。”

可以确定的是，人们始终不知道马嘴前面的黑色究竟是什么。因此，恐怖症并不那么简单，因为它甚至包含近乎不可还原的要素。

它的表象性质相当微弱；而在分析中周期性涌现的论述里，人们曾谈到某种否定性幻觉要素。马头上这种模糊之物，正给人这种感觉；因为归根结底，最清楚地向我们显现的就是它，也最容易让我们想到这种要素。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两种感受存在根本差异。儿童产生焦虑感，是因为突然觉得自己可能完全被排除在游戏之外。小妹妹当然把问题最大限度地准备好；但我再说一次，危机在远为深层的背景上开启，脚下土地随即塌陷：儿童开始能够设想，自己可能突然完全不再履行功能，可能不再是任何东西；他只不过是某种看起来像什么、同时又什么都不是的东西——也就是转喻。

我说的是我们已经见过的东西：转喻是现实主义小说的方法。如果现实主义小说令我们感兴趣，理由不在它带来的全部斑斓现实细节；因为归根结底，现实主义小说始终只是一堆陈词滥调。这些陈词滥调之所以令我们感兴趣，恰恰因为它们背后始终瞄准另一种东西，而且恰好瞄准表面上最相反的东西：一切欠缺之物。超出向我们提供的所有细节和这种石块的闪烁，有某种东西真正维系我们的兴趣；小说越具有转喻性，它的瞄准就越在彼岸。

于是，我们亲爱的小汉斯突然被抛入、至少可能被抛入自己的转喻功能。

他把自己想象成虚无——这样说比理论表述更鲜活一些。当恐怖症进入他的存在时，会发生什么？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在马面前，他体验的不是焦虑，而是恐惧。他害怕某种实在之事发生；他说有两种：

- 马会咬人；
- 马会倒下。

焦虑同恐怖症之间存在差别……焦虑从字面上说是某种没有对象的东西；我这里只是重复弗洛伊德，因为他已经完整衔接这一点……在恐怖症中，涉及的根本不是焦虑，尽管马在这里承载焦虑的基调：它们承载的是恐惧。恐惧总以某种方式涉及能够衔接、命名的实在之物：

- 这些马会咬人；
- 这些马会倒下。

马还有许多其他性质：它们可以在自身保留这里所谈的焦虑痕迹，而且两者也许确实存在某种关系。我们稍后会看到，这片模糊、这块黑斑同焦虑之间有什么关系；因为马遮住某种东西，而下面仍有某种东西显露，在开始漂浮之物背后发出光亮；那就是黑色。

可是，在焦虑的亲身体验中，小汉斯这里具有的是恐惧。对什么的恐惧？不是对某匹马的恐惧，而是对马群的恐惧。从这一时刻起，世界仿佛由一整套危险点和警报点标出节奏；这种东西以某种方式重新结构他的世界。

弗洛伊德曾在某个时刻对恐怖症功能提出疑问，并建议通过其他病例裁决。按照他的建议，不要忘记恐怖症最典型的形式之一……我们以

后还会看到，恐怖症究竟是一种疾病类别还是一种综合征……最常见的形式之一，就是广场恐怖症，也就是阉割恐怖症。广场恐怖症确实在自身携带意义：世界由警报符号标出节奏；它甚至向我们表明，这些警报符号勾勒出一个场、一个领域、一片区域。

如果非要尝试，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自己知道恐怖症的意义朝哪个方向开始——我不会说它的功能，因为不能急于求成——：它在

儿童世界中引入一种结构，一种把内部与外部的功能推到前台的方式。此前，儿童可以说处在母亲内部；他刚刚遭到排斥，或者在焦虑中想象自己遭到排斥。现在，他借助某种东西——这是一种尝试，我们从这个角度处理恐怖症——，用恐怖症建立新的内外秩序；一系列门槛开始结构世界。

相关知识卡 小汉斯的马：恐怖症作为防护构筑与能指替补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我确信，对民族志学家提供的某些要素、对村落空间怎样得到建构进行研究，会令我们在这里学到很多。原始文明不会随意建造村庄；有些田地已经开垦，另一些仍然荒芜；其中还有一些界限，对这些多少已经从自然中脱离出来的人而言，真正表示着根本坐标。这里有许多值得学习的东西，也许我还是会说几句。无论如何，存在门槛。不止如此，还有某种能在门槛处呈现为“守护它之物”的意象：Schutzbau［防护构筑］，或 Vorbau［前筑、门廊］，也就是向前突出的建筑或守卫性建筑。

［Es bleibt ihr nichts anderes übrig, als jeden der möglichen Anlässe zur Angstentwicklung durch einen psychischen Vorbau von der Art einer Vorsicht, einer Hemmung, eines Verbots zu sperren, und diese

Schutzbauten sind es, die uns als Phobien erscheinen und für unsere Wahrnehmung das Wesen der Krankheit ausmachen.]

[“它只剩下一种办法：用某种警戒、抑制或禁令式的心理前筑，封锁每一种可能引起焦虑发展的诱因；正是这些防护构筑向我们显现为恐怖症，并为我们的知觉构成疾病的本质。”]

相关知识卡 小汉斯的马：恐怖症作为防护构筑与能指替补

弗洛伊德用这个术语明确衔接恐怖症：它是建立在焦虑点前方的东西。这里已经有某种东西开始向我们显现并得到衔接，向我们表明恐怖症的功能。

我只是不想走得太快，也请你们不要停在这里；因为人们通常只须极少内容就会满足。把焦虑变成恐惧，这个想法终究十分漂亮；恐惧表面上比焦虑更令人安心，不过这一点也并不确定。

今天，我们只想标出：在发生史中，绝不能把恐惧标记为自我建构的原始、原初要素；有一个

我从不点名的人曾以最明确的方式这样衔接，并把它当作自己全部学说的基础；他出现在一份有关某个——被或多或少恰当地称作“巴黎”——“学派”的报告［文本］上。

恐惧无论如何都不能被视作神经症结构的原始要素或第一要素。如果有什么地方使我们真正接触并看到，恐惧怎样在神经症冲突中作为前方防御介入，替代某种完全不同、本质上和天然没有对象的东西——焦虑——，那么正是恐怖症使我们得以衔接这一点。

相关知识卡 小汉斯的马：恐怖症作为防护构筑与能指替补

今天，我也将停在自己论述的这座 Vorbau［前筑］上。我想，自己已经把你们带到恐怖症问题提出的精确位置，也带到恐怖症被引来——请你们以这个词最深的意义理解——加以“回应”的东西面前。下次，我们会尝试看看事情的后续将把我们带到哪里。

第15课 · 1957年3月27日

散步并不是在某个空间中辨认自己的坏办法。如果你们这样看待事情：在一个已经走过若干路线的场域中，问题在于学会在路线以外想象其地形。我的意思是，例如，你们已经回到起点却没有意识到；或者，当你们待在浴室这样熟悉而完全自成一体的地方时，很少会想到，如果凿穿墙壁，就会来到隔壁书店的一楼。我甚至要告诉你们，每天你们洗澡时，隔壁书店仍在工作，而且就在伸手可及之处。于是，人们说：“这个该死的拉康，真是个形而上学家！”

可是，问题大致正在这里：让你们辨认某些连接，同时看见总体平面的要素，使你们不致沦为我刻意所谓“既定路线的仪式”。

于是，我们同小汉斯一道抵达一个位置：在这个原本进行得并不太坏的情境中，焦虑

和恐怖症来到。我把两者区分开并非没有意图；况且，这严格符合你们在弗洛伊德文本中能够找到的内容。

既然涉及地形而非随意漫步，我希望借一趟不寻常的行走向你们呈现这幅地形。它不寻常，但并非从未有人走过；小汉斯观察已经走过它。我只想开始向你们展示那种随便哪个傻瓜都能在那里发现的东西——除了精神分析家，因为精神分析家不是随便哪个傻瓜。

Agent	Manque	Objet
Père *réel*	Castration *symbolique*	Phallus *imaginaire*
Mère *symbolique*	Frustration *imaginaire*	Sein *réel*
Père *imaginaire*	Privation *réelle*	Phallus *symbolique*

这位象征母亲恰恰在表现自己拒绝爱时成为实在的；满足对象本身——乳房——则成为挫折的象征：爱之对象遭到拒绝。这个实在的洞恰恰是不存在的东西。实在界按本性是充实的；要在那里造成一个实在的洞，就必须引入一个象征对象。这里涉及什么？

我们已经抵达这样一个点：儿童的进程——所谓“前俄狄浦斯”进程——归根结底在于“把自己变成爱之对象”……对这个儿童而言，母亲是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真正重要的东西……为了把自己变成她的爱之对象，他逐渐被引向察觉：自己作为第三项介入；他必须滑入并钻进某个地方，位于他逐渐体验到的母亲欲望同作为阳具的想象对象之间。

我们必须提出这个公设，因为它是最简单的表象，能够综合一系列否则无法设想的事件；它们都来自前俄狄浦斯时期这种象征—想象关系结构。我向你们说明的这一点，已在弗洛伊德《性学三论》第 5 卷第

85 页的一章中得到严格衔接；该章题为《儿童对性欲的研究》或《儿童性理论》。

你们会在那里看到，弗洛伊德正如我所说地明确提出：作为整体的一切倒错，只有通过同阳具母亲的儿童理论之关系以及经过阉割情结的必然性，才能得到设想和解释。

因此，竟然还有人坚持认为：倒错从根本上是一种倾向、本能；倒错者身上有某种直接的东西，有一条通向满足的短路，为他真正带来厚度和平衡。他们就这样解释“倒错是神经症的负片”这个概念，仿佛倒错本身就是神经症中受到压抑的满足，仿佛它是正片。这恰好完全相反，因为一个否定的负项丝毫不必然是它的正项。

弗洛伊德再清楚不过地断言，倒错的结构同围绕“阳具的缺席与在场”得到编排的一切相关；倒错始终同阉割情结本身存在某种关系，哪怕只在地平线上。因此，从发生学观点看，可以说它同神经症处在同一层面。

它的结构使它成为神经症的负片，

或者更准确地说，也许是神经症的反面；但它同神经症一样具有结构。用同我这里使用的词汇相近的说法，两者由同一套辩证法结构化。

对儿童性理论的参照，毫无疑问值得我们停下来，考察弗洛伊德很早便赋予

儿童理论概念本身的重要性，以及这套理论在儿童发展经济中的重要性。不过，它最充分的发展——也就是我在这里明确指给你们的那一章——直到很久以后才加入《性学三论》，我想是在 1920 年。德文版的缺点，是没有在每章旁边注明它加入《性学三论》这部合成著作的日期。儿童性理论及其在力比多发展中的重要性，

单凭自身就足以教会精神分析家把一种笼统而略带贬义、被他动辄以“理智化”之名运用的观念相对化。我的意思是，我们应当觉察：某种乍看仿佛位于理智领域的东西，显然具有一种单纯、笼统的“理智与情感对立”无论如何无法解释的重要性。

所谓“儿童理论”，也就是儿童对性现实进行的研究活动，其必然性完全不同于我们所谓——尽管并不恰当——的那种观念：理智活动仿佛具有上层建筑性质。共同意识所遵循的信念根底，或多或少暗中接受了这种弥散观念；但必须承认，儿童理论并非如此。

这里涉及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也可以使用这个词说，它位于身体总体之中，而其共同意义深刻得多。这种东西远为深刻，因为它包裹主体的全部活动，并驱动所谓情感项；也就是说，它依照主导意象的线条，引导主体的情感或感受。归根结底，它同最广意义上的一系列实现相关；这些实现表现为完全不能还原为功利目的的行动。

如果愿意，可以用一个也许并非最好、最概括，却因其表达价值而被我采用的词，为这一整套行动或活动分类：称它们为仪式性活动，而不只是典礼性活动。我的意思是：个人和集体生活中一切可以纳入这个界域的东西。你们知道，它无处不在；没有任何人类活动能够消除

它。即使具有强烈功利和功能倾向的文明，也会看到这些仪式性活动在最出人意料的缝隙中奇特复现。这里必然有某种理由。

总而言之，要准确定位所谓儿童性理论以及儿童身上围绕它结构化的全部活动秩序具有何种重要性与价值，我们当然必须参照神话概念。

不必是饱学之士，不必已经深入研究神话概念；不过，我确实打算在这里这样做。既然在我看来，有必要不断强调我们的领域同我认为必须把它连接到的那些参照要素之间的连续性，我会尝试缓慢而分阶段地进行。绝不是像有人曾经告诉我的那样，我企图在这里向你们提供一套一般形而上学或覆盖现实全域；我只谈我们的领域，以及最邻近、最直接相连的领域。

这恰恰是为了不落入不当的“世界体系”，不把我们的领域以一种完全不足而贫乏的方式投射到现实的整个层层秩序和场域中。因为“大者”始终会在“小者”中重新找到，它们也许同我们所做的事情具有某种总体类比；但这些类比当然绝不可能穷尽现实，甚至不能穷尽人类问题的总体。

可是反过来，也不能完全孤立我们的领域，拒绝看见其中并非仅仅与其他现实类比、而是同其他人文科学所接近的现实直接连接、直接咬合并接合的东西。我认为，这恰恰对于正确定位我们的领域、甚至仅仅在其中找到方向都不可或缺；这就是我们现在如此自然抵达“儿童理论”概念的原因。

因为，我已经谈了汉斯这么久，你们大概已经察觉：这项观察之所以像迷宫、乍看甚至杂乱无章，恰恰因为小汉斯的一系列发挥在其中占

据重要位置；其中一些极其丰富，给人一种增殖和奢华之感。它们不能不向你们显得恰好属于这类发挥重大作用的［儿童］理论阐发。

我们只从一项最初的显见之处接近神话。无论宗教神话还是民间神话，无论在传承的哪个阶段把握，所谓神话都呈现为某种叙事。

- 围绕这种叙事可以说许多东西。
- 可以从不同的结构面向把握它，例如说它包含某种非时间性。
- 也可以尝试依据它所界定的位置来规定结构。
- 还可以依据文学特征和形式来把握它：令人震动的是，它既同诗歌创造具有某种亲缘，又同诗歌创造鲜明有别，因为它同某些绝不服从主体发明的常项相连。

这也至少能使我们指出神话提出的问题。我想，总的来说，我们会说它具有虚构性质；

- 可是，这种虚构自身带着某种稳定性，不会任凭这样或那样的修改随意塑形。更准确地说，它意味着任何一项修改都会由此引起另一项修改，并始终提示一种结构概念。
- 另一方面，这种虚构同背后始终蕴含、而且虚构本身还携带其明确消息的某种东西——也就是真理——只发生一种特殊关系；这同样不能从神话中剥离。

我借此提醒你们，我曾在《被窃的信》研讨班某处写道：既然自己分析的是一则虚构，那么至少在某种意义上，这项操作完全正当。因为

我说过，在一切得到正确结构化的虚构中，人们都可以切实触到一种结构，而它同真理本身所能标示的结构完全相同。每一种真理表达携带的结构必然性，恰好就是同一结构：可以说，“真理具有虚构的结构”。

这些真理，或者这种真理——神话所瞄准的真理——以一种同样格外醒目的性质呈现；它首先表现为

取之不尽的性质。快速使用一个古老术语来说，它参与某种“图式”的性质；这种东西恰恰远比任何内容更接近结构，能够在各种给定上重新找到并再度应用——按这个词最物质的意义——，而且具有一切神话所特有的歧义效力。

受到结构化的东西、最适合神话范畴提供的这副铸模的东西，是某一类真理。即使仅限于我们的领域和经验，也不可能看不到，它涉及“人”同某种东西的关系；但同什么？

我们不会随意或轻易回答这个“同什么？”，也不会答得太快。如果回答“同自然”，经过我先前的评论，我们很快就会感到不满意：只要自然向人显现、把人计算在内，它就始终受到深刻的去自然化。如果说“同存在”，当然不能说不准确，却也许走得太远，进入哲学，甚至进入朋友海德格尔最近的哲学，无论这个参照多么切题。

我们当然有更加接近、更加清楚的参照。只要察觉这里涉及生与死、存在与不存在、尤其涉及出生——也就是尚不存在之物的出现，而且它同主体自身存在及经验带来的地平线格外相关——，便能在经验中立刻接近这些参照。另一方面，主体属于某个性别，尤其属于自己的

性别——他的自然性别；经验向我们表明，神话活动也以此为界。儿童确实拥有并运用这种神话活动。

于是，很容易看到，它凭借自身内容和瞄准，既同严格说来

在神话术语下发现的东西一致，又没有完全覆盖它。在民族志研究中，神话以虚构形式呈现，始终或多或少不再瞄准人的个体起源，而是他的物种起源、人类的创造、根本滋养关系的发生，以及所谓人类重大资源的发明：火、

农业和动物驯化。这正是我们在神话中发现的东西。

同样，虚构还解释人怎样同一种在神话中不断受到质疑的东西建立关系；它是秘密的、有害或有益的力量，但本质上以

神圣性质为特征，也就是同神圣力量的关系。在神话叙事中，它得到不同命名；可是对我们而言，它显然可以定位成人同意义的这项权能、尤其同它的能指工具之间的关系。凭借这个工具，人向自然引入一种既使他远离自然、又使他接近宇宙的东西；它使人能够向自然秩序引入的不只包括自己的需要……

以及服从需要的改造因素……

还包括某种肯定超出这一切的东西：一种从未得到哪怕近似把握的深层同一性。一边是人操纵能指或受能指操纵、把自己纳入能指的权能；另一边则是，他在一系列介入中体现这个能指机构的权能。这些介入在起源处与其说是无偿活动，不如说是把能指工具直接引入自然事物的链条。

这些神话同儿童神话创造的连接和邻接关系，已经由我刚才所作的靠拢充分标明。总而言之，它们给我们提出一个已经持续一段时间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神话研究、或者说科学神话学与比较神话学。它越来越多地阐发一种方法；这种方法的形式化性质和形式化带来的丰饶性，都已经表明跨出了一步。也许，最终正是沿着这个方向，而不是借助迄今分析神话时使用的类比法则以及各种文化主义、自然主义参照，形式化才可能从神话中提炼出某种可以称作要素或单位的东西；它们在自身层面拥有可比较却并不相同的结构运作性质［神话素／义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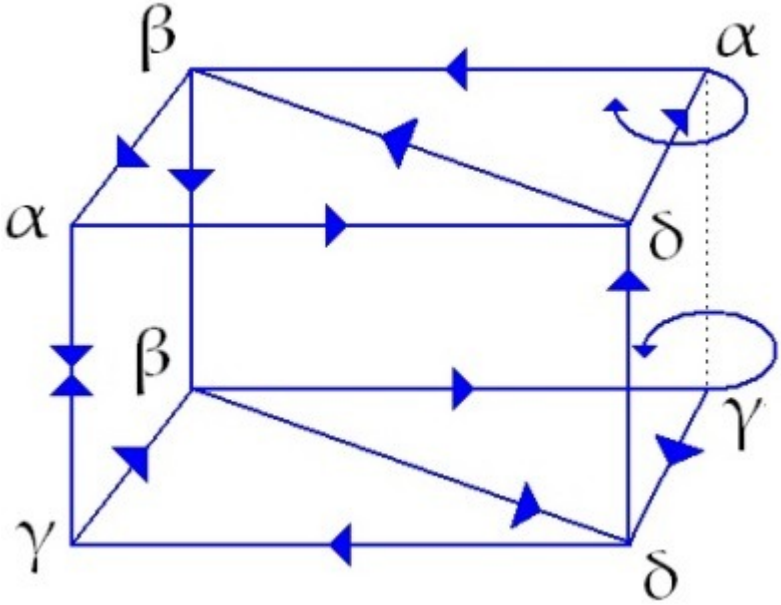
同现代语言学家在语言研究中阐发的各种“序位单位”相仿[注1]。

> [注1]“序位单位”（taxième）一词借自达穆雷特与皮雄的术语，指“联结、同结、异结”等语义—逻辑关系。

人们已经能够建构并实践这种方法，有效地孤立一些被界定为所谓神话建构单位的要素。继续在一系列神话中进行实验，把它们置于这种分解的检验下，观察重新组合怎样运作，就会发现：只要离开

所谓神话的表面类比，表面上相距最远的神话之间就会出现一种惊人的统一性。

例如，说乱伦与谋杀是两件等价之物，乍看不会浮现在你们心中。不过，如果比较两则神话或同一神话的两个层次，例如两个不同世代发生的事情，就会看到：把它们放入一个形态同我上次在黑板上画的小立方体完全相似的星丛，



并把“父亲”“母亲”等项安置在建构的不同顶点上——例如主体不认识的母亲、第一代中处于某个位置的父亲——，也会发现“乱伦”占据另一个特定顶点。进入下一代时，你们会逐点发现——这里的法则只有能够得到严格而无歧义的形式化才有意义——，孪生兄弟概念同第一代的父母配对重叠，并以某种方式成为它的预期变换。通过这项已经由若干结构假设规定的变换操作，谋杀来到相同位置；这些假设决定我们应当怎样处理神话。

于是，这使我们了解到可以称作能指本身的重量、在场和能指机构的东西，了解到它特有的冲击：它孤立某种始终最为隐蔽的东西，因为它本身不表示任何东西，却确实承载意义的整个秩序。

如果存在这种性质的东西，那么它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神话中鲜明可感。

这段必要的开场白，向你们指出我们准备沿哪个方向接近并检验这些乍看鲜明属于想象的繁茂主题……甚至如弗洛伊德本人在观察中提示为一种可能性那样，他把它当作一位假想对话者的意见提出……

这些想象主题也同样可能受到暗示。如果按最简单的意义理解这个词，暗示就是“一个主体所衔接的某种东西，以既成真理的状态进入另一个主体”，至少作为一种带有某种信念性质的形式得到接受。它仿佛是一件赋予现实的外衣，从一个主体那里被另一个主体接收；而“暗示”一词所蕴含的意思，可能使人怀疑这里的建构是否真实可信。

这是一种由主体接收的建构；当然，再没有什么概念比它更容易作为批判要素出现，而这种批判也未必不正当。谁会比我们更应当认为，这里确有值得格外考虑的东西？我们一向主张，在象征层面组织世界的文化要素，凭自身本性恰恰不属于任何人；它必须得到接收和学习。当然，这为暗示概念提供了无可争议的基础。同样醒目的是，暗示不仅存在于小汉斯病例，而且公开铺陈在我们眼前。可以说，小汉斯父亲的追问方式随时表现为一种真正的审讯；它有时甚至带着引导儿童回答的一切特征。

正如弗洛伊德在许多地方强调，父亲的介入当然相当粗略、粗糙，

甚至直截了当地笨拙。他本人在记录儿童回答的方式中表现出各种误解，并紧逼儿童理解得太多、太快；弗洛伊德也强调了这一点。阅读观察同样会清楚看到，确实发生了某种远非独立于父亲介入的东西，

尽管父亲的全部缺陷随时受到弗洛伊德点明和标出。这一点十分明显：

- 我们可以看到汉斯的行为和建构；
- 可以最鲜明地看到他怎样回应某次父亲介入；
- 尤其能看到，从某一时刻开始，他可以说突然加速；恐怖症获得一种非常明显的加速和高产性质。

当然，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观察小汉斯神话生产的这些不同时刻对应什么。同样非常明显的是，这种生产带着每个人的词汇都会暗中赋予“富于想象”一词的性质，也就是这个词的用法所蕴含的虚构性乃至无偿性。

最近，有人在我对一位展示病例进行询问时，向我强调

这位病人某些建构所具有的想象性质。在他看来，这仿佛始终表明某种歇斯底里的“暗示”基调，或暗示在病人这种生产中的效果。可是，很容易看出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虽然受到一个问题引发和刺激，病人的谵妄前生产力却严格依照自己的结构，以特有印记和增殖力量显现。处理汉斯时，我们得到的甚至完全不是这种印象。

任何时刻都不会让人感到这是谵妄生产；我还要说得更多：它鲜明地给人一种游戏生产的印象。不只是游戏；它的游戏性质如此彻底，以至于汉斯本人有时也难以把圈闭合、维持自己走入的某条道路。他先讲出

某个华丽庞大、近乎闹剧的故事，例如妹妹安娜出生时鹳鸟怎样介入；随后完全可以说："不过，我刚才说的那些话，你们还是别信。"

尽管如此，这场游戏中出现的与其说是恒定项，不如说是某种构型；它有时逃逸，有时又醒目得可以把握。我想把你们引入的正是这里：某种结构必然性不仅统摄每一则——尽管必须加上一切必要保留——所谓"汉斯的小神话"的建构，也统摄它们的进展和变换。我要特别提醒你们：重要的未必总是内容。

我的意思是，对先前心理状态或所谓"肛门情结"的或多或少有序的复现，会在汉斯围绕 Lumpf［粪块］任意展示的一切中耗尽；这个主题在观察中发挥作用，而且对父亲而言从字面上说出乎意料……弗洛伊德告诉我们，他特意使父亲对一些很可能遇见、而弗洛伊德自己已经预见的主题一无所知……弗洛伊德点出其中两个，它们在父亲探索儿童的过程中涌现：

肛门情结，以及不多不少的阉割情结。

不要忘记，在我们所处的 1906—1908 年，分析理论中的阉割情结对弗洛伊德而言已经是一把重要钥匙；但它当时完全没有充分暴露在光下，也没有向所有人揭示为中心钥匙。远非如此，它只是一把带着若无其事的模样、同其他钥匙混在一起的小钥匙。归根结底，弗洛伊德想说，父亲对某种必然涉及如下根本关系的东西全无准备：阉割情结是主要铰链；其星丛的建立

和解决、俄狄浦斯的上升或下降阶段都通过它。

所以，我们看到小汉斯确实作出反应。他的反应贯穿实在父亲的介入，也就是一段时间里，父亲审问的交叉火力将他放进温室。总体观察表明，这些火力促成汉斯身上某种东西的真正发展乃至真正培育。它如此丰富，使我们既不能认为没有父亲介入，恐怖症仍会获得这种延伸和回响，也不能认为没有这段时间如此殷勤的坚持，恐怖症仍会拥有同一个中心、发展和丰富性。

弗洛伊德承认这一点，而且我甚至要说，他亲自接受了它：他承认，在父亲作用下，恐怖症一度可能发生某种突然燃起、急剧推进、加速乃至强化。这些都只是初步真理，但仍必须说出来。

让我们从现在的位置重新接过。为了不让你们完全面对一片混乱，我会指出一幅一般图式；我想，我们将尝试理解的汉斯分析现象——它的起点与结果——会围绕它以令我们满意的方式得到编排。

汉斯同母亲处在某种关系中；他对母亲之爱的直接需要，同我们所谓主体间诱饵游戏混合。儿童的言论最清楚地显示这种游戏；只须阅读观察开头，就会发现各种迹象都表明：他需要母亲拥有阳具。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阳具对他而言是某种实在之物。

恰恰相反，他的言论每时每刻都暴露这项关系在游戏视角中显现的歧义。归根结底，儿童确实知道或至少暗示某种东西；他说：“我正好想到……”随后停住。他想的是：“她究竟有还是没有？”他询问母亲，让她亲口说出自己有观察中所谓 Wiwimacher，也就是“撒尿器”；谁知道这个回答令他在多大程度上满意。这个 Macher 并未得到完整翻译，它是“制造者”，即“撒尿制造者”，其中蕴含阳性；其他以 wiwi- 为前缀的词中也有类似情况。

儿童同母亲处在这种想象游戏的亲密与默契中；突然，他陷入一种情境，某种失代偿从一个侧面发生，因为出现了焦虑，而它恰恰在同母亲的关系中显现。

上次，我们尝试观察这种焦虑回应什么。我们说，它同各种以某种方式使情境复杂化的实在要素相关。这些实在要素并非含义唯一；母亲的对象中有一些新的实在要素：

- 有妹妹的出生以及它在汉斯身上引起的一切反应；不过，这些反应没有立刻到来，恐怖症直到十五个月后才爆发；

- 还有实在阴茎的介入。不过，实在阴茎也已经参与一段时间，至少有一年。得益于儿童同父母之间的良好关系，小汉斯在言说层面承认手淫；我们同样毫不怀疑，这个实在阴茎连同它带给情境的复杂性，也已经存在一段时间。

上次我们还注意到，这些失代偿要素可以从何处介入：在一种情况下，汉斯遭到排除，可以说从情境中坠落，被妹妹逐出；在另一种情况下，则是别的东西，是阳具以某种形式介入——我说的是手淫——。对汉斯而言，它仍是同一个对象，却以完全不同的形式呈现。直接说出来吧：这里至少涉及对勃起相关感觉的整合，也很可能涉及我们甚至可以称作性高潮的东西；当然，不涉及射精。

显然，这里有一个问题。例如，弗洛伊德没有裁决它；他当时没有足够观察，无法处理儿童手淫中的性高潮这个困难问题。我不会就此立刻直接处理，只提醒你们，它处在我们追问的地平线上。

甚至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围绕观察中一件十分明显的事情，为什么

弗洛伊德“几乎连问题都没有提出”？这件事就是“喧闹”和骚动；面对恐怖症对象——马——时，儿童害怕的事情之一。弗洛伊德没有追问，这是否恰恰同性高潮相关，甚至同一次并非属于儿童自己的高潮、例如他瞥见父母之间的场景相关。

父母断言“儿童不可能瞥见任何类似事情”，弗洛伊德十分轻易地接受了。这是一道我们以后会得到绝对确定答案的小谜。不过，我们的全部经验都向我们表明，儿童的过去、亲身体验和发展中，确有某种

很难整合、而且我认为极其明显的东西。

我很早以前就强调过它，我想是在自己的论文或几乎同时期的文章中；

那就是最初的复杂性高潮感觉所具有的破坏性——在偏执狂患者身上尤其如此。为什么是偏执狂？我们会在路上尝试回答。不过，可以肯定，我们经常得到一种见证：这种经验在一些主体身上格外清楚地呈现撕裂性的侵袭与颠覆性的闯入。它由此向我们指出，在我们现在的转折处，实在阴茎的这项新颖性必须以另一种方式发挥作用，成为一个难以整合的要素。

不过，谈到焦虑爆发，它并非立刻来到前台，因为这件事已经持续一段时间。归根结底，什么使焦虑在这个时刻而且只在这个时刻发生？问题显然依旧存在。

我们的小汉斯由此抵达恐怖症出现的时刻。把握恐怖症的这次出现，立刻就会看到：并非弗洛伊德，而无疑是同弗洛伊德通信的父亲——观察文本的后续都把这一点推到前台——，马上察觉某种东西同母子

之间的紧张相连。至于格外触发恐怖症的东西具有何种性质，他同样［……］；他在观察最初几行以极其清楚、赋予第一次叙述全部效力的方式提出：

“严格说来，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告诉您这种障碍的诱发因素……”

随后，他开始描述恐怖症。这里涉及什么？暂且撇开恐怖症出现的后续，思考一下。我们已经赋予母亲以及儿童同她的象征—想象关系如此重要的地位；我们说，对儿童而言，母亲表现出一种对她所欠缺之物、对她没有的阳具的“要求”。

我们说：“这个阳具是想象的。”它对谁而言是想象的？对儿童而言。如果我们这样谈论，理由是什么？因为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它始终在母亲身上发挥作用。为什么？你们会说：“因为他发现了它！”但不要忘记，他之所以发现它，是因为它是真的；如果它是真的，为什么是真的？必须知道它在哪种意义上是真的。因为分析家——尤其女性分析家——经常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看不出女人为何比别人更加注定去欲求自己恰好没有的东西，或者相信自己拥有它。”

理由恰恰——我们先限于此——属于“能指自身及其机构的存在”这个秩序。正因为阳具在能指系统中具有象征价值，它才以这种方式通过人际话语的全部文本得到传递，并在其他意象中以优先方式强加于女人的欲望。

在这个转折、这个失代偿时刻，问题不恰恰在于儿童必须迈出这样一步吗？单靠自己，他从字面上无法跨越：同他进行游戏、由母亲欲求的阳具这个想象要素，必须对他而言比对母亲而言更进一步，成为母亲欲望的要素，成为他为了俘获母亲而必须经过的东西。现在，他必

须实现某种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容，也就是察觉“这个想象要素具有象征价值”。

换言之，如果能指系统……以共时方式界定，就是语言系统；以历时方式界定，就是话语系统……

是儿童从一开始便进入的东西，那么他并没有进入系统的全部广度和范围；他只围绕同母亲的关系逐点进入：母亲“在那里”或“不在那里”。

可是，最初的象征经验完全不够；人们不能围绕自己所爱之物“在那里”或“不在那里”这个事实，建构

整个能指关系系统。我们不能满足于两个项，还需要其他项。问题并不在别处，而在于“象征系统的运作需要最低数量的项”。要知道这个最低数是三还是四[注2]。

> [注2] 参见《被窃的信》研讨班中的 α、β、γ、δ。

它肯定不只等于三：俄狄浦斯确实给我们三项，但还必然蕴含第四项。因为它告诉我们，儿童必须跨越俄狄浦斯；这意味着必须有人介入这件事——那就是父亲。人们向我们解释怎样介入，并讲出全部小故事：同父亲竞争，对母亲的欲望受到抑制。

然而，在我们逐步推进、面对特殊情境的层面，已经说过父亲有一种古怪的在场。我们会看到，在这里发挥作用的是否仅仅是这项古怪在场，换言之，这种程度的父亲欠缺。不过，在依靠这些所谓实在而具体、又极难彻底弄清的特征以前，先要问：父亲是实在的、多少有所欠缺，究竟意味着什么？

所有人都满足于近似说法；最终，人们以某种据说属于我们的逻辑之名告诉我们，这里的事情更加矛盾，而不认为必须停下来。不过，我们也许会看到：对儿童而言，一切都围绕某些意象具有象征运作这一点得到编排。

这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这些此刻由现实带给他的意象太过丰盛、在场而繁茂，却显然处在完全缺乏协调的状态；因为儿童必须处理的，是一个迄今在一定程度上和谐运作的世界：

同母亲发生关系的世界。其中那项想象开口或缺失要素，归根结底使这场关系对母亲如此好玩乃至刺激。文本有一处说，父亲要求母亲让儿童离开床铺时，她略微恼怒；她抗议、游戏、卖弄风情。人们把这个词译成“颇为恼怒”，而它其实意味着“十分兴奋”。儿童在那里当然并非没有理由。我们终有一天会准确知道，他为什么待在母亲床上；这是观察的一条轴线。究竟发生什么？

今天，我马上给你们举一个例子，说明事情怎样发生，也说明我所谓这些意象首先从母子关系中产生、同时还包括“其他新意象”是什么意思。儿童并没有很差地面对它们；因为有了小妹妹以后，一切再也不

能简单嵌合到母亲的世界中，于是若干概念介入，而他很善于在现实层面应对：

- 大与小的概念；
- 在那里与不在那里、却会出现的概念；
- 生长与涌现的概念；
- 比例与尺寸的概念。

在这些不同相位中，大者与小者依照不同配对和对立而面对。我们看到，他极其熟练地处理这一切。谈到妹妹时，他说：“她还没有牙齿。”这意味着，他对这种涌现有非常准确的概念。弗洛伊德在一旁讽刺，但没有必要认为这个儿童是形而上学家。

儿童说的话完全健康而正常；他很快便面对一些并非如此不言而喻的概念，例如新东西的出现，以及三项的涌现：一方面是涌现，另一方面是生长——她会长大，或者她没有的东西会长出来；这没有什么值得讽刺。还有第三项，表面上最简单却并非最直接给定：比例或尺寸。

人们会同这个儿童谈论这一切，而对向他本人提供的解释，他似乎仍然难以接受：有一些人“没有”；女性“没有阳具”。父亲将这样告诉他并加以介入。儿童此前曾清楚、灵巧而准确地亲自处理这些概念；可是，他远未满足于此，而是走过一些乍看惊人、可怕、病态而仿佛属于恐怖症的迂回，最终抵达什么？抵达我们以后会看到的、他在结尾为问题给出的解决。

不过，很清楚，通向这项解决有若干道路，他必须沿着它们前进。即使已经把握能够令人满意地对象化实在界的形式，这些道路相对于它仍极其迂回。我们会随时遇见这次跨越、这种想象界和象征界的提升；你们将会看到，它当然不可能在没有某种结构化的情况下发生，而这种结构至少以三元圆环进行。下次，我会向你们展示它的若干后果。

可是今天，我立刻举一个例子。父亲进行一次介入以后，长颈鹿幻想恰好发生……父亲最终根据弗洛伊德的指示——下次你们会看到这些指示意味着什么——，反复向汉斯灌输女人没有阳具、不必再寻找它。弗洛伊德竟指示父亲作出这种介入，真是一个世界；父亲严格遵照他的指示行事。不过，暂且撇开这一点……儿童对父亲的介入作出什么反应？

他通过所谓"两只长颈鹿幻想"作出反应。儿童半夜突然出现，说："我想到了一件事。"他害怕并来寻求庇护——别人说他害怕，我们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害怕——；无论如何，他来到父母床上重新入睡，随后被送回自己的房间。第二天，人们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是一则幻想，里面有两只长颈鹿……"大长颈鹿默不作声，小长颈鹿十分稀有。"［雅克·普雷维尔：《长颈鹿歌剧》］……这里有一只大长颈鹿和一只译成"揉皱的"小长颈鹿——人们只能尽力这样翻译。本课转录写作德语 Verwutzel；按小汉斯随后把纸揉成一团的动作，这里指"揉成一团"。人们问儿童指的是什么，他便作出展示：拿起一张纸，把它揉成一团。现在看看这怎样得到解释。[注]

> [注] 原始观察常见词形为 verwuzelt；米勒编订本在相关段落中直接处理为 girafe chiffonnée（"揉皱的长颈鹿"）。verwurzelt 通常意为"扎根"，并不是这里的词。

父亲立刻毫不怀疑，两只长颈鹿中，一只——大的——象征父亲；另一只——小的——被儿童夺来坐在上面，同时让大的高声喊叫；这是对母亲阳具的反应，是对母亲及其欠缺的怀念。父亲立刻把它命名、感知并辨认为小长颈鹿的意义。不过，这丝毫没有阻止他以一种自己并不觉得矛盾的方式，同时把“大—小长颈鹿”这个配对视作父母配对。

这一切当然提出最有意思的问题。我们可以无止境地讨论大长颈鹿是否是父亲，小长颈鹿是否是母亲。儿童确实要重新占有母亲，并引起父亲的最大恼怒乃至愤怒。这种愤怒并非实在的愤怒；父亲从未真正发怒。小汉斯亲自向他指出：“你应该生气，应该嫉妒。”遗憾的是，父亲从来没有在那里扮演雷霆之神。

让我们稍稍停在完全明显可见的事情上。一只大长颈鹿和一只小长颈鹿终究彼此相似，一只是另一只的分身。这里有大与小的一面，但也始终有同为“长颈鹿”的一面。换言之，我们重新找到同上次所说完全类似的东西：儿童作为转喻被母亲的阳具欲望抓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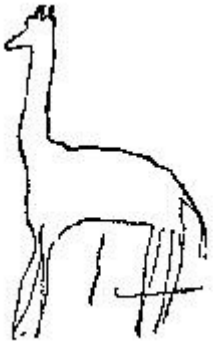
儿童“作为总体”就是阳具。当需要把阳具归还给母亲时，儿童以分身形式使整个母亲阳具化，制造一项母亲的转喻。此前，那只是谜一般的阳具：既受到欲求，又既信又不信，沉浸在歧义和信念中，成为同母亲进行诱饵游戏的参照项；现在，它开始被衔接成转喻。

仿佛向我们展示意象的创造和引入一场真正的象征游戏还不够；为了清楚说明我们已经跨过意象向象征的过渡……观察中没有任何人真正理解的这只“小长颈鹿”，其实就在眼前……儿童告诉我们：这只小长颈鹿如此彻底地是一个象征，以至于它能够像一张纸上的小长颈鹿那

样被揉皱；也就是说，从小长颈鹿只剩一幅图画的时刻起，就可以被揉皱。

没有什么能比这些表面上绝对矛盾、不可思议的东西，更准确地转译从想象界向象征界的过渡。因为你们始终把儿童讲述的一切都当作在各个方面属于三维领域的东西。

可是，符号游戏中也有某种属于二维的东西。正如我在《被窃的信》中说过的，当一切都消失、手中只剩某样可以揉成一团的东西时，汉斯正以同一个动作努力说明小长颈鹿究竟是什么。此刻，揉皱的小长颈鹿所“表示”的东西，完全同他从前画过、而我曾在这里给你们看过的长颈鹿图处在同一秩序；那只长颈鹿带着自己的撒尿器，已经走在通向象征的道路上。



整幅画尽管完全松散，各肢体仍各就其位；但他给长颈鹿加上的撒尿器真正是一种图形性的线条。而且，为了不让我们忽略，它还同长颈鹿的身体分开。

现在，我们进入能指的大游戏，也就是我在《被窃的信》研讨班中处理的游戏。这个母亲的分身，被还原到始终为能指本身的传递所必需的载体秩序：它可以揉皱，也可以拿在手里、坐在上面。它是一份如此充满爱意的见证，以至于同时带着某种汇票和诽谤小册子的性质。

请注意，我并非只围绕一个点衔接我们可以怎样把握“从想象界向象征界的过渡”。还有各种其他点，因为我们看到《狼人》观察同小汉斯观察之间逐渐建立起一组平行关系。

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儿童沿着一些道路接近恐怖意象。我们尚未圈定这幅恐怖意象的意义，但为了圈定它，必须诉诸儿童接近恐怖意象时经过的经验：

- 在《狼人》中，它确实是一幅意象，但这幅意象在一本图画书中；儿童恐怖症的对象就是从书里出来的那匹狼；

- 在汉斯病例中也并非没有类似情形：他的书有一页，恰好位于那幅“鹳鸟把孩子放在红箱中、从烟囱顶送来”的图像对面；那里“碰巧有一匹正在钉掌的马”。

那么，我们会找到什么？既然我们正在这项观察始终寻找结构，就会发现它们在一种逻辑工具的轮转游戏中相互补充，形成一套圆环；小汉斯借它们寻找解决。解决什么？

在名为“母亲、他本人、阳具”的一系列要素或工具中，新要素使阳具不再只是“可以拿来游戏的东西”：它开始不听使唤，具有自己的“任性”，可以这样说；它有自己的需要和要求，把一切搅得乱七八糟。

问题在于怎样整理这一切；归根结底，至少要看怎样在这个永久原初的三人组中固定事情。一组三联将会出现："我的阴茎扎了根。"这是一种保证形式。遗憾的是，人们使他宣称阴茎已经"扎根"以后，恐怖症立刻再次燃起。

看来，它扎根同样带着危险，于是我们看到其他术语出现。出现了"穿孔"这个词；而当我们按照主题的神话分析来寻找，就会发现这个"穿孔"主题以成千上万种方式出现。首先：

- 他在一个梦中受到穿孔；
- 玩偶受到穿孔；
- 有些东西从外向内穿孔，有些从内向外穿孔。

随后，他找到第三个格外富于表达的术语；它终究无法从自然形式推导，却作为逻辑工具进入他的神话进程，真正成为同"扎根"和另一边的"张开洞口"构成三角形顶点的第三项。张开的洞留下空无，因为"如果它没有扎根，就什么也不剩"。于是出现一项中介：人们可以把它装上再装回、取下再装回；它可以拆卸。

儿童为此使用什么？他引入螺丝。水管工或钳工前来把它旋下；随后，安装工或水管工前来，把他的阴茎旋下来，再装上一根更大的。这项主题借自他的幼儿经验，却作为逻辑工具和第三项的神话要素得到引入……我们会看到它发挥什么作用，因为严格说来，这个要素将为问题带来真正的解决。归根结底，通过"阳具也被纳入象征游戏"这个观念——它可以组合，装上以后固定，却又可以移动、流通，是一项中介要素——，我们从这一时刻进入一条斜坡；儿童会在那里首次

稍稍喘息，摆脱对从未令人满足的调和神话的狂热寻求。它们最终把我们带到他找到的最后解决；你们会看到，那是俄狄浦斯情结的一项近似解决。我说这一切，是为了指出应当沿哪个方向分析这个儿童的术语及其用法。

另一个同样重大的问题开始勾勒：他在组织中调用的能指要素，本身已经借自象征要素。“正在钉掌的马”只是观察中隐藏的若干解决形式之一；它解决的，是怎样固定那项欠缺要素的问题。正因为欠缺要素可以由任何东西再现，所以最容易由本身具有足够硬度的对象再现。

最终，我们将会看到，在这个神话建构中，以最简单方式为儿童象征阳具的对象是什么：它是石头。我们在各处都能重新找到它，在同父亲发生的主要对话场景、也就是我们将要看到的真正解决性对话中也有它。你们会看到这块石头的作用。

它同样是被敲进马蹄的铁；还在儿童的听觉恐慌中发挥作用。当马用钉着某种不应完全固定之物的蹄子敲击地面，他格外惊恐；而儿童最终为这个固定问题找到螺丝的解决。

简言之，进展发生在“从想象界走向象征界”的过程中，发生在“把想象界组织成神话”的过程中；至少，这已走在真正神话建构——也就是集体神话建构——的道路上。因此，它从各个方面使我们想起集体神话，甚至有时令人想起亲属系统。严格说来，它从未抵达亲属系统，因为它是一项个体建构；不过，进展正沿着这条道路完成。若干迂回必须以最低数量完成，某种东西必须沿途得到满足；由此，那种术语关系的概念和效力才会出现。你们可以在转喻中——或者愿意的话，在我的 α、β、γ、δ 故事中——找到它的模型与骨架。

为了找到休息与和谐、跨过由某种裂口和欠缺实现的困难过渡，儿童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走过某种属于这一秩序的东西。也许并非每一项俄狄浦斯情结都需要这样经过神话建构；但它们必须以象征转置实现同一种完满，这一点绝对确定。另一种形式可以更有效，因为它能够落实为行动，也因为父亲的在场可以通过“他的存在或不存在”象征化这个情境；不过，小汉斯分析中发现的一切，都必然蕴含对某种同一秩序之物的跨越。

我希望下次向你们展示更多细节。

第16课 · 1957年4月3日

我们这项尝试已经抵达一个位置：现在要为那项著名而所谓的“客体关系”保留弗洛伊德式的层次和衔接；

因为正如人们所说，它“经过检验”便证明自己不只没有那么简单，而且从来都没有如此简单。

否则，整部弗洛伊德著作就真的看不出有何必要，尤其看不出为何还有两个似乎依旧、也许越来越神秘的维度：阉割情结和阳具母亲这个根本概念。研究过程使我们集中考察小汉斯病例，并尝试解读每次看到的东西。现在，我们尝试处理一种分析应用：用分析中惯用的关系类型，理清主体同所谓环境的根本关系。我们不得不看到，这件工具多么不能令人满意；昨晚再次看到了这一点。

如果把儿童同母亲的关系当作根本参照来处理，并认为自己可以停留在二元关系的一般术语中：固着于阳具母亲，处于母亲之中、受到母亲包裹，或不受母亲包裹；那么，我们面对的特征也许像［……］先生昨晚告诉我们的那样，实在太过一般，无法圈定只有在其中才能辨认的影响——我指“有效的”影响。

确实，弗洛伊德引入的范畴如此灵活，却无法

在当前用法中以足够寻常的方式相互交叉，使我们能在同一家族的关系内部随时区分例如性格特征与症状，这颇为奇特。建立二者的类比并不够；既然它们发挥不同功能，就必然具有不同的结构关系。这恰

恰是我们尝试做的事情：借弗洛伊德观察这些典范例子，切实接触这项差异。

你们知道，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经验中为一些术语赋予并尝试澄清其意义……因为要界定一个概念，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使用它……所以，我们正尝试澄清所谓象征界、想象界和实在界三种关系的意义。相对于我们的经验，它们是三种深刻不同的根本样式；我们主张，如果不区分它们，就连最日常的经验也完全无法得到定向。

所以，上次我们抵达这样一个概念：我们在小汉斯传记的某个时刻把握他；他同母亲之间的某类关系标记着这个时刻，而基本项由阳具对象明显出现在母子之间来界定。经过以前的分析，这并不令我们惊讶；因为从今年开始以来，我们已经通过其他观察看到：

- 阳具作为母亲欲望的想象对象，在母子关系中构成何等关键之点；
- 在第一个阶段，儿童抵达自身面对母亲的位置，不能排除而且必然要求他对这个想象对象、这个阳具对象的根本作用作出某种承认乃至承担；它作为一个最初的构成要素进入母子关系和关系的原始结构化。

没有哪项观察能比小汉斯观察更好地服务于我们；因为小汉斯的一切，确实都从他同母亲之间的一场游戏出发：

- 看；
- 不看；
- 伺机观看；
- 窥察……“阳具在哪里”。

需要强调，我们在这里仍然完全无法确定所谓汉斯的信念。我们的确觉得，观察开始时，从实在观点看，他早已如人们所说“心里有数”。父母面对儿童稍显突兀的询问时感到必须给出既快速又“蒙混问题”的回答；而听到这些回答时，他说：“这些我早就想过了。”

这里，我要再次标出某种从这个层面便已在场的东西……想象关系层面原本仿佛是“看”与“被看”关系的典范……我要标出，在这里保留和维持主体间衔接多么重要。你们即将看到，它远非二元关系；所谓“窥视癖”关系带着“展示”与“展示自己”这两个对立项。它值得我们暂且停下，以便看到它同原始想象关系已经多么不同；后者是一种在我们所谓“相互视觉对峙”场域中的俘获方式。

为了使你们理解原始的视觉想象关系，我曾长时间强调这种对峙。当时，我们参照动物界中成对动物的特殊视觉决斗：无论蜥蜴还是鱼，动物都会陷入所谓求偶展示的典型反应。两名对手或伴侣对峙时，双方都竖起一整套皮肤附属物、信号和视觉俘获装置；随后，其中一方从字面上发生退让。仅在这场视觉对峙层面，它就可以说“退隐”了；

这个词以某种方式把运动上的躲闪同颜色的褪淡结合。这场战斗实际产生的，正是它转身避开已经取得支配位置的另一方之视线。经验甚至向我们表明，这里并不总是雄性必然胜过雌性。

有时，这种表现发生在两只雄性之间；我们从字面上看到，视觉传播层面已经准备好一种掌控，随后直接延伸为抓抱乃至压迫的动作：它使一方在另一方面前屈服，也使后者占据上风。

这里当然存在一个“生物学”“动物行为学”参照点，使我们能够在整个进程——不是一次展示，而是“展示本身”——的衔接中，充分强调想象关系。不过，我希望清楚标出，从一开始就能看出：这个领域的一切同这里发生的事情何等不同……你们会看到，我所谓儿童猜测母亲想象世界这件事多么有意思……这里涉及的与其说是观看、受到“所见之物”掌控，不如说是确切地寻求“看见”、寻求“窥察”某种既在那里又不在那里之物；因为这项关系严格“瞄准”的，是“某种在那里却仍受遮蔽的东西”。

换言之，这项根本关系涉及维持诱饵，以便维持某种从字面上说“既在那里又不在那里”的东西；最终抵达一种根本情境。我们绝不能误认它在想象戏剧中的关键性质，因为这场戏剧试图嵌入另一种会重新接过它、赋予它更精细意义的东西；而戏剧的终点就是“惊见”。

不要漏掉法语　　surprise［惊见 / 惊讶］一词的歧义：它可以涉及“撞见”的行动，例如“我意外撞见了它”。有“突袭敌军”，也有“惊见狄安娜”［第一义］；后者正是这项神话中抵达顶点的惊见。我在这里重新

唤起它并非没有理由，因为我在一篇文章末尾提到的整个“阿克泰翁式关系”[注1]，都建立在这个根本时刻上。

> [注1] 参见《弗洛伊德之物》，《文集》第 436 页：“阿克泰翁因追逐女神而罪孽太深；猎人啊，你成为的影子正是捕获你的猎物。让猎犬群自行奔去，不必催促脚步；狄安娜会按它们的价值辨认这些狗……”

可是反过来，这个词还有另一面：主动“惊见”某人时，体验的不是惊讶；但“感到惊讶”却确实是意外发现引起的东西。你们中参加过我病例展示的人，也许曾在一位跨性别倾向病人身上看到 surprise 一词具有多么撕裂性的性质；

当他向我们描绘某天首次看到妹妹裸体时体验的痛苦惊讶，这种性质便显露出来。

因此，想象辩证法抵达一个更高层次：不只是看与被看，而是“给人看”以及“因揭露而惊见”。只有它能使我们理解“看”这项行动的根本意义。我们已经看到，它在一切倒错的发生史中多么根本。反过来，从暴露行动的技术中也再明显不过地看出这一点：暴露癖者展示自己拥有之物，恰恰因为另一个人没有它；正如他本人向我们确认、他的陈述所显示的，他试图通过揭露把另一个人抓进某种远非单纯视觉迷恋的东西中。他从字面上享受向对方揭示据说对方没有的东西，并同时把对方投入对自身欠缺的羞耻。

汉斯同母亲的一切关系都在这个背景上游戏；我们也能从这里看到，母亲充分参与其中。她如此

殷勤地让他参与自己身体的一切运作，却在小汉斯请求她参与自己的暴露时，从字面上不免失去控制，表现严厉和斥责，甚至作出谴责。

我已经告诉你们，想象对象正是从这个起点——但已经被纳入遮蔽与揭露的辩证法——发挥根本作用。我们在这个转折处把握小汉斯并提出问题：在生活中一些事件发生约一年以后——尤其是妹妹出生，以及发现妹妹也是小汉斯同母亲关系中的根本项——，小汉斯为什么出现恐怖症？

我们已经指出，恐怖症必须在一套进程中得到定位；只有看出儿童必须深刻改变自己同世界发生关系的整个方式，这套进程才能得到设想。他必须承认一项最终应当承认、有些主体甚至终其一生都在承担的事情：在世界这个由相似者构成的特权场域中，确实存在一些在实在层面被剥夺著名想象阳具的主体。不要以为只须具备科学知识乃至可以衔接的观念，这件事就会进入主体的整个信念系统并得到承认。

男人同女人之关系的深层复杂性，恰恰来自我们可以用粗糙语言所谓

男性主体对真正而实际地承认下列事实的抵抗：女性主体

确实缺少某种东西，更遑论她们拥有另一种东西。

依托分析经验，我们必须围绕这项事实作出有力衔接。一种经常得到维持的误认，恰恰扎根于这个层面；它以某种韧性维持，甚至影响主体的整个世界观，尤其影响他的社会关系观。即使主体面带微笑、认为自己已经完全接受现实，这种误认也仍在一切界限以外维持。

如果把它从经验中抹掉、对它加以误认，就会显出我们何等无法从弗洛伊德教学最基本的术语中受益。当然，必须尝试理解为什么这种东西如此难以承认；也许，这正是今年旅程最后将要抵达的地方。

目前，让我们从小汉斯观察出发——今天就处在这里——，衔接一种类似承认怎样成为小汉斯的问题。为什么它会突然变得必要，而此前最重要的是“恰恰通过游戏使它不必如此”？我们还会事后照亮：“恰恰通过游戏使它不必如此”为何如此重要。

我们还要看看，要使这项实在剥夺以某种方式得到承担，为什么必然必须完成一种操作……为了产生主体在主体层面可以生活的结果，我指让主体能够融入人类借以真正生活、而不只是忍受的性辩证法……它要求某种东西发生，也就是整合某种其实已经给定的东西：母亲已经是成人，并已经进入那套象征关系系统；人与人之间的性关系必须围绕它并在其中得到定位。

儿童本人必须走上这条道路，尝试所谓俄狄浦斯危机。小汉斯的例子说明，阉割是其中一个根本时刻；但也许说明得不完整、不完美。也许恰恰在“这种不完整”中，我们能够格外清楚地看到我曾指出的小汉斯观察之根本运动；可以说，我们在一项得天独厚的分析病例中看见它。现在，我们会尝试说明这项分析为何“得天独厚”。

我们公开看到这次过渡：从所谓“围绕阳具同母亲进行主体间游戏”的想象辩证法，经过一系列过渡，转入同父亲关系中的“阉割游戏”；

这些过渡恰恰就是我所谓“小汉斯锻造的神话之构成”。为什么我们看得如此纯粹？现在开始衔接它，也就是从上次停下的地方重新接过。

上次，我让你们停在小汉斯“两只长颈鹿幻想”这个醒目现象上。我们在那里真正看到——必须说，它仿佛专为研讨班提供的说明——从意象到象征的过渡：小汉斯从字面上像魔术师一样向我们展示，母亲的

双重意象——我所谓母亲的转喻——成为一张纸，成为他坐在上面的“揉皱长颈鹿”。

这里仿佛出现一幅草图、一般图式和指示，表明我们走在正确道路上。

因为没有比这更好的例子：如果我想发明一个表示“从想象界向象征界过渡”的隐喻，永远也发明不出小汉斯幻想并衔接全部要素的“两只长颈鹿故事”。他向我们展示：一个意象变成纸团，变成此刻完全属于象征、图画、可移动要素的东西；人们抓住它，并在他坐到终于被还原为这个象征和纸屑的母亲身上时感叹：“啊，小汉斯拿到了一张多好的票据！”

当然，这还不够，否则他就已经治愈。他用这个行动显示问题所在；因为儿童的自发行动，肯定比成人经过通常所谓教育这种多年扩增式愚化以后形成的心理观念，更直接、更鲜活。

让我们仔细看发生了什么，先把这张表格当作已经得到证实来使用。“必须由想象父亲最终设定世界秩序”是什么意思？它意味着并非所有人都有阳具。这很容易辨认：他就是全能父亲，是通常上帝观中世界秩序的基础。这里涉及想象父亲；他保证宇宙秩序中最庞大、粗暴的实在要素，“一切都是他创造的”。我这样说时，不只是在锻造自己的表格；现在只须查阅小汉斯观察。小汉斯谈上帝时，说得非常漂亮。

他在两个场合谈到上帝。父亲已经开始给他“一些澄清”，由此带来一种短暂改善。那是在三月三十日，即“两只长颈鹿幻想”以后的第二天；恐怖症稍有减轻，因为把母亲揉成纸团终究不能完全令人满意，但方向正确。无论如何，有一件事令小汉斯震动：三月三十日，他出

门发现马车和马比往常稍少，于是说：“上帝今天少放了几匹马，真是又亲切又聪明！”

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不知道。它是否意味着今天没有那么需要马？可以这样理解；不过，德语词并不表示“亲切”，而是“非常机灵”。人们倾向于认为，这是因为上帝减少了困难；但如果认为马不只是一项困难，还是一个根本要素，这句话便意味着今天对马的需要少了一些。

无论如何，我借此告诉你们，上帝在这里是一个根本参照点。十分醒目的是，“同弗洛伊德相遇”以后，小汉斯将要提到的正是上帝。总而言之，他方才说完一切，仿佛便同上帝进行过交谈。弗洛伊德本人不免感到一种既有趣又快乐的轻痒；不过，他也保留地承认，这无疑同自己有所关联。因为他夸口时，亲自采取了一个格外超然的位置，对汉斯说：

“早在你出生以前，我就预见到有一天，一个小男孩会过分爱自己的母亲，并因此同父亲陷入困难。”

看到弗洛伊德采取这个位置，确实十分醒目。我们完全没有想到责备他；我很早以前就向你们指出过，在所有实际发生的分析中，弗洛伊德可以取得何种原初而特殊的维度：正因为他给予主体的解释性言语不是自己转递的东西，而是真正由他本人发现、以某种方式直接通过弗洛伊德自己的嘴说出，所以它参照我认为——并作为根本内容教给你们——属于言语真实性的东西。

人们当然不可能看不到，弗洛伊德本人作出的解释同我们在他之后提供的一切解释，

可能具有何等差异。

可是在这里，正如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弗洛伊德没有向自己强加任何规则。他真正采取我可以称作“神的位置”：他从西奈山上向小汉斯说话，而汉斯不免受到冲击。请听清楚，我说的是，在这个场合，象征衔接采取的位置——同样仍受遮蔽的象征父亲——由弗洛伊德设定成绝对主人；他在这里不是象征父亲，而是想象父亲。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会看到，弗洛伊德最终正以这种方式处理情境；而理解汉斯同分析者关系的特殊性也十分重要。我的意思是，如果想理解这项观察，“就必须看出它在所有儿童分析中具有某种绝对特殊性”。

可以说，情境以这样一种方式展开：象征父亲要素同实在父亲以及——如你们所见——想象父亲得到足够清楚的区分；无疑正因如此——后面会予以证实——，我们才会看到

例如，在这项观察中，我们尤其清楚地看到，可以称为转移的现象并未出现；与此相应，重复现象也没有出现。

也正因如此，观察仿佛为我们记录了纯粹状态中的幻想运作，只要它的阐发使［……］饱和。这项观察的意义还在于，它向我们显示

Durcharbeitung［修通］并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只由这种反复咀嚼驱动；

仿佛仅仅得到理智同化的东西，经过不断重复，最终会像马嚼子或浸渍一样进入皮肤。

如果修通是必要之物，无疑是因为必须沿多个方向经过一定数量的回路，

某种东西才能在“想象界的象征化功能”中得到有效填充。

因此，我们看到小汉斯走过一条迷宫般的道路。这条道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重构……当然，它每时每刻都被父亲的介入打断和切碎；正如弗洛伊德反复强调，这些介入绝非方向最好，也不最尊重儿童……

可是，我们仍看到一系列神话建构不断产生和复现；必须从中辨认真正的构成要素。

要做到这一点，与其每时每刻用某个“万用术语”覆盖一切——这个情结、那个情结、肛门关系或对母亲的依恋——，不如尝试观察古代神话这类高度衔接之物为我们带来了哪些功能、再现和具象要素。我们习惯于

笼统地给这些术语和功能安排等价物：“这代表父亲”“这代表母亲”或“这代表阴茎”。可是，例如只须真正尝试这项工作，就会看到每个要素——

例如马——只有在同其他若干同样具有能指性质的要素之关系中才能设想；它绝不可能对应一个意义唯一的所指。我说的是马，但也包括弗洛伊德神话中的所有其他要素：马最初是母亲，最后是父亲，中间也可能是偶尔扮演马的小汉斯，或者是阴茎——在故事和恐怖症解释

的几个点上，马显然代表它。对马而言再明显不过的事情，对小汉斯极其丰富的各种神话创造中的任何能指也同样成立。

相关知识卡 小汉斯的马：恐怖症作为防护构筑与能指替补

例如，很清楚，浴缸在某一时刻是母亲，最后却是小汉斯的臀部；弗洛伊德、父亲乃至小汉斯本人在观察中都从字面上如此理解。你们也可以围绕每个相关要素完成同一种操作；例如咬、又如裸体。

要觉察这些事情，作为方法论要点，绝对必须在观察的每个阶段和时刻努力“不要立刻理解”。你们必须让自己不要立刻理解；弗洛伊德在观察的两个地方明确这样建议，我也再次告诉你们。

在这种场合，避免理解的最好办法就是制作小卡片，在一张纸上逐日记录汉斯本人处理的要素；必须把它们作为要素本身、作为能指来把握。例如，我在此前一次研讨班中强调的：“不只是同玛丽德尔在一起，而是完全单独同玛丽德尔在一起……”如果你们完全不懂，就保留这个能指要素；随着理解在进食中到来，你们会发现，它同可以写在同一张纸上的另一个东西严格交叉。

不只是“同”某人在一起，而是“单独同”某人在一起，这预设什么？它预设本来可能还有另一个人。换言之，你们可以按照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先生在 1955 年 10—12 月《美国民俗学杂志》一篇文章中提供的神话分析方法来进行[注2]；

> [注2]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神话的结构研究”（“The Structural Study of Myth”），载《神话：论文集》，《美国民俗学杂志》第 78 卷第 270 期，1955 年 10—12 月，第 428—444 页。

你们会发现，可以用这种方式编排汉斯观察中的全部要素：沿某一方向阅读，它们就是这些神话的序列；但经过一段时间，同一要素并非简单返回、而是以变换形式返回这一事实，会迫使人们不再只把它们排列在一条线上，而是叠放成多条线，像总谱那样编排。

由此可以看到一系列既能横向阅读、又能纵向阅读的序列建立起来：

- 神话沿一个方向得到阅读；
- 它的意义或理解则参照类似要素的叠放；这些要素以不同形式返回，每次都受到变换，无疑是为了精确完成一条从起点——正如拉帕利斯先生会说——走向终点的路径。

到了结尾，起初不可接受、不可还原的某种东西……我曾告诉你们，小汉斯故事从这里出发：实在阴茎闯入作为出发点的母子游戏……也就是实在阴茎最终以一种足够的方式找到自己的位置，使小汉斯能够无焦虑地继续生活。我说的是“足够”，而不是“必要”，因为这种安置也许还可以更加充实。[注]

> [注] 米勒编订本（Seuil，1994，第 278 页）明确区分 suffisante（“足够的”）与 nécessaire（“必要的”）；Staferla 此处词序错乱，本译据米勒本校正。

我们确实会看到，归根结底，小汉斯的俄狄浦斯情结也许没有抵达完全令人满意的解决；它只是“足够令人满意”：它释放主体，使想象界与焦虑的汇合——也就是恐怖症——不再必须介入。换言之，它最终使恐怖症得到还原。

为了立刻走向尾声，不要忘记：后来，弗洛伊德在汉斯约十六七岁时再次遇见他；汉斯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人们把整个故事交给他阅读；

弗洛伊德十分漂亮地把这种抹除比作一件事：主体夜间醒来，试图留住一个梦，甚至开始分析它——我们熟悉这种情况——；可是夜晚的余下时间从它上面流过，到了早晨，一切都已遗忘：梦和分析都不例外。

这里确有某种十分诱人的东西，使我们可以同弗洛伊德本人一样认为：汉斯观察涉及的内容，正如我们能够切实接触的，丝毫不能同主体整合或重新整合自身历史相提并论；后者仿佛是一次有效消除失忆、同时保留所得要素的过程。这里涉及一种极其特殊的活动，一种恰好处在想象界与象征界边界的活动，同梦中发生的事情属于同一秩序。在贯穿汉斯观察的这种神话化中，梦发挥的经济作用同幻想乃至汉斯的简单游戏与发明完全可以相提并论。

不过，不要忘记弗洛伊德顺带告诉我们的内容：汉斯阅读自身故事时，仍有某种东西抓住了他；他对此说："确实，这很可能同我有关。"那就是其中围绕小妹妹安置的一切幻想化。事实上，此时汉斯的父母已经离婚；人们在观察期间从一切迹象就很容易预见乃至预测这一点，而汉斯并没有因此格外不幸。

只有一件事仍然构成他的伤口：小妹妹从此同他分开。生活进程把妹妹带到一个中心位置，使她再现某种遥远、位于彼岸、可以说超出爱所能抵达之物的项；她成为理想化的爱之对象，也就是我们开始分析时采用的那个 girl-phallus［女孩—阳具］。毫无疑问——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它会留下标记，赋予小汉斯以后一切爱恋生活风格和类型；当然，这里只能作出预设和外推。因此，汉斯作为对象接受的那项高明分析，确实显出并未完整闭合一切，也没有最终产生一种自身完全令人满意的客体关系。

不过，让我们回到起点，回到弗洛伊德、他那位作为儿童父亲的弟子，以及弗洛伊德给他的指示。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弗洛伊德怎样承担自己的角色；他会告诉作为自身代理的父亲怎样行事？他提出两项建议。

首先，在获知小汉斯的态度以及他所遭遇的多少痛苦而焦虑的现象以后，他要求父亲向儿童解释："这种恐怖症是件蠢事；这件蠢事同某种东西相关，也就是同他接近母亲的欲望相关。"另一方面，汉斯最近非常关心撒尿器；他应当很清楚，这并不完全正当，马正因如此才如此凶恶并想咬他。

这走得很远。我们面对一种从一开始就直接操纵罪疚感的办法：一边告诉儿童，这些都是自然而简单的事情，以消除罪疚；另一边又说，只需稍加整理和控制。

可是与此同时，弗洛伊德又毫不犹豫地强调一种至少相对存在的禁令要素，针对儿童靠近手淫满足。我们将会看到，这在儿童身上产生什么结果。

弗洛伊德使用的语言本身还有一项更鲜明的内容。他说，第二件事是：既然小汉斯此刻的满足显然就是去发现……正因如此，我刚才才重新接过揭露与惊见的辩证法……"作为隐藏对象的母亲阴茎或阳具"。

人们将通过撤走满足对象，消除他的欲望："你们要告诉他，这个阳具不存在。"弗洛伊德在观察开头从字面上这样衔接——《全集》第 263—264 页。

作为想象父亲的介入——我指那个安排世界、宣告这里无物可寻的人——，很难做得比这更鲜明。我们也会看到，实在父亲完全不能承担这种功能；说实话，当他这样做时，汉斯恰恰通过完全不同于建议的道路作出反应。

因为，母亲没有阳具这个断言刚刚说出，就像他在另一个时刻通过两只长颈鹿故事作出反应一样，他又以另一种方式作出反应，幻想下面这个十分漂亮的故事。他讲述，自己看到母亲穿着衬衣却完全赤裸，向他展示她的撒尿器；他本人也照样展示，还让这时进入游戏的女佣——著名的格蕾特——来见证妈妈正在做什么。这是极好的回答，完全符合我刚才尝试向你们衔接的内容：这里严格涉及“看见作为受遮蔽之物的所见之物”。母亲既赤裸又穿着衬衣，恰如阿方斯·阿莱故事中那个双臂举向天空、大喊的人：“看看这个女人：她在衣服下面一丝不挂！”你们也许从未充分衡量这条评论在自身社会行为之形而上学底层中的影响和效力，

而它对人与人关系本身却具有根本意义。

小汉斯的父亲——他把握事情的方式并不特别机灵——于是告诉他：“她必须是其中一种；她要么赤裸，要么穿着衬衣。”可全部问题正在这里：对汉斯而言，她既“赤裸”又“穿着衬衣”，恰如对在座所有人而言一样。

由此可见，不可能仅凭权威介入来承担世界秩序：根本没有这种秩序。想象父亲显然早已存在、始终存在，也是上帝的一种形式。但这并不能解决我们的困难，这些困难同样经过体验并始终存在。说实话，我们现在处在更进一步的位置。不过，父亲首先初步接近了这个

根本要素；他依照弗洛伊德的要求，尝试减轻小汉斯的罪疚感，并首次澄清马同一项禁令的关系，也就是儿童不应当用手触碰自己的性器官。

他的第一次介入归根结底旨在安抚罪疚焦虑。经过二三十年的经验，我们分析家已经明确知道：如果想正面处理罪疚，就始终会在这种介入中失败；永远不能同罪疚正面对抗，除非恰好把它转变成随后必然产生的各种代谢形式。人们告诉儿童，马只是某种东西的多少令人恐惧的替代物，而他不必为那种东西过度大惊小怪；就在这时，我们同样在观察中看到，一件事以最清楚的方式发生：此前害怕马的儿童说，自己从现在起必须看马——“我现在必须看那些马。”

既然来到观察的这个点，就暂且停在这套值得标记的机制上。人们对他说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归根结底，这等于说，他获准观看马。恰如以“一切获准之物都属强制”为定义的极权体制，既然问题在别处，人们告诉小汉斯可以走近马，实际发生的正是这一点：小汉斯觉得自己受到命令和强迫，必须观看马。我用“获准之物成为强制”这个公式概括的机制，究竟意味着什么？

说实话，这个场合获准之物中有一次过渡，也就是原先受禁之物遭到消除。既然发生了变换，原因无疑在于：获准之物同时穿上强制的性质。这仿佛是一套以另一种形式维持受禁之物权利的机制。换言之，从现在起必须观看的，恰恰是此前不应观看的；也就是说，正如我们已经知道，马禁止了某种东西。

我们知道，恐怖症是一个前哨，归根结底用来抵御焦虑。可以说，马必须标记一条门槛；在这个层面，首先必须如此，而我们知道这一点。人们刚刚也这样告诉主体。它同问题中的新要素相关；后者扰乱主体的整个游戏，也就是实在阴茎。

相关知识卡 小汉斯的马：恐怖症作为防护构筑与能指替补

可是，正如我刚才所说，难道这意味着马就是实在阴茎吗？当然不是！你们以后会从成千上万个例子看到，马远非实在阴茎；在汉斯神话的变换过程中，它也是母亲，最后是父亲，偶尔还是小汉斯。

让我们在这里引入一个根本的象征化概念；前年课程中，我围绕安格鲁斯·西莱修斯的文字游戏“Ort—Wort［场所—词语］”阐发过它。不妨说，在这个场合，马是实在阴茎必须前来安置的位置——而这并非不会引起恐惧和焦虑。

父亲最初的贡献当然仍不太令人鼓舞；不过，我们仍看到严格说来的能指结构在儿童身上发动并作出反应。这套结构抵抗命令式介入，却仍会回应父亲哪怕笨拙、混乱的介入，并产生一系列神话创造；在它们的过程中，我们会看到问题中的东西怎样通过一系列变换，逐渐整合到汉斯的系统中。

也就是说，这里需要的不再只是那套尽管根本的诱饵主体间性……汉斯借它进行惊见和让自己被惊见的游戏，并把自己呈现为缺席……；与此同时，由于游戏中始终有第三个对象在场——它是他同母亲实现关系的最初要素——，汉斯本人最终也必须整合到其中。

因为最近来了一个新要素，也就是他自己的阴茎、他的实在阴茎这个麻烦要素。它有自己的反应，像人们所说，可能把整体炸上天；你们将从他的一系列想象创造中看到，它对他显然是扰动和混乱的要素。

既然今天是四月三日，就直接去看 1908 年四月三日发生的事情：父亲和儿童从窗后推测对面院子里的活动。对面院子里已经有汉斯用来首次支撑问题、作出第一项神话建构的能指要素；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它们处在交通工具这个标志下，也就是他不断亲眼看到的一切：移动的马和车辆，卸下物件，把包裹放在上面，而男孩们又爬上那些包裹。

这一切对汉斯会有什么用？难道你们认为，在永恒的

想象父亲那里，早已预先适配了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统治下、1914 年前维也纳使用的交通工具，同小汉斯这类儿童依照本能发展的良好次序在周围依次涌现的驱力与自然倾向？

难道真有这种预定适配？

恰恰相反，这些要素虽然也属于自身的现实秩序，但儿童将把它们当作置换游戏所必需的要素来使用。我始终回到一点：如果不从这个源头出发，就无法设想和理解对能指的运用——能指最初而根本的游戏就是置换。

尽管你们如此文明乃至受过教育，在日常生活中却可能笨拙到无法穷尽例如一切可能置换；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应该忽视置换秩序……

我马上用自己来证明：我的领带一面稍浅，另一面稍深；要让浅色面在下面、深色面在前面，我必须在心里作一次置换，而且每次都会弄错。

……你们不能因此忽视置换秩序。小汉斯将要建构的一切，都以它为核心；你们马上就会看到一个例子。

在尝试理解马、车辆、坐在上面的小汉斯或卸货分别意味着什么以前，必须记住这些要素：一辆车、一匹马、小汉斯想爬上去并感到害怕。可他害怕什么？害怕自己走过卸货站台以前，车辆就开走。

不要急着说："我们知道，这是他害怕同母亲分开。"因为小汉斯马上让你们安心，他说："如果被带走，我会乘出租马车回来。"小汉斯牢牢立足于现实。所以，这里涉及别的东西：处在一辆车上，而车面对某种可以同它分离、相对它发生移动的东西。一旦知道车辆相对于什么发生移动并孤立这个要素，你们就会在小汉斯观察的成千上万个特征中重新找到它。例如后来很久才涌现的火车幻想：他们经过格蒙登，却来不及穿好衣服，无法及时下车。

诸如此类还有许多，因为小汉斯的最后几则幻想之一，是一名车夫把赤裸的他耀武扬威地举到一辆没有马的东西上；他在那里过夜，第二天还能乘同一辆东西继续旅程，只需给车夫一千弗罗林。你们不可能看不到，小汉斯幻想化的这些阶段和时刻之间存在明显亲缘。

你们还会看到围绕善良可爱的小安娜的全部幻想化。有一个时刻，她同小汉斯坐在另一辆十分相似的车上，因为车上有同样令人焦虑的马；随后，她会在这个过程、这则可以称作车辆神话的最初神话中骑上一匹马。你们要尝试观察，构成这组车马的不同能指怎样发挥作用

——这里确实涉及整组车马；人们始终谈马，但马可以没有车，也可以带着车——：随着故事推进，构成车马、车夫以及车辆相对于某个固定平面的参照的不同要素，怎样取得不同意义。

你们要尝试看出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 是我在《被窃的信》研讨班中说明的能指作用吗？也就是说，通过能指要素在不同人物间移置，这些人物仿佛被它的阴影覆盖，被铭刻为能指的占有者；

- 小汉斯进展的根本之处，是否在于能指围绕主体多少关心的不同人物旋转，令他们被置换机制攫住、俘获并捕捉？还是恰好相反，进展发生在某种很难看出究竟能产生何种进步的东西中？

因为不能说，他周围现实中的任何一个要素曾在某个时刻超出汉斯的手段。这项观察丝毫没有所谓退行的痕迹。如果你们因为小汉斯一度围绕 Lumpf［粪块］制造庞大的肛门幻景，就认为发生了退行，那就大错特错。

这是一场巨大的神话游戏，此刻根本不包含任何退行。可以这样说，小汉斯从观察始终坚持自己“手淫的权利”，毫不动摇；如果有什么刻画了他进展的一般风格，恰恰就是这种不可还原的一面。

弗洛伊德本人也强调：正因为生殖器要素在这样的主体身上完全稳固、在场、确立、抗拒而且极其强大，他才没有形成歇斯底里，而是形成恐怖症。观察把这一点衔接得非常清楚。下次，我们会尝试考察

它；而且会看到，小汉斯用来解决自己问题的神话和字母要素不只一套，也就是从下列一项过渡到另一项：

- 对母子关系的阳具式把握；
- 对整个父母配对关系的阉割式把握。

还有其他神话，例如著名的浴缸与曲柄故事，以及我上次再次所谓的螺丝。一切都围绕我所谓“人工器具的逻辑功能”旋转。

这个儿童把一些围绕高度精细的人工适配方式归组的要素当作逻辑工具运用，不能不令人完全震动：这些要素使他能够建立对立——

一边是所谓“扎根”或仅仅自然黏附之物，以及作为恐惧意义上的把握点、儿童实际在其面前停步的可怕一极——“穿孔”；另一边则是“旋紧”或“钳住”这个要素的引入。我指的是由钳子夹住的东西；你们将在我所谓另一则神话——浴缸与水龙头神话——中看到，它发挥绝对根本的作用。

汉斯的全部进展，都在这项神话结构化的细节中完成：它使用想象要素，以完成某种象征交换练习。正是这使他能够把自己的恐怖症——作为现实的第一项象征结构化——这个门槛要素变得有用，

使恐怖症真正成为现实的最初象征结构。

第17课 · 1957年4月10日

我们对小汉斯的观察推进到这里，已经使我们突出了一种可以称为“神话的功能”的东西——它在小汉斯所经历的心理危机中发挥作用。

这场危机同父亲在弗洛伊德建议引导下的介入不可分割。这里所谓“神话”的功能，是一个整体而厚重的概念；我们并非用隐喻意义，而是在技术意义上使用“神话”一词——至少，我们假定能够恰如其分地估量它。汉斯的想象性创造随着父亲那些有时巧妙、有时不那么巧妙、有时笨拙的介入不断发展；但父亲的方向无疑足够正确，因而没有让它枯竭，反倒最终刺激出这一连串产物。这些产物虽然可以依次排列，却很难同他的症状——也就是他的恐怖症——分离。

上一次，我们讲到 4 月 3 日这个有标记的日子；当天记下了汉斯关于其恐怖症内容的话。当晚，父亲大意说，儿子的行为若变得更勇敢，是最近几件事情所产生的效果，尤其是 3 月 30 日弗洛伊德对小汉斯的介入。然而，儿童的行为固然变得更勇敢，恐怖症本身也扩大了范围。

事实上，就在这一天，恐怖症似乎变得更加丰富——这里当然存在一种无法辨清的双义性。随着汉斯越来越能讲清恐怖症对他施加压力、诱使他屈从的方式，它不仅变得更加丰富，而且增加了影响更微妙、同时也更复杂的细节。

我的努力，确实正是要在你们的头脑中完成某种翻转——更准确说，是重新确立

症状以及那些获得不同定性、被概括为“分析中的过渡性症状”的产物的真正功能。为了向你们概括我们这种进路的意义，我可以尝试提出若干术语、定义，同时也提出若干规则。

我上次已经说过：如果我们想进行真正的分析工作，真正弗洛伊德式、真正符合弗洛伊德为我们展开的那些重大范例的工作，就必须把握某种只能从“能指与所指的区分”中得到理解和确认的东西。

我已经说过，恐怖症有许多可以停下来考察的能指要素；其中首要的当然是马。我们绝不可能把这匹马仅仅看作某种例如同父亲功能等值的东西。

人们很快就能沿一条轻易的道路说：这是父亲的缺失；按照《图腾与禁忌》的经典公式，马在这里作为一种新产物或等价物出现，以某种方式代表父亲、体现父亲。马发挥的作用，由当时看来的困难所决定；这甚至同我正在教给你们的内容一致，即从前俄狄浦斯状态过渡到俄狄浦斯的力矩——是在物理意义上使用“力矩”一词。

这当然完全不充分、不完备。马并不只是它也许最终能够成为的那匹马：在治疗末期，汉斯看见街上一匹神气十足的马经过，便喊出某种把马的雄性骄傲同父亲联系起来的话。就在这一时期，他同父亲进行那场著名谈话，

对父亲说了类似这样的话：

“你一定在生我的气；我占了某个位置，或者独占了妈妈的注意、在她床上占了你的位置，你一定因此怨恨我。”

尽管父亲否认这一点，说自己从来没有对他凶恶过。

儿童无疑已经受到一段时间的充分教导；就在这一瞬间，他让俄狄浦斯神话以一种格外强制的方式涌现出来。这个特点也确实引起了若干作者的注意，特别是弗利斯；他就此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纪念弗洛伊德百年的专号中。[注1]

> [注1] Robert Fliess：〈Phylogenetic versus Ontogenetic Experienc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1956 年 1—2 月，第 37 卷（弗洛伊德百年纪念号）。

马在最终承担这种可以说是隐喻性的功能以前，还发挥过许多别的作用。

马被套在车上时——关于这一点，4 月 3 日小汉斯给出了所有可能的解释——它究竟应当套车还是不套车？是一匹马拉的车，还是两匹马拉的车？每种情况都有不同的意义。无论如何，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刻，马若象征着某种东西——后文会更充分地显示这一点——那么它一方面象征母亲，同时也象征阴茎。

无论如何，它都不可化约地同那辆车连在一起；车本身又是一辆载着货物的车，正如汉斯

在 4 月 3 日那次谈话中反复强调的那样。他在那里解释了自己的兴趣，说明屋前围绕这些来来去去的车所发生的全部交通带给他何种满足：车辆停在那里时，会被卸货，又重新装货。

车的功能——也连同马的功能——逐渐显出它同另一种秩序之物的等值关系：它显然暗示着母亲怀孕；观察记录告诉我们——也就是弗洛

伊德和父亲告诉我们——这又根本关联于儿童在母亲腹中的位置以及他们怎样出来的问题。因此，马在这个时刻具有完全不同的分量和功能。

同样，还有另一个要素长时间成为父亲和弗洛伊德追问的对象，

那就是著名的 Krawall：喧响、骚动、杂乱噪声的观念；这个词似乎还可以引申到吵闹场面或丑闻。无论如何，在小汉斯所把握的 Krawall 中，一种令人不安、尤其引发焦虑的性质显现出来：马倒下以后可能发生这种喧闹。依他自己所说，马的倒下——Umfallen——正是促使马获得恐怖症价值的事件之一。

这正是那次曾经发生过的倒下的时刻；从此以后，它一直停留在恐惧的背景中。这是某些马、特别是套着大车或载重车的大马可能遭遇的事情。倒下伴随着马蹄踩踏的响声；在对小汉斯的询问中，这个 Krawall 会从不止一个角度再次出现。说实话，在整份观察记录的任何时刻，都没有出现某种得到确证的 Krawall 解释。还应注意，在小汉斯这份观察的全部过程中，弗洛伊德和父亲对若干要素的解释始终不得不停留在怀疑和双义之中，甚至保持克制。

可以说，他们催促儿童坦白，向他提示一切可能的等价关系和解决办法，却只能从他那里得到躲闪、暗示和托辞；有时甚至令人觉得，儿童在某些方面嘲弄他们。

这一点不容置疑：儿童某些产物和虚构具有明显的戏仿性质。在观察记录中，尤其是围绕所谓鹳鸟神话的一切，小汉斯把它编得如此丰富繁茂，又充满幽默要素。

儿童某些产物这种戏仿乃至漫画般的侧面，足以打动观察者本人。归根结底，这一切不是把我们带到观察不完备的视角，而是带到一种揭示其典型论证阶段的视角，并把我们置于问题核心。

这并非观察的缺陷；恰恰相反，它正应当沿这条道路向我们指出一种理解方式：一方面，理解恐怖症这种既已如此简单又已如此丰富的症状形成；另一方面，理解分析工作本身——它由此得到表达，并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正因为这是一份弗洛伊德式的、也就是富有才智的观察，所以没有比它更好的说明。

我们看到，能指本身根本地区别于所指。症状性能指的构成方式，使它能够在发展和演变过程中覆盖最为多样、彼此最不同的所指。它不只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本身就是它的功能。

汉斯这段观察期间提供给我们的整套能指要素——这部装置——具有这样一种构造：如果我们不想让

这份观察仅仅成为谜团，成为一份混乱而失败的观察，就必须给自己规定［若干规则］。

否则，它就只能是一份谜一般、混乱而失败的观察。

但为什么偏偏这份观察会失败，而不是我们习惯援引的其他观察失败？只消指出一点：那些解释具有多么任意、诱导而系统化的性质，不能不令我们震惊；尤其在针对儿童的分析观察和分析解释中，更是如此。

恰恰因为这份观察格外丰富而复杂，它在这一领域提供了一份少见的、内容丰厚的见证；因为一旦深入其中，人最强烈的感受正是随时可能迷失。

关于这一点，我想提出若干大致可以这样表述的规则：无论在儿童还是成人分析中，凡是我们能够视为能指的要素——按照我们在这里赋予它的意义，也就是一个对象、一种关系或一个症状性行动——都不能因为它显得原初、仿佛仍然混沌，就被孤立理解。例如，马在一段儿童焦虑显现的间隔以后首次涌现，显得相当混沌；我们要界定马在那里发挥的功能，但它已经被某种辩证的东西以极其独特的方式标记。

这正是我们试图把握的东西；从一个事实中，它已足够清楚地显现出来：马出现的准确时刻，正是母亲要离开的时刻。焦虑就在这里——他害怕马进入房间。另一方面，究竟是谁进入房间？正是他，小汉斯。

因此，我们在每一点上都看到一种极其双义的双重关系：一方面，它通过焦虑的情感色调同当时母亲的功能相连；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小汉斯的运动与行动同他相连。马一出现，便已经负载着深刻的双义性；它已是一种什么都能承担的符号，恰如一个典型能指。我们在小汉斯的观察中刚走三步，就会看到它每时每刻向各个方向溢出。

因此我们提出这条规则：既然任何能指要素在神经症中被界定为对象、关系或症状性行动，它就不能被认为具有单义分量，也不能作为这样的要素，同任何想象性的对象、关系乃至行动等值——我说的是

在我们的界域中；然而，现今所使用的客体关系概念，恰恰总是奠基于这些东西。

今天的客体关系连同它在主体生命中包含的规范性、进步性以及由发生学界定的心理发展，属于想象界的界域。它当然不是毫无价值；但另一方面，一旦人们尝试将它衔接起来，它便呈现出我不得不用最明显方式向你们勾勒的那些无法维持的矛盾……在年初出版的两卷书中，只需阅读摆在我们面前的文本即可……这些矛盾正来自这个概念的运用：它一旦试图在一种逐渐生殖器化的前生殖器关系秩序中表达自身，并带入“进步”观念，我们立刻就会陷入矛盾。现在必须把相关术语哪怕以最粗略的方式加以整理。

因此，如果我们遵循自己的黄金法则——它奠基于我们对象征活动结构的概念——那么，首先就必须通过能指要素同其他能指要素的衔接来界定它们。正是在这里，我们同近来的神话理论相接近：这套理论以一种格外相似的方式确立起来；事实本身迫使我们衔接事物，正如我此刻正在做的那样。这也是列维-斯特劳斯先生刊于《美国民俗学杂志》的文章［《神话的结构》］所遵循的方向。

列维-斯特劳斯先生的文本怎样开启对神话的结构研究？它从一项评论开始；这项评论是他有意借自同行奥卡特的［A. M. Hocart：《社会起源》，伦敦，1954 年，第 7 页］。他说，如果有一种立场首先必须推翻，那便是历代以来这样一种做法：以一种我也不知是什么的、内在而反智主义的成见，把一个假定属于智性的领域从所谓情感的场域中排除，并因此拒绝心理学解释。

这位作者十分明确地说，由此，人们在所谓心理学学派固有的缺陷之上，又叠加了另一种错误——所谓心理学学派，就是在分析神话时，试图从所谓人类心理的恒常项、也就是某种类属特征中寻找神话来源的学派。叠加的错误在于：试图从这些东西中推导出界定清楚、切分鲜明的观念；而无论在神话还是症状性产物中，我们面对的恰恰总是这类清楚衔接的东西。

以某种我也不知是什么的智性主义批判为名，我们把病人那里通常以高度衔接的方式呈现的东西还原成一种混沌的驱力。这恰恰构成其悖论，也正使它在我们眼中显得像寄生物。我们只需不把这一点同所谓心智游戏或推理的冗余混淆；只有在把妄想或症状加以“合理化”的视角中，后者才会这样定性，而这种视角早已过时。因为依照我们的视角，恰恰是能指游戏攫住主体，把他带到远远超出其一切智性化能力的地方；然而，它依然是依照自身法则运作的能指游戏。

总而言之，我们看到什么？什么东西清晰可感？我想用一种图像让它呈现在你们眼前。随着小汉斯逐渐向我们讲出这些幻想，我们便获得了某种概念；只要我们的眼睛足够睁开，也可以从另一个视角把握它。

当我们开始看出一场神经症的历史、它在主体身上的发展以及主体如何被卷入和围困时，就会发现，主体不是正面进入神经症，而可以说是倒退着进入。小汉斯头顶一出现那片马的阴影，仿佛便逐渐走入一套在他周围排序、组织和建成的布景；这套布景与其说由他展开，

不如说把他攫住。正是这种衔接的面貌，使这场妄想得到发展——我几乎像说出一个口误那样说“妄想”；它同精神病毫无关系，但这个词

并非不恰当。列维-斯特劳斯先生说，我们绝不能满足于从模糊情绪出发的推导。

我们的印象是：在小汉斯那里，若可以把这种东西称作观念建构，它便有自身的动机、自身的方案、自身的机构。它也许回应某种需要或功能，却绝不由任何特定的驱力、冲动或情绪运动来证明；并非某种情绪运动被简单移置到其中、在其中得到表达。

这里涉及完全不同的机制；它要求一种所谓“神话的结构研究”。这种研究的第一步、最初行动，就是绝不脱离后来涌现、仿佛前来揭示某项能指要素的其他要素而孤立地考察它——所谓揭示，也就是在首先而且根本属于组合秩序的一系列对立中，把它揭示并展开。

在小汉斯经历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看到涌现的并非若干据说具有或多或少情感或心理等值物的主题，而是若干能指要素群组；它们逐渐从一个系统转置到另一个系统。举例来说——因为现在需要说明我所讲的内容——经过父亲在弗洛伊德指导下最初几次澄清尝试以后，我们从马那里分离出一个格外痛苦的要素：汉斯对弗洛伊德最初澄清的反应，便是强迫性地注视马。

随后，在父亲后续的介入中，我们看到，父亲对手淫加以禁止性的协助，使儿童在某些时刻得到缓解。我们由此进一步接近

对汉斯围绕其排尿器官——他所谓的撒尿器——所产生忧虑的第一次分析尝试。父亲此时做出一次强力介入，试图更直接地触及他所认为的儿童焦虑的唯一现实支点：小女孩没有这个东西——弗洛伊德促使他沿这个方向介入——而汉斯自己有。

汉斯无疑受到了冲击；他对此作出的反应具有一种弗洛伊德并未忽视的意义。弗洛伊德强调，

他的撒尿器是黏附的、或者说扎了根的，是会同他一起生长、长大的东西。如果恐怖症支点确实仅仅等同于一种焦虑——这种焦虑来自对某个迄今尚未由他充分实现的实在的把握——那么，这里岂不是已经初步出现了一种使恐怖症支点变得无用的东西？

就在这时，我们看到大长颈鹿与小长颈鹿的幻想涌现。我已经向你们指出，它的性质把我们抛入一种创造的场域；其风格、也就是其象征要求极其醒目。为了在座上次缺席的人，我再说一遍：只有在我们的视角中，才能赋予这样一个事实以应有分量——对汉斯来说，两只长颈鹿中的一只（也许是小的那只）可以是一只揉皱的长颈鹿，这既不矛盾、也不含混。一只揉皱的长颈鹿，就是可以像这样揉皱的长颈鹿：他亲手向我们展示。

这里，一个迄今一直发挥想象性功能的对象，过渡到某种彻底的象征化介入；主体亲自如此表述，并以随后的动作加以强调：他占有这项东西，可以说占据了这个象征性位置——他坐到它上面，尽管大长颈鹿叫喊抗议。这个行为给小汉斯带来格外强烈的满足。它不是梦，而是他亲手制造的幻想。他走进父母的房间谈论它，并把它展开。

人们对这里涉及什么始终感到困惑，这一点已经标示得十分清楚。请注意观察记录本身的摆荡：起初，父亲认为大长颈鹿与小长颈鹿代表他自己和母亲。然而，汉斯却以最明确的方式说：大长颈鹿是母亲，小长颈鹿是他的器官。由此，这两个能指之间关系的价值又出现另一种形式。

但这就足够了吗？当然不够。父亲曾对妻子说："再见，大长颈鹿！"并向儿童强调，母亲就是大长颈鹿。儿童此前接受了另一套解释界域，却这样回答——法译本译成"是真的"，我认为没有传达其中的锋芒和分量；他说的不是"是真的"，而是："才不是真的！"随后又补充："小长颈鹿是安娜。"我们在这里切实触到什么？这又是一种解释方式；它为什么在此出现？

它真的指向安娜吗？并且顺带指向她的 Krawall 吗？因为在观察记录靠后许多的位置，我们会看到小安娜以她的哭喊变得十分碍事；只要我们的耳朵始终向能指要素敞开，这声哭喊就不能不让我们把它同这个幻想中母亲的喊叫联系起来。

归根结底，这种双义性究竟意味着什么？汉斯的"才不是真的！"在此刻显出愉快乃至已带嘲讽锋芒的色彩；单凭这一点，就向我们指出父亲的做法：他试图在象征关系的两个项同据说由它们代表的某个想象性或实在的要素之间，逐一建立成对的对应关系。

父亲走错了路；汉斯每时每刻都快要向他证明：不是这样，也永远不会是这样。为什么永远不会？因为在恐怖症涌现的时刻，也就是我们所讨论的观察阶段，汉斯必须设法应付的，是对若干迄今尚未为他构成的象征关系的某种把握。它们本身具有象征关系的价值，并关联这样一个事实：人因为是人，便面对本身属于能指的问题；能指仅仅由于自己作为能指存在，就被引入实在。也就是说，正因为有些词会被说出，或者有些句子得到衔接、彼此串联，并由"为什么"或"因为"这一秩序的媒介、系词相互联结。

能指的存在把某种东西引入人的世界；我想，我曾在《精神分析》创刊号的一篇短序［〈精神分析中言语与语言的功能和场域〉，《精神分析》第 1 期，法国大学出版社，1956 年，第 81—166 页］末尾这样表达：象征符号横切事物的进程，并依附其上，赋予它另一种意义。这里涉及意义的创造问题，连同其中包含的一切自由和双义性，也连同俏皮话任意闯入时随时能够彻底抹除意义的可能。

汉斯随时都能像《爱丽丝镜中奇遇记》里的矮胖子那样说：

“事情就是这样，因为我规定它这样，因为我是主人。”［“爱丽丝——问题在于，你能不能强迫词语表示不同的东西。矮胖子——问题只在于谁是主人；就是如此。”刘易斯·卡罗尔：《爱丽丝镜中奇遇记》］

然而，他此刻仍完全受制于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他必须修订迄今同母亲世界建立关系的方式。那种方式已经组织在某种辩证法上，也就是我曾向你们强调其重要性的、他与母亲之间的诱饵辩证法：

- 他或她究竟有没有阳具？

- 当母亲欲望我——这个儿童——以外的东西时，她欲望的是什么？

儿童此前就处在这里。现在，他必须像我们在神话中看到的那样——只要进入正确分析，我们就会看到，神话总是对某个问题的解决作出衔接的尝试——从某种有关主体或相关社会同世界之关系的解释方式出发，

过渡到一种转化；这种转化之所以必需，是因为新的、不同的要素开始

同最初表述发生矛盾，并要求完成一种本身不可能、本身构成僵局的过渡。这就赋予神话以结构。

同样，汉斯此刻面对的东西，要求他修订那份象征系统的最初草图；正是它此前构造着他同母亲的关系。恐怖症的出现关乎这一点，而恐怖症携带的全部能指要素的发展更是如此。汉斯面对的就是它；也正因此，父亲每时每刻试图作出的零碎解读，在他眼中显得可笑。

谈到汉斯的回答风格，我不能不请你们回到弗洛伊德这部宏大著作中那些绝妙篇章——我们的经验对它还远未充分利用——也就是《俏皮话》。在所谓"心理哲学"领域，也许没有任何作品可同它相比；据我所知，没有另一部著作带来过如此崭新而鲜明的东西。所有讨论笑的著作，无论出自柏格森还是其他人，同它相比永远贫乏得可怜。弗洛伊德的《俏皮话》向我们带来的根本内容是什么？

它毫不偏离、不迷失于旁枝考虑，直接指出现象性质的根本。弗洛伊德像讨论梦那样，一开始就在第一章把这一点置于前景："梦首先是一幅画谜。"

没有人注意到它；这句话完全未受重视。同样，人们似乎也没有注意到，对俏皮话的分析首先从一个著名而熟悉的图式开始：分析凝缩现象作为一种奠基于能指的制造，分析 familière（熟悉的）与 millionnaire（百万富翁）叠合形成的 famillionnaire。

后文的全部展开，都将向我们表明：真正具有摧毁性、破裂性的项位于这种消解情形的层次；它打断能指本身相对于所谓实在之存在的游戏，同时又曾经同能指发生游戏。

人随时都把自己的世界一直质疑到根部。俏皮话的价值——这正是它区别于喜剧之处——在于能够利用任何意义运用在根本上的无意义，也就是“凡以能指运用为根据的意义，都随时可能受到质疑”这一性质。能指运用相对于任何可能意义，本身都深具悖论，因为某种东西正是在这种运用中得到创立；这种运用本身创造了它注定要支撑的东西。

俏皮话领域同喜剧领域之间的区分极其清楚。弗洛伊德触及喜剧时，只在这本书中把它作为次要问题处理，并通过它同俏皮话的对立来阐明它。首先，他会遇到一些中介概念，让我们看出天真这一维度。我正是因此才岔入天真的维度——一种如此双义的天真。因为这里存在：

- 一方面，必须界定它，才能看出喜剧性的东西如何从天真的表现中涌现；
- 另一方面，我们也清楚地看到，这种天真在何种程度上是一种主体间的东西。

儿童的天真，是我们赋予他的；某种怀疑也始终盘旋在儿童的天真上方。为什么？这里再举一个例子。弗洛伊德用这样一个故事开始说明天真：孩子们晚上召集一大群成人，答应为他们演一出小戏；木偶戏开始动起来。

弗洛伊德说，小演员们开始讲述一对陷入赤贫的夫妻。他们试图摆脱困境，丈夫远赴异乡；他完成了许多壮举，满载财富归来，在妻子面前炫耀自己的兴旺。妻子听着，拉开舞台深处的一道帘子，对他

说：“你看，你不在时我也好好干活了。”帘幕后整整齐齐摆着十个娃娃。

弗洛伊德以此说明天真；这是喜剧的一种形式。倘若把喜剧定义中涉及的释能作用放在这里，它似乎来自一种自发实现的节省：

同样的话若在另一种秩序中由一张不那么天真的嘴说出来，便会包含某种紧张，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窘迫；这里却省去了这一切。

儿童毫不费力地直接走向某种荒唐透顶之物；正是这一点触发了笑，使事情变得十分“可笑”——而这个词又带着某种奇异的回响。不过，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如果我们因此处在一个同喜剧相邻的领域，那么，相关的节省恰恰是这样一种节省：假如同样的建构从成人嘴里说出，为了唤起同样的东西，它本应经历一番加工；现在则免去了这番加工。

儿童可以说直接实现了把我们带到荒谬顶点的东西；他作出所谓天真的俏皮话。这个故事之所以引人发笑，是因为它从儿童嘴里说出；成人于是可以尽情开心：“这些小鬼真是无价之宝！”人们假定他们完全无辜，一下子就找到了别人必然要费许多工夫才能找到的东西；或者，别人还得增添更微妙的技巧，才能让它严格说来称得上好笑。

然而，这也让我们看到，借其开口的那种无知未必完全。总而言之，当儿童故事具有那种令我们错愕、继而引发笑声的性质时，我们便把它纳入“天真”的视角；但我们十分清楚，这种天真未必总应当按字面理解。有真正天真，也有假装天真。这里，假装的天真正好恢复了儿童喜剧游戏最强烈的、用弗洛伊德的话说最“倾向性”的俏皮性质。只

要稍稍怀疑这种天真并不彻底，情势就会翻转：儿童反而占据上风，真正成为游戏的主人。

换言之，弗洛伊德还突出了一项内容，我请你们回到文本中去看：俏皮话总包含第三个人的概念。人们当着另一个人的面讲某个人的俏皮话；无论现实中是否真有三个人，笑被俏皮话触发时，都有这种必要而根本的三元性。相比之下，喜剧满足于二元关系；喜剧效果只在两个人之间也能触发。

例如，看见某个人跌倒，或者为了完成一项对我们极其简单的动作或努力，却采用完全不成比例的办法；弗洛伊德告诉我们，仅凭这些就能够而且足以在这种天真中触发喜剧关系。

我们从根本上看到，即使第三人的视角仍然是潜在的，它也总或多或少牵涉在内。换言之，在我们认作天真的儿童之外，还有一个大他者；归根结底，为了让事情如此引人发笑，我们正假定它存在。儿童完全可能“假装自己在假装”，也就是做出天真的样子。正是这种象征界维度，随时都可以在捉迷藏般的游戏和不断的嘲弄中感受到；它为汉斯对父亲的一切回答着色，并规定其基调。

稍后，我们会看到另一个这样的现象。父亲问他：

“看见马倒下时，你想了什么？”

汉斯谈到这件事时，说自己“染上了蠢念头”。

父亲问：“你是不是觉得，马带着那么大的蹄子摔下去，已经死了？”

可以确定，正如父亲后来记下的，汉斯起初带着一副十分认真的神情回答：“对，对，我确实这样想了。”

随后，他突然改口，开始笑起来——记录中特意写下这一点——并说：

“才不是，这不是真的；我刚才这样说，只是开个好玩的玩笑。”

这可能意味着什么？整份观察记录布满这些小小的锋芒。它还能意味着什么呢？汉斯仿佛一时被马倒下时那种所谓悲剧性的回响攫住……但小汉斯的心理中真有这种悲剧回响吗？它也许偶尔同许多别的东西一起出现……随后，儿童突然想到另一个人：想到那位留着胡子、戴着眼镜的父亲。弗洛伊德向我们描写过咨询时坐在小汉斯旁边的父亲：小家伙打扮得齐整可爱，而另一个人沉甸甸地坐在那里，眼镜满是反光，全神贯注，充满善意。

有一瞬间，弗洛伊德也动摇了。当时，他们正围绕马嘴前那块著名的“黑东西”追问，打着灯笼似地寻找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弗洛伊德忽然对自己说：“这不就是那张长脸吗——说到底，就是这个蠢驴！”而当我说“这个蠢驴”时，你们仍要记住：马嘴前那块强烈的黑色始终没有得到澄清，它正是永远藏在帷幕和镜子背后的实在豁口；它总从深处像污点一样浮出。归根结底，在某种神圣而高级的人格中，教授式优越感与这种判断发生了短路；同时代人的经验和回忆告诉我们，这种判断总是很容易从弗洛伊德嘴里冒出来，用法语字母表示，便是第三个字母后面跟三个小点：

“多么善良的一位会长，蠢……”

摆在我面前的某种东西，同我对眼前之物从根本上具有深渊性质的直觉相互交叉、彼此汇合：它从深处浮出。因此毫无疑问，在这些条件下，小汉斯始终把游戏玩得相当好：他收回自己的话，他发笑，他突然取消刚才展开的一长串内容。我们每时每刻都觉得，他对父亲说的恰恰是："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乍看之下，他接受"死了"作为"倒下"的等价词；但紧接着，他便想："你不过是在重复教授教你的话。"也就是教授刚刚暗示的内容：他非常怨恨父亲，甚至想要父亲死去。

这也进一步充实了我们的"规则"。我说过，首先要辨认那些具有根本组合价值的能指：所有投入运作的能指正通过这种组合，把一种新的组合关系引入实在，从而重新构造实在。既然还要回到《精神分析》创刊号的参照，那么，那一期封面印着能指本身之功能的符号，绝非偶然。



能指是横跨意义领域的一座桥；因此，意义不是被复制，而是被转化、重新创造。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必须始终把目标和问题集中到一

点：小汉斯完成了怎样一轮能指回路，从什么出发，又抵达什么？我所谓一轮回路，指的是他依次走过的各个阶段，也就是 1908 年前五个月。在此期间，我们先后看到，小汉斯关注什么东西装载、什么东西卸载，关注什么东西突然以或多或少猛烈的方式动起来，同时也可能让他过早离开出发的站台。

这些形形色色而带有幻想性质的能指要素，都围绕运动主题联结起来；更准确说，请允许我这样讲，它们围绕运动中一切变化和加速的主题联结。“摇动”（branle）这个词，是最初那些幻想全部构造中绝对根本的要素；其他要素也由此逐渐涌现。其中，我们不能不格外注意围绕母亲两条衬裤——一条黄色、一条黑色——发生的事情。

脱离我试图引你们进入的视角，这段材料就完全无法理解。可以说，父亲在这里彻底摸不着头脑。至于弗洛伊德本人，他只说父亲不可避免地

把问题搅乱了；不过，他最后仍向我们指出若干视角：父亲无疑没有看出一种根本对立。它也许同不同的听觉知觉有关，例如男性与女性排尿时的不同声响。

我们还看到，弗洛伊德在一则注释中说明小汉斯当时想表达什么；小汉斯说的那些话极其难懂。他大概想告诉我们：衬裤越穿就越黑。这个说法出现在许多展开以后；其中可以看出：

- 衬裤是黄色时，对他具有某种价值；
- 衬裤是黑色时，便不具有这种价值；
- 衬裤同母亲分开时，会让他想吐口水；
- 母亲穿着它时，便不会让他想吐口水。简言之，弗洛伊德坚持说：小汉斯无疑在向我们指出，衬裤由母亲穿着时，与不被母亲穿着时，发挥完全不同的功能。

因此，我们已有足够线索看出，弗洛伊德本人正趋向一种开端——可以说，是把黄色衬裤与黑色衬裤这一对完全加以辩证相对化的开端。在小汉斯与父亲试图共同理清问题的那场漫长而复杂的谈话中，这一对每时每刻都表明：它只能通过表现一系列对立而取得价值；必须从起初完全不受注意的特征中寻找这些对立。人若笼统地把黄色衬裤等同于排尿，又把黑色衬裤等同于汉斯语言中所谓 Lumpf、也就是排便，这些特征就会彻底遭到忽视。把 Lumpf 等同于排便，并遗漏真正构成汉斯之 Lumpf 的根本要素，是完全错误的。

父亲本人的证词告诉我们：Lumpf 是 Strumpf 一词的变形，后者首先表示黑色长袜；在观察记录的另一处，小汉斯又把它同一件黑上衣联系起来。因此，它属于衣服这一绝对根本的要素：衣服既遮藏，又是一面屏幕；汉斯在这块屏幕上显现并投射其前俄狄浦斯追问的主要对象，也就是欠缺的阳具。

因此，粪便本身由某个同时关联象征化与对象欠缺之象征化的术语指称；这足以表明，在这个层次，相对于再次占据支配地位并真正关系到小汉斯根本问题的象征功能，本能关系以及排便机制所牵涉之物的肛门性只有很小分量。

究竟什么东西会失去？什么东西能够从洞里掉出去？

这些都是某种象征工具化最初的要素；后来，它们会

以各种形式融入小汉斯神话建构的发展：在他的第一个梦中，安装工前来把浴缸旋下；后来，安装工把他自己的屁股也旋下来——不得不说，这让父亲和弗洛伊德都极其高兴；再后来，据我们所知，他自己的阴茎也会被旋下来。

这些人如此急于把自己的意义强加给小汉斯，以至于在谈到把他的小阴茎旋下来时，他们甚至不等汉斯说完，就告诉他——连弗洛伊德本人也这样做！——唯一可能的解释当然是给他换上一根更大的阴茎。小汉斯根本没有这样说；至少，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本来会这样说，而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任何东西表明他会这样说。小汉斯谈的是替换。这正是一个能够切实触到反移情的例子：是父亲提出了这样的观念——如果给他换掉，就是为了给他一根更大的。

这就是那些随时发生的错误之一；自弗洛伊德以来，人们从不吝于延续这种解释传统，总要在某种我也不知是什么的情感倾向中，

寻找一种据说能够随时为我们提供动机和正当理由的东西；然而，真正的问题有自身的法则、自身的结构和自身的引力，必须作为这样的东西加以研究。

最后我们要说，在症状性能指系统的神话发展中，必须考察的是

它每个时刻的系统连贯性，以及它在历时性、在时间中所具有的自身发展。由此可以说，任何神话系统在神经症者身上的发展——我过去曾称之为“神经症者的个体神话”——必然呈现为一种展开、脱出和逐步解嵌；一系列中介最终通过一条能指链得到解决。这条链总带有或多或少明显、但根本上循环的性质：终点同起点有深刻关系，却又不再完全相同。

我的意思是，起点总包含的某个僵局，会在终点重新出现，并以一种倒转形式被当作解决。

也就是说，除去符号的变化，从出发点开始的僵局，总会在能指系统的操作性移位终点以某种方式重新出现。后面我会为你们说明这一点。因此，今天我们重新踏上这条将在假期之后继续走的道路，从摆在小汉斯面前的既定条件出发。

在出发点，小汉斯面对的是阳具的游戏；这种游戏早已处在一种诱饵关系中，足以维系他与母亲之间的某种进程。直到那时，它都能为他同母亲的全部关系提供某种目标、视角和意义，也就是同母爱对象的完美认同。

随后发生了某种事情……在这一点上，我赞同那些作者，也赞同父亲和弗洛伊德……它首先是一个问题，其在儿童发展中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主体自身没有任何东西在想象界秩序中预先确立、预先排列，可以让他承担那种在童年发展中两三个时刻尖锐面对的前景——生长。

正因为在想象界层面，没有任何东西预先确立、预先决定，一种完全不同的现象便带来根本扰动；不过，对儿童而言，它在第一次面对生长时，

会在想象中同生长黏合起来：这就是勃起膨胀现象。

换言之，在儿童最初手淫或勃起的时刻，阴茎从较小变得较大；这正是《爱丽丝梦游仙境》各种想象性幻想最根本的主题之一。这些幻想以一种方式说明它，使它对儿童想象具有绝对优先的价值。这里的问题正属这一类型：如何整合既同实在阴茎的存在有关、又同一根本身能够变大或变小的阴茎的独立存在有关的东西；而这根阴茎同时又是小孩和大人的阴茎。

总而言之，这个问题恰恰同更大的那个人、也就是父亲的阴茎在场有关。汉斯此刻的发展问题就系于此：因为汉斯必须在一种要求他完成格外困难的象征化的情境中面对俄狄浦斯情结，恐怖症才会发生。

然而，如果恐怖症得以发展，如果分析产生了如此丰盛繁茂的神话增殖，那么，正如病理向我们揭示正常那样，它足以向我们指出：为了让儿童整合其生殖器性的这一实在，相关现象究竟何其复杂；那个过渡时刻又具有何等根本而深刻的象征性质。

第18课 · 1957年5月8日

如果还需要提醒你们，象征界的介入对人的欲望具有构成性质，那么，除了正确调焦于最普通、最日常的经验以外，我们还可以从下面这个公式找到一个格外醒目的例子。它如此直接、无处不在，任何人都无法忽略：用所谓本能适配的术语来看，也许是人的所有欲望中最深、至少最恒常的那种欲望，其表述究竟可能意味着什么？我们每个人在生命的某个转折处都很难否认它；尤其在那些最受我们关注、遭受某种主体性不适折磨的人身上更是如此。终于说出它的名字：那就是“对别的东西的欲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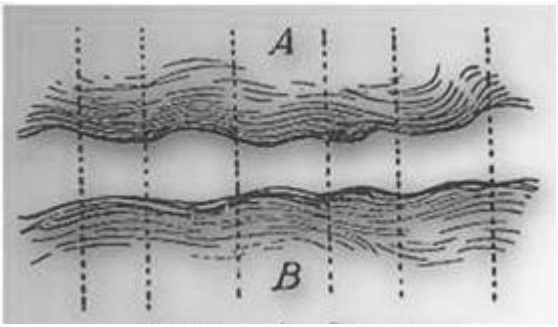
在客体关系的界域中，它可能意味着什么？如果客体关系被设想成一种内在于自身的演化或心理发展，随着连续推进而涌现，人们只需帮助它；如果客体关系参照一种典型的、仿佛预先形成的对象——那么，这种“对别的东西的欲望”从何而来？

这项开场评论，是为了把你们——若可以借用弗洛伊德在书信某处谈埃及圈子时的说法——置于［……］之中。我们从上次停下的地方继续，也就是回到小汉斯。我刚才讲的内容当然并非同主题无关。

到目前为止，我们试图在这种似乎可能的神话酝酿中探测什么？这首先关系到汉斯观察记录的根本特征。我所谓神话酝酿，就是那些不同的能指要素；关于每一个要素，我已经充分向你们显示其双义性，以及它们根本上如何能够覆盖——可以说几乎任何一个——所指，当然不是同时覆盖一切所指。当某个能指重新遇到所指的某个要素时，其

他相关能指要素便覆盖另一些要素。换言之，能指星丛通过一种可以称为“转化系统”或“旋转运动”的东西进行操作。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每时每刻以不同方式覆盖所指；同时，又仿佛在同一股流动中对所指施加一种深刻的重塑作用。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如何设想这种巫术般操作的动力功能？它以能指为工具，而其目标、终点和结果，应当是在危机之后对所指重新定向、重新极化并重新构成。

我们正以这种方式提出问题；我们相信，必须从这个角度提出它。理由很简单：所谓神话酝酿——也可以换一个更常见、但适切程度稍差的名称；二者指的完全是同一件事——就是我们在儿童那里看到并加以关注的幼儿性理论。我们之所以关注它们，是因为它们绝不只是一种多余之物或虚浮的梦；

而是因为它们本身包含一个动力要素。严格说来，汉斯观察所讨论的正是这个东西；没有它，汉斯观察便根本毫无意义。

我们必须抛开成见，从这份观察入手讨论能指的功能，因为它最富示范性；可以说，它在起源的奇迹中得到更好的捕捉和把握。那时，发

明者及其追随者的精神尚未来得及重新压上种种禁忌要素，尚未来得及重新诉诸一种奠基于成见的实在；那些成见要求、或者说从更早的参照中重新找到某种支撑，而新发现的场域恰恰质疑、动摇并贬抑这些参照。

汉斯观察仍保持着新鲜，也保留全部揭示力量——我几乎要说，全部爆炸力。我们必须停下来考察：在这种复杂演变中，汉斯如何被卷入同父亲的对话；父亲此时发挥的作用，同所谓神话酝酿的进展真正不可分割。甚至可以说，父亲每一次介入都刺激神话酝酿，使它反弹、重新启动、再次繁生。然而，正如弗洛伊德在某处明确指出的，它确实有自身的法则和必然性。

汉斯提供的内容远非总是我们预期的；他带来的东西令人大吃一惊，至少是父亲始料未及的——即便弗洛伊德告诉我们，他本人曾预见它们。汉斯带来的内容甚至超出弗洛伊德本人所能预见的范围，因为弗洛伊德似乎并不掩饰，许多要素仍然无法说明、有时也没有得到解释。但我们是否真需要解释每一个要素？有时，我们可以把那两位合作者——父亲与弗洛伊德——的解释再向前推进一点。

我们在这里试图把握的，是这一能指星丛自身的引力法则与连贯性。它表面上围绕某个东西聚集；弗洛伊德明确告诉我们，如果没有注意到下面这一点，我们也许会受到诱惑，仅凭对象——这里也就是马——来界定恐怖症：

马远远超出那个仿佛占据优势的形象。它更像一种把整个场域集中起来的纹章图形，本身负载着各种首先属于能指的蕴含与再蕴含。

因此，为了标记我们此后道路的进展，必须设置若干参照点。我们从这一点出发，而这仍绝非新东西，因为弗洛伊德本人已经以最明确的方式衔接过它。那发生在一次对话以后；汉斯在这场首次对话中，开始同父亲一道从恐怖症里引出我所谓恐怖症的能指蕴含，也就是汉斯能够围绕它建构的一切。这些内容具有丰富的神话侧面，愿意的话甚至可以说具有小说性；它们是一种幻想化，不只关乎过去，还关乎他想怎样对待马、围绕马做什么。它无疑伴随并调节他的焦虑，同时也有自身的建构力量。

我们现在就要讲到汉斯同父亲的这场谈话。谈话之后，弗洛伊德在另一处指出，恐怖症在这里变得更有声势：它发展起来，显露各个不同阶段。弗洛伊德写道：

> “我们由此得知，这场恐怖症其实何等弥散。它指向马，也指向车；指向马倒下，也指向马咬人；指向具有某些特殊性质的马，也指向载重或没有载重的车……不妨直说：所有这些特征之所以触及要害，是因为焦虑最初同马或恶马毫无关系；它后来才被转置到马的恐怖症上，并固定在并非单独的马、而是马之情结中那些适合某些移情的位置。”[注1]
>
> [Wir erfahren so, wie diffus sie eigentlich ist. Sie geht auf Pferde und auf Wagen, darauf, daß Pferde fallen, und daß sie beißen, auf Pferde besonderer Beschaffenheit, auf Wagen, die schwer beladen sind. Verraten wir gleich, daß alle diese Eigentümlichkeiten daher rühren, daß die Angst ursprünglich gar nicht den Pferden galt, sondern sekundär auf sie transponiert wurde und sich nun an den Stellen des

Pferdekomplexes fixierte, die sich zu gewissen Übertragungen geeignet zeigten.]

[注1] 引自弗洛伊德《五个精神分析案例》，法国大学出版社，1954 年。原书法译大意为："由此我们得以看出，它实际上何等弥散。它指向马与车，指向马倒下、咬人，指向某类特殊的马，也指向载重的车。我们现在即可揭示：所有这些特征都源于焦虑最初同马毫无关系；焦虑后来才被转置到马身上，并固定在马之情结中适合某些移情的要素上。"

因此，弗洛伊德已经以最明确的方式表述了这一点。

这里有两个极点。第一个极点属于能指；这个能指将支撑一整系列移情，也就是在所指的一切可能置换中完成的重塑。原则上，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工作假设；只要它符合我们经验的一切要求，就可以假定重塑后的所指不同于最初的所指，也就是说，所指一边发生了某种事情。

我现在就向你们指出，所指一边发生的事情可能是一项绝对要求：通过能指，所指场域必须以某种方式重新组织或扩展。那么，为什么偏偏是马？人们可以就此任意铺陈：在神话、传奇和童话的梦幻数学中，马是一个颇为丰富的主题；最恒常、也最晦暗的一例，便是英语把梦魇称为"夜之母马"［英语 nightmare，字面意为"夜之母马"］。

琼斯先生的整本书都围绕这一点展开[注2]，试图向我们表明，这里绝非单纯偶然："夜之母马"不只是夜间女巫或令人焦虑的显现；母马在这里取代女巫，也绝非偶然。

[注2] Ernest Jones：《梦魇》（On the Nightmare，1931），Payot Rivages，2002 年版。

当然，琼斯先生依照惯常做法，试图在分析中从所指一边寻找答案；这让他发现一切都在一切之中，并向我们表明，古代乃至现代神话中的任何游戏，都不可能逃脱在某一方面成为马的命运。确实，战神马尔斯、奥丁、宙斯都有马；问题在于为什么。

于是，他们既有马，又是马；这本书里一切皆马。从这里出发，当然不难表明，“MR”这个词根同时是母亲、mara，在法语中还是大海；单凭这个词根本身，就包含上述意义。而它之所以如此容易到处找到，是因为它几乎覆盖一切。我们当然不会沿这条道路前进，也不会认为一切蕴含都在马这一边。

马这一边当然包含各种类比倾向；作为一种意象，它因而能够成为有利容器，容纳儿童走到我们观察小汉斯的转折点时进入其关注前景的各种自然要素的象征化。我在这里试图强调的内容始终、到处遭到遗漏：根本之处不在这里。根本之处是，在小汉斯演变的关键时刻，某个能指被带了进来；它会发挥绝对的极化和重新结晶作用。它呈现为病理性的方式，但这种方式无疑也具有构成性。

从这时起，马开始以弗洛伊德后来在小汉斯恐怖症中所谓的“信号功能”为外部世界断句。这些信号在当时为他重新构造世界；世界受到各种界限的深刻标记，而我们现在必须把握这些界限的性质与功能。界限一旦构成，同时也就通过幻想或欲望构成了越过界限的可能性——我们会看到这一点；可是与此同时，一项障碍、一种抑制又让他停在界限以内。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一切由一个能指要素——马——完成。要理解马的功能，不能去寻找马的等价物究竟在哪一边：究竟是小汉斯自己、他的母亲，还是他的父亲；因为马先后是这一切，同时还是许多别的东西。

只要同马保持连贯的能指系统在小汉斯先后把它应用到自身世界、以便重新构造这个世界的尝试中，于某个时刻触及、覆盖他世界中某个主要构成要素，马就可以成为上述一切中的任何东西：他的父亲、母亲、他自己、妹妹小安娜、年幼伙伴、幻想中的女孩，乃至许多别的东西。首先必须看到，当马作为恐怖症的中心点被引入时，它带来一个新项；这个新项的首要性质，恰恰是一个晦暗的能指。

我刚才说“一个能指”（un signifiant）时近乎作了一次文字游戏；你们可以完整地理解它：在某些方面，它是“无意义的”（insignifiant）。正因为如此，它才具有最深层的功能，像犁铧那样以一种新方式重新剖开实在。我们能够理解这种功能为何必要，因为在此以前，小汉斯的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随着马后来出现而涌现的，恰恰就是这种东西——我想此前已经充分指出，现在再重复一次。

弗洛伊德明确强调：弥散焦虑的信号出现不久以后，马便开始发挥功能。只有追随这项功能的发展，追随后来发生的一切——也就是人们将对马做的一切——并且每一步都一路追到尽头，我们才能理解发生了什么，理解这个能指和这匹马究竟发挥什么功能。

因此，小汉斯突然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无疑已经失去平衡的情境中。为什么这个情境会失去平衡？在 1908 年 2 月 5 日或 6 日以前——离他满五岁大约还有三个月——一切似乎都得到了很好的支撑；就在这个时刻，某种事情发生了。

让我们暂时用迄今建立的参照术语，尽可能直接地把握它。他同母亲的游戏继续建立在诱惑的诱饵上；这项诱饵此前一直完全够用。我提醒你们其中各项：同母亲的爱恋关系把儿童引入想象动力本身；他逐渐在其中入门，也可以说悄然钻入其中——这里是从一个新角度引入同“怀抱中乳房”的关系。观察开头每时每刻都铺陈着这一点：汉斯在一种不断遮蔽和揭示的游戏中偷偷观察；这构成游戏本身。

在他同母亲关系的基础上，某种事情发生了：若干实在要素被引入。迄今围绕象征性的在场与缺席展开的对话，一直以游戏为基础；现在，对汉斯来说，一切游戏规则突然都被破坏，因为出现了两件事。正当汉斯最有能力在游戏中“兑现”时——我的意思是，他终于能够真正向母亲展示自己小小的阴茎，而且展示它最为荣耀的状态——他却在这个时刻遭到母亲斥拒。母亲逐字告诉他，这不仅是禁止的，还是肮脏的小东西，一种令人恶心的东西。我们不能不在这里看到一个绝对根本的要素。

弗洛伊德还强调，这种贬抑性介入的后续冲击并不会立刻发生。他逐字强调了一个我不厌其烦地重复、推到分析思考前景的术语：“事后”。他说“nachträgliche Gehorsam”：nachträglich 是事后，Gehorsam 是服从；在任何“听审”以前，它都首先意味着服从、听从。无论这类威胁还是这类拒斥，都不会立刻产生作用；它们经过一段时间才起作用。

而且，我在这里采取的立场绝不偏颇；我还会提出一个实在的比较要素——弗洛伊德本人也明确强调过，并非只在字里行间暗示。通过比较大与小，汉斯能够准确衡量相关器官何等微小、细弱而可笑地不够用。

正是这个实在要素叠加并加重了那次拒斥；后者已经动摇他同母亲关系整座大厦的根基。再加上小安娜的在场：起初，他从各种面向和多重角度、依照许多差异极大的同化方式把握她；但她也越来越暂时证明，游戏中的另一个要素确实在那里在场。它也可能质疑整座大厦、游戏的一切原则与一切基础，使汉斯本人甚至有时变得多余。

有儿童经验的人都很清楚，这些是日常经验中的事实；儿童分析始终把它们带到我们眼前。我们现在关心的是：能指如何在这一切之中进行操作。应该怎样做？必须回到文本，进行建构；必须懂得阅读。

当我们看到同样的全部要素以某种方式反复出现、却又以不同方式重新组合时，必须懂得把它们记录下来。你们要看到，这绝不只有某种遥远的类比参照；它不是在暗示我们外推出、假定在主体身上发生的内部事件；也不是日常语言所谓主体自己正在琢磨的某种东西的象征。它完全是另一回事。

表现这种构造的法则并不属于实在，而属于象征界。这些法则开始彼此作用，可以说自主地自行操作。至少有一段时间，我们应当把它们当作这样的东西考察，以便看出这种重塑与重构的操作本身，是否正是有时真正发生作用的东西。

我来说明刚才所讲的内容。4 月 22 日，父亲像每个星期日一样——这是根本要点——带小汉斯去莱因茨看望祖母。维也纳市中心坐落在多瑙河的一条支流边；小汉斯父母的家就在内城被环城大道围住的这一部分。房屋后面是海关办公处，再远一点便是观察中经常提到的著名车站；房屋前面则是战争部广场与一座美丽的博物馆［奥匈帝国艺术与工业博物馆］。

汉斯想到，等自己取得进步、能够越过屋前的某片区域，就可以前往那个车站。一切都让我认为，这栋房子位于非常靠外的位置；因为他曾提到，北方铁路的铁轨就在住处附近，而北方铁路在多瑙河运河的另一边。维也纳有不少小型铁路系统：来自东西南北各方的线路都汇集于此，此外还有大量地方小铁路，特别是一条位于低处的环线。年初我谈过的那位“年轻女同性恋者”，大概正是投身于这条线路。

不过，同小汉斯的历险相关的主要有两条线路。其中一条是联络铁路；它连接北方铁路与街区后方的中央海关车站。小汉斯可以在那里看到他极想乘坐的轨道小车——用弗洛伊德的话说，是“手摇车”。



与此同时，他还接触了另一个车站。那条铁路有些区段位于地下，通往莱因茨。4 月 22 日这个星期日，父亲向小汉斯提议走一条比平常略微复杂的路线。他们会在城市铁路的美泉宫站停留；那里是“维也纳的凡尔赛”，还有小汉斯同父亲常去的动物园，在观察中发挥极重要的作

用。不过，它远不如凡尔赛宏伟；哈布斯堡王朝大概比波旁王朝更接近民众，因为即使当时城市范围远小于今天，从那里也能清楚看见，地平线近在咫尺。

参观美泉宫公园以后，他们再乘一辆蒸汽有轨电车——当时的60　路——前往莱因茨。为了让你们了解距离，莱因茨离维也纳大致像沃克勒松离巴黎一样远；线路随后继续通往毛尔和默德灵。他们直接去祖母家时，则乘一条从南边许多地方经过、直接抵达的有轨电车。

另一条有轨电车线路连接这条直达线与城市铁路，也就是著名的圣法伊特线路。这会帮助你们理解：有一天，小汉斯产生一个从莱因茨出发回家的幻想，他说火车载着自己与祖母开走了；父亲错过这班车以后，可以搭从圣法伊特开来的第二班车。这套路网形成一个虚拟环线，因为两条线路彼此不通，只是都能抵达莱因茨。几天以后，小汉斯在同父亲的谈话中讲出某种内容；它属于他向我们证实自己曾经“想过”的许多东西。即使人们无论如何都想让他说“这是梦见的”，他仍明确强调，问题在于他想出来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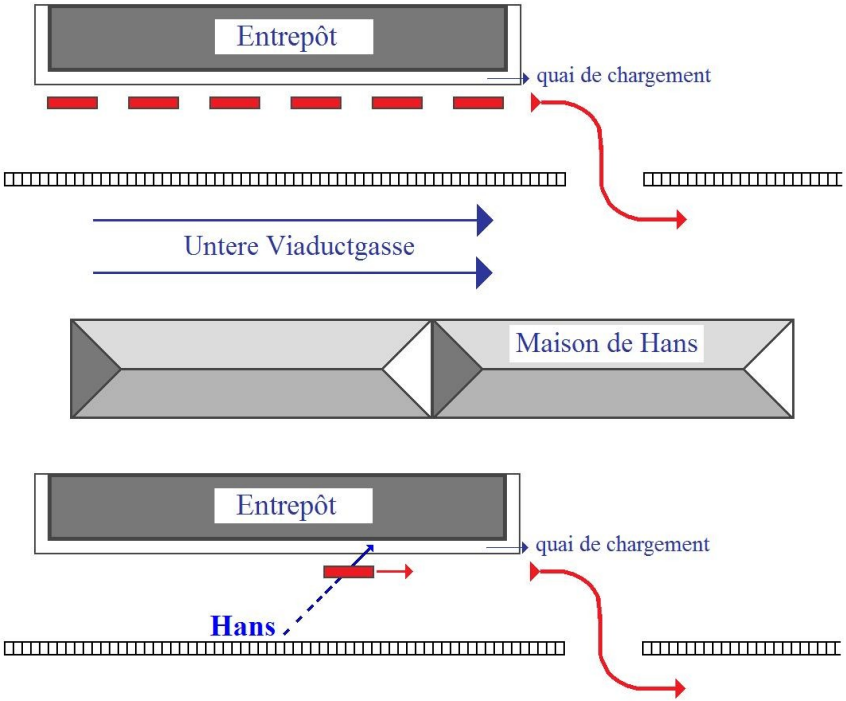
［“我——你梦见长颈鹿了吗？他——没有，不是梦见的；是我想出来的……整个东西都是我想出来的——我更早以前就已经想到了。”］

弗洛伊德本人曾指出，交通情结（Verkehrkomplex）正是在某个根本点以这种方式介入：

“我们可以看到，事情发展到这里时，有关马、马将做的一切以及马之作用的东西，自然而然地远远扩展进整个交通系统。”

换言之，在马的回路所勾画的地平线上，还有铁路的回路。这一点如此真实而明显：汉斯第一次向父亲详细说明自己对恐怖症的切身体验时，给出的解释便关联于屋前的院子和一条很宽的通道。由此可以理解，小汉斯穿过它们为什么会成为一件大事。套着马的货车来到屋前装货卸货，沿着卸货坡道排成一列。





可以说，马匹回路系统同铁路回路系统相切；小汉斯第一次开始稍稍解释马恐怖症时，最清楚地指出了这种相切。小汉斯说什么？

他说："有件事我特别想做，就是爬到车上去……"他曾看到孩子们在那里玩；他可以迅速踏过麻袋和包裹，走到作为卸货坡道的那块木板上。

他害怕什么？　害怕马突然起步，让他来不及迅速完成这件小事、再赶快跳下来。

这毕竟应当有某种意义。我相信，要理解它，正如要理解

能指系统的任何运作一样，我们在这里都不能从这样的观念出发：

- 木板在这一切中究竟代表什么？
- 车究竟代表什么？
- 马又究竟代表什么？

马无疑是某种东西；等到最后根据其运作方式认识它时，我们就能说出它曾经有什么用途。但现在还什么都不知道，必须在马这里停下来。父亲在这里停下来，每个人都停下来——只有那些无休止重读小汉斯观察、试图从中读出别的东西的分析家除外。父亲确实对它感兴趣，并问汉斯为何害怕：

- “会不会例如是因为你回不来了？”
- “噢！才不是呢，”小汉斯说，“我很清楚自己住在哪里，总能把地址告诉别人，他们就会送我回来。我甚至也许会坐那辆车回来。”

这没有任何困难。似乎没有人在这里停留，但值得注意的是：汉斯害怕某种东西，而这个东西完全不是那个似乎再合适不过的解释。他可能被情境裹挟带走；这甚至能沿着我试图引导你们理解的方向，成为一个漂亮的隐喻。可根本不是这样：他非常清楚，自己总会回到出发点。只要我们稍有一点理解力，就会怀疑，归根结底也许恰恰是这一点构成问题：无论怎样做，都无法从中出去。这只是我顺带给你们的一项提示；但这样说也许显得太精巧，而不够严谨。

我们必须看到，在观察记录中，有些情境不能不拿来同这一情境比较；

如今我们已经清楚，必须停下来考察它，因为这正是恐怖症的现象学。被欲望的东西与被害怕的东西在此具有彻底的双义性。归根结底，我们也许会认为，让小汉斯焦虑的确实是被带走、离开这一事实。但依他本人的证词，离开本身远未触及焦虑，因为他非常清楚，人总会回来。那么，他仿佛想走到更远处，又究竟可能意味着什么？

当然，“他想走到更远处”这个公式，目前可以由我们

保留在一种最低限度的建构中。如果他的系统确实由于游戏规则不再受到尊重而陷入某种混乱，他就会觉得自己被困在一个无法维持的情境中；其中最无法维持的要素，是他本人再也不知道自己位于何处。

现在，我要把另一些要素拉到你们面前；它们以某种方式重现恐怖症恐惧的幻想所指示的内容。小汉斯会同马一起离开，卸货木板会离他远去，

随后他又会回来，再次汇入母亲——这究竟是过度欲望的，还是过度恐惧的？谁知道？反复阅读观察以后，我们必须至少记起另外两个故事。第一个幻想不是随便在任何时刻出现的；除了其余一切以外，他还设想它同父亲一起发生。这次仍是在铁路上，不过他们坐在车厢里，他同父亲在一起。他们抵达将要度过暑假的格蒙登车站，于是收拾物品、穿好衣服。

在那个也许不像我们今天这样轻便的时代，收拢和装载行李似乎总是一件令人操心的事情。弗洛伊德本人也在女同性恋者病例中把它作为比较项：

- 分析的第一阶段相当于收拾行李；
- 第二阶段相当于把行李装上火车。 汉斯和父亲还来不及重新穿好衣服，火车便又开动了。

接下来还有汉斯在 4 月 21 日讲给父亲的第三个幻想，我们称之为“站台场景”。“站台场景”恰好位于我们所谓“同父亲的大对话”以前；这些都是便于后文辨认的约定标签。汉斯想到，自己同祖母从莱因茨离开。每个星期日，他都同父亲去探望这个女人；可是，整份观察对她绝口不提。不得不说，这相当令人怀疑这位女士有多么可怕，因为在当时，人们原本远比我今天更容易确定整个家族的情况。

小汉斯所谓的“莱因茨女人”据说同他一起上了火车，父亲还没来得及从踏板上下来，他们便开走了。火车往来频繁，而且从那里可以望见通往圣法伊特的线路；小汉斯说，他及时回到站台，同父亲搭上第二班车。小汉斯既然已经离开，又怎样回来的？僵局恰恰在这里。说实话，没有人成功澄清这个僵局；但父亲确实向自己提出这些问题。观察记录用了十二行，讨论小汉斯脑中究竟可能发生了什么。

至于我们，只需满足于自己的图式：

- 在第一幅图式中，他同祖母两个人一道离开；
- 在第二幅图式中，他以神秘方式走上不可能和无解的道路；
- 到了第三幅图式，最后又变成他同父亲两个人一道重新出发。

换言之，只要大致了解小汉斯观察的两个极点，我们就不能不被这里出现的东西触动：

- 起点是整场显而易见、受到反复强调的母亲戏剧；
- 终点则是：现在我同父亲在一起。

我们毕竟不能看不见，这种向母亲无情往返的运动，同有朝一日至少梦想意气风发地同父亲重新出发，二者之间必然存在某种关系。这只是一项提示，却清清楚楚；唯一的问题是它完全不可能。小汉斯既然已经同祖母先行离开，人们根本看不出他怎样还能同父亲重新出发。只有在想象界中，这才可能。

换言之，我们从水印般若隐若现的东西中，看到了我曾向你们指出的一切神话进程的根本图式：

- 从某种不可能或某个僵局出发；
- 抵达另一个僵局和另一种不可能。

在第一种情形中，不可能从母亲那里出去，人总会回到她那里：“别告诉我，我正是因此才焦虑。”在另一种情形中，人当然可以认为只需置

换一下，改为同父亲离开；汉斯本人也确实这样想，甚至把它写给教授——这是“运用思想的最佳方式”［原文如此］。然而，神话文本同样表明，这不可能；某处总有某种东西敞开着缺口。

如果从这幅图式出发，我们会看到，问题并不局限于那些本身就让我们轻易把它们同套车图式联系起来的要素：人究竟同谁套在一起？这无疑是选择马这一能指或使用它时最原初的要素之一。这里完全无须辨别配对发生在哪个方向；汉斯采取的方向，也由马的功能为他提供的有利机会决定。可以说，这引导他选择了马。

无论如何，他亲自注意向我们展示它的起源。他告诉我们自己在何时——那同样是一个同父亲对话的时刻，绝非比其他时刻更随意——认为自己“染上了蠢念头”：即 4 月 9 日。后面我们会看到，这句话在什么事情以后出现。他说，当时自己正在玩骑马游戏，发生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它提供某种后来还会重现之物的第一个模型，也就是受伤幻想。这个幻想后来在父亲身上显现，但它起初恰恰从一次骑马游戏的实在中提取出来。

父亲问，当时那匹马是什么样子：它套着车吗？

汉斯回答：“不一定；马可以不套车，这时车就在家里；反过来，它也可以套着车。”

汉斯亲自衔接出：马首先而且根本是一种可以套车、可以移动、可以连接的要素。我们会在马的整个运作中不断重新找到这种可以说是“双向接合器”（ambocepteur）的性质；汉斯从最初经验中提取马时，这个性质便已经给出。马在成为马以前，是某种进行联结和协调的东西。你们将会看到，恰恰在这种中介功能中，我们会在古老神话的发展全

程重新找到马。关于马这个能指的功能，后文将从各方面确认我接下来要展开的内容；若仍需为它奠定基础，这里便已经足够。

汉斯本人的话立刻向我们指出，应当沿着能指的语法协调方向前进。因为正是在他围绕马衔接上述内容的时刻，汉斯本人说："我染上了蠢念头。""染上 / 抓住"（attraper）这个词反复使用；它也绝非用于随便什么东西，而总是用于"蠢念头"，也总是用于"得到孩子"——人们逐字说一个女人"抓到了一个孩子"。

这也不是我从作者——也就是父亲和弗洛伊德——忽略的东西中提取出来的。弗洛伊德就此写过一则很长的注释，每个人都对此感兴趣；它甚至给译者制造了一点困难，而这次得到了十分巧妙的解决［第 133 页］。

汉斯说："一直都是因为马……"（wegen dem Pferd）。他仿佛念叨那句重复出现的话：自己"染上了蠢念头"。

弗洛伊德不会错过这样一个事实：wegen（因为）与 Wägen（Wagen 即"车"的复数变音）之间能够形成语词联想；他指出，无意识正是这样运作的。

> "我必须说明，汉斯不是说自己当时才染上蠢念头，而是说这一切同蠢念头相联。事情必然如此，因为理论要求：今天成为恐怖症对象的东西，以前必曾是强烈快感的对象。这里，我替儿童补上他自己无法表达的内容：'因为'（wegen）这个小词，为恐怖症从马扩展到'车'（Wagen；依汉斯习惯听到和说出的形式则是 Wägen）开辟了道路。绝不能忘记，儿童对待词语远比成人具体；因此，语词之间的同音对他具有完全不同的重要性。"

［德语原句中的 wegen dem Pferd 意为“因为马”；其中 wegen/Wägen 构成谐音，并同 Wagen“车”相连。法译为了重现文字游戏，把它转写成 vois-tu le cheval，即“你看见马吗”。——法译者注，法国大学出版社，1954 年］

换言之，马拖着车，就像某个东西把 wegen 这个词拖在自己身后一样。

所以，我们看出下列一点绝不牵强：正当汉斯受制于某种甚至还不是“为什么”的东西时——一旦越过游戏规则仍受尊重的那个点，剩下的便只有混乱、存在欠缺、理由的欠缺——汉斯仿佛让一个无所回应的“因为”拖在后面；拖着它的，正是作为单纯 x 的那个东西，也就是马。

换言之，在恐怖症诞生、涌现的那个点，我们面对的是转喻的典型过程：意义的重量——更准确说，话语所包含之追问的重量——从文本的一点、从文本的线上，转移到紧随其后的点。

从根本上、也从其结构来看，转喻的定义就在这里：wegen 的全部重量受到遮蔽，并转移到恰好跟在后面的 dem Pferd——马——上；这个词因而在此获得其衔接价值，并承担一切解决的希望。汉斯当时情境的整个豁口，都系于这种语法重量的转移。归根结底，你们在这里重新找到的，只是具体的联想，而非人们想象在某个心理超空间中的联想。这种联想有两类：

- 隐喻性联想：以另一个可以替代某个词的词来回应它；
- 转喻性联想：为某个词提供句子中能够接续其后的词。

心理学实验中有这两类回应；你们把它称为“联想”，是因为无论如何都想让它发生在大脑神经元的某个地方。但我对此一无所知；至少作为分析家，我不想知道。我在它们真正所在的地方找到这两类分别称为“隐喻”与“转喻”的联想：它们就在汉斯浸泡其中的语言之浴的文本里。汉斯也正是在其中找到原初转喻；它提供第一个术语——马——他的整个系统将围绕这匹马重新构成。

第19课 · 1957年5月15日

我们由此抵达时间空间中的这个时刻——它不一定同年代顺序上的距离混为一谈——，

也就是 4 月 5 日至 6 日之间发生作用的时刻。5 日，我们追随小汉斯向父亲解释自己制造的幻想；他在其中表达，自己很想爬上那辆车玩一会儿——车通常正在屋前卸货。

我提醒你们，我们曾经强调：若只从害怕分离的视角来看，汉斯在幻想中赋形的焦虑便具有双义性。我们还特别指出，问题未必在于同母亲分开；这并非他特别害怕的事情，因为父亲一问，他本人便明确说，自己确信、甚至太过确信一定能够回来。

4 月 9 日下午，在解释某个时刻的揭示时，“wegen dem Pferd”［因为马］涌现出来；这个时刻在他看来，说明自己怎样“染上蠢念头”。你们清楚，在记忆的回溯中，汉斯“染上蠢念头”的时刻绝非单义，绝非偶然。

他每次都以同样的确信说：“我染上了蠢念头。”当时，一切都奠基于这句话，因为问题只是一次象征回溯；它关联于马这个能指多价性在每个时刻呈现出的意义。我们已经知道，至少在两个时刻，他说过“我染上了蠢念头”。其中一次，他引出“wegen dem Pferd”；上次我以它作为课程的收束，但为此作了一次跳跃，没有时间向你们显示这项明显的“wegen dem Pferd”转喻在什么语境中出现。它同小汉斯在乡间玩“骑马”时摔倒的故事相关。

另一次，他会说：“我同妈妈出门时染上了蠢念头。”同一段文本指出，这项解释含有悖论：那天他整日寸步不离母亲，恰恰是因为母亲手里已经抱着他那份强烈焦虑。因此，焦虑早已开始；我甚至要说得更多：在陪伴母亲的语境中，马恐怖症已经正式显现。这样，一方面，我们确定了自己在弗洛伊德文本历史中的位置；另一方面，也处在我上次向你们提供的初步解码中——某种东西正在这个层次勾勒出来。

我曾用三种形式向你们画出其图式。况且，这些始终都是他想过、琢磨过的东西，从来不是梦；他总对父亲说：“我想过某件事。”而这件事总带有一种特殊回响。

我们同儿童工作时，已经习惯辨认自己的工作材料，也就是想象材料。我正在试图向你们表明：无论能够从中探测出多少想象回响，都不能替代那一系列结构；今天我会努力把这个系列补充完整。

这些结构全都受到某种东西的标记；例如，它同样标记着：

- 第一个幻想：父亲的追问补足它以后，它大体标示了返回的观念；
- 第二个幻想：在演变的另一个重要时刻，汉斯不无理由地想象父亲同祖母一道离开；随后，隔着一个 gap、一道豁口，小汉斯又同父亲会合。它也可以写入同一循环，但有一个条件：在这里，两个一度分开的人物无法重新会合，这构成一项谜样的不可能。

在进一步探索、确认这里作为对象的能指可能性是否已经穷尽以前——我正是在这个原初层次向你们提供材料——，我已经向你们指出这条谜样回路同另一条回路的相切：

在第一个例子中，它显然引发焦虑；在另一个例子中，它则表现为不可能；

这条回路同由另一套更广阔的交通系统构成的大回路相切。弗洛伊德本人正以这样一个极其准确清楚的公式表述它。

所以，小汉斯既然在交通系统上展开游戏，便会逐渐从马的回路过渡到铁路回路，我们无须惊讶。归根结底，这发生在两种乡愁之间：来临的乡愁与返回的乡愁。返回的功能正是弗洛伊德明确赋予对象的根本功能；他强调，对象只能以重新找到的形式诞生，只有作为应被重新找到的对象，才能在主体发展中构成。

严格说来，必然性同距离、同对象远离的象征维度相关；

但距离是为了重新找到对象。可以说，这项真理有一半遭到回避、甚至丢失，因为《今日精神分析》只强调挫折一词，却没有理解：挫折从来只是返回对象的第一步；为了得到构成，对象必须被重新找到。

让我们回想一下，小汉斯故事中究竟涉及什么。对弗洛伊德而言，问题无非是俄狄浦斯情结。它的戏剧本身为一个完备人类世界的构成带来新的、必要的维度；它也为对象的构成所必需。对象的构成绝非同某种所谓生殖器本能成熟的简单相关物，而在于获得某种象征维度。这里当然预设你们已经熟悉我的论述；但若直接瞄准问题，这种象征维度总而言之便存在于每次我们面对下列情形之处：

- 如同小汉斯病例；
- 也如同我曾向你们列举的其他病例；……也就是恐怖症的出现。

在这里，这一点十分明显。儿童从某个角度或通过某种侧面，看到某种东西向自己揭示出来：

那就是母亲意象带有标记的根本剥夺。这项剥夺变得无法容忍，因为儿童本人受到“最高剥夺”的威胁，恰恰悬系于此：他可能无论如何都无法填补母亲。父亲必须为这项剥夺带来某种东西。

归根结底，这件事简单得就像交媾的一声寻常招呼：那个女人没有的东西，就让他给她！小汉斯的整场戏剧讨论的正是这一点；随着对话继续，我们看到它逐渐出现、涌现并揭示出来。

人们说，汉斯家庭圈子那个今天所谓“环境性”的图景勾画得不够清楚。他们还需要什么？根本不必从字里行间寻找，只需阅读，就会看到父亲勤勉而恒常的在场铺展在整份观察记录中。

母亲只有在父亲询问她刚才讲的是否准确时才被提及；归根结底，她从不陪着小汉斯。可是父亲呢？这位很规矩、很和善、非常维也纳式的父亲一直在那里，不只尽心呵护小汉斯，还亲自做全部工作；当然，每个星期日还带小汉斯去看望自己的母亲。

我们不能不惊讶于弗洛伊德多么轻易地接受了下面这一点——我们知道他当时有哪些可以说是占主导地位的观念：小汉斯一直住在父母房间直到四岁，却肯定从未看到任何可能令他对性交的根本性质感到不安的场景。

父亲在记录中断言：“弗洛伊德没有讨论这个问题；他对此大概自有看法。”

说实话，我们即将看到那场重要对话。小汉斯在那里仿佛对父亲说："你必须……"弗利斯的儿子为了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个场景，曾指出它无法译成法语；他的结论不见得完全体面，但评论相当正确，强调这个表达近乎不可译。我们可以借妒忌之神的回响来传达它；在弗洛伊德学说的理论中，这位神同父亲形象相同："你必须成为一个父亲，你一定怨恨我。"

这一切必然是真的；但等他抵达这里以前，还要经历许多事情，也需要一段时间。因此，我们立刻提出一个问题：小汉斯在这场危机中，是否在这一点上以任何方式得到满足？如果他的父亲处在某个关键位置，为什么他会满足？这个位置在背景中的浮现，应当被我们理解为开启恐怖症幻想及其功能所由涌现之裂口的根本要素。

绝非不可想象的是：正是这场对话可以说分析的不是小汉斯，而是他的父亲；因此，整个故事在四个月内相当顺利地结清时，父亲比开头更加具有男性气概。换言之，尽管小汉斯如此强烈地向这位实在父亲发出呼唤，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会真正使实在父亲涌现出来。

因此，如果小汉斯顺利解决了自己进入的危机，我们也值得尝试追问：危机结束时，我们是否能够认为，他走完了一场完全正常的俄狄浦斯情结？他抵达的生殖器位置本身，是否足以保证他将来同女人的关系会成为人们所能想象的最理想状态？

问题仍然开放；不仅如此，你们还会看到，我们可以在这片开放中提出许多评论。我现在已经指出：小汉斯即使可以说注定成为异性恋者，这项保证也许仍不足以让我们认为，单凭异性恋就足以确保女性对象具有某种充分的一致性。

你们看到，我们不得不通过一种同心式的触探前进；我们要把画布和画面张在悬挂它的不同极点之间，使其正常固定。这是一块屏幕；我们要继续在上面追踪某种特殊现象，也就是治疗本身的相关发展——恐怖症的发展。我忽然想起一个小例子，它为父亲在故事中那种“气喘吁吁”的面貌赋予生气，也让我们正在进行的探究更鲜活。小汉斯同父亲围绕马作了漫长解释，他们为此花了整整一上午；吃午饭时，汉斯对他说：“Vati, renn mir nicht davon!”法译依然不可抗拒地带着某种我也不知是什么的厨娘腔，给出这样一句不能说错的译文：

“你为什么这样一溜烟跑开！”

父亲强调，自己当时被这个表达触动。

“你为什么这样撒蹄子跑了！”

还可以补上一句，因为德语容许这样表达：

“你为什么这样从我这里撒蹄子跑掉！”

确实，我们必须把能指分析的问题提升到对象形文字般的解码层次，

提升到这种神话功能的层次；但这并不意味着，把注意力投向能指以后，就不必首先懂得阅读。显然，懂得阅读正是正确翻译的绝对先决条件。弗洛伊德著作在法国读者那里无法产生应有回响，这一点令人遗憾。

这样，我们便同这位父亲一道来到这里；我们几乎已经在图式中写下他应当是什么、应当占据什么位置。小汉斯理应通过他、穿过他、通过同他认同，找到通往那条更大回路的正常道路；如今，他该过渡到

那里了。3 月 30 日那场咨询仿佛把这一点加倍呈现：父亲带小汉斯去见弗洛伊德。这个著名场面呈现父子二人相互面对；我认为，它说明父亲功能的二重化乃至三重化。我反复强调，理解俄狄浦斯以及分析治疗本身都离不开这一点，因为分析治疗会把父之名投入运作。面对弗洛伊德，父亲代表超级父亲、象征父亲；而我必须说，弗洛伊德简直就是这个位置本身。他还不无幽默地亲自强调这一点：他作出预言，仿佛一开始就直接处理俄狄浦斯图式。

小汉斯带着某种觉得有趣的兴味听着，语气简直像在说："他怎么会知道这一切？教授总不会是上帝的知心人吧！"在整份观察中，小汉斯同弗洛伊德这位遥远父亲的关系始终由一种严格说来幽默的关系支撑；它同样富于示范性，并同时标示：

这个超越性维度何其必要；可是，若总以恐惧和敬重的风格把它体现出来，又会错得多么离谱！另一种界域同样富有成效：弗洛伊德的在场让小汉斯能够把自己的问题铺展开来。

不过，我已经告诉你们，与此同时还有别的事情发生，而且对小汉斯的进展更有分量。请阅读观察记录，你们会看到，父亲在 3 月 30 日星期一带他去见弗洛伊德；父亲的报告标出两件事。可是，他把两件事都写进序言，使它们各自的准确功能略微模糊；第二件事其实发生在咨询以后，是小汉斯从咨询处回来时作出的评论。

小汉斯的父亲在观察中当然没有贬低这两个时刻的重要性。刚出发时，小汉斯向父亲讲述自己同他一起作出的越界。因为当天是星期一，前一天星期日去看望祖母时，他们还到美泉宫散了会儿步。不能用别的方式称呼它，因为这就是越界本身的图像；再没有比这更纯粹

的越界：两个人一道从一条绳子下面钻了过去。父亲解释这条绳子是什么；当时，小汉斯在美泉宫花园里问他：

- “这根绳子为什么在这里？”
- “为了不让人走上草坪。”父亲回答；汉斯接着问：
- “那么，什么东西不让人从下面钻过去？”父亲回答：
- “有教养的孩子不会从绳子下面钻过去，尤其当绳子正是为了表示不应越过时。”

汉斯立刻以这个幻想回应：

- “可是，我们一起越界吧。”

这个“一起”格外重要。然后，他们会对看守说：“这就是我们干的事。”啪的一下，看守便把两个人一道带走。这个幻想在其语境中的重要性应当已经足够清楚。问题确实在于：过渡到父亲的界域，并做出某件把他们一起带走的事。由此，未能一同登程的问题也得到照亮。

当然，必须把图式倒过来看，才能理解它；能指的本性正是以严格操作性的方式呈现事物。整个问题都围绕一同登程展开：关键在于，他是否会

同父亲一道登程。事实上，他不可能同父亲一道登程，因为父亲恰恰无法运用这项功能；至少，它没有在共同登程中实现。我们会看到，小汉斯随后一连串的加工将有什么作用：它们让他接近这个既被欲望、又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不过，这条道路已经在我刚才解释的第一

个幻想中起步；它恰好发生在弗洛伊德咨询以前，这一点足以提供提示。

现在来看第二个幻想，仿佛必须确保我们无法忽略两条回路的交互功能：

- 母亲的小回路；
- 以及父亲的大回路。

幻想进一步接近那个目标［……］晚上从弗洛伊德那里回来时，小汉斯在火车上同父亲一起，再次作出一项越界。没有比这更恰当的说法：他打破了一块玻璃。再没有比它更适合充当“向外突破”的能指；两个人又一次被一道带走。这再次构成小汉斯幻想的尖端和终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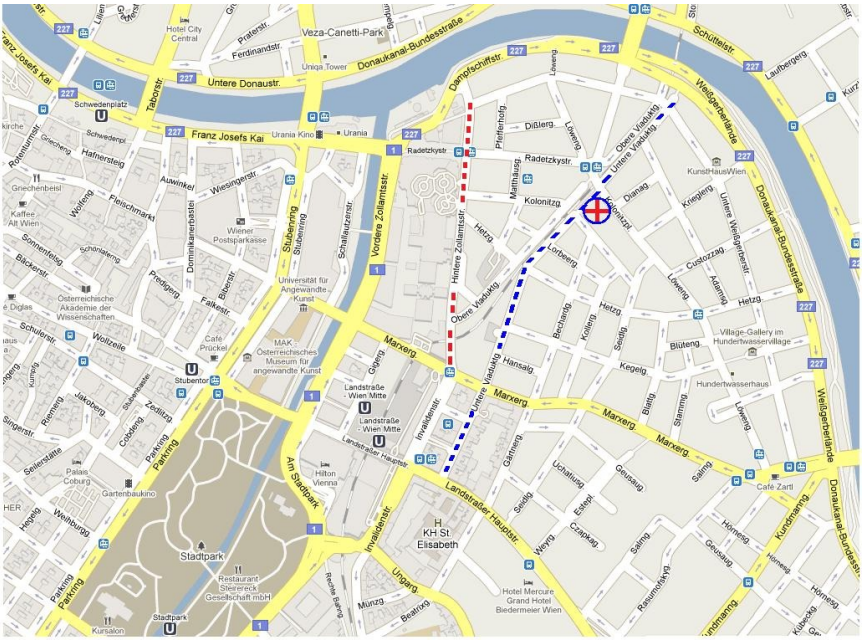
4 月 2 日，也就是咨询三天以后，我们看到第一次好转。不过，我们怀疑父亲也许稍稍助推了报告，因为汉斯痊愈以后，父亲亲自向弗洛伊德更正：

“这次好转也许不像我告诉您的那样显著。”

尽管如此，小汉斯那天仍开始表现出一种腾跃：他能够在车马门外多走几步。在当时语境中，这扇门有其特殊功能。不要忘记，它正代表家里讲究的体面与规矩。准备换住处时，母亲说：“换一层楼没什么，但车马门是你欠儿子的！”

因此，车马门在小汉斯相关事物的拓扑中绝非无足轻重。正如我上次所说，车马门及其标示的边界，又逐点受到更远处某种东西的复写——也许没有我上次讲得那么近，但仍能从正面望见：那就是城市铁

路车站的入口；火车从那里开出，定期驶往祖母家。上次，凭借仔细取得的资料，我曾画过一幅小图，把小汉斯父母的家标在海关街［Hintere Zollamtstrasse，红色虚线］。这并不完全准确；我之所以发现错误，是因为某个东西再次向你们揭示：人对眼前之物可以何等盲目——它就叫作能指、字母。



弗洛伊德在观察记录中提供的图本身便写着街名：下高架桥巷（Untere Viaductgasse，蓝色虚线）。还有一条被遮住的街道，让人推测铁路一侧有一座小建筑；它标在维也纳地图上，对应弗洛伊德所谓 Lagerhaus，也就是专门就食品进入维也纳征收关税的仓库。

这同时解释一切联结：北方铁路轨道就在这里，轨道小车将在汉斯幻想中发挥某种作用；弗洛伊德所说的仓库恰好位于房屋对面；同时，这栋房子仍能清楚看见车站入口。

这样，布景中的舞台已经搭起；小汉斯富有诗意——愿意的话也可以说富于悲剧性——的精神，会让我们追随这场戏剧的建构。

我们如何理解，过渡到一条更大的回路，对小汉斯竟成为必需？

不要忘记，我已经反复告诉你们：这关联于既有关系中的把持点，也关联于他同母亲关系中出现的僵局；观察每时每刻都对它有所指示。迄今为止，母亲一直为儿童确保世界中的支撑和嵌入；这正构成危机的底色。小汉斯的焦虑使他一旦离开某个范围，就无法让自己的家从视野中消失；我们可以在这种焦虑中逐字把握上述危机的翻译。

由于受到若干占主导地位的意义纠缠，我们往往看不到那些以最明显方式写在文本中、得到传达和衔接的东西；恐怖症这种症状恰恰浮在能指表面。小汉斯准备登程时焦虑地回头张望自己的家；为什么不按照它呈现的方式直接翻译？

他害怕的，不只是回家时某个人会不在那里。更何况，父亲——而且母亲似乎也用力助推了这一点——并不总在回路内部。小汉斯走到这里时，问题已经像他关于车的幻想所表达的那样：

整座房子可能一道离开。

根本问题在于房子。从他理解母亲既可能让他感到欠缺、自己又始终同她完全连在一起的时刻起，受到质疑的就是房子。他害怕的并非同

母亲分离，而是同她一起被带到天知道什么地方。在观察记录中，这一要素每时每刻都浮现出来：只要他同母亲连在一起，便不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们在观察的每个时刻都能感到这一点。

这里只需提到这样一个事实。某天——这是我刚才强调必须注意的第二个时刻；小汉斯也许有些任意地在这里确认“蠢念头”——他同母亲在一起。他明确说：“我们刚买完背心，便看见一匹拉公共马车的马倒在地上。”他正是从这些公共马车里面看马。

如果我们不只是任意观看观察，仿佛把浸入水中的日本纸花重新泡开，而是再加上一点别的东西，那么只需追随父亲的好奇心即可。父亲此时问他：“那天你妈妈做了什么？”于是我们看到当天的安排：他们去买了背心，紧接着马倒下；最后——这同我们迄今追踪的内容形成鲜明断裂——他们去了糖果店。

“整天同妈妈在一起”这个事实似乎表明，这里不是儿童留下的洞或审查，而无疑是一项指示：当时发生了某种事情。它使汉斯特别强调，自己的确“同妈妈在一起”，并没有同某个也许正在周围打转的别人一起。

小汉斯话语中的“同妈妈一起”，同开头人们问到玛丽德尔时具有完全相同的强调价值；他特意说：“不只是同玛丽德尔，而是同她完全单独在一起。”二者无疑发挥同一种作用。父亲一方面把追问推得相当远，另一方面又仿佛很快放弃；他的语气所透露的东西，会在稍后得到进

一步确认。就在这以后，小汉斯到床上找父亲；谈话中，他向父亲指出，也许父亲本人会离开。

- “谁说过我可能离开？”
- “从没有人告诉我你会离开；但妈妈有一天说过，她会走。”

为了填塞这个深渊，父亲回答：“她一定是因为你不听话才这样说。”

我们当然不能把这里的警探式调查推得更远；但某种东西始终在那里，恰恰强调：对小汉斯而言，受到质疑的是父母婚姻的稳固性。观察的事后追踪会把这件事彻底解开。焦虑正盘踞在这里；它同母爱一道把他裹挟，其在场从第一个幻想便已经充分显露。

马在这里具有两项性质：一方面，它代表威胁小汉斯的倒下；另一方面，它以咬表达危险。我们难道不应当被这次咬击触动吗？我已经向你们指出，随着危机开启，小汉斯显然再也无法满足母亲；那么，咬击岂不正是报复？

这里包含一种情形，它在“施虐冲动返回”的观念中以混沌方式得到使用；你们知道，这个观念在克莱因派主题中极其重要。不过，问题也许并不完全等同于我曾指出的那种儿童借以压碎爱的失望的东西。

反过来，如果是他让母亲失望，他怎么会看不见自己也可能被吞没？母亲恰恰因为受到剥夺而变得越来越具有威胁，也越来越无法把握，因为他同样无法咬她。马是“倒下”的代表，

也是“咬”的代表；这是它的两项性质。我在这里特意指出这一点，因为在第一条回路中，咬的要素仿佛只受到回避。

不过，让我们继续推进。今天分别以前，我们先为后文标出断句；此后仍会逐一回到小汉斯的一连串幻想。我们还要从某个时刻开始——届时需要单独考察它怎样来临——处理另一些幻想；它们仿佛为我所谓一连串神话置换加上标点。

你们必须清楚地理解，在这里的个体层次上……

神话固然由于各种性质，绝不能完全还原成同一套发展完备的神话体系完全相同；后者奠定世界上一切社会基础，只要神话以其功能在场，便是如此。不要以为，即使在我们的科学文明中，神话表面上缺席，它们就没有藏在某个地方……然而，在个体层次上，神话发展的这种性质仍然得到维持。总而言之，我们必须把它的功能理解为：在一个封闭而陷入僵局的情境——例如小汉斯被夹在父母之间的情境——中提供解决。

凡是我们能够充分把握之处，神话都会以缩影形式重现神话发展的这种根本性质。总而言之，它通过依次衔接情境的一切不可能形式，来面对一个不可能情境。正是在这里，神话创造可以说回应了一个问题：它走完某种东西的完整圆周；这个东西既呈现为可能的开口，又呈现为无法走入的开口。回路一旦走完，某种东西便得到实现；它意味着主体已经抵达问题的层次。

正因为如此，汉斯是神经症者，而不是倒错者。下次我会向你们表明，究竟什么让我们可以逐字这样说；把他演变的这个方向同另一个可能方向区分开来，绝非人为。观察本身就指出这一点；我下次会向你们展示：在母亲衬裤成为问题的时刻，发生的一切都以负片形式标示汉斯本可能采取的、通往恋物癖的道路。

小衬裤出现在这里，正是为了向我们呈现另一种本可能的解决：汉斯本可以依附于这条小衬裤；它背后什么也没有，但他原本能够随心所欲地在其表面画上一切。

恰恰因为小汉斯不是一位单纯的自然爱好者，而是一位形而上学家，他才把问题带到问题真正所在之处：某种东西有所欠缺的点。他要求这项欠缺的理由——请按照“数学比率”中的“比”来理解这个词——就位于它真正所在之处。

他会像任何一个原始部落的集体精神一样严谨行事：使用一组经过选择的能指，走遍一切可能的解决。永远不要忘记：能指并不是为了在同所指的关系中代表意义而在那里；它更主要是为了填补某个毫无意义的情境中的豁口。正因为意义逐字说来已经丢失，线索像《小拇指》故事中那样遗失，能指的石子才纷纷涌现，填补这个洞与空无。

因此，今天我只会紧扣这些幻想的后续。上次已经举过三个例子：卸货坡道前的货车幻想、在格蒙登未能下火车的幻想，最后还有同祖母从莱因茨离开、随后返回父亲身边的幻想——尽管后者明显不可能。

我们会看到另一整串幻想。如果懂得阅读，它们就会以某种方式彼此覆盖，并且恰恰改变各要素之间的置换，从而说明我正在讲的内容。

为了立刻让你们看出过渡发生在哪里，先讲第一个幻想。它位于父亲与小汉斯对话进程相当靠后的时刻：浴缸幻想。每个人都带着一种混沌的怜爱俯身凝视它，仿佛认出某张熟悉的脸，却又完全说不出是谁。

浴缸幻想是这样的：汉斯在浴缸里面……我已经讲了足够多，能让你们感到，“在浴缸里面”同相关的“在车里面”靠得尽可能近；换言之，它们都接近那个根本的“在房子里面”，也就是同某种总可能从母亲支撑平台上溜走的东西保持连接、联结……这时，有人走进来；他显然以某种形式成为这里受到等待的第三项。走进来的人当然是水管工；他把浴缸旋松拆下。记录没有告诉我们更多。

他把浴缸旋松；然后拿钻头（Bohrer）在小汉斯肚子上钻孔。弗洛伊德在这里引入它同　geboren（出生）之间可能存在的双关，却没有解决。按照我们惯常使用的解释方法，人们立刻试图强迫材料；天知道能就此说出什么。无论如何，父亲马上从中看到一种关联：母亲床上通常发生的场面——小汉斯把父亲赶走，以某种方式取代他；接下来在这个幻想中，他便成为父亲攻击的对象。

这一切从根本上说当然并非错误；不过，如果严格停留在材料层次，我们会说：假如浴缸回应的是某种必须克服、同小汉斯的连带关系，那么，浴缸被拆下螺栓这个事实无论如何值得保留。

另一方面，在这个层次，小汉斯本人在幻想中肚子被钻穿；我们同样必须保留它，把它看作对某种置换系统的回应：最终，是他亲自承担母亲的洞。这个洞恰恰是深渊，是受到质疑的关键而最终之点；它是不可观看之物，是以永远无法把握的黑色形式浮在马脸前的东西，而且恰好位于马会咬人的地方，也就是大约那里。迄今为止，它正是不可观看的东西。

我说它不可观看时，小汉斯本人也这样说。请回到母亲衬裤成为问题的时刻，你们会看到：父亲不顾常理地追问小汉斯；面对父亲的一切

提示，汉斯只带来两个要素。我下次回到这个时刻的分析时，会告诉你们第二个；第一个是：

- “你要写信给教授，告诉他我看见了衬裤，我吐了口水，我倒在地上，还闭起眼睛不去看。”

在浴缸幻想的层次，小汉斯仍然不看，却承担了那个洞、也就是母亲的位置。我们恰恰处在倒转的俄狄浦斯情结层次；从能指这一特定视角看，我们会发现，它何其必要，简直就是正向俄狄浦斯情结的一个阶段。

接下来发生什么？在后续幻想之一中，我们回到另一个位置，也就是所谓轨道小车幻想：

小汉斯化为一个清楚可辨的男孩形象，整夜赤身裸体地待在轨道小车上。这件事相当双义：他爬上小车，被人赤裸裸地留在那里整整一夜；这既是欲望，也是恐惧。它严格关联于那场我称为关键、稍后还会回到的对话；他当时对父亲说：“你在那里，像一个浑身赤裸的人。”

弗利斯在我提过的文章中，强调儿童这个词语具有刀锋般的性质，仿佛他突然掌握了《圣经》的精神。说实话，这让每个人困惑，以至于大家急忙填补豁口，在括号里写：“意思是他一定赤着脚。”弗利斯十分正确地指出，这个词的风格值得注意；它紧接着又一次召唤父亲的时刻出现：“做你该做的事。”

母亲怎样得到满足，是一种最终无法看见的东西；但她至少应当得到满足：“你必须去做，这件事必须完成。”这个“必须完成”的意思

是："做一个真正的父亲。"小汉斯刚刚艰难地产出这个公式、指出现实中受到召唤的东西，紧接着就在幻想中酝酿：自己在轨道小车上度过整夜，走上铁路这条更大的平面与回路。他在那里整夜停留；而直到那时，他同母亲的关系一直靠迅速完成的短暂关系维持。他此前欲望的正是这种短暂关系。在我所说的那场对话中，他还向父亲解释这一点；他继续幻想，说：

- "你应当去把脚撞在什么东西上，受伤、流血，然后消失；这样我就刚好有一点时间待在你的位置，不过你还会回来……"

由此，人们就能重新找到所谓"同母亲进行原初越界游戏"的节奏；它恰恰只能靠这种秘密性得到支撑。在幻想中，小汉斯这次在轨道小车上度过整夜。第二天早晨，人们付给司机五万古尔登——在观察发生的时代，这是一笔分量十足的钱——让他准许男孩坐同一辆小火车继续旅行。

还有另一个幻想；它在这个故事中似乎是最后一个，是顶峰和终点，也是小汉斯用来结束的一幕。这次来的不只是水管工，而是安装工；他带着钳子，更加凸显旋松拆卸的性质。因为前面确实出现过一种尖头工具——钻头（Bohrer）——就把这里译作"螺丝刀"，并不准确。Zange 就是钳子；被旋下来的是小汉斯的屁股，以便给他换上另一个。

这样，又跨出了一步。这个幻想同前一个浴缸幻想的叠合相当明显，因为小汉斯本人以最准确、最完整的方式衔接了屁股同浴缸在时间中的关系。维也纳家里的浴缸恰好能被他的小屁股好好填满；他的分量足够。整个问题就在这里：他的分量到底够不够？在这里，他填满浴

缸，甚至不得不一直坐在里面。只要换到浴缸远不能提供同样保证的地方，吞没和焦虑的幻想就会再次出现，使他断然拒绝在别处洗澡。

这里当然不是所指之间的等价；不过，屁股被旋下的图式，

同先前浴缸被旋下的图式相互叠合。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在那个开口层次；那里涉及

某种同货车相应的东西，同时又有所改变：货车同临时贴靠的坡道分离时，可能或快或慢地启动，也可能启动或不启动。

我把最后这个幻想补充完整：据说，安装工随后对小汉斯说："转到另一边去，把你的撒尿器给我看。"撒尿器在这里是那项不充分的现实，因为它没能诱惑母亲。每个人都由此补足解释：安装工把它旋下来，为他换上更好的。不幸的是，文本中没有这句话；归根结底，没有任何东西表明小汉斯可以说在能指层面完整走过阉割情结。如果阉割情结是某种东西，它就在这里：某处没有阴茎，但父亲能够给出另一根。我们还要说得更多：只要过渡到象征秩序是必要的，阴茎就总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先被取走，再被归还。当然，它永远无法真正归还，因为按照定义，一切象征之物都完全没有能力把自身还回去。

阉割情结的戏剧正盘踞于此：阴茎只能在象征层面被取走、被归还。可是在这个病例中，我们看到它在象征层面被取走，却没有被归还。因此，问题在于：走完这整圈在何种程度上已经足够？从考试的角度说，效果是等价的。他多走了一条回路；

而它单凭构成一个循环、一条回路，就足以把某种东西归还给他；它确保这场通过仪式即使没有完全完成，也具有同等价值。无论如何，

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只有严格留在能指清单［……］这个场域中，我们才能推进自己对症状形成的理解。

分别以前，我想让你们注意一件事，因为我总想用一处令你们发笑的锋芒结束：在这一切中，那把所谓螺丝刀、那把钳子究竟是什么？整个故事从来没有提过它；父亲也从未说："人们会把它重新旋上。"那么，它从哪里来？仍然只需停留在能指层次，我们就会看到：安装工在为他旋下屁股时，究竟带什么工具介入。

所以它毫无疑问是一把钳子或夹钳。我早年对马有一点经验：马可能用来咬小汉斯手指的那种大牙，在各种语言中都叫作"钳齿"（pinces）。不仅牙齿这样称呼，马蹄前端——马用它完成那些小动作——在德语中也称作一把"钳子"。

因此，这个东西意味着钳子，而且在法语"钳子"一词的两种意义上都意味着钳子。我还要再说一点：希腊语 χηλή（kélê）具有完全相同的意义。当然，我并非从一本根本不存在的希腊语锁匠手册中翻到它；我偶然在欧里庇得斯《腓尼基妇女》的序幕里读到。伊俄卡斯忒在讲述安提戈涅的整个故事以前，先提供了一个关于杀戮时刻的奇怪细节：她像我建构这些小铁路网与维也纳大街一样细致，清楚说明两个人各自从哪里前来——他们在十字路口相遇，都正前往德尔斐。

这时，谁应当先行的争执爆发：一个坐着大车，另一个步行。双方进退、拉扯；最终，更强的那个人——也就是俄狄浦斯——抢到前面。就在这个时刻——这个细节我在别处没有见过——伊俄卡斯忒特意指出，争执之所以再次激化，是因为一匹骏马用它的蹄，即 χηλή，撞到了俄狄浦斯的脚后跟。

因此，他的脚仅仅由于穿过脚踝的那枚小钉而肿起，还不足以让他完成命运；他的脚还必须——恰如小汉斯父亲的脚——被马蹄打伤。而这只蹄在希腊语、德语和法语中都叫“钳子”，因为 χηλή 同样表示钳子或夹钳。

这是为了向你们表明：当我说小汉斯幻想建构的一连串进程始终使用并转动同一批材料时，丝毫没有夸张。

第20课 · 1957年5月22日

襁褓中的婴儿

“啊，海上诸城，我看见你们的男女公民，被听不懂你们语言的人用坚固绳索紧紧捆住手脚；你们只能彼此以含泪的哀诉、悲叹与叹息，吐露自己的痛苦与失去自由的遗恨。因为捆绑你们的人不懂你们的语言，正如你们也不懂他们。”

列奥纳多·达·芬奇《笔记》，《大西洋古抄本》145 r. a.，伽利玛版第 2 卷，第 400 页。

几个月前，我从列奥纳多·达·芬奇《笔记》中摘出这小段文字，后来完全忘了；如今看来，它很适合为今天的课程开场。当然，这段相当宏伟的文字只应当作为暗示来理解。

今天，我们重新阅读小汉斯的文本，并尝试听懂小汉斯用来表达自己的语言。上次，我向你们标出能指发展的若干阶段；

它使我们把一个谜样中心——恐怖症所包含的马之能指——看作过饱和溶液中的结晶核：它的功能正是如此。

相关知识卡 小汉斯的马：恐怖症作为防护构筑与能指替补

总而言之，正是围绕马这个能指，小汉斯故事中的神话发展才成长起来，绽放成一株庞大的树状结构。现在，我们要立刻把这棵树重新浸入小汉斯切身经验的浴液，考察树的生长发挥了什么作用。我还要指

出，我们即将对小汉斯取得的进展作一番总结；这份总结会趋向什么结论。

它会立刻向你们表明：这里讨论的是被放进一种进步叙事中的客体关系；可是，在小汉斯经历俄狄浦斯的同时，观察记录中没有任何东西指示我们，应当认为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完全令人满意。

我要说，观察开头强调了小汉斯身上的某种东西，不妨称作一种早熟。不能说他当时尚在俄狄浦斯以前；反倒无疑接近出口。换言之，小汉斯体验自己同小女孩关系的方式，已经像观察所强调的那样，具备一种关系的所有高级特征。我们不会称之为成人式，但它已经同成人关系形成一种十分鲜明的类比。说到底，连弗洛伊德本人都把他描写成一位快乐的诱惑者。我有一次在这里不小心说出一个复杂、甚至唐璜式而专横的词，令某些人大为震惊；但这个词恰好刻画小汉斯那种早熟态度，仿佛显示他正在进入对实在语境的愉快适应。可是到最后，我们反而看到什么？

不得不说，到了最后，我们仍会在小汉斯的内部世界中找到同样的小女孩。但只要阅读观察记录，就不能不震惊于：她们不仅变得更加想象性，而且真正彻底属于想象界。她们是小汉斯与之交谈的幻想，并且关系已明显改变；她们更像是他的孩子。

如果危机解决为小汉斯将来同女人的关系留下的矩阵就在这里，那么，我们当然可以说，从表面看来，他的异性恋已经充分确立；但这些女孩仍会带有某种标记，可以说，那是她们进入小汉斯力比多结构之方式留下的烙印。我们甚至会详细考察她们怎样进入。她们相对于

小汉斯的位置具有自恋风格，这一点无可辩驳；我们还会更仔细地看到，是什么决定并安置这个位置。

小汉斯当然可以说会爱女人；但女人在他那里始终根本关联于某种对自身力量的检验。正因如此，一切都表明，他永远不可能不害怕她们：可以说，她们会成为他的女主人。她们将是、也始终是“他精神的女儿”；你们还会看到，她们是从母亲那里夺来的。不过，小汉斯在女性对象关系之外所完成的［……］当然并不止于此。

这是为了向你们显示、至少指出这类研究的兴趣所在。当然，必须重新走一遍我们的道路，才能确认结论。既然我们把小汉斯神话的能指构造时间作为参照点，就必须确定所发生之事的不同阶段，也就是他的进展。

我们讨论神话性能指形成各阶段之间的客体关系。哪些对象先后进入小汉斯兴趣的前景？在这段格外活跃而丰饶的时期——小汉斯同自身世界的关系经历某种更新和革命——，所指一边相应发生了什么进展？我们能否同时把握某种东西，从而理解那些以幻想形式出现的连续结晶究竟怎样划分节奏？

毫无疑问，它们是能指配置的连续结晶。上次我已经向你们显示它们具有共同图形：至少让你们初步看出，在这些连续图形中，同一批要素如何彼此置换；每一次都更新能指配置，同时从根本上让它保持原样。

4 月 5 日出现我所谓“返回”的主题。它当然不是汉斯主要解释的内容，却构成背景。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离开的主题；更准确说，是同货车保持令人焦虑的连带关系的主题。Wagen　停在出发坡道边；小汉斯的

幻想逐渐把它展开，因为它并非一开始就这样呈现。父亲的追问帮助他承认自己的幻想，同时把幻想说出来、组织起来；就在我们能够看见它们时，他也向自己揭示它们。

4 月 11 日，我们看到浴缸幻想出现：浴缸被旋松拆下，小汉斯在里面，肚子上有一个大洞；我们曾围绕它勾画出大致轮廓。两者之间发生了什么？

4 月 21 日，我们找到一个可以称作“同父亲重新出发”的幻想。它明显被呈现为幻想性的和不可能的：父亲抵达以前，他已经同祖母离开；等父亲追上时，天知道发生了什么奇迹，小汉斯竟又在那里。事情就是按照这个次序呈现。

4 月 22 日，小汉斯独自坐着轨道小车离去。还有另一件事大概会标出我们今天所能抵达的界限。

4 月 5 日以前涉及什么？从 3 月 1 日到 4 月 5 日，根本而唯一的问题是阳具。

父亲围绕阳具作出评论，向汉斯提示恐怖症的动机：恐怖症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他触摸自己、因为他手淫。父亲还更进一步，把汉斯害怕之物的恐怖症同这个阳具等同起来；这使小汉斯反驳说，阳具——“Wiwimacher”，也就是阳具在小汉斯词汇中得到书写的准确术语——不会咬人。

我们由此走进将支配小汉斯同父亲整场对话的种种误解。事实上，会咬、会伤人的东西所涉及的恰恰是阳具。这一点如此真实，以至于有

一位并非精神分析家的人——一位在神话问题上钻研得相当深入的神话学者——读过我交给他的这份小汉斯观察以后，对我说：

> “格外醒目的是，在整份观察的发展下面，仿佛始终潜伏着某种功能；它不是‘有齿阴道’（vagina dentata），而是‘有齿阳具’（phallus dentatus）的功能。”

当然，整份观察恰恰在误解的界域中展开。我要补充：两个主体之间任何创造性解释，通常都是这样；解释正是以这种最不反常、完全可以预期的方式发展。而富有成效之物会恰恰在这道误解的豁口中成长。父亲同汉斯谈论阳具时，讲的却是他的实在阴茎，也就是他正在触摸的那一根。

父亲当然没有错，因为年轻主体开始具有勃起的可能，并因此体验一切新鲜情绪；这无可争辩地改变了他全部关系的深层平衡——

这些关系指向当时构成其世界稳固点、固定点与全能点的东西，也就是母亲。

另一方面，还有某种东西发挥主导作用：根本焦虑突然发生，让一切动摇，以至于任何东西都更可取——哪怕锻造一个本身完全封闭的焦虑意象，例如马；它至少在焦虑中心标出界限和参照。在这幅意象中，为咬击和攻击打开大门的是另一个阳具——母亲的想象阳具。正是通过它，小汉斯无法忍受的恐怖症才会开启。迄今为止，他一直玩着展示

或不展示阳具的游戏；他把一项自己早已完全清楚并不存在的阳具拿来游戏，而这正是他同母亲关系中的赌注。

这场诱惑游戏不只同母亲建立，也同所有小女孩建立；他同样非常清楚，她们没有阳具，却又要维持“她们毕竟还是有一个”的游戏。迄今为止，整个关系都把他推到这个层面；它不只是在最直接意义上利用诱饵，也是在同这个诱饵做游戏。

请记住观察第一部分末尾的那个幻想；此后恐怖症才正式显现。小汉斯把它同父母联系起来。严格说来，它几乎是唯一并非幻想的“幻想”：这是一个梦，是一种游戏。儿童把某件东西藏在手里，玩一种罚物游戏；游戏结束后，他获得了让一个小女孩叫他撒尿的权利。

此时，弗洛伊德和观察记录都强调，这是一个听觉梦。在同小女孩最初那种窥视癖关系底部的展示与观看游戏中，被说出的要素、已经过渡到象征符号和言语中的游戏，难道不早已占据主导地位吗?

最初这段时期，每当父亲试图引入阴茎的现实，并告诉汉斯当前究竟应当怎样对待它——也就是不要触摸——，小汉斯便以自动般的严谨，把上述游戏主题重新推到前景。

例如，他立刻讲出自己同母亲在一起、母亲只穿衬衣却浑身赤裸的幻想。父亲因此问：“但她究竟是全裸，还是穿着衬衣？”这并没有难住小汉斯：她穿的衬衣短得刚好可以看见她全裸；也就是说，恰好能够看见，当然也恰好不能看见。你们会认出边缘或饰边的结构；它是恋物式把握的典型特征。

问题总在这样一个点为止：人能够稍稍看见，却看不见即将显现之物。母亲关系中隐藏的东西由此受到唤起：那个并不存在、却仍必须装作在场而拿来游戏的阳具。这一点还凸显当时发生的事情：父亲坚

持以实在术语谈论阳具，带来一项扰乱性要素；这里正是对它的防御。

在这个幻想中，小汉斯召来一个见证者，也就是一个叫格蕾特的小女孩。她取自他随身的“行李”、取自他的私人世界，属于那些同他继续保持想象关系的小女友；不过，他当时追逐的都是完全实在的人物。她叫格蕾特并介入这个幻想，并非不值得强调，因为我们以后还会重新找到她。在幻想中，她被召来见证母亲与汉斯正在做的事情；汉斯还仿佛偷偷地飞快插入一项事实：自己很快稍稍摸了一下。

这总而言之形成一种妥协。也就是说，在同母亲的阳具关系背景上，一切可能介入的新东西都必须被纳入：不仅是他的阴茎实际存在这个事实，也包括父亲正试图在这里把他带向什么。观察所勾画的 4 月 5 日以前整个时期，都逐字受到这种必要性的构造。

我说 4 月 5 日以前的整个时期，当然不表示那里只有这项内容。3 月 30 日同弗洛伊德咨询前后，还会出现第二种东西。这个层次出现的内容当然不完全人为，因为正如我曾向你们指出的，它已经由小汉斯父亲参与那些幻想所预告；汉斯仿佛在其中召唤父亲前来帮助。

因此，从 3 月 1 日到 3 月 15 日的格蕾特与母亲幻想，首要问题是实在阴茎与想象阳具。3 月 15 日到同弗洛伊德咨询之间，父亲试图把阳具彻底带入现实；他向汉斯指出，大动物有大阳具，小动物有小阳具。这当然促使小汉斯说：“我的牢牢长在这里，它还会长大。”我刚才向你们指出的同一图式再次出现，也就是某种反应。

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说，此时父亲试图让阳具完全实在化；小汉斯的反应再一次不是认可自己明明已经接触到的内容，而是锻造出两只长颈鹿的幻想。它的根本内容在 3 月 27 日显现：

即对母亲阳具的象征化。母亲阳具清楚地由小长颈鹿代表；小汉斯一边受到想象性依恋的牵引，一边又通过父亲的话受到实在的坚持，夹在两者之间；

于是，它开始走上一条道路，将为恐怖症神话此后的全部发展划定节奏与图式：想象项将为他变成象征要素。

换言之，在客体关系中，我们绝未看到一条直接道路，能通往新实在的意义，仿佛只凭单纯的象征工具，就能获得对实在的操作。恰恰相反，至少在小汉斯这场危机阶段——分析理论把它标作俄狄浦斯阶段——，只有重新激活一切最具想象性的要素，只有付出对主体最初把握方式作出真正想象退行的代价，实在才能在新的象征配置中重新排序。

在小汉斯神经症——我指幼儿神经症——最初几步中，我们便得到它的模型和图式：

- 父亲代表现实及其适应实在的新秩序；
- 小汉斯则以一种想象繁生回应。它以格外典型的方式得到强化，因为真正支撑它的是一种深刻的不信任方式。你们会看到，小汉斯的整个后续过程都在这种方式中继续；而在观察开头，某种东西已经近乎物质化地呈现出来。

这里显然体现了观察的非凡性质和天降价值：它向我们显示，小汉斯本人怎样察觉这种东西能够被我们把握——人不仅可以拿它游戏，还能把它揉成皱巴巴的纸团或纸塞。

在小长颈鹿这幅最初意象中，解决已经起步；小汉斯学会做的事情也开始综合：怎样同这些意象游戏。还有某种他并不知道的东西；不过，他会受到引入，仅仅因为他已经会说话，是一个小小的人，浸泡在语言之浴中。

他非常清楚，能够说话为自己提供了何等珍贵的价值。每当他讲出某件事，而别人告诉他“这是好的”或“这是坏的”，他总会亲自强调：

“不要紧，反正总是好的，因为可以把它寄给教授。”

类似的话不止一句；小汉斯每时每刻都仿佛显示，他感受到这样一条道路自身的丰饶性：道路之所以向他敞开，是因为他终于找到可以与之说话的人。当然，如果我们没有借此看出分析的全部宝贵之处与效力，反倒才令人惊讶。

这就是同一个儿童完成的第一次分析。从文本来看，弗洛伊德把一整套现成、建构完毕的俄狄浦斯神话直接带进来，丝毫没有尝试使它适应儿童那里直接而准确地呈现的任何东西；

人们可以认为，这正是观察最醒目的方面之一。

弗洛伊德简直是有意对他说：

“我要给你讲一个我发明的伟大故事；早在你出生以前，我便知道它：有一天会有一个小汉斯来到世上；他会太爱母亲，并因此憎恨父亲。”［第 120 页］[注]

［Lange, ehe er auf der Welt war, hätte ich schon gewußt, daß ein kleiner Hans kommen werde, der seine Mutter so lieb hätte, daß er sich darum vor dem Vater fürchten müßte, und hätte es seinem Vater erzählt.］

［弗洛伊德德文原句意为：“早在他出生以前，我就已经知道，将会有一个小汉斯来到世上；他会如此爱他的母亲，以至于因此不得不害怕父亲；我也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父亲。”］

[注] 米勒编订本（Seuil，1994，第 344 页）正文作 détesterait son père，授权西译同样作“憎恨父亲”；但紧随其后的弗洛伊德德文 vor dem Vater fürchten 是“害怕父亲”。正文保留米勒本的讲述，德文引文另按原义译出。

我要说，俄狄浦斯在弗洛伊德学说中代表原初神话；它的作者本人在这里把它投入一项操作，使其根本的神话性质赤裸呈现。弗洛伊德使用它，恰如人们历来教儿童“上帝创造天地”，或者依儿童所在的文化语境教给他各种别的东西。它作为一则起源神话得到给出；人们相信它为作为神话受托人的主体之言语规定方向、结构与道路。问题逐字说来正在于它创造真理的功能。

弗洛伊德正是这样把它带给小汉斯。我们看到，小汉斯仿佛说出了某种东西；其中仍含有贯穿他整个同意过程的双义性，也会继续纠缠他。他说的话大致是：

“这太有趣、太刺激了，真棒！教授一定同上帝说过话，才会找到这样的东西。”[“教授同亲爱的上帝说话吗？不然他怎么可能事先知道这一切？”]

可是，这产生什么结果？弗洛伊德本人此时十分清楚地亲自告诉我们：当然不能指望这项传达一下子、仅凭这次冲击就结出果实。在观察的这个时刻，弗洛伊德用同我们在这里相同的方式衔接问题；他说，关键在于：

让它产生自身的无意识产物，让恐怖症得到发展。

这是一次激发，也可以说是另一个结晶核；它被植入小汉斯当时尚未完成的意义。小汉斯单凭整个存在就代表这种未完成的意义：一方面，是自行发生的恐怖症；另一方面，是弗洛伊德把它注定要抵达的东西完整带到这里。

弗洛伊德当然丝毫不幻想，自己此刻引入的俄狄浦斯宗教神话会立刻结出果实。他只等待一件事，也明确说了出来：让它帮助另一边的恐怖症得到发展。它至多为我刚才所谓的能指结晶发展开辟道路。弗洛伊德在 3 月 30 日写下的这两句话，已经说得再清楚不过；

这一天正是同弗洛伊德咨询的日期。

我们最多可以说，父亲一边当时仍有一点反应，但不会持续很久。在不同能指形成阶段内部，我们今天试图把握的正是客体关系；而我们要到最后才会在其中真正重新找到父亲。这并不令人惊讶。危机行将

结束时，他才会走到前景：我上次曾告诉你们，恰好在轨道小车幻想以前，小汉斯会在俄狄浦斯对话中同父亲正面相遇：

- “你为什么这样妒忌？”

更准确说，原文使用的是“激动”或“热烈”一词。父亲抗议：

- “我才没有！”

- “你必须嫉妒！”

这就是同父亲相遇的点，也面对父亲位置当时所代表的缺失。此处只有父亲的首次出现，是他已经在那里这个事实带来的一次小小震动；而我们很清楚他以什么方式在那里：

- 他以一种极其耀眼的方式在那里；

- 正如人们常说的，他“以其缺席而耀眼”。

次日，小汉斯果然这样作出反应。父亲告诉我们，他来找自己，说是因为害怕父亲已经离开。他原本也会这样来见父亲；真正令他害怕的是父亲走了。这会把我们带得更远，因为父亲立刻追问：“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

先在这里停下；我们要学会断句。面对这种对父亲缺席的恐惧，我要说，真正处在恐惧中的东西，总而言之是焦虑的一次小小结晶。焦虑不是对某个对象的恐惧。焦虑是主体同对象缺席的正面遭逢；主体在那里被吸住、迷失。相比之下，任何东西都更可取，甚至可以锻造最奇异、最不具客体性的对象——恐怖症对象。

只要懂得观察，这里的恐惧形式本身就显示其非现实性质：它是对一种缺席的恐惧，也就是对刚刚向他指出的这个对象之缺席的恐惧。小汉斯来这里说，自己害怕父亲缺席。请这样听懂它，正如我告诉你们：神经性厌食并不是儿童不吃东西，而是他“吃无”。这里，小汉斯害怕的是“父亲的缺席”；他开始象征化的也正是父亲的缺席。

与此同时，父亲绞尽脑汁，想知道儿童究竟通过何种转折和反作用表现出一种只会是欲望反面的恐惧。这个说法并非全错，却只从外围把握现象。主体刚刚开始意识到：父亲恰恰不是神话告诉他应该成为的那个父亲。他直接对父亲说：

- “你为什么说我特别喜欢妈妈？我明明爱的是你。”

小汉斯前来讲述的东西完全对不上：

- “我必须憎恨的应该是你；事情不对。”

在小汉斯之外受到牵涉、却又把他卷入其中的事情，是情况竟然如此，实在遗憾。尽管如此，他毕竟已经被引上这条道路：能够以神话为参照，辨认一项缺席位于何处。观察立刻把它记录下来；愿意的话，我们应当像我刚才所做的那样，在这里听出一次象征化。

如果把恐怖症围绕其安排自身功能的能指记作大写 I，那么，此时受到象征化的某种东西可记作小写西格玛 σ：父亲的缺席，即 $I(\sigma \overset{\circ}{P})$。这绝不表示马之能指的全部内容都在这里，远非如此。我们会看到，仅仅因为有人告诉小汉斯：“你将害怕父亲，你必须害怕他。”马这个能指并不会立刻烟消云散。

不会；不过，“马”这个能指的确立刻卸下一部分负荷。观察记录写道：

“不再害怕所有白马……”

他现在不再害怕每一匹白马；其中一些已经不怕。父亲虽然没有沿我们的理论道路前进，却立刻理解：有些马是 Vati［爸爸］；一旦汉斯觉得某些马是爸爸，就不再害怕它们。

为什么不再害怕？因为 Vati 非常和善。父亲也多少理解这一点，却没有完全理解；直到最后，他甚至根本没理解，戏剧恰恰就在 Vati 太和善。如果真有一个能够令人害怕的 Vati，人们可以说就符合游戏规则；儿童原本能够经历一场真正的俄狄浦斯，帮助他“摆脱母亲的裙摆”。可是，因为没有令人害怕的 Vati，因为 Vati 太过和善，神话一唤起爸爸可能具有的攻击性，ἵππος（hippos，马）的恐怖症能指便相应卸载；观察在当天下午就记录了这一点。

我丝毫没有强迫材料，因为一切都在文本中。只需几乎不可察觉地移动视角，它就不再是一座令人迷失的迷宫；相反，每一个细节都随时取得意义。

我在这里也许显得前进得相当缓慢，又从开头重新讲起；但必须让你们把握：观察没有任何细节逃过这种透视安排。一旦看出弗洛伊德原样报告的能指同正在分娩的所指怎样衔接，我们便看到，它以数学般的精确在小汉斯情境中自发、自然涌现的能指功能上引发回响。

此时，我们立刻看到这些减除和卸载效果被记录下来，仅仅因为

父亲被带入了；而且，父亲被带入得越少，它就越必须以某种数学方式写下，仿佛落在天平托盘上。

一部分白马不再令人害怕；观察本身衔接出两种焦虑秩序。弗洛伊德告诉我们——也就是进一步强调我刚才所讲的内容——，他区分：

- 围绕父亲的焦虑；
- 同面对父亲的焦虑相对。

我们只需照弗洛伊德本人呈现的方式记录下来，就能准确重新找到我刚才描述的两个要素。围绕父亲在小汉斯配置中所代表的空缺、凹陷位置的焦虑，

恰恰在恐怖症中寻找支撑。只要哪怕仅仅在要求层次唤起某种被设定的“面对父亲的焦虑”，围绕父亲功能的焦虑就会相应卸载。

终于可以面对某种东西焦虑了；不幸的是，它无法走得很远，因为父亲虽确实在那里，却完全无法支撑一场正确、清楚且具有俄狄浦斯神话全部普遍分量的神话形成所赋予他的既定功能。

这恰恰迫使小汉斯重新落回困难。正如弗洛伊德预见的，此后困难会开始发展、取得形体，并凝结成恐怖症必将展开的产物。事情立刻开始变得清楚：4 月 5 日出现第一个幻想；上次我以它作为首项出发，直到最后都能重新找到它的各种转化。连同周围的一切、预告它的一切，这个幻想凸显了小汉斯在前一天已经开始清楚衔接之物的分量：究竟什么令我害怕？

我们开始看见答案：正是马——文本就是这样衔接的。父亲在这里用了一把力，真正作起分析；也就是说，他有时不再清楚该往哪里走，而这反倒让他找到一些东西：他看出马通过四种方式令人害怕。这些要素全都调动一种东西；对人——也就是注定要知道自己存在、因而不同于其他动物的动物——来说，它会在最扰乱的时刻显示自身要求。小汉斯的恐怖症新产物此时所展开、衔接的恰恰就是：运动。

请听清楚：这里不是匀速运动。我们历来——至少近来——知道，人在匀速运动中感觉不到运动，甚至能在其中得到逃逸。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直线运动与旋转运动的区分就已有这个意义。用现代语言说：这里有加速度。

小汉斯告诉我们，马拖着某种东西时，只要飞驰、启动就令人恐惧——快速启动比缓慢启动更可怕。凡是能够感到某种惯性的地方，运动都呈现这种性质。对没有卷入运动、并以最低限度的生命抽离——即我刚才所谓“知道自己存在”，作为一个被运动带走而有自我意识的存在——面对它的人而言，这种惯性会显现出来。正是在这里，应当分析焦虑：焦虑既来自被运动裹挟，也来自它的反面——被留在后面、遭到丢下的幻想。

某种东西突然把汉斯卷进一场运动，这为他带来深刻的坠落。一切深刻改变他同母亲稳定性之关系的东西，都让他面对母亲，同时也面对某种从根基上真正颠覆他的东西。他此时用谈论马的方式向我们表达母亲：“Umfallen und beißen wird”——它将倒下，也将咬人。

我们知道咬击关联什么：每当母爱变得欠缺时，它便涌现。当母亲可以说为他倒下时，她同时也成为一种没有别的出口之物；小汉斯只能作出必然的焦虑反应，也就是所谓灾难性反应：

- 第一阶段：咬；
- 第二阶段：倒下，在地上打滚。

“从现在开始……”小汉斯试图以一种完全幻想性的方式复原自己“染上恐怖症”的时刻时，这样告诉我们。对他而言，这也表达在一个必须保留其结构的公式中：“从现在起，每一匹套着公共马车的马都会倒下。”

小汉斯用这个公式赋予问题以形体：当时构成他世界基础的一切，都在根基上受到质疑。

这恰恰把我们带到 4 月 9 日，带到围绕恐怖症加工运动焦虑主题的阶段。父亲无论试图带来什么缓和，在这个主题中都完全无效；因为对人这样的存在而言——他的世界在象征界中得到构造——，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解决这种被感受到的生成和被运动裹挟的经验。因此，小汉斯必须在自己的能指构造中完成一种转换：改变运动图式，把它转换成替代图式。

这个过程分阶段发生。首先引入可拆卸的主题；随后，替代由此发生。浴缸形成表达了这两个图式阶段：它处在被旋松拆下的时刻。而且，拆下它并非没有代价。正如我说过的，小汉斯此时必须让自己遭受某种事情；我们知道，这种过渡从来都不是没有代价。观察没有充

分突出的这项东西，完全在于：有一段时间，阉割不仅已经足够，而且由那把钻入他肚子的钻头、大钻头得到形式上的象征化。

然后是第二阶段：某样东西旋下来以后，可以把另一样东西旋到原处。这项能指形式承载的正是对主体而言的转化操作：把运动转化成替代，把实在的连续性转化成象征界的不连续性。整份观察都表明，这正是它的进程；没有它，观察的各个阶段与进展便无法理解。

在所指一边——也就是小汉斯那里混沌而悲怆地发生的事情中——，4 月 5 日的货车启动幻想图式及其全部恐怖症联结，同浴缸在幻想中拆下螺栓、可能的替代象征化开始启动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两者之间有什么？

两者之间有整片周边材料，我不得不加以清理。那是一段漫长过程，持续时间恰好大致等于下述唯一要素为小汉斯发生的全部时间；在此前情境中，只有这个要素能够把可拆卸性作为他世界重构的根本要素引入。它是什么？

它恰恰就是我曾告诉你们必须引入下述辩证法的要素：展示与不看，把并不存在的东西作为存在却隐藏的东西加以唤起——也就是“面纱”本身。

在这两天焦虑的追问中，父亲简直什么都不懂；他在这里同在其他地方一样，只作出某种笨拙摸索。弗洛伊德本人也强调这一点，并明确说，这是分析调查中可以说失败的部分。

无论如何，留下的材料已经足够让我们看见根本内容，也足以看出弗洛伊德本人特意强调什么是根本：面纱前发生的事情，也就是“那两条

衬裤”。观察记录以大量细节仔细雕琢它们：黄色小衬裤与黑色衬裤；记录还说，这是一条 Reformhose。



Reformhose 显然是一种为骑自行车的女性使用的新式灯笼衬裤。我们确实知道，汉斯的母亲走在进步前沿。我们还会回到她；我想，阿波利奈尔一些精彩喜剧中的若干适当节选，尤其是《蒂蕾西亚的乳房》，会帮助我们把她描绘得更清楚。正如那出精彩戏剧所说：

> “她们就是我们的一切，然而她们不是男人。”[第一幕，第九场]

整场戏剧恰恰在这里；一切从开头便由此出发。原因不只在于小汉斯的母亲或多或少是女性主义者，而在于小汉斯面对一项写在刚才诗句中的根本真理；弗洛伊德也从未向我们隐瞒它的根本而决定性价值，

他提醒我们：“解剖即命运。”

问题确实在这里。小汉斯试图衔接自己要讲的内容，父亲热切的问题却不断打断他，使材料难以筛选；不过弗洛伊德完成了筛选，因为他告诉我们的正是根本内容。最清楚可见的是，小汉斯通过两个阶段辨认并区分这些衬裤；二者以混沌方式投射在它们的二元性上，仿佛每一条都可能在某个时刻更多承担其中一种功能。但根本之处是：衬裤本身在他那里关联于厌恶反应。

不只如此：小汉斯还要求写信告诉弗洛伊德，自己看见衬裤时吐了口水、倒在地上，随后闭起眼睛。恰恰因为这种反应，小汉斯不会成为恋物癖者；选择已经作出。相反，如果他把这些衬裤认作自己的整个对象——也就是任何人永远都看不见的神秘阳具——，他就会以此满足，并成为恋物癖者。

可是，命运作出了另一种安排：小汉斯恰恰厌恶衬裤。不过他又明确说，母亲穿着它们时就是另一回事；它们那时完全不令人恶心。关键正在这里：一边是本可以作为对象提供给他的衬裤本身；另一边是衬裤只有投入功能时才保持效力——如果可以这样说——，也就是只在继续维持阳具诱饵的地方保持效力。这个要害和过渡，让我们能够把握这场经验。

这场漫长的追问使现实在此刻取得突出价值。小汉斯试图围绕它说明自己；由于被推向分歧而混乱的方向，他讲得很差。然而，根本效果依然是：通过这个特权对象，把可拆卸性要素引入。我们会在后文重新找到它。从此以后，它过渡到工具化层面；我们将看到庞大的工具材料开始发展，并从这一刻起支配能指神话的演变。

上次我已经带来几件工具，甚至向你们显示，能指的双义性中已经写着何等奇异的东西：钳子、马蹄与马齿之间非同寻常的同名关系。我还可以把它展开得更远：马蹄正中的部位叫作 pince［钳端］，两侧却叫作 mamelles［乳房］！

上次谈到意为螺丝刀的 Schraubendreher 时，我已经告诉你们，安装工幻想中的工具恰恰不是它，而是钳子或夹钳；是弗洛伊德此时又拿出了自己的 Schraubendreher，没有充分看出这种工具化为他提供的价值。因此，不要以为它只出现一次。现在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对象，会向你们显示母亲与儿童的关系，也显示那种在出生与死亡问题中为人表达自身的根本可拆卸性。

你们现在会看到这些对象被引入；它们背后则是一个绝对谜样、令人不安而滑稽的人物——鹳鸟。不过也不要忘记，它还有完全不同的风格：这位斯托赫先生［Storch，鹳鸟］会以夸张剪影登场，头戴小帽，钥匙不在口袋里——因为它根本没有口袋——而叼在嘴里；它还把嘴用作产钳、跷板和挂锁。

从此以后，我们被工具材料淹没；观察的全部后续正以此为特征。不过，为了不让你们空手离开，我要告诉你们：这里是围绕母亲与儿童即将发生之事的轴心和转折时刻。

下次我们会逐步重走这一切，并看到母亲与儿童怎样通过一种准确的能指形式，在始终保持同一的同时得到转化。

车会变成浴缸，再变成箱子，等等；一切彼此嵌套。到了一个显然格外漂亮的时刻——那时，人们已经在母亲问题上取得足够进展；你们会看到是什么进展——，一个十分有趣的小幻想介入：小汉斯拿起一

只橡胶娃娃，仿佛偶然地把它叫作格蕾特。别人问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叫她格蕾特。”

只要认真读过观察，就会知道，父亲似乎略微忽略了一点：她正是那位见证他同母亲游戏的格蕾特。不过，现在事情已有进展；人们在驾驭母亲方面已经走得足够远。你们会看到，这个词必须以最技术性的意义使用；也会看到，他通过谁学会把母亲牵在缰绳末端，甚至稍稍抽打她。

这时，橡胶娃娃被刀刺穿；人们把某样东西塞进去，再把它挤出来。小汉斯重新作出自己的小小穿孔，不过这次用的是一把小折刀；折刀事先从那个为了让娃娃发出“叽……”声的小孔插入。

小汉斯终于找到这场玩笑的谜底和刀尖：母亲脑子里原来预藏一把小刀，准备用来切掉他的东西；小汉斯却截断她的道路，亲手把刀逼了出来。

第21课 · 1957年6月5日

- 4 月 9 日：两条衬裤。
- 4 月 11 日：浴缸与钻头。
- 4 月 13 日：安娜坠落。
- 4 月 14 日：大箱子。
- 4 月 15 日：鹳鸟。
- 4 月 16 日：遭到鞭打的马。
- 4 月 21 日：同父亲的想象性登程，大对话。
- 4 月 22 日：轨道小车上的加冕，小刀插进娃娃。
- 4 月 24 日：羔羊。
- 4 月 26 日：洛迪。
- 4 月 30 日：Ich bin der Vati［我是爸爸］。
- 5 月 2 日：安装工。

今天，我们继续谈几句小汉斯；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是我们关注的对象。

我提醒你们，这篇评论依照怎样的精神展开。总而言之，“小汉斯”是什么？是一个五岁儿童在 1908 年 1 月 1 日到 5 月 2 日之间的喋喋不休。对一切没有预先了解的读者来说，“小汉斯”就是这样呈现的。如果读者已有准备——不难做到——，他就知道这些话很有价值。

为什么有价值？因为人们至少在原则上设定：这些儿童闲谈同某种相当坚实的东西——一场恐怖症——存在关系；

- 它为年轻主体的生活带来种种麻烦；
- 为他的周围人带来种种忧虑；
- 也引起弗洛伊德教授的全部兴趣。

换言之，这些话同恐怖症存在关系。我认为，澄清这种关系最为重要；我们不能越过闲谈，跑到观察记录根本没有呈现的某种彼岸寻找关系。这类彼岸只是后来出现在我们头脑中，带着成见的一切强制性质。例如，我上次停下的点：小汉斯用小折刀刺穿娃娃的故事。

今天，我重新制作了一份年表。我想，到现在为止，你们都不只读过、而且重读过小汉斯的观察；这些提示本身应当已经足够鲜活。上次，我停留在小汉斯对母亲两条衬裤的反应；这里包含：

- 当时那些有问题的交流；
- 父亲与儿童之间的追问；
- 以及对话得以继续的一场深刻误解。

我同弗洛伊德一样，强调在他看来这场围绕母亲两条衬裤的对话留下的最根本余项。它由汉斯本人清楚断言，绝非追问诱导或提示的结果：在以下两种情形中，两条衬裤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 衬裤单独放在那里时，小汉斯吐口水、在地上打滚，大闹一场，表现出一种自己也没有给出钥匙的厌恶；但他又希望人们把这件事告诉教授；

- 衬裤穿在母亲身上时，小汉斯说，它们对自己逐字说来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我强调这一点时，听到有些人不知为何感到惊讶：我仿佛回避所谓 Hosen——母亲衬裤——同 Lumpf 的联系。在小汉斯的词汇中，Lumpf 指排泄物。儿童极其常见地根据某次偶遇乃至偶然的命名来称呼这种功能；最初名称往往关联于实行这种功能时的某种联结，而这里使用的也正是这种非典型名称。

我们会看到 Lumpf 究竟怎样。仿佛我出于某种系统精神，删去了此时及时涌上我们脑中的肛门阶段；就像按下“开”按钮，便触发巴甫洛夫的狗某种条件反应。一听到排泄物，你们就喊：肛门阶段！肛门阶段！肛门阶段！于是开始谈论肛门阶段，因为事情必须“正常地”发生。

我希望你们稍稍退后一步看这份观察，并发现：在这场处理的进程中——它是一场治疗吗？我当然没有说它是一场治疗；我说的是，如同弗洛伊德每一份重大病例一样，它在我们的分析经验中发挥根本功能——，若有一种东西真正丝毫没有得到指示，那便是可以写入“挫折”界域的某种快速节奏或机制。

在所谓治疗的整个期间，他不仅没有遭受任何挫折，反而得到充分满足。退行还是攻击？无疑有攻击，却当然既不关联任何挫折，也不关联任何退行时刻。如果有退行，它不是本能意义上的退行，也不是某种较早之物重新涌现。若确实存在退行现象，它属于我已多次向你们指出的另一种可能界域：主体为了澄清自身问题，必须把自己“在世存在”和关系中的某个要素加以还原；例如，把象征界还原到想象界，有时甚至像这份观察清楚显示的那样，把实在还原到想象界。

换言之，在场诸项中某一项接近能指的方式发生改变。你们会在观察进程中看见小汉斯怎样完成这件事；他以一种严谨乃至强制的方式推进。这正是弗洛伊德界定的无意识能指过程的性质：它之所以是

无意识，就在于主体完全无法察觉，简直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只需有人协助并促使他展开自己引入、且为心理支撑所必需的能指作用。他在展开它以后，从中得出某种解决；这未必是规范性解决，也未必是最佳解决，但在小汉斯病例中，显然有效地消除了症状。

让我们回到 Lumpf。弗洛伊德在谈论母亲衬裤引起的厌恶征兆时提到它；父亲此前也沿这个方向问过几句话。小汉斯当然已经显示，排泄物问题对他并非毫无意义和兴趣。弗洛伊德在谈到衬裤时提出它同 Lumpf 的关系；但这当然也可以倒过来：我们同样可以说，Lumpf 是由于衬裤才被带进来的。

这是什么意思？事实不只在于：小汉斯围绕母亲衬裤表现出明确的厌恶反应，因此被带到相关排泄功能。弗洛伊德谈到 Lumpf 时亲自强调：换言之，排泄物以及这里涉及的肛门性，究竟以何种方式介入小汉斯观察？

怎样介入？记录立刻告诉我们：小汉斯对 Lumpf 产生了某种兴趣；它也许并非同那些背景、同他自己的排泄功能毫无关系。但此时真正涉及什么？母亲完全允许他参与自己的排泄功能：每次母亲穿上或脱下衬裤，小汉斯都紧缠着她不放，不停烦她。母亲为此辩解："我没有办法，只能带他一起去厕所。"这时，父亲又展开小小调查；不过，他本来就没有多少事情不知道。

所以，问题围绕小汉斯同母亲之间"看与不看"的游戏。不只"看与不看"，而是"看见那不能被看见的东西，因为它根本不存在"。小汉斯对此非常清楚；为了看见"不可见之物"，就必须隔着面纱观看，也就是在有待观看之物的不存在面前维持一层面纱。

Lumpf 正是围绕面纱、衬裤和衣服的主题被引入；衣服背后隐藏着母子关系的根本幻想，也就是阳具母亲幻想。因此，如果我把 Lumpf 留在它自己的层面——也就是第二层面——，并非出于系统性偏见，而是因为观察只在这种联结中把它带给我们。

换言之，在分析中，仅仅听出一支熟悉曲调，还不足以让人因为来到熟悉国度而欣喜若狂，满足于说：我们又找到了那句反复歌唱的副歌——"肛门情结"。

问题在于：分析的某个时刻，这个主题究竟发挥什么准确功能。它始终对我们重要，但原因并不只在那个纯属隐含、本身模糊、只同发生学观念相关的意义——在具体病例的每个观察时刻，这些观念随时都可能受到质疑——，而在于认识它同演变中的完整能指系统有何联结；无论在疾病演变的症状期间，还是治疗过程中，都要如此。

如果 Lumpf 在这个系统内部具有额外意义，那当然也是因为它同衬裤此时的功能——即面纱——严格同构。

Lumpf 同衬裤一样，都是可以掉落的东西：面纱掉落，而对小汉斯来说，问题恰恰在面纱已经掉下。可以说，他掀起面纱的一角。正如我告诉你们的，恰恰通过 4 月 9 日这场围绕衬裤的漫长解释，随后会出现浴缸幻想，也就是引入同这种掉落关系最紧密的某种东西。通过把这种坠落、这种坠下之物，同恐怖症让他面对的另一项——咬击——相组合，可拆卸性与旋松拆卸的主题得到引入；

它会作为还原情境的根本要素，贯穿一连串幻想。

因此，必须切实看见并设想小汉斯的这一连串幻想正如我曾告诉你们的那样：

它是一则发展中的神话，是一篇话语。观察记录中发生的绝对不是别的事情。

观察记录不过是借助想象要素，对这则神话进行的一系列重新发明。

必须理解这种旋转式进展、神话的连续转化怎样发挥功能：在我们恰好能够理解的深层层次，它们怎样为汉斯代表问题的解决。严格说来，问题在于他自身在存在中的位置；这个位置必须参照某种真理、某些真理参照而确定，他必须在其中取得自己的位置。

如果还需要更多证据支持我所讲的内容——既然有人向我提出这项异议，我也确实遇到它，就要把它追到底——，请回到文本，看看 Lumpf 归根结底是什么。我还要补充，小汉斯在一个明确时刻，即星

期日晚间从祖母家返回时，因为车厢里的黑色坐垫表示 Lumpf，便在车厢中表现出厌恶。

大约两天以后，他在随后的解释中同父亲谈话；什么东西被拿来同 Lumpf 的黑色比较？一件衬衣、一件黑色短衫与黑色长袜。Lumpf 主题同母亲衣服、也就是同面纱主题的紧密关系，正由小汉斯本人在观察中凸显。况且，Lumpf 究竟是什么，从哪里来？小汉斯为什么把排泄物叫作 Lumpf？观察同样告诉我们：因为它同黑色长袜相似。

在我们沿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继续考察的这段观察中，十分清楚的是，Lumpf——也就是排泄物——依照某种关系、以某种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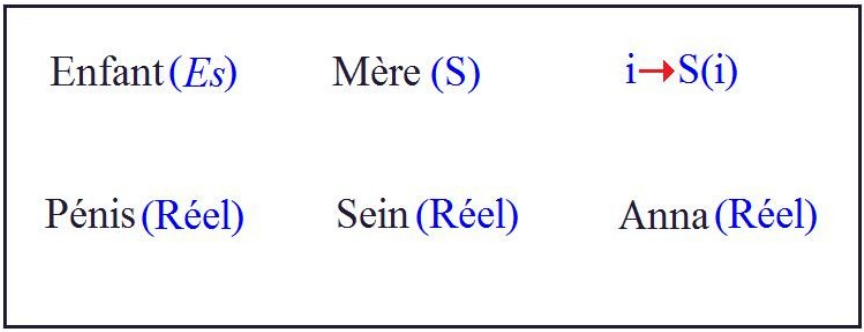
介入能指衔接。更根本、更重要——说实话，也是我们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它的下列关系：

- 同衣服主题的关系；
- 同面纱主题的关系；
- 同“母亲遭到否认的无阴茎状态隐藏在什么背后”这一主题的关系。这才是它的根本意义。当我们采取这条轴线和这个中心，理解恐怖症怎样通过神话转化在分析中得到还原时，并没有出于任何偏见改变观察本身的方向，

而是在追踪这些转化的进展。

我们已经讲到 4 月 11 日的浴缸幻想。我曾告诉你们，浴缸代表着情境开始得到动员。换言之，汉斯由于某种未知理由觉得自己同某样东西绑在一起，并因此产生最大限度的焦虑：那就是母亲这项令人窒息而

独一无二的现实。他觉得自己既完全听凭她处置，又被她取消、受她威胁；这为小汉斯构成危险情境——一种本身绝对无法命名的危险，严格说来也就是焦虑。问题在于看儿童怎样走出这个情境。我提醒你们，面临失去母爱的儿童同母亲之间的情境，其根本图式如下：



象征母亲，是儿童最初加以象征化的现实要素；她根本上可以缺席或在场。儿童同母亲的全部关系都系于一点：爱遭拒绝时，补偿来自对实在满足的压倒性填充。不过，这不表示当时不会发生倒转：乳房恰恰在成为补偿时，转而成为象征赠礼；而母亲此时成为实在要素，也就是一个拒绝给予爱、全能的要素。

相关知识卡 象征母亲、实在母亲与赠礼

母亲情境的进展在于：儿童必须发现，母亲在他以外爱着什么。那并不是儿童自己，而是 i、想象性要素，也就是母亲对阳具的欲望。归根结底，儿童在这个层次必须做到的——这不表示他真能做到——，恰恰是抵达这个公式：i → S(i)。它在尚为 infans、还不会说话的儿童行为之交替和游戏中呈现；

相关知识卡 母亲—孩子—阳具三角

儿童以遮蔽游戏伴随自己对象征部分的处理。

到了某个时刻，两个实在要素的引入使小汉斯的情境复杂起来。其一是安娜：一个实在儿童前来复杂化他同母亲彼岸的关系。其二确实属于他自己，却让他简直不知道怎样处理：一根开始活动的实在阴茎；而它在自己对之发挥功能的人那里受到恶劣接待。小汉斯刚刚说："你不觉得它很可爱吗？"姨妈前几天曾说："再没有比它更漂亮的了。"

母亲对此反应极差，从此问题变得十分复杂。要探测这层复杂性，只需抓住恐怖症的两个极点，也就是马令人恐惧的两个要素。我已经解释过：马会咬人，而且马会倒下。

- 马会咬人：既然我再也无法以任何方式满足母亲，她就会像我在她完全不满足我时满足自己那样满足自己；也就是说，她会咬我，正如我咬她，因为当我无法确信母爱时，这就是最后手段。

- 马会倒下：同样准确地说，正如我——小汉斯——此刻遭到抛下，因为每个人眼里只剩下安娜。

不过，从另一方面说，小汉斯显然又必须被吃、被咬。他必须经历这一点，因为归根结底，这才对应于重新赋予那根阴茎以价值；母亲先前完全不把它当回事，拒绝了它，而它必须变成某种东西——小汉斯欲望的正是这一点。他被母亲咬住、攫住，是一种既受欲望又受恐惧的东西。倒下也是如此：小汉斯也可能欲望马倒下。

情境中不止一个要素是小汉斯希望看见倒下的。一旦我们把"坠下之物"的范畴引入观察，第一个呈现的就是小安娜：他希望她掉下去、从窗户掉下去；如果可能，穿过分离派风格阳台略宽的栏杆掉下去。因

为我们面对的是走在进步前沿的人家，他们不得不加装一道丑陋铁网，以免小汉斯过快把小安娜从空隙推下。因此，咬击功能和坠落功能都在恐怖症显见的结构本身中给出；它们是根本要素，而且如你们所见，

是具有两副面孔的能指要素。

这才是“矛盾情感”（ambivalence）一词的真正意义：小汉斯并非只害怕、畏惧坠落，正如他并非只害怕咬击；这些要素也能沿相反方向介入。咬击在某一方面同样受到欲望，因为它将在情境解决中发挥根本作用；坠落也同样受到欲望。即使女儿本人不应当坠落，有一件事仍然确定：从某个时刻起，母亲在整份观察中也会画出一条下降曲线。这个时刻恰好受到一种奇特的工具功能制约，也就是第一次以谜样方式出现在浴缸幻想中的旋松拆卸功能。

正如我上次所说，相关的焦虑不只指向现实中的母亲，而真正指向整个集合：全部环境、迄今构成小汉斯现实的一切、他的固定现实参照，也就是我上次所谓的“整座棚架”。在水管工前来、旋松拆下浴缸的第一个幻想中，人们开始逐件拆除“整座棚架”。这绝非抽象联结；经验本身完全包含了各种联系。

不要忘记，观察记录揭示：小汉斯以前曾亲眼见人把浴缸旋松拆下，因为他们去格蒙登度假时，会把浴缸装在箱子里带走。我们还知道此前搬过家，可惜观察没有提供准确日期；它们大概发生在所谓观察病史涵盖的时段，也就是发病前两年——关于这段时间，我们拥有父母留下的若干笔记。

无论搬家还是把浴缸运往格蒙登，都早已为小汉斯提供“拆除整座棚架”意味着什么的能指材料。他已经知道这种事能够发生；但这无疑仍是一次或多或少已经融入他自身能指操作的经验。

我们由此进入浴缸被旋松的幻想。恐怖症起初具有晦暗、纯粹信号性的性质：它是抑制、停止、边界和无法越过的界限。浴缸幻想让汉斯跨出第一步，开始知觉这种东西。只有在恐怖症本身内部，它才能得到动员，因为恐怖症包含可以以其他方式组合的要素。

换言之，马用门牙咬人；门牙就是那把钳子。我上次解释过它的多重意义：在德语、法语以及许多别的语言，尤其希腊语中，马的咬噬器官，同时都表示钳子或夹钳；

它让一个拿着钳子与夹钳的人物首次出现。这个人物开始投入游戏，并引入一种演变要素——我再说一遍，是纯粹能指性的演变。

你们总不会告诉我，儿童身上已经具有某些本能痕迹，能够解释浴缸为什么被旋松，解释它为何既是同一件事、某些方面又是其反面。换言之，小汉斯走入的神话演变，其发展不能安置在能指本身以外——也就是包含工具和器械的人类象征世界以外——的别处。他通过同那两位俯身研究并分析其病例的人物展开一种晦暗而摸索式的合作，走入这项发展。

我在这里稍停一下。浴缸幻想中不只有浴缸与旋松拆卸；当时还有Bohrer——钻头。同往常一样，发现的新鲜感带来敏锐知觉；站在分

析探索前沿的见证者毫不怀疑钻头是什么：“这是母亲的阴茎。”不过，围绕这根阴茎，文本又出现某种摆荡：

- 它瞄准小汉斯吗？
- 还是瞄准母亲？

我要说，这种双义性完全有效；我们越理解这里涉及什么，它就越有效。请再一次把它看作我所讲内容的证据：只在头脑中存有一套或详或略的分析经典情境档案还不够——例如知道存在倒转的俄狄浦斯情结，儿童看到父母性交时可能认同女性一方。

在这里找到小汉斯同母亲的认同，当然是真的，为什么不呢？但只有一个条件：我们必须理解它为何是真的。仅仅说出这一句，严格说来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完全无法同这个幻想显现的前因后果相接：儿童设想、想象并亲自衔接，某样东西前来，在他肚子上钻出一个大洞。

它只能在语境、在相关事物的能指演变中取得意义。不妨说，小汉斯此时向父亲解释：“这回就把那东西结结实实塞到她该被塞的地方。”小汉斯同父亲关系中的全部问题，正聚集在这里。

整份观察始终让我们看到这种缺失，也看到小汉斯为恢复某种情境付出的努力。我不会说恢复正常情境；父亲一旦对他扮演当前这种角色——哀求他相信爸爸并不凶恶——，正常情境就无从谈起。他要恢复的是结构化情境。

在这项结构化情境中，小汉斯开始拆卸母亲的同时，很有理由相应而强制地促使父亲对母亲发挥作用。我再说一遍：在分析过程中，小男

孩的被动幻想能够从无数角度、以无数方式介入，把男孩带入同父亲的幻想关系，在那里同母亲认同。

仅以我自己的分析经验为限：不久以前，有一位男性——他并不是同性恋者，正如在我看来小汉斯从来不可能成为同性恋者一样——在分析的某个时刻衔接出这样的内容：自己童年时无疑曾幻想处在母亲位置，正是为了可以说代替她把自己作为受害者献出。他体验的整个童年情境，是父亲的性要求不断造成的某种烦扰；父亲性情极为奔放，乃至对母亲提出苛求，而母亲拼命拒绝其需要。儿童则察觉，无论是否有充分理由，母亲在这种情形中都把自己体验成受害者。

由于这项内容已经融入主体的症状发展——因为这位主体是一名神经症者——，

我们绝不能停在某种单纯女性化乃至同性恋的位置上；

分析在某个时刻揭示的这个幻想出口，必须连同赋予它完全不同意义的语境来理解；这个意义甚至同小汉斯观察中发生的事情恰好相反。

小汉斯对父亲说："你多操她一点。"而另一个孩子对父亲说："你少操她一点。"显然，两者都必须使用"操她"这个词，甚至是："必要的话，就替她操我。"只有通过这个词的能指联结，我们才能估量这里涉及什么。在由此创造、表面上无路可出的情境中，父亲并不介入。你们也许会说：可是父亲存在，父亲在那里。父亲在俄狄浦斯情结中的功能究竟是什么？

显然，儿童同母亲的情境必然会在某个点、以某种形式出现僵局；另一个要素必须在这里引入。我要强调，我们会再次把这一点重新衔接

——事情必须重复，不重复就会丢失。当然，这不会只是旧话重述，因为按照定义，俄狄浦斯情结既然是根本的，就必须用上千种不同方式说明。

不过，仍有一些结构要素始终能够重新找到，而且保持相同，

至少在排列和数量上如此。

父亲作为第三项，在某个层面进入母子情境；如果换一个层面，由于并不存在的阳具已经构成第三个要素，他就作为第四项进入。请原谅我使用一个不太喜欢、但为了快速说明不得不用的表达：这就是情境的“自在”。我的意思是，此刻我只把父亲视为“应当同其他要素一道在那里”的父亲，尚不考虑主体“自为”会发生什么。我不喜欢这个说法，因为你们也许会把“自为”理解成主体意识中给出的东西；然而，这项“自为”

大部分位于主体的无意识中，也就是俄狄浦斯情结的效果。

但我正是为了标出差异，才指出父亲必须在那里，并说明他的自在角色。现在不能重新讲述整套俄狄浦斯情结理论；不过，父亲是拥有母亲的人，他以父亲身份拥有她，凭借一根真正而充分、确实发挥功能的阴茎。儿童则不同：他受制于一件既没有得到良好同化、又不充分，甚至遭到拒斥与轻蔑的工具。

分析理论围绕俄狄浦斯情结教给我们、也使俄狄浦斯情结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必要的，

不是生物学或内在必然性，而至少是经验必然性，因为它在经验中得到发现。如果俄狄浦斯情结的存在确有意义，那就表示年轻男孩性能力出现并自然增长的过程，不会独自完成，也不会只分一个或两个阶段完成。毕竟，如果只考察生理层面，它也可以、而且事实上正分两个阶段发生。但仅仅考察这种自然增长，丝毫不足以说明发生的事情。

有一个事实：为了让情境在正常条件下发展——我指让人类主体不仅在实在世界，而且在象征世界中充分维持自身在场，也就是让他能够在按象征经纬组织的实在世界中容忍自己——，仅仅感知我上次所谓的运动、它的加速度以及将主体裹挟运走的东西，并不足够。还必须有别的东西：一方面是一次停止，另一方面是把两项固定下来：

- 真正的阴茎、实在阴茎、有效的阴茎，也就是父亲那根发挥功能的阴茎；

- 儿童的阴茎；它在同父亲阴茎进行的 Vergleichung［比较］中取得位置。只有经历称作阉割情结的取消，它才能以某种方式接近父亲阴茎的功能、现实、尊严及其作为阴茎的整合。

换言之，儿童自己的阴茎必须在一个辩证时刻暂时遭到消解；正因如此，他才有望将来进入完整父亲功能，成为一个觉得自己正当地拥有男性气概的人。看来，这个“正当地”对性功能在人类主体身上的良好运作至关重要。若非如此，我们围绕决定论、早泄以及

其他各种性功能障碍所讲的一切，只要没有在这些界域中取得意义，就简直毫无意义。

必须理解这一点——这只是重新确定问题的总体位置——：它是经验告诉我们的，本来无法预见。我先前给你们的情境图式本身也不一定能够预见；证据就在于，它是分析经验发现的。俄狄浦斯情结是对男性功能的整合，而分析经验让我们把事情推进一步：象征父亲——也就是父之名——若对象征世界的构造至关重要，对某种比原始断奶更根本的断奶出口至关重要——儿童由此摆脱同母亲全能的单纯配对——；如果象征父亲是象征世界的根本中介要素，对人类语言的一切衔接如此根本，那么，严格说来，这正是《传道书》说出下句话的理由：

相关知识卡 父亲隐喻与父之名

“愚妄人在心里说：没有上帝。”

恰恰因为他“在心里说”这句话；另一方面，在心里说“没有上帝”严格说来是愚妄的，因为说出同语言衔接本身矛盾的事情就是愚妄。你们十分清楚，我并不是在作自然神论信仰宣言。问题在于象征父亲。

经验还告诉我们，就父亲进入男性性功能承担的特有作用而言，实在父亲发挥根本的在场作用。也就是说，只有当实在父亲真正参与游戏，履行阉割父亲的功能，以具体、经验的形式承担父亲功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我几乎要说，以退化的形式承担……

原初父亲这个人物，采取弗洛伊德神话向我们呈现的专横、或多或少令人恐惧的形式……

换言之，只有当现实存在的父亲履行自己的想象性功能，让这项功能中经验上不可忍受、愿意的话甚至令人反抗的东西产生作用；只有当

他以某种方式让人感受到自身作为阉割者的介入，而且只从这个角度，阉割情结才会得到体验。

小汉斯病例把这一点说明得精彩绝伦：那里有一位象征父亲；小汉斯不是愚妄人，立刻相信这位象征父亲——弗洛伊德就是上帝。你们要清楚，这正是小汉斯建立平衡的最根本要素之一。当然，他就是上帝。

小汉斯立刻相信他，而且像我们所有人相信上帝那样相信：既信又不信。他之所以相信，是因为任何真理衔接都必须参照某种最高见证者；归根结底，它就是这样一个要素。有一个人无所不知；小汉斯找到了他——弗洛伊德教授。多么幸运！他在地上拥有上帝，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好运。无论如何，这给了他很大帮助，却丝毫不能补足想象父亲、真正发挥阉割作用的父亲之缺失。全部问题就在这里：小汉斯必须找到一项替补，补上那位执意不肯阉割他的父亲。

这就是观察的钥匙。问题在于，小汉斯究竟怎样承受自己的实在阴茎，恰恰因为它没有受到威胁。这正是焦虑的基础。他情境中无法忍受的，正是阉割者一边的这种缺失。事实上，贯穿整份观察，你们找不到任何东西代表所谓阉割的构造、实现或切身体验，哪怕在幻想中也没有。小汉斯强制地召唤一次创伤，并为此不择手段。

同弗洛伊德在这里所说的恰好相反：小汉斯的脚撞在石头上受伤，这项经验本身没有任何东西会自然引出后续联结——他希望父亲遭受同样的创伤，经历这种神话式割礼；

这会在 4 月 21 日的大对话中显现。他对父亲说：

“你必须像一个赤裸的人那样到那里。”[Ja, du sollst als Nackter]

每个人都如此震惊，开始猜测这个儿童究竟想说什么；人们觉得，他竟开始用《圣经》腔说话，甚至在观察中加上括号：“意思是他赤着脚来。”然而，真正说对的是小汉斯。问题在于，父亲是否会真正证明自己——作为一个男人面对他那位可怕的母亲；父亲本人究竟有没有经过根本启蒙，经过创伤，经过同石头的撞击。这足以告诉你们，小汉斯整个存在都在逐字渴望这个采取最根本、最具神话形式的主题。

不幸的是，什么也没有发生。小汉斯仅仅在同父亲的对话中说出这番话，并不足够。那个时刻，他表现出自己怎样为强制欲望的东西燃烧：妒忌之神的妒忌——《圣经》正使用这个词——，也就是一位怨恨他、却会阉割他的父亲。但他没有这样的父亲；情境转向完全不同的道路。稍后我会告诉你们怎样理解它。

请注意，既然父亲一边没有阉割者，却有若干人物来到阉割者的位置：水管工开始旋松浴缸，随后还有钻孔者。稍后我们还会看到另一个人物；严格说来，他也没有卷入父亲受到欲望的功能。

无论如何，确实还有小汉斯本人所谓的安装工；他出现在 5 月 2 日的最后幻想中，为情境收尾。所谓安装工，就是上帝没有充分履行自身一切功能，于是人们让“机械降神”（deus ex machina）登场。相对于阉割情结、相对于情境要求的阉割者，他就是机械降神。

安装工确实是机械降神；小汉斯让他承担自己能够赋予他的那部分功能，完成他在那里应当完成的任务。

我要提醒你们，一切都还原到这里。必须懂得阅读文本；再没有比最后幻想更醒目的例子。这项幻想逐字结束了治疗与观察：安装工前来更换的，是小汉斯的屁股，是小汉斯的底座。

人们已经开始拆除整座棚架，这还不够；小汉斯本人身上的某样东西也必须改变。我们无疑在这里重新找到阉割情结的根本象征化图式。然而，观察本身显示，连弗洛伊德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图式裹挟：小汉斯的幻想没有丝毫痕迹表明，他前面的东西得到替换。

如果阉割情结的图式正如我向你们给出的那样——恰恰是弗洛伊德本人这样说、这样承认——，那么，此时幻想的是弗洛伊德。他说："显然，人们也给你换了一根阴茎。"

不幸的是，小汉斯的幻想完全没有这种内容。他的屁股被旋下来，换上了另一个；人们对他说："转到另一边。"随后便戛然而止。必须按照文本原样把握它。小汉斯观察的特殊性就清楚地位于这里，而它也应当让我们理解整个集合。他明明已经如此靠近，却没有再往前，正因为事情不可能再往前。

因为，如果继续前进，那里就不会有恐怖症，而会有一场正常的俄狄浦斯情结与阉割情结；也不需要所有这些复杂过程——恐怖症、症状和分析——才能抵达一个未必是预定、典型终点的位置。

现在重新开始，回到我们留下小汉斯的那个点。刚才的内容大致是为了确定父亲在这里的功能；更准确说，是确定他的矛盾位置：一方面，他无可争辩地在那里，在分析中行动并发挥帮助；另一方面，他恰恰因为以分析者身份在那里，便承担一些同有效阉割父亲功能明显不相容、受到整体情境预先规定的职责。

你们会注意到，如果俄狄浦斯情结中的确有阉割，而俄狄浦斯情结本身就是阉割，那么，人们并非毫无理由地以某种晦暗方式察觉：它同母亲的关系不亚于同父亲的关系。在原初情境的描述中，我们看到母亲阉割，因为它为儿童包含被吞吃和咬噬的可能。

相对于在先的母亲阉割，父亲阉割是一项替代。它也许并不可怕得更少，却无疑更加有利，因为能够得到发展；相反，被母亲吞没和吃掉完全没有发展的出口。

正是在这两项之间，存在一个能够发生辩证发展的项：同父亲竞争，可能杀死父亲，也可能使父亲失去男性能力。阉割情结因此在俄狄浦斯中富有成效，而在母亲一边则不然；理由很简单：完全不可能掏空母亲，因为她没有任何可以被掏走的东西。

汉斯由此站在十字路口；一项替补方式已经开始勾勒，母亲将他彻底吞噬的纯粹威胁这一原初情境，可以借此得到超越。它已经在我所谓的浴缸与钻头幻想中初步勾勒。同小汉斯的一切幻想一样，它开始衔接情境：威胁可以说被“退回给发件人”，送还母亲。

被拆掉螺栓的是母亲；受到召唤扮演钻孔者的是父亲。这里，我也只是逐字把握弗洛伊德带给我们的东西。他如此受到钻孔者角色吸引，以至于作出一项自己没有解决的评论——理由也很充分，因为还需要通过

语文学、民族志、神话等等，考察 Bohrer 同 geboren 之间究竟可能有什么关系。

德语 geboren 意为“出生”或“已经诞生”，Bohrer 意为“钻头”。两个词根没有关系。概括来说，这正像拉丁语 ferio 与 fero 的差异，也就是“击打”与“携带”的差异。二者并非同一词根；在不同语言中追踪这两个词根，它们始终截然有别。还有表示“钻穿”的 ferare，显然也不同于表示“携带”的 fero；而 geboren 始终关联于“携带”这一项。

无论追踪多远，都能重新找到两个词根的根本差异。重要的是，弗洛伊德恰恰在这里停下，停在一次能指同纯粹能指问题的相遇上；因为归根结底，钻孔者在这里让人想起普罗米修斯——他也是一位穿凿者。钻孔者又是 geboren，也就是把儿童带到日光下的根本承载之项。二者仍是截然不同、甚至彼此对立的要素。这段插话只是为了向你们显示，弗洛伊德本人赋予能指术语何等重要的地位。

小汉斯带来的替补解决将沿怎样的路线继续发展？他现在仿佛无力使情境“成熟”——请允许我使用这个表达；这里不是把本能成熟推向不会陷入僵局的方向，而是让情境的辩证发展继续。既然确实发生了发展，就必须相信这里存在某种东西。至少，我们要理解它，而且理解整个集合。今天我只能向你们指出方向。

从我们抵达的点，也就是 4 月中旬左右开始，全部发展沿一条侧路前进：安娜作为可能且受到欲望的坠落要素被引入；母亲的咬击同样被当作工具要素，作为阉割性介入的替代。不过，它的方向已经偏转：不再作用于阴茎，而作用于别的东西；在最后幻想中，这种东西最终发生改变。

必须相信，这项改变本身已在一定程度上足够，至少足以还原恐怖症。最后，汉斯得到改变；这就是已经取得的结果。下次，我们会看

到这为汉斯的发展带来哪些绝对重大的后果；它们令人着迷。安娜进入，也就是情境中另一项无法同化之物进入。汉斯的整个幻想进程会分阶段进行——我们将努力逐一描述这些阶段——，把这个无法忍受的实在要素交还给想象界，让它能够在那里重新整合。

请用这把钥匙阅读或重读观察，看看安娜怎样以彻底幻想性的形式重新引入——出生以前的安娜。小汉斯告诉我们：两年前安娜已经同他们一道去过格蒙登；当时，她明明还在母亲腹中，小汉斯却说，人们把她放进车后的小箱子带走，她在那里过着十分快活的生活。或者，他还说更早的每一年，人们都这样带着她；因为小安娜一直在那里。

情境中无法忍受的是：小汉斯不能设想格蒙登的假期会有另一个安娜。他在回忆中对它加以补偿——我以严格的柏拉图主义重音使用“回忆”一词，把它同重复功能、也就是“重新找到对象”相对。小汉斯把对象变成其理念自始就在那里的对象。柏拉图必须有某种东西说明我们怎样进入更高世界；因为我们虽不属于那里，却仍能够进入。

小汉斯做的是同一件事：他把安娜还原成一种仿佛自古以来就记得的东西。这是把这个实在想象化的第一阶段；愿意的话，也就是“回忆”。它同本能退行的故事具有不同意义。此后，她既然成为柏拉图意义上的理念、乃至理想——她确实是理想——，小汉斯让她做什么？

这同样存在于他的幻想中：他让她骑上马，玩起骑马马。这既幽默、机智，又神话化、史诗化；同时，它具有史诗文本的一切性质。我们总是不厌其烦地为那些文本描写两种

凝缩状态、两个史诗阶段，并假设各种插笔者、评注者和造假者，以便解释史诗同神话共有的一种东西：它们要说明

- 想象世界中发生什么；
- 实在世界中发生什么。

这里，小汉斯无法删除车夫；另一方面，小安娜又必须骑在马上，并且也要握住缰绳。于是，他在同一句话中说，缰绳在一个人手里，却也在另一个人手里。这让你们看到某种内部矛盾的鲜活状态。在神话中，它往往让我们假定有两个混乱界域，仿佛两个故事不连贯；但真正原因是，无论《奥德赛》还是小汉斯，其作者都受制于一个简单矛盾：两个根本不同界域之间的矛盾。你们在汉斯病例中看到了它的活体。

安娜成为一幅意象以后，仿佛变成小汉斯的更高自我；小汉斯通过这位妹妹展开行动。用这把钥匙，你们便能理解从某个时刻起，围绕小安娜始终保持的全部评价——包括赞美评价——的意义。它们并非只是讽刺，

而是面前这个小他者的根本规定。小汉斯由此开始能够支配情境；小安娜已经骑着可怕的马足够久。正如我曾告诉你们的，从此以后，小汉斯也能够幻想自己驯服这匹马；紧接着便出现“遭到鞭打的马”。也就是说，小汉斯开始验证尼采的真理与警告：“你到女人那里去吗？别忘了鞭子。”[注1]

> [注1] 参见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老妇与少妇〉末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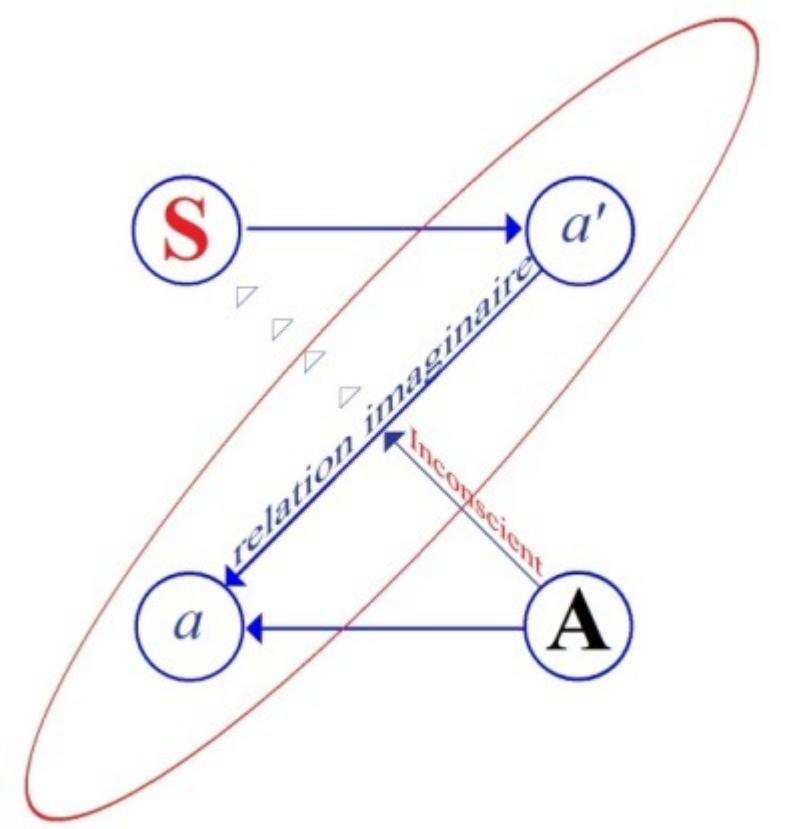
这只是为今天课程划分节奏的一种方式，只是一处停顿。不要把它看作今天课程的根本内容；它只是讲话把我们带到如此晚的时刻以后，时间迫使我作出的切断。

第22课 · 1957年6月19日

学年已经接近尾声；但愿小汉斯也快讲完。课程开始时，我应当提醒你们：今年，我们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修订客体关系概念。现在稍稍后退一步并非无益；不是为了向你们展示所谓“已经走过的道路”——人总会走过一些路——，而是展示某种祛魅效果；你们知道，我非常看重它。

谈到分析，分析训练似乎至少应当满足一项最低要求：人必须察觉，如果人确实同这些本能打交道——无论人们怎么说，我相信这些本能，包括死亡本能——，如果这就是分析带给我们的根本内容，那么，一切就不可能归结并抵达一个如此简单而天真的公式。然而，我们经常看到精神分析家赞同它：仿佛只要抵达最终目标，让主体同同类的关系成为所谓“人与人”的关系，而非同一个对象的关系，一切就都解决了。

我并不厌弃“客体关系”这个术语；恰恰相反，我试图在这里向你们展示它真实的复杂性。况且，为什么我们的同类不能有效地成为一个对象？我甚至还要说：但愿他真是对象！因为分析向我们显示，通常且起初，他甚至远不如对象；他只是某种东西，前来填补我们追问内部的能指位置——只要神经症正如我一再告诉你们的那样，是一个问题。



- 对象绝不是如此简单的东西。
- 对象确实必须被赢得；而且，正如弗洛伊德提醒我们的，若不先失去它，就永远无法赢得它。
- 对象始终是一项重新赢取。只有重新占据某个最初被他撤空的位置，人才能抵达那个被不恰当地称作自身整体性的东西。

至于人格，你们应当清楚：我们当然希望，自己同某些真正代表人格丰满性的主体之间能够建立某种东西。然而，归根结底，这恰恰是最难推进的场域，也是各种滑脱和混乱纷纷建立的场域。

人们通常设想，人格显然就是我们像承认自己一样，承认其有权说“我”的东西。但是，每当需要以完整意义说“我”时，我们显然都是世上最窘迫的人；分析经验强烈凸显这一点。它正好向我们表明：每当把他者设想成一个说“我”的人时，我们最常滑入的做法，就是让他说出我们自己的“我”，也就是把他诱入我们自己的幻景。

简言之，正如我去年精神病研讨班末尾向你们强调的，真正最难实现的不是“我”的问题，而是同人格相遇时的“你”的问题。一切都向我们显示，这个“你”是界限能指，是某种我们最终总要停在其半路的东西。

然而，我们仍从它那里接受一切授任。去年研讨班结束时，我停在“你就是将跟随我的人”或“……将不跟随我的人”，“将做这件事的人”或“……不会做这件事的人”，绝非偶然。

如果说分析经验向我们显示了某种东西，那恰恰是：一切人际关系都奠基于这种确实来自大他者的授任。这位大他者早已以无意识形式存在于我们之中；不过，我们自己的发展若不经过那个把作为言语所在地的绝对大他者包含在内的星丛，就什么也无法实现。

如果俄狄浦斯情结有意义，正因为它把那个拥有言语、能够说话的人——父亲——的存在，设为我们进展以及安置在实在界与象征界之间的基础。总而言之，它把这个存在具体化为一种本身根本成问题的功能；我再次提醒你们这一点。

“父亲是什么？”这项追问归根结底位于分析经验中心；至少对我们分析家来说，它永远没有得到解决。今天，我想从这一点重新讨论小汉斯的问题，向你们展示他相对于父亲是什么、又不是什么，位于何处。为了从更高处重新开始，还要提醒你们：唯一能够对父亲问题作出完整而有效回应的地方，无疑位于某种传统之中。它并不是隔壁房间，

正如我谈现象学时常说的那样［参见上文：浴室与书房］。这里我们要说：是隔壁那扇门。

如果父亲能够在某处找到自身综合与完整意义，那就在一种称作宗教传统的传统中。我们在历史进程中看到，只有犹太—基督教传统尝试这样做，绝非偶然：它试图依照“潜能”与“实现活动”的对立原则，在两性之间建立一致，而这种对立通过爱得到中介。

不过，在这项传统以外，必须说，一切对象关系都蕴含我们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看到得到衔接的第三维度。后来，伪亚里士多德——那部远晚于他的时代才归到他名下的《神学》中的亚里士多德；每个人都知道这部书存在，也知道它是伪作——恰恰删除了这个维度。

关于对象的整个构成，绝对根本的亚里士多德术语正同第三项剥夺相对。今年我是从剥夺概念出发的，你们已经看到：分析文献和弗洛伊德学说所建立的全部客体关系，都围绕这个概念旋转。

剥夺概念在其中绝对居于中心；离开剥夺，我们就不能理解：无论男人还是女人，要整合并进入自身性别，全部进展都要求双方承认某种东西——

- 对其中一个性别而言，它根本是一项必须承担的剥夺；
- 对另一个性别而言，同样必须承担剥夺，才能充分承担自身性别。

简言之：一边是 Penisneid［阴茎嫉羡］，另一边是阉割情结。当然，这一切同最直接的经验会合。格外奇怪的是，人们以或多或少遮掩、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不诚实的形式重新提出这样一个观念：一切生殖器性的成熟都包含奉献性，包含对他者的充分承认；凭借这一点，男人与女人之间那种受到假定并预先建立的和谐就应当确立。可是，我们明明看到，日常经验几乎只是这场和谐的不断失败。

请你们更直接地去告诉今天的妻子——正如那位以亚里士多德为名、经过整个中世纪与经院传统的无名神学家所说——，她是“潜能”，而你这个男人是“实现活动”。她会立刻回答：“我可不干！你把我当成一团软面吗？”事情十分清楚：女人同我们一样，掉进了同一批问题之中。

甚至不必处理问题的女性主义或社会面向，只需引用阿波利奈尔放进泰蕾兹—蒂蕾西亚——更准确说，她丈夫——嘴里的精彩四行信条。他躲避记者时说：

> “我是一位诚实的女人—先生，
> 我的妻子是一位男人—女士。
> 她带走了钢琴、小提琴和肥缺，

> 她当了士兵、部长、粪医，等等……”[阿波利奈尔：《蒂蕾西亚的乳房》，第一幕，第七场]

我们当然必须双脚站稳在经验的场地上，并看到：如果分析经验确实推进了一个问题——我们的生命发展乃至神经症全部经验使它越来越鲜明——，正因为它懂得把两性关系安置在客体关系的不同层级上。但这是什么意思？

它意味着——人们早已看出这一点；如果因为一种完全不配的羞怯、虚假羞怯而不肯看见，也不过是在它上面蒙上一层面纱——，分析若确实推进了某种东西，恰恰就在必须直呼其名的层面：色情性。在这里，两性关系得到澄清，因为它们走在通往某种融合、实现以及回应主体围绕自身性别所提出之问题的道路上；性别既已进入世界，却从未在那里得到满足。

至于其余内容，也就是著名而完美的奉献性——据说男人与女人的理想和谐最终在那里实现——，我们只能在极限地平线上找到它；我们甚至不能把这个目标指定为分析应当实现的目标。

如果想对我们的探究进展保持一种健康视角，就必须知道：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一旦得到确认，这道豁口始终保持敞开。归根结底，为了让某种最终之物在哲学家——也就是能够从游戏中全身而退的人——眼中尚可接受，女人、尤其是妻子便根本发挥她对苏格拉底发挥的功能：检验他的耐心，检验他对实在的耐心。

为了更生动地进入今天将为我正在断言之物继续断句、并把我们带回小汉斯的内容，我要援引报纸之王的一则消息；更准确说，是一位优秀朋友从中读到并转述给我的消息。

大约十天前，他读到这则来自美国深处的小新闻：一名女人以永恒爱情的盟约同丈夫联结——你们马上会看到怎样联结。丈夫死后，她严格每十个月让自己为他生一个女儿。

这也许令你们有些吃惊；不要以为这是孤雌生殖现象。

恰恰相反，这里涉及人工授精。这名献身永恒忠贞的女人，在丈夫最后那场致命疾病期间，让人储存了足量液体，使自己能够随心延续亡者的血脉；正如你们看到的，间隔极短，而且可以说反复进行。

这则新闻看似微不足道；我们其实原本能够想象，却必须等到它实际发生。在我看来，再没有比它更醒目地说明我所谓父亲身份的 x；归根结底，我想你们不会看不出，这种可能性会引入哪些问题。

当我告诉你们“象征父亲就是死去的父亲”时，我想你们在这里已经看到一个说明。不过，这则新闻还引入新东西，正好凸显这项评论的重要性：在这个病例中，实在父亲也是死去的父亲。从此，追问俄狄浦斯情结在此情形中会变成什么，实在很有意思。

在最初、最贴近经验的层面，人们当然很容易围绕“性冷淡女人”在极限处可能意味着什么，讲几句俏皮话。新谚语会说：“女人冷淡，丈夫冷藏。”这里还可以用上我一位朋友创作的广告口号；他原本想用它宣传某个“冰箱”品牌。

确实，这个口号放到盎格鲁—撒克逊心灵中总遇到困难；可是，恰恰在这里它会取得价值。我们可以想象一张漂亮海报：这些女士神情紧绷，下面

写着：“She takes care of her frigid air until she turns her husband a Frigidaire.”［她维护自己的冷淡气息，直到把丈夫变成一台冰箱。］

眼前这个病例恰好也是如此。说实话，它精彩说明了真正的问题：父亲概念，即使作为实在父亲，也绝不能同他的生育力混为一谈。

我们清楚看到，问题在别处；而且不能不看到，这会把我们带入“俄狄浦斯情结概念将变成什么”的问题——我把外推留给你们。因为一旦走上这条道路，

一百年后，我们会让女人生出今天在世天才的亲生儿子；到那时，这些天才的液体一直珍藏在小罐子里。

问题确实产生：在这里，人们以最彻底的方式从父亲身上切掉了某样东西，看来也切断了他的话语。于是问题显然在于：祖先的话语将怎样、通过什么道路、以何种方式写入儿童心理？归根结底，母亲将成为这项话语唯一的代表和载体。可以这样说，她怎样让装进罐头的祖先开口？如你们所见，这完全不是科幻小说，只不过有一个好处：使问题的某个维度赤裸呈现。

这是顺带的插话。刚才，为了解决婚姻问题的理想方案，我曾把你们指向“隔壁那扇门”；现在，面对神圣丈夫死后授精的问题，看教会将怎样设法表态，会很有意思。

确实，在这类情形中，教会若援引自己通常置于前景的“自然实践”之根本性质，人们就能提醒它：恰恰因为我们已经彻底分离出“不属于自然”的东西之性质，这种实践才得以引入并成为可能。因此，也许必须明确“自然”一词；当然，人们将不得不强调迄今所谓“自然”之物深刻的

人为构造面貌。简言之，到了那时，我们作为参照术语也许不会完全无用。我们的好友弗朗索瓦丝·多尔多，乃至她的一位学生，也许会同时成为教父。

简言之，关于想象界、象征界与实在界的全部问题，也许仍不足以单独提出这个问题的各项术语；它既然已经能够进入现实，在我看来绝非接近解决。不过，这会让我们更容易像今天希望的那样表述：我们所谓“父亲功能的认可”不在自在层面、而在对主体而言的层面，能够以怎样的术语写入。在这阵揭露布景支柱的穿堂风吹过以后，对主体而言，任何可以说对父亲功能的引入，都呈现为一种隐喻经验。

我不会用新东西压垮你们，而会提醒你们：去年我曾在什么标题下引入这里所谓的隐喻。隐喻是能指链的一项功能和用法；它使用的不是能指链的连接维度——一切对能指链的转喻用法都安置在那里——，而是替代维度。

去年，我没有跑很远去寻找例子；我强迫自己从人人触手可及的《基耶词典》里找，采用它给出的第一个例子，也就是雨果的诗句：“他的禾束既不吝啬，也不怀恨。”你们也许会说，运气对我格外眷顾，因为今天这句诗正好像戒指套上手指一样契合我的论证。［《沉睡的波阿斯》，《历代传说》第一卷］

任何隐喻都能用于类似论证；但我还是要重复这个例子，因为它恰好把我们带向今天的问题，并带回恐怖症主题。隐喻是什么意思？它不是超现实主义者所谓的“诗意火花在想象中尽可能悬殊的两个术语之间跃动”。这个说法看似吻合，因为那捆可怜禾束当然谈不上吝啬或怀

恨；像这样解释，也就是借助否定建立关系，而否定当然以可能的肯定为背景，确实具有一种完全属于人的奇异性。

总而言之，禾束当然既不吝啬，也不怀恨；吝啬与仇恨是属于波阿斯的属性，并不比属于禾束更少。至于这些属性和美德，波阿斯对两者都作出合宜运用，既不征询意见，也不向其中任何一方倾诉感情。

隐喻创造发生在什么与什么之间？一边是“他的禾束”这一术语所表达的东西，另一边是禾束所替代的人，也就是刚才用对称措辞向我们介绍的波阿斯先生。正因为禾束在那里占据了波阿斯的位置——他已经处在一个稍有累积性质的位置上，具有既不吝啬也不怀恨的品质，也就是清除了若干负面德性——，禾束才来到他的位置，并在一瞬间逐字把他取消。我们重新找到象征符号作为“物的死亡”的图式。

这里甚至更进一步：人物的名字被抹除，他的禾束前来取代。如果这里有隐喻，如果它有意义，如果这构成田园诗的一个时刻，恰恰因为像他的禾束这样根本属于自然的东西能够替代他。波阿斯先是隐没、遮蔽、抹除，随后又在我所谓“禾束那恰好丰饶的光芒”中重新出现。

他确实既不吝啬、也不怀恨，纯粹就是自然的丰饶性；这恰好在后面的诗段中取得意义。诗要向我们宣告——或借随后到来的梦向波阿斯宣告——：尽管他已经年迈，依本人所言八十岁，却很快会成为父亲。那棵大树将从他和他的腹部生出；文本说，一位国王在树下歌唱，一位上帝在树顶死去。

我由此向你们显示隐喻的功能——人类文化中一切新意义的创造，根本上都属于隐喻——；

一种替代在取代某物的同时又维持它；就在被抹除、删除之物同其替代物之间的张力中，某种新东西得以通过。诗的即兴展开把它清楚引入；在这里，波阿斯神话明显赋予新东西以形体：它是一个新维度，也就是父亲身份的功能。

还可以把问题推进很远。像往常一样，年迈的雨果在这首诗中远非始终沿严谨道路前进，时而向左、时而向右蹒跚；不过，下列内容十分清楚：

“他沉睡之时，摩押女子路得，
袒露胸膛，躺在波阿斯脚边，
等待天知道怎样的陌生光线，
当苏醒的亮光忽然到来。”

请你们注意，这种风格怎样处在一个双义地带：现实主义同某种过分赤裸乃至浑浊的光混在一起，让人想起卡拉瓦乔画作中的明暗对照；尽管带着全部民间粗粝感，它们也许仍是今天最能向我们传达神圣维度意义的东西。稍后，问题仍然相同：

“一动不动，在面纱下半睁眼睛，
哪位神，哪位永恒夏日的收割者，
离去之时漫不经心地抛下
这把金色镰刀，在群星的田野？”

无论去年教学，还是近来围绕波阿斯与路得诗中这捆禾束写下的内容，我都没有进一步探究或评论诗人把隐喻发展到何处。我把镰刀放到一边，因为脱离诗文以及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工作，它也许会让读者觉得有些强迫。

不过，我不认为你们会不被一点触动：整首诗都指向一幅意象；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当然一直惊叹它具有何等神奇的直觉性

与比拟力量。它就是细而明亮的新月。

然而，你们不可能忽略：如果这个意象有分量，而不只是一处美丽的绘画笔触——蓝色天空上的一抹黄色——，恰恰因为天空中的镰刀是母性那把永恒的镰刀。它已经在克洛诺斯与乌拉诺斯之间、朱庇特与克洛诺斯之间发挥过自己的小小作用。这种女性性，

也就是我刚才谈到、由女人这场神话式等待清楚代表的潜能，始终在那里；镰刀就拖在她伸手可及的地方。拾穗女人会用它切断——请允许我这样说——相关的禾束，而弥赛亚的谱系将从中重新喷涌。

只有从这些术语出发，我们才能正确设想小汉斯恐怖症的发展、创造与解决，并把它写成方程。请注意，在俄狄浦斯情结中，儿童连同自己相对于母亲的一切问题，处在 x 的位置；只有当某种事情发生，构成父亲隐喻，那个对一切个体发展都至关重要、称作阉割情结的能指要素，才能得到安置。

相关知识卡 父亲隐喻与父之名

我说的是男人和女人双方；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提出下列方程：



如果 P 是父亲隐喻，X 则依病例、发展节点以及前俄狄浦斯期把儿童相对于母亲带到的问题而或多或少遭到省略；那么，我们可以在俄狄浦斯隐喻的联结中写下对一切对象概念都至关重要的阶段：随你们写作一个 C 或镰刀，再加上恰好构成意义的某种东西——存在在那里重新找到自身，X 也在那里找到解决。俄狄浦斯跨越的

相关知识卡 父亲隐喻与父之名

根本时刻就位于这样的公式中。

小汉斯病例所面对的恰恰就是这一点。正如我向你们解释的，在同母亲的关系中，有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发展到当前阶段，母亲已经变成一种如此复杂的东西——母亲 + 阳具 + 小 a——，并带来全部复杂后果。

小汉斯抵达这个僵局，却无法从中出去……

- 因为没有父亲；
- 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把他同母亲的关系隐喻化；
- 总而言之，因为他在另一边没有其他出口。 他在那里找到的不是镰刀，不是阉割情结的大写 C，也不是先失去、再重新找到阴茎这种中介可能；只有母亲可能的咬击……当他感到母亲缺失时，他也正用同一种咬击贪婪地扑向她；因为除了当前全部分析理论凸显的吞噬关系，他同母亲没有另一种实在关系……正因为抵达这个僵局，他不知道还有另一种同实在的关系；无论对错，人们把它称作“口腔—施虐性”关系。于是，小写 m，或者 m 加上当时对他构成

实在的一切——尤其是刚刚显露、必然复杂化情境的实在，即 Π，他自己的阴茎——可以写作：

$$(M + \varphi + A)\, M \sim m + \Pi$$

问题既然以这种形式向他呈现，就必须引入唯一剩下的隐喻性中介要素：马。也就是说，小汉斯恐怖症的建立，可以写进我刚才给你们的同一公式：

$$\left(\frac{\text{'}\Iota\pi\pi\text{o}\varsigma}{M + \varphi + A}\right) M \sim m + \Pi$$

……带粗气符的 ἵππος 表示马，M 表示母亲。它会等同于某种并未因此得到进一步解决的东西：咬击。对他而言，这是其全部现实的最大危险，尤其是刚刚显现的生殖器现实的最大危险。

这也许令你们觉得人为。不要这样想；先开始使用它，随后看看是否真能提供帮助。我可以立刻向你们显示它的一千个可应用面向，尤其是：被说成会咬、会威胁阴茎的马，也是会倒下的马；根据小汉斯本人的话，马正因此受到引入。

马起初作为某种东西被引入：它套在运送小莉齐行李的货车前，能够回过头咬人。不过，他告诉我们，自己正是在那里“染上了蠢念头”。更准确说，某种已经钩在一个意义上的东西，被他作为远远超出一切意义之物保留下来；他以一句格言或定义式断言为它盖章：

“现在，每一匹马都会倒下。”

母亲根本上正通过坠落功能得到引入；在小汉斯抵达的这个时刻，它是方程下半部分一切相关内容的共同项。

母亲由这项共同功能被带入。

$$\left(\frac{\text{Ἵππος}}{\text{M}+\varphi+\text{A}}\right)\quad \text{M} \sim \text{m}+\Pi$$

我们已经强调“母亲坠落”这个要素：母亲的阳具再也无法维持；游戏已经玩不下去，但他仍竭力维持它的存在。最后，小安娜正是他最希望看到倒下的东西，甚至还想稍稍推她一把。

马以有效、形象且仿佛主动的方式，把所有这些坠落功能汇集起来；正因为履行它们，马才开始作为根本项被引入，成为恐怖症的术语。我们由此看到，真正为人类心理确立并安置的对象是什么。

正如我刚才说过的，它也许配得上对象这个名称；不过，一旦我们处理的对象是恐怖症对象或恋物，就怎样强调“对象”定性需要单列专章都不过分。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何等作为对象存在：以恋物及其移位为例，它们必须在主体心理中构成欲望真正的里程碑。

在恐怖症中，这个对象既是实在中在场的某种东西，又明显同实在有别；另一方面，只有通过这种能指形式化，概念才能接近它。必须承认，迄今还没有人提供更令人满意的概念化。如果我似乎以比过去稍

微复杂的形式向你们呈现它，也请注意：弗洛伊德在著作末期最终同样这样谈论它。

当弗洛伊德完整衔接恐怖症、重新以小汉斯为例时，他把马变成一个替代一切意象和混沌意义的对象；主体的焦虑无法从围绕这些东西的模糊物中沉淀出来。弗洛伊德把它变成近乎任意的对象——正因此才称作信号。借助这项信号，混乱场域内部能够界定一些边界。边界即使任意，仍引入划界要素；至少在可能性上，它确保秩序开始形成，构成象征界与实在界之间有组织结晶的第一个结晶核。

这恰恰是所谓汉斯"分析"进程中将要发生的一切——如果可以在完整意义上把汉斯病例中发生的事情称作分析。我要提醒你们：至少从琼斯先生的叙述看来，分析家似乎仍未理解弗洛伊德为什么作出保留，说这是一个绝对例外的病例。它能够由儿童自己的父亲进行和完成；父亲固然受弗洛伊德指导，却仍是儿童自己的父亲。因此，弗洛伊德几乎没有把可能推广这种方法建立在充分基础上。

分析家似乎惊讶于弗洛伊德这种谨慎。他们最好更仔细地观察，并追问：这场分析恰恰因为由父亲进行，是否呈现一些特殊性质，至少部分排除了严格的移情维度？换言之，安娜·弗洛伊德小姐经常讲的一句蠢话——儿童分析不可能有移情——，是否恰恰只适用于这个由父亲进行的病例？

当然，任何由分析家实施的儿童分析都再明显不过地存在移情；它同成人那里一样，甚至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清楚。可是，这个病例有些特殊；后面我们会揭示其后果。

无论如何，我们能够围绕这样一个公式，以最严谨方式为父亲介入的全部进展断句。这个公式很有用——我想下次会向你们显示——，因为它让我们真正确定：为什么父亲有些介入毫不结果，为什么另一些介入却发动

神话转化的运动；小汉斯病例中的这道方程正借此取得效力，

因为它的进展可能和隐含的隐喻丰富性——也就是这类方程获得转化的可能——以最快速度介入并显现。

今天，我只向你们显示用同一种形式化写出的最终和极端项。我已经讲得足够多，能让你们设想并理解我将写下的分量。最后看到的无疑是一项解决；它把小汉斯安置进一个可以生存的所谓客体关系界域。

从俄狄浦斯整合角度说，它完全成功了吗？下次我们会更仔细地考察。现在已经能够看到，它在哪些方面成功、又在哪些方面没有。如果依照文本阅读小汉斯最后对自身位置的表述，他告诉我们：“现在我是父亲。”观察全程中，他不得不不断刺激、哀求自己的父亲：“你倒是做父亲该做的事啊！”我们无须追问，他要怎样处理这样的父亲。那场同父亲发生的最后一个精彩幻想显示：父亲仿佛刚好在火车站台追上他，可事实上，小汉斯早已撒腿跑在前面；他同谁离开？仿佛偶然地，是同祖母。父亲首先问他：

- “现在，如果你代替我当父亲，你会做什么？”
- “噢！很简单，我会每个星期日带你去看外婆……”

父子关系没有任何改变。因此，可以推测这里并未实现完全典型的俄狄浦斯情结。只要懂得阅读文本，就能很快看出：同父亲的一切联结远未切断，甚至通过这场分析经验牢牢打结；但正如小汉斯说得非常清楚：“从此以后，你就是祖父。”

他确实这样说，可在什么时刻？请仔细阅读文本：他说自己是父亲以后。这个祖父完全单独来到这里；只有先谈到母亲——我们会看到她在此是哪一类母亲——，才转而谈到另一个将成为祖母的女人。

可是，从小汉斯自身的视角来看，这位祖父同祖母之间没有任何联结。弗洛伊德颇为满意地强调，小家伙以非常优雅的方式解决了俄狄浦斯问题：从此娶母亲为妻，把父亲送给祖母。他这样说并非毫无理由；不过，这远不能让我们完全放心。这是一种优雅乃至幽默地回避问题的方式；但弗洛伊德迄今写下的一切，都没有表明我们能够把这项也许显而易见的解决视作俄狄浦斯情结的典型解决。

总而言之，从此以后，小汉斯确实在谱系秩序中保持某种连续性。如果连这一步都没有抵达，他就什么也没有解决；严格说来，恐怖症的功能也会完全归零。

小汉斯把自己设想成父亲，这受到大致可以写成下述形式的东西制约：母亲就是祖母；发展终点处，母亲分裂成两个。这个点极其重要。小汉斯承认了某种东西，使自己找到一个三脚架式平衡；正如我们始终所说，这是对象关系能够建立的最低条件。父亲那里没有找到的第三项，恰恰在祖母那里；他已经看得太清楚，祖母在客体关系中具有绝对决定性、乃至压倒性价值。

小汉斯恰恰通过在母亲背后附加第二个母亲，把自己的亲生父亲［置为祖父］，并让自己建立在一种父亲身份中。哪种父亲身份？恰恰是想象的父亲身份。从此以后，小汉斯告诉我们什么？谁会有孩子？是他自己，他说得非常清楚。可是父亲冒失地问：

- “你会同妈妈生孩子吗？”
- “当然不会，”小汉斯回答，“这是什么话？你告诉过我，父亲不能独自生孩子；现在反倒要我生吗？”

儿童与父亲的对话在这里出现一次非常醒目的摆荡，准确显示一切属于父亲创造本身的内容怎样真正遭到压抑。与此相反，他从这一刻起衔接的是：自己会有孩子，但只是想象的孩子。他想要孩子——以最准确、最清楚的方式说自己希望拥有——，另一方面又不愿母亲再有孩子。换言之，他极其明确；关于未来，他首先希望取得的保证就是：母亲不再生孩子。

为此，人们什么都愿意做，甚至慷慨行贿——我们毕竟面对一个资本家的小后代——那位最卓越的生育者。下次我会回到它，向你们展示其真正面貌，因为这是一个极重要的要素：拥有奇异面孔的最高生育者——鹳鸟。下次我们会准确看到，应当赋予它什么位置和功能。小汉斯甚至愿意贿赂鹳鸟父亲，以免再出现实在儿童。

儿童身上某种父亲功能同母亲发生根本区分；这项想象功能又取代母亲：他会像母亲一样有孩子，并照顾自己的想象孩子，正如他已经彻底解决儿童概念，连小安娜也包括在内。这就是围绕小安娜的幻想；上次已经开始谈论，下次还会回到。围绕箱子、鹳鸟以及早在出生以前便已存在的小安娜，他的全部幻想都在于把她想象化、幻想化。

因此，他会有幻想性孩子；他将成为一个根本上属于诗人的人物，成为想象秩序中的创造者。

他赋予这些想象创造的最后形式，是所谓洛迪。人们问他：

- “这个洛迪是什么意思？”

父亲非常感兴趣：

- “是巧克洛迪吗？还是萨法洛迪？”

Saffalodi 的确意为小香肠。这个形象根本属于想象界，具有阳具形状。总而言之，那项既未被让出、又永远为母亲想象的阳具发生了想象转化；我们在小汉斯身上看到，它以这种形式得到复制。

对他而言，女人永远只会是那些妹妹—女儿的幻想；他的整场童年危机都围绕她们旋转。它不会完全成为恋物，因为它恰恰会成为可以说“真正的恋物”：他没有停在写在面纱上的东西，而是重新找到自己对象典型的异性恋形式。

尽管如此，他同女人的关系从此而且永远无疑都会受到这种自恋起源的标记；他正是在这段起源中，相对于女性伴侣把自己调整到正位。总而言之，女性伴侣不是从母亲本身产生，而是从他能够为母亲制造的想象孩子产生；这些孩子本身则继承那项阳具——同母亲建立的原初爱恋关系和捕获母爱的全部游戏，都曾围绕它展开。

所以，最后一方面，小汉斯确认自己作为新父亲——作为 Vati——同母系谱系的关系；另一方面，在方程第二部分与它相应的是：小安娜

骑在马上，相对于所有车辆、整个列车以及母亲拖在身后的一切取得支配位置。

小汉斯正是通过小安娜，做到我们上次所谓他所做的事情：支配母亲。他不只鞭打她；后续故事显示，他还看到母亲腹中有什么，也就是取出那把阉割性小刀。如今小刀确实已经取出，母亲变得无害得多。

同先前公式相对，这个公式标示小汉斯转化的终点。小汉斯当然会具有正常异性恋者的一切表象；不过，他为抵达这里而走过的俄狄浦斯道路并不典型，它关联于父亲的缺失。你们也许惊讶这种缺失竟如此巨大，

但观察的整条路线随时都显示父亲的失灵与缺陷；小汉斯本人不断呼唤，也在不断强调它。因此，恐怖症的进展与解决最终带有非典型标记，当然不足为奇。

这里只要求你们保留两个极端项，看到人们可以、也能够设想通过一系列阶段衔接一项向另一项的转化。当然，不宜过于系统化。可以说，这种逻辑是新的；如果继续追究，也许它只会引入若干有关自身形式的问题，让我们追问：它是否绝对服从其他逻辑领域已经形式化的同一法则？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当然已经开创某种工作：他告诉我们，无意识的逻辑——换言之，无意识中能指的逻辑——肯定不同于我们习惯操作的逻辑。《梦的解析》足有四分之一篇幅根本致力于显示，若干重要逻辑衔接——“要么……要么……”、转置、因果性——怎样能够转移到无意识秩序。它也许不同于惯常逻辑，正如拓扑学不同于通

常几何。你们知道拓扑学是什么：橡胶几何。这里同样涉及橡胶逻辑，也许要求我们为若干术语下定义，借以界定这种橡胶逻辑。

但这不表示一切都可能。尤其是，两个彼此穿套的环［原文如此］，在得到进一步通知以前，没有任何东西允许我们把它们解开。这是为了告诉你们：橡胶逻辑并未注定享有完全自由。

简言之，小汉斯恐怖症解决的终点出现了某种配置，

也就是：尽管父亲行动在场、甚至反复坚持，小汉斯仍把自己写入

一种母系谱系；更准确、也更严格简单地说，是母亲的复制。仿佛那里必须有第三个人物；既然不是父亲，就由那位著名的祖母补上。

另一方面，还有某种东西把他同从此成为其欲望对象的对象相连。我已经强调，病史提供证词：某种东西把他根本性地系于格蒙登和妹妹。也就是说，他系于小女孩，系于作为母亲女儿的儿童；但她们也是他的女儿，是想象的女儿。

他同女人之关系原初的自恋结构，已经在恐怖症解决的出口处得到指示。经历恐怖症会留下什么痕迹？

一种格外奇特的东西：小羔羊的角色。最后，小汉斯告诉我们，自己同它进行非常特别的游戏，例如让羔羊把自己撞来撞去。人们有一天曾试图让妹妹骑上这只羔羊，也就是把她放到幻想所谓“大箱子”的位置。

妹妹进入汉斯的想象；如果你们记得，正是她骑在马上。这是马恐怖症解决以前的最后阶段：妹妹必须先支配它，小汉斯才能以马应得的

方式对待它——也就是抽打它。此时，马与母亲之间的等价关系得到确保：打马也是打母亲。最后，妹妹骑过的东西仍留下来，也就是这只羔羊。这便是终点保留的配置。

我实在无法拒绝自己这个乐趣，也不能不把这个谜交给你们：我要向你们展示，我们的导师弗洛伊德在达·芬奇分析中让论述围绕旋转的东西。它不是《岩间圣母》：



而是卢浮宫收藏的《圣母子与圣安娜》大型画作；在它以前，还有一幅收藏于伯灵顿大厦的素描：





弗洛伊德对达·芬奇的全部分析，都围绕这个面容格外雌雄同体的圣安娜旋转——她确实很像《施洗者圣约翰》——，



……还围绕这幅圣母子。人们在这里特别指出：不同于伯灵顿大厦的素描，表弟施洗者约翰恰好由一只小羔羊取代。

这项极其独特的配置没有逃过弗洛伊德的注意；它真正构成其论证的硬核，构成《达·芬奇童年的一段回忆》这部极其独特著作的硬核。

我希望你们在学年结束以前花工夫阅读《达·芬奇童年的一段回忆》；也许我会以它为研讨班收尾。如果阅读这篇童年回忆时，你们没有察觉首次引入"自恋"一词的整个情境何等不可思议地谜样，没有体会在那个写作时刻写出这种东西近乎疯狂的大胆……

此后，我们竟成功地逐字把它作盲点处理，
没有认识到弗洛伊德著作中存在这类东西……

请阅读它，以便看出，归根结底要弄清弗洛伊德想说什么何其困难；同时也请阅读它，以便看出，尽管存在一切错误——那里确实有错误，但无关紧要——，论述又何其严密自洽。

我请你们去了解并阅读《达·芬奇童年的一段回忆》这篇文章。

这项独特配置仿佛向我们呈现一幅 humanissima trinità［至为人性的三位一体］：非常人性、乃至过于人性的三位一体，同它所取代的 divinissima［至为神圣者］相对。我们还会回到它。我想先把下面一点作为待建之石标在这里：一种怎样独特的必然性，使我们找到第四项？它以小羔羊这项余项形式出现；在这个动物项中，我们重新找到恐怖症本身的术语。

第23课 · 1957年6月26日

今天要用稍微不同的方式，把小汉斯观察中发生的事情形式化。如果它有价值——而且只有一种价值——，那就是首先更紧密、更严谨地包围观察本身所包含的内容。

当然，小汉斯观察有各种可以推开的落地窗。既然是马恐怖症，人们就能围绕马无休无止地妄想，因为马归根结底是一种格外独特的动物；它同整个马神话中反复出现的那匹马相同，也确实能够同小汉斯的马相比较。

弗洛伊德通信对象之子弗利斯占据一个体面位置。他为弗洛伊德百年纪念专号撰写了题为〈种系发生经验与个体发生经验〉的文章[注1]，其中有一番颇有价值的推演。它确实格外醒目，恰恰因为如此不合适。

> [注1] Robert Fliess：Phylogenetic versus Ontogenetic Experienc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1956 年，第 37 卷（弗洛伊德百年纪念专号）。

汉斯病例显然还有谜没有解决；弗利斯努力加以解决，为案卷带来整套庞大外推。它只有一个完全无法辩护的缺点：恰恰预设未解决之物已经解决。格外醒目的是，他以完全有效的方式，把问题集中在小汉斯同父亲那场著名对话上，也就是我所谓的“大对话”。它大约在 4 月 21 日达到顶峰；小汉斯逐字召唤父亲，对他说：

“你必须妒忌。”父亲本人对这句话的涌现也发挥了作用；人们感到，它由此前的一切酝酿成熟。

［我：“那我究竟为什么骂人呢？”
他：“我不知道！”
我：“为什么？”
他：“因为你在妒忌。”
我：“这不是真的！”
他：“对，这是真的。你在妒忌，我知道。这必须是真的。”］

小汉斯逐字召唤父亲扮演父亲角色；他对父亲说：“你必须妒忌。无论发生什么，也无论你怎样惊恐地否认，这都必须是真的。”一场对话就这样结束；小汉斯在其中展开下述幻想：他想象父亲走进母亲的房间，在那里像小弗里茨过去那样被石头弄伤；父亲撞上石头，必须流血。

我们的作者十分敏锐地强调，小汉斯这里使用的词，让他的话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带着一种更“庄重”的风格；他也清楚指出英译本的不足。真正有趣的不完全是这些评论——它们当然有价值，也显示第一代分析家仍对语言本身的起伏、某些能指的重音和根本作用保持敏感——，而是看到一项相当精细的父亲角色推测怎样展开。父亲亲自介入；作者正确地说，他第一次引入一个词：“schimpf”［schimpfen：责骂］。译文把相关句子译作：“我是在责骂你吗？我让你烦恼吗？”

作者正确指出：这项介入此刻略显突兀，打断了同小汉斯的交流；它推测父亲在多大程度上参与某种据说此时位于小汉斯自我中的东西。

这一切还不算过分大胆的外推，却显露作者不得不告诉我们：某种东西此时正在构成，因为事情必须如此，因为它早已蕴含在一种必须应

用于病例的预成界域中。无论如何，这里有某种东西让我们鲜活把握作者表达时的犹豫。

他当场把它译成："如果它正在诞生。"它肯定还没有出生；超我的诞生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作者此时援引伊萨科沃先生的工作；后者大力强调听觉领域在超我形成中的主导地位，也就是说，他确实预感到我们围绕言语功能在某场规范性危机——也就是俄狄浦斯情结——发生中的作用而不断提出、重新提出的整个问题。

伊萨科沃先生还围绕某种东西有时可能怎样表现作出有趣而中肯的评论：我们可以说把握到它的支架，一套构成超我的装置和形式网络。他在主体听见某种纯粹句法调制的要素中把握它；严格说来，那是空洞的话，因为问题只在话语的运动。伊萨科沃说，在这些带有一定强度的运动中，我们能鲜活把握一种必然关联于完全古老要素的东西。

儿童必须在某些时刻开口，把极其原始的时刻加以整合；那时，他只能知觉成人言语的结构，尚未知觉其意义。总而言之，这就是内化，也提供超我严格说来是什么的最初可理解形式。这仍是一项有趣的评论；若在另一场研讨班中，把它同父亲对话放在一组考察，也会很有意思，但绝非为了从中找到任何吻合之物。

人们谈到言语在一般运动和根本结构中的整合，把它视为建立超我内部机构的基础；我们当然不会把它放到同父亲进行最为外化对话的准确时刻，哪怕以为这样能够填补其中的悖论。

我强调一种必要性：尽管我们必须随时为描述的内容寻找一般参照，仍要完成一项工作，使分析经验概念的操作获得某种进展；这项工作必须尽可能紧贴小汉斯观察的运动。

迄今完成的一切，总而言之建立在我们先前评论的若干公设上——它们绝非公设，因为那里包含整套评论工作和对分析经验所给材料的反思。所讨论的公设当然包括例如下述一点：

神经症是主体在自身存在层次提出的一个问题：

- “拥有我现有的性别，究竟是什么？”或者
- “拥有性别是什么意思？”
- “我竟然能够提出这个问题，又是什么意思？”

这引入象征维度：人不只是一只雄性或雌性动物；他还必须相对于受到象征化、称作男性和女性的东西确定自身位置。如果神经症关联于此，那么，在另一种神经症——强迫性神经症——中，它以更加戏剧性的方式关联于此：问题不只涉及主体同自身性别的关系，还涉及他存在这个事实，以及他怎样把自己安置为强迫症者。

“存在究竟是什么？我相对于那个我既是又不是的人怎样存在——因为我仿佛可以免去他？”仅凭这个问题，就足以设想神经症问题是否在这种界域中提出。

如果神经症对主体本人而言是一种封闭的问题，却仍作为问题得到组织和构造，那么我们当然也会更好地理解：只有在组织问题的界域中，我们才能理解

症状是这个经过衔接之问题的鲜活要素。主体不知道自己在这项仿佛活着的问题中衔接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往往也是其中一个处在不同

层次的要素；他既可能位于极其初级、近乎字母的层次，也可能位于更高的句法层次。

正是在这个界域中，我们可以谈论觉醒前（hypnopompique）与入睡前（hypnagogique）的功能；我们辨认并采用语言学家——至少其中一些人——给出的观念：它们是语言衔接的两个大斜坡。

使我们难以在观察评论中保持准确路线和笔直线索的，是始终必须防止自己过于绝对、彻底地倒向摆在面前的任何一边。为了获得观察，我们首先必须分析其自身；

神经症者之问题的特性正是完全封闭，所以它没有理由向纯粹记录它的人交付更多东西。那只会是一篇无法解码、充满谜团的象形文字文本。因此，在弗洛伊德到来以前，人们记录神经症病例数十年，却丝毫没有猜到严格说来这种语言的存在。

所以，只有某种开始解码的东西介入，我们才能恰好把握并看见必要的转化与操作；它们向我们确认、保证，这确实是一篇文本。我们借其中显现的若干结构找到方向，不过，只有对文本进行操作，这些结构才会出现。

我们可以在纯粹切分的层次操作它，就像处理谜题那样……对某些格外封闭、谜样的病例，我们确实这样进行，同坡某篇文字中展示的做法并无太大差别：它让我们想起解码电报的通常操作，即使电报采用密码或超级密码风格……归根结底，我们甚至可以计算哪些符号出现得最频繁，并据此作出有趣假设，例如某个符号对应假定语言中的某个字母；我们正要把密码文本译入这门语言。所幸，面对神经症，我

们已经进行更高阶的操作，也就是重新找到自己熟悉的某些句法集合。

显然，危险始终在于犯错：把这些句法集合过度实体化，推向所谓灵魂、甚至 ἔπος（ epos，言辞 / 史诗）的属性；过度沿某种“自然本能化”方向前进，却没有察觉突然支配一切的是那个组织性纽结。它赋予若干集合以逐字的意义单位价值，也就是通常所谓的词。

因此，最近我曾谈到男孩同母亲那场著名的“认同”。我要提醒你们，这类认同只相对于分析进展的一般运动才会发生；弗洛伊德在这份观察中也极为明确地指出：

“因此，分析的道路永远不能重复神经症发展的运动。”——德文见 1924 年《文集》第八卷第 205 页［《小汉斯》］。［恐怖症从无意识思想形成时会发生凝缩，因此，分析的道路永远不能重复神经症的发展进程。］

我们已经抵达问题核心。在这项解码努力中，必须追随实际在文本中打结的东西；这篇文本本身会使用主体过去的某个要素，在当前情境中

把它作为能指要素。这就是凝缩 x 最清楚的形式之一。

只要从能指要素入手，我们当然不能忽视：它会分解出主体历史中相距很远的两个术语、两个点；但我们仍必须依照它们当前的组织方式解决问题。正因此，我们能够、也必须为每一种组织话语的解决寻找自身法则；不同神经症会以不同方式向我们呈现这些话语。不过，除

了组织话语，还有某种东西进一步复杂化问题：一场旨在解决话语的对话会以怎样的方式开始。

除非我们严格说来把自己的位置提供出来，作为话语部分术语得以实现的场所，否则这项工作无法进行。话语只因是话语，便在某处、从一开始就潜在包含这位大他者；他总而言之是话语善意的位置、见证、保证者和理想场所。

原则上，我们正把自己安置在那里。主体无意识中的要素会由此立刻显露并浮现，也就是一些前来占据我们位置的术语。我们会因此被召入揭示性对话；话语的意义将在对话中得到表述。对话逐步解码话语，向我们显示自己所占据的人物发挥何种功能。这就叫移情。而这个人物

在分析过程中必然发生变化。我们正以这种方式尝试揭示话语的意义。

因此，正是我们自己——作为人格而被整合成能指要素——得到能力、也有义务在这里解决神经症话语的意义。主体间性的这两个平面必须始终维持在眼前；它们是解码历史展开的根本结构。面对任何观察，包括小汉斯，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确定这两个平面。

在小汉斯病例中，我们必须突出同父亲关系的复杂性。因为这里讨论的是父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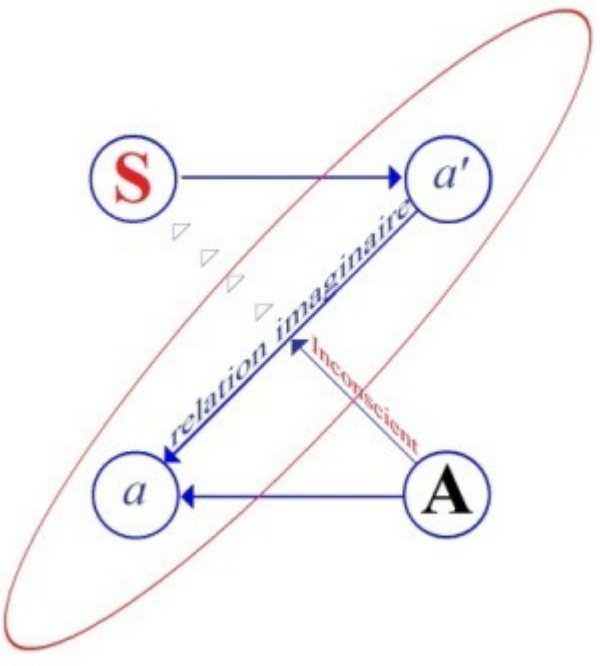
不要忘记，进行分析的正是他。我曾告诉你们，这里有一位现实而当下、同儿童对话的实在父亲，因此已经是一位拥有言语的父亲；但在他以外，还有一位父亲，他的话向这位父亲揭示，并以之作为自身真

理的见证。这位更高、全能的父亲就是弗洛伊德。这赋予观察一项绝对根本的特征；我们应当保留这种特征和结构，因为面对任何关系，都无疑必须辨认它们。

这类更高机构如此内在于父亲人物或父亲功能，以至于总会以某种方式倾向于重新产生。正如我先前评论时已经指出，这恰恰构成病人面对父亲本人——弗洛伊德——那个病例的特殊性。

那里没有分身，弗洛伊德背后也没有超级权威。病人清楚感到，自己面对的就是那个亲自唤起一个新意义宇宙、唤起人同自身意义与自身境况之间新关系的人；他就站在面前，也亲自供面前这个病人使用。

这说明为什么弗洛伊德技术中的结果有时惊人得令人难以置信，介入方式也同样惊人。提出这一点以后，我们能更好地确定兴趣向哪个方向滑动。我的意思是，过去几年，你们看到我加工主体的根本图式……



也就是主体同那个“对他自身而言的大他者”之间的象征关系；这个无意识人物驱动并引导他，而想象的他者、也就是小他者则发挥某种中介屏幕的作用。过去几年，如果你们看到我反复强调这些内容，那么如今也会清楚看到，兴趣正逐渐滑动和移位。我们一步步被带向一种同样具有原初问题、又有别于先前问题的东西：相关话语自身的结构。

今年，我们逐渐移动了兴趣。当然，存在主体间性的法则，存在主体同小他者及大他者关系的法则；但这些不是一切，也无法取消这项原初功能。必须逐步接近它。

事实在于：

- 根本问题是语言；
- 根本问题是话语；
- 话语有自身法则；
- 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不同而独立，尽管二者能够像想象界与象征界的关系那样彼此覆盖。 总而言之，今年围绕客体关系的全部运动逐渐把我们带到这里。

我们看到，一些确实属于对象的要素分离出一个原初位置；它们甚至处在完全原初而奠基、乃至形成对象的阶段。不过，它们同所谓完备意义的对象完全不同，至少远远不同于实在对象；因为这里使用的是能够从不适中抽取出来，却被置于能指功能的对象。

今年，我首先围绕恋物作出这种分离；到学年结束，我至多只再考察恐怖症。但如果你们已经理解，每次谈论小汉斯恐怖症时我们试图投入运作的内容，就会获得一个模型；后续工作可由此进一步深化并扩展到其他神经症，特别是癔症与强迫性神经症。

在恐怖症中，这一点格外简单而富于示范性。每当年轻主体出现恐怖症，你们都会看到，它总涉及一个表面上相对简单的能指。当然，一旦进入它的游戏，它的操作和变化绝不简单；

但从基本层面说，占据［那个位置］的就是一个能指。我曾给出的公式正表达这个意思：

$$\left(\frac{\text{Ἵππος}}{M + \varphi + A} \right) \quad M \sim m + \Pi$$

这些术语涉及母亲关系逐渐加工出来的功能；某种东西逐渐复杂化我们出发时讨论的原初母子关系。那时，我用挫折符号图式 S(M) 说明母亲作为在场与缺席；儿童同母亲的关系在不同年龄的发展中建立于此。

在小汉斯病例中，某种东西首先把我们带到一个极其痛苦的阶段：母亲由于各种附加要素变得复杂；这些要素是：

我曾向你们讲过的阳具；它肯定是任何二元关系中开启关键豁口的要素。当前分析辩证法把二元关系描绘得如此封闭，我们必须看到，这项阳具本身怎样同母亲的想象功能处于特定关系。另一方面，还必须走到另一个儿童［安娜］所代表的东西；她有一段时间把这个儿童赶出母亲的爱，将他驱逐。

对我们话语预设的任何主体来说，这都是典型的关键时刻。儿童恐怖症总会这样出现：某种在特定时刻对解决儿童同母亲之间这场表面无路可出的危机发挥根本作用的东西有所欠缺。

这里不必提出假设。整个分析建构都奠基于俄狄浦斯情结的一致性；它可以用 P(M) 以某种方式图式化。如果俄狄浦斯情结有意义，就表示从某个时刻起，人们通过父亲的功能考察并体验母亲。这里的“父亲”写作大写　P，因为我们假定它是绝对意义上的父亲，是象征父亲层次

的父亲，是父之名。父之名在这种复杂性中确立父亲的存在；父亲正以这种复杂形式向我们呈现，而全部精神病理经验又通过俄狄浦斯情结为我们分解这种复杂性。归根结底，它无非就是这一点：引入这个象征要素，为儿童同母亲的关系带来一个崭新而彻底的维度。

相关知识卡 父亲隐喻与父之名

我们必须从经验材料出发。这里存在某种东西；如果只作大致表示并保留后续评论，它可以近似写成：

$$\left(\mathrm{P}\right)\mathrm{M} \sim (-\mathrm{p})\left(\frac{\mathrm{X}}{\Pi}\right)$$

X 下方的 Π 表示实在阴茎；(－p) 恰恰是作为某种想象对抗同儿童相对的东西，也就是父亲的想象功能——只要父亲具有攻击性、在阉割情结中发挥作用。若逐字理解弗洛伊德经验并尝试形式化，我们至少暂时必须承认阉割情结的恒常性；全部经验也确认这一点。

无论此后围绕它发生过哪些争论，我们始终保留这项参照：母亲关系中发生某种事情，把父亲作为根本象征因素引入。父亲拥有母亲，正当地享用她；这是一项完全根本

而成问题的功能，它可能碎裂或减弱。与此同时，同它保持连贯的另一种东西会发挥功能：把一种真正属于人类特有的意义作为根本衔接，逐字引入主体的本能游戏及其功能承担；因为人类秩序在象征秩序这个附加维度中发展。

也就是说，人的性功能受到某种确实属于能指、近乎工具性的东西击中。他必须经过、考虑并把人类经验中在场、切身经历的某种东西投入游戏；它称作阉割。分析以最工具性的方式把它表现为：一把剪刀、一把镰刀、一柄斧头、一把刀。可以说，它属于人类物种性关系中的本能家具。

显然，我们也可以尝试为某个动物物种列出家具：以知更鸟为例，彩色胸羽很可能被视作求偶以及两性争斗中的某种信号要素。

显然，动物那里也存在这种严格说来悖论要素之恒常性的等价物；在人身上，它关联于一个能指，称作阉割情结。我们可以这样写出俄狄浦斯情结及其相关的阉割情结公式。俄狄浦斯情结本身在象征层面组织；这就预设主体背后有作为其构成条件的象征秩序存在。

我们会从小汉斯那里看到：直到同父亲对话的某个时刻，这种东西才出现。父亲试图把他推向对各种所谓心理解释要素的考虑……父亲很胆怯，从未把事情彻底推到底……他指出，可怜的小汉斯当然不太理解女性器官的功能。

但事情倒转了：父亲在无计可施时最终给出解释，可儿童围绕神经症已经展开的幻想清楚显示，他非常了解这一切都在母亲腹中，无论它受到马还是车的象征化。

父亲没有看见的是：自己经过一场漫长谈话以后才作出这项结论；而儿童在谈话中只关心某种谱系建构。显然，他最关心的是弄清楚某个进展时刻由什么组成——它在通常情形下正常发生，在这里则受到神经症自身困难的强化。

十分清楚，这是正常的；而且，它发生在观察非常靠后的点。儿童只是进行一场漫长讨论，建构现有的谱系可能：儿童怎样同父亲、母亲发生关系？同父亲、母亲发生关系是什么意思？他甚至建构出弗洛伊德特意标作极为新颖的幼儿性理论。

弗洛伊德不常在儿童身上发现这种理论；确实，如同任何观察，这里有特殊要素。儿童一度建构这样的东西：小男孩生小女孩，小女孩生小男孩。不要以为在谱系结构和组织中绝对不可能重新找到它；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已经给出这种东西。归根结底，其中确有真理：正因为女人产生男人，男人随后才能——我说的是在象征秩序中——为女人提供这项根本服务，使她们能够继续履行生育功能。

当然，前提是我们在象征秩序中考察它，也就是在一种为这一切规定世代规则序列的秩序中。正如我屡次提醒你们的，在自然秩序中，所有事情完全围绕母系谱系旋转没有任何障碍；无须区分后代会发生什么，也不会有任何不可能：只需大致由母亲按自己可能的生育期生育，后续世代也可依次进行。小汉斯异常繁茂而奇想迭出的整个建构，都围绕这种秩序、这种象征秩序旋转；他关心的正是它。换言之，儿童正围绕大写 P 提出象征秩序的问题：“父亲是什么？”

父亲是维持谱系秩序的枢纽、虚构而具体的中心；这套秩序让儿童能够令人满意地把自身放进世界。无论应该从文化、自然还是超自然角度怎样判断，他确实诞生在这个世界里；他在一个

由象征秩序组织的人类世界出现，也必须面对它。分析的发现当然不在于告诉我们，为了向儿童传达、让他感受到并把握自己在象征秩序中的位置，实在父亲一方最低限度需要做到什么。

人们还预设，神经症中发生的一切，在某些方面恰恰是为了替补儿童处理俄狄浦斯这个根本问题时遇到的困难、乃至不足。当然，还有别的东西会复杂化所谓退行要素：同母亲原初关系中的中介要素已经包含某种二元象征体系。

在它同严格说来俄狄浦斯构成的时刻之间，可能发生各种意外；儿童交换的不同要素会在这项关系、象征秩序的建构与理解中发挥作用。总而言之，前生殖器期要素能够得到整合，并复杂化神经症的追问和问题。恐怖症病例为我们提供了简单情形。没有人否认：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儿童已经抵达所谓生殖器阶段，主体性别整合的问题在那里得到充分提出；恐怖症中的事情正以这种方式发生。因此，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设想恐怖症要素的功能。

弗洛伊德已经充分衔接这一点；他把恐怖症要素整合成同民族志当时分离出、属于原初关系的若干要素——图腾——同一秩序、彼此同质的东西。如今，这大概已不太站得住脚；根据当前进展——列维-斯特劳斯在其中发挥主导而轴心的作用——，其他东西会取而代之。不过，对我们分析家、对我们的实践经验而言，弗洛伊德归根结底只在恐怖症层面清楚显示图腾相对于分析经验怎样取得意义；我们仍必须把它转置到一种比图腾关系更少可疑的形式化中。

这就是我上次所谓“恐怖症对象的隐喻功能”。某个具体病例中，父亲人物由于某种缺失——这里是实在缺失——没有填补某个位置；恐怖症对象便前来发挥这项未获填补的功能。它发挥同样的隐喻作用；上次我曾用这幅意象说明：

“他的禾束既不吝啬，也不怀恨……”

我向你们显示，诗人怎样使用隐喻，让父亲维度以其原初性质显现；

他借禾束喷涌的全部自然生命，为年迈衰颓的老人重新注入活力。在恐怖症这类鲜活诗歌中，马发挥完全相同的功能。马引入某种东西，各种意义将围绕它旋转；归根结底，它们为主体发展中欠缺之物——周围环境的辩证法为他提供的发展中所欠缺之物——带来一种替补要素。

不过，这只能以某种想象方式发生。

这是一个粗粝的能指；它并非没有某种倾向，因为主体背后的整个文化车队早已运载着它。归根结底，主体只需在各种纹章图形所在的地方寻找：一本图画书。这不表示自然意象，而表示人手绘出的图像；它们预设完整历史——也就是饰有残片神话和民间传说的历史。小汉斯在书中红色箱子般的红烟囱——鹳鸟站在上面——对面，恰好找到一匹正在钉掌的马；正因如此，我们能切实触到并表象这匹马。

某些典型形式总在特定语境显现，当然不足为奇；某种联结、某些联想可能逃过运载它们的人，而主体会选择它来填补一项功能：仿佛暂时授权某些状态的功能——

眼前是焦虑状态。主体会选择某样具有停止点、终项、枢纽或桩基性质的东西，把焦虑转化为局部恐惧；母亲关系危机的整股内流让一切摇晃、威胁将其卷走，而这些东西可以钩在这个支点上。

马此时发挥一种作用；它当然显得大大妨碍儿童发展，对周围人也是一种寄生性、病理性要素。但分析的建立同样清楚显示：它还发挥钩挂和重要制动作用，为主体提供一个点；他能够继续让某种原本会在

无法承受的焦虑中决定下来的东西围绕该点旋转。因此，分析在这个病例中的全部进展，总而言之是提取并揭示儿童利用根本能指替补自身危机所提供的潜能，让这个能指能够发挥如下作用：

- 儿童同象征界的根本关系为它预留的作用；
- 儿童建构自身神经症时为它预留的作用。

他把它当作援助，当作象征秩序中绝对根本的参照点。这就是这里的恐怖症所展开的内容。它会让儿童以某种方式操作这个能指，并从中提取比它作为能指自身包含的更丰富的发展可能。不是说它预先包含我们将让它说出的一切意义；它本身并不包含这些意义，而是由于自己占据的位置包含它们。

相关知识卡 小汉斯的马：恐怖症作为防护构筑与能指替补 · 父亲隐喻与父之名

正因为这个位置本应有象征父亲，而这个能指在那里以隐喻对应物的方式存在，它才容许完成一切必要移情，把分母一线上的全部问题——对阳具功能的召唤、儿童以及每次同实在母亲形成一个儿童无法掌控之独特三角形的复杂内容——加以转移。某种令人害怕的东西得到安置；人们甚至衔接出为什么：因为它会咬。由此，横线另一边出现另一项 m + Π，也就是这里受到最大威胁的儿童阴茎。

相关知识卡 小汉斯的马：恐怖症作为防护构筑与能指替补 · 父亲隐喻与父之名

$$(M + \varphi + A)\, M \sim m + \Pi$$

小汉斯观察向我们显示什么？正是，在这样的结构中：

- 严肃动员它的方式，并不是攻击其可信或不可信；
- 不是对儿童说“我鄙视你”；
- 也不是作出非常中肯的评论——例如告诉他，触摸自己的撒尿器同更强烈地体验“蠢念头”激发的恐惧，肯定有所关联。恰恰相反，这些做法无法真正动员问题。

如果依据这幅图式阅读观察，你们就会看到儿童对这些介入的反应有何分量。介入本身并非毫无意义，却从未直接具有最初原初经验那种人们也许希望的说服力。观察的兴趣当然正是清楚显示这一点。尤其可以看到，儿童此时反倒通过强化自己对问题的象征表述之根本要素来回应：他坚持并重演同母亲进行的阳具捉迷藏戏剧——“她究竟有还是没有？”——，清楚显示它是一个象征符号，是他作为象征符号而坚持、不可被打乱的东西。由此可见，为了理解儿童所面对的问题，这类图式既重要又绝对关键。

儿童面对的也许确实是让它演变，允许他展开系统孕育的各种意义，从而不只停在“小恐怖症患者害怕马”这项临时解决上。不过，这道方程只能按照自身法则解决；它们是一篇特定话语、一场特定辩证法的法则，而非另一篇话语的法则。它一开始可以不考虑自己怎样支撑象征秩序。

正因如此，我们可以给出其进展的一般图式。进展在于：无论作为大写象征父亲的弗洛伊德，还是作为受到爱戴的小父亲，他们的介入都绝非徒劳。后者归根结底只有一个过错，却是大过错：没有满足年轻

汉斯斥责他提出的要求——履行父亲功能；至少有一段时间，甚至要履行妒忌父亲、eifersüchtig、妒忌之神的功能。两者的介入都并非徒然。

在最初阶段，父亲的确带着大量爱意和投入同他说话，却仍只能继续做迄今一直为他做的那个人。正因为父亲实际上没有在实在中充分履行父亲功能——一切都这样向我们、也向儿童表明——，他同母亲才逐字随心所欲地行事。

这不表示他不爱父亲，而是父亲没有为他履行一种能够给这一切带来图式化直接出口的功能，远非如此。我们面对情境的复杂化：父亲依照弗洛伊德的指示，首先直接干预 Π 这一项；这证明，连弗洛伊德头脑中的问题都尚未完全厘清。

仍要考察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进入种种细节衔接，以完全严谨的方式表述它，也就是给出一系列彼此转化的代数公式。

我有些不愿这样做，担心大家的头脑尚未完全习惯并向某种东西敞开；然而，我相信，它仍是我们对病例演变进行临床和治疗分析时的未来。我的意思是，每个病例都应当至少在根本阶段上，能够归纳为一系列转化。上次我曾先给出其中两个例子，首先是：

$$(M+\varphi+A)M \sim m+\Pi$$

随后给出终点公式：

$$\left(\frac{\text{'I}\pi\pi\text{O}\varsigma}{\text{M} + \varphi + \text{A}} \right) \quad \text{M} \sim \text{m} + \Pi$$

以及

$$\text{P} \left(\cancel{\text{M}} \right) \left(\text{M}' \right) \sim \left(\frac{\alpha}{\varphi} \right) \Pi$$

我要说，极其明显的是，这一切都被纳入大写 Λ，也就是纳入逻辑化。

$$\Lambda_{\text{p}}^{\text{P}} \left(\frac{\text{'I}\pi\pi\text{O}\varsigma}{\text{M} + \varphi + \text{A}} \right) \quad \text{M} \sim \text{m} + \Pi$$

只有从人们开始谈论它、从这个夹在大写 P 与小写 p 之间的 Λ 出发，我们才能给出某种发展，并追问：在哪种情形、哪个重要时刻可以认

为转化已经发生？也就是，小写 p 何时在 m + Π 这里介入，而大写 P 又何时在大写 Ἵππος 层次介入。

严格说来，我没有进入这项形式化，也就是没有进入这些连续转化。不过，如果我们继续停在观察层次，追踪发生什么以及事情怎样演变，就会看到：弗洛伊德介入的当天，紧接着便出现一则发挥极重要作用的儿童幻想。它随后会为我们提供理解所有处在 Verkehr 标记下的东西所需的位置——也就是交通 / 运送，连同这个词的一切双义。

某种事情发生，使人可以说，下面公式的第一项大致在幻想中得到相当好的体现：

$$\left(\frac{\text{Ἵππος}}{\text{M} + \varphi + \text{A}}\right) \quad \text{M} \sim \text{m} + \Pi$$

如果汉斯展开的幻想——他爬到货车上玩，货车突然被马拖走——确实是对自身恐惧的转化，是第一次尝试把事情辩证化，那么，人们不能不惊讶：只需成为某样东西的主体，写在这里的内容就会显现：

$$\frac{\text{Hans}}{\text{M} + \varphi + \text{A}} \sim \text{Ἵππος}$$

我的意思是，马显然在这里构成拖动要素；小汉斯本人则来到那辆堆满袋装货物的货车上。后文告诉我们，这恰恰是他经历的事情：这些

货物就是母亲一切可能、潜在的孩子；观察的全部后文都会证明这一点。

因为最令人害怕的事情，莫过于看见母亲再次装载，也就是再次怀孕；她滚动、载运，

恰如那些令他如此害怕的载重货车——腹中装着一个孩子。观察的全部后文都会表明，车、有时还有浴缸，都发挥代表母亲的功能：人们会往里面放进一大群小孩；我亲自把他们放进去，再把他们运走。

当然，这可以说是一场在意象中想象出的初次练习。这幅意象同对心理现实的任何自然赞同相距尽可能远；可是，从能指组织结构来看，它又极富表达力。由此，我们看到小汉斯首次从马这项恐怖症根本要素的辩证化中获益。我们能够在这里看见它。

我们已经看到，小汉斯非常重视维持象征功能，例如长颈鹿幻想。弗洛伊德介入以后，小汉斯仿佛对这组要素的一切可能游戏方式逐一进行试验。

小汉斯首先被放在货车上，置身各种彼此异质的要素之间；他极其害怕，它们最终会同自己一道，被一个从此对他只剩下不受控制、无法预测之力量的母亲拖到天知道什么地方。他们再也不能一起游戏；或者可以说［……］，用一句表达力很强的俚语，他们之间再也没有爱情——也就是再没有游戏规则。因为别的人介入，也因为小汉斯本人开始把游戏复杂化：他带入的不再是同母亲和小女孩玩捉迷藏的象征阳具，而是一根实在小阴茎；他也因此被打手指。

这让任务格外复杂，并向我们显示：一位先生像上帝那样讲话以后，儿童立刻开始行动。他完全没信故事的内容，却觉得那个人说得漂亮；结果是，小汉斯能够开始讲话，也就是开始讲故事。他首先会同父亲维持某种清楚显示实在道路与象征道路之差异的东西。他说：“他为什么说我爱妈妈？我明明爱的是你。”

他清楚区分了不同部分；随后让马交出它伴随的一切潜能与可能：它既会咬人，也会倒下。我们会看到这将产生什么；

小汉斯的恐怖症运动由此全面开始。

小汉斯开始让马交出它能够给出的一切，所有这些悖论正因此出现。在马这个能指孕育它据说覆盖的一切危险的时期，小汉斯却同时以极其随意的态度拿同一个能指游戏。

不要忘记这个悖论：就在最害怕马的时刻，小汉斯开始同新来的女佣玩骑马游戏；这让他有机会同她做出各种不成体统的举动，

采取最无礼的方式，脱她衣服，等等。这一切都属于弗洛伊德笔下女佣的角色。你们看到，马当时完全没有吓住他；他甚至亲自占据马的位置。我们既看到马的功能得到维持，也看到儿童怎样利用

同这些成组能指游戏所能提供的一切机会，澄清并把握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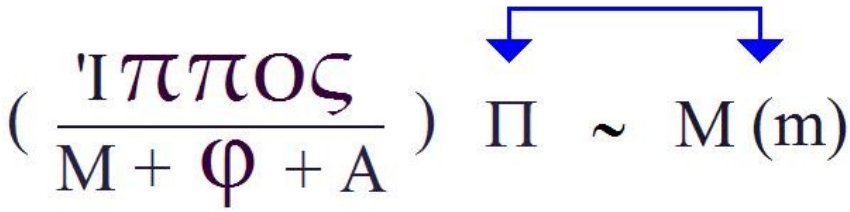
但前提是运动必须维持；否则，这一切就毫无意义，我们也看不出为什么还要继续保留儿童告诉我们的内容。

我已经说过，绝对根本的转化点，是儿童发现这类情境的一项最根本性质：整个集合一旦得到逻辑化——也就是人们已经同它充分游戏，

能够进行若干交换和置换——，最初而决定性的转化便发生。那不是别的，就是浴缸被旋松拆下：咬击转化为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尤其改变人物之间的关系。

“贪婪地咬母亲”作为行动，或者把其意义把握成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

甚至反过来害怕由马体现的著名咬击，同下面的事情并不一样：旋松、拆掉母亲的螺栓，把她在这件事中动员起来，让她第一次也作为可移动要素、同时作为整套系统中的等价要素进入。此时，这套系统会变成某种庞大的滚球游戏；儿童尝试由此重新构成能够维持的情境，乃至引入让整个情境重新结晶的新要素。这正发生在浴缸幻想中；它大致可以写成下面这样，即出现一项置换：



Π 代表他的性功能，小写 m 则表示怎样把母亲本人带入可拆卸要素的辩证法。这些要素会让她成为可以说同另一个对象一样的对象，使小汉斯此时能够操作相关母亲。因此可以说，恐怖症分析的全部进展代表母亲相对于儿童的衰退，也代表儿童逐渐取得对母亲的掌控。

下一阶段如下——这一点很重要，我下次也必须停在那里作出结论。下一阶段全部围绕想象平面上将要发生的事情。迄今的过程在某种方式上属于退行；现在，在另一种意义上的想象平面，小汉斯会把妹妹

本人投入游戏。这项要素在实在中极难操作；他却围绕妹妹展开一番耀眼的奇想，把她带进一项惊人建构：首先假定她一直在那里，曾经在大箱子里，可以说几乎自亘古以来便如此。

你们会看到这怎样成为可能，又预设他已经具备何等高度发展的能指组织。妹妹被假定早已存在，甚至早于来到日光下的时刻；不过，他说她当时已经在世界中。以什么名义？显然是以想象名义。

这里，弗洛伊德的解释告诉我们：某种东西以无限重复、恒常而永久的想象形式呈现，成为某种绝对根本的回忆。小安娜一直在那里；弗洛伊德明确强调，她越是在现实中根本不在那里，就越在那里。恰恰是她尚未出世的第一年，小汉斯才强调她已经出世，而且当时做过任何人可以做的一切；在治疗第一阶段，小汉斯从逻辑和辩证层面在话语及游戏中做过的一切，她也都做过。现在，他在幻想中从想象层面告诉我们：妹妹不仅自始就在车后大箱子里——有时又随场合单独旅行——；他在另一时刻还说，她坐在车夫旁边，“握着缰绳……不，她没有握缰绳！”[4 月 14 日]

> [“车夫坐在车座上，汉娜拿着去年那根鞭子，抽打马匹，不停喊‘驾！’，始终很开心；车夫也在抽马。——车夫根本没有抽，因为鞭子在汉娜手里。——车夫握着缰绳——缰绳也在汉娜手里（我们每次都坐车从车站去住所；汉斯在这里试图让现实与幻想彼此吻合）。在格蒙登，我们把汉娜从马上抱下来，她独自走上楼梯。”]

这里存在一种区分现实与想象的困难；不过，小汉斯通过这个自始在那里、而且将永远在那里的想象儿童继续幻想。他还指出，正是通过

这个想象儿童，一种同样属于想象界的关系开始勾勒。我已经强调过，小汉斯同母亲对象的关系最终会稳定在其中；也就是同那个永恒返回的对象、同这个小男人必须接近的女人之间的关系。

通过这场想象游戏，小汉斯逐字把妹妹当作某种自我理想使用。妹妹成为能指的主人、马的主人并支配它；正因此，小汉斯本人才能像我有一天提醒你们的那样，开始鞭打、抽打和支配这匹马，成为它的主人。他由此相对于一种东西取得掌控关系；从此，它将根本写入其精神创造后来展开的界域，也就是对今后为他出现的任何女性幻想——我可以称作“他梦中的女孩”“他精神中的女儿”——取得某种掌控。

他将始终面对这种自恋幻想；一幅支配性意象在那里为他取得形体，解决阳具归属的问题。不过，他对关键情境取得的根本关系——总而言之也就是支配——仍然根本属于自恋、根本属于想象界。今后，凡是我们能够理解为小汉斯情境出口或正常化的事情，都会由此带有深刻双义性。

观察已经充分标出各个阶段：幻想展开以后，经过这场想象游戏，把一度固定为能指的要素还原到想象界以后，一种根本关系将由此构成，使儿童能够承担自身性别。他的承担方式仍显得如此正常，以至于表面上可以假定，儿童毕竟带有某种欠缺；我大概要到下次才能向你们展示其中一切重音。

不过，今天已经可以用某种东西结束；它清楚指出，儿童为了填补或守住自身位置所抵达之点的缺陷位于何处。再没有比最后旋松或拆掉螺栓的幻想更有意义：儿童的底座被更换，得到一个更大的屁股。

为什么？归根结底，为了填满他已经变得更容易操作、更容易动员的位置，也就是那个浴缸。只有浴缸被旋松以后，坠落辩证法才能从中进入，也能在必要时排空。

我要说，观察中情境的非典型、反常乃至近乎倒转的性质同样在这里显现。若用一个正常公式表示——只谈男孩——，正是儿童拥有自己的阴茎，才会重新找到那根作为归还给他的阴茎；也就是说，他曾失去它，经历过阉割情结。

然而，这里难道不醒目吗？儿童到处召唤阉割情结，亲自提示其公式，并抓住各种意象……

他几乎勒令父亲让自己经受检验；或者通过反照方式，在父亲意象身上酝酿并组织这场检验——让父亲受伤，希望它实现……

可是，在完成、跨越主体这场根本变形的一切徒劳努力中，最终发生的事情并未触及性器官，而根本触及他的底座、他同母亲的关系。他由此能够布置那个位置，却以某种在此视角中没有显现的东西为代价：主体同自身器官关系的辩证法没有得到处理。

这里，除非被改变的是器官，否则在观察终点得到改变的就是主体本人；与此同时，他把自己承担为某种按照自身设想形成的神话父亲。天知道这位父亲完全不同于其他父亲，因为这个父亲仍能在幻想中独自生育——就像阿波利奈尔《蒂蕾西亚的乳房》中那位男人；记者说：

> “今晚再来，看大自然
> 如何不用女人，赐我后代繁衍。”[第一幕，第八场]

因此，不能说两性的相对位置已经全部得到承担；整合两性关系仍留下豁口。我们要强调，只有通过正负记号、通过某些术语倒转的悖论，才能真正判断某项进展的结果。所以，如果小汉斯没有经历阉割情结，他就经历了另一种东西；它足以被称为把他转化成另一个小汉斯，正如安装工为他更换屁股的神话所指示。总而言之，后来小汉斯再次出现在弗洛伊德那里时，是为了让我们看到一个对他说："我已经完全不记得这一切。"的人。我们在这里找到一种根本异化时刻的征兆与见证。

你们知道那个故事：据说有个主体前往一座岛，为了忘掉某件事。

人们找到并走近他，问："那件事是什么？"他本来是为了忘记才离开；可是别人问他为什么，他已经无法回答。故事机智地说："他忘了。"在小汉斯病例中，我要说，某种东西使我们能够从根本上修正重音——我几乎还要说，修正故事的公式。

如果小汉斯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分析未完成、恐怖症所设定的俄狄浦斯解决也未完成的烙印，就在这里：所有这些有益回路从某个时刻起，使诉诸马之能指变得无用乃至多余，总而言之让恐怖症逐渐消散；然而，整个过程仍从某样可以说小汉斯已经忘记的东西出发。

第24课 · 1957年7月3日

今天是我们本年度最后一次研讨班。上一次我留下了一些东西没有讲。我不想今天完全只顾着总结、重新定位和重复；不论成效如何，这并不是一种太坏的方法。因此，上次我搁置了若干事情，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没有把这项分析一直推进到底。

我用一些小写字母作了形式化，并试图向你们提出：我们可以在哪个方向上努力，逐渐习惯于把各种关系书写出来，以便给自己设置固定的参照点；一旦提出，这些参照点就不能在讨论中反悔，也不能借助通常存在于下述游戏中的那种过度灵活性而把它们规避掉——

也就是想象界与象征界之间的游戏；它对我们理解经验如此重要。因此，我向你们开启的是这种形式化的一个开端。

我很清楚，自己并没有把其中所有项都论证得绝对充分；我的意思是，在这些项彼此联结的方式上，你们可能还觉得存在某种未定性。我们不可能同时解释一切。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在即将发表于《精神分析》第 3 期的文章[注1]中，你们也许会以一种更切近——

> [注1] Jacques Lacan：〈L'instance de la lettre dans l'inconscient ou la raison depuis Freud〉，《La Psychanalyse》第 3 期，PUF，1957 年，第 47—81 页；后收入《Écrits》，第 496 页起。

也更严密的方式，看到这些公式次序的根据，也就是分别关于隐喻与转喻的公式。我想，我们走到这里，重要的是：这一提示已经让你们有可能运用同类公式，来定位主体与大他者各种形态之间的功能和关

系。这些功能和关系归根结底无法用别的方式表述；日常语言并不给我们提供所需的基础。

所以，我确实留下了一些东西。说到底，我会问：为什么不能留下呢？为什么非要——哪怕就小汉斯本人的病例而言——为小汉斯作为问题提出的东西提供一个绝对完整的公式？你们知道，我打算在弗洛伊德所提出的问题这一界域中作评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想把他的每一部著作都做成一个封闭系统，甚至也不意味着，要把他的全部著作做成一个封闭系统。

重要的是，你们已经充分学会，并且每天都更加清楚地学会：弗洛伊德把心理学考察本身的基础改变了，可以说，他在其中引入了一个异于迄今心理学考察之所是的维度。正是这个维度相对于对象的任何固定化所具有的异质性，构成我们这门科学的独创性，也构成我们必须据以构想其进展的基本原则。

任何其他做法——封闭弗洛伊德式追问，把它缩减到心理学领域——都会导向我姑且不加更多形式主义地称作“妄想性心理发生论”的东西。你们每天都能看到这种心理发生论含蓄地发展出来：它体现在精神分析家看待其所处理的事实与对象的方式上。它竟能延续至今，这个事实如此悖谬，与周边一切概念化如此格格不入，如此令人震惊，却最终又如此被人容忍；这个事实本身必须并入问题的核心，并与我们将为弗洛伊德式论题——也就是无意识——提出的解决一道获得解决。

因此，我确实搁置了整套游戏；我想你们如今已能跟上它。你们对其中诸要素已有足够了解，可以在重读文本时察觉整个神话游戏：一端

是我姑且称为把母亲欲望序列的这个要素还原到想象界，正如我把它写在公式 M · φ · α 中，即母亲同作为她自身阳具的那个想象他者之间的全部关系；另一端则是可能出现的一切新要素，即其他孩子，在本例中就是小妹妹。

孩子在这场想象游戏中进行的游戏与神话化，是由我们姑且称为心理治疗性的介入所触发的。它本身向我们显现出一个现象；必须把握并确定它本身的独创性，把它视为整个分析进程之加工（Verarbeitung）的一个本质要素，因为它是一个能动的、使某种东西结晶的要素，结晶在分析治疗本身赖以成立的象征性进展之中。

当然，即使我没有把它再推进，我仍想向你们指出那些甚至未曾触及的要素；我的意思是，我曾顺带指出它们，却没有说明它们相对于孩子在分析介入刺激下所作的这些神话行动，究竟发挥什么确切功能。

这里有一个项、一个要素，它与围绕出生、尤其围绕小安娜出生而展开的伟大神话发明绝对相关，也与小安娜从永恒以来便始终在场这件事相关——

小汉斯以他的神话化推想，如此漂亮地酝酿了这件事。

这个神秘人物是真正配得上最优秀黑色幽默传统的鹳鸟：这只鹳鸟戴着一顶小帽子来到，鞠躬致意，把钥匙插进锁孔；它趁无人时到来。我得说，如果懂得倾听小汉斯的话，它会显出完全异乎寻常的面貌："它到你的床上来了"，这无异于说"到你的位置上来了"；随后他又改口说："到它的床上去了"。然后它瞒着所有人重新出去，离开后还不忘弄出一点响动，仿佛要把整座房子摇一摇。

这个来来去去、神色镇定自若乃至近乎令人不安的人物，当然是小汉斯的创造中——

最令人费解者之一。它值得我们久久停留；说到底，应当——

首先指出它在小汉斯进展此刻的整个经济中所占的位置。小汉斯之所以能够在心理治疗者父亲——其上又罩着弗洛伊德——的管束下，酝酿出对在场各项的想象操弄，只因为他把某种东西释放出来；就在伟大神话创造之前，它已被如实宣告：一边是安娜的出生，另一边同时是鹳鸟。

我们看到，仅仅通过汉斯的文本、通过父亲，死亡主题便被说了出来：小汉斯有一根棍子——不知为什么，此前从未谈到过这根手杖——，他拿它敲打地面，并问下面是否有死人。死亡主题的在场与出生主题严格相关。这是理解病例及其进展时必须标出的一个本质维度。

但说到底，这个主题，这种被推到神秘之极的生殖力量——处于生命与死亡、存在与虚无之间——提出了一些特殊问题，不同于引入“马”这个能指的问题。它并非后者的同系物，而是另一种东西；也许明年我们会看到它，我暂且把它保留下来。我明年很可能选择如下标题来展开内容，即：无意识的形成物。

我还要再次强调：很有意味的是，小汉斯在解决并消解恐怖症的危机末尾，安顿到了一种如拒绝出生一般本质的东西里，也就是从此同鹳鸟、同母亲订立的某种条约。你们会看到那一段的全部意义：它谈到母亲与上帝之间围绕一个孩子可能到来的关系；这件事在观察中由弗

洛伊德的一则小注如此漂亮地解决：“女人想要的，上帝也想要。”母亲对他说的确实正是：“归根结底，这取决于我。”

另一方面，小汉斯说自己希望有孩子，同时又不愿再有别的孩子；他想拥有想象孩子，因为整个局面已经通过认同母亲欲望而解决。他会拥有梦中的、精神中的孩子；总之，他会拥有按母亲阳具方式结构起来的孩子，最终把它作为自己欲望的对象。不过，不言而喻，新的孩子将不会再有。对作为想象欲望的母亲欲望作认同，只是在表面上使小汉斯返回他从前的样子——那时他同小女孩玩一种原初的捉迷藏游戏，而他的性器就是游戏对象。

但现在，汉斯完全不再想到玩捉迷藏；更确切地说，可以说他不再想到向她们展示任何东西，除了小汉斯漂亮的身姿。这个人物从某一方面看，最终亲自成了一件类似恋物的对象；小汉斯把自己置于某种被动化的位置。无论其对象多么符合异性恋的法则，我们都不能认为，这就穷尽了他的位置之正当性。

小汉斯由此汇入一个你们不会觉得陌生于我们时代的类型：我们熟知的某种风格的一代，也就是 1945 年风格的那一代。这些迷人的年轻人等待主动从另一边过来；总之，他们等着别人来脱下自己的裤子。这正是我看见在这位迷人的小汉斯身上勾勒出来的未来——

无论他显得多么异性恋。请听清楚：观察中没有任何东西让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刻认为，结局不是由母亲阳具的这种支配达成的；汉斯占据它的位置，同它认同并掌控它。

当然，一切可能对应于阉割阶段或阉割情结的东西，无非是在观察中以一块可能使人受伤的石头这一形式勾勒出来的东西。可以说，这里

浮现的意象，与其说是有齿阴道，不如说是一个有齿阳具（phallus dentatus）。这种凝固对象是一个想象对象，任何男性的进攻都会撞伤在它上面，成为它的牺牲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小汉斯及其俄狄浦斯危机，严格说来并未导向形成一种典型超我；我指的是按一种机制产生的超我，这一机制已经在我们围绕拒斥（Verwerfung）所教的内容中得到指出，例如：被排除在象征界之外的东西会在实在界中重新出现。

这才是真正的钥匙，它处在一个更接近俄狄浦斯式拒斥之后所发生之事的层面：正因为阉割情结既已被跨越，却又不能由主体充分承担，它才会产生某种对父亲的粗陋意象的认同。这种意象带着父亲现实特性的反光，而那些特性在字面意义上沉重乃至压人。我们由此再次看到在实在界中重现的机制获得更新；这一次，是一种处在心灵边界上的实在，它位于自我疆界以内，却以一种近乎幻觉的方式实实在在地强加给主体［参见《狼人》］，其条件是主体——

在某一时刻脱离了阉割过程的象征性整合。

当前病例中没有显现任何类似之物。当然，小汉斯不必失去自己的阴茎，因为他也从未在任何时刻获得它。小汉斯最终认同于母亲阳具，这并不意味着他的阴茎因此就成了他能够真正重新找到并承担其功能的东西。不存在阴茎象征化的任何阶段；阴茎仿佛一直留在边缘，脱开齿轮，成为某种从来只被母亲鄙弃、斥责的东西；而发生的这个东西使他能够整合自己的男性气质。

这不是通过别的机制，而是通过形成对母亲阳具的认同；它所属的秩序也与超我的秩序完全不同，与超我这种无疑会造成扰动、却也具有

平衡作用的功能完全不同。它是一种属于自我理想秩序的功能。正因为小汉斯对自己的理想有某种观念，正因为他是母亲的理想，即阳具的替代物，小汉斯才安顿进存在之中。

可以说，假如他不是有一位处在进步运动中的犹太母亲，而是有一位虔诚的天主教母亲，你们就会看见：小汉斯可能通过什么机制，温顺地被引向神职乃至圣徒之路。在这个病例中，母亲理想恰恰为一个被引入非典型俄狄浦斯关系的主体，定位并赋予了某种出路、某种形成方式以及两性关系中的某种位置；其结局通过对母亲理想的认同完成。小汉斯病例的出口，我大致就为你们勾勒、界定在这些项中。

贯穿始终，我们都有一些可谓确证性的迹象；在观察结尾处，它们有时多么动人——

小汉斯彻底因父亲的缺位而灰心，于是仿佛亲自在幻想中举行自己的入门仪式。他赤身裸体地站到那辆小车上——正如他曾希望父亲上前那样——；在那里，他简直像一名年轻骑士，理应守候整整一夜。随后，又靠交给列车员几枚硬币——同样的钱也曾用来安抚 Storch［鹳鸟］的可怕力量——，小汉斯沿着大环线驶去。

事情解决了。小汉斯大概不会成为别的，只会成为一名骑士——一名或多或少受社会保险制度保障的骑士，但终究是一名骑士——，而他不会有父亲。我不认为，存在经验中的任何新东西以后还能给他一个父亲。紧接着，父亲试图重来一次，却已稍晚，因为随着观察推进，父亲的理解能力逐渐打开，这也不是最无趣之处。父亲起初坦率行事，深信从弗洛伊德这位好老师那里学来的一切真理；可随着他推进，看见这种真理在实际操弄中远为相对，当小汉斯即将开始自己的

伟大神话妄想时，他漏出一句在文本中几乎无人注意、却颇为重要的话。当时大家在玩“说话”的游戏，小汉斯时时自相矛盾，他说：

- “这是真的……这不是真的……这是闹着玩，可还是非常严肃……”
- “人所说的一切……”父亲并不愚蠢，而且在这场经验中也学到了东西；他说，“……人所说的一切，总有一点是真的。”[“Alles, was man sagt, ist ein bissel wahr.”4 月 22 日]

尽管如此，这位父亲仍未能处在自己的位置上，因为真正应当接受分析的是他而非孩子。当一切已经太晚时，父亲试图重新来过，对小汉斯说：“归根结底，你一直在怨恨我。”

正是在父亲这项迟来的介入前后，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动作发生；观察仿佛给它打上了特殊的光：小汉斯让他的小马掉了下去。就在父亲同他说话的那一刻，他让小马掉下去。谈话已经被越过，此时的对话已经过时；小汉斯已经安顿在他于世界中的新位置上。这个位置使他成为一个潜在拥有孩子的小男人，能够在想象中无止境地生育他们，并完全从他们那里获得满足。母亲也以这种方式活在小汉斯的想象中。

这正因为小汉斯如我所说，不是一位母亲的儿子，而是两位母亲的儿子。这是一个引人注目而又费解的点，上一次我已经把观察停在这里。当然，另一位母亲是他有太多机会和理由认识的人；所谓机会与力量，就是父亲的母亲。不过，他在承担最终平衡的条件时，采用了这种双重性、这种母亲形象的二重化；这仍是观察所提出的结构问题之一。

你们知道，我在上上次研讨班结束时正是从这里，把它同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画联系起来，并同时同达·芬奇病例联系起来。弗洛伊德如此关注这个病例并非偶然。今天剩余的时间，我们就用在他身上。

这也将构成——我们并不声称用一课就穷尽《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童年回忆》——某种小小的“假期前一课”。在我的整个教学中，我习惯以这种放松方式面对像你们这样专注的听众；我也为此感谢你们。至于小汉斯，就让他走向自己的命运吧。

不过我要提醒你们：我在谈他时，曾暗示两性关系某种演变中一个具有深刻当下性的东西，并提到 1945 年的一代；我这样做，当然是为了不让问题显得过度追逐时下。

至于当下一代究竟是什么，我把描绘和界定它的工作留给别人，也让别人给它一种直接而象征性的表达——比如弗朗索瓦丝·萨冈。我在这里提到她并非偶然，也不只是为了追逐时事，而是要告诉你们：作为假期读物，你们可以看看一位严肃、惯于只把自己置于黑格尔与最高政治层面的哲学家，能从一部外表如此轻佻的作品中读出什么。我建议你们阅读 1956 年 8—9 月号《Critique》中亚历山大·科耶夫题为〈最后的新世界〉的研究；他在文中讨论了我刚才提到的畅销作家所写的两本书——《你好，忧愁》与《某种微笑》。

这一定会让你们有所长进；用常话说，“这不会伤害你们”，你们不冒任何风险。精神分析家并不是从那些把自己完全交给心理—性时尚波动的人中招募的。可以说，你们的方向感太好了，不至于如此；甚至在这方面还略带一点“优等生”气。

这确实能使你们进入一种切近当下的视域，激活你们对自身工作、以及有时必须准备从患者本人那里听到之物的看法。它也会向你们显示一个我们必须考虑的东西：男女关系可以在一段并不长于我们同弗洛伊德时代之间距离的时期里发生深刻变化；按通常的说法，我们后来的一整段历史，当时都在酝酿之中。

所有这些也是为了告诉你们：无论那些就此提出过有趣见解的分析家怎么说，唐璜主义也许还没有说出最后一句话。我的意思是，人们在唐璜的同性恋这一概念中确实隐约看到了一些正确的东西，但肯定不能按通常方式去理解它。

我深信，唐璜这个人物在文化秩序中离我们太远，分析家未能恰当地把握他。假如我们把莫扎特的唐璜当作这个人物的顶峰，也当作某个真正意义上的问题——依照我在这里使用这个词的意思——所达到的终点，那么他肯定完全不是兰克试图为我们构造的那个反映式人物。他当然不应只从分身的角度和偏径来理解。

我还认为，与通常说法相反，唐璜绝不能简单地同一个掌握小技巧、每次都能得手的诱惑者混为一谈；差得很远。当然，我相信唐璜爱女人，我甚至会说，他爱她们爱得足够深，以至于有时知道不把这句话告诉她们；而且爱得足够深，所以当他告诉她们时，她们会相信他。这并非无足轻重，它显示出许多东西；尽管如此，局面对他而言始终没有出路。

我认为，应当沿着阳具女人这一概念的方向去寻找它。

当然，唐璜同他的对象之间的关系确实涉及一个双性问题；但关键恰恰在于，唐璜寻找的东西是女人，而且是阳具女人。他确实去寻找

她，走向她，并不满足于等待或凝视；正因为他真正寻找她，所以他找不到她。或者，他最终只以那个阴森来客的形式找到她；这位来客确实是一个他意想不到的、超出女人之物，而他是父亲并非偶然。但不要忘记，他出现时采用的形式——又是一件奇怪的事［参见汉斯］——是那位石客，是那块石头；总之，是绝对死寂、封闭并完全超出一切自然生命的那一面。他最终正是在那里撞碎自己，并抵达自身命运的终点。

列奥纳多·达·芬奇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将完全不同。弗洛伊德对他发生兴趣，这件事无需我们追问。为什么一件事发生了，而不是没有发生，一般说来，最不值得我们操心的正是这个问题。弗洛伊德之所以是弗洛伊德，恰恰因为他对列奥纳多·达·芬奇发生了兴趣。现在要知道的是，他怎样对他发生兴趣；列奥纳多·达·芬奇对弗洛伊德而言可能是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最好莫过于阅读他就此写下的《一个童年回忆……》。我及时提醒过你们，因此你们当中有些人已经读过，也已经察觉这部作品深刻的谜样性质。1910 年，弗洛伊德走到一个可以称为其一生幸福顶峰的时刻。

至少，从外部看，事情就是如此；说到底，他本人也不忘向我们强调这一点。他已获得国际承认，尚未经历同最受器重的弟子分离的戏剧与悲哀；大危机将至未至，但到此为止，他可以对自己说：人生中落后的最后十年已经追回来了。

弗洛伊德这时选取了一个题材：列奥纳多·达·芬奇。由他的背景、文化以及对意大利和文艺复兴的热爱来看，一切当然都让我们理解他

为什么会被这个人物迷住。但他要借此告诉我们什么？他将告诉我们一些东西；这当然丝毫不显示他对这个人物只有最低限度的认识，或对其鲜明轮廓缺乏敏感，远非如此。

总体而言，可以说《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童年回忆》值得重读；我甚至会说，随着年岁增长，它给人的趣味反而递增。我的意思是：它虽然是弗洛伊德最受批评的著作之一，却悖谬地也是他最为自豪的著作之一。

在这种情形中一向最为抵触的人——上帝知道他们曾抵触到什么程度——，也就是所谓绘画与艺术史专家，随着时间推移，也随着弗洛伊德著作中最严重的缺陷逐渐显现，最终仍不得不觉察弗洛伊德所说之物的重要性。于是，总体来看，弗洛伊德的著作——

几乎遭到艺术史家普遍排斥、蔑视乃至鄙弃；可是，尽管所有保留意见仍然存在，他们如今也只能借新增文献来加强这些意见。这说明弗洛伊德确实犯过错误。





尽管如此，例如肯尼斯·克拉克[注2]这样的人，在一部年代并不太久远的著作中——

> [注2] Kenneth Clark：Léonard de Vinci，Le Livre de Poche，2005 年。

承认弗洛伊德对我前几天给你们看的那幅画所作分析具有高度价值。这就是卢浮宫的《圣安妮》，与它成双的是收藏在伦敦的那幅著名草图；稍后我们还会回到草图。弗洛伊德对列奥纳多·达·芬奇病例所作——或自认为所作——的全部深化，正围绕这两件作品旋转。

话虽如此，我想无需再为你们概述这本小册子的展开路径。你们知道，开头先是快速介绍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病例和他的奇异性。我们随后会凭自己的手段返回这种奇异性；它确实被看得很准，而且弗洛伊德所说的一切，当然都紧扣这个人物之谜而展开。

接着，弗洛伊德追问这位画家独特的构造乃至某种禀赋，并追问他那悖谬的活动——尽管他同时还是如此多的别种人物，我们暂且称他为这位大画家。弗洛伊德将诉诸一个在他生命这一时期的全部发展中被格外突出的项，也就是我们所知列奥纳多·达·芬奇唯一的童年回忆，也就是那个被译给我们的童年回忆。

“我仿佛命中注定要研究秃鹫。事实上，我最初的一则童年回忆是：我尚在摇篮中时，一只秃鹫来到我这里，用尾巴撬开我的嘴，又用这条尾巴在我的双唇之间反复拍打。”

[“Questo scriver si distintamente del nibio par che sia mio destino, perche nella mia prima ricordaiione délla mia infantta e mi parea che essendo io in culla, che un nibio venissi a me e mi aprissi la bocca colla sua coda e

molte volte mi percuotessi con tal coda dentro alle labbra.”《大西洋古抄本》（Codex Atlanticus），folio 66 v.b.]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这是一则令人困惑的童年回忆”[Eine Kindheitserinnerung also, und zwar höchst befremdender Art.] 他随即衔接下去；正是沿着这项衔接，他会把我们带到某个东西那里。我们之所以跟随，是因为已经习惯了一种变戏法式游戏：在辩证法和推理中，把那些在经验与临床中常常混在一起的东西叠合起来。

但这终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界域。我并不是说弗洛伊德以不恰当的方式操弄它们；相反，我认为他以天才的方式操弄，也就是直接抵达现象核心。只是我们以完全懒惰的心智跟随他，仿佛预先接受他告诉我们的全部内容：把一种同母亲乳房的关系，同他一开始便立即向我们提出的某种具有真正性侵入意义的东西相叠合、相重叠，也就是至少在想象中的口交。

弗洛伊德一开始就给出了这一点；他也将据此继续表述自己的构造——

逐步把我们带向如下阐发：列奥纳多·达·芬奇同母亲的关系，在他的病例中具有怎样深刻的谜样性质；弗洛伊德将把这个奇异人物的一切特性，无论是什么，都奠基在这层关系上——

也就是，首先是他很可能的性倒错；其次，是他同自己作品之间全然独一而特殊的关系。这种作品活动可以说始终处于可实现与不可能的边界——他本人有时也这样写——，他的终生事业在不同起点上发生一连串断裂；这种独特性把他从同时代人中隔离出来，使他生前就成

为传奇人物，被设想为具备一切品质、一切能力以及严格说来构成普遍天才的一切。

列奥纳多·达·芬奇当时已经被这种东西环绕；弗洛伊德将从他同母亲的关系中为我们推导这一切。我已经说过，他从这则童年回忆出发。这意味着：这只秃鹫以及那条前来拍打婴儿的颤动尾巴，首先被构造为某个东西的屏幕记忆；弗洛伊德毫不犹豫地把这个东西设定为口交幻想的反映。

我们终究必须承认，对一个没有先入之见的心智而言，这里至少提出了一个问题。因为后文将展开的内容——而弗洛伊德研究的意义，恰恰在于向我们揭示这一点——是：列奥纳多很可能直到三四岁之间的某个年龄，都没有——

- 母亲在场之外的其他在场；
- 严格说来，除了他所谓“母亲充满激情的亲吻”以外的其他性诱惑要素；
- 除母亲乳房之外、能够代表其欲望对象的其他对象。……归根结底，启示之所以能够发挥这种预示作用，正是在幻想层面被弗洛伊德本人提出的。总之，这一切立足于一个点：秃鹫同母亲本人的认同，因为在本例中，母亲正是想象侵入之源这一人物。

现在不妨直说：在这件事情上，确实发生了一场可以称为事故乃至错误的事情，但它是一个幸运的错误。弗洛伊德只通过赫茨费尔德对该段文字的引述读到这则童年回忆，并以此为工作基础；也就是说，他读的是德文，而赫茨费尔德把一个根本不是秃鹫的词译成了“秃鹫”。

我们会看到，弗洛伊德本来也许应该有所怀疑，因为他照例极其仔细地工作；他原本可能注意到这个错误，因为译文附有手稿页码，在这里就是《大西洋古抄本》中的一页，也就是收藏在米兰的一组列奥纳多·达·芬奇文稿。

这些文字几乎被译成了各种语言。法文有一个很不充分、但完整的译本，题为《列奥纳多·达·芬奇笔记》，翻译的是列奥纳多留下的手写笔记；这些笔记往往写在他的图画边上。他原本可能看出这条引文在列奥纳多笔记中的位置。那些笔记通常只有五六七行，至多半页，同图画混杂在一起。这段话就在一张纸页的图画旁边；列奥纳多作品的不同地方都分布着鸟类飞行研究，这正是其中一处。列奥纳多写道："我仿佛命中注定特别研究……"——不是秃鹫，而恰恰是旁边画着的那种鸟，也就是鸢。

鸢对于鸟类飞行研究格外有趣，这件事在老普林尼那里已经出现。老普林尼自古便把它视为对飞行员格外有启发的东西，因为据他说，鸢尾巴的运动，对任何舵的作用都尤其具有示范性。列奥纳多·达·芬奇研究的正是同一件事。沿着历代作者来看鸢的这项基本特征，十分有趣：从古代的老普林尼起，它便为人所知，后来又通过各种作者——其中有些我稍后会顺带谈到——不断重现；有人向我保证，它甚至延伸到我们时代：两次大战之间某个时期，福克先生曾实地研究鸢尾的运动，酝酿那些关于飞机"俯冲"动作的漂亮小准备工作。这当然是对自然飞行真正令人厌恶的拙劣模仿——我希望你们在这点上同我看法一致——，不过我们本来也不该对人类的变态抱有更高期望。

于是，这里就是这只鸢；它本身倒确实很适合挑起这种人类的变态，因为这种动物没有任何特别吸引人的地方。贝隆写过一部非常出色的

鸟类著作；他曾受亨利二世委派前往埃及及世界其他地方，并在埃及见过一些鸟，把它们描绘成肮脏而不讨喜的动物。它是什么？



Pierre Bellon：《L'histoire de la nature des oiseaux》，1555 年，第 130 页。

我得说，我一度希望一切都能圆起来：弗洛伊德的秃鹫虽然其实是鸢，却最终仍会同埃及有所关联，而所谓埃及秃鹫归根结底正是它。你们看，我总是多么希望把事情圆回来。可惜完全不是这样。事实上，情况很复杂。埃及确实有鸢；我甚至可以告诉你们，我在卢克索吃早餐时，忽然在视野边缘看见某个东西“呼……嗖”一声，斜刺里飞过，叼走了桌上的一只橙子。

我一度以为那是一只隼：荷鲁斯、太阳圆盘……但立刻发现并非如此。它不是隼，因为这只动物落到一处屋顶角上，又放下那只小橙子，仿佛表示这不过是一场玩笑。可以清楚看出，那是一只棕红色、有着特殊姿态的动物。我立即确认它是一只鸢。你们看，鸢是一种多么常见、可供观察的动物。列奥纳多·达·芬奇在鸟类飞行问题上感兴趣的，正是这种动物。

但还有另一回事：有一种埃及秃鹫同它很相像；如果是它，事情原本就能圆起来。贝隆谈到这种鸟，称它为“埃及圣鸟”；自希罗多德以来，人们就以 Hierax［希腊语：隼］之名谈论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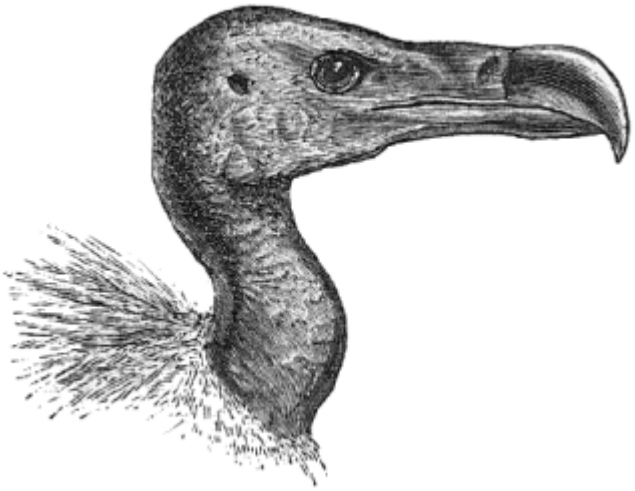
Pierre Bellon：《L'histoire de la nature des oiseaux》，1555 年，第 110 页。

埃及有大量这种鸟；它自然是神圣的。希罗多德告诉我们，在古埃及杀死它会招来最严重的麻烦。它很有意思，因为既有点像鸢，也有点像隼。在埃及表意文字中，正是它大致对应字母 aleph；我在关于象形文字及其对我们的示范作用的论述中谈到过这个字母。这里涉及的是秃鹫，也就是大致所谓“埃及圣鸟”。假如为女神穆特服务的是这种鸟——你们知道，弗洛伊德在谈秃鹫时提过穆特——，一切就都能说通。

然而这仍行不通。弗洛伊德确实彻底弄错了；尽管我们作了上述全部补救，为女神穆特服务的秃鹫其实是这一只，也就是图表右侧画出的那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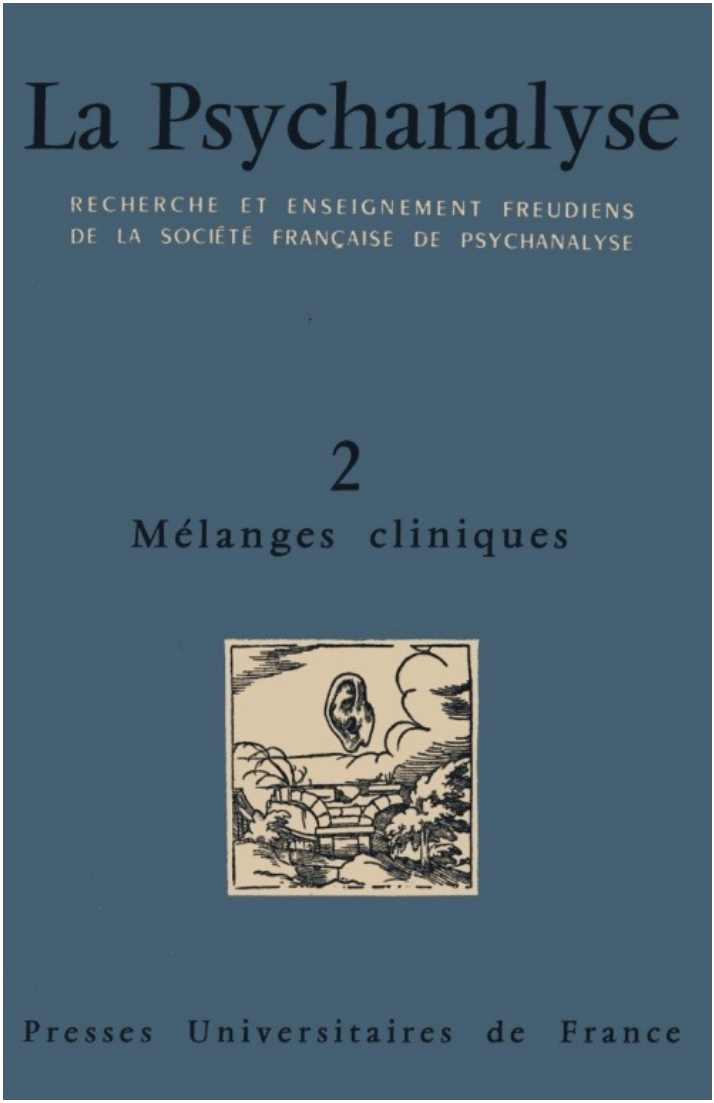


它不像另一只鸟那样具有语音价值。这只秃鹫充当限定符，也就是说，人们把它附加上去。它有时单独指称女神穆特，这时会在它旁边再加一面小旗；有时又被整合进一个完整符号，先写 MOUT，再加上这个小限定符；或者干脆让它自身等同于 M，但仍会再加一个小小的 t，也就是说，终究还要把这个词语音化。参见原文中的象形文字图样。它出现于不止一种组合；所涉及的确实总是母神，而在这种情况下，用的是这种完全不同的秃鹫，一只真正的 gyps。它绝不是处在鸢、隼及其他邻近动物边界上的那种秃鹫，而是完全不同的一种。



谈到母神时，涉及的正是这只真正的 gyps；弗洛伊德将向我们转述的那些动物志传统，也都同这只秃鹫有关。例如，霍拉波罗传下来的内容便属于埃及文化的衰落时期；他的著作本已残缺，又经过千百次转述、抄写和变形，到文艺复兴时成为若干合集的题材。当时的版画家为它们配上小型徽记，而这些合集据称能向我们提供若干主要埃及象形文字的意义值。

你们所有人都应当熟悉这部著作，因为《精神分析》杂志封面上的图画正是我从中借来的。



霍拉波罗对我在这里看到写着的东西作了如下描述：“画出来的耳朵，意指已经完成或应当完成的作品。”参见原文图画。不过，我们不会因为一个时代的坏习惯而被拖到这上面去——

那个时代的一切并非都值得接受。弗洛伊德正是从霍拉波罗那里取得秃鹫这项参照；它不仅意味着母亲，还意味着某种有趣得多的东西，推动他在辩证法中迈进一步：有一种鸟类动物，只存在雌性。

这是一个古老的动物学谬误；它像许多其他谬误一样源远流长，在古代就已——

得到记载——当然并非见于最优秀的作者——，却无疑在中世纪文化中获得普遍接受。若以为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精神从某种视角发动了革命，完全没有浸润在中世纪故事中，那就大错特错；只需稍微翻开他的《笔记》，便足以证明这一点。弗洛伊德认为，列奥纳多博览群书，所以一定知道这个故事。此事很可能，也毫不稀奇，因为故事传播甚广；但它没有得到证明。而且证明它更加没有意义，因为这里始终不是一只秃鹫。

圣安布罗斯把雌秃鹫的故事当作自然特意展示给我们的例子，好让我们脑袋更容易理解耶稣由童贞女受孕；这个事实我就略过不谈了。弗洛伊德在这里似乎毫无批判地认为，几乎所有教父都讲过这个故事。说实话，我得告诉你们，我没有逐一查验；从今天早上起，我知道圣安布罗斯那里确实有。

其实我早已知道，因为一位名叫 Piero VALERIANO 的作者，在 1566 年前后编过一部此类传说要素的合集。在我看来，要考察当时人们怎样看待鸢——

以及若干象征要素，这是一项尤其重要的资料来源。书中指出圣安布罗斯曾经援引此说，也指出巴西尔大帝提过它；但它并没有像弗洛伊德所依据的作者似乎认为的那样，列出所有教父。

秃鹫只有雌性，正如蜗牛只有雄性；这曾是一项传统。把两者相互联系很有意思，因为蜗牛是贴地爬行的动物。所有这些在秃鹫那里都有对应项：秃鹫在天空中受孕，向风大大敞开自己的尾部[注3]；有一幅图把它画得非常漂亮。

> [注3] 另参 Fr. Noël：《Dictionnaire de la fable》，Le Normant，1810 年：“[秃鹫] 被用来指母亲，因为据埃及人说，只有雌秃鹫。他们说，这种鸟按如下方式繁殖：‘当它发情时，便向北风敞开生殖器，仿佛由风使其受孕；此后五天里，它不吃不喝，一心忙于繁殖。’”



Piero Valeriano：Hieroglyphica sive de sacris Aegyptiorum literis commentarii，1556 年，第 132 页。

这一切把我们带向哪里？它把我们带到如下结论：同许多这类故事一样，秃鹫故事当然有其趣味。说实话，列奥纳多·达·芬奇的作品中充斥大量此类故事；他对在这些故事基础上构造出的各种寓言颇感兴趣。

我们还能从中得出许多其他东西。例如，可以得出鸢是一种很容易嫉妒、会虐待自己孩子的动物。想想看，如果弗洛伊德碰巧落在这点上，会产生怎样的结果，以及一种何等不同的——

关于同母亲之关系的解释。

所有这些都无法成立；弗洛伊德阐发的整个这一部分没有任何值得保留的东西。我讲给你们听，并不是为了这一点；我不会占据事后批评一次天才介入的廉价优势。甚至常常发生这样的事：尽管带着种种缺陷，天才的目光受到远非这些偶然小考据的其他东西引导，早已比这些支撑走得远得多。

这意味着什么？所有这些让我们能够看到、保留什么？它让我们保留如下事实：在《性学三论》问世 6 年后，在弗洛伊德最初觉察双性现象 10 年或 12 年后，并且参照弗洛伊德此前一方面从阉割情结的功能中、另一方面从阳具与想象阳具的重要性中所阐明的一切——因为后者是女人阴茎嫉羡（Penisneid）的对象——，弗洛伊德论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文章究竟引入了什么？

它在 1910 年 5 月非常确切地引入了阳具母亲、阳具女人这一功能的重要性；不是对于充当其主体的那个女人，而是对于依赖这个主体的孩子。这就是棱线，这就是——

弗洛伊德在这个场合带给我们的独创之处。

孩子联结于一位母亲，而这位母亲本人又在想象层面联结于作为欠缺的阳具；弗洛伊德引入并视为本质的，正是这层关系。它同弗洛伊德此前关于女人与阳具之关系所说的一切截然有别。我今年围绕这一结

构的独创性，展开了对客体关系的全部根本批判；客体关系理论意在依据某种象征关系，建立一种稳定的两性关系。

我今年一直让问题围绕这件事旋转，也已经把它完整地向你们呈现出来——至少我认为——

你们在小汉斯分析中正是这样把握它的。此处，我们在弗洛伊德思想中找到了一则证据：这个东西单凭自身便让我们能够进入列奥纳多·达·芬奇位置之谜。换言之，孩子因同女人的二元对峙而被迫面对、被孤立出来，同时也就不得不面对如下问题：对他的女性伙伴——在本例中也就是母亲伙伴——而言，阳具作为一种欠缺存在。弗洛伊德围绕列奥纳多·达·芬奇构造、思辨出来的一切，都以此为轴心。这构成该观察的鲜明轮廓与独创性；此外并非偶然的是，这也是弗洛伊德首次提到“自恋”一词的著作。因此，它是弗洛伊德作品中整个想象界域本身开始得到结构化之处。

现在，我们必须在我所谓列奥纳多·达·芬奇这个人物的反差与悖论上停留片刻，并提出另一个项的问题。这个项并不新，却也在此以一种格外执着的方式出现；它是弗洛伊德引入的另一项，也就是升华。

我的意思是，弗洛伊德不时参照若干可以称为列奥纳多·达·芬奇神经症特征的东西。他仿佛时时都在寻找某次危急转折的痕迹，在我不知道怎样的词语重复中寻找遗留的关系，寻找某些强迫性的口误。

他还把求知欲中那种说不清的悖谬之物——传统所谓 cupido sciendi——同列奥纳多的好奇心拉到一起；他甚至几乎把后者也变成一种强迫性的东西，称其为“窥探的强迫冲动”。不能说这里毫无提示；不过，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整个人格不能由神经症解释。弗洛伊德把

某种被抬高乃至固定的儿童倾向之残余——恰恰就是列奥纳多病例中涉及的倾向——的一条本质出路引入进来：他援引了升华概念，而此前在《性学三论》中已经引入过它。

你们知道，关于升华，弗洛伊德归根结底只告诉我们：这种倾向确实会转向一些并非原初对象的对象，而是在人类与人际考量中所能提供的最高对象。直到后来，他才对此作了一些补充，指出——

升华在建立自我兴趣时可能发挥什么作用。

此后，精神分析共同体中的若干作者重新接过升华主题——

把它同中性化以及"本能的去本能化"概念联系起来。我得说，这是一种很难设想的东西：力比多的去力比多化、攻击性的去攻击化。我们最常在哈特曼和勒文斯坦的著作中看到这些最和善的说法。

所有这些都几乎没有阐明，升华作为机制究竟可能代表什么。

弗洛伊德所表述的列奥纳多·达·芬奇这类观察，其意义在于：我们可以从中取得一些想法，至少可以开启某种工作，使我们能够提出一个更具结构的项，超越"一种本能使自己去本能化"的概念，甚至超越一个对象如人们所说变得更加崇高这种说法——因为这似乎就是升华的 Saft［汁液、树液］。

列奥纳多·达·芬奇本人也成了某种理想化——如果不是升华——的对象。这项工作在他生前就已开始，倾向于把他塑造成一种"普遍天才"；在有些人那里，他当然还成了现代思想令人惊叹的先驱。甚至一些十分博学、像弗洛伊德那样着手清理这个问题的批评家，以及在其

他层面工作的作者，也这样看待他。例如迪昂说，列奥纳多已经预见物体下落定律，甚至预见惯性原理。从科学史角度作一番哪怕稍微严密、而且能够依方法进行的考察，就会表明事实并非如此。

不过，列奥纳多·达·芬奇显然作出过令人惊叹的发现。他在运动学、动力学、力学和弹道学方面留下的各类图画，常常显示他的知觉异常切中要害，远远超前于他那个时代已经完成的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也绝不让我们可以相信，在所有这些领域此前没有一些数学化程度已经推进很远的工作，尤其是在运动学上。

不过，亚里士多德传统仍有残余，也就是一种建立在某些经验自明性上的传统；因此，已经相当发达的整个抽象运动学之数学形式化，完全没有同所谓经验领域结合起来。我指的是真实存在的物体，那些在我们看来服从重力定律的物体。重力以其经验自明性如此长久地堵塞人类心智，以至于人们花了你们都知道的漫长时间，才终于为它给出正确表述。

想想看，在列奥纳多·达·芬奇的图画及其附注中，我们仍会看到如下断言：一个物体越重，下落就越快……我想，你们从中等教育中至少还记得足够多，知道这是一个错得极其严重的定理；尽管经验——用通常的说法，处在粗大层次上的经验——

……当然似乎会迫使我们接受它。不过，我们在这些图画中看到的东西，其独创性究竟来自哪里？

我在这里指的是他留给我们的部分作品，也就是严格说来那套工程师作品；它不仅令同时代人惊讶、感兴趣乃至着迷，也同样打动此后历代。那些东西的确常常远远超前于时代；但在运用数学、使数学可以

说鲜活进入实在现象分析的秩序方面，它们当然不能越过一些尚未被跨越的界限。换言之，他带给我们的东西，在发明力、构造和创造性上常常绝对令人赞叹。比如，他以极其优雅的方式确定若干定理；这些定理可以用来评估附着于一个 circum mobile 物体——即能够围绕一根轴转动的物体——上的力，其作用量怎样逐渐变化。能看到这些已经足够了不起。

这股力连接在一条臂上，臂会转动。随着杠杆转动，这股力的效能将怎样变化？面对这类问题，列奥纳多·达·芬奇善于把它们转译成我所谓对力场的一种观看；决定这种观看的，与其说是他的计算，不如说是他的图画。总之，在他那里，直觉要素、创造性想象要素同赋予经验原则的某种主导地位相联系，也成为各种迅疾、原创却终究局部的洞见之源；它们停留在工程蓝图层面。

这绝非无足轻重，因为相较于工程师书籍里已有的东西，你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像科瓦雷这样的科学史批评家告诉我们——图画与工程蓝图之间的全部差别。但一幅工程蓝图即使能仅凭自身显现某些量、某些值之间关系的各种直觉要素——它们仿佛只在器械的排列中就获得形象与物质形式——，也仍无法在更高的、原初—象征的层次上解决某些问题。

例如，归根结底，我们会在列奥纳多·达·芬奇那里看到一种不充分乃至错误的斜面理论。这个问题直到伽利略才真正解决；再借用科瓦雷的一个说法，就实在界的数学化而言，它只有通过这样一场革命才获得解决：从某一时刻起，人们决定彻底净化方法，也就是用一些明确从不可能出发的项、方式与问题设置，去检验经验。

请听清楚：只有当人们开始把公式的表述从如下假设中释放出来——

也就是从任何所谓“对实在的直觉”中释放出来——，例如放弃“越重的物体下落越快”这种自明性时，工作才真正开始。

换言之，人们开始从另一个出发点进行阐发，例如正确的重力出发点；这意味着从一个仿佛在任何地方都无法得到完全满足的公式出发，因为实现它时，我们总会处在不纯的实验条件中。正因为人们从一种纯粹的象征形式化出发，实验才能以正确方式实现，数学化物理学也才开始建立。可以说，许多个世纪都曾努力抵达它；然而，在最初便承认象征界与实在界的这种分离以前，没有一个世纪真正成功。历次实验与摸索所构成的这条道路，确实令人着迷，值得一路追随——

看它怎样从一代研究者传到下一代研究者。

这正是科学史的意义：此前，人们归根结底一直停留在这种两者之间、这种不完整、这种局部、这种想象性之中，也停留在那些迅疾洞见中。它们甚至让列奥纳多·达·芬奇本人形成如下说法——这才是我要谈到的地方——：他同自然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服从自然的关系。假如“自然”一词在列奥纳多的作品中仍发挥如此重要、如此本质的作用，那么我们必须时时把它的在场把握为一个绝对首要的本质要素。这仍是一种面对他者的方式：人们必须破译其符号、背面、分身，也可以说把它视为共同创造者。所有这些词其实都见于列奥纳多的笔记。他正以这种视角质询自然；可以说，我想借此抵达的，是想象界同某种他者之间的混淆。后者不是我们所处理的那个根本大他者

——我教你们把它定位、画成无意识的位置与场所——；而是这样一个他者……

很重要的是，要看到列奥纳多·达·芬奇多么坚持声称：自然中没有声音。

他为此给出一些极有趣、极奇特的论证；值得看看，证明不可能有某个人回应他这件事，在多大程度上对他变成严格说来具有强迫性的东西。当时，所有人相信有某种精神在空气中的某处说话；回应者就是这样被称呼的。

这件事对他至关重要；他坚持不懈，反复返回。事实上，对某些人而言，公开宣称这项真理几乎是一桩丑闻。不过，列奥纳多质询自然时，把它当成这样一个他者：它既不是主体，人们却又应当阅读它的理路。我这样说，是因为列奥纳多本人写道：

“自然充满无限理路，而它们从未进入经验。”

假如我们像人们经常做的那样，把列奥纳多·达·芬奇当作现代实验主义的某种先驱，那么这个公式的悖论恰恰表明：当某种演变已经完成、思想中某种东西已经得到清理以后，我们要事后把握那个通常被称作先驱的人，其思想究竟卷入什么之中，会有怎样的距离和困难。

就列奥纳多而言，他面对自然的位置，可以说是同这个并非主体的他者建立关系；但人们仍要探明这个他者的历史、符号、节理和话语，并把握它的创造力量。总之，这个他者把这个绝对大他者的根本他异性，转化为某种可以通过一种想象认同而接近的东西。

我希望你们在弗洛伊德本人援引的那幅草图中，考虑这个他者。弗洛伊德也把一种身体混淆当作谜来指出；正是这种混淆，使圣安妮同圣母难以区分。事情真实到这种程度：假如你们把草图翻转过来，便会看见卢浮宫的画，并注意到：

- 圣安妮的双腿处在最初曾经以最自然方式、而且几乎处在同一姿势的——

- 圣母的双腿所在的一侧；而圣母双腿现在所在的位置，此前又是圣安妮双腿的位置。 这是一种双重存在，两个身体彼此从后方分离出来；此事毫无疑问。在伦敦草图中，孩子延伸着母亲的手臂，几乎像一具木偶，操纵者的手臂伸进木偶体内并摇动它；这同样极其震撼。







除此之外，另一个女人——我们甚至不知道是哪一个——又在孩子身旁显出一根竖起的食指。它贯穿列奥纳多·达·芬奇的全部作品，也是他的谜之一。总而言之，你们会在这里看到如下歧义获得形象：实在母亲与想象母亲、实在孩子与隐藏的阳具之间的歧义。我说这根手指是后者的象征，并不是因为它粗略再现了阳具的外形；而是因为，这根遍布列奥纳多作品的手指，指示着一种存在之欠缺，我们发现这个项处处铭刻在他的作品中。

这里涉及主体相对于这个他者的问题所采取的某种立场：它或者是封闭的绝对大他者、封闭的无意识、无法穿透的女人；而她背后是死亡的形象，也就是最终的绝对大他者。某种经验以一定方式同人类关系的这个终极项周旋；它怎样在其中重新引入想象交换的全部生命，又怎样移动同本质他异性之间的这层最终而根本的关系，让一种幻象关系住进其中——这就叫作升华。列奥纳多的作品时时在天才与创造层面为我们提供它的例子。

我认为，这幅并非孤例的草图——这一独特的密码图——同样表达了上述内容。它只不过是另一幅草图的分身；后者为列奥纳多从未完成的一幅小教堂祭画而作，其中重新呈现圣安妮、圣母、孩子和我们谈过的第四项，也就是圣约翰——在另一处则是羔羊。它是这个四项构图中的第四项；正如每次谈到它时一样，一旦四项关系获得具身，我们显然必须在其中重新找到死亡主题。死亡在哪里？它自然无处不在，从一个人物传到另一个人物。

死亡也正是那个将使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性活动保持死寂的东西；因为这是他的根本问题，也是弗洛伊德围绕其提出追问的问题。列奥纳多一生中，没有任何地方证明存在某种真正的联结、真正的攫取；我们找到的只有含混而短暂的关系。

但归根结底，他的生平给人的印象不是这些，而是某种“梦幻父职”［参见汉斯］。他曾保护、资助几个衣饰精致的年轻人；好几个人从他生命中经过，却没有任何重大依恋真正标记他的风格。假如真要找一个被看见、被归类为同性恋的人，那倒更像是米开朗琪罗。

死亡是否位于这种分身之中？也就是位于他对面那个如此轻易就被羔羊替代的人物之中？同时代人都谈到这只羔羊，尤其是皮耶特罗·达·诺韦拉拉[注4]。他在给通信对象的信中写道：列奥纳多为佛罗伦萨圣母领报教堂主祭坛的一件作品绘制了这幅草图——作品后来从未完成——，全佛罗伦萨人连续两天从草图前走过。然而，所有人都在推敲这幅四人场景的意义：孩子正要骑上羔羊，却被母亲拉住。人人都理解这场戏剧、他的受难和未来命运的征兆；与此同时，凌驾于全景之上的圣安妮拉住母亲，不让她把孩子从自己的命运中移开。

> [注4] Pietro da Novellara 在 1501 年 4 月 3 日致 Isabella d'Este 的信中，描述了列奥纳多当时正在制作的一幅《圣安妮》草图；它可能对应卢浮宫的构图。另参卢浮宫 2012 年 3 月 29 日至 6 月 25 日的展览资料，其中列为列奥纳多第 19 件作品。

正是在作为他的命运与牺牲的这个东西一侧，某个项——而且本质上也是他同母亲之关系的死亡——才能得到定位。但弗洛伊德让列奥纳多此后生命中的全部戏剧化从他同母亲的分离开始。最后还有所有人物中最费解的那一个：被重新建立起来的圣安妮。她被设立在这层纯粹女性、纯粹母亲的关系中，作为这个首字母大写的大他者；她是赋予整个场景以平衡所必需的。与克里斯先生的说法相反，她当然远不是列奥纳多的发明。

就连弗洛伊德也从未有一刻认为，这里引入的"安妮、圣母、孩子加第四个人物"主题是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独家发明。第四个人物无疑在宗教母题史中提出一个颇具列奥纳多特色的问题；但至于把圣安妮、圣母与孩子共同表现出来，只要对当时发生的历史稍有概念，或者随便读过一点历史，就会知道：恰恰在 1485 至 1510 年间，圣安妮崇拜在基督教世界得到推广。它的提升同围绕圣母无原罪始胎展开的全部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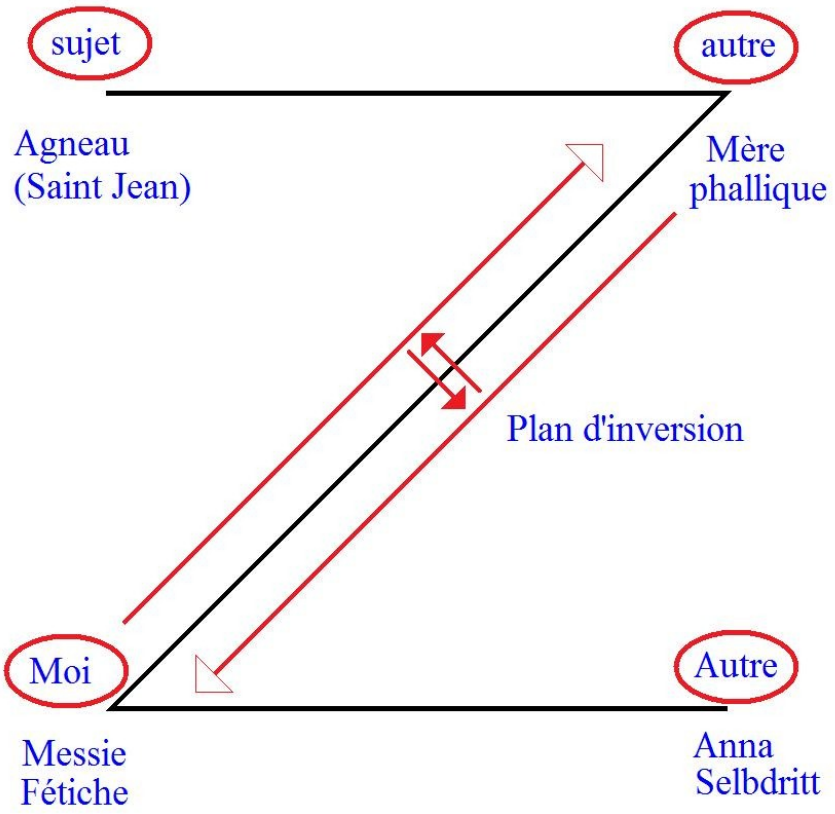
义批判相关；当时，它严格说来成为一个灵修主题以及远不只灵修之事的出口。因为那也是“赎罪券”运动的年代：各种小册子涌入德国，确实都印着安妮、圣母和孩子；人们购买一张，便能为来世得到一万乃至两万年的赦免。

这个主题既不是列奥纳多·达·芬奇发明的，弗洛伊德也未把发明归于他。只有恩斯特·克里斯先生会说，列奥纳多是唯一表现这种三人组合的人；其实只需翻开弗洛伊德，就能看见这幅画的母题以 Anna Selbstdritt 为标题得到表现，意思是“安娜自身为第三者，三位一体”。意大利语也是同样说法：“安娜为第三者，Anna Metterza”。

安娜三位一体的功能在于：在某个无疑关键的时刻……如果我们并不是要重新思考它，就不能经常被关于基督教虔敬的历史批评牵着走……可以说，我们在这里重新找到一种“超三位一体”的恒常性；它在列奥纳多·达·芬奇身上获得心理化身，因而充分显示自己的价值。

我的意思是，列奥纳多无疑是一个被置于深刻非典型位置的人；就其性成熟而言，他处在不对称的位置，而这项不对称仿佛在他身上同一种达到异常活动与实现程度的升华相遇。当然，在一部反复重做百次的作品之阐发中——

一部真正具有强迫性的作品——，没有任何东西能获得结构，而不让某种东西重现自我与他者的这层关系，也重现那个铭刻在图式中的大他者之必然性；我有时正请你们借这幅图式，在这些问题中找到方向。



不过，在这里，我们该怎样看待这个尤其富于戏剧性的人投身想象界道路以后所实现的非典型性？他确实仿佛只从这个三位一体场景中汲取其本质创造的技巧，而它同我们在小汉斯观察结尾处找到的场景相同；这是一回事。但另一方面，这难道不能使我们看清，与他自身主体位置相关的一项扰动吗？

我向你们指出这一点：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性倒错——如果我们真能谈他的性倒错——对我们而言，远不能只被缩减为他某些重要情感关系中的悖论乃至异常。它在这个禀赋齐全的人身上，显得格外带有

一种独特的抑制。当然，人们也许有些过度声称，列奥纳多·达·芬奇的任何地方都没有色情主题；这也许走得太远了。

的确，在弗洛伊德时代，人们尚未发现丽达主题，也就是一位极其美丽的女人同一只天鹅结合；结合的波动动作几乎同她的身体线条一样细腻。假如我们发现，在这里又是鸟代表男性主题，而且显然是一个想象幻想，那当然相当引人注目。不过，暂且不谈。有一个东西必须说：只要我们依据能够获得的列奥纳多经验，就无法把它排除在外；这就是他的手稿。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翻阅过一卷复制本。看见一个人的所有笔记都用镜像文字书写，继而又读到这些笔记，看到他始终对自己说话、用第二人称称呼自己，终究会产生某种效果：

> “你要做这件事。你要向巴黎的让询问干画法的秘密。”或者：“你要去街角商店取两撮薰衣草或迷迭香。”都是这类事情，一切混在一起。它最终也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把人攫住。

总而言之，自我对他者的这层认同关系似乎至关重要；只有建立它，我们才能理解各种认同怎样构成，主体的自我又怎样从中推进。于是人们会想到，随着每一场升华并与它相关地……也就是说，随着这个去主体化、使大他者自然化的过程——后者在这一过程达到或多或少的总体性或完善程度时，仿佛构成其本质现象——

……总会在想象界层面发生某种东西；它以程度不同的鲜明形式，构成自我与他者关系的这种倒转。因此，在列奥纳多·达·芬奇这样的病例中，可以说，我们真正面对的是这样一个人：他从自己的想象他者出发，对自己说话并评论自己。

我们确实应当把他的镜像文字纯粹而简单地看作他面对自身的位置所造成的事实，看作这种根本异化的事实。在上一次研讨班中，我也正把小汉斯的嫉妒问题悬置在这种异化上；借此，我当然要提出如下问题：我们能否设想，同一个过程的整个方向相关地……

- 我们称它为升华；
- 称它为心理学化；
- 称它为异化；
- 称它为自我化；……还存在一个维度，使存在把自身遗忘为大他者的想象对象；也就是说，存在着某种东西，可以解释想象自我中一种根本而本质的遗忘可能性。

[1956—1957 年研讨班完]